

高 敏 主 编

yin • shi • zhuan



隱士傳

河南人民出版社

隐 • 士 • 传

高 敏 主编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豫)新登字 01 号

隐士传

主 编 高 敏 责任编辑 笑 峰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卫生厅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125 字数 419000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215-03111-X/K·471 定价:20.50 元

序 言

· 高 敏 ·

(一)

“士”，在我国古代有各种不同的涵义。《白虎通·爵》，谓“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这大约是比较后起之义。从年龄方面讲，凡成年男子的已婚与未婚者，都可以称为“士”。凡从事军事战斗者，也可以叫“士”，如《荀子·王制》所说的“霸者富士”，就是如此。也可以单指有知识技能者，如古代把“士”与农、工、商并列称为四民之首的“士”，就是这种情况，故《谷梁传·成公元年》何休注，谓“士民”为“学习道艺者”。还可指低级贵族而言，如《韩非子·说难》有“用告商王士”的说法。《礼记·礼运》所说的“隐士”之“士”，近乎古代的隐士。《礼记·礼运》并列的作为四民之首的

“士”。所以，“隐士”之“士”，是对我国古代社会里具有一定知识与技能者的称呼，它大体上相当于近代的知识分子的概念。由于这种“士”掌握知识和技能，就具备为官作吏的条件，因而就逐步产生了“士”同“任事”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从而使“士”同为官作吏产生了必然的联系，于是就逐渐产生了士、庶的分野与对立，使“士”成为了一个特殊的阶层。

由于“士”阶层的“士”是与为官作吏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有条件为官作吏而主观上却不愿为官作吏的一部分“士”人，就成了“隐士”。所以，“隐士”，是指有条件为官作吏的“士”阶层中不愿为官作吏者而言，是同愿意为官作吏者相对立而存在的。因此，同一个士阶层就产生出为官作吏之士与隐居不仕之士的分野。于是，隐居不仕之士同为官作吏之士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隐”与不隐，亦即为官与不为官。本文所论的“隐士”，是对我国古代社会里凡具有为官作吏条件的士人而不愿为官作吏者的总称。

“士”，既是有知识、有技能的人，这种士人又有愿意为官与不愿意为官的区别，那么，这种“士”只可能产生于“学在官府”的局面被破坏和私学之风兴起之后，也只可能产生于官僚制度初步形成之后。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学在官府”的时代，民间无私学的存在，因而在民间不会产生掌握知识、技能的士阶层，没有士阶层的形成，自然更不会有以“任事”为目标的阶层需求。另一方面，在官僚制度产生之前，盛行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石的世卿世禄制度，所有国家机器的任职者，都是固定在一个家族中世代相传，民间的“士”，即使存在，也根本没有为官作吏的可能与条件，自然也不存在“士”之愿意为官与不愿意为官的状况与区分。这就是说，这种愿意为官与不愿意为官取决于“士”阶层本身意志的情况，只有在世卿世禄制解体和官僚制度初步形成之

后才有可能出现；掌握知识技能的“士”的大量出现，也只有“学在官府”之制解体与私学之风兴起以后，从而才有“士”阶层的形成。因此，“士”阶层的形成，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了“士”阶层的形成，才会从中分化出隐居不仕者，因而“隐士”这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也同样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不是有史以来就有的。只有当“学在官府”的格局被破坏、私学之风盛行和官僚制度取代了世卿世禄制度之时，才是“士”阶层的形成时期，才是“隐士”这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从“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时期。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隐士”是我国古代私学之制盛行和官僚制度出现以后的产物。

在我国古代社会里，适应着“学在官府”局面的破坏和私学盛行而产生的“士”阶层，实现于春秋战国之际。从此以后，才有由私学培养的士人存在，才有由士人创立的各种学说、学派的产生，才有士人数量的日益增加，随后才有士人的政治主张与要求出现，随之才有各诸侯国的卿、大夫蓄养士人为自己服务的事发生，进而才有取消世卿世禄制而代之以士人可以为官作吏的封建官僚制度的萌芽。有了这个前提条件，才有可能出现士人愿意为官与不愿意为官的分野，才开始有“隐士”的出现。随着士人中不愿意为官者人数的日益增加，才会逐步形成一个特殊的“隐士”阶层。因此，“隐士”的产生，只可能萌芽于春秋之际，到战国时期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社会阶层。依此而言，从上古时期到春秋战国之前，应当说是不存在“隐士”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的。

然而，在我国古籍中，往往有“隐士”的记载，似乎“隐士”的存在是十分古老的。据皇甫谧《高士传·序》云：“鸿崖先生，创高于上皇之世；许由、善卷，不降于唐虞之朝。”可见在他看来，所谓“三皇”、“五帝”时代，就有高隐之士存在。《后汉书

·逸民传序》也说，舜时有隐逸之北人无择。当皇甫谧在他的《高士传》中讲述高士具体情况时，又指出王倪、瞿缺、巢父、蒲衣、壤父等人，均为尧、舜时期的高隐之士；接着，他又举出老莱子、弦高、荷蓐、石门守者、东郭顺子、列御寇、段木干、公仪潜、王斗、黔娄先生、原宪、陈仲子、披裘公、江上老人及乐臣等高隐之士，是春秋时期和战国前期的人。到战国末年和秦王朝时期，他还提出了盖公、东园公、毋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黄石公、鲁二徵士、安期先生、东郭先生及田何等人也为高隐之士。除此之外，孔子生活的时代，据说还有他崇敬的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蓐及仪封人、楚狂接舆等七人，除石门、荷蓐等人同皇甫谧所举重复外，余皆超出皇甫谧所举，可见他们所列举者都不是史书所载自上古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高隐之士的全部。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后世所说的真正的“隐士”呢？今天看来，除战国时期已有隐士阶层的初步形成期的萌芽型隐士之外，春秋时期以前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隐士”的。原因很简单，这是由于夏、商、周三代不存在官僚制度，也没有“士”阶层的形成，这时的官吏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按照宗法制度而确定的，一经确定，各级官位都是世代相袭的。在这种世卿世禄制下，根本不存在出身于平民的“士”阶层和不愿意为官作吏的情况存在，从而就决不会有隐居不仕的隐士产生的土壤。至于三皇、五帝时代，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已有国家、政权存在；即使已有初级的或原始的国家、政权的雏形存在，其任职者也是由本氏族或部落成员选举产生的，既不存在专门做官的士，又何来“隐居不仕”的高隐之士！因此，不管是皇甫谧的《高士传》说得如何神秘，也不论其他古籍对高隐之士讲得如何神奇，三皇五帝时期的高隐之士，全属于虚乌有；三代时期的隐士，也是出乎后人的杜撰。故《隐

士传》的编写，拟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并以秦汉以后诸封建王朝为重点。

(二)

隐士的出现既是在私学与官僚制度基础上的产物，那么，随着私学之风的盛行与官僚制度的发展，必然导致“隐士”这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所以，战国后期和秦王朝与西汉时期，由于封建官僚制度的正式确立，隐士的存在就由个别的偶然的现象逐步形成一个社会阶层。西汉末年，社会矛盾尖锐，尤其是王莽篡汉，引起许多忠于汉室的士人的不满，于是隐居山林以避王莽政权征辟的士人大为增加，从而出现了隐士在封建制度形成后的第一个高潮期。到了东汉，汉光武帝鉴于王莽篡汉的历史教训，大举提倡名节，从而以表彰西汉末年不仕王莽政权的士人为手段，以达到引诱东汉士人永远忠于东汉政权的政治目的。然而，到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宦官相继专权，政治极端黑暗，加上汉武帝独尊儒术和东汉白虎观会议以后，儒学之士大有增加，仕途却被外戚、宦官所垄断，因此，有志之士往往羞与这些人为伍，于是，又出现了隐居不仕的又一次高潮。正因为如此，范曄所著《后汉书》，又在《史记》与《汉书》专为社会不同的群体列传的体例之外，第一次增加了《逸民传》，专为有条件为官而隐居不仕者立传，这说明东汉时期的隐逸之士，不仅已成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而且说明隐逸之风成了这时值得重视的社会风尚。自此以后，《晋书》有《高逸传》，《宋书》有《隐逸传》，《南齐书》有《高逸传》，《梁书》有《处士传》，《后魏书》有《逸士传》，《北史》、《南史》均有《隐逸传》，《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

《金史》、《元史》及《明史》均有《隐逸传》，足见历代王朝均有隐逸之士存在，亦即“隐士”这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的存在，是封建官僚制度长期共存的。上述诸正史之所以为隐逸之士立传，表明封建统治者是一贯重视这个社会阶层的。有的不仅重视而已，还把他们敬之若神明，誉之曰“高士”，如刘向的《说苑》、王隐的《晋书》和何法盛的《晋中兴书》，对隐逸之士都有不同的颂扬；陆云的《逸民赋》、陆抗和左思的《招隐诗》，都对隐逸之士给予了崇敬之情；更有晋初人嵇康的《高士传》、晋人皇甫谧的《高士传》、虞般佑的《高士传》及袁淑的《真隐传》（见《宋书·隐逸传序》）等，不仅集中记载隐逸之士的事迹，而且把他们吹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隐逸之士在封建社会里的重要地位。那么，这些人所属的社会阶层，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阶层呢？这无疑是对隐士进行探讨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由于隐士是对我国封建社会里具备为官作吏条件而又不愿为官作吏甘于退隐林泉者的称呼，不论他们隐居不仕的原因如何不同，也不管他们不愿为官的方式如何千差万别，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具备为官作吏的条件的一些人或社会集团。从这一点着眼，表明他们都是在当时的社会有一定地位的人。他们的这种社会地位，来源于他们在政治上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在经济上自给而有余，在文化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作为“士”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所决定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他们就无以成为“士”阶层的一部分，也无条件为官作吏，更不会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甚至更没有生存下去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正如鲁迅在《隐士》一文中所说：“登仕，是啖饭之道；归隐也是啖饭之道；假使无法啖饭，那说连‘隐’也隐不成了。”（《鲁迅全传》卷6《隐士》，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正因为隐逸

之士必须具备隐居不仕的起码物质生活条件，可见“隐士”这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基本上应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范畴。这是“隐士”的属性之一。

另一方面，“隐士”又是整个“士”阶层中不愿为官作吏的一部分，从这一点着眼，又表明他们毕竟不同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他们既无炙手可灼的权势，又无高官厚禄的官品，徒有超世绝俗的空名，实质上在政治上属于庶民、平民或白衣；有些隐逸之士基于隐逸的原因的不同，还可能是封建统治阶级当权派的反对派或不合作者。因此，基于这些因素，“隐士”阶层虽然在整体上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与封建剥削阶级的范畴，在政治上却不同于封建统治的当权派；在经济上也不同于“田亩连于方园”的封建剥削阶级，尽管有的隐士也拥有自己的“田园”，也有自己的奴仆，靠吸吮劳动者的乳汁而生存，但大都比较清贫俭朴，有的还要亲身参加一定的劳动，却又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提供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这就是说，“隐士”阶层又有比较接近当时的劳动人民而本身并不是劳动人民而属于剥削阶级的一个特定组成部分的特征。正因为如此，以致某些隐士比较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往往能够发出一些体现劳动人民需求与意愿的呼声，甚至有接近于劳动人民的思想倾向。

正因为隐士阶层中人物，就其整体而言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与封建剥削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在考察他们的作为、言行和思想倾向时，就不应该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去认识问题；特别是分析他们所以隐居不仕的原因时，不能脱离他们的阶级地位、阶级意识和阶级倾向去作抽象的描述，更不应该抽掉他们的阶级属性而把他们笼统地称之为封建社会的“文化人”，把他们隐居不仕的原因，说成是什么在封建社会条件下“追求理想价值”，

从而得出什么“隐士”是“作为文化人心态的产物”的结论（见《学术研究》1992年第4期《中国古代文化人心态探析》一文）。总之，我们应实事求是地去探求我国封建社会“隐士”阶层的阶级属性以及分析他们其所以隐居不仕的社会根源与个人性格倾向，切忌把一切都归之于什么“古代文化人的心态”表现。

（三）

隐士是具备了为官作吏的古代士人，一旦作为官吏，就跻入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当权派的行列，可以取得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利益，甚至可以享受许多特权，然而这部分士人却不愿意为官。是什么原因使之如此呢？这中间无疑有其复杂而深刻的根源。从古代士人的个体而言，决定其走上隐居不仕道路的因素，质言之，不外客观、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以客观方面的原因而言，可以是由于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不合理性，使一些本来可以为官作吏的士人屡次失去为官作吏的机遇，从而走上消极悲观的隐居不仕道路；也可以是因封建政治腐败，有才能者不得为官，而无才能者却以善于钻营而得宠，因而使一部分才识之士愤世疾俗，转而走上隐居不仕的道路；有的是一些已经获得官位之士，由于官场险恶，或长期不得升迁，或遭到无端排斥、陷害、歧视和暗算，从而鄙弃为官作吏而遁隐山林；有的则因为做官之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实现；有的则因为在不同派别或利益集团的矛盾斗争中失利而被迫弃官不仕，隐居山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都属于客观方面的原因。以主观方面的因素而言，也同样十分复杂：有些士人，或有山林之癖，因而以隐居林泉之下为其生活的最高追求；有的专好花石之奇，宁愿放弃仕途生涯，追求安

静与澹泊，因而“放情肆志，逍遥泉石，无意于出处之间”（《旧唐书》卷192《隐士传序》）；又有的士人，或感于求官之不易，更不想献媚于人，不甘为五斗米折腰，因而养成淡泊于名利的性格倾向，“安苦节，甘贱贫”，“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皆欣欣于独善，鲜汲汲于兼济”（《隋书》卷77《隐逸传序》）；更有些士人，本来就具有内向型性格，行为迂怪，性格乖张，不好与人交往，甚至不容于当世，所谓“持峭行不可屈于俗”（《新唐书·隐逸传序》）；更有些士人，为了获得官位，故意以隐居不仕相标榜，以取得封建当权派的重视，以特殊的方式把他们引入仕途，这属于以隐居不仕为求官手段者，即所谓“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托薜萝以射利，假崖壑以钓名”（《旧唐书·隐逸传序》）。如上所述，客观方面的原因虽然千差万别，主观方面的原因也各不相同，然而，都可以走上共同的道路——隐逸之路，均可以成为隐士。当然，更多的情况，是主观与客观原因同时存在，使古代士阶层的一部分人走上隐逸之路。

由于隐士走上隐逸之路的主观、客观原因的千差万别，也使隐士呈现出高下之分，人们对他们的看法也大有差别。主要由于上述诸客观原因而走上隐逸之路者，大抵均为对当时的封建政治有某种不满的有为之士，他们的隐居不仕，或弃官而隐逸山林，实为对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当权派的一种消极抗议，或者说是一种无声的反抗。像这样一些隐士，往往能够勾起各个不同阶级与阶层人士的同情之心，于是有人把这些人称之为“高士”，为之立传，加以歌颂，以寄托其对当时腐败的封建政治的贬斥之情。这样一来，这些隐士的所作所为，无形中就起到了对当时封建政治激浊扬清的作用。于是，这些隐士便成称颂的偶像，仰慕的楷模，正如皇甫谧在其《高士传·序》中所赞誉的那样。因此之故，各封

建王朝的统治者为了笼络人才之心和求贤之望，也需要几个这样隐士到自己的麾下，以装点门面，从而出现了“凡中贤之主，未赏不聘岩穴之隐，迫逐世之民”（《太平御览》卷501《逸民部》引皇甫谧《高士传序》）的状况，于是隐逸之风，由此弥盛！

主要由于主观方面的原因而走上隐逸之路者，其影响与作用，自然远不及前者。特别是那些名隐而实不隐，以隐居为手段以求官晋爵目的的所谓“隐士”，他们的隐居不仕，完全是一种骗局，是为了沽名钓誉，他们身在山林，心存宫阙，其汲汲于名利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终日绞尽脑汁而角逐于官场的追名逐利者。正如鲁迅在《隐士》一文中所说的：“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人间是不会知道的。”他们高挂隐士招牌，有人替他们“开锣喝道”，正如刺陈眉公的诗所云：“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家”；也如唐末诗人左偃所云：“谋隐谋官两无成”，隐而需谋，且同“谋官”并列，则这种“隐”之非息影山林者可知了。这种以隐为职业、为手段的隐士，自然称不得真正的隐士，而历代隐士中却不乏这样的“隐士”，这是最令人讨厌不过的了！封建士人之或仕或隐，除了取决于上述士人本身的主观、客观方面的原因外，还各有其时代的与社会的原因和风尚等因素。

综观一部中国古代史，除春秋之前尚无官僚制度的产生与士阶层的形成从而无所谓“隐士”存在外，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有了士阶层的萌芽和官僚制度的肇端，封建士人开始有了选择出仕与选择隐居的条件，因而到战国后期，出仕的士人与隐居不仕的士人都逐渐多了起来。不过这时的隐居不仕者的数量，同当时热衷于游说于诸侯，取信于方伯，各自出谋献策，竞宠才能，以纵横驰骋于一时并显赫于当世的出仕之士比较起来，几乎只是海

洋中的一个浪花。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秦和西汉以后，以军功入仕的途径向士子们敞开了大门，新的统治阶级的格局也未固化，布衣之士往往于朝夕之间就可以升至卿相，于是仕途的宽阔，使隐逸之士很少见于史册，故《史记》、《汉书》均无《隐逸传》的专篇，见于秦和西汉的隐士，秦时仅有王次仲、周贞实而已（王次仲见于《水经注》卷13《温水注》；周贞实，见于陶岳之《零陵总志》）；西汉仅有“商山四皓”，见于《史记·留侯世家》。然而，到西汉末期与东汉时期，情况就判然不同了。这时立军功进入仕途的道路已经阻塞（详见拙作《论西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收入《秦汉史论集》1982年8月中州书画社出版），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已经形成，统治阶级的阵容与格局已经固化，布衣之士上升为官的途径已大为缩小，特别是察举制度的实行，乡举里选已成为封建士人入仕的必要阶梯，而乡里的评议却完全掌握在世族地主手中，这又使一般士人的仕途进一步狭窄。而另一方面，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之士大为增加，在当时儒家经典被立于学官和通经可入仕的情况下，儒生们由精通经学进入仕途，几乎成了广大儒生们的唯一正途，于是儒生希望入仕的数量大为增加。事实也正是如此，据马彪先生考证统计，西汉武帝时由儒生入仕者，占公卿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八；宣帝元帝时就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到东汉光武帝时期，竟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七；章帝以后各代，几乎都占百分之四十（参见《试论汉代的儒宗地主》一文，刊《中国研究》1988年第4期）。这说明通经的儒生，确以入仕为官为其主要出路。因而到西汉时期特别是东汉时期，有条件为官作吏人数的增多同仕途十分窄狭的矛盾就显得日益突出和尖锐，这就自然会加深士人出仕的难度，也会增加士人终身无法谋得官位者的数

量,从而使他们被迫走上隐逸之路而成为隐士准备了土壤与基础。因此之故,在西汉末年王莽篡政之时,许多儒生因反对王莽篡汉,正好找到隐居不仕的借口,于是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士人隐居不仕的高潮。东汉光武帝之后,又提倡名节,以鼓励士人不仕于王莽新王朝政权为手段,引诱东汉士人对东汉政权的忠诚,于是西汉末年隐逸之士的名声进一步显赫起来,以致效法者日多而形成社会风尚。加之东汉中期以后,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各立朋党,互相争夺,弄得政治极端黑暗,民不聊生,使不少有志之士有的起而抗议,却又遭到残酷镇压。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使士人产生前路渺茫之感,从而转而摒弃仕途,既以求得心理上的安慰与平衡,又可以耻与阉宦丑类为伍相标榜,还可以洁身自好,于是一个遁迹山林,以隐逸为高的高潮又一次出现了(可参阅《南都学坛》1989年第3期黄宛峰的《论东汉的隐士》一文),而且在数量上超过在此之前任何一个时期,以致范曄的《后汉书》的也特为之立传,开了古代史书有隐逸传之先河。单以见于《后汉书》的隐逸之士来说,就不下数十人,如果再加上见于《方术传》、《儒林传》及其他列传中的一些有隐逸倾向的人,数量更为惊人。由此可见,封建士人走上隐逸之路,除了有如上所述成为隐士的主观客观原因以外,还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诸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不仅从西汉和东汉的情况可以反映出隐士大量涌现同当时政治、社会诸因素的密切关系,西汉以后,其他各代的情况也同样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知道,自东汉末年以后,中国统一的局面被打破,而代之以分裂的局面。随着分裂局面而来的,必然是社会动荡不安和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社会的动荡不安,会使封建士人失去正常

入仕的途径；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更会造成士人朝不虑夕的状况。曹操政权虽然局部实行了“唯才是举”的政策，却并未动摇东汉以来由高门士族把持政权的局面；一些已经成为高门士族的士人，也在激烈的变化过程中沉浮拼搏，时刻有丧失昔日荣光与地位的危险。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和玄学的兴起，前者堵塞了一般士人的仕途，后者加大了大量仕人的厌世、出世思想。加上曹氏与司马氏的争夺政权方面的矛盾，也加剧了有不同政治倾向与立场的士人之间的斗争，斗争的胜败与变幻，也使一些士人产生消极悲观情绪。由于这一系列的政治的社会的因素的交织，不仅使得三国与西晋时期的士人，大量走上隐逸道路，而且出现了像嵇康、皇甫谧这样的以著书立说的形式宣传隐逸之士的思潮，他们不仅大捧当世的隐逸之士为“高士”，甚至把隐逸之士的渊源推到了三皇、五帝时代，既以确立他们的隐逸行为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观点，又以发抒他们心中的闷气。从此，他们的隐士高尚论就影响到整个封建时代，隐逸之风就长期不坠于封建社会。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对峙，双方为争夺领土的战争不已，加上民族关系复杂，北朝有汉胡地主之间的斗争，南朝不仅有侨姓与吴姓地主之争，而且有统治集团的内讧，更有道教佛教的盛行，助长了隐逸思想的泛滥，因而隐逸之士也代代有之。隋唐以后，由于科举制度的实行，一般封建士人出仕的机会虽然增多了，但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仍然此起彼伏，斗争中的失败者和失意者，还是摆脱不了以隐逸为归宿。佛教的盛行与中国化，在封建士人中的影响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于是，宗教的出世思想很容易同科举落第者和斗争失利者的消极悲观情绪合拍，隐逸者的出现也同样不足为怪。

宋、辽、金、元时期，民族矛盾又趋于激烈，反映到当时封

建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主战主和的斗争层出不穷，加上封建士人对当时社会积弊的解决办法有不同认识，从而不能不加剧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封建士人在出仕与隐居上的倾向与态度，以致隐逸阶层仍然绵延不绝。到了明末清初，由于又发生了汉族政权被少数民族统治者夺取的巨大变化，这样一来，又引发了封建士大夫阶层的狭隘民族气节感，于是纷纷以隐居不仕去抗议清政府的统治，有的甚至以此作为反抗的一种手段，以致一批又一批的遗老遗少又加入了隐逸的行列，又出现了一次隐逸之士的高潮。

从上述这一简单的历史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封建士人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政治、社会诸因素，是何等明显地决定着隐逸之风的起落和隐士数量的多少。

(四)

既然封建士人走上隐逸之路有着千差万别的主观与客观原因，那么，依据隐士隐居不仕的动机、目的的不同，性格与好恶的差别，以及其隐居不仕的方式的不一样等等，我们可以把历代的隐居之士大体上区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而且这种类型的划分，古代之修史者已或多或少有所察觉。范曄《后汉书·逸民传序》，谓古之隐士，“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这虽然讲的是隐居原因的不同，但已有把隐士划分为不同类型的趋势。范曄在《逸民传·高文通传》的“论曰”中引其父范泰的话说：“古者隐逸，……或高栖以违行，或疾物以矫情，虽轨迹异区，其去就一也。”显然也有把隐士区分为不同类型之意。沈约《宋书·

《隐逸传序》更进一步把隐士区分为“身隐”与“道隐”两种类型。指出“身隐”者必“穴处岩栖”，“道隐”者“遁世避世”而已，不必身处岩穴。萧子显《南齐书·高逸传序》，则把隐士区分为四种情况：一种为“道义内足，希微两亡，藏景穷岩，蔽名愚谷，解桎梏于仁义，永形神于天壤，则名数之外，别有风猷”；二种为“揭独往之高节，重去就之虚名，激竞违贪，与世为异”；三种是“或虑全后悔，事归知殆”；四种是“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泽”。这四种情况的隐士之中，似乎寓有高下优劣之分。唐人姚思廉的《梁书·处士传序》，则明显把隐士区分为等级：他说“古之隐者，或耻闻禅代，高让帝王，以万乘为垢辱，之死亡而无悔，此则轻生重道，希世间出，隐之上者也。或托仕监门，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处污而不愧其色，此所谓大隐隐于市朝，又其次也。或裸体佯狂，盲瘖绝世，弃礼乐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远寄，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他虽对隐士有高下的区分，却又认为所有隐士，“与夫没身乱世，争利于时者，岂可同年而语哉！”《隋书·隐逸传序》则把隐逸之士区分为大、小两类：“其大者则轻天下，细万物，其小者则安苦节，甘贱贫。”所有这些隐士，“或与世同尘，随波澜以俱逝；或违时矫俗，望江湖而独往，狎玩鱼鸟，左右琴书，拾遗粒而织落毛，饮石泉而荫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独善，鲜汲汲于兼济”，他并未指斥隐士中有盗虚名者。然而，到了《旧唐书·隐逸传序》中，除了把隐士区分为等级外，还进一步指出了“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托薜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退无肥遁之曼，进乏济时之具”的假隐士。《新唐书·隐逸传序》除了把隐士正式区分为高下四等之外，也同样指出：隐士中“放利之徒，假隐士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

焉。”由此可见，古代修史者，对我国古代隐士阶层的认识，也处在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中，他们也企图把隐士区分为不同的类别，同时也辨别其高下。只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并未能作出明确和科学的分类。为此，我们有必要依据隐士之所以隐居不仕的动机、目的的不同，性格与好恶的差别，以及不仕的方式不一等等因素，把隐士区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一曰抗议型隐士，或曰不合作型隐士。

这种类型的隐士，大都同当时的封建统治者站在对立的立场上，至少同当时的官府采取不合作态度，例如“汉室中微，王莽篡位”之时，“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到了东汉中后期，“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后汉书·逸民传序》）。又如曹魏统治时期，亲曹氏之党与亲司马氏之党的纷争，也导致失意者转入愤世嫉俗状态。此外，如民族矛盾尖锐之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激烈之日，都会发生类似情况，正如《南齐书·高逸传序》所云：“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泽”。因此，这种类型隐居之士，主要是基于同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存在不同集团或阶层利益的差别，从而导致政治上的意见分歧，于是在斗争失利或者无法抗争的形势下，转而摒弃仕途，走上隐居不仕的道路。毫无疑问，这样的隐居不仕者，必然具有以隐居不仕为抗议手段的性质，至少也表达了他们不为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所用的不合作态度。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这种类型的隐士是不少的。凡属于这种类型的隐士，大都具有不为富贵所淫和不为威武所屈的傲骨，也有宁为玉碎而不为瓦全的品德，他们往往鄙视权贵，反对暴政；仇恨贪鄙，清廉自律；重视民族气节，同情劳动人民。他们不随流俗，有如出污泥而不染的青莲；他们不羨品官，宛若傲视霜雪而

不萎的寒梅。尽管他们所重视的民族气节，有时可能近于偏狭；他们所追求的作人风貌，也难得都十全十美。但总体来说，这种类型的隐士，在事业上往往有自己的理想与追求，正如《南齐书·隐逸传序》所说：他们“含贞养素，文以艺业”，故他们在政治上往往有自己的见解，在文学上或哲理上有自己的建树，从而为祖国的精神文明宝库增添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甚至他们存在的本身，也给正义凛然之士树立了典范，体现了不朽的民族精神。

二曰淡泊型隐士。

这种类型的隐士，多由于本性淡泊，或性格乖僻，不慕功名利禄，无意于升官发财，又缺乏这方面的才能与条件，故而遁迹山林，但求在青山绿水之间怡养天年，不与于尘世之争名逐利，表现出“安苦节，甘贱贫”（《隋书·隐逸传序》）的性格特征，乐于过“望江湖而独往，狎玩鱼鸟，左右琴书，拾遗粒而织落毛，饮石泉而荫松柏”（同上书）的生活。他们之所以过“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湖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后汉书·逸民传序》）。这就是说，这是他们的性格决定的。实际情况也确不乏其例。如后汉之台佟，没有任何社会原因促使他“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采药自业”（《后汉书·逸民传》）；又如后汉京兆人韩康，“家世著姓”，没有任何其他缘故使他“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同上书）；还如后汉扶风人德真，“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官府屡辟而终不为官”（同上书）。南朝时期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也不婚娶，“居瀑布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唯朋松石”，“介于孤峰绝岭者积数十载”，终于老死山林（《南齐书·高逸·褚伯玉传》）；又如陈留阮孝绪，“性沉静”，幼时“虽与儿童游戏，恒以穿池筑山为乐”（《梁书·处士·阮孝绪传》），足见阮孝绪的终身隐居不仕，也同他的性格有密

切关系。因此，我们称这一类型的隐士为淡泊型或恬淡型隐士，即他们大都不是基于明显的政治原因而走上隐逸道路。

三曰老庄型隐士。

所谓老庄型隐士，即其世界观受浓厚老庄思想影响的士人，甚至是老庄思想的推崇者与发挥者。在老庄看来，功名富贵，对任何人都不是永恒的东西，“宝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只有虚无才是常道，运用到政治上，便只有退隐。由于他们受老庄思想影响，因此崇尚自然，傲视权贵，追求朴素，向往无为。悠悠然有出世之思和脱尘之志，于是走上隐居不仕的道路，实属势所必然。关于这一点，《晋书·隐逸传序》已有论述。《序》云：“处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因而“古先智士，体其若兹，介焉超俗，浩然养气，藏身江海之上，卷迹嚣氛之表，漱流而漱其清，寝巢而韬其耀，良画以符其志，绝机以虚其心。”从而使自己达到“玉辉冰洁，川渟岳峙，修至乐之道，固无疆之休，长往邈而不追，安排官而无闷，修身自保，悔吝弗生”的境界，于是“啸咏林藪，峻其贞白之轨，成其出尘之迹”，就很自然了！像这样的隐逸之士，几乎代代有之。如西汉末年之河内向长，“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故能安贫乐道（《后汉书逸民·向长传》）；后汉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隐于华阴山中”（同上书）；后汉扶风人矫慎，“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同上书）。又如南朝南阳人宗测，“颇好音律，善《易》、《老》，续皇甫谧《高士传》三卷”（《南齐书·高逸·宗测传》）；同时人沈麟，曾“著《周易》、《两繫》、《庄子·内篇训》，注《易经》、《礼记》……数十卷”（同上书）。所有这些人之成为隐逸之士，无疑都同他们具有老庄思想影响的特征分不开，故可名之曰老庄型隐士。

四曰清高型隐士。

这种类型的隐士，虽然同老庄型隐士有某些共同之处，但也有区别。他们走上隐逸之路，主要不是由于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而是基于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我们知道，儒家思想本质是入世的，它同本质属于隐居之道的老庄思想不同。但是，儒家思想也不绝对排除隐逸之道。依照儒家鼻祖孔子的看法，“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他以“无道”与“有道”作为“隐”与“不隐”的分界线；孟子则主张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实际上是以“穷”与“达”作为“隐”与“不隐”的分水岭。而他们的所谓“有道”、“无道”与“穷”和“达”，都是以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主张能否获得实现为依据的。如能实现，就是“天下有道”，自己就可“达”，即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反之，就是“天下无道”，就是“穷”，就只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思想与主张而退隐。这就是说，这种由于受儒家思想支配而来的隐士，大都是出于不得已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反映。因此，他们的隐居不仕，不一定像老、庄者之流遁迹山林，身居岩穴而后为隐，不参与政治活动、注重自己的修身养性，或者教授生徒，著书立说，也就算是隐了。因此，这种类型的隐士，所共同具有的一个特征就是清高。其主要表现就是一不问政治，二是甘于清贫，三是鲜与人交往，四是埋头于自己的爱好和从事著书立说的事业。这就是说，这种类型的隐士，同那些终日隐于山林无所事事者不同，他们或隐于诗，或隐于画，或隐于小说创作，或隐于学术研究，终身孜孜不倦，多有所成。因而他们虽然不能在当时的封建政治生活中有所建树，显露威名，却多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五曰虚伪型隐士。

这种类型的隐士，虽有隐士之名，甚至高举“隐士”招牌，实

则唯恐他人不知，毫无隐士之实，仅仅是以“隐士”作为获得封建朝廷青睐从而对他们予以征辟重用的手段。因此，这样的隐士，实为一些沽名钓誉之徒，故曰虚伪型隐士。像前引历代正史《隐逸传》、《逸民传》或《高士传》、《处士传》作者所指出的：“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托薜萝以射利，假岩穴以钓名”的隐士，是“假隐士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者，这是一群毫无高尚之节可言的卑鄙下流者，可以说是一群高举隐士招牌以骗官府的政治骗子。像这样的徒盗“隐士”之名的虚伪者，既无高尚的品德可言，又无学术上的成就，更缺乏理论思维方面的高深造诣，完全是隐士阶层中的败类和最卑劣者。然而，这样的假“隐士”，既然古人早已指出，必然大有人在。例如汉代之樊英、晋代的冯恢，早就为人所讥。《南齐书·高逸传序》就有：“故樊英就征，不称李固之望；冯恢下节，见陋张华之语。”查《后汉书·李固传》，谓东汉顺帝永和年间，曾“聘南阳樊英、江夏黄琼、广汉杨厚、会稽贺纯，策书嗟叹，待以大夫之位。”由于这些人的被起用，以致“岩穴之幽人，智术之士，弹冠振衣，乐欲为用”。这些人既然隐居不仕，一旦看到有岩穴之士被征，其他岩穴之士都“弹冠振衣”，有出仕之意，足见这些所谓“隐士”，都是一些身在山林，而心存宫阙的求官迷，故李固对樊英也未加称许。到《后汉书·逸民·周党传》中，又载博士范升奏毁周党曰：“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臣愿与坐云台之下，考试图国之道。”足见东汉时期这种以隐士虚名而求官者，决非樊英、周党几人。又如西晋冯恢，也以“征士”为官，足见原为隐者，是为了做官而“下节”，为张华所讥，可见也是一个以隐士名义而求官者。正因为这样的假隐士人数不少，而且代代有之，故《旧唐书》与《新唐书》之《隐逸

传序》都痛斥这种假隐士。

我们把隐士阶层的人士区分为各种类型之后，有利于了解该阶层的内部状况及其在品格高下、贡献大小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差别，从而有助于了解这个阶层同封建王朝的关系，也有助于评价隐士阶层的不同类型中人物的是非功过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五)

对待中国古代的隐士阶层，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评价与看法。

东汉时期，是隐士大量涌现的时期，因而对隐士的看法与评价便开始出现。《后汉书·方术传》末范曄《论曰》：“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他异。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

由此可见，最早对隐逸、方术之士加以贬斥性评价的，要算李固与朱穆，只是《后汉书·李固传》并无此语。南朝时期的范曄，也是对隐逸之士与方术之人加以贬斥的倡导者。他在上引《方术传》末的《论曰》中指斥“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时接着说，“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不过，范曄所鄙视者，主要还是方术之士，对隐逸之士的批评他还是有所保留的。他认为“彼虽然有类沽名者，然而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乎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并引荀卿的话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也。”这些话，显然对隐逸之士还有肯定之意，认为他们不同于“饰智巧以逐浮利”之徒，承认他们还有“志意修”和“道义重”的美德。

具有老庄思想色彩的皇甫谧等人，却对隐士倍加赞许。他在其《高士传·序》中说：“孔子称，举逸民而天下之人归心焉。是以鸿崖先生，创高于上皇之世；许由、善卷、不降于唐、虞之朝。自三代秦汉达乎魏兴，受命中贤之主，未尝不聘岩穴之隐，追逐世之民。是以《易》有束帛之义，《礼》有玄纁之制，诗人发《白驹》之歌，《春秋》显子臧之节，明堂月令，以香春之月聘名士、礼贤者，然则高让之士，王政所先。”他对隐士的地位与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梁人萧子显的《南齐书·高逸传序》，很是推崇隐士中的“揭独往之高节，重去就之虚名，激竞违贪，与世为异”者，又很赞赏“仕不求闻，退不讥俗，全身幽履，服道儒门”的隐逸之士，认为这是“逸民之轨操”。唐初所修新《晋书·隐逸传序》，认为隐逸之士的行为，“虽不应其嘉招，亦足激其贪竞”，故“美其高尚之德”而集其事以为《隐逸传》。《梁书·处士传序》亦云：隐士的事迹言行，“可以扬清激浊，抑贪止竞”，因此之故，“自古帝王，莫不崇高其道。”《隋书·隐逸传序》的作者，尤其高度评价了隐逸之士的社会价值，指出“虽其道未弘，志不可夺，纵无舟楫之功，终有贤贞之德。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贪竞之风，与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谓无用以为用，无为而无不为者也。”由上可见，不仅有老庄思想的影响者推崇隐逸之士，而且有儒家思想的史家也都承认隐逸之士有“立懦夫之志，息贪竞之风”的社会价值与教育作用。这不仅反映出历代封建统治者对隐逸之士的共同评价，也足以说明历代史家为什么要为隐士树碑立传的原因。

说到封建统治者对隐逸之士的作用与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北齐时魏收的《魏书·逸士传序》有一段别开生面的论述，其词曰：

盖兼济独善，显晦之殊，其事不同，由来久矣。昔夷齐

获全于周武，华裔不容于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许以激贫之用；督其迹者，以为束教之风。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丧，忘怀累有。比夫迈德宏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傲世浇浮，淳风殆尽，锥刀之末，竞入成群，而能冥心物表，介然离俗，望古独适，求友千龄，亦异人矣。何必御霞乘云而追日月，穷极天地，殆为超远哉！

魏收的这席话，总结了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崇隐逸之士的原因。在魏收看来，隐逸之士的思想，有“激贫之用”；他们的行为，有教育人们的作用。他们的功德，虽然不能同“德迈宏道，匡俗庇民”的贤者相比，但也不忽其影响。特别是在社会风气败坏，儒家道德沦丧，人人竞“锥刀之末”，唯利是图的情况下，隐逸之士的“介然离俗”，实有益于弘扬名教，尤其显得难能可贵。魏收的这些看法，颇为我国封建社会一些有为之士所接受，例如宋代的范仲淹就曾盛赞东汉时期的隐士严光，认为“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称赞严子陵不为光武帝所屈的高尚品德，认为可使“贫夫廉，懦夫立”，“大有益于名教”（范氏：《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这些观点，同以魏收为代表的封建史家的看法一脉相承。

推崇名教的儒家，从隐逸之士的言行可以教育贫夫的角度去肯定隐士的作用；崇尚自然的老庄学派则从无为与出世的角度而向往隐逸之士的作为；而法家学派，却从强化皇权的角度去攻击隐逸之士的不从王命行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讲了一个封于齐地的太子望诛杀“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的居士狂裔与华士昆弟的故事。韩非子很赞同太公望的作法，原因是作君主“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狂裔、华士兄弟二人，“则望当谁为君乎？”因此，必须

对那些“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的不为“主用”之人予以诛杀之。这就是说，在法家学派看来，那些为国法所不及和不听从朝廷征召、不为朝廷办事的隐逸之士，是应当诛戮的。由此可见，封建社会里的不同阶层和不同学派的人士，对隐逸之士的地位与作用是有不同看法与评价的。

隐士既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无疑有研究它的必要性。那么，我们今天来研究历史上的隐士阶层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如前所述，隐士和隐士阶层并非亘古有之，而是当社会发展到私学兴起、封建官僚制度取代世卿世禄制度和士阶层形成以后才产生的。换言之，在我国古代它是同封建制度的确立同时发生的。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不是有人类以来就有的。这就是说，很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我国历史上的隐士与隐士阶层，以澄清封建史家在这个问题上散布的迷雾，正确认识隐士与隐士阶层产生的社会条件与历史背景。

其次，隐士与隐士阶层的产生既是一个历史范畴，那么，从这一角度着眼，研究隐士与隐士阶层的形成及其发展的历史过程，无异于从一个侧面研究我国古代私学的兴起与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无异于研究我国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的历史过程，从而有助于对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特别是封建政治史的研究。

其三，隐士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定社会阶层，虽属于地主阶层，但又非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因此，对隐士与隐士阶层的研究，又无异于研究我国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并把这种研究推向深入和扩大研究领域。

其四，隐士中的抗议型隐士，往往基于对当时封建政治的不

满而走上隐逸道路的事实告诉我们：封建地主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是存在激烈的矛盾斗争的。而且这种斗争往往同他们对当时的封建官僚制度与封建选官制度的不同看法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可以启示我们去探讨地主阶级的不同阶层对封建官僚制度和封建选官制度的不同看法是如何影响和推动这些制度的发展与演变的历史的，而这正是研究封建政治制度史所必不可少的内涵。

其五，基于对老庄型隐士、清高型与淡泊型隐士等不同类型的隐士的研究，可以明白我国古代的不同哲学流派对隐士阶层的影响，又可以看出这些不同类型的隐士对不同哲学流派的思想体系的发展与变化有何作用。而这一切，正是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所不可缺少的研究方面。

其六，有不少隐士，在他们隐居不仕的过程中，有的把全部的精力用于诗、文创作，有的寄情于绘画、书法，有的致力于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从而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与演变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因此，对这些隐士进行研究，也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史所必需的。

其七，研究我国古代隐士中那些以隐居不仕为手段以谋取官位的沽名钓誉者，有助于我们认清假隐士的丑恶面目和卑劣手法，对于认清现实生活中那些操着同样手法的伪劣君子的本质来说，实有不可低估的历史借鉴意义。

其八，如果说封建社会里的一部分隐士之所以同当时的封建统治者站在对立的或者不合作的立场上还有进步性的话，那么，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时代，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时代，知识分子同国家、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就根本不存在封建社会会产生抗议型隐士那样的社会条件了，如果还有什么人要仿效古代抗议型隐士的作法，显然不具备任何进步性了！

其九，大量正直的真正的隐士，都具有超然尘世之外不求名利，热爱祖国，关心民生疾苦，又不屈从权贵，更不趋炎附势等高贵品德；他们的民族气节永远为人们所敬仰；他们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德，永远为人们所称道。他们的为人，不愧为中华的脊梁，他们的言行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神。因此，对我国古代的隐士与隐士阶层进行研究，实有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作用。诚如古人所云，标榜隐逸之士有“息贪立懦”之功效。特别是在举世汹汹，人人言利，拜金主义泛滥，权钱交易盛行，挥霍浪费成风，贪污受贿日炽，各种社会沉渣泛起，有钱有势的小人横行不法之时，研究古代隐士的清高风范，淡泊美德，也许可收息贪止暴之效，有益于世风之淳朴。至少也可以为迷恋官位、贪得无厌和追求奢侈生活的社会沉渣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让他们照一照自己的光怪陆离的形象！

正是基于上述的一些原因，河南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处才约我为他们主编一部《隐士传》；也是基于这些认识，我才勉强接受了这个并不轻松的任务，本文就是为此书所写的序言。由于人们对我国封建社会的隐士与隐士阶层缺乏整体的研究，因此，当我写篇序的时候，深感缺少可以借鉴的研究成果，以致这篇序言不可能阐明有关隐士和隐士阶层的所有问题；即使已经谈到的一些方面，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远不是完美无缺的；甚至应当说还存在许多错误和不足。其所以敢于拿出来并置于书首，为的是想得到同志们的指教，以利于修改提高。

（六）

本书所收隐士，仅仅是每个历史时期一些有代表性的隐士，远

不是在正史《隐士传》有记载隐士的全部；但也有部分隐士，超出诸正史隐逸传所列人物。僧、道中人物，除极个别外，一般没有列入隐士名单。具体的编写过程，首先是由主编者列出一个整体性的初步名单，并提出撰写隐士传的体例、格式、注意事项和行文要求等；其次，每一个时期，由主编征得作者同意后确定一个或两个主要撰写者；各段的主要撰写者对提出的初步名单，有权删去或增添；至于每篇传记的字数，一般视隐士的具体情况而定，材料较多的著名隐士，可超过万字，少者也可以只写三五千字。为了便于文责自负，主编只作文字上的润色、材料上的审核和决定取舍的篇目，一般不改动作者的观点，只希望作者能参考主编在序言中所陈述的不成熟想法去立意谋篇。为了避免同河南人民出版社文史处所编其他传记中的人物重复出现，我们删去了已经写好的七个隐士的传记，他们是范蠡、谢安、王维、刘基、宋濂、黄宗羲。还由于《隐士传》的最后定稿，由上下两册缩为一册，以致许多著名隐士也不得不忍痛删去。又为了照顾每个历史时期都有隐士入传，必然会影响到所收隐士的不平衡性。所有这一切，都盼读者谅解。在编写过程中的许多事务性工作，我的博士研究生朱和平同志出力不少。负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隐士传略的撰写者，大都是认真负责的。出版社的李铁屏同志，带病主持此项工作，在统一编写体例、确定入选篇目、核对引文等方面付出了不少劳动，并对全书多次提出过指导性意见，对此书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出版社的美术编辑，还辛辛苦苦为若干隐士绘制了图像。对上述这些同志，在这里我谨表示由衷的感激！

1993年秋写于郑大平房院翹楚斋

目 录

逍遥清高的人生——庄子	(1)
排难解纷、义不帝秦的鲁仲连	(15)
东方朔的吏隐道路	(27)
与丑妻偕隐的梁鸿	(49)
不慕高官厚禄的严光	(59)
学穷典奥、幽居恬泊的法真	(68)
苦居田亩而不食官禄的庞德公	(77)
避乱世隐居辽东	
——管宁与王烈	(85)
人间卧龙嵇康	(95)
《钱神论》的作者	
——南阳名隐鲁褒	(122)
一代“书淫”名隐皇甫谧	(133)
杰出的画家、雕塑家戴逵	(153)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渊明	(166)
冥心物表，介然离俗	
——北魏四隐士	(195)

学为当世冠、不愿凤池游的刘楨	
.....	(203)
京口名隐臧荣绪.....	(212)
“山中宰相”陶弘景	(223)
崇尚自然、追慕高士的阮孝绪.....	(233)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	
——隋朝三隐士.....	(242)
隐于酒乡的“斗酒学士”王绩.....	(249)
终身不仕、救死扶伤的孙思邈.....	(262)
终身隐逸的田园山水诗人孟浩然	
.....	(274)
山林隐逸诗人寒山子.....	(292)
同情人民、抨击时政、亦官亦隐的	
文坛巨匠皮日休.....	(309)
博学重义的处士——戚同文.....	(324)
创象数之学、为两朝并重的	

陈抟·····	(343)
梅妻鹤子话林逋·····	(354)
治《易》学、好预言、隐居不仕的 理学大师——邵雍·····	(375)
自食其力、不乐仕进的苏云卿·····	(391)
著作等身的隐士元好问·····	(400)
逸于运外而不仕明的五隐士·····	(418)
隐身佛门的一等功臣姚广孝·····	(430)
抛却亲王尊贵位，让国退隐做学问 ——郑世子朱载堉·····	(445)
一代儒宗名隐孙奇逢·····	(462)
以中日文化交流为己任的 隐者朱之瑜·····	(471)
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 思想家傅山·····	(486)
早慕刘琨投戎旅，晚遁山舍著鸿篇 ——著名思想家王夫之·····	(498)
被剖棺戮尸的隐者吕留良·····	(521)
关中大儒名隐李颀·····	(531)
坚守志节、成就“绝作”的 顾祖禹·····	(540)

庄
周



逍遥清高的人生——庄子

· 安继民 ·

庄子，名周，是战国中期宋国蒙地（今河南商丘市东北）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①庄子一生默默无闻，却著述甚丰，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各艺术领域都有极大的影

^① 据马叙伦、吕振羽、范文澜、闻一多等论证，庄周生年为前369、335、328、375年，卒年为前286、275、286、295年。本文从马说。

响。老、庄与孔、孟共同构成了国民精神的源头。但是，庄子作为一个沉思默想、不求功名的隐士型思想家，他基本上没参加过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我们无法非常自信地为他写出一部线条清晰、先后承接的传记，这是不得不预先声明的。

（一）贵族身世，落泊宋蒙

公元前 387 年，在“战国七雄”中的楚国，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吴起变法。这件事对了解庄周其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的故事必须从这里讲起。

从周天子裂土封疆到战国中期的六个世纪中，随着铁器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度发展，所谓的“男耕女织”，“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宗法农耕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日趋形成；与此同时，各诸侯国内部也出现了一个日益庞大的有闲阶层，“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复杂。在这种形势下，各国有识之士纷纷起而倡导变法，力图拆去“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藩篱；一些精明的统治者出于富国强兵、称霸中原的需要，也乐于起用这些变法图强之士。吴起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位。战国时期，先后出现过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三大改革家。吴起作为一个才高德薄的历史人物，他俊逸豪迈，手段精明而老辣：为了能在鲁国统兵抗齐，他可以亲手杀死自己的齐国妻子；在魏国带兵时，他可以亲口为士兵吮吸浓疮。但是，作为一代英杰，他确实为楚国的强盛作出了生命级的贡献。

楚国封国之初，本来还是一片落后的蛮荒之地，由于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湿，山川秀丽，楚人带着原始的浪漫和热情，很

快发展了起来。到吴起变法时，楚国已是公族众多，财政匮乏，“贫国弱兵”，不堪重负，社会矛盾将要激化了。楚悼王时吴起从魏国来到楚国，倡导变法，被楚悼王委以重任。他力主“捐不急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①。具体说来，就是要把那些领奉不干事的闲官、散官裁汰一批，实行“减政”。对贵族的三代以下闲散子孙统统贬为庶民，让他们自食其力。然后用节省下来的财政收入养精兵以与中原各诸侯国争雄。为了使被贬为庶民的贵族后裔不致联合作乱，吴起下令让“贵人往实广虚之地”，也就是将他们疏散到边陲地区，让他们开荒种地，过自食其力的平民生活。庄氏是“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楚庄王公元前613年即位，卒于公元前591年。从前591年到前387年吴起变法已有二百余年，三十年为一代，到庄子父祖辈上，早已过了三代，所以无疑是被贬谪的对象。楚悼王公元前381年逝世，吴起失去了王权的庇护，变得孤弱无靠，被他打击的达官贵人立即联合起来，攻打王宫追杀吴起。吴起抱住悼王的尸体被乱箭射死，那些参与作乱的显贵们却因此而犯了伤害王尸的“夷宗”大罪，继位的楚肃王因此而诛灭“七十余家”。庄子的父祖辈大概就是这时为避“夷宗”之祸而越境迁居宋国蒙地的。

据公认的推测，庄周在楚国公族作乱十二年后即公元前369年出生于宋国。一个养尊处优的贵族家庭一下子落泊为平民，流亡异国，自食其力，必然是一个相当难以适应的艰难过程。由此可以想见，庄子的幼年时代生活在一种动荡、忧患的环境气氛中，物质生活上的匮乏姑且不论，庄周那幼小的心灵过早承受了过多过重的压力却是毋庸置疑的。这样一种幼年生活经历，对天资聪

①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颖的庄周来讲，形成一种内向型人格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事情。幼小的庄周必然很小就思考了很多问题，由于其家庭成员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他在耳濡目染中一定也读了许多书。这是庄子成为思想家，一个反传统、反异化、非理性，重内在精神修养的思想家的最为根本性的原因。

（二）委身漆园，工于技艺

在抑郁寡欢中成长起来的庄周，对人类存在、社会规范、自然奥秘这些人类面对的亘古困境陷入了深深的困惑，这是一种哲人的忧思，一种探索真理的渴望，一种破译自然奥秘的科学求知的冲动。但是，人不能靠真理过生活。读书写作之余，他必须找到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职业。一个落魄域外的贵族后裔没有可以继承的田产，于是庄子只好靠手工业为生。

庄子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他可以织出非常精细的草鞋，可以做出当时堪称一流的漆器，并对木工、陶工、屠宰、洗染等几乎所有的手工业都十分精通。司马迁记载“周尝为蒙漆园吏”^①，证明庄子曾因技艺的精湛，做过一任管理漆器作坊的小官吏。科学发源于技术。庄子在手工业劳动的实践过程中，对各种物质的属性一定会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体验，并通过这种体验进入了“直观体道”，“道不可言”的精神修养境界和哲学境界。在《庄子》一书中，庄子记载了许多手工业者，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和艰难

^① 漆园吏：一说漆园为古地名，在今商丘市东北（或菏泽市北，或定远县东），战国时庄周曾为蒙漆园吏。一说漆园非地名，庄周乃在蒙邑中为吏主管漆事。本文从后一说。

思索后的哲学结论。

比如，齐桓公在堂上读书，木匠在堂下做车轮子。木匠停住手中的活问桓公：“您读的是什么书？”桓公漫不经心地说：“圣人之言”。“圣人还活着么？”桓公说：“已经死了”。“那么说您读的只是古人留下的糟粕了！”桓公听了大怒，说道：“我在这里读书，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今天如果说出个子丑寅卯倒还罢了，否则就处你死刑”。木匠不慌不忙地来到堂上，对齐桓公说：“我这道理是从做车轮中体验出来的。榫眼松了省力而不坚固，紧了则半天敲打不进去；我可以令榫眼不松不紧，然后不慌不忙地敲进去，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嘴里虽然说不出这松紧的尺寸，心里却是非常有数的。我心里这个‘数’，无法传给我的儿子，儿子也无法从我这里继承下去。所以我都七十岁了，还在这里为您做车轮子。圣人已经死了，他所悟出来的最深刻的道理也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了，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只能是浅层次的道理。所以我说您读的书是古人留下的糟粕”。

还有，庄子写道：一个屠夫为文惠君宰牛，手摸、肩靠、脚踩、膝顶、刀尖刺、刀刃割、刀根砍、刀背砸，很有节奏，好像踩着《桑林》乐章在跳舞，似乎和着《经首》的旋律在伴奏。文惠君说：“噤！真棒。技艺竟然可以高到这种地步！”屠夫放下刀回答说：“我所爱好的是道，已经超过技艺的层面了。开始学宰牛，牛是浑然一体的；三年后，一眼就能看到牛的骨骼、肌肉、经络所组成的内在结构。现在我不需要眼睛看，好像不是运动手脚在杀牛，而是全身心都贯注到了牛的自然纹理结构中，割肉、剔骨，顺着牛的自然结构下刀，不会碰到任何大的障碍，连经络相连处我都可以轻松地分解开来。……我这把刀已经用了十九年了，杀了几千头的牛，刀刃却仍然锋利如初。因为骨与骨之间有缝隙，而

刀刃的刃端无厚度，无厚的刀刃进入有隙的骨节，当然就应该游刃有余。所以我把刀用了十九年还像新的一样。虽然说起来容易，但在杀牛时遇到筋骨盘结处，我仍然要全神贯注，凝神静气，看准关键后，刀轻轻一动，牛就哗啦一声解体了，好像泥土散落一样堆在地上。这时我提刀站立，顾盼左右，感到一种惬意和满足，于是乎擦净刀收起来”。文惠君说：“好啊！我听了这番话，连养生的道理都明白了。”

类似这样的精湛技艺，庄子还记载了很多，如“大马捶钩”、“梓庆削鐻”（jù，音具。古乐器，像钟）、“津人操舟”等等。大都是借别人之名抒庄子情怀之作，其中既有大量的感性经验，也不乏直观的想象和逻辑的推理。这种悉心于技艺的经验体会成了庄子哲学思想逻辑展开的不竭源泉。他管理漆器作坊的时间可能并不太长。曹商出使秦国获得赏赐后来看庄子，他正在打草鞋，很可能是又在以打草鞋为生。所以庄子一辈子都是在清贫中度过的，据载他曾经向监河侯借贷过粮食，见魏王时也穿得十分破烂，这虽然也可能是有意衬托出内在的清高，彰显一种关于忍受贫穷的理论，但终庄子一生，他在清贫中过着一种恬淡寡欲的生活却是毫无疑问的。

（三）交友海徒，学海发微

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庄子悟性极高，他在对大自然的观察中，在工艺技巧的体验中发现了哲学意义上的普遍存在，即所谓“道”。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亘古不变的问题，在庄子这里的答案是：人从道中来，回归道中去。庄子的道为中国特色的世界

本原问题提出了一种最为彻底、最为深刻、唯一可以和西方本体论相媲美的一种解释。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征服人，所以，虽然庄子的理论与当时流行的儒家学说正相对立，主张人应淡泊功名，养生全真，却由于其新奇、自圆其说的深刻性赢得了不少人的好奇和崇拜。于是一套本来属于退隐山林的学说，反而帮助它的创造者彰显了名声。所以，庄子也有一些弟子，甚至有层次极高的朋友。庄子与惠子的交往构成了庄子生涯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

惠施是当时超一流的政治家、外交家，还是名家“合同异”派的代表人物。他在魏国先后当了十二年宰相，实际掌权近二十年，帮助魏惠王“为法……民人皆善之”，他主张“去尊”、“偃兵”，变法图强；开六国称王之局，是山东六国“合纵”政策的实际组织者。这样一个风云人物，却是隐士庄子一生唯一的谈友。惠施年长于庄子，大约于公元前314—310年之间去世，庄子从惠施墓前经过时，曾对随从的弟子们说：“楚国郢都有两个人，一人把蝇翅大小的一点灰泥涂在鼻尖上，另一人抡斧去砍削，斧头运行如风般地砍将下来，两眼一闭，‘噌’地一声，灰泥削得干干净净，鼻子却毫无损伤。二人从容不迫，面不改色心不跳。宋元君听说后，就把抡斧匠人召来让他表演一番，匠人说：‘我原来是有这么个绝招，不过，我的伙伴早就死了’。自从惠老先生死后，我也像匠人一样失去了辩论的对手，我怕再也找不到一个能理解我的人来和我说话。”一种“子期不在对谁弹”，失去知音的悲哀充分说明了庄、惠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庄子和惠子在一起讨论切磋的问题范围广，深度大，其中最有趣的是所谓“濠梁鱼乐之辩”。他俩在濠水上游春，庄子说：“鱼儿悠然自得地摇头摆尾，游来游去，是多么快乐哟！”惠子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很快乐呢？”庄子说：“你也不是我，怎

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当然不知道你想些什么，你也不是鱼，理所当然地不可能知道鱼的快乐，这不就完了!”庄子说：“嗨！咱们从头想想，你问我怎么会知道鱼的快乐时，那已经假定了我是知道鱼的快乐的，你问我怎么知道的，现在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

此外，他们还就“大而无用”、“人固无情”等价值论、人性论、本体论问题进行过十分深刻的阐述，有的甚至是现代人也无法回答的重大哲学问题。这里就不具一一了。

庄子妻子死的时候，惠施作为退休宰相亲自参加吊唁活动，又是二人关系非同一般的例证。有这么高档次的朋友，即使他如何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地退隐山林，他仍然会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在私学盛行的战国中期，庄子肯定有不少的学生和崇拜者，他的学生也有可能到惠施手下去为官。所以庄子仍不是一隐了之，而是在退隐理论的指导下，过着一种恬淡寡欲、清高自守、沉思默想、著述不缀的学术研究生活。

(四) 笑傲王侯，抨击现实

宁静的学术生涯给庄子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他为自己能如此深刻地理解人生、社会和自然而无限欣喜，而对权力、金钱抱着孤芳自傲甚至不屑一顾的态度。

惠施在魏国做宰相时，有一次，庄子来到了魏国，有人以为他是来与惠施竞争宰相职位的；惠施深知庄子之志，完全不以为然；但他又怕庄子直接去见魏惠王，放荡不羁地争辩起来，招来杀身之祸；于是就让人到处寻找庄子。庄子也听到谣言说惠施为

了不让庄子与自己争夺相位正在搜捕他。二人见面后，庄子绕着圈说：“南方有一只凤鸟，非楝食不吃，非醴泉不饮。这只鸟飞向北方时，看到地上有一只老鹰正在抓一只死老鼠吃。老鹰看到凤鸟飞来，吓得‘唉哟’一声，赶快把死老鼠藏在身子下面，生怕被抢走了。你是不是也想拿你那个相位来吓唬我呀！”

庄子见魏惠王时，穿着补着补钉的大布衫，用草系到脚上一双破鞋。魏惠王见了说：“先生为什么如此疲惫呀！”庄子说：“这不是疲惫，而是贫穷。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治世主张不能实行，那才叫疲惫。衣服破一点，那不叫疲惫，而只是贫穷。我只不过是生不逢时罢了。您没见过那些猿猴？它们在林间树枝上跳来跳去，悠然自得的样子，即使神射手羿和逢蒙也拿它没办法。一旦猿猴进入灌木丛，它们就会吓得东张西望，战战兢兢；这并不是它的骨骼肌肉出了毛病，而是环境不利，不能施展它们攀枝腾跃的技能了。现在这个社会，昏君在上，乱臣在下，像我这样的人不得不疲惫哟？您难道没听说过忠臣比干由于其忠诚而被殷纣王把心挖出来么？”

宋国有个人名叫曹商，他以宋国使臣身份出使秦国。出使时带了几辆车，由于秦王喜欢他，又送了他一百辆车。曹商回来后揶揄庄子说：“要说在穷巷破屋里打草鞋。整天把自己弄得面黄肌瘦的，那我不如你；但是如果说一见君王的面，就可以让他十分赏识，赐车百乘，这是我的长处”。庄子说：“听说秦王有病请医生，治好一个疮赏一辆车，为秦王舐痔疮的赏五辆车，手段越下流，得的赏赐越多。你大概是为秦王舐痔疮了吧！否则怎么会得到那么多的车呢？走你的吧！”

这种有趣的揶揄和尖刻的挖苦，极为犀利地攻击了名利权势、富贵荣华的世俗人生观，表现了超越的价值追求和清高孤傲、洒

脱不羁的人格风范。这种人格风范作为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对后世封建士大夫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乃至成了一种民族的心理积淀。

在庄子看来，在社会生活中，根本没有绝对的真理正义可言。那些高高在上的君王、诸侯们，用现在的术语来讲，他们本身就缺乏“合法性”，庄子论辩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比如说齐国的田成子，他篡夺了姜氏的齐国政权，但是由于他有武力和财政作后盾，小国不敢说三道四，大国也不敢出兵讨伐。如果说臣子应该忠于君王，那么武王作为殷纣王的臣子不应该伐灭纣王；商汤也不应该伐灭夏桀。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是一套骗人把戏，根本没有经过理性的考察，也没有任何可证实的根据。政治、伦理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仅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人都是大自然的产物，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应该是充分自由的，任何人包括君王本人在内，都不具有限制别人自由的权力；在庄子的“建德之国”和“至德之世”理想中，“无为”是基本的生活原则，从上到下，大家都过着宁静而幸福的生活。而在当今的社会中，统治者为一己之私欲，用强制的方法治理民众，把社会搞得一团糟，逼得人饥寒交迫，铤而走险，那完全是统治者的罪过。但是，被逼得铤而走险的民众却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而所谓“汤武革命”同样用武力强劫到政权后，不但可以不受任何谴责，而且可以南面称王，安享人间尊荣。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完全是强盗逻辑。这就是历史理性在法理上的荒谬性。而儒家挖空心思为历史理性论证，说穿了不过是为虎作伥罢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在庄子看来，合法的统治不需要进行合法性论证，一旦需要借“圣人”之言为自己的统治论证，这统治就一定是非法的。“圣人”以自己的才学为非法的政治论证，事实上便成为“窃

国大盗”的帮凶。这是庄子所不齿的。

（五）终身不仕，独成一家

从自然之道的价值悬设出发，导致了庄子对社会现实的基本否定倾向。这样，他就很难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甚至社会生活了。

楚威王听说庄子很有才华，就派使者携带重礼去拜访庄子。使臣对庄子说道：“如果您愿意出山理事，楚国准备让您担任宰相的重任。”庄子笑了笑说：“你带来了一千两金子，这是很厚重的礼物；允诺我当楚国的宰相，这也是很尊贵的地位。但是，您难道没见过国君郊祭时用来作为牺牲的牛么？好草好料养它几年，祭祀时为它披上彩色的锦绣绫罗，然后把它牵入太庙的祭坛之上，到了这种时候，这头牛想跑到野地里孤伶伶地啃干草以免一刀之刑，它还能够做得到么？请您早点回去吧，不要骚扰我宁静的生活。我宁愿像泥鳅一样在污泥中自由自在地玩耍，图个身心愉快，而决不为侯王所用，让他们用宰相的枷锁把我限制起来。”

抱着这样一种清静无为、潜心学术的态度和人生志向，庄子成就了一番万世不没的文化事业。在人生哲学上，庄子提供了一套缓解人们精神危机的修养方法，表现出对精神自由的强烈向往和追求；在自然哲学上，他的洞察力使当代理论物理学家们都感到吃惊；时空是相对的，物质世界不像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由不可分不可入的“原子”和“虚空”构成，它的构成方式很可能像庄子设想的“气”那样，是一片人类永远难以彻底认识的“浑沌”。在认识论上，庄子的观点和当今流行于西方世界已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现代主义思潮，特别是其中的存在主义者音节应和，遥

相辉映。

在中国思想史上，庄子思想对消化佛学理论起到过关键性的作用，曾经构成了魏晋玄学的主旋律并直接影响了整个的传统文学艺术。宋代思想家叶适评价庄子道：“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鲁迅先生说庄子的文风汪洋恣肆、仪态万方，先秦诸子莫能先也。闻一多先生说自魏晋以来，中国文化中永远留下了庄子的影响。当代哲人金岳霖十分推崇庄子的思想，他写道：“也许应该把庄子看成大诗人甚于大哲学家。他的哲学用诗意盎然的散文写出，充满赏心悦目的寓言，颂扬一种崇高的人生理想，与任何西方哲学不相上下。其异想天开烘托出豪放，一语道破却不是武断，生机勃勃而又顺理成章，使人读起来既要用感情，又要用理智。”在庄子“这种怀疑主义里，可以说希腊的明朗渗进了希伯莱的美妙，希伯莱的美妙软化了希腊的明朗。有幸接近这种理想的人会妙趣横生，怀疑主义并不使他尖酸刻薄，美妙也不使他冒冒失失地勇往直前。”崔大华在《庄学研究——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一书序言中评价庄子思想在民族文化中的历史作用说：“庄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发展演变中的最活跃的、不衰的观念因素，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理解、消化异质思想文化的最有力的、积极的理论因素。”这些评价说明我们不可能在忽视庄子思想的情况下从传统走进现代。

（六）参透生死，浪漫达观

死亡，这一人生的自然大限，构成了人类悲剧意识的本根性

原因。卡西尔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无疑是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人类本能之一。一切迷信活动、神话乃至宗教都与人类的死亡意识有关。庄子思想为人类超越死亡意识的恐惧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

庄子到楚国去的路上，碰见一具空髑髅（dù lóu，音独娄。死人头骨），庄子用马鞭敲着髑髅问道：“你是因为违背自然规律而死的么？是国破家亡，遭到刀斧之刑而死的么？是自己干了罪恶的勾当，有愧于父母妻子而死的么？你是因贫穷冻饿而死，还是寿终正寝自然死亡的呢？”问完了话，庄子就枕着髑髅睡觉。半夜，髑髅在梦中对庄子说：“听你说话像是能言善辩的人，不过，你说的都是活着的人的忧患，死了之后便不存在这些问题了，你想听听死人的道理么？”庄子说：“可以。”“死了以后，上无君下无臣，也没有为生活而奔忙的四时之事，轻轻松松地以天地为春秋，其快乐程度即使你们南面为王的君主怕也比不上的！”庄子不相信，就说：“我让掌管生死的鬼神恢复你的形貌，归还你的肌肉骨骼，送还你的父母妻子和朋友乡亲，你愿意干么？”髑髅一听很不高兴，紧锁眉头说：“我怎么会放弃比南面称王还快乐的事去到人间受那些烦心劳体的罪呢？”这里，庄子把死亡描绘成一种至高无上的安乐之事。既然死比生还要快乐，关于死亡的恐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这种说法固然不能证实，但也没人能够证伪。

但是，庄子的基本思想并不是以死为乐，而是“齐一生死”。庄子妻子死的时候，惠施前去参加吊唁活动。看到庄子叉腿坐在地上正敲着瓦盆唱歌。惠施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你老伴和你生活了一辈子，为你生儿育女，都七十多岁了。现在她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却还要敲着盆唱歌，这也太过分了吧！”庄子见是惠施来了，就回答说：“她刚死的时候，我咋能不动感情呢？但想

了想，原来人间并没有她这个生命存在呀！不仅没有生命，而且也没有形体，不但没有形体，而且也看不到形体的物质元素‘气’，气原来是混杂在冥冥之中的，变化后成为气，然后才成形，然后才转化为生命。现在她又由生转化到死，这不是和春夏秋冬的四季更替一样吗？她的尸体现在还躺在天地之间，我却哇哇叫地在她身边痛哭流涕，自以为这是没有真正理解生命现象，所以就停下来不哭了。”

在庄子看来，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人也不例外，“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正因为他执著于这样一种“通天下—气”的观念，自然也就对死亡抱着一种十分浪漫达观的态度。

庄子快要死的时候，他的弟子们准备厚葬自己的老师。庄子知道后用幽默的口气说：“我死了以后，天地就是我的棺槨，日月就是我的连璧，星辰就是我的珠宝玉器，天地万物都是我的陪葬品，我的葬具难道还不丰厚么！你们还能再增加点什么呢？”学生们哭笑不得地说：“老师呀！要那样的话，我们还不是怕乌鸦老鹰把老师吃了么？”庄子说：“扔在野地里你们怕乌鸦老鹰吃了我，那埋在地下就不怕蚂蚁吃了我么？你们把我从乌鸦老鹰嘴里抢走送给蚂蚁，为什么那么偏心眼呢？”

一位思想深邃而敏锐的哲人，一位仪态万方的散文大师，就这样以一种浪漫达观的态度和无所畏惧的心情，从容地走向了死亡，走向了在一般人看来那令人万般惶恐的无限的虚无，这就是庄子。据学术界考证，庄子大约死于公元前 286 年，享年八十三岁。现在商丘民权县尚有庄子墓和其他一些庄子遗迹。

鲁仲连



排难解纷、义不帝秦的鲁仲连

——·朱和平 汪 清·——

作为一代辩士，他的功绩在纵横捭阖的战国史中虽鲜有可比者，但其却从未涉足官场；他的言行似乎是在赤裸裸地追求功利，却在高官厚禄面前从不动心。他那传奇般的人生历程既向后人提供了建功立业的积极经验，也为世人留下了不为利禄所诱的高贵品质。他就是被称为战国第一高士，不畏强暴，竭力奔走于危难之中，以

拯救天下为己任的鲁仲连。

（一）仗义直言，厉声折卿相

生于七雄并争的战国末期的鲁仲连，又称鲁连，其家本是齐国的世代布衣家庭，只是到他的父亲时，通过在海滨煮盐而成为富庶之家。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战国时代，要使家庭摆脱平民阶层，必须为官作吏。为此鲁仲连的父亲不惜钱物，供儿子读书、游学，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够侍奉君王，位居卿相。在父亲的谆谆教诲和不时督促下，鲁仲连很快就凭借其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和能言善辩的口才，在齐地崭露头角。人们都对他另眼相看，认为他一定会获取高官显位。

邻里乡亲们的厚望是有根据的。时逢兼并战争非常激烈，各国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迫切需要网罗人才，扩大自己的势力，不仅“养士”之风盛行，为怀才不遇的士人提供了暂时的栖居之地，而且游说之士，只要使自己的主张、思想为某个国君所接受，一夜之间，便可由穷酸的文化人而变成权臣卿相。

鲁仲连生长的齐国，有一个以“养士”知名的孟尝君。他凭借自己任齐国相国的政治权势和拥有薛（今山东滕县）地万户封邑的经济收入，供养了三千多名食客，为他出谋划策，解除危难。

鲁仲连在齐地出名以后，孟尝君从手下食客的口中得到了有关他的情况，不禁暗喜，便对他手下的食客说：“你们去告诉鲁仲连，说我田文很欢迎他成为宾客。”食客像得到喜讯一般，急急忙忙地跑到鲁仲连家。面对鲁仲连一家和前来看热闹的邻里，食客吹嘘了一番孟尝君礼贤下士的情形，然后说明来意。当来人凝视

着鲁仲连，脸上露出微笑时，鲁仲连没有表情，只是把目光转向远处，那漫长的道路似乎绵绵不绝，永远没有尽头。刹那间，他有些茫然，但很快地，他又坚定了信念，收回目光，对来说：“请回去转告孟尝君，我不想成为他的食客。”鲁仲连早就耳闻孟尝君并非真正爱好宾客，他门下的三千多食客大多是些生活无依无靠的乞丐和游手好闲的无赖，而那些真正的士人，在他的门下待遇很低。有个叫冯驩的宾客，是当时难得的读书人，效力于孟尝君，却不能养活自己年迈的母亲。只好击剑哀叹：“长铗（jiǎ，音夹。剑名）啊！咱们回去吧！我在这里没有东西可以养活家人。”后来他利用替孟尝君收取封邑租税的机会，以孟尝君本人的名义，将财物散发给贫苦人家，并减免他们的租税，为孟尝君收买民心，但却遭到孟尝君的责骂，几乎被辞退。而孟尝君家的妻妾却绫罗绸缎，所豢养的狗马都是以梁肉^①为食。

过了不久，孟尝君见鲁仲连还没有去他门下，便对手下的一个心腹说：“你去告诉鲁仲连，只要他愿意成为我的宾客，我一定待他如上宾。”恰巧在这时，孟尝君门下的两个舍人，只因孟尝君本人看不顺眼，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作为，不能尽死力为自己效劳，准备驱逐他们。这件事在当地迅速传开，议论纷纷，所以，当来人将孟尝君的意思转告给鲁仲连以后，鲁仲连心想：“自己何不去见见孟尝君，当面揭露他的虚伪面目，为那些贫穷苦难的知识分子请命呢？”于是，他与来人一同乘车到了孟尝君的相府。孟尝君见鲁仲连来了，喜出望外，赶紧出来迎接，握着鲁仲连的手显得特别亲热。哪知鲁仲连拨开孟尝君的双手，高声说道：“猿猴可以自由地在树上攀援，可到了水中，却不如鱼鳖；日行千里的骏马，

① 梁肉，好的肉，古代一般指肥肉。

让它跳跃在树丛岩缝间，却不如狐狸；鲁国的曹沫仅凭三尺之剑大声一呼，就创造出百万大军难以达到的功绩，如果让他操持犁锄去耕地，还不如一般农夫。所以即便像尧和舜那样的贤人，如果舍其长处用他们的短处，也会没有什么作为。现在你使用人才，不用他们的长处，不为他们创造条件，不充分地发挥出他们的能力，反说他们没出息，让别人去做不擅长的工作，做不好就说是笨蛋，就要赶走他们，抛弃他们。你这样做合适吗？我始终认为：从来都是‘士可死不可辱’，你难道不怕招来报复吗？”鲁仲连说到这里，望了一眼孟尝君，只见他脸上已是红一阵、白一阵，但鲁仲连觉得还没有刺到孟尝君的痛处，便又接着说：“你算什么贤人？只不过是靠矫揉做作，徒有虚名，有几个臭钱罢了。人们都传说你礼贤下士，其实你并不好养士，只不过是善于弄巧罢了。古代真正好养士的人，与士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穿戴没有什么两样，真正用心相交，所以才得到门下人尽力效死。现在你的家财难以计数，梁肉喂养猪狗，后宫嫔妃成群，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吃的是山珍海味，而门客四处奔波，有些人还几乎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你却要他们尽死力为你效力，这像话吗？今天早晨我出来时，看见一个农夫拿着一只猪蹄在田边祷告，希望上天保佑他田里的庄稼长得茂盛，收获的粮食堆满仓囤。以少易多，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也是人，难道你们又是什么天生的贵种吗？告诉你将相本无种，我们虽然贫穷，但不缺少骨气，虽然不得温饱，但不食嗟来之食。”孟尝君哪里听到过如此严词呵斥，早已气急败坏，只是在鲁仲连连珠炮似的话语下，插不上话。可鲁仲连说完之后，扭头就走了。

（二）临危解难，却敌五十里

周赧王五十三年（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秦、赵两国军队在长平展开了战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役——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战争相持了三年，结果是秦军击败了赵军，赵将赵括被杀。秦将白起活埋了赵国降兵四十万人。战争结束后，赵国举国骇然，凄天惨地，遍地尽闻招魂之声。而秦军却乘胜又攻占了赵国的太原郡（今山西太原一带），又派王陵率军攻打赵国国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西南）。邯郸城危如累卵，情况万分危急。赵国君臣惊慌失措，束手无策。过去自诩为智囊的平原君更是木讷无言。最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赵孝成王决定派使臣到魏、楚两国去求援。魏国的国王魏安釐王派了大将晋鄙（bǐ，音比）率领十万军队前去救赵。就在这时，秦国也派使臣来到魏国威胁魏王说：“魏国如果派兵去救赵国，秦国就先调兵来攻打魏国。”魏王怕秦国来攻打，就只好命令晋鄙率军驻扎在赵魏交界的汤阴（今属河南）地区，按兵不动，以观变化。另派客将军辛垣衍从小路进入邯郸，通过平原君对赵王说：“秦国之所以急于围攻赵国，是因为从前和齐湣王争强称帝，齐国首先取消了帝号，现在齐国比湣王时更加衰弱了，当今只有秦国称雄天下，这不一定要贪图邯郸，他的目的只不过是想要得称帝天下。赵国如果派使者尊秦昭王为帝，秦王一定高兴，就会收兵离开邯郸。”平原君听了犹豫不定，没有做出什么决断。

这时鲁仲连正巧在赵国游历，碰上秦兵围攻赵国，听说魏国想让赵国尊秦王为帝，于是去见平原君说：“抗秦这件事打算怎么

办呢？”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平原君这时也是显得束手无策地说：“难办啊！难办啊！我赵胜怎么敢谈抗秦这件事呢？上百万的军队在外面打了败仗，现在秦兵又深入国内围困邯郸而不离开。魏王派客将军辛垣衍劝赵王尊秦王为帝，现在那个人还在这里。我怎么敢谈抗秦这件事呢？”鲁仲连听了，立即愤然作色道：“先前我认为你还算得上天下贤明的公子，从现在起才知道你并不是那么回事，根本就没有什么能耐。魏国的客将军辛垣衍在哪里？请让我替您去斥责他，把他赶回魏国去！”

于是平原君见到了辛垣衍说：“齐国有位鲁仲连先生，他来见将军。”辛垣衍说：“我听说鲁仲连先生是齐国品行高尚的人。辛垣衍是魏王的臣子，出使到赵国来有自己的职责，我不愿意见到他。”平原君见此，只好如实地说：“我已把您来的使命泄露给他了。”辛垣衍无可奈何，只得答应了。

鲁仲连经平原君引荐见到了辛垣衍。刚见面时，鲁仲连压住心中怒火，气宇轩昂地逼视着辛垣衍，但并不急于说话。辛垣衍也默不作声，双方都在沉默中对峙，在暗地里揣摩着对方的心理。最终还是辛垣衍忍受不住这种难堪的局面，首先开口说：“住在这个被围的京城之中的人，都是有求于平原君的人，高贵的先生，不像有求于平原君，为什么长久住在这被围的城里而不离开呢？”面对辛垣衍咄咄逼人的问话，鲁仲连从容地说道：“世人以为鲍焦^①是由于器度狭小而忧死的，都是错误的。现在一般人不了解他，以为他是为个人打算。秦国是抛弃了礼义而崇尚斩首之功的国家，用权诈之术来使用他们的贤士，把人民当做奴隶来役使；如果让它

① 鲍焦，相传为古之廉士。耕田而食，穿井而饮，非妻所织不服。子贡讥笑他，他抱木而死。

自称为帝，不幸而控制了整个天下，那么我只有奔向东海去死了，我不忍给它当老百姓！我所以要见将军，是想帮助赵国。”辛垣衍心想，现在秦乘大胜之锐气，重兵包围了邯郸，赵国君臣失色，一片哀怨，悲痛还来不及，哪里还有抵抗的力量呢？你鲁仲连有什么高招能救赵国。于是反守为攻说：“先生打算怎样帮助赵国呢？”鲁仲连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将来让魏国和燕国帮助它，而齐国和楚国本来就是帮助它的。”辛垣衍带着怀疑的口吻说：“燕国嘛，我相信它是会听从你的；至于魏国，我就是魏国人，我不知道你怎么能使它帮助赵国。”鲁仲连凝目注视着辛垣衍，说道：“这是魏国没有看到秦王称帝的害处的缘故，假如魏国看到了这一点，魏王必定会帮助赵国。”辛垣衍急忙问：“秦称帝，对魏有何害处呢？”鲁仲连接过话题，说：“从前齐威王曾经实行仁义，带领天下的诸侯朝拜周王，周王既穷又弱，诸侯没有谁去朝拜，而齐王偏偏去朝拜周王。过了一年多，周烈王死了，诸侯都去吊丧，齐国的使者后到。周王大怒，派人把烈王的死讯告知齐国说：‘周烈王驾崩，天子离开宫室，寝在苦席上守丧，齐国的臣子田婴后到，应该受斩头之刑！’齐威王变了脸色大怒说：‘啊！你的母亲，不过是个出身低贱的婢子罢了，你有何高贵可言！’齐威王的非礼，终于被天下人所讥笑。齐威王之所以在周烈王生时朝拜他，死后就斥骂他，实在是因为忍受不了周王对他苛求的缘故。那天子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的。”

辛垣衍反问说：“先生难道没有看见过奴仆吗？十个仆人跟随一个主人，难道是力量抵不过，智慧赶不上吗？是因为怕他呀。”鲁仲连就势说：“魏国对秦国来说，就像仆人一样吗？”“是的。”辛垣衍点头说道。鲁仲连紧接着说：“那么我将让秦国把魏王用酷刑杀死！”辛垣衍的脸色立即变得阴沉下来，很不高兴，说：“唉，先

生的话，也太过分了！您又怎么能使秦王把魏王用酷刑杀死呢？”鲁仲连冷笑道说：“这不过是小事一桩。等我说给你听：从前的九侯、鄂侯、文王，是纣王的三个诸侯。九侯有个女儿长得美丽动人，所以进献给纣王。九侯之女不好淫，纣王便怒气冲冲地把九侯剁成肉酱；鄂侯急切地为他争理，剧烈地替他辩解，结果纣王把鄂侯的尸体做成肉干；文王听了此事，发出长叹，因此纣王把他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境）狱中拘禁了一百天，并想处死他。这三个人为什么跟别人一样都尊帝尊王，却终于走上被脯被醢的地步呢？”

接着又说：“齐湣王将要到鲁国，夷维子拿着马鞭跟随着，对鲁国人说：‘你们用什么礼节来款待我们的国君呢？’鲁国人说：‘我们将用十太牢款待你们的国君。’夷维子说：‘你们从哪里取这种礼节来款待我们的国君？我们的国君是天子啊。天子到各地视察，诸侯要离开自己的宫室，而让给天子；把锁钥缴纳给天子，提起衣襟，捧着几案，在堂下侍候天子在堂上吃饭；天子吃过了饭，他们才能退回自己的朝廷上去听政办公。’鲁国人听了之后闭关下锁，拒绝齐湣王入境，使得齐湣王没能进入鲁国。齐湣王将要到达薛地，向邹国借道。正在这时候，邹国国君死了，湣王想要去吊丧。夷维子对邹王的儿子说：‘天子来吊丧，主人必须把灵柩移到坐南朝北的方向，然后请天子面向南方吊唁。’邹国的群臣说：‘一定要这样，我们将要用剑自刎而死。’所以齐湣王不敢进到邹国。邹国和鲁国的大臣，对国君生时不能侍养，死后也无力备饭含^①，然而当齐王想对邹国鲁国的大臣们行天子的礼节的时候，邹、鲁的大臣还终于没有让湣王入境。现在秦国是一个有万辆兵

① 饭含，人死以后，把米放在死人口中叫饭，把玉放在死人口中叫含。

车的国家，魏国也是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彼此都据有万乘之国，都有称王的名声，只看到秦国打胜了一仗，就想服从秦王尊他称帝，这是让三晋的大臣，不如邹国、鲁国的奴仆婢妾呀！”

最后，又说：“况且秦王逞欲不止，自立为帝，将来就要更换诸侯的大臣，他们将夺掉所谓的不贤的人的职权而给予他们所谓的贤人，夺掉他们所憎恨的人的职权给予所喜爱的人；又要把他们的毁贤嫉能的妾妇，做诸侯的妃子，住到魏国的宫室里，魏王怎么能够平安无事呢？而将军您又怎么能够得到旧日的恩宠呢？”听到这里，辛垣衍站起身来，向鲁仲连再次行礼致谢说：“开始我以为先生是平庸的人，到现在我才知道先生是天下品德高尚的人啊！请让我离开这里，我不敢再谈尊秦为帝的事！”

秦国的大将听到这件事，便不敢加紧进攻邯郸，相反向后撤退了五十里。正赶上这时魏公子无忌夺得晋鄙的军权来援救赵国，赵军也乘机从城里杀出，内外夹攻，秦军像山崩似地溃败，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赵国终于得以幸存。

邯郸之围一解，赵国便庆功论赏。赵王非常感谢鲁仲连的侠义，要封他爵位，要任命他显职。他绝没有料到此时鲁仲连是何等的心情！此时的鲁仲连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各个诸侯国，上自国君，下至百官，除了鱼肉百姓颇有能耐外，遇到国家危难之时，却一个个束手无策，无可奈何。自己怎能与这些人一起使这个纷乱的世界变得更加纷乱呢？要是那样，不是与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驰吗？想到这里，他又不由自主地记起了孔子说过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话，现在不正是天下无道的时候吗？自己不仅要独善其身，维护自己的人格与节操，而且还要兼济天下……想到这里，他对赵王的表示再三推辞，始终不肯接受。平原君见此，便站起身来，走到鲁仲连面前，赠送鲁仲连千金，祝福他长

寿。鲁仲连笑着说：“天下的贤士可贵之处，是能够替人排除忧患、消除困难、解除纷乱而不取报酬；假如有取了报酬的，那是商人的行为，仲连我不愿意这样做。”于是辞别平原君，离开了赵国。

（三）愤世疾俗，单舟独棹隐东海

大约在秦孝文王元年（前250年），齐国和燕国之间发生了战争。燕国有个将军攻占了齐国聊城（今属山东）。聊城有人使用离间计，向燕王进谗言，说燕将的坏话，燕将怕回燕国后被杀，就坚守聊城，不敢领兵回去。齐将田单攻打聊城，双方交兵一年多，士兵伤亡很大，但聊城仍为燕兵占领着。鲁仲连这时正好回到了齐国，见双方血战旷日，而没有结果，老百姓无故遭受战火的侵害。于是，他决定劝说燕将，试图化干戈为玉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鲁仲连给燕将写了一封信，系在箭上射进城去。燕将得到书信，见信中写道：

我听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善于抓住有利机会的人才算明智；勇敢的人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忠臣不优先考虑自己的得失而把君主放在后面。现在你逞一时的气愤，毫不顾念燕王，这是不忠；聊城已在重兵包围之下，齐人正倾全国之力猛攻，城池被攻克只是时间问题，城破之日，将军遭杀身之祸，威名不扬，这是不勇；事业失败，身破名灭，后世对你无所称道，这是不智。目前是你生和死、荣和辱、贵和贱、尊和卑将分明的关头，时机不会再来，希望你不要为凡人俗见所左右，犹豫不决，而应考虑对策。

聊城为齐北重镇，齐国必争无疑；而燕国国内祸乱纷起，

民心动摇，燕国不可能派出援兵，况且你还遭到燕王的猜疑、忌恨。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仅凭聊城这一支困顿的兵力，抵挡住了整个齐国的进攻，坚持一年之久，可以说是像墨翟一样善于守城了；物资缺乏，用人肉充饥、枯骨为柴，而士卒没有涣散叛离，可以说你是像孙臆一样长于用兵了。你的才能已经显现于天下，处于这样的境地，并非是你自己的错。虽然如此，为你打算、着想，倒不如保全兵力来答谢燕国，使部队完好无损地回国，这样燕王必然高兴；百姓见子弟平安返回故国，必然视你为重生父母；朋友们会振奋地推崇赞许。如果你无意这样做，就离开燕国，摒弃世俗的议论来到齐国吧，齐国不会加害于你。希望你慎重地在这两条方案中选定一条。

或许你还想不通。其实，拘守小节的人不能成大事；因小辱而觉耻的人不能立大功。从前管仲射中齐桓公的衣带钩，这是犯上的行为；丢下公子纠不能为他效死，这是怕死的表现；身受捆绑，被戴上脚镣手铐，这也受尽了耻辱。假使管仲一直坐牢不能出狱，身死没有回到齐国，就不免要落个人人侮辱、行为卑劣的臭名了，奴婢也会感到羞辱。但管仲不以身遭囚禁为耻，而以不能使天下太平为耻；不以不能为公子纠效死而耻，而以不能在威名之间伸张威名为耻。因此，他虽兼有犯上、怕死、受辱三重过失，却终于辅佐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名扬天下，光耀邻国。由此看来，管仲不是不知顾全小的名节、讲究小的操守，他只是认为一死之后，身亡名灭，功业无以建立，不是聪明的做法，因而放弃一时的愤怒，建立一辈子的威名；摒弃一时的愤恨，奠定累世不朽的功业，从而他的声名也就同天地长久。请你三思而行吧！

燕将读罢鲁仲连的信，痛哭流涕，犹豫不能作出抉择。他想：要是回燕国，燕王对自己已产生了嫌隙，害怕被杀；要是投降齐国，自己曾杀死虏掠过成千上万的齐人，担心投降后会受侮辱。最后，他长声地叹息说：“与其让人杀我，不如自杀。”说完之后，竟拔出长剑，刎颈而死。

聊城失去主将，群龙无首，骤然大乱。田单乘机进兵，攻破城池，并下令屠城，聊城顿时成为一片血海。聊城被齐军收回之后，田单向齐王献功请赏时，将鲁仲连的事迹一并汇报了。齐王觉得鲁仲连在收复聊城中拥有首功，应该予以高官重爵，便派人四出寻找他，想当面授予他上卿的职务。鲁仲连听说田单血洗聊城，大惊失色，本以为通过说服打动燕将，免动干戈，却万万没料到田单贪功，嗜杀成性，致使一将功成万骨枯，无数生命惨遭屠戮，为此而心中难过极了。这时，又听说齐王准备封自己高官显爵，觉得这是在玷污自己的人格，让世人误认为自己为了谋求这一切，不惜牺牲无数生命，不禁喟然长叹说：“我与其这样富贵而屈身事奉别人，不如贫贱反可超脱世俗，使自己的志向不受委屈啊！施行仁德不能拯救社会的混浊；那些奸佞小人哪里还考虑百姓的死活，只要对自己有一利而丝毫不顾百姓的百害。追名逐利之人，飞黄腾达，指日高升；正直的人，竭诚尽忠，为民请命，却如同临绝险境地，找不到路径。”于是，鲁仲连像逃避瘟疫一般，急忙跑到东海边，操一叶扁舟，颠簸在浪峰波谷之间，将这纷争无序的世界远远地抛在脑后。自此之后，关于他的事迹史无明载。这样，被称为战国第一高士的鲁仲连，伴随着他隐居东海，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东方朔



东方朔的吏隐道路

· 高 放 ·

引 言

东方朔是朝廷命官吗？是，也不完全是。

东方朔是隐士吗？是，也不完全是。李贽《藏书》把他归于《吏隐》一类，不无道理。拉开历史的帷幕，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身佩长剑、体态魁梧、风流倜傥、能

调善侃的畸形人吧！

东方朔本姓张，小名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阳信县大桑洛墅）人。那么，他为什么又姓起“东方”来呢？原来他是一个“弃儿”。生父姓张，名夷，字少平。母亲田氏。当这个小生命来到人间刚三天，母亲就去世了。真是“有娘的孩子像块宝，无娘的孩子像根草”，无法养活他的父亲，只好把他扔出家门。当邻母听到婴儿啼哭声将他抱回来的时候，正值东方发白，于是便取姓“东方”，名“朔”。另一说，是母亲死后，由兄嫂抚养长大。这是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的事。

他虽然在无知中就失去了亲生父母的爱抚，但在义母的精心抚养下茁壮成长起来了。刚满三岁，就显露出独特的性格。他记忆力特别强，而又富有好奇心，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兴趣。尤爱“天下秘识”，“一览”就能“暗诵于口”，且又喜欢指天画地，像着了迷一样地自言自语。为了探索书中的奥妙和寻求未知的世界，小小年纪就敢离家出走，经月不回。义母虽曾严加管教，但这个放纵不羁的孩子，在猎取心的驱使下，多次逃离家园，在外流浪，即使是被蚊叮蛇咬，狼追狗扑，也在所不顾。这个富有开拓性的孩子，在艰苦的流浪生活中，不仅增长了知识，也磨练了意志，更增强了体质。正是这颗不断追求的心，使得他的青少年时期闪烁出异彩来。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写道：“齐人有东方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在他的自荐书中也谈到“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五学击剑”；“十九学孙吴兵法，战胜之具，钟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①。透过这些文字和数字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这

^① 李贽：《藏书》卷68，《奸臣传·史隐》。

个年轻人正以无比的热情抓紧农闲，在寂静的书斋里汲取知识，汲取力量。他陶醉在没有束缚和羁绊的追求中，其思想是活跃的，精力是充沛的。为了冲出去，他正从重压下、从坚硬中聚集力量、磨练胆识，作好向上层社会冲杀的准备。

（一）满怀激情，西进长安求达官

在历史的长流中，时势与英雄两者的关系总是互为因果、辩证存在和发展的。自刘帮代表地主阶级掠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起新的地主阶级政权——汉王朝以后，经过文景之治进入到汉武帝时期，已经达到了鼎盛阶段。汉武帝为了招揽天下贤才为自己的帝业效忠出力，便下了一道“徵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①的诏书，于是，四海有识之士，纷纷聚集长安。他们殚精竭智、洋洋洒洒向皇上进言，抒发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伟见”，希望获得一顶“乌纱帽”，以偿寒窗苦读，长途跋涉的艰辛。崭露头角的东方朔也挤在这群人流中。

东方朔在众多的上书者中颇具特色，引起了汉武帝的青睐。他毫不自逊地夸赞自己“身長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②，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后生，具有勇、捷、廉、信的性格特征。即自诩有齐国勇士孟贲般的膂力，春秋时庆忌般的敏捷，齐国鲍叔般的廉洁，战国尾生般的信守，具备了成为“天子大臣”的条件。正是这种不亢不卑、大言不惭的自白，引起了汉武帝的好奇心。其次，东方朔的上书确具有内容“凡用三千奏牍”，在没有纸张书写

①② 《汉书·东方朔传》。

的时候，他写的“奏牋”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汉武帝看看停停，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于是，“诏拜以郎，常在侧侍中”^①。

东方朔虽然获准留在长安，但生活待遇低下，且始终没有机会接近皇上，以抒己见，以展鸿图。于是，这个狡黠的年轻人便在盘算着。一天，他走到御厩前对那些看马管车的侏儒们说：“我听皇上说，留下你们这些人毫无用处，要你们去种田吗？你们不能耕地扛锄，算不了一个好农民；叫你们去当官吗？你们没有理政、治民的本领；要你们去当兵吗？你们又不能横枪跃马、杀敌夺虏，留着你们对国家对社会都是一个累赘，不如统统杀了的好，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只知伸手要吃、要穿的人。”侏儒们听罢吓得魂不附体，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纷纷向东方朔讨教。东方朔见一计已成，便再生一计道：“你们这些蠢才只知道哭，哭能解决问题吗？我给你们拿个主意，如果皇上出来，你们就跪下向他求情，不就没事了吗？”不久，汉武帝果然来到御厩看马，侏儒蜂拥而上跪在他的面前嚎啕大哭。待问明原因之后，知道是东方朔出的歪点子，便找他来责问。东方朔振振有词地说：“侏儒身长不过三尺许，他们一月能得到一袋口粮，还有二百四十钱俸金。他们撑饱了还有余有剩。我身高九尺三，每月也是一袋口粮、二百四十钱俸金，食不饱肚，衣不蔽体，这实在是不公平了。如果陛下认为我是一个可用的人才，就应该给予优厚的待遇才对。如果认为我是无用之辈，就应该早早遣散我回家。您怎么能忍心让我沦为长安城中的一名乞丐呢？”汉武帝听罢，哈哈大笑。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下诏封他为“待诏金马门”（这是供皇帝随时征召咨询的官员），从此，他的待遇得到了改善，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接近皇上的机会。他

① 《史记·滑稽列传》。

在滞留长安的这段日子里，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终于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东方朔来自下层社会，接触面较广，加之又读过很多书，有着超人的见识，常能为汉武帝解疑答难，且性格活泼，出语诙谐，深得皇上的欢心。虽有行为不检之处，也能获得皇上的谅解。

有一次建章宫后阁栏杆中钻出一头像麋一样的动物来，有人向汉武帝报告，并引来一群人围观，但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只好诏见东方朔。狡黠的东方朔看罢，故弄玄妙地先提出个要求道：“我知道这是什么动物，但陛下得先赐给我美酒佳肴，我才愿说出来。”汉武帝满口答应了。等到他酒醉饭饱之后，又提出一个要求道：“某地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陛下要是慷慨赐给我，我立即就说出来。”汉武帝急于要了解这头不知名的怪物究竟是什么，也就爽快地答应了。踌躇满志的东方朔，这才说出：“此所谓驺牙者也”，远方必有来归附的人，所以驺牙先来预报。而且，他详细地指出这种“驺”“其齿前后若一，齐等无牙”。^①事情过了一年以后，果有匈奴混邪王率将士十万前来降汉。这虽然是一种巧合，但仍然博得了汉武帝的欢心，又赐给他很多钱财。

有一次，汉武帝东游至函谷关，发现前面有个怪物挡道，其身長数丈，有点像牛，眼睛发亮，寒光闪闪。四脚深深入土中，能动却又拔不出腿来。所有的人看了都十分害怕，又不知道为何物？在没办法处理这怪物时，又把东方朔找来。东方朔虽不能立刻说出一个道道来，但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即用酒去灌。一连灌了数十桶酒，这头怪物才渐渐地消失，没入土中。汉武帝问他这是为什么？东方朔带着忧戚的神情作了一番似是而非的解释

① 《史记·滑稽列传》。

道：“此忧患所生也”，“必秦之狱地”，“罪人徙作地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也”^①。他的解释是否准确，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追究。从东方朔的感情上来看，他是在把这种怪异现象的出现，归咎在秦的暴政和征伐上了。汉武帝深感东方朔见识之广，识物之多而叹曰：“博物之士，至乎此乎。”^②

正是由于东方朔在许多时候能为皇上解难答疑，汉武帝一直把他留在身边没有让他走，他的官职也逐步由待诏公车、待诏金马门，直至太中大夫。但他生性滑稽，出语诙谐，举止荒诞，常给他的升迁带来致命的弱点，甚至引起人们的攻击，以“狂人”污之。

（二）思维敏捷，常令对手叹奇才

能令对手叹服，才是真正的强者。东方朔带着几分放纵不羁的色彩，混迹于上层社会之中，在皇帝和大臣们面前，常显得“大逆不道”，却又没有受过惩处，有时还能得到格外的赏赐，难免又引起人们的嫉妒。“覆射”是当时流行于宫中的一种带赌博性质的游戏。东方朔凭着自己广泛的阅历、敏锐的思考和多辩的口才变成了常胜将军。这时，汉武帝身边还豢养着一名叫郭舍人的“俳优”，是一个巧言令色、善于巴结的人。见东方朔在覆射中常能取胜，便说那是瞎蒙的，决非真本领，要与东方朔进行一次实地的较量。摆出的赌注是“要是自己输了，愿挨一百板屁股；要是赢了，要求皇上赏他布帛”。于是，他从树上找来一种寄生物扣

①② 《太平广记》卷 359《妖怪一》。

在盆子下让东方朔猜。东方朔围着这个盆子敲了敲、听了听，然后说：“此为‘蓂蕝’（jù sǒu，音句叟）。郭舍人一听，认为他猜错了，便高兴地要求赏赐。东方朔作出了巧妙的解释：没有煮熟的肉叫脍，烘干了的肉叫脯，生长在树上的东西叫寄生，覆盖在盆子下的东西叫“蓂蕝”。于是，汉武帝判东方朔取胜，郭舍人的屁股挨了一百板，直打得嗷嗷叫。那么，“蓂蕝”究竟是什么呢？原来是一种用茅草结成的圆圈，以便放在头上顶着东西走路时用的。其实，东方朔只是从广泛的范围来阐明对这种寄生物的体形的特点而已。当郭舍人挨打的时候，东方朔高兴得手舞足蹈，还朗声哼道：“咄！咄！口无毛，声嗷嗷，尻（kāo，指屁股）益高。……”恼羞成怒的郭舍人反咬一口，说东方朔是肆意羞辱朝廷命官，要求皇上将他斩首。东方朔狡辩道：“此乃隐语也，怎能说诋毁朝廷命官呢？所谓口无毛者，狗窠（即洞）也；声嗷嗷者，鸟在喂食也；尻益高者，鹤低头弓背饮水也。”不管他怎样解释，羞辱之意是明摆着的，但谁也驳不倒他。

有一次上林苑给皇上送贡品来了。汉武帝要考一考东方朔的才智，便召他进宫来。汉武帝站在未央宫的台阶上，用木棍将木栏连敲了两下，然后口中念道：“叱（chì，音斥）！叱！先生束束！”东方朔的脑子里立即闪现出：两木相击为“林”，“束”“束”相加为“棗”字。叱！叱相乘为四十九。一定是上林苑送来了四十九枚红枣。汉武帝见他思维如此敏捷，更是叹服不已。有时甚至是想方设法刁难他一下。一次，一群大臣陪同皇上去游上林苑，见一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便问东方朔这叫什么树？东方朔随口而答：“此树名善哉！”汉武帝明知他是在胡诌塞责，但谁都不知道此树何名，也就算了。却又暗地叫人把这棵树的权枝砍掉。过了二年，他们又一起去游上林苑，汉武帝指着这棵砍得

秃秃的树问东方朔“此树何名？”东方朔应声而答：“此树名瞿所。”汉武帝严词责问：“你真会说瞎话，同是一棵树，前年叫‘善哉！’今年叫‘瞿所’，你这不是欺君罔上吗？”东方朔不慌不忙，言之凿凿：“夫大马为马，小马叫驹；鸡子长大了的叫鸡，没长大的叫雏；大牛叫牛，小牛叫犊；刚生下的小孩叫婴儿，长大了的叫老者。此树过去叫‘善哉！’现在叫‘瞿所’，并没有什么错。长、少、死、生，万物成败，都没有定数，均可随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我决无蒙哄陛下之意。”汉武帝原想借此揭他一次老底，谁知这个妙语如珠的东方朔具有难不倒的辩才，心中暗自佩服。从此，一有疑难，便找东方朔询问，君臣关系更臻密切。

东方朔的敏才、善辩和升迁，同样也引起了儒生们的忌妒，总想寻个机会难倒他。一次，汉武帝召集儒生博士们议事，东方朔也在被邀之列。有人当面诘难他道：“苏秦、张仪是古代能言善辩的谋士，他们的连横、合纵主张一经采纳，便能高踞相位，泽及后世。东方先生是研究先王治民之术的人，自称是‘海内无双’的贤才，但不知为什么搞了这么多年还是‘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呢？就连你的亲属也得不到一点照顾，这实在不好理解。”面对这种富有挑衅性的问题，东方朔不慌不忙作出了一番义正辞严的驳斥：“诸位先生都是学富五车又有修养的人，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也应该好好研究现实。这样才能不拘泥于历史现象，才好把张仪、苏秦和我东方朔联系起来看。张仪、苏秦生活于周室倾危、群雄割据、诸侯争霸的时代，征伐、兼并到只有十二个国家存在的时候，仍然看不出鹿死谁手的结果，在此成败决策的时候，人才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所谓‘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乱世出英雄’，那是锻炼人的大熔炉，对于那些善于延揽人才的君主来说，只要有利于实现自己帝业的人才，自然言听计从，

予以重用。张仪、苏秦之所以高踞相位，享受优厚待遇，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战国时期有着根本的区别。现在的皇帝英明，天下统一，要办好一件事情，推行一种政策和法令，就像在手中转动任何一个物体一样那么容易，真可谓一呼百应。现在国泰民安，恩及四海，国家的根基稳固得很，就连四海的夷狄，也来纳贡称臣，求得保护。在这种和平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一批又一批的智能之士，大家都渴望得到重用而献计献策，怎么好区别他们的贤与愚呢？要是张仪、苏秦和我处在同一个时代，恐怕连一个‘掌管’的小官吏也捞不上，还奢望当什么‘侍郎’呢？所以说时异事弃。但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和上进心的人，就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从另一个方面去施展自己的才能，去推动社会的发展。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①姜太公一生行义，到了七十二岁，才碰上周文王得以实现他的主张，被封在齐国，恩泽子孙，传国七百年而不绝。只要是勤勤恳恳地研究学问，老老实实地做人，又何必担心身过不留名呢？有些隐士的主张，虽一时不被重视，一生也没有享受过什么高官厚禄，但他们的人格是高尚的，就像一块矗立的巨石，安然挺拔。许由是帝尧时一名贤德的人，并没有作过官，但人们称赞他，尧想启用他。接舆是楚国很有才学的人，尽管他自己装成疯子，而人家就不这样看待他。范蠡是大智大勇的人，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为什么要泛舟隐去呢？伍子胥是一代名臣名将，为了吴国的兴盛，可谓披肝沥胆，他虽然遭到奸臣的杀害，但其高大形象，却高照史册，谁会说他是该杀的人呢？纵观古今历史人物走过的历程，均足以启发我们去思索。这正所

① 《史记·滑稽列传》。

谓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诸君纠缠。‘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义’，‘枉而直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① 这是圣人教给我们处世做人的准则，愿与诸君共勉。”东方朔这番严肃的剖白，不仅说明了自己既安于现状又图进取的积极态度，有力地回击了挑衅者的热嘲冷讽，更表现出他善于观察、勤于思考、长于辨析的卓越才能，致使满座哑然，对手叹服。

（三）襟怀坦荡，直言忠谏阻歪风

东方朔出语诙谐，性格放纵，游刃于上层社会之中，但并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人。相反，他的眼睛里夹不得半点沙子，对于违背常理，侵害人民利益的事却敢大胆直言，敢谏敢阻。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率领大批人马，假称是平阳侯的人，微服外出猎狩。而且，往往是深夜出去，平明回来。在追杀各种野兽的过程中，常不顾及地里的庄稼。农民辛辛苦苦耕种出来的庄稼，还不到收获的时候就全被糟蹋掉了，能不心痛吗？于是，纵声谩骂，并成群结队地把平阳侯的这些恶行告到鄠（今陕西户县）、杜（今陕西长安县西）县衙。县吏们听到这种胡作非为的搞法，也很气愤，便要去找平阳侯说理。不料走到半路上反遭猎手的袭击。于是，激起了县吏极大的愤怒，才强行扣下几个猎手。经过一番审讯之后，这几个人才吐露实情，并拿出他们身边所带的“舆物”来

^① 《汉书·东方朔传》。

证实自己的身份。县吏弄清真象以后，也无可奈何，只得把他们放走。从此，南山之下便知道皇上在微行狩猎。虽然蒙受了损失，谁也不敢吭气了，还在各地为皇上设置行营，让这批人有休息、寝宴的地方。尽管是劳了民、伤了财，而汉武帝仍觉得这样太劳苦、太不方便，便打算在离长安近一些的地方开辟一个范围更大、规模更宏伟的上林苑。吾丘寿王就是这项计划的献策者和规划者，因而深得汉武帝的赏识。东方朔却与此人持相反的态度，便直言进谏汉武帝有“奢侈越轨”的表现。他认为在京郊扩大上林苑是“绝陂池水泽之利”，“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的^①愚蠢作法。还指出扩大上林苑之后，徒使麋鹿、狐兔成群，也只会给虎、狼猛兽提供栖息场所。这些野生动物为了找东西吃，还会破坏生产，也会挖冢啃尸、吃人的家畜，这样就会伤害人们的感情。何必为了一时一事的欢乐去干有损于国富民强的事呢？他顺便向汉武帝推荐了《泰阶之符》^②的建议。《泰阶之符》是什么呢？它分上、中、下三台，共设六个星座，两两并排而斜上，如阶梯。并说：“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岁大登，民人息，天下平。……”这大概是那时观测天文的一种设备。汉武帝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正式拜他为太中大夫，成为了亲近的侍从官员，以备顾问应对、奉诏出使等职，秩比千石，还赐给黄金百斤，表示谢意。但是，迷恋狩猎的汉武帝，并没有放弃上林苑的扩建工程，这给东方朔的心灵上投下了一个阴影。

有一次，上林苑里有一只鹿被人杀了，武帝听后大怒，下令有司将杀鹿的人处死。群臣们为了讨得皇上的欢心，阿谀一番之后，都说此人该杀，天大的胆子，也不能把上林苑里皇帝的宠物

①② 《汉书·东方朔传》。

杀害。东方朔站在一旁暗想：为了一头鹿，竟忍心杀一个人，皇权之极，实在太可怕了。他灵机一动，挺而进谏道：“这人不仅该杀，而且应该让他死三遍。首先，是诱使陛下因鹿杀人，这是一大罪；其次，使天下人闻之，都说陛下重鹿、轻人，这是第二大罪；再次，当匈奴来侵犯时，便可用鹿去驱杀敌人。现在，鹿死了，人也死了，谁去边关守隘、抗敌？”经他这么一说，汉武帝知道自己盛怒之下所作出的决定，是不得人心的。于是，便下令释放了这个错杀了鹿的人。东方朔运用自己机敏的辩词，不仅救了一个无辜者，无形中也匡正了皇帝的一个错误决策。

古代中国素被称为礼义之邦，而封建朝廷总自命是推行“礼”、“义”之道的司令部，声称要按礼、义、廉、耻的最高标准来衡量臣民的思想言行。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否也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存在呢？如果有，又该怎样呢？东方朔在这个方面是敢直言不讳的。隆裕公主的儿子昭平君因犯法关押在死牢里。后来公主患了重病很思念孩子，花了大把大把的钱把儿子赎了回去。但这个桀骜不驯之徒，在母亲死后，劣性不改，甚至敢杀“内官”，于是再次被投进了死牢。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形成了两种看法：有人想讨好皇帝，说什么“既然上次可用钱赎罪，这次也可以这样作”。另一种看法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汉武帝面对这个公案，有心袒护，又怕引起议论，想起姐姐临终时的嘱托，不禁潸然泪下，凄切地对大家说：“姐姐老来才有这个儿子，临死时将他托付给我，然而“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①因此，“哀不能止”。许多大臣见汉武帝这样伤心，也跟着流眼泪。唯独东方朔举杯上前称颂说：

^① 《汉书·东方朔传》。

“皇上赏不避仇，诛不避骨肉”，“天下幸甚！”^①正在悲戚中的汉武帝觉得他的话太不近情理，便拂袖进宫。不久，便把他传进宫中训斥道：“讲话要讲究时间地点，我正在难过的时候，你向我祝贺进酒，这难道是合适的吗？”东方朔巧妙地宽慰汉武帝道：“我听说：‘乐太甚则阳溢，哀太甚则阴损，阴阳变则心气动，心气动则精神散，精神散则邪气及，消愁者莫过于酒。’”^②经过这么一说，汉武帝的气全消了，不仅没有惩罚他，还赐帛百匹，以资鼓励。

馆陶公主是汉武帝的姑母，堂邑侯陈舞的妻子。陈舞死后，年过五十的寡妇不甘寂寞，豢养了一个比他小十三岁的男幸——董偃。开始是教他读书、识字、相马、射击，到了十八岁便“出则执辔，入则侍内”^③，成了须臾不可分离的人物。因为是长公主的宠幸，人们也另眼相看。长公主又怂恿董偃用钱财去结交朋友，达到了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的境地。董偃为了稳住自己的地位，又采纳了一个名叫爰叔的人的建议，设法讨好皇上，接近汉武帝。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之后，馆陶公主把自己的领地“窦太主园”改为“长门宫”，献给汉武帝，讨得了皇上的欢心。然后，又装起病来，引得皇帝前来探亲。佯病中的长公主装出十分思念的样子道：“希望皇上路过我家，一定进去叙谈，一定要好好接待。”既然是病人的愿望，汉武帝也不便拒绝，便满口答应了。不久，汉武帝从长门宫回来，果然来到她家作客。馆陶公主热情接待，亲自下厨，并设法引见了董偃。这一来，董偃的身份便合法化了，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有时还可以陪同皇帝在北宫游戏，或到外面骑马、观看斗鸡等，竭尽阿谀之能事。

为了答谢皇姑的盛意，汉武帝还在宣室设宴款待馆陶公主。宣

①②③ 《汉书·东方朔传》。

室是未央宫的正室，是大臣们朝见皇上的地方。汉武帝还派人想把董偃也召来。这天正值东方朔执戟值班，他觉得皇上这样做太失体统了，便“辟戟”进谏，严肃地指出董偃以一介平民私侍公主，搞乱了婚姻关系，败坏了伦理道德，助长了男女之间的不正常气氛；而且董偃千方百计引诱皇上游玩，“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狂之道，径淫辟之路”，是“国家的大贼，人主之大贼”，应该及早地处死他才对，怎能让这种人来宣室作客呢？汉武帝觉得东方朔言之有理，表示以后要疏远他，但酒宴已经摆好，就让他混过这一次算了。东方朔却坚决反对道：决不能让这种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人踏进这庄严的殿堂，并引古证今把董偃比成古之奸贼竖刁、易牙、庆父之流。汉武帝没法驳倒他，只得下诏撤宴，改置北宫。从此，也不再宠信董偃。得意一时的董偃又过起了提心吊胆的日子来了，刚过三十，就一命呜呼了。

东方朔就是这样一位敢于直言极谏以阻止歪风的人物。

（四）退而求隐，苟且于天子脚下

东方朔虽然性格放荡，出语诙谐，但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智慧、有能力的人。他在汉武帝身边多年，除了解疑答难、逗笑取乐外，也曾讨论过许多国家大事。他曾引古证今，大谈尧舜之道，希望汉武帝作一个继往开来的明君。他也曾把自己与古今名臣和周围的人作过多次的、纵横的比较，坦露出自己的胸怀与求职求官的愿望。但汉武帝始终没有重用他，从某种角度来说，只是把他当成取乐逗笑的玩物而已。东方朔是一个熟谙历史的人物，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意识到自己的抱负、理想、才能难以

发挥，便产生了退而求隐的思想，并从无数历史事件中总结了这样一条结论：“为士者用则为虎，不用则为鼠”^①。其中包含着许多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没有发牢骚、讲怪话，诋毁皇帝，中伤同僚，而是通过巧妙的设想，抒发出自己的苦恼。他在《非有先生》一文中，大讲了直言进谏的两种后果，隐然说出了自己的失落感。而且他的这篇对话体的文章，开创了生动活泼的议论文风，对后世文坛起了很好的作用。其文曰：非有先生仕于吴三年，进不称古人之德以劝谏吴王，退也不宣颂吴王的功德。于是引起了吴王很大的不满，便责问道：“寡人继承了先王的功德，又借助了许多贤臣的智慧和力量，夙兴夜寐，从不敢放松自己该做的工作。先生既然以德才兼备来到吴国，就应该帮助我把国家治理得更好，而你三年来没有提出过任何意见，也没有听到你说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话，难道我是无道昏君，是一个不堪辅佐的人吗？”非有先生听了此话，知道吴王是有意“将”自己的军，还是唯唯诺诺，只说“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吴王见他如此多的顾虑，便坦然保证道：“与中等文化水平和修养的人可以谈高深的道理，你就大胆地试着谈罢，我企盼着你的善良的意见！”于是，非有先生便引古证今提出了一系列忠言进谏所取得的不同后果，说明自己三年来不敢开诚明言的原因。

关龙逢（páng，音旁）是生活在夏桀时候的一个忠臣，夏桀在位时不讲德行，无端杀害百姓，又凭武力去侵犯其他部族，致使其他部族联合起来反对他。关龙逢进行了多次苦谏也不听，最后还把关龙逢杀了。桀由于不接受忠臣的劝阻，招致了夏王朝的彻底覆灭，最后为商所取代。殷纣是商朝的最后一个昏君，在他

① 《汉书·东方朔传》。

淫乱不止的时候，他的叔父比干曾多次进谏，他不仅不改邪归正，还制炮烙、设盂盆，塞阻忠臣进谏。比干以死力争，三日不去。纣王不以为忠，反而听信妲己谗言，将比干剖腹挖心。像关龙逢和比干都是大智大勇、忠心若日高悬的人，他们之所以拼死进谏，为的是使帝业得续，万民能不遭罪，而他们都遭到了惨死，这难道不足以证明进谏一事“谈何容易”吗？当他们进谏的时候，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则攻击他们是蓄意诋毁君王，罪不容赦。当他和他的亲属们遭到株连惨死的时候，构谗者颐指气使，自鸣得意。这部血泪斑斑的进谏史，至今仍在继续地书写着，而巧言令色者的狂想曲也仍在演唱着。蜚廉、恶来生本奸诈之辈，他们以膂力过人而事纣王，巧言令色以进其身，然后用雕琢刻镂等物去讨好主子，以靡靡之音去麻醉帝王之心，以美色去腐蚀帝王的躯体。到了这种时候，是非曲直的标准就完全颠倒了。辅国的仁臣被驱赶，邪佞之徒便乘机而入。如果在此时图进忠言，会被扣上“危言耸听，上拂主意，下违民心”的罪名。那么，即将出现圣贤被戮、宗庙崩弛、国家空虚、外患内乱接踵而来的亡国趋势，志士仁人虽有志于朝廷，但已无匡时济世的机会了，便只有走退而隐居的违心道路了。隐居者居林泉之间，筑土为室，编茅为庐，弹琴作乐，以咏先王之风，不问当时之事，以了残生。伯夷、叔齐本是商纣时的贤德之士，为什么要隐居首阳山而当饿死鬼呢？还不是觉得自己的一片忠心，得不到纣王的理解，眼看大厦倾覆，又无力改变，更不能阻止周武王征伐纣王的兵力。他们既不愿作商的逆民，也不愿作周的顺民，只得走上隐居的道路而作了饿死鬼。

接着东方朔又对历世隐士们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分析。许由是尧时贤臣，尧想起用他，他就是不愿挤上政治舞台。他认为尧只知贤人有利于天下，而不知他们也能贼天下的道理。许由虽没当

官受禄，但并不影响他作为贤士而存在于历史上。箕子也是纣王的叔父，见纣王无道，专听奸佞之言，不纳忠臣之谏，便装疯作傻，才得以保全住性命。商亡后，被封于朝鲜。后来，当他路过殷墟，作诗凭吊故国时，谁不为他抛洒同情泪呢？接舆是楚国的贤士，楚王曾以百金聘他为官，要他帮助治理江南各地。他认为这是“富贵人之所欲”，他的妻子也认为“至人乐道，不能以贫易操，不为富改行”。于是，双双隐居四川峨嵋山上。像箕子、接舆这样的人，如果能碰上明君圣主，君臣之间能推心置腹，共商国事，共图富强，上下同心，则国泰民安，还怕三皇五帝那样的盛世不能再现吗？伊尹耕于莘（今陕西合阳县东南）野，商汤三次去聘请他。他们之间由于统一了认识，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才以天下为己任，出山帮他伐桀，此所谓圣人之任。

姜子牙也是贤能智谋之士，七十岁了还没有出山，垂钓于渭水之滨。他是在等待时机，寻找明主，直到认识周文王之后，感到心同意合，才愿意帮他去征伐纣王，统一全国的。周文王、周武王对姜尚无比信任，总是言听计从。正是由于君臣的团结和深信不疑，给姜尚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使他能深思远虑，引义正身，推恩而广天下，奖励有德行的人，录用贤能的人，惩罚那些道德败坏的人，这样便达到了统一的目的，建立起美好的风尚，实现了帝王之业。他毫无野心，尽到了臣子之责，封侯授爵，传之子孙，名显后世，万民称之于今世，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关龙逢、比干、伊尹、姜尚……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人，而他们的结局却迥然不同，这不正说明“谈何容易”的道理吗？

吴王被非有先生的这一番话感动得泪流满面，而且深切地感到自己身上确有许多毛病，已经把吴国推向到危险的边缘了。于是，便痛下决心进行了一番改革。他从自己做起，严肃了上朝的

制度，端正了君臣的关系，选拔了一批品德廉洁的人，推行一整套节约的办法，减少了后宫的费用，限制了车马的使用权，停建了楼台馆阁的建设，并把一些皇家花园、池塘废除，用来发展生产。又从皇家仓库中拿出钱粮来赈济鰥、寡、孤、独和残废、老人，并减轻了人民的赋税和刑罚，又将一批奸佞之人与歌舞之徒赶了出去。……这样一来，只三年时间，国内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足，蓄积有余，囷囷空虚，凤凰来集”^①的一片升平景象。以致远方异俗之人向风慕义，各奉其职前来朝贺。……

东方朔这番“非有”的假设和议论，只能说是自身失落感的道白。汉武帝虽然多次向他执经问难，自己也曾多次露才扬己，但始终没有成为股肱之臣，其耿耿之情是谁都难免会产生的。

人总是要吃饭的，而且东方朔还是喜欢喝酒的人。刚进长安的时候曾因不愿作长安的乞丐而骗了侏儒们。他的出身和经济基础并不具备离开长安、遁入山林、不问世事的条件。他常说：“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②汉武帝问他时，他也坦诚相告：“臣闻贤者居世，与之推移，不凝滞于物，彼何不升其室，饮其浆，泛泛如水中之凫，与彼俎游，天子穀下，可以隐居，何自苦于首阳。”^③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使东方朔幻想通向达官贵人的彩虹在脑子里渐渐地隐去。他还写了《十洲记》、《神异经》，描绘的乃是人迹绝妙的仙境，是所谓“践赤县而遨五岳，行陂泽而息名山”、

① 《汉书·东方朔传》。

② 《史记·滑稽列传》。

③ 《太平广记》卷173《俊辩一》，《史记·滑稽列传》。

“日月所不逮，星汉所不与”^①的地方。汉武帝到了晚年，也想成仙成佛求得长生不老，东方朔也窥测到了这一点，便故弄虚玄地把“崑崙天柱”描绘得神奇极了。所谓“围三千里，员周如削，肤体美焉”，“有乌希有，绿赤煌煌，不鸣不食，东覆东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东，登之自通……”^②如果真有这样的仙界，东方朔不就早走了吗？何必苟且于天子脚下看着别人升迁而感到不是滋味呢？

（五）精言辟论，留予后人慎思索

东方朔到了晚年，放纵诙谐之气已经收敛多了，常以诗文打发日子。临终时他向汉武帝赠送了几句话：“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③汉武帝读后，不禁惻然，长叹一声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④其实以诙谐逗乐取幸于皇上的东方朔，何止一次向汉武帝献出过赤诚的心呢？只是没有被皇上正面接受而已。他还与同舍的人说：“天下无人识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⑤后来，汉武帝把太王公找来，问他是否知道东方朔是一个怎样的人？太王公也说不清楚，只是说，他观天象，其间有一个岁星，有十八年没有见到，现在又看见了。于是，汉武帝便认为这十八年来未见的岁星，一定是东方朔归位了。责怪自己没有早些发现，便惨然不乐，这无异给东方朔又披上了一件神奇的

①② 《隋书·志第二十八·十洲记》。

③④ 《史记·滑稽列传》。

⑤ 《太平广记》卷6《东方朔》条。

外罩。

“用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这是东方朔在《客难》的答辩中所说的一句话，南朝宋人范晔在《后汉书》卷23评论窦宪时发出了深切的感叹道：“卫青与霍去病是汉武帝时的征北将军，他们组织了强大的军队多次去征伐匈奴。然而，屡征屡逃，屡逃屡犯，屡犯屡征。征战连年，耗去国库一大半，还是不能彻底平息。后来卫青以征讨匈奴有功拜为大将军。霍去病封冠军侯，加骠骑大将军，名载史册，人称良将。他们两人出身卑贱，是通过裙带关系而逐步上爬的。当他们还处在奴仆地位的时候，哪里曾想过封侯受爵呢？窦宪是窦太后的哥哥，拜为郎。和帝即位以后，不断升迁为郎中，掌管宫廷机密，外宣诏命，可谓权倾一时。当他去击匈奴的时候，立下的战功并不亚于卫青与霍去病，有所谓率“胡羌边杂之师，一举而空朔庭”^①的战绩，他把匈奴追过辽阔的大漠，直达到了今天的腾格里湖一带，并负石刻碑，大振汉朝的天威，达到了一劳久逸的目的。如果把他们作一番确切的比较，自然是窦宪的功绩远远高出于前朝的两个人。然而，后世很少有人知道窦宪是一名善于攻战的名将，更不知道他的功绩。当他被夺权、撤职、查办、逼杀的时候，虽然再想像公鸡啼鸣一样长啸一声也没有机会了，哪里还能念及到叱咤风云、封侯受爵的岁月呢？所以说东方朔的这句话是有很深哲理的。有才华的人如果机遇不佳，就很难获得施展的机会。何况人的才能又是从不断磨练中提高的呢？失去了磨练、施展的机会，也就无法塑造成有才能的人了。

扬雄是西汉历元帝、成帝至哀帝三朝的大臣，少而好古，博古通今，因为有口吃的毛病，不喜欢说话，常喜欢思考，文章写

① 《后汉书·窦融传》。

得很好。有“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①的“清静无为”思想。虽然官至侍郎，而家境贫寒，“家产不过十金，乏无担斗之贮”。^②到了汉哀帝的时候，丁氏、傅氏和董贤当权，凡是依附在他们门下的人都发了财、升了官，而这时的扬雄仍潜心写《太玄》以自守。于是，这帮人便嘲笑他太书呆子气了。扬雄不屑与这些人多费口舌，也仿照东方朔的《客难》一文的写作方法，写了一篇《解嘲》，驳斥这些人对他的攻击：“炎炎者灭，隆隆者绝”、“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还说“藺先生收功于章台，四皓采荣于南山，公孙创业于金马，骠骑发迹于祁连，司马长卿窃誉于卓氏，东方朔割肉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数公并者，故默然独守吾太玄。”^③

在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已拜为郎中、典校秘书，专心笃志于儒学，以著书为主要职业的班固，有人讥笑他只是蛀书虫，没有什么功绩可言。不被人理解的心情常使班固感到难受，这时他也产生了东方朔写《客难》、《非有先生》时的这种感情，于是便写了《答宾赋》，以阐明自己“功不以虚立，名不可以伪立”、“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并不能说他们是“迂腐”，“一阴一阳，无地之方”、“乃文乃质，王道之纲”^④以阐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没有意义。事实上班氏一家前继后续所写的《汉书》是对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奉献，只是没有被当时那些追蝇逐臭的人所理解而已。

崔骃是与傅毅、班固是同时代的人，博学而有伟才，尽通古

①②③ 《汉书·扬雄传》。

④ 《后汉书·班彪传》。

今训诂百家之言，文章写得很好，常以典籍为业，有人讥笑他书生气太重，又说他“上不步卿相之庭，下不登王公之门，进不以党赞己，退不称（黜）于庸人”^①，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于是，他便仿效东方朔假设一个人物的写法，写了一篇《达旨》，回答了人们不理解他的议论道：“子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度也。”^② 如果为了获得高官厚禄去显露自己的才智，为了达到私人的目的去与人拼搏或结党营私，是自己所不愿干的事。基于此，我就不怕人讥笑了。此外，如唐人韩愈的《进学解》等设问法写作，也都是受到了东方朔的一些影响。

东方朔走了。他走进了汉代的史卷中，走进了文人的笔下，走进了失意者的自嘲中。翻读他的史料，这个似官非官、似隐非隐的畸形人，给人以笑谑，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思索，给人以谈资。他虽然走了很久很久，却永远不会被历史抹掉。

① 《后汉书·班彪传》。

② 《后汉书·崔骃传》。

梁
鴻



与丑妻偕隐的梁鸿

· 朱和平 ·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人。出生年月不详。因他的父亲梁让在王莽擅权专政时期作过城门校尉，故可推测他生于西汉末年。他是我国历史上知名度甚高的大隐士。

(一) 逆境苦读

梁鸿生于官宦之家。父亲梁让在“新”莽政权建立以前被封以修远伯的高爵。王莽好古成癖，登基后，认定一些人是三皇五帝、先贤哲人之后，分别赐予爵号，以显示自己的新朝能克绍先圣，弘扬仁德。王莽认为梁让是上古五帝之一少昊的后代，封他为修远侯，封地在北地郡（在今甘肃庆阳西北县马岭镇）内。王莽新朝短命，几年后，天下大乱，梁让举家逃难，途中他得病死去。梁让一死，昔日的官僚家庭就此衰落，成了一个赤贫户。如同树倒猢猻散，那些宾客、仆人、僚属见自己的主子不在了，都纷纷抢掠财物，远走高飞另谋出路。梁鸿的母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丢下了年幼的梁鸿，和尚未掩埋的丈夫的尸体，独自离开了梁家。少小的梁鸿，顿时陷入了举目无亲的状况，只得用一张破席草草地埋葬了父亲。战乱与家庭的变故给小梁鸿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深深地刺痛了梁鸿的心，这对他成年以后淡泊名利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为了能自力更生，梁鸿不得不离开北地到当时的京师长安谋生和求学。作为西汉帝国和新莽政权政治、经济中心的长安，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太学，就设在这里。梁鸿到达长安后，无依无靠，不免踟蹰街头。尚幸他父亲昔日的几位故吏见此情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既给他解决了衣食困难，还通过关系将他送入了太学学习。

在太学读书的太学生，几乎全是贵族官僚和富家子弟，个个穿戴阔绰，一掷千金；唯有梁鸿衣着破旧，经常为温饱发愁。这

样，不免招来了那些纨绔子弟的嘲笑和欺凌。这给梁鸿的心灵又以极大的创伤，看透了荣华富贵的虚幻性，使他萌发了逃避尘世的念头。

梁鸿好学不倦，博览群书，经书、诸子、诗赋等无所不通。他对当时儒学中那种皓首穷经，拘泥于一字一经的做法不屑一顾。梁鸿不愿钻研章句之学，无异是自绝了做官的门径。

梁鸿结束在太学的学业后，就在长安郊区的皇家林苑——上林苑中牧猪为生。在偌大的上林苑中，只见梁鸿早出晚归，放牧不辍。放牧之余，梁鸿夜夜在昏暗的灯光下苦读。清贫的生活，本来就使梁鸿吃尽了苦头。不料屋漏偏遭连夜雨，行船又逢浪头风。一天，梁鸿在家中边做饭边读书，读到入神处，疏忽了灶中的火种，引起了火灾。当火光热浪使他醒悟时，他的小屋已是烈焰冲天，无法抢救了。不仅如此，大火还蔓延到了邻家，烧坏了邻居的部分财物。

事后，梁鸿主动来到被火灾殃及的邻家，把自己喂养的那群小猪全都赔出。邻居一看梁鸿如此忠厚老实，贪心顿起，不肯放过梁鸿，说区区十几只小猪不足以抵偿他家的损失。梁鸿说：“如今我孑然一身，没有任何财产可以赔你了，我给你家干活吧。”邻居答应了。

梁鸿成为无偿佣工以后，将邻人家里里外外的活统统包揽，粗活细活无所不做。夙兴夜寐，不懈朝夕，勤勤勉勉，绝无怨言。村里人见他举止不似常人，便为他抱不平，纷纷责备那位邻居贪心失礼。邻居也为梁鸿的宽厚忍让精神所感动，不仅不要梁鸿干活了，而且把那群小猪全部退还给他。梁鸿坚决不肯收回，说：“火因我的过失而起，已给你家造成损失，我理应赔偿，岂能收回？”

从此，村里人都非常尊敬梁鸿，见面都称他“先生”、“夫

子”。梁鸿的名声也渐渐传了出去。后来，他见上林苑已无法安稳宁静地生活，便悄然回到了平陵老家。

(二) 择妇明志

人们提起梁鸿，总要谈到他的贤妻孟光。

梁鸿回到家乡后，耕种自给，读书养性，并无什么惊人之举。天长日久，他的学问、人品还是显露了出来。特别是他在上林苑中牧猪及失火为人作佣的一段逸事不胫而走，传入扶风，使得很多人慕其高洁，见他已届而立之年，都遣人来提亲，争抢这位隐士为婿。梁鸿岂能看中那些庸俗脂粉，他一概加以拒绝。

扶风县有一户姓孟的人家，虽不是高门贵族家庭，然却靠经商，聚积了不少钱财，算得上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家。孟家有一女儿，粗眉大眼，身材矮小壮实，肤色黧黑，可谓姿色俱无。这副容颜本来就使他的婚姻成为困难，但她偏又自视甚高，别人不挑她，她倒挑起别人来了。

有一次，一个落魄书生，饿昏在荒野，被孟女发现，背回家救醒，疗养月余，渐渐康复，书生渐生好感，对孟女的外貌也就并不在意，有求婚之意，孟家父母都感到非常满意，但却碰了孟女的“冷钉子”，并被数落了一顿：“你们读书人，不缺胳膊不少腿，到处请托权门。得意时，正眼都不瞧我们；失意时却饥饿不能自存，还痴心妄想娶媳妇呢？我如果在这时候答应你的求婚，人家会说我趁人之难。你还是不要这样打算吧！”书生只好答谢她的救命之恩，怏怏而去。这件事一传开，乡里大为震惊，都佩服孟女的侠义，不少人前往求婚。当地一家财主的儿子求婚，遭到孟

女的拒绝之后，顿生羞恼，指斥道：“我上门求婚是抬举你，凭我的财富，找一个漂亮媳妇难道还成问题吗？瞧瞧你那模样。”孟女毫不示弱，针锋相对：“有钱就财大气粗吗？模样丑是天生的，你有钱就买‘俊’的，就是买不去我这‘丑’的。”县令的小舅子一听，也决定来碰碰运气。他尽量打扮得儒雅一些，装出斯文相，登门求亲，与孟女相见，开口夸赞道：“久闻姑娘高义，实在佩服！”孟女莞尔一笑：“高义怎比高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哪里值得您如此称道？”县令的小舅子一听，也就悻悻地走了。

孟女几次拒婚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登门求亲了，及至三十岁时，仍是待字闺中。父母终于失去了耐心，问她：“女儿，你到底要嫁个什么样的夫婿？”女儿不假思索地应声而答：“我要嫁个像梁伯鸾一样的贤士！”父母以为自己听错了，请她又说了一遍；又以为是女儿灰心之极说的气话，但女儿神色安详，哪像是在生气呢！父母都认为女儿的这个念头荒唐之极，绝无实现的可能。

万万没想到，梁鸿听到这个消息后，竟请人来下聘礼。孟家人喜出望外，满口答应；又唯恐梁鸿反悔，很快议定了嫁娶之期。孟家女儿知道后，当然也高兴，但并没有像她父母那样乐昏了头，而是有条不紊地准备陪嫁的物品。

待到成婚之日，孟女被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头上珠宝金银，身上丝织衣服闪闪发光，脚穿青丝鞋。一路吹奏弹唱，好不热闹。然而，婚后一连七日，梁鸿一言不发。第八天早上，孟家女来到梁鸿面前，恭恭敬敬地行过礼，然后对他说：“妾早闻夫君贤名，立誓非您莫嫁；夫君也拒绝了许多家的提亲，最后选定了妾为发妻。妾深感荣幸！婚后，夫君默默无语，使妾诚惶诚恐。想必是妾犯了重大过失，如此，请夫君治罪。”

梁鸿听罢，带着一种不满的神情说：“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妻子

是位能穿麻、葛制作衣服的人，并且能与我同甘苦，能够与我一起隐居到深山大泽之中。而现在你却穿着绮縠等名贵的丝织品缝制的衣服，涂脂抹粉、梳妆打扮，一副贵夫人模样，这哪里是我理想中的妻子呢？”

孟女听了，不但不恼，反而欣然作喜，对梁鸿说：“我这些日子的穿着打扮，并不是我的初衷，我只是想验证一下，夫君是否真是我理想中的贤士。其实妾早就备妥了劳作的服装与用品。”说完之后，便将头发卷起来，穿上麻布衣服，架起织机，动手织布。梁鸿见此，又惊又喜，连忙走过去，笑容满面地对妻子说：“你是我梁鸿真正的妻子！”他怀着尊敬的心情，为妻子取名为孟光，字德曜，意思是她的仁德如同光芒般闪耀。

（三）隐居霸陵山中

自从梁鸿妻子换上麻布衣服，亲自纺纱织布以后，夫妇互敬互爱，男耕女织，在家乡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一天晚饭后，当梁鸿像平时一样拿起书本时，孟光拉住了他的手，用深情的目光注视了他好久好久，弄得梁鸿疑惑不解。这时，孟光用低沉的声音对梁鸿说：“妾早就知道夫君要遁世归隐，避开尘世的烦恼。但为何我们至今还不走？难道夫君还要向世俗低头，委屈自己去入仕吗？”梁鸿猛然惊悟，忙说：“贤妻说得好，此处无甚可留恋的，我们即刻归隐吧。”于是就在当天晚上，夫妻二人忙碌了一个通宵，收拾行装，将必须的生活用品打包装点，第二天天刚矇眊亮，夫妻二人背着包袱，踏着未尽的月色，悄悄地进到了霸陵（今西安市东北）山中，过起了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

在霸陵山深处，他们就着岩石，用枯树枝和茅草搭起了能遮风避雨的草棚，在山谷中开垦出了一片土地，种上了小麦等作物。白天，他们共同劳动；夜晚，梁鸿就着火边或诵读经书，或赋诗作文，或弹琴自娱。孟光则或缝衣纳鞋，或夫弹妻唱，抒发他们对前代高士的仰慕之情和不为利禄所染的高洁品格。夫妻二人对自西汉初年的四皓^①以来的高士二十四人都曾给予了高度的赞美，对他们每一个人都作了由衷的颂词。

霸陵山山势并不幽深、险峻，更不是无人涉足之地。梁鸿夫妻隐居于此山的生活终于被外人知道了，昔日平静、恬然的日子再也无法保持，经常有人慕名前往寻找他们。有人是去向梁鸿请教经书中的疑难问题；有人是去询问为人处世的哲理；有人则是去请梁鸿出来为官主政；有人更是怀着好奇的心理去观看他们的生活情况……看来霸陵山已不是梁鸿夫妻生活隐居的世外桃源了。因此，夫妻二人决定从地处人口稠密的关中搬往人烟稀少的关东地区继续隐居。

他们东出潼关，取道京师洛阳。看到洛阳城中巍峨、富丽的宫殿群，想到沿途所见老百姓生活的艰难，不禁对刚刚建立不久的东汉统治者有些不满与失望，他作了一首《五噫之歌》，讽刺统治者追求享乐，浪费民力，歌词大意是：“登上高高的北邙山，噫！俯览壮丽的帝王之都，噫！只见宫室连云遮日，噫！看不见百姓的辛劳，噫！漫漫辽辽的宫殿，噫！”

当时在位的是东汉王朝第三代皇帝章帝刘炟。章帝得知这首歌后，龙颜大怒，传令各地捉拿梁鸿夫妻二人。好在梁鸿夫妻有

^① 四皓，汉初隐居在商山的四位隐士，名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四人须眉皆白，故称四皓。

意隐藏自己的行踪，终于没有落入官府之手。尽管如此，梁鸿也不得不改名期运，与孟光跋涉千里，在远离洛阳的齐鲁地区找到了一片属于他们的乐土，继续过着他们理想中的生活。

(四) 再隐吴地

齐鲁并非梁鸿所希望的净土。过了几年，他们隐居的行踪又被世人发现，并最终传到了朝廷。由于时光的推移，虽冲淡了章帝的雷霆之怒，但章帝并没有完全忘记这个曾经不与自己合作，却还攻击朝政的逸民。他向地方官吏传下圣旨，表示只要梁鸿愿意到朝中任职，以往的言行均不予追究。梁鸿深知一首《五噫之歌》给章帝的阴影始终不会抹去，即使自己能得到皇帝的垂青，至多也不过是拿自己来为封建统治者装点门面，欺骗世人而已，自己的志愿是万万不可能实现的了。因此，当征召他入京的官吏正在寻找他时，他已偕妻离开了齐鲁。临行之前，夫妻二人百感交集，不禁感叹：

离开故乡呀，踏上漫漫的征途，到遥远的地方去安居呀！哪里才是理想之地？心里一直在淌血呀！折磨着我的身体，只是因为志向不能与世俗沉浮。我想要纵马挥鞭干一番事业，无奈得不到世人的理解，许多人说我的坏话，只是想让我听从他们的安置，这都是那些佞臣进谗言的结果。原来糜烂的生活方式会不会改变呀！我只希望到别的地方了呀！在那里可能会是尚贤任能。还是做个隐逸之士逍遥自在呀！像孔子那样周游天下。安闲自在地步行观看世间呀！是我十分高兴爽心的事，可以随时委弃车子而乘船。路过春秋时吴公子季札

所封的延陵，到天涯海角去寻找战国时鲁仲连的行踪。这虽然不是世人所能理解的，但我却认为是件幸事，我希望他们的灵魂与他们一样完美。这个时候是晚春时节呀！一望无际的是滚滚麦浪。可惜的是茂盛的万物会渐渐变得枯萎，遗憾的是芳香四溢的季节将不复存在。哀叹我的理想不能得以实现，我只能抱憾终生呀！怎么能去深究呢？口里本想有所陈述呀！可被人认为我在诽谤朝政，在这种恐惧的氛围中，谁还敢留下来呢？

梁鸿夫妻二人不为朝廷的高官厚禄所诱。当他们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心情之后，为了避免因不应皇帝之命而带来的麻烦，从齐鲁地区南下到了吴地（今江苏境内），像当时许多劳动者一样，成了依附于世家豪族的徒附。梁鸿一家住在当地大族皋伯通家宅的廊下小屋中，靠为人舂米过活。皋伯通开始倒未留意这个舂米人是何等人物。一天，他偶然看见梁鸿妻子孟光给梁鸿送饭，只见妻子恭恭敬敬地走到丈夫面前，低头不敢仰视，把装饭的盘子高举齐眉，请丈夫进食。皋伯通大吃一惊，心想：一个雇工能让他的妻子如此守礼，那此人一定是个隐逸的高人。他立即把梁鸿全家迁进他的家宅中居住，并供给他们衣食。

梁鸿已上了年纪，干体力活渐渐力不从心了，皋伯通热情款待他一家，又非常知趣，没盘根问底，梁鸿也就安心在皋家住下了。他晚年利用这段衣食不愁的宝贵时光，潜心著述，成书十余篇。他在写作过程中，为自己定下了两条原则：一是不是前代高士的著作不作评定注释；二是不涉及抒发自己志向的内容不写成文字。因此，他的十余篇作品，均是发前人所未发的独具匠心之作。

也就在他致力于写作的过程中，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由于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繁重的劳动，使他积劳成疾，卧病在床。临终前，梁鸿对皋伯通说：“我听说前代的高士都是不择生死之地，是随遇而安葬。我死之后，请您千万不要让我的孩子把我弄回故乡去安葬。我既然死在吴地，就把我埋在吴地吧！”

梁鸿死后，皋伯通等人将其安葬在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的要离冢旁，并说：“要离断臂刺庆忌，是一个壮烈之士；梁鸿终身不出仕，是一个清高之士。就让他们二人长相依傍吧！”

安葬完梁鸿，孟光带着孩子北上，回扶风老家，后不知所终。

严
光



不慕高官厚禄的严光

· 朱和平 ·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君主一向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士人一旦做官，就如同卖身为奴一般，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人格。“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个不愿做皇帝奴仆的人，便不能做官，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就只有守迹山水，做一个隐士。严光的一生，充分说明这一现象。

（一）短暂的太学生活

严光，字子陵，本姓庄，因避汉明帝刘庄的名讳，《后汉书》上便将他的姓改作“严”了。他是两汉之际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

严光少小时就聪明好学。十多岁时，就精通《诗》、《书》，在家乡一带颇有些名气，与别人论辩中，逻辑缜密而奇诡多怪，不同凡响。乡里以为他将来一定会出将入相，给家乡带来无限荣耀，因而都对他另眼相看。稍长之后，他希望能成为一个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于是他决定结识一些良师益友，来到当时人才荟萃的全国最高学府——京师长安的太学学习。

京师太学的太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在严光的太学同学中有个叫刘秀的人，来自南阳，豪强地主家庭出身。他见严光才思敏捷，谈吐不凡，于是他们志趣相投，成为挚友。年轻的严光经常与刘秀等人在一起凭兴致海阔天空地谈诗书，谈人生，谈社会，谈自己的理想。但此时，西汉王朝统治已十分腐朽，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已是日薄西山。外戚王莽趁机代汉而建立了“新”政权。王莽代汉，引起了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是篡汉，发誓不与王莽合作，对王莽给予的高官厚禄也坚辞不受。而此时的京都太学也像热油锅中注入了一碗凉水，沸沸扬扬地翻腾开了，有些太学生认为王莽是大逆不道，表现出了极端的不满。当西汉末绿林、赤眉军大起义爆发以后，其中有些人带着难以明说的动机加入了反对王莽的武装斗争，成为起义军中的关键人物。而严光静观这纷纭的世界，觉得自己是生不逢时，壮志难酬，京都长安已不是

久留之地，只得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揖别长安，踏上了东归的漫漫之路，可是该走向哪里呢？严光面对苍茫大地，如血残阳，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发出了长长的叹息。

（二）齐地“钓翁”

严光离开长安太学后，怀着沉重的心情，东出函谷关，取道洛阳，途经中原，兵燹之灾的痕迹，随处可见，大好河山已是满目疮痍，残破不堪，令人感伤不已。他本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但南归的路为混战的烽火所阻，归途已是危险丛生。再说当时自己辞别家乡时，带着乡亲们的殷切期望，现在这样落魄而归，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左思右想，最后他决定，倒不如先到人杰地灵的齐鲁之地，这里是文化中的藏龙卧虎之地，或许能寻访到良师益友。于是他来到了沂蒙山区。

沂蒙山绵延起伏，在山麓之南，严光发现了一条河流，这就是沂河。沂河之水清澈见底，美丽的鱼儿在水中悠忽游弋。鱼儿是多么地快乐呀。这使严光想起了人世间是多么污秽不堪，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什么功名利禄，什么理想抱负，算了吧，都是追腥逐臭，不如把自己的情怀，投入这山水之中，采山中之蕨，捕水中之鱼，这也是一种人生啊！于是摘下那已破败不堪的方巾，抛弃那功名的诱惑，就在青山之麓，河水之滨，搭起一间栖身的小棚。当太阳升起时，严光踏着朝露在河水边静静垂钓，红日西沉时，在暮鸡的噪聒声中回到小棚。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岁月，人间的纷繁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几乎不知有汉。

（三）傲视高官

山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在严光做“钓翁”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元 25 年，严光昔日的同学、挚友刘秀，在窃取农民起义胜利果实，扫平群雄后，君临天下，建立了东汉王朝。刘秀一旦黄袍加身，甚感惬意。可想起老祖宗西汉开国之君刘邦说过的：“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便感到有些美中不足。但考虑御座未暖，草寇股匪还未全部荡平，百废待兴，一时无法成行，他看着堂皇冠冕，似是孤芳自赏。忽然，他灵机一动，既然不能还乡，让亲朋故旧来洛阳叙叙旧，不也是一种满足吗？于是他首先想到了同窗严光。回想当年自己在太学因才学平平而藉藉无名，而严光却才高学富，颇有名气。好在现在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想到这里，光武帝立即派人到严光的家乡会稽余姚去，征召他来朝廷效力。

会稽太守接到旨令后，星夜骛趋，赶到严光的家乡，一打听，才知严光已多少年没有回家了。太守只好命人扩大搜寻的范围，将会稽境内的山山水水逐个搜了个遍，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但结果是“两头茫茫皆不见”。

会稽太守将查访严光的情况详细汇报给光武帝以后，光武帝猜想严光一定是躲起来了，不禁有些恼怒，心想：“朕上应天命，下顺民心，举义旗，兴义兵，诛灭逆贼，光复汉室，为尔等恢复太平人间。你严子陵既然自命不凡，理应闻风而动，兼程而归，辅佐朕治平天下。岂知你非但不来，还避而不见使者。恐怕你是在假作清高，抬高身价吧！好，看在往日同窗份上，朕就遂了你的

心愿，为你激扬名声，也好让你死心塌地为朕效命。”于是他闭上双眼，回想着太学时严光的相貌特征，然后口述出来，让画工描绘出“严光肖像”，在全国各地张贴。

皇帝诏令一下，严光确实是扬名天下了，各地官员派人四处打听严光的下落。不久，齐国（封国，在今山东泰山以北）官员报告说：“沂河边有一男子，独居于山谷中，身披羊皮，经常静坐在沂河边垂钓，长相有几分像画像上所描绘的，只是不敢肯定。”

光武帝一听，精神大振，认为此人八成是严光。于是马上派出使者，备上专门聘请贤人的车辆，带上表示尊贵的玄色丝帛，前往齐国，召聘那位垂钓的男子。

使者见了“钓翁”，奉上礼物，恭请上车，可“钓翁”却眼皮也不抬一下，更不通报姓名，只是说山野之人，志在江湖，拒绝应召。无奈光武帝决心已下，非要把严光找来不可，所以连派了三次使者去敦请那位男子。最后，那男子承认自己是严光后，使者前呼后拥，硬是将他请到车上，一起来到京城洛阳。

光武帝在皇宫中听到手下人报告：“钓翁”已被请来，就亲自出宫迎接，以示自己对“钓翁”的重视。当走到宫门外一看，果真是严光老同学，欣喜之情就不必说了，立即上去又是拉手，又是拥抱。可严光很了解光武帝的性格与为人，知道他外表柔顺，待人宽厚，其实内心狭隘，刻薄寡恩。便推说旅途劳累，亟需休息，不愿与光武帝谈话。光武帝只好把他先安置在皇家的馆舍中，一应生活用品及膳食全部由皇宫提供。

严光有位旧友叫侯霸，字君房，在朝中做官，位极人臣，是三公之一的大司徒。他看出光武帝对严光的期望很高，就极欲与严光恢复友谊，但又放不下大司徒的架子，不愿马上去见严光。于是，他先派部下侯子道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函去问侯严光。

严光住下来后，成天饮醇酒，睡懒觉，无所事事。侯子道进了房，严光正躺在床上。侯子道向他行了礼，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然后递上侯霸的信函。严光懒散地坐了起来，也不回礼，盘腿坐在床上，看侯霸的来信。读完之后，沉思片刻，信手把信一扔，问道：“我与君房兄相别很久了，他过去有痴病，现在位居三公高位，难道没有出差错吗？”侯子道哪里肯信严光的话，但又不敢顶撞这位皇帝请来的大隐士，只好小心翼翼地解释说：“敝上身为国家柱石之臣，怎么会有些痴呆呢？先生恐怕记错了吧！”

严光微微动了一下眉头，慢慢地说道：“他既然没有痴病，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侯子道心想，我一来就说明了来意，你也看过了侯大人的信，怎么眨眼间就忘了呢？他只好把侯霸派自己来向严光致意，并约定晚上来看他的意思又说了一遍。

严光“嘴嘴”一笑，说：“阁下倒是忠心耿耿，为上司护短，你说君房不痴不呆，那他说晚上要来看我，这不就是痴言呆语吗？当今天子要见我，征召三次，我才勉强应召；进了京城，我还不想和他多说话。你想想，天子我都不愿和他说话，还会见他这个臣子吗？”“这、这……”侯子道口中呐呐，说不出话来。

侯子道张口结舌，惊呆了半天，觉得就这样回去，不能向上司交待，左思右想，最后说：“请先生赐一大礼，让我回禀司徒大人。”严光说：“我疏懒已久，手不能握笔，无法作书回复你大人了。”侯子道不肯走，一再请求，严光说：“好吧，念你一片忠心，就让我口授，你记录，写一封回信吧。”于是，严光一字一顿地说：“君房足下：你官居三公之位，很好；心怀仁爱辅佐天下大义，天下人都会高兴。另外请把阿谀奉承的本领学精学绝，不要太痴。”侯子道一字一句地记着，写到这里，却迟迟听不见严光再开口，便请求严光再添几句。严光带着嘲笑的口吻说：“难道阁下是在市场

买菜吗？称好后还要再加一点？”侯子道听了，不觉有些尴尬，赶紧告辞而去。

侯霸听了侯子道叙说了见严光的经过，看了严光口授的回信，勃然大怒，觉得自己被严光羞辱了一通，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忽然想到，严光讽刺自己有些痴呆，是阿谀顺旨的小人，不等于攻击皇帝昏庸无能，忠奸莫辨吗？对，不妨如此，让皇帝来为自己出这口气。哪知光武帝听了他的奏报，只是说了一句：“严子陵狂态复萌了！”根本没有治严光罪的意思。侯霸见出气无望，只得黯然退下。

（四）士各有志

当侯霸退下后，光武帝立即命人备妥车驾，亲自去馆舍看望严光。车驾来到馆舍门前，侍者忙不迭地冲进严光房中，一看，严光还在床上拥被高卧。“先生，先生，快快请起，皇帝驾到，皇帝驾到！”侍者大声叫着，严光理也不理，照旧呼呼睡着。

光武帝进了严光的房间，侍从官正要去叫严光起来迎驾时，被光武帝制止了。他仔细瞧瞧严光，只见他呼吸平稳、悠长，好似真的在梦见周公。光武帝也有些糊涂了，不知严光是真的睡着了，还是在装睡？光武帝心想：自己以天子之尊，百般迁就，竟然打动不了严光的心！想到此，他禁不住走过去抚摸着严光的肚皮说：“啊呀！老同学，你能屈尊帮我治理天下多好呀！”严光翻了一下身子，算是作了回答。

光武帝怔怔地站在旁边，约摸过了半个时辰，严光缓缓地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昔日唐尧治理天下，仁德远扬，还有巢

父洗耳之事。士各有志，何必苦苦相逼呢？”光武帝摇摇头说：“子陵，朕徒然拥有四海，连自己过去的同学也说服不了呀！”说罢，垂着头，一路叹息地走了。严光根本不为其所动，不一会，又鼾声如雷。

过了数日，光武帝不再提严光入仕之事，只说请他去皇宫叙叙旧，严光这次倒未推辞就去了。两人坐定以后，回忆起当年在长安太学读书的往事，细数少年同学的变故，感叹世事的无常变幻。两人从容谈吐，气氛十分融洽。当光武帝和颜悦色地问道：“你看我比以前如何？”“当然胜似以前啦！”严光似乎是不假思索。谁知这一回答，正好搔到了光武帝的痒处，光武帝的虚荣心一下膨胀起来，以为严光已经心旌摇摇，为自己所动了。谈笑一直持续到晚上，光武帝便留严光在宫中过夜，并与自己同榻共寝。

睡到半夜，光武帝迷迷糊糊中感到似乎有个东西压在自己的肚子上，还有一股淡淡的泥土味。醒来后用手一摸，原来是严光一只高贵的脚压在自己的身上，而且准确到位，坚定不移，同时伴随着如管弦齐鸣的鼾声。光武帝何曾受到这等压迫之苦！他本能地想把这只压在自己身上的脚推开，但他又担心这是严光对自己的考验，看自己是否确实能礼贤下士，与士人同甘共苦。光武帝非常清楚，国家政权建立之初，多么需要一些满腹经纶、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啊！因而只得忍着肚皮上的酸楚，度过这难熬的一晚。

一个天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将脚压在别人的肚皮上；一个似苦似乐地承受着这份惠赐。这一压不要紧，第二天一大早，太史官前来报告，胡说什么“昨夜星象显示客星侵犯御座星，情况十分危急。”光武帝倒也暗自惊讶：“我与严子陵共卧一宿，难道便能上感于天吗？”

不久，光武帝面授严光为谏议大夫之职。严光既不推辞，也不对光武帝谢恩，似乎是接受了这一职务，光武帝对此满心欢喜。可没过几天，严光却对光武帝说：“你让我走，咱们还是昔日的朋友；你让我留在这里做什么谏议大夫，反倒会伤和气。”光武帝看严光说得坦城，纵使留下人也留不下心，只好让他走了。

光武帝最终没有使严光留在朝廷任职，只好派人将他送回故乡会稽。回到会稽以后，严光独自一人到了富春山。富春山旁边就是富春江，严光就在这里种地、钓鱼，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直到八十而终。

现在的浙江桐庐县尚有“严陵滩”，滩后的山，因严光居住过而名为“严山”，山下有块巨石，濒临富春江，上面平坦光滑，可坐十多人，人称“严子陵钓鱼台”。这块巨石，便是严光的无字碑！宋时范仲淹曾路过此地，驻足于此台，感慨吟哦道：“君为功名隐，我为功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

富春山水地因人传，严光不慕高官厚禄，甘于清贫的事迹能流芳百世，其中的奥妙恐怕就在于他压在光武帝肚皮上的那只脚迈向的是山野。

法
真



学穷典奥、幽居恬泊的法真

·朱和平 王玉志·

自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学校教育随着经学的学习传播而迅速发展。中间虽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禁止私人设坛招生，但终秦之世效果并不理想。秦朝解体，禁令松弛，民间讲学活动逐渐恢复。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各级学校一时昌盛发达。及乎东汉，正如史学大师班固所描述的那样：“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

门”^①，各地方的公私学校不计其数。著名的经学大师都有上百成千的学生，最多的如蔡玄^②竟有门徒一万六千人。他们聚徒传经，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传播知识、弘扬文化的浪潮，从而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法真就是这些众多传播文化者中的一员。

（一）以传播文化知识为己任的“关西大儒”

法真，字高卿，又称乔卿，东汉后期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东渭河北岸）人。和帝永元十一年（99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其先辈是战国齐国国君齐襄王法章，秦灭齐时，齐襄王的子孙不敢称田姓，改姓法。西汉宣帝时，法氏家族被迁徙到三辅后，其家族中一直有人担任着二千石的高官。法真的父亲法雄也由郡的功曹而爬上了青州（治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临淄镇北）刺史的高位。法雄虽不是走一般士大夫那种凭明经而仕的道路，但他深知自己的家族之所以长盛不衰，家门富贵，只是因为世代为官，恩荫后代的结果；如果一味地依赖这种特权，在当时以文取仕、经学成为“禄利之路”^③的形势下，恐难逃门户中衰的厄运，因此，他下决心要从儿子这一代开始，凭文才跻身宦海。故他十分重视对子女的学习和教育，当法真咿呀学语时，他就有意识地向他传授有关知识；稍长，又为之请来当地名师，讲授经典论传；自己则不时

① 《后汉书·班固传》。

② 蔡玄，东汉南顿（今河南项城县西南）人，字叔陵。学通五经。顺帝征拜议郎，迁侍中。任弘农太守。卒官。

③ 《汉书·儒林传·赞》。

地给法真灌输“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使法真产生读书就是做官的信念。

名师的教诲，父亲的训导、鞭策，使法真学识骤增，不到十岁，他对各种经书有了基本了解。十岁那年，望子成龙心切的法雄把儿子送到了京师洛阳，成为一名太学学生。

法真在太学的学习与众不同。当时的经学教育注重派别和师门，每位经学大师都有师承和宗门，他们讲授的知识均不超出本宗的主张，所招收的学生也必须继承老师的传授。法真对这种风气不以为然，甚至有些反感，他除了学习太学博士传授的本宗知识以外，更多地是博览各家派别的经解传释，兼容并包，并根据自己的见解，撷取慎思。几年的太学生活，使他精通儒家各类经典，遇事引经据典，娓娓道来，辨疑释难，无人可以匹敌。

在经学被捧上文化思想王座，成为僵化教条的情况下，它也就被作为一种材料，筑成了一条文化思想的狭路。在狭路的起点，写着知识分子由此入口；在狭路的终点，堆积着大堆的禄米。无疑，这条狭路中挤满了利禄之徒。他们口里念着圣经贤传，心里想着高官厚禄。这一情况在法真太学毕业时反映得淋漓尽致。当时，同窗们或留在京师担任朝官；或出仕州郡，任地方佐吏。法真的父亲凭借祖先的功勋和自己的权势，不费吹灰之力就替儿子在京师谋得了一个位虽不高，却属飞黄腾达的美差——尚书省侍郎。尚书省是汉武帝削弱丞相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东汉时尚书台“总领纲纪，无所不统”^①。皇帝一般让其宠信的近臣充当尚书省的大小职务。这些人出入禁中，与闻国政，极易晋升。当法雄喜滋滋地把喜信告诉儿子时，万万没料到儿子竟无动于衷，似

^① 《后汉书·仲长统传》。

乎不屑一顾。反而还对父亲说：“我们祖祖辈辈，世为高官、良吏，虽锐意忠君爱国，惠泽民众，偶有美名治绩。然民众教化不兴，终非长久之效。依我所思，当对百姓传授王道乐土，使他们为王化所染。惟其如此，方能国泰民安。故孩儿愿回故乡招纳弟子，传播知识。”法雄听了儿子的一席话，本想劝阻一番，但他深知儿子秉性刚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难以更改，况且他所说亦不无道理，一时也难以找到说服他的理由。因此，他虽预感到世代为官的家族可能就要在自己的儿子这一代画上一个句号，却没有勉强法真，让他回扶风老家了。

法真回到家乡以后，因为他学识渊博，鄙薄名利，品德高尚，深受当地百姓崇敬。特别是他治学不拘门宗，授业有方，使他声望骤增。经过七八年之后，名噪关中，号为“关西大儒”^①，前来求学、投师者，络绎不绝，门生由关中地区而迅速遍及全国各地。很多人把能成为法真的门徒当作殊荣，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

（二）拒作功曹，兴办私学

法真在扶风兴办私学，几年后，其门生就遍及天下，他们当中有贵族官僚子弟，也有一般的平民百姓；有希望通过拜他这样的名儒为师而求谋取一官半职者；还有早已在职为官，希以高迁者。扶风郡的官僚都前去听法真讲经授业，都以做法真弟子为荣。太守以为法真收纳府中佐吏，旨在让这些佐吏推荐为官，至少从中得到一些好处，可几年过去了，法真全无求官谋利的意思，始

^① 《后汉书·逸民·法真传》。

终以办学为务，和外界绝无交往。太守进而又猜测，该是法真清高，不肯主动说出有求于他的话呢？于是派人邀请他，说：“太守虽公务繁忙，但手不释卷，只是经常遇到疑难，幸希先生能够予以指教。”法真听说太守有请，一笑拒之，并请来者转告太守，自己绝无结交权贵之意。来者听罢，立即陈述道：“守君并无他意，只是久仰先生学识、高义，希望求得教益，与先生磋商先哲名儒所传经义。”法真用疑惑的目光注视了来人片刻，心想，既如此，就去看看吧。遂头系方巾，一副书生模样的装束跟随着到了太守府。

法真还未到府，早就有人通报太守，所以法真刚到，太守已经恭恭敬敬地迎候在门前。延入府中，寒暄几句之后，太守对法真说：“下官才疏学浅，对前代史事知之甚少。不过，我听说春秋时鲁国的国君鲁哀公，不是一个贤明的君主，但是孔子却在他面前自称臣下。现在，我德薄才疏，想委屈您担任本郡功曹一职，如此，上辅朝廷，下佐本郡，不知先生能否应允？”

法真原以为真是请自己来谈经论道的，没想到太守的真正用意是自己一向所鄙视的，所以，他听后，脸色阴沉，颇为不快，如同蒙受了奇耻大辱一般，只是自己多年饱读经书，前贤先哲名言牢记在心，再加上太守也非恶意，而且没有强人所难的意思，所以，他仅仅是有礼貌地摇了摇头。太守对他的举动感到愕然，张口结舌地望着法真，似乎在刻意从法真身上发现与众不同之处。这时，只听见法真说道：“我因为太守您相待有礼，来做您的座上客。如果让我当手下的官吏，那么，我将隐居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的地方了。”说完之后，拱手告辞，头也不回地走了。

太守站在门口，望着渐渐远去的法真，既后悔自己刚才的言语伤害了法真的自尊心，又对法真的志向倍增敬佩之情。他一直

认为史书中所记载的那些不为高官厚禄所诱的人，是史家杜撰出来的无稽之谈，至此真正意识到确有那种在名利面前毫不动心的人。自此以后，他更加敬重法真，再也没有产生违背法真心愿的想法和举动。

（三）四征不就，深自隐绝

法真拒绝担任郡功曹之职后，虽在政府选拔官吏所进行的察举^①、征辟^②中年年被举荐，但由于他每次都未应征，一直蛰居家乡招生授业，所以许多不知内情的人误认为地方长吏没有举荐，致使朝廷不能明察。于是以个人名义或者联名上书朝廷，称赞法真者大有人在。上奏文书虽接连不断，但由于当时中央政府内部外戚和宦官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故并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所有奏章如同石沉大海。

终有一天情况发生了转机。负责向皇帝报送文书的宦官，阴差阳错地把法真同郡的田弱写的奏章当成祥瑞材料送到了顺帝案头。顺帝从众多奏章中拿出这封文书，只见上面写道：“扶风处士^③法真，精研《诗》、《书》、《礼》、《乐》，学穷典奥，幽居乡间，淡于名利，对荣华富贵满不在乎，对隐逸生活十分向往，似乎要像老子那样，不为高官所动。我希望朝廷任命他三公一类职务，如

① 察举，秦汉官吏选任的主要形式之一，包括诏举和岁举两种。它是自下而上考察和推选人才，经考核合格，即授给官职。

② 征辟，也是汉代选任官吏的重要形式，包括中央征聘和部门自辟两种方式。

③ 处士，古时称所谓有德有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后来泛指没有做过官的读书人。

此，普天之下，四境之内，一定会因朝廷珍惜人才而唱出《诗经》中《清庙》^①那样的颂歌，而且也会使天下的贤德隽秀之才尽为朝廷所用。”尽管在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宦官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但是纸张的使用还不普及，田弱的这篇上书仍旧是写在简牍上。顺帝在读简文时，爱不释手，不停地用笔敲打着竹简，以示赞许，一连反复看了几遍。这时，顺帝正准备到关中去巡视，所以特地提醒侍从官吏届时招延法真。

顺帝出巡的车队浩浩荡荡，从洛阳抵达长安时，田弱又立刻晋见皇上，恳陈旧意，请求顺帝重任法真。顺帝立即传旨召法真到长安行宫。负责传旨的使者见到法真以后，先是向他祝贺，接着又说：“当今圣上敬重士人，此次征召一定会委任要职美差。”进而央求法真发迹后，不要忘了提拔自己。使者的举动，如同演戏一般，奴才嘴脸暴露无遗。法真对此十分厌恶，对官场的尔虞我诈更加痛恨。他既没有感激之意、高兴之情，也没有应允的意思，更没有前往拜见皇上的迹象。使者只好无可奈何地回报顺帝。

顺帝听了使者的叙述，更加坚定了要面见这个逸民的决心。随即又派出一位使者，再次陈述自己的意思。顺帝在长安行宫焦急地等待，心中早已作好了准备，不仅要让世人知道自己礼贤下士，而且一定要网罗到有真才实学的士人。过了几天，使者却是孤身一人返回。

前后两次派出的使者无功而回，使顺帝产生了是否是由于礼节不周、形式简单的缘故呢？故当他第三次派出使者时，像古时诸侯国延聘谋士那样，携带了大量金帛，作为聘礼，同时，又备

① 《清庙》，《诗·周颂》中的篇目，《诗序》谓为祀文王之歌，郑玄注以清庙为祀文王之宫。

上安车，以示尊贵。尽管如此，顺帝的心愿还是没能实现，法真不仅拒收金帛，而且还要使者回去禀报顺帝，请他将金帛赏赐给出征西羌的将士。

法真三次拒绝皇帝的征召，顺帝以他少有的豁达胸怀容忍了，表现出了不寻常的耐心。他决定再一次派遣使者，用舒适的蒲轮车将法真请到长安官中来。为了打消法真以为入宫便要为官的顾虑，他嘱咐使者说：“见了法真，向他说明请他到长安官中，只是想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道理，并不会拿国家大事麻烦他。”使者见了法真，尽管一再表明了皇帝的用意，但法真还是没有答应。

顺帝四次派人延请法真，法真四次拒绝，有人见此，便对他说：“皇上的旨意是不能违背，一旦龙颜发怒，后果不可想象！”言下之意就是提醒法真，如果违背皇帝的旨意，不免招来不测之祸。法真感叹地说：“看来我既然不能隐藏自己，逃避现实，难道还能天天接受那些我不愿听的教诲吗？”于是悄然离家，隐居于他乡。

法真离家出走以后，他的门徒都不知其去向，因思念他的言行风范，许久都没有人愿意离去。有一个叫郭正的人，是法真的好友，对这些不愿离去的弟子们说：“法真的大名是可以听得到的，可是他的身影是难得见到了。他想要隐匿自己的名声，可他的名声时时跟随着我们，他对于名声毫无兴趣，可是他的名声不断增大，这种人可以说是百代少有的宗师呀！”众生听了他的一番感慨之言，纷纷议论开了。最后大家一致提议，在法真的居住地刻石立碑，记述他的品行善德。在所刻的赞文中，特地称他为“玄德先生”。意思是说他不仅有潜蓄不著于外的品德，而且还有自然无为的素质。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①的圣贤。

① 《老子·道德经》。

从顺帝之世法真隐姓埋名，离家隐居，到中平五年（188年），近四十年间，法真过着一种十分奇特的生活：他虽然与凡人共居，然而却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他的历史，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上懂天文，下识地理，学识渊博；只见他每天早出晚归，辛苦劳作，不是自己的劳动果实不收，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周围的人向他询问有关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而当问到他的名字时，他却总是一笑置之，用别的话题来回避。对此，周围的人都感到很奇怪。一直到中平五年，当这位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临终时，他才透露了自己的过去和真实姓名。

法真从顺帝时起，就毁裂冠带，避居他乡，逃脱黑暗的封建政治的骚扰，就像逃出地狱一般，反映了东汉王朝自外戚、宦官走进朝堂以后，儒学信仰危机加剧，士大夫们为了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在无可奈何的现实政治面前，开始大批地退回田里。

庞德公



苦居田亩而不食官禄的庞德公

——·朱和平·——

从汉末外戚、宦官专权到军阀混战的演变，再到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过程，如同争雄称霸的春秋、战国之世一样，反映了一个普遍现象：“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人才在整个政治、军事斗争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宦官集团也好，外戚集团也罢；军阀割据者也好，维护中央集权者也罢，都在网罗人才，招延贤士。正是在这样的情

况下，汉末到三国的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人才辈出的局面。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有识之士的才德均得到了施展的机会，仍有不少人因痛恨统治者毒荼天下生灵的罪行，而羞与为伍，甘愿躬耕垄亩，穷困潦倒。庞德公就是其中的代表。

（一）躬耕岷山之南

庞德公，汉末襄阳（今属湖北）人。其出生年月不详。关于他的身世，由于史书漏略，我们难知其详。不过，从有关资料推测，他可能出身于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所以，虽家道中衰，但凭借先辈留下来的家资余业，通过自食其力，还能过上温饱生活。这在军阀长期混战，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居”^①，“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②，使人人为之寒心和目不忍睹的现实面前，尚属众里难寻的上等家庭。正因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所以庞德公自少小开始，有机会学习文化知识。

庞德公家居岷山（今湖北襄樊市附近）之南，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以便将来重振家业，庞德公的父母绝不让他染指家务，为他聘请了有名的老师，搜集到了各种书籍。庞德公也很懂得父母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辜负父母的一片厚望。他珍惜光阴，刻苦学习，广交文人学士，除了熟悉前代经典、诸子百家著作以外，还精研了《六韬》、《五略》等谋略兵书。不到二十岁，就学富五

① 《后汉书·仲长统传》。

② 王粲：《七哀诗》。

车，成为当地的饱学之士，跻身名士行列了。如果在太平盛世，像他这样学识渊博的人，仕宦为官定可有所作为。无奈生不逢时，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攻杀，使一批深受孔子进世归隐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仕途失去了兴趣，产生了隐居独善其身的心理。当时的襄阳太守处心积虑，扩充势力，在境内招贤纳士，许多人劝庞德公前去投奔，均被他嗤之以鼻。他认为与其为某个人为虎作伥，倒不如在家孝顺父母，关照妻子儿女。这样，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开始了农耕生活。

白天，与几千年来就形成的日出而作的农夫一样，庞德公也荷锄于田间，掘地、松土、除草、施肥，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只有夜晚和农闲时，他才与普通劳动者不同，这时，他或在青油灯下诵读、著述；或与学友们谈经论道、针砭时弊；或独自在林涧间吟咏赋诗，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感慨。

不久，他与当地一位农家女子结成夫妻。婚后，男耕女织，相敬如宾。每当耕作劳累，妻子送来茶水、点心，让他休息之时，他总是在田垄上正襟危坐，不失学者风度。农夫们见了，作为佳话竞相传播。

（二）不为刘表所动

斗转星移，正当庞德公躬耕于岷山之南时，刘表在荆州的地位一步步得以加强。他为了实现割据荆州的目的，一方面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稳定民心；另一方面网罗人才，扩充自己的势力。当他听到庞德公的有关传闻以后，觉得庞德公是个难得的人才，便派人前往延请。刘表派去的使者到达岷山之南以后，颇费周折才

找到庞德公家里。使者一见庞德公，别提有多高兴了，还没喘过气来就对庞德公说明了来意。说完之后，他便以期待的目光望着庞家的人，因自己给庞德公带来了喜讯，一定会厚待和感谢自己。哪知庞德公对他说：“先生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你却说这么多我不愿听的话，先生莫非患有什么疾病？”使者一听，十分恼怒，二话没说，扭头就走了。见到刘表以后，他把满肚子不满和怨气变作攻击庞德公的言辞，除了一字不漏地转述庞德公的话以外，还说他如何傲慢，如何不通人情，甚至表示怀疑他神经有毛病。正当使者还在发泄怨恨、竭尽诽谤时，刘表制止了他。刘表心想，此人看来确实有点不同凡人，遂决意亲自前往察看。

深秋时节，田野上金黄一片，农夫们正忙着收获。这时刘表独自一人离开了荆州治所，骑马来到岷山之南，打听到庞德公正在田间收割稻谷时，径直走了过去。见面之后，刘表既不通报姓名，也不说明来意，而是开口就问：“先生认为是保全个人，还是保全天下好呢？”庞德公并不知道发问的人是刘表，但从其形貌和穿戴来看，显然不是一般的村夫俗民。于是，带着严肃的神情说道：“我听说大雁在高大的树木上筑巢，以便夜晚休息，乌龟和鳖鱼在深泉之下寻找地方，用它作为晚上的栖宿之地。寻找住处，趋利避害，也可以看作是人的巢穴。只要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也就谈不上什么保全天下的事了。”刘表听罢，本想反驳几句，无奈找不到攻击的地方，点了点头，算是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刘表心里明白，自己如果此时说明来意，不仅不能请到庞德公，而且还有可能弄个自讨没趣，便翻身上马，离开了岷山。

刘表回去以后，在处理政务之余，常常回想起庞德公回答自己提问的话，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像他那样能言善辩之士，一定要说服他出来辅佐自己，刘表不止一次地思考这个问题。不是先

哲说过“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自己应当以诚心诚意来感动庞德公。他想到这里，当即决定再赴岷山。轻车熟路，很快就见到了庞德公。当时庞德公正在田垌上正襟危坐，其妻子则在地里清除杂草。刘表见此情此景，把早已想好的言语都忘了，上前问庞德公：“先生这样苦居田亩之间而不肯为官接受俸禄，准备日后拿什么留给子孙？”问完之后，带着得意的神情等待庞德公回答，心想这一下准会使他无言以对。庞德公用手轻轻地拂了一下衣袖上的尘土后，点了点头，徐徐地说：“一般人都留给子孙以危难，现在只有我留给子孙的是安稳。虽然所留下的不同，但不能说我没有留下什么。”刘表听了，不明其意，反问道：“此话怎讲？”庞德公不动声色、不慌不忙地解释说：“我听说过去尧舜把四海之内的大事都交给他的臣下，没有什么钟爱吝嗇之处；留给他们儿子的仅仅是农夫所作的农活，没有什么怜惜的神色，丹朱^①、商均^②虽都是特别愚鲁之人，然却能得以尽其天年，大禹、商汤王因为以四海为贵，把国家当成私产传给亲属，落得个夏桀被徙南巢（今安徽巢县东北），商纣王被杀，头悬周朝旗帜，并且家族同受祸害的结果，这难道是他们比丹朱、商均更愚蠢的原故吗？这实际上是形势危急罢了。周公旦摄政天下而杀死自己的亲兄弟。假若周公兄弟栖居山林，以藜藿为食，居住在茅草之中，难道会有互相对杀的后果吗？”刘表听完之后，后悔刚才又贸然发问，没有表示出自己礼贤下士的真情实感。禁不住长吁短叹，怏怏而去。

① 丹朱，帝尧之子。相传尧因丹朱不肖，禅位于舜。

② 商均，舜子。相传舜以商均不肖，乃使伯禹继位。

(三) “荆州学派”的领袖

在汉末，军阀割据称雄，相互混战，黄河流域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停滞，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战火荼毒的情况下，荆州地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所谓“于时天下虽乱，荆州安全”^①，“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②，“年谷独登，兵人差全”^③，从而吸引了大批饱受战祸苦难的人民前来避乱，史书上说：“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④，一时在荆州形成了与北方郑学相抗衡的以名实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流派。庞德公由于善于识鉴和品评人物，成为这一学派的领袖人物。他虽然躬耕于岷山之南，没有公开聚徒讲学，但三国时期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曾受业其门下，得到他的褒扬和奖训。诸葛亮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隐居在襄阳隆中的诸葛亮，心怀天下，在“躬耕陇亩”之余，用心研究各种学派的观点和主张。当他得知庞德公的情况以后，经常去请教他。庞德公倾心相待，向他传授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之学，并讲习兵书。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奇特，一方面，每当诸葛亮提出拜庞德公为师时，他总是满口拒绝，但对于诸葛亮所提问题，则是有问必答，甚至还将一些诸葛亮不曾提到的问题毫无保留地讲述出来；另一方面，每当诸葛亮到庞德公家时，总要在座前向他行跪拜重礼，虽屡遭阻拦，却始终如一。庞

① 《三国志·刘表传》注引《晋诸公赞》。

② 《三国志·刘表传》注引《搜神记》。

③ 《后汉书·赵岐传》。

④ 《后汉书·刘表传》。

德公认为诸葛亮将来必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于是送给他一个“卧龙”雅号。诸葛亮经庞德公的品题以后，“卧龙”的名字就流传开了，他由此获得了很大的名声，也由此引出了“三顾茅庐”这幕千古绝唱的荐贤、纳贤史剧。应该说，像诸葛亮这样蛰伏在乡村僻野的“卧龙”，如果没有庞德公的认同和标榜，恐怕后来演出腾入云霄，呼风唤雨，驾驭天时历史画面的主角，其面孔尚难逆料。

庞德公不仅毫无保留地将知识传授给前来求教者，而且其敏锐过人的洞察力也不止是拔诸葛亮于隐废之藪。他与别人相见，只需一面之交，就能从其言行、举止中评判出才德的高下。且所言颇中肯綮，深为世人认同。如名垂青史的庞统、司马徽早年都被他给以美名，庞统被称为“凤雏”、司马徽被称为“水镜”^①。他们二人均藉此而名显一时。

荆州平安无事的局面，随着曹魏统一北方战争的结束而不复存在。当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挥戈跃马，饮马江汉，驱刘备，降刘琮以后，荆州就成为战事频繁，曹操、孙权、刘备三方争夺的核心地区之一。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原来隐居在这里的士人，或投身于某一集团，或背井离乡，逃亡他处。像庞德公这样的名士，自然是三方都想争夺的对象。曹操、刘备都不止一次地派人来延请。尽管每次他都设法推辞了，但已是居无宁日了。有一天，曹操派来的使者对他说：“曹公是众望所归，天下士人都云集在他的周围，不知先生到底有何打算？”使者的话虽然不是直截了当，却明显地带有威胁的口吻，带有浓烈的火药味。庞德公寻思，如果明确拒绝，可能难逃其魔掌，倒不如假装答应，借故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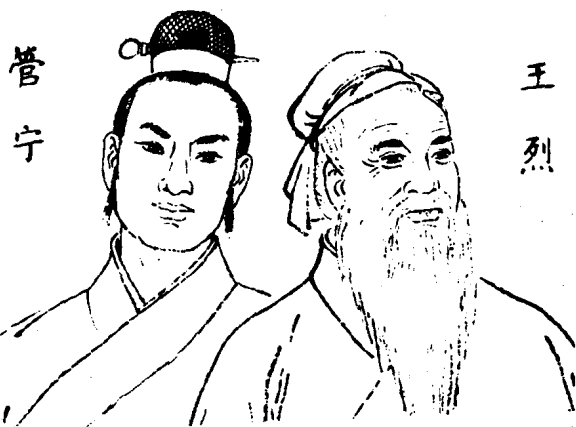
① 水镜，以水和镜的清明比喻人的明鉴或性格爽朗。

身。于是，他对使者说：“我多年服用岷山之药，请让我在临走之前采集一些药物吧！”使者见他总算答应成为曹操的僚佐，高兴之情不觉溢于言表，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相约三天以后前来迎接。使者一走，庞德公便收拾行装，率领妻子儿女，逃入鹿门山（今湖北襄樊市东南）中。后来人们再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也不再听到他的消息了。

庞德公所隐居的鹿门山，不仅成为历代隐士向往的隐逸之处，而且他的事迹，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唐代杰出诗人孟浩然，在游览该山之后，吊古伤怀，留下“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①的诗篇以后，竟步其后尘而隐居此山。南宋诗人陆游在山河破碎、报国无门之时，吟出了“身似庞公不入城，东阡南陌残余生”^②的不朽诗句，代表了人们对这位不与封建统治者为伍的隐逸之士的无尽思念。

① 孟浩然：《题鹿门山》。

② 陆游：《乍晴风日已和泛舟》。



避乱世隐居辽东 ——管宁与王烈

· 史建群 ·

自古乱世出英雄，然而乱世亦多隐士。汉末三国时期，军阀混战，分裂割据，“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无数英雄豪杰、野心家、小丑在动荡不安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悲剧或滑稽可笑的喜剧，因而史册留名。但是，也有

一些士人，隐居不仕，却以其全行守志的情操和卓然独立的人格而流芳百世，同样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管宁和王烈就是这样的隐士。

（一）屡拒征辟，一生清高恬静的管宁

管宁，字幼安，是东汉北海国（治今山东昌乐县西）朱虚县（今山东临朐县东南）人。年少之时，他就以道德高尚、操行卓异闻名乡里。管宁幼年丧母，全靠父亲把他拉扯成人。不幸的是，在他十六岁的时候，父亲也死了。亲戚们可怜他家贫如洗，于是纷纷出资赠送，帮助他备办丧事。然而，管宁全都辞而不受，量力送终。因为他认为办丧事关键在于对死者的哀思，而不在于外表的排场。他的这一作法，矫正了汉代的厚葬之风，世人无不称赞。

管宁自幼好学。父亲亡故之后，他外出游学，结交志同道合之人，与华歆、邴原、王烈等人友善，过从甚密，名声鹊起。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天下大乱。管宁看到中原地区战火熊熊，唯有公孙度独霸辽东，与中原割据势力很少发生冲突，社会局面较为稳定。于是，他决定和邴原、王烈等人一起前往辽东避难。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在乱兵丛中绕来绕去，最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公孙度也是不甘示弱的野心家。他虽然无力南下，逐鹿中原，但至少要保住辽东这块地盘。因而，他招揽人才，协助自己治国理民，巩固统治，并千方百计在各派势力的斗争中保存实力，维持辽东独立王国的地位。如今，管宁等几位名士同时来到辽东，公孙度自然大喜过望。他派人洒扫馆邸，热情地迎接管宁诸人。稍

事安定，公孙度就亲自会见管宁，虚心请教治国安邦、扩展实力的计划、方略。出乎意料的是，管宁只讲儒家经典大义，闭口不语世事。公孙度见管宁不为自己出谋划策，误以为管宁是以此为筹码，要求官职，遂准备授管宁以高位，被断然拒绝。非但如此，管宁还谢绝了公孙度的挽留，不住公孙度为他准备好的华丽住宅，而决定到人迹罕至的深山定居度日。当时，来到辽东避难的士民百姓多居住在辽东郡的南部，以随时关注中原局势，准备在中原安定之后，返回故乡。独管宁定居于辽东北部深山，以表明终老于此地，不复还家之志。他在入山之初，居住在临时依山搭建的草庐之中。然后，马上着手凿岩为洞，作为自己的永久居室。

管宁道德高尚，名闻遐迩。他在深山定居不久，许多仰慕他的人都追随他而到山中垦辟田地谋生。不久，在管宁定居的地方，居然鸡鸣狗叫，人烟稠密，自成邑聚。

管宁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儒生。他以为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按照儒学礼制规范人们的言行。因而，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众多的避难者之后，他就向人们宣讲《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的深奥内涵，并且陈设俎豆，饰威仪，讲礼让。他自己则身体力行，以高尚的道德感化民众。在他们居住的深山中，地下水位很低，凿井不易。仅有的一口水井又很深，汲水困难。因此，每当打水人多的时候，总是男女错杂，有违儒家礼制。有时，还发生因争先恐后而吵闹以至械斗之事。管宁看在眼里，忧在心中。于是，他自己出钱买了许多水桶，命人悄悄地打满水，分置井旁，以待来打水的人。那些年轻气盛的粗莽壮汉，见到井边常有盛得满满的水桶排列整整齐齐，个个惊奇万分。他们终于打听到是管宁为避免邻里争斗而为之，不由得反躬自省而羞惭万分，遂各各自责，相约不复争斗。从此之后，邻里和睦，安居乐业。有一次，邻

居家的一头牛，践踏管宁的田地，啃吃田中的禾苗。管宁没有把牛打跑，怕这头无人管束的牛被山中野兽咬死。他命手下人把牛牵到荫凉之处，饮水喂食，照料得比牛的主人还要细心。牛主失牛之后，到处寻找牛的下落。当他看到自己的牛非但没有被殴打，而且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十分愧疚，千恩万谢地离去了。就这样，管宁以自己宽容礼让的节操感化了周围的民众。他的名声也传遍了辽东郡。原本因管宁不愿与自己合作而心怀不满，进而又对其来意疑虑重重的公孙度，也理解了管宁隐居求志的初衷，长舒了一口气，放下心来。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之战中，击败袁绍。不久，袁绍呕血而死。曹操又利用袁绍诸子的矛盾，消灭了袁氏的残余势力，中原局势渐趋安定。许多客居辽东的内地人士，纷纷返乡回家。管宁周围的士民百姓也一个个踏上还乡之路。本来热热闹闹的邑聚慢慢地冷清了。村中再也看不到喧闹的儿童，田边也见不到农人的身影。管宁面对空寂的群山，终日与鸟兽为伴，晏然自若，闭口不提南返之事。然而，封建社会的士人常常是身不由己的，名士更是如此。自从建安九年，公孙度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公孙康、公孙恭相继掌握辽东大权。但统一了北方的曹氏集团是不会容忍公孙氏长期割据辽东的。故而自公孙康在位之时，就不得不臣服于大权掌握在曹操手中的汉王朝。曹操死后，曹丕废汉自立，是为魏文帝。公孙恭上表称臣，曹丕遣使拜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黄初四年（223年），华歆向曹丕举荐管宁。魏文帝下诏令管宁入京。公孙恭不敢违抗诏命，催逼管宁进京面见皇帝。辽东是呆不下去了，管宁只好率全家人南下。公孙恭亲自送出城外，又赠送了许多衣服财物。自从管宁到辽东之后，公孙度、公孙康、公孙恭前后赠送财物甚多，他

都受而藏之。在即将登船启程之时，管宁命人把公孙氏从前赠送的资财连同这次公孙恭所赠全部奉还，一无所受。

船只在今山东半岛靠岸之后，管宁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他并没有继续西行进京，而是在家乡住了下来。他不愿去见皇帝，不愿当官。可即使如此，魏文帝还是下诏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命其立即入京赴任。管宁上书曹丕，自称无傅说、姜尚之才，不能匡佐帝王，克成大勋，且又疾病缠身，日薄西山，唯愿游戏山藪，以尽天年而已。魏文帝亲览奏章，虽然心中不悦，但为了显示自己对士人的宽宏大量，下诏嘉许其志，遂不再勉强管宁出仕。

魏明帝即位，太尉华歆上书表示要把自己的职位让给管宁。这位管宁的好友，并非不知道管宁的志向，但他认为朝廷如果遗漏贤才而不用，实是最大的失误，故而再次举荐管宁。司空陈群也上书皇帝，认为管宁“行为世表，学任人师，清俭足以激浊，贞正足以矫时”^①，宜加重任。于是明帝下诏任命管宁为光禄勋，同时命令青州刺史派人以礼发遣管宁，并为其配备车辆、从吏及应用物品，督促上道。然而管宁一如既往，坚辞不就。明帝诏问青州刺史程喜：“管宁究竟是追求守节的名声而不任官，还是老病荒忽呢？”程喜上言：“管宁年事虽高，但身体康健，扶杖能行，并非年老智昏。他也不是为了追求名声而故意违抗诏命。我认为他屡次辞官的原因是不愿为世间俗事扰乱安静的心灵，又不习惯官场的繁褥礼节。他是一个本性喜爱清静的人，辞官是其真心实意的行为”。魏明帝也就不再强迫他了。

正始二年（241年），齐王曹芳接受了太仆陶丘一等大臣的建议，再次下诏征聘管宁，地方官也为管宁准备好了舒适的车辆。然

① 《三国志·魏书·管宁传》注引《傅子》。

而就在这个时候，管宁去世了，终年八十四岁。

管宁一生清高恬静，冰洁渊清。他以自己的言行，向周围的人灌输儒学为人之道。自辽东返家之后，他常坐一木榻。那时还没有椅子，所谓“坐”就是双膝着地，臀部坐在脚掌上。如果是臀部着地，双腿伸开，则称之为“箕股”，意即两腿伸展如簸箕。“箕股”是不合礼节的傲慢、轻狂的行为。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管宁从未箕股，一直规规矩矩坐在木榻上，以至膝盖着榻的部位都磨穿了两个小洞。可见他是如何看重礼节了。管宁每与年轻人谈话，总要教以孝顺父母及兄弟友爱的道理。无论在辽东还是在家乡，只要邻里、姻亲、朋友、故旧有了困难，管宁总是及时伸手救助。哪怕自己家中存粮无几，也必定分出一份赈济别人。因而，管宁去世的消息传出，无论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没有不嗟叹悲伤者。一个人，以其德行节操赢得世人如此敬爱，也许就是他身为隐士而名标青史的原因吧！

（二）才学渊深，德行高洁的王烈

王烈，字彦方，平原郡（今山东平原县西南）人。他虽与邴原、管宁为友，名声却远远高出二人。当时，与他同一师门的荀爽、李膺、贾彪等人都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尤其是李膺在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毫不手软，声望极高，以至于能够与李膺谈一次话，就被士人誉为“登龙门”。然而，李膺、贾彪及荀爽都十分钦佩王烈才学渊深，德行高洁，与之相亲为友，因而王烈英名远扬。

王烈年轻的时候，外出求学。学成归家不久，他的父亲就与

世长辞。王烈按照儒家道德规范的要求，在父亲的坟墓旁搭个草棚，为父亲守墓三年。三年中，每当他想起父亲的养育之恩，总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王氏族人见他至孝出于真心，交口称赞。王烈不但是孝子，而且是乐于助人的善人。凡遇到自然灾害，饥馑荐臻，路有饿殍，他总是把自家全部存粮捐出，和邻里乡亲一起度过灾荒。

王烈一生不慕权势富贵，唯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乐，以教书育人为自己的职责。他自己出钱，营建学校，又挨门挨户地劝人送子弟上学。在教育弟子方面，他根据各人不同的脾气禀性，从不同的角度入手，灌输儒学提倡的为人处世之道，使之改恶从善。弟子们自己虽然没有感觉到什么变化，然而春雨润物细无声，实际上个个道德精进，大化隆行，皆成大器。他的弟子出入进退，容貌端庄，行止可观。即使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人们仅仅根据走路的态度神貌，就可以判定何人是王烈的弟子。王烈师徒的志行节操大大影响了家乡周围的民风，人们纷纷竞相为善。一些著名的故事，载诸史册，传为佳话。例如：曾经有一个偷了别人牛的人，被牛的主人捉住了。牛的主人见他悔改之意，决定不再追究他的罪责。但盗牛者又苦苦哀求说：“我是一时鬼迷心窍，做出了如此可耻的事情。如今我已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决心从此洗心革面，重新作人。既然您宽宏大量，赦免了我的罪过，希望您不要将此事告诉王烈。”牛主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这件事不知怎么还是传到了王烈的耳朵里。王烈马上命人将一匹布送给盗牛者，并勉励他努力行善远恶，修养道德。盗牛者见王烈没有因此事而看不起自己，十分感动。这时，有人问王烈：“这个人当了盗贼，不是个好人，而且他也怕你知道他干的坏事，你为何反而要送布给他呢？”王烈回答说：“春秋时代的秦穆公曾经有一匹骏马。有一天，

这匹马跑丢了。有一伙人捉住了这匹马，并把它杀死吃掉了。秦穆公知道这件事后，不仅没有治他们的罪，反而对他们说：‘我听说吃骏马肉而不饮酒，会伤害人的肝。’当即赏给这伙人许多酒。后来，当秦穆公在战斗中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伙人拼命死战，解救了秦穆公。如今这个盗牛人也像他们一样，有了悔过之意，又怕我知道他干的坏事，说明良心觉醒，知耻知恶。知耻就有了改过的勇气，知恶就表明善心已经萌生。所以我送他一匹布，以鼓励他弃恶从善。”

过了一段时间，王烈和其他的人都把这件事淡忘了，而在王烈的家乡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有一位老人挑担行路。担子重，路又远，老人气虚体衰，不堪重负，行路缓慢。这时，有一个行路人赶上来，接过老人的担子，替他挑了几十里路。一直把老人送到目的地附近，行路人才放下担子离去。老人问他姓名，他不肯说。

不久，这位老人又在行路时丢掉了一把剑。有一个人在路上捡到了这把剑，他本想仍放置路旁，等待失主来取。但一转念，又怕被别人捡走，剑的主人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剑了。他想把剑带走，办完自己的事再悬赏寻找剑的主人，可既怕剑主着急，又怕发生差错。想来想去，这个人决定暂时搁下自己的事情，就在原处等待失剑之人来找。直到暮色苍茫的时候，失剑的老人才找到这里，老人仔细一看，替自己看守失剑的人，正是不久前帮自己挑担又不肯留名的好心人。老人拉着他的衣襟，说道：“上次你替我挑担，不告诉我你的名字。事后，我想起来心中十分难过。如今你又拾金不昧，在路边看守我的剑。我还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仁人志士。请你把名字告诉我，我要把这些事告诉王烈。”那人见老人拉着自己不放，只好把名字告诉了他。老人找到王烈，把自己

的奇遇全都讲了一遍。王烈说：“世上有如此仁义之人，我竟然还没有见到。”他马上命人调查，才知道那人原来就是从前偷牛的人。王烈感慨万端，叹息道：“人之改恶从善，居然能够发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为了以此人为楷模，唤醒迷途恶人，王烈让家乡的人们在此人居住街巷的里门上题写褒奖的题词，以表彰其道德。

由于王烈德高望重，当时人们都把他当作真理与正义的化身。有的人因小事争讼不止，大都相约找王烈平判曲直。可是，绝大多数争讼者，走到半路就改变了主意，觉得自己为世俗小利而争吵，实在愧对王烈。也有的人，望见王烈住宅，顿生羞恶之心，遂互相推让而不再争吵。甚至连曾经发生争执的事，也不敢让王烈知道。

王烈的名声越来越大。各级地方官员纷纷举荐他出任做官，京城里的中央最高级的达官贵人也请他做自己属下的官员。王烈一概推辞不就。后来，董卓作乱，中原到处是战火烽烟。王烈就和管宁等人一起到辽东避难。他在辽东亲自下田耕作，布衣粗食，不改其乐。当时的社会风气很不好，许多人相互攻讦，飞短流长，因而不少在辽东避难的人，都受到仇敌的诬告和陷害。而王烈不但以其高尚的道德和谦逊宽厚的处世之道，得以全志保身，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衰颓谰谤的世风。

公孙度对王烈仰慕已久，多次请他出山做官，都被王烈拒绝了。后来，公孙度任命他为长史，并强迫他接受。可王烈实在不愿当官，于是他就故意去经商，以玷污自己的名声。自商鞅变法后，封建统治阶级一直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他们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而工商业是侵蚀小农经济的“末业”。秦汉政府都不准商人及其后裔做官，社会各阶层也都看不起商人。因而，王烈

经商自秽，公孙度也就不好再勉强他出仕了。公孙氏臣服曹氏集团后，曹操也曾任命他为丞相掾，多次征召他回中原。公孙氏反复申明王烈的本心而没有去打扰他。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王烈一病不起，客死辽东，享年七十八岁。

嵇
康



人间卧龙嵇康

——·张旭华·——

魏晋之际是世事翻覆、政局动荡的年代。由于司马懿父子图谋篡魏，大杀异己，一些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名士们厌倦官场，疲于争斗，纷纷从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漩涡中跳出来，成为隐居不仕的在野者。他们或消极遁世，不言政治；或托言老庄，贵己养生；或结伴交游，啸咏山林；或纵酒谈玄，放达不羁，从而向人们

展示出魏晋名士的不同处世哲学及其精神风貌。然而，在隐退在野的名士当中，也不乏对现实政治密切关注和对理想人生执著追求者。他们虽身处江湖而心忧天下，清高超俗而敢于直面人生，乃至愤世疾俗，不畏权势，遗世独立，傲视王侯，并最终为反抗名教礼法和司马氏的专制王权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历史上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被后人誉为人间卧龙的嵇康，就是这类隐者的代表人物。

（一）一代名士，皇室姻亲

嵇康原姓奚，字叔夜，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他的先世为避怨，举家迁徙到谯国铨县（今安徽宿县）。铨县有嵇山，奚氏世居居于山侧，后遂指山为姓，改为嵇姓。

嵇康祖上官宦无考，大概社会地位不高。到他父亲嵇昭时，才开始进入仕途，担任过曹魏督军粮治书侍御史之职。昭有二子，长子名喜，次子即康。嵇康出生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但他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在后来回忆自己幼年丧父的不幸遭际时说：“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哉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姐，不训不师”^①。可见嵇康很早就落为孤儿，失去父爱，他是在母亲和哥哥的抚育下长大成人的。

少年时代的嵇康，天资聪颖，颇有俊才。但由于严父早逝，无人管束，加上母兄骄惯，有慈无威，使他从小就养成了桀傲不驯、尚奇任侠的性格。他常常以清高脱俗自居，旷迈不群，傲然自纵，

^① 《幽愤诗》，《嵇康集》卷1。

在乡里不修声誉。又“学不师授，博览无不该通，”通过自学和博览群书，获得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到齐王芳正始初年（241年），嵇康已步入青年时代。受当时盛行的玄学思潮影响，他崇尚老庄，卑弃儒学，以致成为继何晏、王弼之后的又一位玄学思想家和胜流名士。

嵇康为什么一进入社会就服膺老庄、卑弃儒学呢？这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与思想界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两汉时期，统治阶级提倡名教之治，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作为维护封建秩序的思想工具。到东汉末年，经学已流于支离破碎，非常繁琐，加之黄巾大起义对儒家纲常名教的冲击，原来的统治思想已难以起到维系人心的作用，名教出现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曹魏统治者急需在儒家以外找寻一种理论，而一些上层知识分子也热衷于研究老庄道家之学，试图把玄远虚无之道与儒家纲常名教统一起来，以便更好地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于是玄学也应运而生。同时，在齐王芳正始年间，以曹爽为代表的曹氏集团和以司马懿为代表的司马氏集团互相倾轧，正酝酿着一场争权的政治风暴。政治局势的扑朔迷离，事态发展的不可捉摸，使特别敏感的知识阶层产生了忧患忧生的恐惧心理。为了明哲保身，他们只好采取逃避现实的态度，表面上漠不关心政治，终日里嗜酒谈玄，到老庄学说中去寻求精神寄托。所有这些，都对嵇康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他崇尚老庄，卑弃儒学的重要原因。

玄学兴起于曹魏正始年间，导源于何晏、王弼。史载“魏齐王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①，因此又有“正始玄风”、“正始之音”之称。随着正始玄风

① 《晋书·王衍传》。

的兴起，许多知识分子都潜心于对《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本号称“三玄”之书的研究，而其兴趣主要是追求超言绝像、幽深玄远的宇宙本体，所以人们就用《老子》“玄而又玄”的“玄”字来称谓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潮，故名“玄学”。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年青的嵇康也开始对老庄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又说自己自幼“不涉经学”，及长“又读老庄，重增其放”^①。他在《幽愤诗》中叙述自己青年时代学术思想的形成时说：“爰及弱冠，冯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古人以二十岁行冠礼，“爰及弱冠”即刚满二十岁。可见从青年时代起，嵇康就确立了“托好老庄”、“养素全真”的志向，并向往成为一个具有道家思想风骨的人物。

由于嵇康对玄学的悟性极高，而且风姿神韵，才气高逸，所以很快就成了为人仰慕的一代名士。

魏晋名士是道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和道德风范的具体体现，而美好的容貌，风度翩翩的举止则被认为是名士必备的条件之一。嵇康生的器宇轩昂，英姿俊发，时人形容他“伟容邑，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②。意思是说他虽有美好的姿容，但却尚自然而不任藻饰，因而更显的器度不凡，潇洒超俗，富有老庄气质。魏晋名士重视姿容美，然又强调姿容美要和精神美相结合，当时人看嵇康为形象美与精神美之统一。《世说新语·容止》载：“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

① 《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集》卷2。

② 《世说新说·容止》注引《康别传》。

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这是将嵇康的形貌和精神品质结合起来评论，即透过他的形象而抓住他的精神。说他身長七尺八寸，指他体健魁梧；风姿特秀，指容貌秀美；而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均是形容他精神人格高超。嵇康正是以其内在的精神力量和人格美，征服了广大士族，被誉为一流人物。

处世雍容大度，喜怒不形于色，也是魏晋名士所持有的一种风度。嵇康为人襟怀宽广，心胸坦荡，是个既充满感情而又不为感情所累的人。面对恶浊势力，他敢于起而抗争，表现出疾恶如仇，慷慨任气的一面；而和朋友相处，则是虚怀若谷，表现出涵养极深，度量雍容的雅量。《嵇康别传》说：“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又据他的朋友王戎回忆，嵇康宽简有大量，修养极好，能够容人。王戎与之相交二十年，从没有见过他红过脸和疾声说话，因而被誉为“方巾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也。”

嵇康才致极高。他善俊辩，美词令，通音律，均为同时人所称许。据说嵇康十五岁时著《游山九咏》，魏明帝读后异其文词，大加赞赏，对左右说：“斯人安在，吾欲擢之”^①。嵇康还擅长音乐，尤精琴技。《晋书·嵇康传》中曾记有他向古人幽灵学琴和弹奏《广陵散》琴曲的故事：一次，嵇康游于洛阳西，暮宿华阳亭，于灯下引琴而弹，雅声逸奏。夜半时分，忽有一客拜访，自称是古人，素好音律。他和嵇康共论音声之趣，又索琴弹奏名曲《广陵散》，音曲清和，声调绝伦，并传授给嵇康。后经嵇康弹奏，成为著名的古琴曲之一。这个故事虽不免荒诞，却反映出嵇康的琴技

① 《北堂书钞》引《嵇康集》。

曾经过高人指点，业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嵇康的才致风情，深受当时士族社会的推崇。《世说新语·贤媛》载，山涛与嵇康、阮籍是好朋友，其妻韩氏亦素仰嵇、阮高名，却从没见过面。一天，嵇、阮二人来访，韩氏让山涛准备酒肉，盛情款待，三人一直畅饮至深夜。韩氏于夜间越窗去窥看嵇、阮二人，竟至达旦忘返，山涛亦不为怪。后山涛问其妻：“二人如何？”韩氏径直答道：“君才情不及嵇、阮，正当以识度相友。”山涛深以为然。这个故事一方面说明嵇康与阮籍俱为才华之士，另一面也表现出韩氏深深爱慕才士，这也是魏晋士族女子喜爱风流才情的风度。

嵇康卓然超群的名士风貌，不仅受到士族社会的赞誉，而且也得到皇室贵族曹林父子的青睐。曹林是魏武帝曹操的儿子，魏文帝在位时封谯王，明帝时改封沛王，食邑多达四千七百户，是曹魏宗室和食封贵族。曹林死后，其子曹伟袭爵。由于嵇康家居谯国铨县，而曹林父子的封地也在谯沛，加之嵇康为当代名士，声誉甚高，所以曹林父子为结交名士，便将曹伟之女长乐亭主许配给嵇家。这样，出身门第不高的嵇康，遂得以联姻皇室，成了沛王曹林的孙女婿。嵇康与长乐亭主结婚后，曾以主婿的身份起家为官，先后担任过郎中、中散大夫之职，因此后人又称他为“嵇中散”。不过，嵇康在京城洛阳做官的时间不长，并且当他联姻皇室，步入仕途之际，一场酝酿已久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其结果不仅影响到曹魏政局的发展，而且也决定了嵇康弃官退隐及与曹魏王朝共沉浮的政治命运。

（二）曹马党争，天下多故

齐王芳正始年间（241—249年），曹魏政局剧烈动荡。以曹爽为代表的曹氏集团和以司马懿为代表的司马氏集团明争暗斗，党同伐异，正进行着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激烈斗争。

公元239年，魏明帝死，年幼的曹芳即位，司马懿与宗室大臣曹爽受遗诏共同辅政。司马懿出自家世二千石的世族大地主家庭，为人深沉狡诈，善自营护。曹操为司空时，曾辟召司马懿，他“不欲屈节曹氏”，便辞以风痹，不能起居，托病不至。曹操为丞相，再召司马懿，并命令征召的人，如果司马懿拒不应召，就将他抓起来。司马懿惧而应召，为文学掾，历官黄门侍郎、议郎、丞相主簿等职。曹丕代汉称帝后，司马懿历任侍中、右仆射、录尚书事等，地位逐渐显要。魏文帝曹丕临终时，司马懿和曹真、陈群同受顾命辅佐明帝曹叡。后司马懿升为太尉，权势越来越大。他曾经西拒诸葛亮于秦陇，东灭公孙渊于辽东，成为魏国有声望的大臣。司马懿有将略，但却是个大阴谋家。他诡计多端，残忍如狼，平时善于伪装，一旦暴露真实面目，便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曹爽是大将军曹真之子，少以宗室瑾重，为魏明帝所倚重。明帝临终，拜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司马懿共辅幼主。辅政之初，司马懿以曹爽为宗室肺腑之臣，凡事都要询问他的意见；而曹爽也以司马懿位高名重，不敢专行，两人并无矛盾。后来，曹爽在他的谋士何晏、邓扬、李胜、丁谧、毕轨等人的谋划下，觉得司马懿威权太重，就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并

以小皇帝的名义，转司马懿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实际上把他架空。曹爽又委其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掌官禁军。同时任何晏、邓扬为尚书，毕轨为司隶校尉，李胜为河南尹，政事不经过司马懿，以削弱其权，双方矛盾开始产生。

曹爽掌握军政大权后，培植党羽，排斥旧臣，变易朝典，专擅朝纲，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矛盾更趋激化。正始八年，司马懿诈疾疯瘫，称病不朝，但暗中却在布置力量，筹划政变，伺机消灭曹爽集团。他任命司马师为中护军，“总统诸将，主武官选举。”司马师则建立了一支私人敢死队，“阴养死士三千人，散在民间”，作为政变的突击力量。在政变准备就绪的情况下，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并没有掉以轻心，而是采用了“欲擒故纵”的策略，装出病入膏肓之状麻痹曹爽集团，使政变过程更具有戏剧性。正始九年（248年），李胜由河南尹出任荆州刺史，被曹爽派遣去看望司马懿，以辞行为名，刺探其动向。司马懿伪装病危，令两婢扶持，拿衣服则衣服由手中掉落，饮粥则粥由口边流出，沾满胸襟，一副气息奄奄、行将入土的样子。他又装做耳聋，将李胜说将出任荆州误听为并州，且说自己年老病笃，死在旦夕，以后恐不能再见了。司马懿的成功表演，竟使得李胜信以为真，他向曹爽汇报时说：“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也。”曹爽听后果然受骗，失去防备。

正始十年正月，司马懿趁曹爽兄弟陪同皇帝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墓——高平陵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政变。他派长子司马师屯兵司马门，列阵阙下，他本人和太尉蒋济率军占领洛水浮桥，切断曹爽等退路。他还迫使太后郭氏下令免除曹爽兄弟的职务，以侯归第。当时大司农桓范冒死冲出洛阳，投奔曹爽，劝他奉天子都许昌，传檄天下以讨司马懿。但曹爽无能，犹

豫不决，竟交出事权，向司马懿归罪请死，被司马懿以“阴谋反逆”的罪名诛夷三族。曹爽的亲信何晏、邓扬、丁谧、毕轨、李胜等人也同日被诛，皆夷三族。曹爽向司马懿投降时还存有幻想，他以为将朝廷大权交出，以侯归第，司马懿便可免他一死，自己仍“不失为富家翁。”面对曹爽的昏聩无能，桓范曾痛哭说：“曹子丹（曹真字子丹）佳人，生汝兄弟，蔑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①就这样，曹爽集团在政变中土崩瓦解，军政大权全部落入司马氏集团手中。

高平陵政变，是曹魏统治阶级内部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也是曹魏灭亡，司马氏兴代的关键。曹爽虽是宗室重臣，但其能力识见和威望，都远在司马懿之下，所信用的何晏、邓扬、丁谧等，也大都是浮华之辈，以至变起仓卒，束手无策，终于惨败。曹操曾告诫儿子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②，不料竟被曹操言中。

高平陵政变发生时，不仅曹爽集团受到致命打击，何晏、邓扬、丁谧、李胜等人被杀，就是与曹爽集团并无密切关系的名士亦多被枉遭牵连，同日斩戮，惨死于司马氏的屠刀之下。史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③，就是对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面对正始末年的险恶政局，以及司马氏对异己势力的血腥屠杀，嵇康内心充满了悲伤和愤怒。但是由于他和曹魏宗室有着乡里和姻亲的两重关系，再加上他的妻子是沛王林的孙女，与何晏妻即沛王林之妹亦有着血缘关系，司马氏的屠刀随时都可能向他砍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肯违背自己的心愿与司马氏合作，

① 《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② 《晋书·宣帝纪》。

③ 《晋书·阮籍传》。

又担心公开反对司马氏会带来杀身灭族之祸，于是只有绝途仕路，弃官隐退，率领一家老小移居于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修武），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隐居生活。

（三）隐居山阳，优游竹林

齐王芳嘉平初年（249年），司马氏集团已控制了曹魏大权，但曹氏集团也在纠集党羽，伺机反扑，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在严峻的客观现实面前，嵇康拒绝做司马氏的官，隐退山阳，与当时名士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等共为竹林之游，后人称他们为“竹林名士”或“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大都是为当时政治形势所迫，不愿趋炎附势，对官场争斗采取回避态度。如嵇康早已抱定“养素全真”的宗旨，不愿与司马氏同流合污。阮籍曾于正始末年拒绝曹爽征召，“以避清路”，“毕愿家巷”，高平陵事件后又因天下多故，“由是不与世事”。山涛在正始年间出仕，后因目睹曹马党争激烈，惧怕祸患，很快便辞官而去，“隐身不交世务”。因此，竹林七贤的结合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产物。

竹林之游始于嘉平年间，《集圣贤群补录》（下）说七贤“在嘉平中并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这个说法是可信的。竹林位于山阳县东北二十里处，那里有清泉流水，茂林修竹，是个风景秀丽的好地方。在大自然静美的环境中，竹林名士们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他们或登高怀古，发思古之幽情；或游山玩水，抒淡泊之心志，尽情享受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的乐趣。

嵇康和“七贤”其他人物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和生活情趣，表

现出放纵、潇洒和遗落世事的倾向。嵇康“为性好酒，傲然自纵，与山涛、阮籍无日不兴”。他们又常集于竹林之下，置酒高会，肆意酣畅，以纵酒放达为风流。嵇康曾写《酒会诗》^①以记其事，诗云：“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百卉吐芳华，崇台邈高峙。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轻丸翫飞禽，纤纶出鱸鲙。坐中发美贲，异气同音轨。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诗中说到林木芳华，崇台流水，临川献酤，雅咏清谈，异气同音，寄心知己。生动再现了七贤优游竹林，纵酒谈玄的一时风会，同时也表明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虽不满司马氏的统治，但又无力反抗，只有“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垒块”，以酒作为解忧消愁、避乱离祸的工具。

竹林七贤的活动，在传世名画和出土文物资料中也有反映。1961年在南京西善桥发现的南朝大墓中的《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画中有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王戎、阮咸、刘伶、向秀和春秋时代人荣启期。这些人物都穿着宽畅的衣衫，衫领敞开，袒胸露臂，恍恍乎若神仙之化身。其中嵇康抚琴，阮咸弹阮，刘伶手捧酒杯似在饮酒，阮籍、山涛，王戎面前各放一空酒杯，向秀则颓然而坐，是一幅难得的七贤生活风情画。唐代大画家孙位的历史题材作品《高逸图》，也是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又叫《七贤图》。该画已残缺，只剩下四个人物：山涛赤裸上身，抱膝而坐，背倚隐囊（花垫），两眼向前凝视，表情深沉持重。王戎赤脚而坐，手执长柄如意，帽子放置一边，神色有几分快意。刘伶“以酒为名”，自然要双手捧酒杯，回头作欲吐状，旁边有一位侍者手端唾壶跪接。阮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所以他的嘴角流露出讥世

① 《嵇康集》卷1。

的微笑，手中拿着清淡家的爱物——麈尾扇。这幅作品尽管完成于唐代，却表现出了竹林七贤的性格特征及其精神风貌。

除游于林下，纵酒清淡之外，嵇康也经常参加各种生产劳动。自嵇康一家寓居山阳后，生活比较贫困，为了维持全家老小的生计，他在山阳开辟出一块规模不大的田园，平日里躬耕陇亩，浇水灌园，对农业劳动充满了热爱。嵇康还喜爱锻铁，《文士传》说：“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就锻者，康不受直。”可见嵇康不仅善锻，而且乐于助人，凡邻居们求他锻打铁器，从不索取钱值。因此，嵇康正是经过躬耕的实践，对劳动的艰苦性有了一定认识，对劳动人民也产生了一定的感情，这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中是很少有人做得到的。

隐居生活的乐趣，使嵇康暂时忘掉了心灵上的烦恼，可以超然于污浊的现实之外，坚持自己的情操和理想，因而他这时的心情是恬静和愉快的。他在《赠秀才入军诗》十四首中写道：“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这首诗是寄赠给他从军的哥哥嵇喜的，但诗中的生活趣味和人物风格完全是嵇康自己的。这不是嵇康不知道军旅生活不可能这样悠闲，而是他根本不愿意嵇喜为司马氏作事，所以写的仍然是隐士式的生活情调，表现出他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和热爱。然而，嵇康以隐逸傲世避俗，超然物外，虽属高朗而不降志之表现，但也包含有老庄明哲保身和高蹈出世的思想。他在《酒会诗》中称：“猗与庄老，栖迟永年，实惟龙化，荡志浩然，”就反映出这种逃避现实和消极遁世的情绪。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无法以个人的力量来反抗整个社会，这就使得他的反抗只能采用隐居不仕的

形式。所以嵇康等竹林名士虽然开启了隐逸清谈的风气，表面上超尘拔俗，陶然自得，而其内心深处却埋藏着说不尽的痛苦和隐忧。

竹林七贤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共同活动的时间也不太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司马氏对异己势力迫害的加重，竹林七贤便逐渐地分化瓦解了。嘉平三年，太尉王凌以淮南兵反，谋废齐王芳，立楚王彪为帝，以摆脱司马氏的控制，结果遭到司马懿镇压，这是继曹爽被杀后司马氏集团对曹氏集团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嘉平四年（252年），司马师继司马懿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并加紧了对在野名士的威胁与利诱。在司马氏势力日益强大的情况下，山涛表示不愿再做隐居的“吕望”，于投见司马师后很快得到升迁。王戎不久也投靠了司马氏，后来官至三公，成了司马氏集团的重要人物。此后，阮籍也在形势的逼迫下，不得已做了司马氏的官。这样，大约在嘉平五年（253年）左右，在山阳并居的竹林七贤的活动也就随之结束了。竹林七贤著忘言之契，优游酣畅于一时，其后七贤虽各有结局，并受到不同的贬贬，然而林下之游，其高情远趣，风流际会，总是令人追慕不已，成为千古佳话。

（四）拒绝利诱，避地河东

嘉平三年王凌、楚王彪事件后，司马氏一面拉拢在野名士以扩大声势，一面又用暴力手段清除曹氏势力，进一步加紧了篡权的步伐。嘉平六年，中书令李丰联合皇后父张缉，曹爽外弟（姑之子）夏侯玄共同反对司马氏，被司马师诛杀。接着，司马师废

齐王芳，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正元二年（255年），镇东将军毌丘俭等以淮南兵反；甘露二年（257年），征东将军诸葛诞又以淮南兵反，这些连续发生的军事反抗，都先后被司马氏镇压了。司马氏大诛异己，图谋篡魏，不仅是对封建礼教的肆意践踏，而且也使得政局更加动荡，天下百姓深受其害。在这种形势下，嵇康已无法再过安静的隐居生活，他指斥时政，交游太学，不畏权势，拒绝利诱，从而一改往日那种遗落世事的作法，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出愤世嫉俗与慷慨任性的一面。

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世语》记载：正元二年毌丘俭以淮南兵反，嵇康曾欲起兵响应，并向计于山涛，由于山涛反对，而且不久毌丘俭即兵败被杀，事遂未行。《晋书·嵇康传》载钟会谮词也说：“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但是否真有其事，很令人怀疑。嵇康一介书生，在军事上如何策应毌丘俭以反对司马氏，没有其他有力的佐证。另外，毌丘俭起兵之时，山涛早已投靠了司马氏，并且山涛与司马懿妻张氏（宣穆皇后）有中表亲，这些嵇康都是知道的。所以嵇康把起兵助毌丘俭这样事关身家性命的机密大事，去找山涛商量，也很难理解。前人已经指出过此事“近诬”^①，很可能是出自钟会的陷害。

不过嵇康对王凌、毌丘俭和诸葛诞先后以淮南兵反的所谓“淮南三叛”，在思想上是同情的。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管蔡论》^②，名义上是为管蔡翻案，实则是替毌丘俭辩诬的文章。他认为西周初年管叔、蔡叔之反，乃是疑虑周公篡权，是忠于王室的表现，因而在文中力辩二叔无罪。他说：“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

① 吕兆禧：《吕锡侯笔记》。

② 《嵇康集》卷6。

自然。……思光前载，以隆王业。……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斯乃愚诚愤发，所以微祸也。”嵇康盛称管蔡忠于王室，“欲除国患，翼存天子”，显然是影射司马氏行将篡魏，暗指毌丘俭等以淮南兵反的事，都是有所为而发。因为司马氏的高压政策，使嵇康不敢直接抨击司马氏的不忠不义，为毌丘俭等人鸣冤辩诬，而只能借古讽今，讥刺司马氏。张采《汉魏别解》曾说：“周公摄政，管蔡流言，司马执权，淮南三叛，其事正对。叔夜盛称管蔡，所以讥切司马氏也。”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嵇康的《管蔡论》敢于发表违反传统的卓见，具有力抗顽俗的勇气，但后来却成为嵇康被杀的罪状之一。

嵇康在太学的活动，也是他反对司马氏的一个重要方面。《晋书·赵至传》说：“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嵇康的儿子嵇绍在《赵至叙》中也说：“（赵至）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①赵至是一个士家的儿子（即“士息”），根据曹魏士家制度，士家子世代当兵，不能改从其他职业，更不能仕进为官，社会地位非常卑贱。赵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学立名，”所以小小年纪便离开父母，到洛阳求学，正好遇见嵇康在太学抄写石经古文。然而，嵇康在太学的活动是否只是埋头写石经古文呢？显然不是。据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下）考证，赵至十四岁在太学见到嵇康是在甘露三年，而在此前后，正是曹氏和司马氏两个政治集团激烈斗争的紧张阶段。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正元二年和甘露二年（257年），毌丘俭、诸葛诞等先后以淮南兵反，对司马氏

① 《世说新语·言语》注引。

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太学则是舆论斗争的中心，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十分敏感。甘露元年（256年），高贵乡公曹髦曾在太学言古代圣王优劣，羡慕夏少康，似乎不愿再当傀儡，企图来一次“中兴”。他又让太学博士庾峻讲解《尚书》，并说“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书》所载，皆博士所当通也”。^①由此引起了太学中关于管蔡问题的讨论。在这种背景下，嵇康在太学的活动显然不只是写写石经古文而已，而是具有更深刻的政治动因。事实上，嵇康在太学的活动内容远比写石经古文丰富得多。嵇康那篇替毌丘俭等辩诬的《管蔡论》，就是当时在太学辩论的产物；他那指斥“六经”，反对儒学的《难自然好学论》，也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另外，嵇康被害时有“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②也说明嵇康在太学中的活动是很活跃的，对广大太学生的影响是很深的。因此，嵇康在太学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无不与当时社会形势密切相关。他广泛结交太学生，大胆立论，抨击时政，从而向司马氏集团以及依附于司马氏集团的黑暗势力发动了一场舆论战。

嵇康的言论和活动引起了司马氏的忌恨，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嵇康的威逼和利诱，所谓钟会“造访”和司马昭辟康做官。

钟会出身名公子。正始以后投靠司马氏，备受擢拔，是司马氏的鹰犬。甘露二年（257年）诸葛诞以淮南兵反，钟会为司马昭出谋划策，深得恩宠。不久他又连连升迁，官至司隶校尉，赐爵关内侯，更加恃宠骄横，不可一世。钟会早就仰慕嵇康盛名，想与之结交，因此当他志满意得之时，便率领一群官吏前去拜访嵇

① 《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纪》注引《魏氏春秋》。

② 《世说新语·雅量》。

康。一天，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忽见钟会一伙贵人，“乘肥衣轻，宾从如云”，神气十足地驾临。嵇康对钟会的人品极为鄙视，他仿佛没有看见，继续打铁，不予理睬。钟会等了一会，见嵇康旁若无人，不发一言，感到很没趣，就准备起身离去。这时嵇康突然开口，冷冷地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如法炮制，随口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亲信，对嵇康的无礼，自然耿耿于怀。后来钟会劝司马昭杀嵇康，加在嵇康头上的罪名之一就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这正说明嵇康不畏权势，不受利诱，具有一种遗世独立和傲视王侯的气概。

钟会造访嵇康碰壁后，司马昭又企图以官爵利禄拉拢嵇康，辟康做官，也遭到拒绝。史载“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①。可见在司马氏一次又一次的威逼利诱下，嵇康已无法在山阳隐居。为了防止司马氏的迫害，他被迫远走他域，避地河东。

嵇康这次避地河东，心里充满了愤懑和忧伤。《嵇康集》附有他与郭遐周、郭遐叔兄弟的赠答诗，可以看出嵇康此时的心情。《郭遐周赠三首》首章云：“吾无佐世才，时俗不可量，归我北山阿，逍遥以倡佯，同气自相求，虎啸谷风凉。……我友不期卒，改计适他方，岩东咸发日，翻然将高翔，离别在旦夕，惆怅以增伤。”《郭遐叔赠四首》第二章也说：“交重情亲，欲面无算。如何忽尔，时适他馆。明发不寐，耿耿极旦。心之忧矣，增其愤怨。”从诗的内容看，二郭是嵇康的好友。他们对嵇康为“时俗”所迫，避地外出寄予很大的同情，并对司马氏表示了愤怨。嵇康在答诗中说：

^①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

“君子义是亲，恩好笃平生，寡志自生灾，屡使众衅成。豫子匿梁侧，聂政变其形，顾此怀怛惕，虑在苟自宁。今当寄他域，严驾不得停，本图终宴婉，今更不克并。二子赠嘉诗，馥如幽兰馨，恋土思所亲，不知气愤盈。”反映了嵇康在司马氏的高压下，既不愿向黑暗势力屈服，又不得不寄走他域以避祸的愤怒心情。

嵇康避地外出，史书中有避地河东和避地汲郡北山两种不同记载。据前人考证：“或云汲郡，或云河东者，盖叔夜避居在外，本无定所，然以居苏门山（即汲郡北山）为多也。”^①因此嵇康这次外出避世，很可能是先到河东，后来又落脚于汲郡北山。嵇康在河东的活动，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后来他在汲郡遇见隐者孙登，遂与之从游三年。孙登是汲郡共（今河南辉县市）人，魏晋间隐者高流，为嵇康所景慕。他“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便在郡北山中筑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隐逸不问世事。嵇康自遇孙登后，遂执弟子礼以事之，从游三年。而孙登却沉默自守，无所言说，甚至不交一言。临别之际，嵇康问道：“先生竟无言乎？”孙登徐徐答道：“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②孙登的这段话，完全是庄子处世哲学的复述，意思是说嵇康才智虽高，而保身之道不足，所以难免灾祸。从嵇康以后的实践来看，他并没有按照孙登所说的那套世故圆滑的处世哲学去行事，特别是在他返回山阳后，随着司马氏迫害的加剧，他的反抗精神愈加强烈，终于在生

① 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下册。

② 《世说新语·栖逸》注引《文士传》。

命的最后几年，写下了一生中最为慷慨悲壮的一页。

（五）龙性难驯，视死如归

嵇康避世外出，历时三年。就在嵇康返回山阳之时，曹魏政坛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景元元年（260年），魏帝曹髦不甘心做傀儡皇帝，对大臣王沉等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于是亲自率领宫中卫士数百人攻打司马昭相国府，结果被司马昭所杀。这样，从曹芳即位到曹髦被杀的二十年间，司马懿父子三人接力相继，经过多次较量，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日后司马炎上台称帝铺平了道路。

当司马氏篡魏禅代已成定局，政治形势越来越明朗的情况下，许多朝野人士纷纷投入司马氏的怀抱。嵇康回到山阳后，面临这种形势，也必须做出新的抉择。景元二年，司马昭打算任命山涛为吏部郎，以主持选举之事，而山涛认为嵇康更能胜任此职，便有意荐举嵇康自代。对山涛此举，嵇康非常愤怒，他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表示与当局不合作的立场，予以严词拒绝。嵇康在《绝交书》中列举了自己拒绝做官的原因有“七不堪”、“二不可”，归纳起来，其主要内容是：（1）“非汤武而薄周孔”，说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不合人伦之礼，朝廷之法，与“世教不相容。”（2）“不喜俗人”，不愿与礼法之士“嚣尘臭处”。（3）讨厌官场的酬酢应对，不会“揖拜上官”和“千变百伎”地阿谀奉迎。（4）自己脾气暴躁，“刚肠疾恶，遇事便发”，“无万石之慎，有好尽之累。”（5）恣意放纵性情，喜欢隐居养志。总而言之，我行我素，不向权贵低头，拒绝和司马氏及其党羽合作。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并不只是宣布和山涛绝交，实际上是对虚伪的礼法和所谓礼法之士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揭露了司马昭以禅让为幌子篡夺皇位的阴谋。因为正当司马氏准备在朝野人士的赞扬声中受魏禅让的时候，嵇康却出来大唱反调，公然宣称“非汤武而薄周孔”，这不能不引起司马昭的恼怒。鲁迅先生曾说：“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①

司马昭本来对嵇康还抱有某种希望，听到他“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闻而怒焉”^②。司马昭虽“闻而怒焉”，却没有马上杀害嵇康。这主要是从舆论上考虑，杀魏帝曹髦已使内外喧哗，再杀嵇康于己更为不利，所以隐忍未发，直到两年以后找个借口把他杀害了，这个借口就是吕安事件。

吕安是东平（今属山东）人，魏镇北将军吕昭次子，“志量开旷，有拔俗风气”，与嵇康是志趣相投的好友。竹林七贤傲游于林下时，吕安曾与之一道同风，是七贤之外的重要人物。嵇康曾和吕安一道灌园于山阳，他们还共同讨论过学术问题《明胆论》。史载吕安与嵇康友谊纯真，关系密切，他们每当想念对方时，便不远千里相会。一次，吕安前来山阳拜访，正值嵇康不在家，嵇康之兄嵇喜出门迎接。吕安拒不入户，在门上题写一个“鳳”字，然后扬长而去。嵇喜看了很高兴，却不知吕安所写“鳳”字乃是“凡”“鳥”两字的组合，意思是讥刺嵇喜是俗人，故不与相交。魏

①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90页。

②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

晋名士以不结交无名之辈闻名，他们在社交中往往表现出一种过分的偏执和傲慢，吕安不礼嵇喜就是一例。

吕安的哥哥吕巽，原来与嵇康的关系也很好，但他后来依附司马氏，道德沦丧，成为卑鄙无耻的小人。吕安之妻徐氏容貌姣美，温柔贤惠，吕巽对其垂涎已久，后来竟然趁弟弟外出之时，用酒将徐氏灌醉，丧尽天良地奸污了她。当这件丑事败露后，吕安曾向嵇康诉说自己内心的痛苦，并且要举发其兄这不啻于禽兽的行径，使其无颜立足于世。嵇康虽也鄙视吕巽的人格，但又念他与吕安有手足之情，就劝吕安为门户之计不要告发。吕安也听从了嵇康的劝告，把这件事压了下来。谁知吕巽做贼心虚，内不自安，竟来个恶人先告状，反诬吕安“挝母”、“不孝”，勾结官府将吕安定罪徙边。吕安上诉自理，引嵇康为证。嵇康“义不负心，明保其事”，并写信与吕巽绝交，“临书恨恨”地骂他“阴自阻疑”，“包藏祸心”。可是吕巽时为司马昭相府的掾属，他又与钟会相友，俱有宠于司马昭。于是二人遂串通一气，合谋陷害吕安、嵇康。

景元三年(262年)，官居司隶校尉的钟会将吕安收捕下狱。接着，他又趁嵇康诣狱为吕安辩护之时，当庭收录嵇康。钟会即数嵇康罪名说：“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①可见嵇康因吕安事牵连系狱，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不愿屈服王权，不与司马氏合作，所谓吕安事件只不过是借口而已。钟会对司马昭讲得很清楚，他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也。”他又劝司马昭乘机杀害嵇康说：“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

① 《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

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① 司马昭为铲除篡魏禅代的障碍，早欲除掉嵇康，只是没有合适的时机。吕安事件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因衅除之”的借口，于是以司马昭为代表的专制王权决计杀害嵇康。

嵇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收录下狱，曾引起社会上的强烈不满。当时太学生三千多人为之请命，“于时豪杰，皆随康入狱”，表明这是哄动京城的大事件。但嵇康的言行既为司马氏所不容，是非除掉不可的“卧龙”，因而他之死自亦不可避免了。人类最惧怕的事情莫过于死亡，面对死亡的威胁，色厉内荏的伪君子会暴露出其怯懦的本质，而真正的勇士则会表现出慷慨悲歌的英雄气概。嵇康在司马氏的屠刀面前，正是表现了这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据《世说新语·雅量》载，嵇康在临刑前从容不迫，神色怡然，他先是平静地欣赏了一下自己在阳光下的身影，然后向前来送别的兄弟亲族要了一把琴，弹起了平生最喜欢的名曲《广陵散》，弹完后说：“过去袁孝尼想跟我学这首曲子，我没有教他，看来今后《广陵散》要失传了。”说完行颈从容就义，时年四十岁。

嵇康被杀，是他所具有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意识与封建专制王权矛盾激化的结果。这一事件，固然是封建专制制度下一代名士的悲剧，但嵇康敢以生命对抗专制王权，使统治中国二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主义也为之黯然失色。嵇康虽然被司马氏杀了头，然而他的高尚气节和人格精神却赢得了后人的赞颂，被誉为人间卧龙。南朝刘宋初年，颜延之曾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其首章《咏嵇中散》云：“立俗违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

① 《晋书·嵇康传》。

时铄，龙性谁能驯。”^① 龙性难驯，正道出了嵇康愤世嫉俗和桀傲不驯的卧龙性格。

（六）师心自任，著论矫俗

嵇康长期寓居山阳，过着一种隐逸生活。但他并不是世人心目中放达超脱、不问世事的方外之士，他实践的也不是老庄道家学说所主张的清静无为，适意逍遥的处世哲学。嵇康具有一种超越个人和群体利害的理想主义精神，对整个社会抱有深厚的关怀。在山阳隐居期间，他始终顽强地从事着学术，文化的创造活动，以对社会批判的特殊形式参与政治。他潜心钻研，勤于著述，在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辩以及文学、音乐美学思想等方面都取得了超迈前人的贡献，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位思想家、文学家和音乐家，其主要学术思想著作有《卜疑集》、《太师箴》、《释私论》、《养生论》、《难自然好学论》和《声无哀乐论》等^②。

在政治思想方面，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建立一个“至德之世”。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极力调和儒道，他们把儒家的“名教”和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精巧地结合起来，提出“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所谓“名教”就是儒家宣扬的伦理纲常，所谓“自然”就是玄学所讲的“道”。因此，他们百般论证名教是以“无”为本，名教是“自然”的产物，这样就“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从而把封建礼教说成是天经地

① 《文选》卷21。

② 均见《嵇康集》。下引此书不另注。

义的，为门阀士族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嵇康在曹氏和司马氏两个政治集团斗争的漩涡中度过了大半生，他亲眼目睹司马氏在篡魏过程中，忽而用“无君之心”的罪名诛杀异己，忽而用“不孝”的罪名废弑曹氏皇帝，名教成了他们篡权的工具。嵇康在政治上反对司马氏，同时也反对他们提倡的虚伪的名教。他认为名教与自然是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名教并不出于自然。嵇康在《释私论》中明确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主张冲破名教的束缚，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他指出一个人行为正确与否，不在于其表面是否符合名教，而是看其内心是否违背了“道”，所谓“越名任心”。他还进一步指出名教和礼法都是束缚人性的东西，是与人的自然本性相对立的，只有“心不存于矜尚”，“情不系于所欲”，才能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基于这种思想，嵇康对当时社会上的虚伪和欺诈现象很不满，并在《太师箴》一文中加以抨击。他说：“季世凌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嵇康的这些话，显然是攻击司马氏，指斥他们口头上要推行“仁义”和“廉让”，而实际上却是在破坏名教和篡权自代。正是由于当权者践踏了名教的尊严，所以嵇康公然宣称要“越名教而任自然”，把“自然”作为检验人的行为的伦理标准，否定了把儒家名教作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准则。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儒家倡导的名教礼法，对于揭露和批判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恶浊现象是有积极意义的。

嵇康在谴责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同时，还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他在《难自然好学论》一文中说：“昔鸿荒之世，大朴未

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在《答难养生论》中，他认为一国的君主应该是“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如果君主能做到不“割天下以自私”，不骄奢残暴，不过重地剥削农民，家给人足，上下相忘，那么，一个和平安定的“至德之世”就会到来。嵇康憧憬的“大朴未亏”的理想社会带有复古主义的色彩，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但这种设想就其对现实社会批判的意义上讲，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嵇康社会政治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非薄汤武周孔，反对“六经”。嵇康激烈地反对名教，自然也连及儒家所推崇的圣人。他在《卜疑集》中说“轻贱唐虞，而笑大禹”，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宣告“非汤武而薄周孔”，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则公然反对“立六经以为准”，“以周孔为关键”，并宣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和儒家推崇的圣人相对抗。嵇康对“六经”的攻击也是不遗余力的。当时礼法之士要人学习“六经”，提出“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嵇康也强烈反对。他在《难自然好学论》中驳斥说：“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在他看来，应该“以明堂为丙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腐臭。”嵇康还进而批判了学习六经是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说法，指出六经和名教都是束缚人性的东西，主张按照自己的理性去认识世界，按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一句话，理性就是自己的老师，这就叫“师心自任”或“越名任心”。嵇康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礼”，“师心自任”，反对“立六经以为准”、“以周孔为关键”等等著名观点，是儒家定于一尊后第一个勇敢地对儒家的“圣人”、“经典”提出挑战的人，这些口号对于人们摆脱礼教的束缚，冲破儒家思想的禁锢，促进当时的思想个性解放方面，曾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后来受到明代主张个性解放的思想家李贽高度的推崇。

在哲学思想方面，嵇康继承了王充的唯物主义元气自然论。他在《明胆论》中说：“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自然发生的，不承认自然界之外有任何神秘力量的主宰。他还明确提出了形神相即的观点，指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即精神与形体之间有着互相依存的关系，形神互相依赖，不可分离。但是，嵇康没有明确肯定精神要以形体为基础，因而带有形神二元论的倾向，这是其形神观的主要缺陷。

嵇康还首次探讨了声音与人的主观情感的关系，主张声无哀乐，反映了他对哲学上心声关系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同时也反映了他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嵇康是个出色的音乐家，他能作曲，又精于弹琴，在音乐理论上，他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在《声无哀乐论》一文中认为，音乐本身有其自身的规律，和主观情感的哀乐无关，不能混为一谈。他说：“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感情而发，则无系于声音。”他还举例说，人们同在一处听琴，但反应各不相同，有人“忻然而乐”，有人“惨尔而泣”，以此表明音声与哀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嵇康从事物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前提出发，认为声音是物质自身的表现形式，要求把客观的声音和人的主观感情加以区别，这种见解，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并在我国音乐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又片面地强调心与声在概念上的区别，认为主观感情只是出自内心，否认声音对主观感情的影响，这就完全是唯心主义的美学理论了。

嵇康在文学上的造诣也颇深，散文和诗歌都有相当的成就。在诗歌方面，他的四言诗能够脱出《诗经》的藩篱，既有高洁的志趣和愤世嫉俗之情，也富于秀逸清远的风格。如《幽愤诗》是嵇

康因吕安事被捕入狱后所作，全诗长达 86 句，334 字，但写来情真意切，直抒胸臆，表达了他托好老庄不附流俗的志向和耿直的性格。他如《酒会诗》、《赠秀才入军诗》等诗，亦颇有特色。钟嵘《诗品》评他的诗“峻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嵇志清峻”，也可以说是文如其人了。嵇康的散文尤负盛名，历来认为是他代表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他对自己人格的最好写真。信中列举不能出仕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都环绕着自己傲世避俗的生活态度立论，写得既明白剀切，也富于生动形象。《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嵇康师心以遗论”。就是指他这种孤傲愤世，目空一切，敢于大胆立论的作风而言。

综上所述，嵇康是魏晋之际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音乐家。他在政治上反对礼法，大胆立论的勇气，以及他在认识论上强调理性，反对盲从，主张师心自任，不以圣人言论为立身行事的标准的思想，都对冲破儒家思想的禁锢，启迪人的思想，推进认识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他被司马氏视为“非圣无法”而加以杀害，在他死后的一千多年间，也不断受到封建卫道士的诟骂，把他看作“以放达为盛德，竞事浮虚”的名教罪人。^①但他也受到进步思想家的称赞，引为同调。明朝的李贽十分推重嵇康。鲁迅对嵇康的为人也很赞赏，他曾用去很多时间精心校订了嵇康的作品，并整编成《嵇康集》。因此，嵇康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贡献也是不容抹煞的。

① 钱大昕：《潜研堂集》卷 1。

鲁
褒



《钱神论》的作者 ——南阳名隐鲁褒

· 高 凯 ·

在我国几千年浩瀚的文化典籍中，有许许多多洋洋洒洒、千古流传的奇文。它们之所以是千古奇文，不仅在于它们都具有语言优美、凝炼的共同特点；而且在于它们以长短不一的文字为手段，或赞美天地、或贬驳丑恶、或弘扬正气、或耻笑奸

佞。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精华。西晋时期由南阳名隐鲁褒创作的《钱神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鲁褒是何许人也？他又是为了什么而创作《钱神论》这篇千古奇文的呢？

（一）一个好学多思的少年

夏天的南阳，闷热而潮湿。清晨还昂然向上的葱郁的树叶，一经太阳暴晒，便纷纷蔫了下去；老狗卧在树下，气喘嘘嘘地吐着长舌；平日勤快的水牛，把全身泡在水里，只露出两个鼻孔，一动也懒得动；隐在树林中、且高高在上的夏蝉也热得“知、知”地乱叫。这是西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年）六月的一天。就在这样闷热的日子里，南阳城中的鲁宅出生了一个遗腹子。他就是西晋后期写作《钱神论》一文的鲁褒。半年以前，本宅的主人，即鲁褒的父亲突然染疾身亡。他父亲临死前，双手紧紧握住妻子的手说：“孩子他娘，你已经身怀六甲了，但我不能再看着你生这个孩子；孩子生下来，如果是男的，就让他姓鲁名褒、字元道吧；如果是女孩，那你就随便起个名字。”说完这一席话，男主人挣扎着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小鲁褒的父亲之所以这样起名，意思很明白：褒，是衣襟宽大的意思，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长为一个心胸宽广、做一番伸张正气大业的人。

小鲁褒没有辜负他父亲的企望，从小就表现出与其他同龄儿童不同的特点：勤学好问，富于想象。在他刚会说话时，母亲教他识字，他过目不忘；教他吟诗，他一学即会。到五六岁时，他已经会写几百个字、会背几十篇古典文赋了。他总爱缠着母亲给自己讲故事、释名言，并善于举一反三地发现和提出问题。所以，大人们经常

被小鲁褒提出的稀奇古怪的问题所难住。例如：他经常向大人提出：天是如何造出来的？为什么有七彩的云朵？天上的雷、电、风、雨是谁把持的？此外，尚有：为什么人们买东西必须用钱去交换？钱的价值是多少？等等，这些大人始料不及、三言两语难以说清的问题，都成了小鲁褒经常询问的对象。母亲谆谆教导说：“孩子，学问是一天天积累的，娘的知识很有限，你要想了解这些问题，只有像先哲那样刻苦读书才行。孔夫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克服光学不思、光思不学这两个毛病，还得自己努力才行。”于是，小鲁褒每天都把自己藏在父亲生前的书房里读书、写字。学习之余，他便跑到庭院中，望着庭院树木花草，尽情地发挥着他的想象。庭院里有几棵上百年树龄的老榆树，他想象着为什么纤细、柔弱的小榆树，会变成臃肿丑怪的样子，竟好像画中画的古木一般；面对满院高高下下生长着的杂草和草中缠纠着的牵牛花、茛苢花，望着繁星似的金钱菊、丹砂似的鸡冠花，他心中想着：为什么老天爷造物如此神奇迷人，以致每一朵花的形状、结构、色彩无一不恰到好处。每天晚饭后，他母亲都要牵着小鲁褒到庄园后的池塘边去散步。他又被池塘里的鸳鸯、鱼虾、波纹深深迷住了，在他眼中鸳鸯为什么成双成对？雄鸳鸯为什么比雌鸳鸯美丽等等问题又成了他向母亲提问的对象。母亲厌倦了他的问题，坐在林中休息，而他却独自跑到池塘边，用心去感受池塘里水的湖蓝、明艳、深重和沉静，而晚霞中池塘里幻化无穷的色彩和众多形象的水生物则成了他脑海中最深奥、最神秘的谜。

寒往暑来，一晃十五年的时间便过去了。十五年的寒窗，鲁褒通过孜孜不倦的苦读，再加上在不断观察中发现问题、在不断学习中逐步积累解决问题的学习方法，使鲁褒的知识得以丰富，学问有了加深。到鲁褒弱冠之年时，他已经成了当时南阳地面上

同龄人中才气横溢、学问最渊博的青年。同时，由于鲁褒从小就热爱大自然，热爱一切真、善、美的事物，从而就形成了鲁褒性格中极为可贵的禀性豪爽、嫉恶如仇的品质。正是这一点，才使得鲁褒在成年以后能够写出千古奇文《钱神论》。

（二）游学洛阳，增长见识

南阳，虽然也地属中原，但周围被连绵起伏的山峦围绕着。在当时交通十分不便的条件下，南阳属于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闭塞地区。而二十岁的鲁褒，血气方刚，不满足自己已获得的知识，抱着立“四方之志”的决心，毅然离开了自己的家园，离开了自己慈祥的母亲，开始了增长见识，游学洛阳的历程。

从南阳到洛阳，有几百里的路程。其间不乏山高、路陡、林密之处，还不时有毒蛇、猛兽出没；在山中行走，几十里人烟不见是常事。他既要防备猛兽的偷袭，又要克服恐惧心理，加速赶路。每逢“打尖”，他总是抽空与过往行人打听当地的风土民情与名胜古迹，了解当地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社会风气。在山中行走，鲁褒还常常遇到十几或几十家农民开辟的山间荒地，通过详细地了解，鲁褒得知他们都是来自于平原地区，为的是逃避沉重的赋税、徭役负担和豪门大族的盘剥。鲁褒深深地为之迷惑不解。他想：中原久历战火，经济倍遭破坏，现在国家统一的时间不长，百废待兴；而农业是兴国之根本，朝廷本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的负担，奈何现在会有如此多的农民逃入山林以躲避徭役租税负担呢？为了尽快了解事实真象，鲁褒心急如焚地赶路。终于，经过近一个月跋涉，他来到西晋的首都洛阳城。

早在南阳时，鲁褒就多次听乡人谈及当时在西晋任京官的文字家邹湛是南阳新野人。所以，鲁褒一到洛阳城，便拿出邹湛的故人为自己所写的推荐信和自己平日的得意之作，拜谒了正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的邹湛。邹湛作为当时有成就的文学家，他的诗文倍受时人赞誉。且邹湛十分喜欢培植后进，尤其是故乡来的年青人鲁褒，有“下笔千言立就，挥毫四座皆惊”的才华，所以，很受邹湛的垂青。邹湛不仅让素不相识的鲁褒住进了自己的家里，而且还经常彻夜与鲁褒谈论诗文及学问，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一次，鲁褒向邹湛谈及自己在山路上的所见所闻，问道：“恩师，学生有一事不明：学生在山中行走时，多遇平原州郡的农民，他们自言为逃避沉重的赋役而来。这种事情不知朝廷知道不？”邹湛说：“这种事朝廷能不知道？！但是，现在朝臣们只知一味享乐和如何搞权钱交易，哪有心思管农民是否负担太重呢！”鲁褒听后，十分惊讶，便问：“恩师，学生不明的是这朝臣搞权钱交易是怎么回事呢？”邹湛好像不愿深谈，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这权钱交易分很多种，比如说先朝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本是以士人的品行高低作为定品标准的，现在却变成了‘计资定品’，即按士人的家产多少作为定品的依据。这和中正定品时收取贿赂有密切的关系，这种事情难道不是典型的权钱交易吗？”鲁褒一听，也非常气愤地说：“啊！原来如此，我说社会风气怎么会如此败坏呢！”

事实上，西晋社会风气之败坏远比邹湛所说的严重得多，而且这种风气早在西晋武帝时便开始了。首先，晋武帝篡魏之后，为了获得高门士族的支持，立即就颁布了按官品占田的法令。该法令明确规定：“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①。这就从法律

① 《晋书·食货志》。

上肯定了官吏对田地的占有权。自此，各级官吏为了扩张自己的经济势力不断扩大占田范围，其结果只能使越来越多的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形成了“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植无地”^①的局面；其次，晋武帝首开大赏官吏之风。晋武帝在世期间，对功臣大加赏赐，如晋初重臣王祥离职时，晋武帝竟赐“钱百万、绢五百匹”。泰始五年王祥死后，晋武帝又赐王祥的家属“钱三十万，布百匹”^②；又如晋初重臣郑冲、何曾等人在身前身后共获晋武帝赐钱一百三十万、绢五百匹，布百匹；其他像晋初重臣石苞、羊祜等人死后多赐钱在三十万以上。故自晋武帝之后，政界用钱之风盛行，尤其是晋惠帝元康年间（291—299年）外戚杨骏辅政，为了篡夺帝位，便“大开封赏，多树党援”，“恩泽之封，优于灭吴之功，”^③致使西晋元康之后的“纲纪大坏”，^④官吏素质进一步下降。当时所谓的“纲纪大坏”，多指一些身处高位、家势显赫的大臣不择手段地捞钱、享乐。如“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⑤的晋初重臣石苞之子石崇，在荆州任职时，便是以“劫远使商客”^⑥而致暴富的。他用抢劫商旅的钱财，在河阳（今河南孟县）的金谷修建了一座名叫梓泽的别墅，别墅之内“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⑦石崇除了让别墅的一切装饰、用度都豪华无比之外，他还经常与外戚王恺、羊琇之流“以奢靡相尚”^⑧。为了争强斗富，王恺“以饴溲釜”，^⑨石崇便以蜡烛做柴火；王恺“作紫丝布障四十里”，^⑩石崇则以锦缎做步障五十里；石崇用花椒和泥粉刷墙壁，以取温

① 《晋书·李班载记》。

② 《晋书·王祥传》。

③⑤⑥⑦⑧⑨⑩ 《晋书·石苞传附子石崇传》。

④ 《晋书·隐逸·鲁褒传》。

暖多子之义；王恺则用红色的石膏粉墙以显其富贵。总之，俩人总是极尽奢侈之能事，拼命也要争强斗胜；所不同的是，石崇靠的强夺商旅的巨财，而王恺则以晋武帝为后台、利用国家的财富为资本的。当时除了石崇、王恺的争胜斗富外，还有贾谧及其狐朋狗友“费用无复齐限”。^①此外，当时的王公贵族及大臣，也以“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渐然相放，莫以为耻。”^②如惠帝的长子司马遹，身为太子，不思上进，却喜欢蝇头小利。据《晋书·愍怀太子传》载：司马遹“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又令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再如《晋书·王戎传》载：晋惠帝时司徒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嗇，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再次，创制于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到西晋已完全失去了原有的作用，而成为州郡大小中正结党营私、谋取私利的工具。当时手握大权的中正完全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定品，致使许多品行低下的人“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结果“附托其必达，守道者困悴”；而中正对于“有私于己”^③的人，必定让他们遂其心愿。因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④的格局。这样，社会上地位低下、真正有才能的人不能得到提拔，而提拔上来的都是那些只知盘剥百姓、拼命捞钱的士族子弟。这就使得整个国家官僚阶层中的官吏素质极度恶化，同时也助长了社会上各种歪风邪气的滋生和发展，加速西晋国家的腐败进程。

① 《晋书·外戚·羊琇传》。

② 《晋书·江统传》。

③ 《晋书·段灼传》。

④ 《晋书·刘毅传》。

元康末年，文学家邹湛病死，鲁褒结束了与邹湛亦师亦友的关系，离开了寄居数年的邹府。通过几年的所见所闻，鲁褒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疾恶如仇的性格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多么的格格不入；西晋皇帝的昏庸，大臣的贪婪、社会风气的败坏都深深地刺痛了他，他对自己的仕途已完全失望；同时，他也不想让污浊的社会风气玷污自己的灵魂。于是，他下定决心离开洛阳，回到虽然闭塞，然而还算“清洁”的故乡南阳。

（三）奋笔写奇文，痛斥拜金者

秋天来了，残蝉紧抱着枝头，唱着无力的恋歌；树叶由青翠变成了深黄，像诗人一样，在秋风中耸着肩儿微吟，感慨着自己萧条的身世。这时，在南阳城内一所宅院前，瑟瑟的秋风里，久久伫立着一个形影相吊的人，他就是数月以前，从洛阳一路风尘赶回故乡的鲁褒。现在的鲁褒，没有了一丝刚回故乡时的喜悦，而是满脸都写着愁苦。他眼窝深陷，眼睛死死盯着前面被众多树木拥绕着的寂静的院落，放射着仇恨的目光。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回乡的短短的几个月里，自己会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慈祥的母亲离开了自己，撒手尘埃；为母亲治病和治办丧事，鲁褒不得不向南阳的富家大户举债，因为无力偿还债务，他只得忍痛任人贱卖掉祖上留下来的宅院。这样，几个月前尚有家有室的鲁褒，到现在却变成了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的穷汉。他怎么能不恨这个充满贪婪、狡诈和丑恶的黑暗社会呢？怎么能不仇恨那些为富不仁的达官贵人和为非作歹、鱼肉乡里的世族大家呢？他想：“虽然我已是一贫如洗、身无半文的人，但是我可以利用知识和笔杆做武

器，去抨击社会的黑暗、去揭露达官贵人的丑恶、去鞭挞世族大家的贪婪，还可振奋社会上的正气。于是，鲁褒在仇恨与痛苦的交织中，在穷困潦倒的境遇里，奋笔写下了千古奇文《钱神论》。

鲁褒的《钱神论》以讽刺的笔调这样写道：“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①它虽然很小，但是把所有的钱收集起来，就会像大山一样雄伟；所有的钱流通于世，会像大江一般川流不息。而且，钱能“动静有时”，^②它既便于收藏，又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地交换他物，且不易损坏。所以，钱在当时世人的眼中是总括天地万物、“行藏有节，市井便易”、“难折象寿”的不可缺少的“神宝”^③之物。世人为了表示对钱的亲近，不仅待之“如兄”，且亲切地称它为“孔方”兄；如果谁一时失去了这个“亲密”的“孔方”兄，那么他便成了穷汉；而一朝得此孔方兄，那么富贵无比自然不必言传。所以，“孔方”兄虽然没有脚，却能行走如飞；虽然没有翅膀，但它却能“无翼而飞”^④，且钱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解严毅之颜，开难开之口”^⑤的巨大功效。在九品中正制实行过程中，你若是向中正贿赂的钱财越多，那么你的品位就越高，做官也升得快；你若只向中正送薄礼，那么你的品位低了又低，做官既迟又小；且这种差别还会带来“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⑥，让你终身为之后悔不已的后果。可见，他论述钱的社会效用，为的是要揭露权、钱交易的罪恶现象。

接着，他又进一步揭露当时人们的拜金主义状况。指出钱，像泉水一样源远流长，且无幽不致，无处不达，所以，无论是京城王公贵族，还是文臣武将，无不孜孜以求然后而快之。他们

①②③④⑤⑥ 《晋书·隐逸·鲁褒传》。

“疲劳讲肄，厌闻清淡，对之睡寐”^①，国家大事可以置之不理，道德修养可以闻之而不顾，凡是可以用以捞钱的途径和手段，无论有多么卑鄙、多么下贱，都可以不要脸皮去做，昧着良心去拿，以致达到了“见我家兄，莫不惊视”^②的地步。至于那些整日无所事事的世族子弟只相信钱的作用。在他们的眼里，有了钱，就可以无事不大吉大利，大顺大通，又何必非要通过苦读经书，然后实现大富大贵的目的呢！所以，当年吕不韦聘人写成了《吕氏春秋》，汉刘邦被萧何多送二钱所折服，卓文君脱下布衣而着锦绣，司马相如“乘高盖”而抛弃牛车，都是钱的神效造成的。由此可见，钱这个东西，可使“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的“神物”^③；同时，还有着“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④的神奇功效，以致当时社会已演变成了“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⑤的地步。鲁褒就是这样把当时人们的拜金主义嘴脸揭露无遗的。

另外，洛阳一带无论是身着龙袍的帝王，还是手握权柄的大臣，都非常喜欢“孔方”兄，并达到了非此不可的境地。他们为了达到拥有钱财的目的，可以“不计优劣，不论年纪”，以致“宾客辐辏，门常如市”。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条谚语，那就是“钱无耳，可使鬼”^⑥。这条谚语反映的就是当时在所有人的眼里，“惟钱而已”，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故“军无财”，^⑦就没有人去当兵；“军无赏”，^⑧则没有人愿意奔赴前线去作战。仕途进退也是这样：假若做的官职位不高，就“不如归田”^⑨做一个富足安逸的田舍翁；即使官职符合意愿，如果没有丰厚的钱财、外快，那么就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晋书·隐逸·鲁褒传》。

可以“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①哪里还管它什么为国家、为民族服务呢！他对当时人唯利是图，唯钱是夺的状况的痛恨心情，跃然纸上！

总之，鲁褒用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语言，多样的比喻，排比的句法，形象的描述，为西晋元康以后，自帝王将相到世族大家的子弟勾勒了一幅生动逼真的贪婪与丑恶的画像。所以，鲁褒的《钱神论》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一些痛恨“时疾者”，无不为鲁褒的传神之作而欢欣鼓舞，他们广为传看传抄《钱神论》，抒发着内心的痛恨之情。鲁褒的《钱神论》很快就传到了洛阳，洛阳城内迅速掀起了一阵传看传抄此文的热潮，从而再一次形成了西晋历史上“洛阳纸贵”的盛况。

由于鲁褒的《钱神论》揭露了官场的无比丑恶和达官贵人的贪婪、卑鄙，深深地刺痛了达官贵人的自尊心，他们纷纷跳出来指责鲁褒扰乱视听，诋毁国家大臣，并扬言要给鲁褒一些颜色看一看。为了躲避达官贵人的迫害，同时远远逃离当时丑恶、污浊的凡世间，鲁褒放弃了一些正直官吏征辟他为官作吏的机会，隐身山林，人不知其踪迹，也不知道死于何时。但是，鲁褒并没有死，直到今天，他的奇文，仍然在闪光，令疾恶者欢欣，使贪婪者惧怕！

① 《晋书·隐逸·鲁褒传》。

皇甫湜



一代“书淫”名隐皇甫湜

· 文识非 ·

引 言

“淫”有“浸淫、浸渍”；“过度、过甚”；“惑乱、邪恶”；“长久、淹留”等多方面的含义。所谓“书淫”，自然是指酷爱读书，达到了神倾魂恋、废寝忘食的地步。皇甫湜的一生是在独立寒门、博综经典、广采百家之言、偏重老庄之学中渡过的。而

且是在咬住这个方向之后，就矢志不移、一往情深地走下去的。即使在疾病缠身的时候，也毫无懈怠之意。因此，时人送他一个“书淫”的绰号，真可谓名符其实。

那么，皇甫谧是怎样走上“书淫”这条道路的呢？他的一生有何建树？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这是需要我们认真了解的。

（一）识迷途兮其未远，觉今是兮而昨非

皇甫谧是一个“智”者，也是一个“痴”者。他在自传体的《玄晏春秋》中有这么一段形象而生动的自我描述：

予长七尺四寸，未通经书。与从姑子梁柳等或编荆为楯，执杖为矛，分阵相刺，有若习兵。母数谴予。予出得瓜果归以进母。母投诸地，曰：“《孝经》称曰：用三牲之善，犹为不孝。何孝者？莫大于欣亲。近尔年近三十^①，志不存教，心不入道，曾无怵惕，少慰我心。修身笃学，尔自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予流涕。予心少感，遂伏史书。

从这段简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皇甫谧在二十岁以后，仍不懂得读书、上进，是一个无所作为、放荡贪玩的人。他在邻居的眼中，是一个傻乎乎的“痴”人。为此，常使母亲伤心生气。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时。因此，当儿子向母亲进瓜果时，母亲却生气地摔到地上，怀着悽苦、自责的心情数落这个顽童，并严肃地指出用最好吃的东西来孝顺父母，算不得真正的孝顺。什么才是真正的孝顺呢？只有按照父母的期望走正道、作正人君子，作

①《说郭·玄晏春秋》作三十，《晋书·皇甫谧传》作二十，此从《说郭》。

个有出息的人，才是最大的孝顺。天下父母心，谁又不是这样呢？儿女是父母的全部希望。皇甫谧这里所指的“母投诸地”、“母数谴予”的“母”，还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而是他的叔母。皇甫谧早年丧母，过继给叔父。叔母对他无比爱护，胜过自己的亲生儿子。当她看到成年后的皇甫谧如此不成才时，是何等的失望！她想起了“孟母三迁”、“断杼教子”的故事，深深地责怪自己，也苦苦地告诫儿子“修身笃学，尔自得之，于我何有”的道理。皇甫谧被震动了，叔母殷切的期望、恳切的教导，就如一片金色的钥匙启开了他智慧的仓库。叔母对他深厚的感情、拳拳的心意有如重磅炸弹，摧毁了他贪玩、放荡的恶习之后所迸发出来的能量，就像冲决堤坝后激起的洪流，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皇甫谧变了。皇甫谧不再“痴”了。他变得成了另外一个人。从此，他改掉了游荡的恶习，潜心学习研究，“就乡人席坦受读，勤力不息。”^①他终于成了魏晋时期一个很有建树的学者。不仅在史学方面成绩突出，而且对于文学、医学、天文历法等科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这正是智者最能接受理智的指导的一个典型的范例。

说到皇甫谧的世家，原有一段辉煌的历史，追溯他的远祖有个皇甫规，曾是东汉时的重臣，以降服羌人有功拜度辽将军。永康初，征为尚书，迁弘农太守，后又以中郎之职，持节监关西兵，封寿成亭侯。曾祖皇甫嵩，少好诗书，又习弓马，灵帝时为北地太守，领冀州牧，拜太尉，封槐里侯。其人折节礼士，是一个“威名震天下，豪杰争附之”^②的人物。他们世居晋雍州安定郡朝那地方（今甘肃灵台县），是这里的高门望族，只是到了皇甫谧的

① 同前揭《说郭·玄晏春秋》。

② 《后汉书》卷61《皇甫嵩传》。

父、祖两代才没有人做官，因而，家道中落，以务农为生。

皇甫谧，字士安，幼时又名静，自号玄晏先生。约生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卒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享年六十八岁。由于母亲早逝，过继给叔父抚养。这个生长于忧患、动乱年代的名士，其行为、思想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反映出其独特的性格，显示出其生、死、穷、达，不易其操的特点。

皇甫谧改掉放荡、游玩的恶习以后，遂“逐伏史书”、“奋力不怠”^①。但这时，由于家道中落，只能维持半耕半读的状况。开始一段时间是“躬自稼穡，带经而农”^②。但过了一段时间，生活的重担全落到了他身上，要靠他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劳动，才能解决养家糊口的重任。此时，他处在“昼则务农，夜则疲寐。及二时之务，书卷生尘，筐不解緘”^③的状况中。但他没有中道废辍，相反是惜时如金，加倍努力。他摆脱了迎来送往、拉长聊短的繁琐应酬，利用农闲废寝忘食地苦读。他曾这么深沉地回忆道：

唯季冬裁得一句学，或兼夜寐，或戏独否，或对食忘餐，或不觉日夕，居家游出之事，吉凶略绝。富阳男数以全生之道诲，子方知好色，号予为书帙。^④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皇甫谧攻读书、史，已经达到了神魂颠倒、废寝忘食的地步。一颗坚实的种子扎根在深厚的泥土中以后，长出的一定是一棵挺拔的树苗。它不会因狂风摇曳而倾倒，也不会因蛀虫爬啃而夭折。因此，当富阳男以“全生之道”数落他的时候，他置若罔闻，仍然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走下去。“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皇甫谧对“保命哲学”鼓吹者的

①③④ 《说郛·玄晏春秋》。

② 《晋书·皇甫谧传》。下引此书不另注。

响亮回答。

然而，正当皇甫谧争分夺秒奋力求进的时候，由于过度的疲劳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他病倒了。这时他还不到四十岁。他得的是风痹症。这是一种极端顽固的疾病，湿热留注经络，风寒湿邪久郁，关节疼痛，肢体痿软，发热、怕冷、口渴，也就是今天所谓的风湿性关节炎或类风湿关节炎，后来连腿也萎缩了。因此，他服用了寒食散。而服用寒食散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反而加剧了病情的发展，因“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愤，叩刃欲自杀。……”一个满怀壮志的人，正在编织五彩缤纷的梦，突然遭到如此沉重的打击，能不伤心吗？他的眼前变得一片漆黑，有如天崩地塌一般。在这场疾病与轻生思想的激烈搏斗中，是深怀爱抚之情的“叔母谏之而止”。这位伟大的女性，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是叔母精心的护理，使他得以从痛苦中平静下来，并冷静地思索人生。他认识到痛苦是人类伟大的导师。他要向命运挑战。没有障碍的人生旅程，是没有意义的。金子要靠火来测验，勇者靠逆境来考验。他决心要以伤残之躯在荆棘中闯出一条道路来。此后，他更是爱不释“书”了。除了经史百家之言以外，还有医学方面的书籍。为了给自己治病，也为了给他人解除痛苦，他广涉医学，写出了《黄帝针灸甲乙经》，是至今保存得最好的一部古书。这部著作主要取材于《素问》、《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而得名的。皇甫谧对上述三部医学著作，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再创作工作，“……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①使这几部书变得更系统、更清晰、更适用于学习和临床的运用。这部医学名著，实用价值很大。全书共分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分

① 《针灸甲乙经·自序》。

医学、针灸学的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两个部分。内容涉及内、外、妇、儿各科的生理、病理及治疗诊断等方面。书中还讨论了针灸的操作手法、禁忌和各种注意事项，对后世影响极大。到了隋唐时期，被列为太医院的学习和考核教材。后来，许多关于针灸学术著作的撰写，都是在此基础上再创作、再完善而成的。书中，他对自然和人体的见解，既体现了他的自然观，也是对中国独特的医疗手段——针灸学的一个重大贡献。除此之外，皇甫谧还撰写了《依诸方撰》和《论寒食散方》等医学方面的著作。到了南北朝时期，皇甫谧所著医方影响更大。《颜氏家训·杂艺篇》说：“医方之事，取妙极难，不劝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药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皇甫谧、殷仲堪则其人也。”可见，皇甫谧不仅没有被疾病折腾死，反而升起了一面救死扶伤的旗帜，真是“久病成良医”。皇甫谧不仅认为学医能帮助自己摆脱疾病的折磨，还能更多地为他人解除痛苦。他曾说：“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情，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①很真实地道明了他学医、行医的目的。有关他的医学著作，也成为了祖国医学宝库中的瑰宝。

（二）垂范后昆勤著述，弘扬正道写春秋

在著书立说道路上攀登的人是艰苦的。皇甫谧所经历的艰苦比谁都多、都难。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家境贫寒，生活负担过

^① 《针灸甲乙经·自序》。

重，二是起步太晚，年过二十才开始发奋读书；三是疾病缠身，耗精损锐。但“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以大量的学术成果和丰富的内含证实着知错必改、前途无量的认识方法是正确的。李巨来曾这样评价：“考晋时著述之富，无若皇甫谧者。”^①可惜，他卷帙繁多的著作陆续散佚，许多重要的学术思想和贡献已不为后人所知。根据《晋书·皇甫谧传》记载：他诗、赋、诔、颂、论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玄晏春秋》，并重于世。”

单讲他写的《帝王世纪》，有人说十卷，有人说是九卷，但不管多少，其特色是很明显的。陶宗仪是第一个为《帝王世纪》辑佚的人。后来，顾观光等人又继续收罗，竟达到了三百四十多条（见《指海》）。以后又有人陆续作了补充。皇甫谧著《帝王世纪》意在补《史记》之遗漏，“网罗放佚，求其完备，甚至著传记于竹帛，为使它们不致湮灭”。^②事实证明，此书的确起了补缺正闻的作用，他所搜集的丰富史料为后人研究古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以后，人们在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作注释时，也都广泛地吸收了皇甫谧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他的《帝王世纪》，首创性地将历代人口、土地数目理出了一个系统的资料来，并对其升降原因进行了探讨。土地和人口自古以来就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最基本要素，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也十分重视土地、人口的调查和管理工作，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也经常把这一内容作为论辩的主题。皇甫谧虽然不愿为官作吏，介入政治，但却是历史上第一个按时代顺序将夏禹至三国时期的星

① 见《书古文尚书冤词后》。

②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23章。

田和人口数字进行整理的人。他首先对各个时期全国土地面积进行估算，然后依照土地、人口两个方面分别进行统计，又在土地类中分出田亩总数、定垦数额、不垦数额三项。在人口类中，又条理为户数和口数两项。有明确记载的，尽量将具体数字保留到个位，缺少记载的，则以其他史料进行推算。实在无法推断的，则空阙不分。在缺少现代测绘、统计条件的情况下，要作如此浩繁的研究工作，该是何等的困难。他的论述尽管显得有些粗略，却使得后人在考察古代社会经济状况时有据可依。

皇甫谧在对历代人口、土地数目升降的原因进行探讨时，严肃地提出了战争和暴政是造成土地大量荒芜，人口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现象又与统治者实行的政策法令密切相关。他列举了历朝各代统治者凡是注意了男耕女织，不夺其时、天下无事的时候，就会出现人口繁衍、生产发展的盛世，相反，民罹毒政、诸侯兼并的时候，就会出现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的悲剧。暴秦之后有盛汉，隋亡之后有盛唐，这都是历史事实的重演。皇甫谧也谙于天文、精于历法，他编《年历》六卷，大约是配合《帝王世纪》而作的，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皇甫谧还写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等著作，其中描写、叙述的人物自被衣至管宁、焦先等约数十人之多，且都是一些不为人所重视的逸士、高士、妇女、他以生花的妙笔、精辟的语言，为这些人争得了地位。他的这一努力，开拓了历史描述的范围，给后人提供了更为广阔斑斓的古代生活画卷，并为后世史学家编撰此类专传开创了先声。在他的笔下那些品德高尚、不追名逐利的高士、逸士、妇女，个性鲜明，见识卓越、品德高雅，敢说敢为。与封建御用文人笔下描绘的那些“名声若日月，功绩若天地”，靠结党营私、自吹自擂、胁迫众人歌功颂德等手段造成

的如雷贯耳的人物大相径庭。

列御寇是战国时候不为名利金钱所动而又专心作学问的人。他隐居不仕，修身养性，很受人们的尊敬。但家境贫寒，常有饥色。这时子阳为相，此人专重刑法，宰杀无辜，列御寇认为此人是逆世而行，不可能长久，便隐迹穷巷，避而远之。有人向子阳道：列御寇是当今有道之士，可是他还经常挨饿，你不启用他，只怕要落一个不会任用名士的恶名了。子阳听后，觉得自己真该改一改这个毛病才行，便派人送去十多车粮食。列御寇礼让一番以后，谢绝了子阳的赐予。妻子知道后，很生气地责备丈夫，埋怨自己将跟着他要饿死了。列御寇很耐心地给妻子解释道：子阳并不是真正要救济我，而是在别人提醒下怕落个不好名声才这样做的，实际是加罪于我。如果，有一天产生了什么变化，人家又会说我与子阳有什么瓜葛，到那时跳入黄河也难洗清。所以，我宁愿挨饿，也不愿接受这些不义之财。一年以后，郑人果然杀了子阳。子阳的党羽也都受到了牵连，唯独列御寇安然无恙。皇甫谧用简炼的笔触勾画出一个料事如神、饥不受赠者的高大形象。

皇甫谧十分敬重王倪那种“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恒而不能寒，疾雷破山、暴风振海而不能惊”^①的蔑视“利害”的达观性格。

吴人披裘公一次上山打柴，碰上延陵季子出游，两人同时发现路中有一遗金，季子提醒他道：“你看着这钱干什么？何不拾了就走呢？”披裘公怒视季子，挥手而去，并悻悻地说：“看你这个人长相不错，可思想太卑贱了一点吧！我披裘公这么热的天上山打柴自给，难道是一个拾金昧于己的人吗？”季子挨了这顿批评，顿觉自己不应以自私之心去揣度别人，赶忙赔礼道歉，并请问披

① 《太平御览·逸民》。

裘公高姓大名。披裘公傲然回答：“子皮相之士，何足语姓名哉！”^①皇甫谧把披裘公与季子这两个人物的身世、思想境界、行为准则进行了一番比较性的描绘，恰到好处地提高了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

皇甫谧笔下的《列女传》也极富有特色，一改以封建伦理道德作为准则载述妇女事迹的范畴。他着力描写有智慧、有抱负、有胆识的杰出女性。他赞颂了教子有方的孟母；称道了忠实于爱情又敢反抗统治者的杞梁的妻子；歌颂了忧国忧民的漆室女；描述了手刃杀父之仇的庞涓之母赵娥；而且还推崇了一条娶妇不要以貌取人和不要以貌量人的思想准则。他泼墨讴歌齐国的孤逐女、宿瘤女，虽然长相不扬，但见识高远，才能卓著，对齐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赞美肤黑而力大、举臼过头、勇如男子汉的孟光。他觉得健壮、贤慧的孟光，比之纤纤袅袅，以美取宠的女子更为难得。他在《江乙母传》中刻画出一位有胆有识的母亲：

楚江乙母者，当恭王之时，乙为大夫。有人入王宫盗者，令尹以罪乙，请于王而黜之。处无几，其母亡布八寻，言令尹盗之。王曰：“令尹职上，寇盗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为郢大夫，入盗王宫之物，妾子坐而黜。今尹独何不以是为过也？”王曰：“善”。令吏偿母之布，因赐金十镒。母让金而言曰：“妾岂贪货而干哉！恕令尹之治也。”遂不受。^②

这段简短、生动的描述，展现出一个母亲有胆有识、有理、有据

① 《太平御览·逸民部·皇甫士安高士传》。

② 《说郛·列女传·楚江乙母》。

为儿子鸣冤叫屈的事实。对不加调查研究，就滥施淫威加害下属的官僚展开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何等有力，何等生动逼真。

广汉（今四川梓潼）女汝归，是皇甫谧笔下一个知足常乐、克己待人、勤劳俭朴的女性。面对贪得无厌、不讲兄弟情谊的长嫂，汝归女不但能忍耐谦让，还主动将巨额祖产全部让给了兄嫂，自己只要了几亩薄地，另盖茅舍去开荒种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已是难能可贵的品质。不料在开荒种地时，从地里挖出一罐金子。汝归夫妇没有隐瞒私吞，而是与丈夫挑着这罐金子到兄嫂家去。大嫂一见她俩，以为是穷得没法子来向她家借贷的，便把脸一沉，露出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等到汝归夫妇说明原因及见到金子以后，嫂子立刻眉开眼笑，伸手就夺。大嫂贪得无厌的思想行为与鄙视钱财的汝归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连一向受妻子支使的哥哥也被汝归的行动所感染了。他不顾妻子的反对，夺过她手中的金子去追赶远去的弟媳。皇甫谧把在金钱面前截然不同的两个女性，刻画得栩栩如生，真是妙笔如神。

樊姬又是他笔下大胆进谏、能辅佐楚王改邪归正、颇有见识的贤明后妃。楚庄王即位以后，不以国事为重，

好猎狩，姬谏不止，乃不食禽兽之肉。王改过，勤于政事。王曾听朝罢宴。姬问之。曰：“与贤者虞丘子语。姬掩口而笑。王曰：所笑何也？”姬曰：“虞丘子相楚十余年，未闻进贤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贤者之路，是以笑也。”^①

这话传到虞丘子的耳里，感到既惭愧又内疚。于是，便引进了孙叔敖。楚王让孙叔敖当了令尹以后，推行了一整套富国强兵的措

① 《列女传》卷二。

施，只短短三年的时间，就使楚国兴旺起来了，而且能称霸于战国。皇甫谧认为像樊姬这样的王妃是有智、有勇、有谋的，是关心国家大事的女性。她没有迁就楚王的恶习，也看出了朝廷大臣们的弱点，了解了孙叔敖的优点，称得上是楚庄王的贤内助，与那些只图安逸享乐、以色取宠的官妃，是截然不同的。

皇甫谧以饱蘸深情的笔墨讴歌了许许多多的正人君子，为的是要把自己所崇敬、熟悉的而又被他人所忽视的人公告于世，为这些人争得一席之地。自然，这些人的思想、品德、情操与自己也是十分合拍的。从他笔下的这些历史人物中，我们也可以照见他的影子。天命不过是脆弱者心灵中的一个自慰的词汇和借口。皇甫谧在同贫、病拼搏时，显得特别坚强，一反天命论的束缚，当贫困和疾病扼住他咽喉的时候，他没有屈服。他把感情和理智、信念作了适当的调整，去掉了轻生的念头，鼓起满帆的风，表现出一个大智大勇者的气节，焕发出一个改变了命运者的崭新风貌。

（三）不与春风争芳艳，自甘篱落傲秋霜

随着时日的推移，皇甫谧的学问、人品逐步为人们所传闻、所推崇。这时有人劝他要“修名广交”，以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挤向上层社会去进行一番较量。“富贵”是许多人都希望得到的；“贫贱”也是许多人害怕和讨厌的。因此，有人劝他不要委形待终、穷而不变、辗转沟壑以待死。而皇甫谧对此持相反的态度。他认为“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为利禄去忙忙碌碌呢？享受俸禄的人，必然要为主子分一份忧患、担一分责任，身体好的人尚且感到劳累不堪，

何况自己是多病身残的人呢？于是他作《玄守论》回答了人们的劝告，表示自己不与春风争芳艳的态度，阐述了“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何必为了追求富贵而耗费精神。他认为“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至矣！”又何必要扬名显姓于世人面前呢？但求能够“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于损益之外，游于形骸之表”。以后，他确实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顶住了统治者的威逼。魏郡太守召他为上计掾，又奉他为孝廉，他没有理睬。景元年间（260—264年），控制了朝政的司马昭为了笼络人心，亲自选拔皇甫谧等三十七人为官。其中三十六人均欣然应命，受到了封官拜爵的封赏，只有皇甫谧托病未去。他磨墨吮毫作《释劝论》以言志。他对司马氏为首的统治集团掌握国家政权所推行的野蛮、贪婪、虚伪手段，十分反感。随着早已沦没的家世，他有了长期同劳苦大众息息相通的感情，在思想上与统治阶级早已格格不入，尤其是对尔虞我诈的司马氏集团，更为不满，自然不愿去作为他们涂脂抹粉的工具，何况他确实有病缠身呢？当他立志攻读时，就辞绝了迎来送往的一切应酬活动，现在他更不愿意在官场中把自己折腾死。他在《释劝论》中这样写道：家里的人以及许多朋友们都认为“天下大庆，万姓赖之，虽未成礼，不宜安寝，纵有疾笃，犹当致身”，而我只知道天下大小事情，都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加以论断，对的确不能完成使命的人，不能说是有意怠慢。我常常躺在病床思考：那些乐意升官晋爵的人，也是按自己的意愿来作出决定的。即使我没有疾病，我乐意学商山四皓，隐居箕山，也是应该允许的。何况我的身体确实不行呢？尧舜时代，也有名人、高士遁迹山林，不过问政治，尧、舜也没有对他们施加任何压力而诋毁他们的行为。皋陶是功臣，他在外族侵扰、盗贼与奸人闹事的时候，担任主管刑法的工作，把

五刑处理得轻重适中，是因为得到了各方面的配合。如果不是这样，皋陶再有本事，也难治理出一个国泰民安的社会来。一个盛世，应该“朝贵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既然大家认为现在是盛世，也应该允许我的自由存在。这里皇甫谧所谓“全志”的标准，大概就是《晋书》的评论中所说的“……素履幽贞，闲居养疾，留情笔削，孰悦丘坟，轩冕未足为荣，贫贱不以为耻。……”为内容的生活画面。有的人指责他，并以不满朝政、逃避现实来逼他就范。于是，他就公开《释劝》来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实情。皇甫谧以犀利的笔锋，以设问方式、引古证今，洋洋洒洒抒发着愤懑的感情，真可谓泼墨淋漓，无懈可击。

皇甫谧面对多变的时势，始终以警惕的眼光、清醒的头脑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他搬出了大批隐居不仕的贤德之士如支伯、老子、颜阖、原思、荣期、黔娄、干木、荆莱、严适、四皓、郑真、管宁等人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支伯是传说中尧舜时的贤人，他没有做过官，却受到了人们的尊敬，有所谓“然后临沧州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岂不盛乎”^①的说法。老子虽然是楚国人，但远离了故乡，写出了《道德经》，不同样是好人吗？颜阖辞却重金，不愿做官，安居陋巷，不也成了名士吗？原思，也叫原宪，是孔子的弟子，住在一所破烂的房子里，穿得破破烂烂，形颜枯槁。子贡见了，以为他生病了。他爽朗地回答：“学道而不能行之谓病。若思贫也，非病也。”他的回答响亮地告诉人们“穷”并不是可怕的事，怕的是自己理想、抱负不能实现。荣期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有一次，孔子游泰山时见他穿着破烂的鹿皮衣服，腰间拴着一根带子在潇洒地弹琴歌唱，便问他为什么这样快乐。荣期以自

^① 《文选》三国·魏阮嗣宗《籍》（为郑冲劝晋王表）。

己是一个长寿的男子汉（即人、男人、长寿）三乐来回答，引起了孔子许多的感慨。黔娄是春秋时一个贫贱志不移的人，他拒绝了鲁恭公和齐王的聘用，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死后连一件好一点的衣服也没有。曾子看到后十分伤感，著书四篇，言道家之务，号《黔娄子》；严遵，字君平，汉时四川人，以卜卦为生，与人言利害，日得百钱够糊口就收摊。回到家里，闭门读《老子》。他还是扬雄的老师。益州牧李强要他出来做官，他就是不干。他活了九十多岁，还写了一本《老子指归》的书，也没有人说他有什么不好。郑真是汉时人，他隐居阳谷口（今山东平阴县西南），成帝时大将军王凤想启用他，他拒绝了。杜甫在他的《杜工部草堂诗笺》中写道：“自是秦楼压郑谷，时闻杂佩声珊珊”，暗喻驸马的富贵，哪里比得上郑真的高贵品德。管宁，字幼安。处在三国分裂争霸的时期，他“语维经典，不及世事”、“因山为庐，凿环为室，越海避乱者，皆来避之。旬月而成邑，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义，非学者无由见，由是安度其贤，民化其德”。他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拒绝朝廷的聘任，又有什么不好？这些人都有难夺的气节，不可改变的志向，不愿凭别人的意思去改变自己选定的方向，我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老师，希望大家不要对一个有病的人妄加议论。我对大家有如此多的怪论实在感到奇怪。……皇甫谧对于当时社会舆论给予的迎头痛击，更突出了他安贫乐道的意志。以后，晋武帝虽然又下过几次敦诏，但他都以“上有明圣之主，下有输实之臣；上有在宽之政，下有委情之人”为由，拒绝了多次威逼。正是由于皇甫谧“词切言至”，也就没有追逼了。他向皇上只提了一个要求，请求能借些书给他看。晋武帝便送了一车书给他。此时，他的病情虽不断在加剧，但仍“披阅不怠”，与官场人物，更少往来，就是幼时一起长大、游玩的城阳（今河

南登封东南)太守梁柳来探望他时;他也和平时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款待。并说:我与梁柳是布衣之交,以前他来我家,也是送不出门,吃的也是盐菜。现在他的地位虽然变了,我的接待如果也变得热烈了,那不就证明我所看重的是城阳太守而不是梁柳吗?皇甫谧就是这种“不与春风争芳艳,自甘篱落傲秋霜”的学士、文人。

(四)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别有天地在人间

到了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皇甫谧闭上了智慧的双眼与世长辞了。这一年,他六十八岁。他悄悄地走了,像夏夜花丛中的萤光,像天穹的流星,消逝在广袤无边的夜空。又像那红雨般的桃花,随着流水杳(yǎo,音咬)然飘去。人们再也看不到他拄杖蹒跚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他咳嗽的声音了。他的确死了。但死并不意味着人生的一切都终止了。他那数十年艰苦笔耕结出的硕果,却熠熠发光,显示出他永不熄灭的生命之光。这正如人们所说: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死了。

对于“生”和“死”,皇甫谧有其自然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看法,而且他竭力反对厚葬。他认为:

夫人之所贪者,生也;所恶者,死也。虽贪,不得越期;
虽恶,不可逃避。

的确,高踞帝位,被万民呼之为“万岁爷”的人,长寿者究竟有几人?括民脂民膏,揽天下奇珍妙药以祈“长生不老”的秦始皇

之流，又活了多久？不管各人所得到的荣、尊、卑、贱有何不同，但都是要死的。因此，争取长寿是可以的。但惧怕死亡是不必要的。这应该是人们的共识。皇甫谧认为：

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寄命终尽，穷体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形不存体，则与气升降；尸不久寄，与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

他接受了老庄返朴还真的思想，对“死”有着比较超脱的看法。到了晚年，觉得自己“神气损劣，困顿数矣”，由于“常惧天陨不期，虑终无素”，便写下了《笃终》这一名篇，提出了反对厚葬的许多见解，应该肯定这是高明的、正确的。其主要观点“厚葬”是“空夺生用”，“徒启奸心”。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无数厚葬者走过的道路，都证实了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当我们参观、考察古墓葬的时候；当考古工作者不断报告新发现的时候，当公安人员不断侦破走私和盗窃文物案件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信服皇甫谧的判断太正确了吗？

他认为人鬼异制，人死了就没有知觉和需求了。既没有知觉和需求，要陪葬那么多东西不是夺去了生者许多有用的东西吗？厚葬者认为只有多花钱财，多陪葬物品才能安慰死者、表达孝心，或求得自己失亲的痛苦心情的摆脱。其实，陪葬得越多，招来的是“剖破棺槨，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扞肠求珠玉”，为死者招来的是更大的横祸，是最愚蠢的行为，徒然是告诉人家这里有金银财宝，要人家去偷、去抢、去挖。他推崇杨王孙亲土的作法。杨王孙是孝武帝专攻黄老之学的人，家财万贯。活着的时候，讲究享受，知道怎样活得痛快，年老多病的时候，却要求儿子裸

葬。所谓“裸葬”，就是用一个布袋套住尸体，等到把坑挖好以后，把尸体放进坑里，然后把布袋从下部脱出来，使尸体“亲土”。他的这一决定，使十分富有的儿子为了难。如果按父亲的意愿去作，心里不忍；如果不按父亲的遗言去作，就要落个“重废父命”的罪名。在左右为难的时候，便向父亲的好友祁侯请教。祁侯说服父亲不要让自己赤身裸体去见先人。于是，祁侯便搬出《孝经》中提出的“棺槨衣衾，圣人之遗制”为由，劝杨王孙不要独持“裸葬”的作法，让子女们感到难堪。杨王孙却以老子的“反真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为由，来阐发“裸葬”为什么好的理由。且指出“裹以帋帛，隔以棺槨，肢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但千年以后，最好的棺槨也是要腐烂的，到那时才能“亲土”，简直是一种折磨。任何厚葬对死者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对生者却有很大的损失。所以，他还是要坚持“裸葬”。杨王孙是吝啬吗？非也。杨王孙是愚蠢的固执者吗？非也。当一种认识、一种观念形成以后，是不容易改变的。何况他的这种认识和观点具有很大的正确性呢？

皇甫谧十分推崇杨王孙的这种作法，但又作了稍稍的改变。当他知道自己再也活不下去了的时候，作出了如下明确的规定：“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槨，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衣，殓含之物，一皆绝之。”为了“俭不露形”，穿着原来的衣服、头巾去就行了。气绝之后，用粗竹席裹住尸体，两头用麻绳捆住，放在床上。然后，选择一个不毛之地，挖一个深坑，“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示不忘孝道”就行了。他不要风水先生为他的尸坑测定方位，也要不砌坟堆，把土填平之后，还其故草，不使有任何形迹。更不要植树。而

且规定，以后不管谁死了，也不要附葬，免得招染麻烦。这样百年、千年之后，也无忧虑。他的儿孙与学生们没有改变他的遗愿，按照他的意愿草草地掩埋了他的尸体，让实践履行了他“返朴还真”的意愿。

时至今日，对于“生”和“死”，人们有了更多的正确的先进的认识和看法。别说薄葬如何有理正确，“火葬”不是比之更为先进吗？当然厚葬更属无聊。殷商女将军妇好的陪葬物出土了，秦始皇兵马俑发掘出来了，骊山下的水银棺恐怕在不久的将来也要被人们捅开。明代的十三陵的陪葬品也被开挖出来向人们展示了，清代的东陵不是早被北洋军阀洗劫一空了吗？长沙马王堆里开挖出来的那位老奶奶，她生前怎么会想象出千百年后会以干瘪的容颜展示在后人的眼底呢？那丰厚的陪葬品和内棺、外椁，徒然证实的只是我国古代的文明，并不会因为她高贵的身份、贪婪的占有欲而受到人们的尊敬。由于丰财厚葬而诱发的奸心，更不会去考究死者的身份和价值了。老子、杨王孙、皇甫谧诸人，亿万年后也是不会有这种忧虑的，而他们崇高的思想境界，却得到了人们的公认。

（五）结 语

人是不能超越历史的。任何杰出的人物都是历史的产物，受着历史上政治、经济的限制，也受着自身条件的限制。皇甫谧生活在魏、晋交替之际的动乱年代，斗争尖锐复杂。他生于汉末，祖祖辈辈是汉代的重臣。恋汉、思汉、怀祖的思想是很难避免的。但已沦为下层社会的他，是无法改变司马氏篡权禅代、一统天下的

局势，这恐怕是他隐居不仕、托病不出、景仰历代逸士、高士的原因。他鄙视“贵诈贱诚，牵于权力，以利要荣”的狐媚之士，认为“斯皆弃礼丧真，苟荣朝夕之急者也，岂道化之本与？”他为高士、逸士、妇女们立传，也是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为自己立传。从他笔下的大批高士、逸士传中，处处都可看出他的身影。他是在“沉静寡言，以著述为务”、“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乎损益之外，游于形骸之表”中实现他的所谓“全道”的，应该说他是十分完美的隐士。作为一个隐士，是否就是一个聋子，一个瞎子似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呢？我认为皇甫谧也不完全是这种人。不然，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力去作《帝王世纪》呢？他钻研医学，给自己治病就行了，为什么又要写什么《针灸甲乙经》、《依诸方撰》，还去给别人治病呢？他笔下的人物，个个不屈不卑，有智、有才、有谋，个性鲜明，敢于矛头上指，决不是逆来顺受的弱者，这又是为什么呢？皇甫谧不失为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因此，他应享有自己的历史地位。但“金无全赤，人无完人”，自然他身上也有不少的弱点和缺点。诸如在繁多的著述中，很难避免谬误，以及如何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去认识社会的矛盾以及天命论等，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可惜，他的作品和他的生命一样，遭到了许多罹难，使我们无法了解其著作的全部。但是，他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已引起史家们的重视与研究。不久的将来，皇甫谧这个历史人物将以更伟岸、更丰满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杰出的画家、雕塑家戴逵

——·张旭华·——

戴逵，字安道，谯郡铤（今安徽宿县）人，后徙居于会稽剡县（今浙江新昌）。他一生隐居不仕，以从事绘画、雕塑艺术创造为乐，是东晋时期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

（一）热爱艺术，不慕仕途

戴逵出生在一个士族官僚家庭里。他的祖父、父亲都曾仕进为官，有过名位。兄长戴逵，有勇武，多权略，以军功封广信侯，官至大司农。戴逵从少年时代起，就在这个官宦世家中受到良好的教育。史载戴逵“幼有巧思，聪悟博学”；又说他“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①。可见戴逵自幼聪明过人，兴趣广泛，不仅博览经史，喜爱清谈，而且还精通诗文、音乐、书法、绘画等等，表现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

戴逵是一个少年成名的艺术家。十几岁时，他就用白瓦屑掺鸡蛋清制作成一小碑，名《郑玄碑》，自作碑文并镌刻之，时称“词美书精，器度巧绝”，见者莫不惊服。他又曾去建康（今江苏南京）瓦棺寺作画，著名画家王濛见后大为赞叹，说：“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也”^②。王濛不仅是画坛前辈，也是清谈名流，他欣赏戴逵，赞赏戴逵能画，一方面固然是从戴逵具有绘画艺术天才这一角度着眼，但另一方面也是赏誉戴逵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神韵和风采，日后“终当致名”，为清谈名流们所推重。戴逵后来果致高名，而且是名士中隐逸不仕、不慕利禄者。

戴逵在青年时代曾就学于当时的名学者范宣，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范宣字宣子，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人，博

① 《历代名画记》卷5，《晋书·戴逵传》。

② 《世说新语·识鉴》。

学多识，尤善“三礼”，但因不满朝政，屡辟不仕。东晋初年，太尉郗鉴辟他为主簿，后朝命累征为太学博士，散骑侍郎等荣显之职，皆辞而不就。范宣是个勤奋好学，不尚虚夸，乐于贫俭，亲身参加耕作的学者，同时也是个不趋荣华，不贪利禄的隐逸之士。以后他一直隐居于会稽，以讲诵为业。

戴逵不仅崇敬范宣的学问，更仰慕他的人品和为人，于是不远千里，从谯郡来到会稽，拜范宣为师。戴逵师从范宣期间，好学不倦，潜心经典，“范读书亦读书，范钞书亦钞书”，因而范宣很器重他。但是对于戴逵好画，范宣则不以为然，认为绘画是雕虫小技，没有多大用处，主张戴逵应多在经学上下功夫。戴逵见老师对绘画艺术存有偏见，就特意根据东汉张衡文学作品《南都赋》，绘成《南都赋图》一幅，献给老师。范宣见到画后，对戴逵巧妙的构思和出色的绘画甚为嗟叹，他不仅改变了认为绘画无用的看法，而且以绘画为“有益”并转而开始“学画”。就这样，戴逵以自己精心绘制的作品改变了老师对绘画艺术的成见，也显示了自己 在绘画方面的出众才华。从此，范宣更加喜欢戴逵，并把兄女许配戴逵为妻，而范宣不趋荣华，隐逸著述的高尚情操也深深感染着戴逵，成为他效仿的楷模。

由于戴逵多才多艺，才华出众，自然也引起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注意。当时任太宰的武陵王司马晞，听说戴逵善鼓琴，就派人召他到太宰府去演奏。戴逵不愿为这些故做风雅，实际上并不理解音乐，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当权者演奏。他当着使者的面砸坏了心爱的乐器，说：“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拒绝为权贵鼓琴。戴逵不畏权势，拒绝为武陵王演奏，表现出一个艺术家刚强正直和高朗而不降其志的鲜明个性。但是通过这件事，戴逵也看到了东晋上流社会的腐朽和奢侈放纵的风尚，他深深感到艺术创作活

动只能植根于民间，与人民群众密切相连，而不能成为王侯显贵们歌筵舞榭、消遣享乐的工具。自此以后，他“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并携带家人徙居于会稽剡县，过着一种超然绝俗的隐逸生活。

戴逵在剡县隐居时间，一方面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绘画、雕塑等艺术创作活动，一方面又与当时名士郗超、刘惔、谢安、王徽之等人游散山水，谈论书画，因而被世人誉为“通隐”。《世说新语·任诞》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大名士王徽之家住山阴，一天夜里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他在梦中醒来，打开屋门，一边喝酒一边欣赏漫天洁白的雪景，内心猛然涌出一种说不出的彷徨情绪，便朗诵左思《招隐诗》中“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的诗句，不免触景生情，想起了好友戴逵。当时戴逵隐居于剡县，王徽之很想找他畅述情怀，就连夜乘船走水路去拜访他。经过一夜奔波，第二天早晨来到戴逵家时，却不进门，又随即乘船而返。后来有人问他其中原因，王徽之回答说：“我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又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意思是说，尽管没见到戴逵并与之畅谈，但此行已达到同样的效果，使自己在感情上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这个故事既表现出王徽之的旷达真率，自足于情怀，同时也说明戴逵与当时名士们的交游之广，影响之深，故史载其“隐于会稽剡山”，“多与高门风流者游，谈者许其通隐”^①。

戴逵为人胸怀虚旷，不计得失荣辱。据说谢安原来颇轻视戴逵，但仰慕他的高超琴技与书画才能。一次，戴逵从剡县来到京师。谢安去看他。两人见面后，谢安只和他谈论琴书而不及其他，而戴逵却意色自若，全不介意，反而谈琴书愈妙，亦不流露吝色，

^① 《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晋安帝纪》。

谢安“悠然知其量”。本来，谢安的偏执行为，在常人未免羞恼，可戴逵则不计荣辱，也不计怨尤，表现出极深的道德修养，并以其虚旷胸怀博得谢安叹赏。

戴逵一生隐居，不慕仕途。淝水之战后，其兄戴逵以军功封侯，官居显位，宰相谢安曾问他：“你们兄弟二人，一立志隐逸，一建功立业，处世态度何以如此悬殊？”戴逵答道：“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业”^①。表明戴逵淡泊荣利，以隐逸为乐的操守和情趣，太元十二年（387年），孝武帝“束帛”征戴逵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他都以父亲有病推辞掉了。后来王珣为尚书仆射，上疏复请征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戴逵又辞而不就。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东宫，朝廷又以“逵执操贞厉，含味独游，年在耆老，清风弥劭”，准备辟他为东宫僚属。但是没有多久，戴逵就得了重病，并于次年病逝，终年七十六岁。

（二）丹青妙手，画坛领袖

我国的绘画艺术，历史悠久，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相传在虞舜和黄帝时期，我国就已出现有巢氏图圆轮，伏羲氏画八卦和黄帝画茶神以御鬼神的故事。战国至秦汉时期，已产生了绢画和石刻画，绘画艺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但是，汉代的绘画主要是操持在宫廷之手，在宫廷的画室中有画工，被称为“黄门画者”和“尚方画工”，为皇帝所御用。在这些画工中，不无名家，可他们是被宫廷用来表功颂德，

^① 《世说新语·棲逸》。

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唐代著名书画评论家张彦远说汉代所画题材，不外乎“三皇五帝”、“周公孔子”、“忠臣死难”、“放臣逐子”、“淫夫妒妇”、“令妃顺后”等等^①。把画笔限之于人物，人物又限之于帝王、忠臣、孔子一类，这就是独尊儒术的汉朝君主所要求的绘画作品。

魏晋以后，是我国绘画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前所未有的著名的专业画家。如三国曹魏的杨修，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张墨、卫协、荀勖等，皆善绘画，代替了昔日的“画工”。与此同时，人物画大大发展起来，不再限于帝王将相、忠臣烈女、孝子顺孙的圈子，而且增添了新的题材——佛教人物画像，改变了中国人物画的内容；山水画已逐步发展，开始成为独立的画科。到了东晋时期，绘画艺术又踏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众体皆备，绘画理论与专著相继产生，绘画艺术日趋成熟，著名画家辈出。而被南朝齐人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赞誉为“荀（勖）卫（协）之后，实称领袖”的戴逵，就是其中最先崛起的佼佼者。

戴逵一生隐逸，致力创作，在绘画艺术上取得很高的成就。他不仅擅长人物画和肖像画，而且还精于山水画，并创作了不少以飞鸟、走兽为题材的画。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著录，他的人物、肖像画有《阿谷处女图》、《胡人弄猿图》、《董威辇诗图》、《孔子弟子图》、《五天罗汉图》、《渔父图》、《尚子平白画》、《孙绰高士像》、《嵇阮像》、《杜征南人物图》等十余幅；山水、走兽画有《吴中溪山邑居图》、《南都赋图》、《三牛图》、《名马图》、《狮子图》、《三马伯乐图》等等，“并传前代”。此外，与戴逵同时

^① 《历代名画记》卷1《叙画之源流》。

的著名画家顾恺之，在其所著《魏晋胜流画赞》中，也载有戴逵画的《七贤图》、《嵇轻车诗图》、《嵇兴像》、《陈太丘二方图》和《临深履薄图》等五幅作品，而且评价甚高。可惜“纸寿千年，绢寿八百”，戴逵的画皆已亡佚不存了。

戴逵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他把我国古代绘画艺术中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尤其是形神兼备这一点，向前深化了一步。他同魏晋名画家一样，善于抓住对象的性格、气质特征，然后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如顾恺之评品他的《嵇兴像》这幅肖像画说：“嵇兴，如其人。”说明戴逵所画嵇兴像酷似其人，风范气韵毕肖。评品他的《嵇轻车诗图》能完整地捕捉人物的情态，所谓“作啸人似啸人”，充分表现出嵇康“永啸长吟”的精神特征。又认为他画的《七贤图》超过了前人，特别是其中嵇康的像更为传神和出色，世人“莫能及之”。到南朝齐时，著名美术评论家谢赫称赞戴逵的作品是：“情韵绵密，风趣巧拔，善图圣贤，百工所范，尚、卫之后，实称领袖”^①。从这里都可体察出戴逵在捕捉人物精神面貌上所取得成就。

解放后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戴逵绘画艺术成就的极有价值的资料。1961年在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中发现有《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共两幅，分嵌于墓室南北两壁中部，各长2.4米，高0.8米。南壁绘刻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北壁绘刻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先秦高士）四人。八人席地而坐，情态、服饰各不相同，气韵生动，观之可以使人想象“竹林七贤”当年结伴交游的风采。据《历代名画记》记载，“竹林七贤”等是当时美术上极为流行的题材，东晋的戴逵、顾恺之，南朝的

① 《古画品录》。

陆探微、毛惠远等人都画过《七贤图》，但戴逵是最早的作者，谢赫《古画品录》则说戴逵“善图圣贤，百工所范”，更明确提到当时民间匠人所制作的《七贤图》，大多是临摹戴逵样本而来，其中虽不免在复制和再创作时加些改动，但基本造形和布局仍大体保留了戴逵原作的风貌。因此南朝墓中民间工匠所作《七贤图》母本，应与戴逵有较直接的联系，其源流出自于东晋。以这一作品来了解戴逵的《七贤图》及其绘画风格，可以获得有关戴逵绘画成就的感性认识。

砖刻壁画中的“七贤”与荣启期等形象，既表现了他们放浪形骸、不拘礼法的行为与癖好，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内在气质、道德修养和性格特征。如嵇康头梳双髻，赤足而坐，双手抚琴，抬头傲视远方，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及其高迈绝俗的性格。山涛则是头裹巾，赤足屈膝而坐，他一手挽袖，一手执耳杯，坐前有一瓢尊，意在抒写他饮酒八斗不醉的神态。王戎别有一番情趣，他一手靠几，一手玩弄如意，仰首而曲膝，坐前亦有瓢尊、酒杯，意在描绘他不修威仪欲作如意舞的神态。其他如善作长啸的阮籍，沉着好思的向秀，嗜酒成癖的刘伶，旷达不羁的阮咸和鼓琴而歌的荣启期，也莫不刻画得神态逼真，各尽其妙。整幅画面，正如谢赫所说，呈现了“情韵绵密，风趣巧拔”的情趣。这幅墓室壁画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是驰名中外的艺术珍品。

戴逵不只是在人物画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在山水画方面也很有创造。他所画的《吴中溪山邑居图》，就是早期山水画中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顾恺之评品他的《嵇轻车诗图》不仅“作啸人似啸人”，而且“处置意事既佳，又林木雍容调畅，亦有天趣”，是山水画的上乘佳作。张彦远也说戴逵所画“山水极妙”，评价很高。这些都说明戴逵在我国早期山水画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和东晋时期的另一著名画家顾恺之一样，同是我国山水画的先驱者。

（三）雕塑佛像，独步江东

东晋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佛教艺术的兴盛，佛教造像艺术也勃然而兴。戴逵不仅精于绘画，更以擅长雕刻和铸造佛像而知名。他一方面继承了汉魏以来的雕塑艺术传统，另一方面又对外来的佛像雕塑进行改革和创新，使之朝着中国民族风格方向发展。因此，戴逵在佛教雕塑艺术中国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是我国佛教造像的重要奠基者。

佛教起源于印度，两汉时期开始传入我国。但是直到东晋初年，各地寺院供奉的佛像多是从西域东来，即使民间有仿制佛像，也谈不上艺术。我国佛教造像成为一种艺术，是从戴逵开始的。据史书记载说：“自汉世始有佛像（得自西域），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①。可见佛像至戴逵时形制始工，也就是说才真正成了一种艺术。

戴逵有巧思，善铸佛像及雕刻，但他并不满足于传统雕塑艺术的朴拙，而是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不断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的源泉。一次，戴逵制作了一尊六丈高的无量寿佛木像，构思巧妙，风格古朴，许多人都称赞塑得好。可戴逵经过反复观察，认为雕像的感情表现得不够充分，艺术感染力还不够强，就决定继续修改。为了将雕像刻画得更细腻，他主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但

① 《宋书·戴逵传》。

是，他发现别人总是说好的多，说缺点少。于是，戴逵想出一个办法，他每天躲在佛像后面的帷帐中，悄悄地偷听观众的议论。参观的人看见戴逵不在场，说话就比较随便，意见就比较直率，既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戴逵都一一记在心里，然后再对这些意见进行分析，决定哪些地方该改，哪些地方不改。就这样，戴逵“潜坐帷中，密听众说，所闻褒贬，辄加详研”，经过三年的悉心研究，反复修改，终于制成了一尊具有中国民族风格、观众无不佩服的完美佛像。

戴逵所制的无量寿佛木像和旁侍两大菩萨木雕，后来被迎至于会稽山阴灵宝寺，其雕制之精巧，技艺之纯熟，形制之柔美，不仅显示出当时雕塑艺术达到的最高成就，而且也受到艺术界名流的普遍赞扬。在《法苑珠林》里，唐道宣对这一作品有如下论述：“自泥洹以来，久踰千祀，西方像制，流式中夏。虽依经镛铸，各务髣髴。名士奇匠，竞心展力，而精分密数，未有殊绝。晋世有谯国戴逵，字安道者……机思通赡，巧凝造化。乃所以影响法相，咫尺应身，乃作无量寿挟侍菩萨……覈准度于毫芒，审光色于浓淡，其和墨、点采、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客象楮之妙，不能逾也。委心积虑，三年方成，振代迄今，所未曾有”。由此可见，戴逵的作品所以被看成是杰出的中国式佛像的代表，是由于他不满足于以前那些虽然“依经镛铸”，“精分密数”，而仍旧“古制朴拙”，“不足动心”的作品。在吸收外来艺术时，他不是停留在“髣髴”（模仿）外来样式，停留在固定的量度仪轨上，而是善于从生活中汲取营养，运用他通赡的机思，来巧凝造化。并且根据本民族的欣赏要求，依据群众的爱好和想象，来丰富自己的创造力，从而在和墨、点采、刻形和镂法等方面都取得了超迈前人的辉煌成就，雕塑出具有民族风格，深受群众欢迎的佛像来。唐

道宣称“东夏制像之妙，未有如上之像也”，并非偶然。

戴逵在建康瓦棺寺作的佛像五躯，也是佛教造像的杰出作品。据史书记载，晋安帝义熙初年（405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曾派使臣献玉佛像一尊，“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①。这尊玉像后被放置于瓦棺寺，与该寺珍存的戴逵手制佛像五躯、顾恺之绘制的维摩诘壁画，并称为“瓦棺寺三绝”。

戴逵制作的佛教造像所以具有民族风格，受到人们的赞许，还在于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不断地探索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世说新语·巧艺》有这样一段记载：戴逵中年时画佛像画得很好，但庾敳看了却不以为然，说：“您画的佛像神情太俗了，可能与您本人没有脱俗有关吧？”戴逵回答说：“您所说的‘脱俗’，只有古代隐者务光才能做到，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庾敳评论戴逵所画佛像“神情太俗”，也就是说他画的太像现实人物了，意在讥讽戴逵虽是隐士，但却没有超越世情而脱俗。戴逵则认为生活在世情中的人，不可能脱俗，虽然是隐士亦不能脱离世情。传说商汤时有个隐者务光，商汤想把天下让给他，他不愿接受，说：“吾闻亡道之世，不践其土，况让我乎！”并负石自沉于洺水。戴逵说只有务光才能做得到没有世情和脱俗，这正是对庾敳的批评，同时也表明他是有意识地在宗教形象中赋予现实人物的思想性格，是在通过宗教艺术，曲折地反映他对现实的认识和探求。戴逵正是以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及其美学思想，揭示了当时雕塑艺术发展的面貌，以及佛教造像艺术达到新的水平的原因。

由于戴逵善于细致地观察，精心地构思，广泛地听取群众意

① 《梁书·师子国传》。

见，不断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的源泉，因此他在佛教造像艺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是当时艺术界的一个大胆的创造者。与此同时，他在雕塑技术上也敢于创新，并发明了“夹纮造像法”。魏晋以来，佛教造像主要有铸铜、木雕、石刻、泥塑等等，夹纮则是东晋以后新兴的造像手段。所谓“夹纮”，就是一种干漆造像技法。其工艺是先借木胎泥模塑造出底胎，再在外面粘贴纮麻布数层，布胎上髹漆并县彩绘，等干了以后，除去泥模，就成了中空的漆塑像，又叫“脱胎”或“脱空(sāi, 音塞)造型”。从史书记载来看，我国最早制作夹纮造像的就是戴逵。据说他在建康瓦棺寺手制的佛像五躯，就是采用的夹纮造像法。这种造像很轻便，宜于携带般运，所以又称为“行像”。因此，把油漆技术和髹饰工艺创造性地运用到雕塑方面，应是戴逵的独创和发明。南北朝时期，夹纮造像已十分流行。到隋唐以后，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夹纮造像又逐渐传播到了日本。

戴逵的绘画和雕塑才能也直接影响到他的两个儿子。其长子戴勃擅长山水画，次子戴颙在雕塑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史载戴颙年青时就常常帮助父亲雕塑，后来他把佛教造像和传统艺术进一步结合起来，发明了佛教雕刻“藻绘”法，对雕造技术有所发展。戴颙在巨大佛像的制作上有丰富的经验，他对佛像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佛像的造型都有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成就。一次，宋世子在瓦棺寺铸丈六金像，像成后发觉头面瘦小，工匠们都没有办法再加修改，便请戴颙前来审视。戴颙看后指出，并不是面颊太瘦，而是臂胛太肥，照他的意见修改，削损臂胛，佛像头身果然显得十分对称，形象变得雄伟壮观。因此，当时人都叹服他的艺术修养，认为他“巧思通神”，“天机神巧”。

由于戴逵、戴颙父子在雕塑艺术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所以

唐代曾有“二戴像制，历代独步”的美誉。历史上所以这样重视戴氏父子的成就，显然是和他们在佛教艺术上的创造，特别是在佛教艺术中国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分不开的。唐人张彦远认为以前的佛像“以形制古朴，未足瞻敬”；至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释氏，范金赋采，动有楷模”^①。自此以后，由于不同艺术家的创造，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流派和风格，从而推动着我国佛教艺术的不断发展和繁荣。因此，戴逵以其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仅在艺术上有所建树，而且给后人以深刻的影响，不愧为我国四世纪杰出的画家和雕塑家。

^① 《历代名画记》卷5。

陶渊明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文醉仙·——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陶渊明怀着舒坦而急切的心情要回老家去了。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终于下定决心摘下刚戴上八十天的“乌纱帽”，告别官场，告别彭泽县（今江西湖口东），要回到故乡去过那“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耕耘，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

诗”的田园生活了。

这果断的决策，对陶渊明来说是痛苦的，还是愉快的？是明智的，还是愚昧的？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不管是当时的人，还是现代的人，也不管是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背景来说，人们对他的议议论论、评评点点，不知道有过多少，但他那悠闲自得，向往自由，不辞贫贱，醉心诗酒，刚正不阿的个性和形象，在历史长河的洗礼中越来越显得清晰、明朗。清朝龚自珍在读陶氏的《归去来兮辞》后，深有感慨地叹道：“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竞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甘蛰仙也曾很牵强地说：“陶渊明——中国的托尔斯泰”^①。哲夫更是赤裸裸地指责：“酒鬼陶渊明”^②。赞颂也罢，批评也罢，责骂也罢，但这个生活在 1500 多年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古代士人竟以“短褐穿结”、手扶锄柄的姿态，冲出神州，走向世界，进入洋人的视野和思想、文学领域里了。自然在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学领域里更是反响剧烈。自隋唐以来，论者纷纷，评者济济，连篇累牍，推波助澜，有如浩瀚大海。而他那梦幻中的理想王国——桃花源，在改革开放后“旅游热”不断高涨的今天，已经不再是与世隔绝的仙界。当如蚁的游人穿梭于盛开的桃林中的时候，人们禁不住都在呼唤——陶渊明，这熟识的名字！桃花源，这令人神往的地方！

① 《晨报副刊》1992 年 11 月 18 日。

② 《世界日报》副刊 1927 年 7 月 18 日。

（一）更名之争与动乱世纪

陶渊明，又名陶潜，字元亮，是晋朝大司马陶侃的曾孙。祖父、父亲都做过小官吏，也许是政绩平平，无甚建树，因而名不见经传，就是从陶氏自己的诗文中，也难寻觅出确凿的史料，描出清晰的轮廓来。按照“渊明”的“渊”字，是表示深邃的意思，“亮”是明的意思；“渊明”与“元亮”意义又相近，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取名的一条惯例，是可以信赖的证据。他为什么又叫“潜”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叫“潜”呢？于是，史家们就多了一个议题，在有关他的年谱中，议论此事的多达数十种。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檀道济是与陶渊明同一时代或略晚一点的人，当他做了江州刺史后，正值“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去看望陶渊明，见他贫病缠身，潦倒不堪，似乎动了怜悯之心，便劝说道：“贤者处世，天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究竟当时是否属于“文明之世”？陶渊明与檀道济的认识大相径庭，因此，不但没有接受他的意见，领受他的馈赠，还写了二首《感士不遇赋》的诗道：

其一：或击浪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

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

其二：

密网裁而渔骇，宏罗制而鸟惊。

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并以“潜”之隐名回绝了檀道济的相邀，表示了逃避纷纭世态、彻

底退隐的意愿。于是陶潜之名始也。

另一说他是在刘裕篡位改国号为“宋”之后才更名为“潜”的。这是为了表示“耻事二姓”的态度。如果真如以上所述，这也不算陶渊明的独创，与他同时代隐居于庐山的刘程之进入宋后，就改名刘遗民，也就说自己是晋朝的遗民，陶氏究竟更名与否？是何动机？在陶氏自己留下的诗文中没有作出说明。黄鲁直在《宿旧彭泽怀陶令诗》中（内集）云：

“潜鱼愿深渺，渊明无由逃。

彭泽当此时，沈冥一世豪。

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

凄其望诸葛，肮脏犹汉相。^①

又有人说陶渊明所作的诗文成篇于晋代，都署年号，成篇于晋亡后的，只署甲子，如此等等。都是后人从有关的史料耙疏、剖析中而得出的结论。不过陶渊明所处的时代，对他的一生的确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在政治风云瞬息幻变的时刻，他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究竟如何呢？

陶渊明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这是一个大分裂、大混乱、大动荡的年代。整个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乱不已，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北方，在匈奴族刘聪推翻西晋之后，羯、氐、羌、鲜卑等族相继起兵，各据一方，经过了

^① 《陶渊明年谱》第268页。

史称“五胡十六国”的分割时代后，直到鲜卑人拓跋氏建立北魏、吞并北凉后，北中国才再度统一，进入到南、北朝分裂时期。此后，北方各族的统治者，仍经常发动对南方的骚扰与进攻。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虽面临着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但统治阶级内部却不励精图治、团结御侮，反而因循苟且，沉湎于江南水乡山色的安乐享受之中。对于收复失地的事业，从未真正下过决心。掌握军事大权的将领们，都忙于扩大个人的势力，以勾心斗角为能事，致使少数有志于恢复北方失地的爱国志士如祖逖等人行动受阻、受挫。尽管有过淝水之战大败苻坚一仗的胜利，但不久又因内乱继起，收复失地、统一全国的美好愿望再次化成泡影。

没落的东晋王朝是依靠士族支持而建立起来的偏安政权，也是门阀之风特盛、士庶之别极严的特殊年代。中央的主要当权人物，掌管着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权，操纵着国家的命脉和前途。一方面尽情挥霍，过的是“蒲酒永日，驰骛卒年。一宴之饌，费过十金；丽服之美，不可赏算。盛狗马之饰，营郑、卫之音，南亩废而不垦，讲育阙而无闻”^①的极端腐朽的生活；一面又残酷压榨和剥削劳动人民，赋税、徭役空前奇重，造成“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避就，不避幽深”^②、“民疲田荒，杼轴空匮”、“……童蠶夺养，老稚服戎”^③的惨状。这种竭泽而渔的凋蔽景象，为暴发农民战争准备了条件。而一批所谓“寒门”、“庶族”的中小地主阶层，虽占有少量土地，他们一方面对农民进行剥削，一方面又要向国家缴纳赋税，他们不能具有与士族有生俱来的爵禄，没有上升为士族地位的特权，相反还时时受到上层集团的排斥与打

① 《晋书·范宁传》。

② 《晋书·刘毅传》。

③ 《宋书·武帝纪》。

击。这个阶层的知识分子，被称之为“贫士”或“寒士”，士族豪门和庶族平民之间，壁垒森严，甚至在服饰、车骑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陶渊明就是这个阶层的代表之一。因而，迫使他对待统治阶级的权力之争，统治阶级与农民起义之争抱着观望的态度了。后来统治阶级的矛盾发展到既有帝室之争，也有帝室与大族之争，这就引发了东晋末年以孙恩、卢循为首的农民起义反抗斗争。历时十二年的这场农民暴动遍及南方各主要地区，给东晋政权以沉重的打击。面对风起云涌的反抗怒潮，残暴的统治集团采取了血腥镇压，官兵所至，烧杀抢掠，十室九空。更丧失了收复北方失地的、统一全国的人力、财力基础。随后，又有桓氏企图篡夺政权之举。桓玄篡位之后，又有刘裕挟兵逼禅位之事，这就使得本已糜烂不堪的东晋王朝陷入彻底覆灭的境地。陶渊明就生活在这动乱多变的年代。他的一贯思想主张和追求的目的是盼望尧舜之世再现，天下统一，朝政清明，人民安居乐业，人人各得其所。自己也能“猛志逸四海”，使国家不断富强，天下得以太平。然而遭时不遇，理想和抱负根本不可能实现。他对东晋王朝糜烂不堪的政权万分厌恶，宁肯挨冻受饿，也要坚决归田，很难说有眷恋的犬马之情。桓玄是恒温的儿子，十分自负，善于玩弄权柄，他是通过各种手段攫取到了荆、江二州刺史和荆江八州军事大权的。对于他的为人，陶渊明十分了解，对于他的挟权篡位，并无拥戴、助桀为虐之意。刘裕集团崛起以后，曾有过征讨桓玄和北伐的短暂胜利，陶渊明曾对他萌动过一时的希望与喜悦，但很快就看出他急于篡权逼禅的苗头，对他诛杀异己的行为感到十分失望。看到他所推行的，仍然是一条维护新、旧士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路线，所代表的仍然是统治集团的极权利益，同样不是他理想中的圣君贤臣。孙恩、卢循所领导的农民起义阶层，虽然对东晋王朝给予

了沉重的打击，给士族官僚，特别是谢、王两家给予了惨重的教训，但这种拉锯式的反抗斗争，给社会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赶上这个令人诅咒的年代，已看不到光明了，又由于自己社会地位低下，虽有大干一番的雄心，又怎能插足进去呢？又哪来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呢？面对严峻的、矛盾丛生的现实，陶渊明的思想能不复杂、能不痛苦、能不翻腾吗？“潜”名也罢，“潜”身也罢，他只能作出无可奈何的“归隐”决策了。

（二）四番出土与几度归田

在封建社会里文人要想展才济世，便要做官，而且要作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虽然出身寒微，但却是晋朝的大臣。他有着勤于政务，关心民瘼的好作风，与当时士族官僚骄奢淫逸、不屑繁琐的吏治作风迥然不同。祖辈的遗风，自然是陶渊明心中的偶像。从他的“忆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诗来看，就可知道当时就抱有济世的愿望。当他二十九岁第一次走出家门的时候，只作了一个“州祭酒”的小官。“祭酒”在晋时是掌管兵、贼、仓、户、水、铠等杂务的人。陶渊明学问渊博，志意高远，干着这种勤杂人员的活计，不是太屈煞人才了吗？但由于出身庶族，决定了他的出路。要越过这道铁丝网，必需要靠阿谀逢迎、竭尽巴结之能事才能达到目的。而陶渊明又是一个宁折不弯性格的人，耻于干这种勾当。再说这种“祭酒”小官，上面有的是管束的公婆，他受不了这种束缚和折磨，没过多久，就“辞官”归田了。在这番出仕时，他在《饮酒二十首》中感慨地写道：

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
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他所耻的是什么呢？不外乎官位太小，无法遂愿；也耻于巴结奉迎，丧失气节。陶渊明既然是饱读诗书，心怀尧舜，大济苍生的人，决不会因为仕途上第一次受挫就灰心丧气。于是，又于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来到桓玄幕下做了一名镇军参军。但到任不久，便又感到厌倦与苦恼。他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时写下了：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
山川何一旷，巽坎难与期。
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
静念田园好，人间良可辞。
当年诤有几，纵心复何疑！

在为桓玄办事的过程中，他产生了“静念田园好，人间良可辞”的思想，这不仅是军旅生活给他带来的许多不安定的因素造成的，更重要的是他已察觉到桓玄桀骜不羁的勃勃野心后，所产生的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

正当诗人犹豫之际，母亲病故了，他借丁忧的名义，离开了桓玄。从投靠桓玄到急急离开桓玄，这里有个认识的过程。前期的桓玄，在人们的心目中，并不是一开始就以一个乱臣贼子的形象出现的，而是一个颇具其父桓温雄豪之气的人。也有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大耻载雪，饮马灞浐，悬旗赵

魏的气概。他也确曾指责过“权门日盛，丑政日繁”的政局。在他主持朝政时，也曾有过“去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初备，京师欣然”^①的短暂景象。特别是他批判佛教、限制寺院经济发展的主张等，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也为陶渊明所欢迎。陶渊明为了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来到了桓玄的幕下，原是满怀希望的。但随着时局的发展，桓玄走上了“凌辱朝廷，幽摈宰辅，豪奢极欲，众务繁兴”^②的道路，在他还没能弄得“朝野失望，人不安生”^③时，陶渊明就敏感到此人发展下去的前途是可悲的，便果断地离开了他。这不正是陶渊明“识迷途未其远，觉今是而昨非”的一个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举措吗？

第二次在官场碰壁之后，陶渊明的济世愿望仍有增无已，他在《荣木》一诗中写道：

先师遗训，余岂之坠。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此时的陶渊明不仅没有心灰意冷，反而增加了为官的紧迫感。想到自己年近四十，再不驱车策马去施展抱负，就要耽误最佳年龄了。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再次来到刘裕的麾下，做了一名参军。

在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既是一般读书人攀龙附凤的进身之阶，也是他们贡献才智的必由之路。陶渊明在仕途漫步，探索，多么想找个安身立命、施展才智的处所啊！封建时代的官吏，虽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了巩固

①②③ 《晋书·桓玄传》。

自己的权势，总是惯使残害异己的手段，刘裕和桓玄没有两样，他利用广大群众对东晋王朝和桓玄的不满，打着“革弊拯民”的旗号，收揽民心，扩充势力，成其霸业以后，打败了桓玄，恢复了京邑，被满朝文武推为都督八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州刺史之后，立即露出了狰狞的面目。面对这个沾满了镇压农民起义军鲜血的地主集团首领，仕与隐的矛盾又撞击着陶渊明的心扉。他在《始作镇军参军经阿曲作》诗中写道：

.....

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

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真相初在襟，谁谓形迹拘。

聊此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回首走过的道路，无异是对自己初出为仕的思想一个讽刺和打击。既然济世展才无望，而为官作吏又如此不自由、受束缚，真正的贤明圣主在哪里？自己劳碌奔波是为了什么？他觉得刘裕又不是他理想的圣君，倒不如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为最好。但是，这次他没有马上回家，却来到了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麾下，又当了一名参军。不久刘敬宣出于某种无法再拥兵自固的原因而自表离职，陶渊明也就顺应这一形势而归田了。

陶渊明第四次出仕是作彭泽令，时间很短，前后只有八十天。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是为什么呢？按照陶渊明的阶级出身来说，既然是属于没落官僚，本有家宅田园。虽不十分阔绰，还是住食有着的。那种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思想时时蹦了出来，支使他作出意想不到的决策。陶渊明几次出仕，又都属于

小官吏，也没聚攒多少家资，从他的个性来说，也不可能是巧取豪夺的人。既然打算要隐退，总得要为日后的衣食着想，作些物质的准备才行。因此，费尽周折谋取到了离家不远的“彭泽”做了一名县令。这次出仕的目的就是“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他还打算将公田全部种上粳米，以酿酒备饮。因为他的妻子反对，劝他也要种些粮食，才决定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米，以实现他“吾尝醉于酒足矣”的美好打算。这次赴任正值岁末，美好的打算还没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碰上了倒霉的事。据说有名督邮前来视察，旁人提醒他“应束带见之”，陶渊明一听心里不高兴，督邮算什么人物？乃乡里小儿。我怎么能为五斗米折腰呢？恰在这时，住在武昌的妹妹病故了，伤逝之中便挂冠赴丧，这便成了他仕途中的最后一站。他从二十九岁起出仕，到四十一岁归田，前后共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仕与隐的矛盾贯穿始终，而且越往后斗争越激烈，使他感到违己交病，度日如年，还不如回去种田。正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一个“猛志逸四海”的有理想、有抱负、慷慨激昂的青年，最后痛苦地作出“觉今是而昨非”的结论，回到自己的老家了。

“不为五斗米折腰”，似乎成了陶渊明归隐的导火线。“五斗米”的县令一职对陶渊明来说，也不是轻而易举可以拿到手的“乌纱帽”，也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任性之举。从他的《归去来兮辞》一文来看，其彻底归隐之意由来已久，而且是经过了一场曲折的、复杂的、甚至是痛苦的实际体验之后而作出的决策。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经是东晋“腰妾数十，家童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①的大富豪、大官僚。曾几何时，其子孙或因

① 《晋书·陶侃传》

罪被诛，或自残而歿，万贯家财，顷息而没。从世系家族史中，他
能不吸取一些教训吗？他虽然没有得到过祖业的余荫，但还有可
以维持中上水平的家产，犯不着再去扩充多少家产而增加自身的
累赘。因而，从经济角度来说，是具备了归隐条件的。特别重要
的一点，他虽不是名门望族，但还是书香后代，自称是“好读书
不求甚解”的人。但从读书、学史中，使他具有对现实生活敏锐
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也具有了中国文人不戚戚于贫贱，不
汲汲于富贵的气节。他面对混乱世纪是有足够思想准备的。陶渊
明在世的几十年，三易朝代，几经废立，每一变更，无不伴随着
一场大清洗和大屠杀，因而他才发出了“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
而鸟惊”^①的感叹。一个既无靠山，又无高位，更无实权的文弱书
生，能有多大能量去参与这种政治角逐，又有何种办法去改变这
一腐朽透顶的政治局面呢？据说刘裕篡位后，曾派人送来秘信相
邀，他没有去。后来又有人邀请他当较高职位的“著作郎”，他也
没有去。这就可以看出他的归隐自认是明智之举。汉、晋之间，隐
逸之风很盛。政治追求上的幻灭，对上层当权者的失望，更是陶
渊明隐逸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他素读孔、孟之书，深受儒家
思想的影响。孔子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②思想
自然就成了他的行动指南。根据《光明日报》1993年3月29日黄
炳麟关于《五斗米辨趣》一文的考证，认为处于经济困境的陶渊
明，丢掉的是日俸五斗米，还有近百文钱收入可观的较好“官
位”，去过那铮铮傲骨的清贫生活，是他受到儒家学说影响的结果。
儒家的始祖孔子，济世不成，退而讲学，培育了弟子三千，贤人

① 《感士不遇赋》。

② 《论语·卫灵公》。

七十有二；孟子济世不成，退而著书，便写出了《孟子》七篇。陶渊明济世不成，便退而归田。归田以后，写了不少瑰丽的诗文，在中国文坛上闪烁出异彩。他像一只摆脱罗网的“羁鸟”和“池鱼”，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开始了更有意义的耕读生活。因此，不难看出陶渊明的归隐，绝非一时感情冲动或意气用事，而是经历了宦海沉浮、长期深思熟虑、权衡轻重后的抉择。

（三）世外桃源与批判、反抗的曙光

《桃花源记》是闪烁在中国散文领域里的灿烂篇章，约成文于东晋太元中（376—396年）。它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描绘出一个既没皇帝又没有官员；既无阶级又无剥削；人人劳动、团结友爱、生活安定、“怡然自得”的理想社会。正是他对这个理想社会的描绘，勾引起千余年来人们的向往与追求。

桃花源在哪里？桃花源里真是这样美好吗？回答是否定的。那么，陶渊明是在有意捉弄人吗？回答也是否定的。我们应该透过这篇优美的文字、逼真的记述去探索陶渊明内心的追求，去探索当时社会的征结。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么绮丽的风光能不诱人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又是何等安定舒适的地方？然而，这个“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世外桃源，却只藏在陶渊明的心里，它是陶渊明对腐朽没落时代燃起的愤怒感情凝聚的反抗炮弹。

撩开历史的帷幕，来看看晋末宋初社会的真实面貌吧。东晋王朝在失陷了中原之后，偏安江左，腐朽的统治阶级集团却不顾人民的死活，在内部进行着权利的争夺，使人民长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兵灾、水灾、旱灾和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逼得人民大量逃亡。加上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对汉民族的残酷掠夺与屠杀，更加剧了人民的逃亡现象。一时“晋人避乱”、“道路相属”^①到处呈现出一片“井灶有遗处，桑竹残腐株”，“荒涂无归人，时时见废墟”^②的景象。人们为了苟全生命，便逃入深山老林，选择一块深险平坦的地方，从事开垦者的艰辛劳动，以供养父母子女。这就是陶渊明所指的“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的原因。池鱼思故国，归鸟恋旧林，这是人们共同的心意。这些逃入深山绝境的人，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即使是陶渊明弃官之后，也还是乐于回到那贫瘠的故园去。世外桃源的出现，是对当时社会的一次暴光。桃花源里的安详与狼烟滚滚、血流飘杆的现实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正是陶渊明憎恨黑暗、向往光明思想的自白吗？

那么，陶渊明既不是身负改革的社会家，也不是大量逃亡的向导者，他为什么要设想出一个这样美好的“理想王国”来呢？这要从他一贯的思想体系和切身的生活体验来认识。

这个理想王国的特点，首先得从政治上看。正如王安石所说的：“桃花源是一个虽有父子而无君臣”^③的、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其次，这里是一个“秋熟靡王税”的、没有经济剥削的乐园。再次，这里是一个“相命肆耕农，日入从所息”的人人

① 《资治通鉴》113卷《晋纪》35卷。

② 《晋书·刘毅传》。

③ 王安石：《抱朴子·潜确篇》。

参加劳动、地位平等，并得到了休养生息的集体。然后，是表现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充满愉快生活的地方。最后，表现为“淳薄既异源”，是一个没有欺诈的社会。这样的理想社会，在古代世界文学史上，还没有人作出过这种设想。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学在六经”，自然接受过古老文明思想的影响，但又没有禁锢在这种思想领域中。老子是一个反对剥削、压迫的古代思想家，他提出过一套“小国寡民”的理论，老子的主张是让人民再去过复古、倒退的苦行僧生活，即“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兵甲，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① 存在决定意识，人们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已经获得的物质文明，而去过那种复古倒退的生活呢？而桃花源里的这幅政治图景，是一个“相命肆农时，日入从所息”、“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的社会，这与当时社会的物质文明生活基本一致，是一个互相关心、共享共乐的社会。即使见到了外来人，也“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而且每一家都要“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热情款待渔人，这是一个充满淳朴友谊的社会乐园，有幸来这里作客的渔人，自然感到这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它比老死不相往来的设想要先进得多。老子的设想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只能证实他对现实斗争的无可奈何；陶渊明设想的桃花源，却反映了人们经过抗争获得了的胜利果实。

《桃花源记》里，也确实存在“大同”的思想影子。《礼记·礼运篇》提出了一整套理想社会的影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① 《老子·道德经》。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壮有所用，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贼乱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不同”。这一套保持原始社会影子的学说，是主张社会财富共有共享，反对少数人垄断劳动成果，人人劳动，主张各食其力，反对侮诈权谋，互相倾轧。但这只是抽象的理论。而桃花源里的男女老少，各得其所，是人人相处得很好的太平乐园，是倍受剥削、倍受杀戮的逃荒者的普遍希望与渴求。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也是玄学与佛学思想盛行的时代。他们宣扬以无为为本，并以这种唯心主义理论去为门阀士族统治者服务。要求人们忍受现实中的苦难，以便死后到幸福的极乐世界中去。这种从反动统治阶级立场出发，大肆宣扬并不存在的所谓“天国”，实际上是一种“麻醉剂”，其目的和结果，只能是取消人民的反抗。在陶渊明看来，这种政治上的压迫与经济上的剥削，不仅不合理，而且应该设法摆脱；人们的理想王国不应该是死后到天堂里去寻找，而是在生前，在人间。于是，为了摆脱这种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才有“避秦时乱，来此绝境，不复出焉”的举措。东晋时的道安和与陶渊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慧远，均是当时影响很大的高僧，他们大肆宣扬“顿悟成佛”的教义。所谓“顿悟成佛”，是说无论作了多少坏事，只要后来觉悟了，便可立地成佛，陶渊明也到过庐山，与慧远有过往来，他不仅拒绝了慧远这种逆来顺受的教义，而且是鼓励人们去开创桃花源那样的乐园，去追求无剥削、无压迫的生活，这无异于拉响了批判“顿悟成佛”这种唯心主义理论的炮弹，显露出它的积极意义和进步性。

因此，《桃花源记》里所描绘的理想王国的产生和形成，是深

深植根于陶渊明生活时代土壤之中的、政治的也是文学的作品；它所反映的无君论思想，是陶渊明面对战乱频繁、政治腐败、生产凋蔽、生灵涂炭而引起的严肃思索。早有“大济苍生”之志的陶渊明，在这乌云蔽日的时候，自然会想到暴君踞万民之上，只会制造压迫、剥削、饥饿、死亡，倒不如不要皇帝，不失为一条改革的、现实的、求生存的出路。然而，桃花源只是陶渊明笔下闪光的思想篇章，即使逃避到了山林中的遗民，要进入到这样一个理想境界，也不知有多大的难度。刘禹锡在游罢桃花源后慨然叹道：“桃花满溪水似镜，尘世如垢洗不去”，因而“渔人振衣起出户，一刻不肯桃源住”^①，也就深刻地指出：即使有“世外桃源”，也无法洗去那种污浊的现实社会现状，只有斗争、革新，才是真正的出路。不然，世界将永远会是“仙家一出寻无踪，至今流水山重重”的结局。即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刘子骥，虽终身不仕，也不能摆脱尘世的纷扰，以至抑郁而死。

《桃花源记》约成文于陶渊明的晚年，这是他经过生活折磨和对现实深入观察与感受之后在脑子里构想出来的生活蓝图，也是为了批判和否定当时丑恶社会而幻想出来的理想王国。它是从客观上树起的一面批判，反抗的大旗，是当时广大农民思想的一种反映，闪烁着人民性。因此，它也是陶渊明坚持真理、积极探索人类美好未来生活的结晶，是在污浊社会中开辟的一片净土，启示着、影响着后代许许多多的正直的人。

^① 《桃源行》。

(四) 清贫自守与自况、自白、自祭

清贫“自守”，是陶渊明一生严格遵守的一条生活准则。他虽然没有做过主宰整个社会的大官，即使是做彭泽令时，也只是想积攒一些钱米为退隐后的物质生活作准备。因此，他始终是处在贫困线上的。陶渊明归田的时候，还有“童仆”替他种田，有饭吃，有衣穿，也有酒喝。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鸣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是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田园宅”。其耕地也有被称之为“西田”、“南亩”、“下巽田”、“西畴”等，是接近中小地主水平的人家。从彭泽归来后，“还在开荒南野际”，并取得了“我土日已广”的垦荒结果。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可以“优哉游哉，可以卒岁”的经济基础，他才毅然抛弃仕途，归隐田园。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陶渊明醉心于田园生活的时候，却遇上了一场大火，把这苦心经营起来的家财烧个精光。

正夏长风急，林家正烧燔。

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①

房子烧完了，只好临时移居到船上。加上连年的水灾、旱灾、兵灾，逼得他只好再次迁居到当年的故居“南村”。好在他对南村同样富有眷恋之情：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①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
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①

继续过着他那安贫乐道的生活。但这时他的实际生活水平已经大大地降低了。竟至出现了断酒、乏食的情况，也出现了许多叙述贫困潦倒的作品。如他在《乞食》中写道：

饥饿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
衔载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在这一严肃的现实面前，陶渊明遵循着一条安贫乐道的原则，仍不愿出山再仕。他耳边鸣响着：“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的格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古代贤士、隐士的身影，也时时出现在他的眼前，成为他励志的榜样。早年他不慕虚荣，不逐私利。中年以后，思想上虽出现过“贫病常交战”的矛盾，但总的来说，安贫乐道是他自始至终坚守的信条。他在《咏贫士》中写道：

① 《移居》。

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
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
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
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
惠孙一晤叹，腴赠竟莫酬。
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

个人守穷，全家受苦，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意志的考验，但他认为“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纵观历朝各代，贫富、荣辱的确是因时而异、互相转化的。只有襟怀豁达的人，才不为荣衰所羁绊。陶渊明不仅自己坚守清贫，还巧妙地讽刺那些追逐名利的人道：“富贵诚足贵，亦复可怜伤”^①，辛辣地嘲笑一切攀高结贵，显赫一时的人物的愚妄，到头来还是逃脱不了可怜亦可伤的悲惨结局，因此在极端潦倒的时候，他仍几次拒绝出山任仕的邀请，甘愿过“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清贫生活，坚守着文人的气节，毫不动摇，决非易事。

自古以来，“学则优”、“优则仕”的思想束缚着所有的文人。无数文人达士，在生命的旅途中，谱写过瑰丽的篇章，雄踞过显赫的高位，建立过耀眼的丰碑；也有不少文人，蒙受过无端的陷害、杀戮，颠沛于茫茫的歧途。有韵的《离骚》，不正是屈原蒙尘受屈、伤心痛苦时发出的呼号吗？无韵的离骚《史记》，不正是司马迁遭受迫害时，在狱中以饱蘸血泪的笔写成的经传吗？陶渊明在十三年的仕途颠簸中，头脑清醒，眼光锐利，适时而止，也没有在一条道上走到黑，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

① 《拟古》。

陶渊明是一个襟怀坦荡的人，从不掩饰自己的思想，总是用生花的妙笔，为自己画像，希望获得人们的理解。《宋书·隐逸传》云：“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可见当时的人就把这篇词采精拔，跌宕昭章，独起众类，爽朗抑扬的散文作为他的自传了。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他决不会因为喝多了酒而把自己的名字也忘了吧。在他的《田园宅》诗里曾介绍过屋前屋后有榆柳之荫，也许他是十分爱惜那硕大繁茂、扬扬轻拂的柳树而自名“五柳先生”的吧。“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一个爱好读书的竟至废寝忘食的人，决不会对书中含义不求“甚解”，应该说这是他把书读“活”了的“自白”。他是在读书中吸取精华、吸取力量、吸取教训，这是一种破卷取神的灵活的读书方法，决不能视为乱翻一通。“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次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这又是一种贫困生活的真实“自白”，是未加任何渲染的“自况”。归隐之后，家庭罹难，每况愈下，而嗜酒之癖难解，常受到亲友的照顾是常有的事。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时，在浔阳与他交往甚多，几乎日日造访。每往，必酣酒致醉。临去时给他留下一笔钱作生活费用，陶渊明全部把它送给了酒家，有闲就去喝酒，一副醉态，跃然纸上，其诗文之妙，大概也是浸透着酒汁的。“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是他晚年生活的乐事。他用绘声绘色的彩笔生动而又形象地图画着自己不慕功名利禄、立志攻读著文的生活理想和洁身自好、安贫乐道的高尚情操。读书不寻章摘句、死记呆背，不拘泥一格，潇潇洒洒；喝酒不问主宾，无论贫贱，无拘无束。要送他鞋子，伸

出脚来就让人量尺码，并无尴尬伪态，实在太洒脱无羁了。因而，他的诗文才能博得后人如此多的钟情。李白就曾高歌过“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①。白居易也模仿《五柳先生传》作了一篇《醉吟先生传》。看来这些超凡脱俗的文人们，有着共同的思想轨迹。其实，陶渊明的自况、自白、自画，何止一篇《五柳先生传》呢？他的《乞食》等篇，更是描绘出了一个难于开口，但又不得不去求人的心态。即使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也不掩埋于心底，而是把它暴露于诗文中。所以，他是一个敢于向人坦露心迹的人。在婚恋问题上，人们常是避而不谈的。而他的《闲情赋》，是以丰富的想象力、大胆地倾泻自己的爱情，一“愿”一“悲”，环环相加，反复咏吟，扣人心扉，自由奔放，淋漓尽致，是男女悲欢离合情感的集中反映。这么瑰丽的言情赋，自然是他不幸的爱情生活的回响。“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带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这不能不说也是他的“自况”与“自白”吧。再读他的《时运》末章，

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

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

这种思古悲今之情，也是“伤己”、“伤今”的“自况”“自白”的“实录”，我们沿着“自况”、“实录”的线索就不难描绘出这个生活在1500年前的隐士的形象来了。

“自祭”更是陶渊明引人瞩目的另一奇文，对于“死”，不管是谁都是很忌讳提到它的。特别是到了多病的晚年，陶渊明不但没流露出恐惧之情，而是自己作文凭吊起来，真是超人逸事。他

① 《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

在《自祭文》中直接地表达自己对生死的态度。轻视生死本是人们的老生常谈，加上“不惧”与“不喜”的字样以后，就显得不落俗套，别开生面了。其自祭文的开头一句：

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

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永归本宅。

在这秋色浓浓的时刻，离开这沉浮了半个世纪的“逆旅”，道明他至死也没忘记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接着是：

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绺冬陈。

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

虽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但这是自己乐于追求的安定、自由的生活，毫无反悔之意。相反，对守着穷庐，酣饮赋诗的作法，感到自慰。对死后的事情，看得十分淡泊，也交待得十分清楚：

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窆窆我行，萧萧墓门。

奢耻宋臣，俭笑王孙。……不封不树，日月遂过。

他在安葬的问题上，对亲友无半点过奢的要求，体现出达观者正确的死葬观。

那么，陶渊明的自守、自白、自况、自祭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吗？回答也是否定的。他是用自我麻醉的方式来填补灵魂的空白吗？回答也是否定的。纵观他的一生，是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早年满怀荆轲之志，要大济苍生。即使在历尽沧桑之后，对理想的追求仍未稍懈。他笔下的《桃花源记》就是长期追求的实例。直到晚年，仍在吟咏着“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的诗句来告别人生，是社会的诸多因素限制着他才能的发展，可以说，他是被

推上归隐之路的。后人对他又何必太多苛求、太多指责呢？

（五）千层浪与“匪贵前誉，孰重后歌”

陶渊明在他的《自祭文》中这样写道：“匪贵前誉，孰重后歌”，表明他根本不看重生前的赞誉和死后的讴歌之类的事情。事实上当他放弃官场拼搏之时，也就放弃了“猛志四海”、“大济苍生”的愿望，只想安身于陇亩，苟全性命于乱世，过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把酒话桑麻”的恬闲日子，做一点自己爱做的事情。至于人家在他身后怎么说长道短，他是从来不算计较的。然而，他笔下许多咏怀诗、哲理诗、田园诗和辞赋、散文，却成了后人喜闻乐读的篇章。特别是到了唐代以后，引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他的人品，他的诗品，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陶渊明活着的时候所始料未及的。

后人之于陶渊明，可以说是毁誉兼有，但认真统计一下，还是誉过于毁，也是真实的事实。我们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衡量古人的言行。

最早盛赞陶渊明的恐怕是在当时与他有过不少交往的颜延之。颜在《陶徵士诔》中泼墨讴歌，泪洒襟衫，洋洋洒洒，以饱含血泪之情叙述了陶渊明的生平、志趣、意向、气质，说他是一个“畏荣好古，薄身厚志”、“孝惟养义，道必怀邦”的人；与友人相处，又是一个“举觞相诲，中言而发”，推心置腹的朋友，即使到了死的时候，也是“存不愿丰，没无求赠”、“省讣却赙，轻哀薄敛”，一无所求的人，因而他的死，对自己来说感到“仁焉而终，智焉而弊”，有着“黔娄既歿，展禽永逝”般的巨大损失感。……

杜甫、李白、白居易等人，对陶渊明的看法却迥然有异。杜甫在《遣兴五首》中说：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
观其著诗集，颇似恨枯槁。
达生岂足是，默识盖不早。
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

看来这位杜老先生是不怎么欣赏陶渊明的，嫌他的诗缺少韵味，又说他不该把教育子女的事也写在诗中。而白居易在《登浔阳》时，却发出了：

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

.....

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
清辉与灵气，日夕供文篇。

.....

因高偶成句，俯仰愧高山。

与杜甫相比，这是迥然相异的赞叹。

宋人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渊明作诗不多，而其诗质绮实，癯而实腴，自曹、刘、鲍、李、杜诸人，皆不及也。”

宋人黄庭坚在《跋渊明诗卷》中说：“血气方刚时读陶诗，如同嚼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还说白居易、柳宗元都仿效过陶诗。柳宗元学的结果是语近而气不近，气多凄怆；白居易学的结果是气近而语不近，语多散缓，只是各得其一而已。至于苏东坡也有许多和奉诗，也不如陶诗的自然巧合。

宋人朱熹在评价陶诗时说：“人们都说陶诗平淡。据我看很豪

放。豪放得使人来不及感觉到。像《咏荆轲》一篇，就是一个例子。

金人元好问对陶诗更是拍案叫绝道：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还在《继愚轩和党承雪诗》中写道：

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

山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

真是高人明见。

明人黄文焕对陶渊明则作了一翻综合评价道：“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以平淡概陶，则陶不得见也。析之以炼字炼章，字字奇奥，分合隐现，险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鍾嵘品陶，徒谓隐逸之宗；隐逸蔽陶，陶又不得见也。析之以忧时念乱，思扶晋衰，思抗晋禅，经济热肠，语藏本末，涌若海立，屹若剑飞，斯陶心胆也。”^①他对陶渊明的人品、诗品作了有机结合的分析，可谓精辟独到，淋漓尽致。

鍾嵘说陶渊明的诗风来源于应璩，但到了清代沈德潜颇有微词地指出：陶渊明是陶侃之后，又处在晋、宋交替之时，有很多话是难于直言不讳的。他的托寄远志的诗，决不止《咏荆轲》一首，是“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旷世独立”。他特别批评鍾嵘，不该把陶诗看成中品。这是“一语不智，难辞厥咎己”。^②总之，关

① 《陶诗析义自序》

② 《说诗晬语》卷上。

于陶诗的评价，可说众说纷纭，连篇累牍。到了近代，研究陶渊明诗文的人，也大有人在。解放后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里，围绕着陶渊明的归隐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的政治主导思想是什么？以及陶渊明的作品在文学上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什么？以及陶渊明的艺术风格等，都有许多的专文、专著。争论是激烈的，评价也是多种多样的。真可谓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它揭示出这个 1500 多年前的陶老先生以生命的石子激起了千层浪花。论也罢，说也罢，褒也罢，贬也罢，然而他的诗文，仍让无数学子倾心、迷恋。他的人品更为后人称道。就连毛泽东在 1959 年《登庐山》时也怀念这位古人道：“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好耕田”。如今坐落在武陵源腹地的“桃花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张开双臂正拥抱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观光者。真是：

却怪武陵渔，自洞口归来，把古今游人忙煞；

欲寻彭泽宰，问田园安在，惟桃花流水依然

——见桃花源楹联

如果有幸踏着历史的遗迹去访胜，你就可以看到丛丛的竹子，拔地而起，有的直指云天，有的柔若钓竿，只可惜没有武陵鱼来上钩而已。清澈的山泉，缓缓地流淌，低低的浅唱，泼撒着清凉，驱散着倦意。各色的山石，黑的、白的、灰的、紫的、花的，光滑圆润，在山泉的爱抚下眨着眼睛。一只只锦鸡，拖着长箭似的尾巴在林石中穿梭，逗起人们去追赶、欣赏。沿着陡峭的山路上爬，“秦人古洞”就隐蔽在“桃花潭”的绿荫深处，通过“遇仙桥”就可以进入洞中。尽管这是后人根据《桃花源记》中的描绘而设计出来的，但仍具有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以致有许多碑刻留下了他们的向往、怀念之情，就连王维、韩愈、刘禹锡等名人，也

不免在游后留下了自己的手迹。最令人寻味的是题《遇仙桥》的一首怪诗，要读懂它，颇费思索。1990年初夏，我有幸与高敏到此一游，细品《遇仙桥》诗，兹录此诗于后，以饷读者：

《题遇仙桥》

洞彼仙人下象棋
源始覺星斗移少
桃停期底彈琴黃
到響佳牛郎又冠
得鼓會女織賦歸
時鐘聞惟靜詩道
機忘盡作而機觀（原诗都是繁体字）

这本是一首七言律诗，应有八句，它却少了一句，另一句就藏在诗中。如果按照常规去读它，不仅不够八句，而且语句不通，原因在于它是一首回环诗，前一句的后一个字，是后一句开头的一个字，但又要去掉这个字左边的一半。而且这首诗开头的一句，并不在开头，是藏在诗的中心，呈螺旋式展开。如果把这首诗理出来，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文字游戏，也可以增添一点关于桃花源的神秘感。现释读如下：

《遇仙桥》诗底
牛郎织女会佳期，
月底弹琴又赋诗。
寺静惟闻钟鼓響，
音停始覺星斗移。
多少黃冠归道观，

见机而作尽忘机。

几时得到桃源洞，

同彼仙人下象棋。

不管人们怎样看待陶渊明，也不必再问他归隐的动机、目的如何。他始终是一个以全隐者的姿态，在历史上留下身影的人，也是人们深深向往的唯一真隐的文学大师。



冥心物表，介然离俗 ——北魏四隐士

· 史建群 ·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不仅葬送了西晋王朝，还导致了历史上又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分裂时期。如果说江南还算相对稳定的话，那么昔日富庶繁华的中原地区，如今变成了汉族和众少数民族的野心家争权夺利的战场。直到北魏统一了北

方，定都洛阳，中原的局势才渐趋平稳。

在北魏统治的一百多年中，有四位介然离俗，拒不出仕的著名隐士，得以史册留名。他们是：眭（suī 音随）夸、冯亮、李谧、郑修。

（一）独行奇士眭夸

眭夸，一名眭旭，赵郡高邑（今属河北）人。他的祖父眭迈原是西晋东海王司马越属下军谋掾。石勒攻占中原以后，任命眭迈为徐州（今属江苏）刺史。眭夸的父亲名邃，字怀道，曾任后燕国中书令。眭夸虽出身官宦之家，却无仕进之意。他少有大度，不拘小节，勤学好书，但不关心人世俗务。眭夸对父母十分孝顺。等他年届三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因思念父亲而致使胡须忽然变白，每一悲哭，痛彻心肺，闻者莫不流涕。

眭夸喜爱饮酒，放浪形骸，寄情山林，游意于红尘之外，而不愿出仕做官。同郡名士李顺愿与他交朋友，他拒而不许。因而士人对他无不敬而畏之。他一生中，只有在年轻时与崔浩为莫逆之交。除此之外，不曾与任何人为友。因为他知道交友易，而保持友情、不失朋友之道是很难很难的事情。

崔浩仕途得意，直升至司徒的高位。他知道眭夸博学多识，是个难得的人才，遂上奏太武皇帝拓跋焘，任命眭夸为中郎。眭夸岂肯受官职的束缚，故称病不赴任。后来，地方官奉旨催逼他进京，眭夸不得已才离家上道。进京之后，住在崔浩府中，眭夸整日与崔浩对饮，高谈阔论，但闭口不谈红尘琐事。崔浩几次想开口谈聘请他担任中郎之事，却都找不到机会。直截了当地说，又

怕他不高兴。故而一连数日都是欲言又止。最后，崔浩干脆把任命诏书投入眭夸怀中，而又一言不发。眭夸见状，说道：“桃简（崔浩的小名），你已当上了司徒。又何必以中郎俗务来麻烦我呢？如果硬要给我套上官职的桎梏，我马上告辞。”崔浩知道眭夸是个言出必行的人，担心他真的立即离京。于是，就把眭夸唯一的坐骑——一匹骡子藏到马厩之中，不让他知道，以便用这种方法拴着眭夸。同时北魏规定，进出京师洛阳都要在周围的关卡之中交验证件，方能放行。眭夸一无坐骑，二无证件，是很难离开洛阳的。但是眭夸终于还是逃了回去。原来，他的同乡赶车到京城来交纳租赋，眭夸假扮成赶车的人，混出了关卡。崔浩得知此消息，叹道：“夸本是独行奇士，本不应该以小小的中郎之职麻烦他。我又藏起他的坐骑，使他杖策还乡。如今，怎样向他谢罪呢？”当时，北魏的法令甚严，官员私自离职者，是要判重刑的。亏得崔浩为他在朝堂之上开脱罪名，才免受牢狱之苦。后来，崔浩又把他的骡子和自己所骑的马一起送给眭夸，并致书谢罪。但眭夸既不接受崔浩的马匹，也不要自己的骡子，甚至连信也不回。崔浩丝毫不气恼。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因修国史“备而不典”、宗族势力过大、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引起朝廷的不安而被诛。眭夸闻讯，痛哭流涕，为崔浩素服行丧，并设置灵位，接受乡人吊唁，多日乃止。眭夸感慨地说：“崔公既死，谁能容我？！”遂作文一篇阐述朋友应以心交而不拘形迹之意，甚为时人称许。

眭夸的岳父乃是钜鹿（今河北宁晋县西南）人魏攀，也是当时的名士。眭夸与岳父相处，不拘礼节，如同朋友一般。

眭夸于七十五岁高龄无疾而终。下葬之日，前来送葬的人如潮涌。

（二）醉心佛学、鄙薄功名的冯亮

冯亮，字灵通，南阳（今属河南）人。他的舅父乃是南朝梁武帝帐下平北将军蔡道恭。冯亮原来生活在南朝，有一次，他随舅父驻守义阳（今湖北枣阳东南）。恰好，北魏中山王拓跋英发兵攻打义阳，冯亮被俘。中山王英素闻冯亮博览群书，又笃好佛理，实为学富五车的大名士，因而以礼接待，不敢轻侮。二人遂成知心朋友。冯亮性喜清静而厌嘈杂，到京师洛阳之后，他并没有住在繁华的城市中，而是隐居嵩山。因为感激拓跋英的恩情，他时常与其书信往来。拓跋英死讯传来，冯亮奔赴洛阳，痛哭尽哀而还。

北魏宣武帝元恪曾授冯亮以羽林监领中书舍之职，欲使其讲解佛经。冯亮坚决辞官不做，元恪遂不强逼。冯亮在嵩山数年，与僧徒念诵佛经，素食饮水，不食酒肉，有终老山林之志。不幸，有一名叫王敞的男子企图反叛，事泄，受牵连的人非常多。嵩山的和尚也被牵连进去，连冯亮也因与和尚关系密切而连带被捕，送往京师尚书省候审。过了十几天，宣武帝下令赦免冯亮，但冯亮也因此不敢回嵩山居住，而寓居京师景明寺。皇帝命官府按月发给冯亮及其数名从人以衣食。

过了一段时间，王敞谋反之事渐渐平息。冯亮久居京师，不耐其喧嚣杂乱，仍想回嵩山居住。经请示宣武帝同意，冯亮又返回嵩山。他素爱山水，又有建筑设计之巧思。他所设计的建筑，依山傍水，精巧绝伦，闻名于世。但他却无力为自己建造精美的住宅。宣武帝元恪得知消息，命官府供应人、财、物，并命地方官

与冯亮一起勘察嵩山形胜美妙之处，建造房舍及佛寺，供冯亮及和尚们居住。这处建筑营制精美巧妙，周围高山深水，林涛声声，曲尽山居之妙。冯亮从此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冯亮虽隐居嵩山，然而北魏皇帝及达官贵人仰慕其才学名声，时时邀请他到京师小住。因此，冯亮经常来往于嵩山与洛阳之间。延昌二年（513年），冯亮在洛阳得了重病，京师名医疗治无效，宣武帝敕命以马车送冯亮回山。几天以后，冯亮就与世长辞了。宣武帝诏赠帛二百匹，以供丧葬之资。

冯亮临终之前，对赶来服侍自己的侄子交待：火化遗体，于火化处建造佛塔以藏骨灰。火化之日，白雾缭绕。山中僧俗百余人自动前来为醉心佛学、鄙薄功名的冯亮送行。

（三）辞官不做、志在山林的李谧

李谧，字永和，涿郡（今河北涿县）人。李谧少好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尤精于儒学经典。起初，他师从小学（即文字学）博士孔璠（fán，音烦）。数年之后，他的才学就超过了老师，孔璠反过来要向他请教了。故而同学们编了一首歌谣来称赞李谧的学问和孔璠的不耻下问：“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这首歌谣的意思是：青（指徒弟）出于蓝（指师傅）而胜于蓝，徒弟教师傅以谢师恩；师徒名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谁懂得多谁就是老师。

李谧的父亲是北魏相州（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刺史。按照北魏的规定，高官显宦的长子可以享受任命为官的待遇，因而，皇帝任命李谧为著作郎。李谧不愿做官，要求把官职授给弟弟李

郁。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地方官多次举荐他，朝廷中的高官也聘请他做属官，李谧一一婉言谢绝，唯以琴书为娱。

明堂，是儒家理想中皇帝颁行仁政教令的地方。按照儒家学说，明堂是自古流传的制度，只是到了周秦末世，明堂之制才失传。故而，自汉代以来，儒生们纷纷就明堂的形制发表自己的看法。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自古流传的圣王明堂之制。夏商周三代帝王，一般都是在宗庙中发号施令。宗法制崩溃而官僚制兴起后，则是在朝堂之上议事布政。汉儒造作明堂之论，其实是为宣扬儒学“王道政治”制造舆论，把明堂作为“王道政治”的物质外化形式来认识。故而自汉代以降，关于明堂的争论沸沸扬扬，都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得出结论。可是，李谧醉心典籍，深信书传。他从历代儒生明堂之争中，得出了自己的看法，遂作《明堂制度论》一文，辨正其事。

李谧虽然学问精深，但他并未受各派学问的束缚。他以为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信徒，都是追求虚名的无聊之士。而一个人如果生前不能快心惬意，死后的名声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他主张生前按照自己的意愿，不受任何束缚的任意而为。他虽不饮酒，却喜爱音乐，更爱山水之美。他常常外出旅游，寻觅奇山秀水。遇到景色奇丽之处，总是流连忘返，定要尽兴方归。

延昌四年（515年），年仅三十二岁的李谧不幸因病早逝。同年，小学博士孔璠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宣武帝，称赞李谧的道德学问，以为应当褒奖，以励风俗。宣武帝下诏说：李谧屡次辞官不做，志在山林，其高风亮节及渊博才学，“深可嘉美。谧曰：‘贞静处士’，并表志其门闾，以旌高节。”^①遂派官员奉诏书至李

① 《魏书·李谧传》

谧家乡，宣布皇帝之命，赐李谧所住街巷为“孝义里”，表李谧家门为“文德”。

（四）隐居不仕的郑修

郑修，北海（今山东昌乐西）人。自年轻之时即隐居于今陕西省岐山南面的川谷之中，依山崖屋宇，独处其中。他几乎从来不和世人交往，不问俗事。他自己耕种薄地数亩，自给自足。常年粗茶淡饭，破衣烂衫，不以为苦。耕作之余，他总是手不释卷，尤其是喜欢道家学说。《道德经》、《庄子》全都烂熟于心，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郑修虽然没有著书立说，而且隐居山野，但其名声却远远地传播开来，以至于传到了地方官耳朵里。各级地方官屡屡礼请他出山为官，郑修全都辞谢不就。最后，岐州（今陕西凤翔县南）刺史魏兰根，一次又一次地派人向他致意，不厌其烦地聘请他到州府一叙。郑修实在不得已，只好面见魏兰根。刺史大喜，多次与之对饮交谈，极力劝他到州府任职，郑修拒不答应，且很少开口讲话。魏兰根无奈，只好留他住了几日后，送其回山。但是，魏兰根回府后，立即上书孝明帝元诩，大力推荐郑修，希望皇帝亲自下诏任命郑修到朝廷做官。孝明帝接到奏报之后，要求雍州（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刺史萧宝夤访问落实，探察郑修是否果如魏兰根所言之贤士，而后上奏朝廷。可是，萧宝夤接到诏书时，正在谋划叛乱，哪里会去干这样的事？不久，萧正式发动叛乱，这件事也就搁置起来。后来，郑修一直隐居不仕，以至连他何时去世，史籍亦无记载。

北魏时期的这些隐士，大抵都属于恬淡型隐士，故乐于避免尘嚣，隐逸山林，爱好自然景物，而不乐为官。但考虑到北魏统治时期，是民族矛盾比较尖锐时期，尽管北魏统治者利用胡汉地主联合统治的形式以拉拢汉族地主，仍不免使某些汉族官吏的子孙心存疑忌，也许这也是这些隐居不仕者的共同心理因素。



学为当世冠、不愿凤池游的刘瓛

· 张兆凯 ·

（一）少年负盛名，初仕多乖舛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已经不是知识分子做官干禄的阶梯，自然也不大为人所重视和喜爱。一些士族和他们的子弟多从事玄学、文学、史学、书法等方面的研究，而儒学成了真正的冷门。喜欢儒学的人既然不多，有造诣的自然有限，而博通儒学

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但南朝宋末沛国地方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少年刘瓛，当时年纪虽小，却博通儒家经典，成了远近知名的学者。

刘瓛，字子珪，沛国相（今江苏沛县）人。沛国刘氏在南朝不是显族，刘瓛的六世祖刘悛（tān，音谈）做过晋朝的丹阳尹，此公《晋书》无传，平生事迹无考。刘瓛的祖父刘弘之，官至给事中。给事中是将军、列侯、九卿等大员的加官，给事殿中，讨论政事时备顾问应对。官品不高，亦无实权。刘瓛的父亲刘惠，担任过刘宋的治书侍御史，这是在司法部门起草和掌管文书档案的官职。父祖官位不高，自然不可为他提供入仕的荫资，但能够为他提供读书的基本条件。加上刘瓛的笃学，聪颖，因而少年就负有盛名。当时州郡长官可以自辟掾属，负有盛名的刘瓛为州郡长官所青睐，二十余岁时，被任命为州里的祭酒主簿，相当于秘书一类的官职。其时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朝廷输送最优秀的青年，称为举秀才，刘瓛的才学，理所当然在被举之列。刘瓛的哥哥刘璉也同时被州郡举荐。当时的州别驾王元写信给刘瓛的父亲说：“近来你的两个贤慧的儿子都被举为秀才，我们州真是有人才啊！”秀才到了朝廷，一般都要安排一官半职，刘瓛被吏部授予奉朝请。这种官虽然无实权，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对于在乡下长大、家庭又无多大背景的刘瓛来说，自然应该满足了。但刘瓛不这样想，他认为自己饱读经书，心怀治国才能，奉朝请没有任何实权，不能发挥自己的才学，因而坚持不受。他回到家乡，聚徒教授经书，前来学习的弟子经常不下数十人。刘宋末年有一个著名的士族叫袁粲，他担任丹阳尹时（丹阳当时是朝廷的直辖郡，地位重要），非常欣赏刘瓛的才华。有一次袁粲在后堂请客，到场的都是丹阳一带的学士名流，刘瓛自然也在邀请之列。丹阳的名流学士对刘瓛都是很尊敬的，而且其中有不少还是他曾教授过的学生。刘瓛的

到来，为袁粲增添了光彩。丹阳尹府后院有一株古柳，腰围一丈，枝繁叶茂，树形呈蘑菇状，把整个院子都遮住了。袁粲指着这株古柳对刘瓛说：“传说这株古柳在您的六世祖刘公任丹阳尹时就有了，一看到这株古树，就使人想到刘公的高风，今复见您的清纯高德，真是刘公之节不衰啊！”时人的普遍心态是最希望别人赞颂自己的祖上功德。袁粲一席话，说得刘瓛心如蜜甜，对袁粲顿生了一种知遇之恩。袁粲当然也是出于内心的赞美。不久，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在朝廷的关系，推荐刘瓛到朝廷担任秘书郎。在当时秘书郎是清要之职，事情少，俸禄高，升迁快，一般只能由士族或达官贵要的子弟担任。刘瓛门第不高，自然没有资格担任这一官职。但既然是袁粲推荐，朝廷还是稍加重视，他先后被任命为邵陵王主簿、安陆王国常侍、安成王抚军行参军等秘书参谋之类的职务。刘瓛所服侍的刘宋诸王大多不学无术，兄弟叔侄之间又互相倾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卷入政治漩涡。一旦卷入，身首异处不说，九族将受株连。刘瓛在这些武夫屠伯手下任职，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终因以处理公事不当而被免职。刘瓛本来对做官不感兴趣，一则是由于知己袁粲的推荐，盛情难却；二则自己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怀有一展才华的愿望而入仕。当他进入官场后，发现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充满了血雨腥风。而社会的门第又是如此的森严，像他这样出身寒微的人物在政治上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前途。所以从他被免职的这一天起，就下定了永远脱离政治，循山隐居，以教学度余生的决心。

（二）审己度时势，不慕凤凰池

刘宋末年，宗室倾轧。宋明帝当政后，把哥哥孝武帝的儿子斩尽杀绝，自己仅存的五个兄弟也杀了四个。宋明帝死后，子刘昱继位，史称后废帝。宋明帝仅存的弟弟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起兵直捣建康。幸亏右卫将军萧道成指挥城防军队坚守台城，派人诈降，乘机杀了刘休范，才把局势扭转过来。建平王刘景素（宋文帝孙）为南徐州刺史，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他看到朝政紊乱，大权旁落，想举兵夺取政权，结果兵败身死。在宗室内部倾轧的浪潮中，大权落到了领军将军萧道成手中。不久，萧道成杀刘昱，立刘昱弟刘准为帝，是为宋顺帝。顺帝是萧道成手中的傀儡，萧道成是事实上的皇帝。在朝的士族贵要，眼见刘宋的命运将终，纷纷投向萧道成的怀抱。宋明帝死时，遗命尚书右仆射，护军将军褚渊，左仆射中领军刘劭，尚书令袁粲等辅佐自己年幼的儿子刘昱。萧道成杀了刘昱后，袁粲知其欲行篡代，与褚渊、刘劭等密谋诛杀萧道成。由于褚渊告密，结果袁粲等被杀，诛其三族。粲被杀后，陈尸在道，无人敢去收埋。刘瓛与袁粲感情甚笃，他冒着生命危险，微服去现场哭吊，并出钱请人收殓尸体。刘瓛的行为表现了他的勇敢无畏精神和不遗故旧的优良品德，因而受到时人的赞扬。

萧道成建立齐朝后，为使自己的政权获得社会贤达的承认，召集当时的学者名士到皇帝休息的华林园坐谈，刘瓛也在应召之中。萧道成问刘瓛道：“我顺应上天的意旨，取代刘宋建立齐朝，人们怎么议论这件事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如果说下面一致拥护

齐朝的建立，那纯粹是自欺欺人，刘瓛决不会昧着自己的良心去奉承这位新皇帝；但如果坦率告知天下议论，就完全有可能招来杀头之祸。他略为思考一下后说道：“《孝经》上说得挺明白，兄弟、父子之间要谦让、和睦，对别人能容忍、宽仁。宋朝之所以亡，就是因为父子兄弟之间互相残杀，对人民暴虐压榨，而这种残杀与暴虐轻而易举地丧失了天下。如果陛下能以宋朝为鉴戒，内和睦，外宽仁，那么即使现在人们有些议论，过一段时间后会自行消失，政权也就会稳固。如果像宋朝那样，内部不和睦，对外不宽仁，稍有不合己意者就诛其九族，那么政权虽然建立了，也无法长久维持下去。”刘瓛这一番不卑不亢、义理严凿的答词，说得齐高帝萧道成哑口无言。刘瓛走后，齐高帝对司徒褚渊说道：“儒者之言，可宝万世，刘瓛这个人直率得很，有学问的人就是与凡人不同嘛。”后来，齐高帝多次欲召刘瓛进皇宫坐谈，而刘瓛觉得话多无益，故累次谢绝了齐高帝的邀请。

齐高帝欣赏刘瓛的学术，一心要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来。刘瓛在宋时未得重用，虽被授予七品的车骑行参军，但刘瓛并未到职。齐高帝欲用他为中书郎，中书郎隶属中书省，中书省长官为中书监、中书令。中书省在汉代为内官，不涉政务，主要工作是照料皇帝的饮食起居。从曹魏开始，中书省代替了尚书省的许多职权。东汉时有关诏令的起草、宣达都由尚书省负责，曹魏时全部归到中书省门下。中书省职权到西晋时又进一步扩大，而且由于中书省直接与皇帝打交道，权势、地位比具体贯彻执行皇帝诏令的尚书省重要得多。西晋荀勖为中书监，后调为尚书令。尚书令的资历要求比中书监令高，但因不掌握机要，实际权力小。荀勖任尚书令后，心中老大不高兴，而旁人以为从中书监升任尚书令，是一种荣迁，故向他表示祝贺，荀勖恨恨地说：“夺我凤凰池，

诸君还贺我吗？”以后人们就把中书省称作“凤凰池”，意思是中书省掌管机要，是有权有势的核心衙门。南朝时，中书省的监、令都由大士族担任，这些大士族都不太关心政事，更懒得管具体政务，这样中书省的职权就落到了中书郎甚至中书郎的下层中书通事舍人手里。齐高帝欲用刘瓛作中书郎，无疑是对他的信任。不过当时做官要讲求资历，中书郎为五品官，与郡太守同秩，且地位重要得多。刘瓛父祖无爵位，自然也无荫资，他不可能从一介平民一蹴而任中书郎。于是齐高帝派当时的吏部尚书何戢向刘瓛宣达自己的旨意。何戢对他说：“皇帝欲以凤池相处，但遗憾的是你没有做官的资历。你过去担任过抚军行参军，后被免了职。希望你暂且再担任此职，一段时间后可以转为国子博士（官秩为六品），继之便授中书郎。齐高帝的这种安排，为刘瓛考虑的极为周到，也可以说是从天而降的美事。但对入仕做官已经心灰意冷的刘瓛则拒绝了齐高帝的提携。他对何戢说：“我生平就不想当官，更不愿意在皇帝身边作权势之官。你们要我去担任中书郎，这是违背我一贯志向的，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受你们的安排。”何戢当了多年的吏部尚书，无论是贵势子弟，还是庶姓平民，对做官的欲望都是十分强烈的。为了谋得一官半职，为了得到一次提升，托人情，送贿赂，巴结权势，见缝插针，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而今天碰到刘瓛这个人，竟连天上掉下来的大美事都拒绝接受，实在令他费解。他知道刘瓛这种人是不需要劝说的，同时也对他拒绝做官怀有敬意。回到朝廷后，婉饰其说，极力为刘瓛开脱，因而刘瓛的拒绝为官没有引起齐高帝的忌恨。

齐高帝死，子萧贇即位，为齐武帝。齐武帝的次子竟陵王萧子良担任司徒，征北将军。萧子良爱好文学，礼才好士。在他周围聚集了大批的文人学士，如后来的梁武帝萧衍，大学问家沈约，

梁朝宰相范云等都是他在鸡笼山开西邸时邀请的好友。刘璡的才学名声为萧子良所倾慕，特别派人邀请他担任司徒府的记事。刘璡没有同意，但考虑到萧子良的盛情以及他的爱才好士，便写了一封长信给司徒府的左长史王思远、右长史张融，说明了自己不能去司徒府任职的缘故。信中说：“蒙贵府看重，召我赴职，理应欣然赴命。但这违背了我一贯不入仕做官的原则，加上我这个人善于与人打交道，更没有做官的才能。过去我曾几次担任过行佐一类的官，但因拙于为官，几次都被免职，这一情况，大家都非常清楚。我反复掂量，总觉得自己不是做官的材料，自然也不敢期望在这方面有什么造就。加上近年来，贫困交加，人又懒惰，破衣烂褥，头发蓬松，人们见了我这副尊容都会感到害怕。我的一些故旧好友，见我如此惨状，送我衣服，劝我修整容貌，但我旧习难改，依然如故。”

“我过去几次入仕当官，几次都被免职，现在思想起来，后悔不迭，既然如此，我怎么会又重蹈前辙呢？古人云‘冠一免不重加于首’，这是告诉我们人要适可而止。凭此信条，虽然宋朝曾几次召我为官，都被我谢绝，何况现在我抱病在身，更无期荣之念了。”

“我今天辞贵府辟召，绝不是恃才孤傲。我本来就没有什么绝俗之操，我做官的才能，诸君有目共睹。我的志向是做做学问，教教书，周游四方。总之，我不愿有职事来缠住我，我希望能自由自在一点，这就是我唯一的愿望。”

王思远、张融接到刘璡的来信后，报告了萧子良，大家以为刘璡的辞任可能是嫌官职小了，于是上书皇帝，授他为步兵校尉。但他们又一次误解了他，刘璡仍然谢绝拜受。

（三）晚年勤教授，淡泊度人生

刘瓛身材矮小，但学问冠于当时，京师达官贵人，并其子弟莫不前来受业。刘瓛对前来求学的人，无论是士人子弟，还是庶姓平民，一律以礼相待，勤于教授。刘瓛身负高名，但他不以高名自居，为人谦和，不耻下问，且好学不倦。他每次出门拜访朋友故旧，都让一门徒扛一胡床跟在后面，到了别人的大门前，敲门以后，利用仆人通报主人的时间，就放下胡床，与门徒商讨学问。他住的地方，只有几间瓦屋，年久失修，逢雨必漏，学生们戏呼他的房子为“清溪”，他亦习以为常。有一次，萧子良来拜访他，见他所居如此简陋，上书齐武帝，请为刘瓛立学馆。离刘瓛所居之地不远有个杨烈桥，这里有一栋豪华宽敞的房子，房子的主人已死，又无后代，齐武帝诏令将这栋房子送给刘瓛做学馆。他的门生见师父弄到这样一栋好房子，都来向他表示祝贺。刘瓛对他们说：“房子太好了，会招来灾祸，这栋房子的主人不是死后无嗣吗？虽然皇帝诏令把房子用作讲堂，我也恐遭来横祸呢？”这样一说，学生们也不敢勉强，但刘瓛考虑在自己破旧的瓦屋里授课，也确实难为了门徒，故准备把讲堂搬到那所房子里去。不料还没搬迁，刘瓛就病了，而且一病不起，死时五十六岁。

刘瓛毕生研习儒学，尤其对《孝经》、《礼》、诸书研读颇深。他不仅从理论上研究，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身体力行。他的祖母生疽病床年余，刘瓛经常用手搓持膏药，结果手指都被药汁所浸烂。他母亲性格严明，兄弟常受母亲斥责。刘瓛事母至孝，母亲常对亲戚说：“阿称便是今世曾子。”阿称是刘瓛的小名，曾子是历史

上有名的孝子。刘璡的个人生活甚不顺意，到了四十岁，还没有婚娶。齐朝建立后，齐高帝与司徒褚渊为刘璡保媒，娶一王姓女子为妻。王氏嫁过来后，同他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住的房子是土墙，有次妻子在墙上钉竹钉挂鞋子，隔壁住的是母亲，锤子一敲，墙土落到了母亲的床上，母亲挺不高兴。刘璡对母亲十分孝顺，从没惹母亲生过气，妻子做事这样粗心，使他很难堪，一气之下，就休掉了妻子。妻子回到娘家，向自己的父母哭诉，父母为之不平。事情反映到县郡，认为刘璡这样做有点过分，经人劝说，刘璡才迎回妻子。刘璡的父亲死了，他为之守孝三年，足不出户。结果三年过后，他的脚依靠手杖也站不起来了。刘璡死后数年，梁武帝为他立碑，谥号曰“贞简先生”。

臧荣绪



京口名隐臧荣绪

· 高 凯 ·

东晋安帝义熙八年(412年)一个冬天的夜晚，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城内凛冽的江风裹着鹅毛大雪漫天而下。就在这古老、萧瑟的城市里，有一座破败、寂静的臧姓庄园。庄园里除了一盏油灯忽明忽暗地亮着以外，仿佛整个院落没有别的东西存在一样。突然，一阵“呱呱”的婴儿啼哭声从有灯光的房子里响起来，而且随着

婴儿的啼哭声，又响起了接生婆兴高采烈的大嗓门：“老爷！老爷！您得了一位公子！一位公子啊！”紧接着寂静的庄园活跃起来，好几间房子里一下子都亮起了灯，许多人走出自己的房子，跑向产房。这时，先头跑进的一位中年人不由分说地一把抱起了婴儿，凑近灯光，仔细地端详，嘴里还欣喜地念叨着：“嘿，嘿！也让我瞧瞧我的儿子！”片刻之后，中年人长长地叹了口气。只见他紧锁着眉头，心里暗暗地说：可叹这孩子先天不足，瘦弱非常，皱巴巴的脸儿，跟老太婆一般，看这情形孩子也活不了几天？但是，这个中年人回念一想：自己老来得子，已属大喜之事；孩子虽然难养，说不定将来还要靠他传宗接代哩！于是，他暗暗地祈求上苍保佑他的儿子能够健康成长，并忧喜参半地为孩子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荣绪，就是希望他将来能够光宗耀祖，一展英姿。这个中年人，就是臧庸民；新生的婴儿，就是他的儿子臧荣绪。

（一）纯笃好学的少年

小荣绪真的没有辜负他父亲的心愿，以顽强的生命力，出奇般地活了下来。他的天资聪敏，好奇心极强，而且见什么便问什么、学什么。从三四岁开始，小荣绪便跟着他父亲在家中读书识字。在读书方面，他的父亲臧庸民为荣绪的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臧庸民学识渊博，见识独到，是刘宋时期著名的国子学助教，家中藏书成椽累栋，使荣绪有了一个良好的博览群书的环境。不幸的是臧庸民积劳成疾，年仅五十出头就与世长辞了。临死之前，臧庸民把只有七八岁的小荣绪叫到跟前，语重心长的叮咛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多少成就，也没有攒下多少财产，我只有满满一屋

子书可以留给你了，希望你能好自为之，不负厚望啊！”小荣绪重重地点了点头。

早在西晋末年，臧荣绪的祖父臧奉先从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避乱江南，并在东晋王朝中谋到了建陵（今江苏沐县西）令一职，小有财力，便买下了京口这套庄园。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打，庄园已经变得破烂不堪。荣绪的父亲在世时，已无力修理。现在父亲死了，家里缺乏其他经济来源，只能靠变买田产度日的母子，就更无力整治这残破的庄园了。庄园虽然破旧，但它背依一座郁郁葱葱的土冈，门前还有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河，庄园在青松翠竹的掩映下，显得相当幽静，这无疑是臧荣绪潜心读书的好地方。

小荣绪除了每天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外，还常常利用空闲时间，帮助他母亲操持家务。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增加一点家庭收入，他放下庄园小主人的架子，亲自开垦庄园里荒芜的花园，种花植菜，打水灌园。收获的东西，除了留下一部分自家享用外，其余的都叫仆人拿去卖掉，以换回祭奠亡父的四时祭品。正是由于他坚持边学习、边劳动，所以，到十几岁他母亲病死的时候，臧荣绪不仅已读完了父亲留给他的所有藏书，而且成为能够独挡一面的“小大人”了。

母亲的死，使臧荣绪悲伤不已。自从父亲臧庸民死后的这些年来，荣绪和母亲相依为命，建立了深厚的母子感情。如今母亲一死，荣绪终于感到自己成了真正孤苦零仃的孤儿了，这怎么能让他不痛断肝肠呢？在母亲的灵堂里，臧荣绪失声痛哭，几度昏厥，仆人救醒了他，他便又扑到母亲的棺木上，一边哭一边呼唤。看得出臧荣绪有多么地悲痛。但是，他并未因为母亲的死而从此失去生活和精神支柱，而是化悲痛为学习的力量，以更多的精力

去苦读经书。为了怀念母亲，他每天都要把母亲过去的住室和母亲常去的庭堂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厌其烦地整理母亲的遗物，不让它们沾染任何灰尘。同时，每逢初一、十五，他便要亲手下厨做几样母亲生前爱吃的菜肴，拿到母亲的坟上去祭祀一番。上坟之时，他每每跪在母亲的坟前，总是暗暗地向母亲汇报自己的成绩：最近我的学问有何长进，我又看完了向别人借阅的什么书籍，我写了什么文章，请何人批改及所获得的评价等等。最后，为了寄托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臧荣绪特把自己记忆中有意义的小事、母亲生前的谆谆教诲等详细地记录下来，从而写成了《嫡寝论》一本小册子^①，只可惜年代久远，这本书已经失传。但是，此书的写作为臧荣绪成年以后撰写“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②一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二）铁笔写春秋

由于臧荣绪出生于东晋末年，从小就亲身经历了东晋末年社会动乱、经济凋敝、军阀混战和生灵涂炭的黑暗时期；当父亲在世之时，他也常听父亲提及西晋末年随祖父臧奉先举家南迁江南的艰险经历和当时中原百姓横遭屠杀的故事。这一切，都促使了臧荣绪对现实社会政治制度的无比厌恶，对豪门士族腐朽生活方式和世族子弟无功受禄现象的强烈不满；加之当时社会上已有一些为刘宋以后豪门士族编制谱牒而写成的西晋史书，其内容不乏违背历史真实而为豪门士族歌功颂德之处，因而，促进臧荣绪萌

①② 《南齐书·臧荣绪传》。

生了一种重写东、西晋历史的念头。于是，他在母亲死后三周年，正式着手准备写书的工作。他首先重读了古代的历史名著，如《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从中汲取了前辈史家写作历史著作的经验，从而找出了一条研究、摸索历史的方法。经过一段研究前人著作和摸索写史道路的过程后，他深深地感到：要写好东、西晋的历史，光沉溺于书本是不行的，最重要是要实地考察、搜集和整理各种资料，并从中提炼出真实可信的东西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将祖上留下的已然不多的田产全部卖掉，筹集钱财，游历全国。当时正处在南北双方尖锐的军事对峙中，他冒着随时可能为边防军抓获而当成对方奸细被杀头的危险，穿越边境线。为了安全起见，他经常选择偏僻的小路，以躲避各地关卡的盘问、检查；为了减少路费的消耗，多少次他都是风餐露宿。就是这样，他多次深入北方地区，甚至涉足到了少数民族的栖息地。作为一个汉人，尤其是长期生活在南方的汉人，语言不通，路径陌生，其实际困难之大、危险程度之高是常人不可能想象得出来的。尽管是如此，臧荣绪还是坚忍不拔地走遍了东、西晋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发生地。通过实地认真地考察和研究，他修正了自己过去一些错误认识，对有些一直迷惑不解的问题也有了清醒的认识。同时，通过实地考察，臧荣绪对东、西晋豪门士族的作用、地位及家族史有所洞察，从而为他在以后写作《晋书》时精到地评价豪门士族的领袖人物打下了基础。

几年之后，臧荣绪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京口臧宅。离家时已破败的庄园，现在变得更加满目疮夷。园中上百棵粗壮的苍松被砍伐殆尽，一丛丛翠竹也寥寥无几。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舍

弃了京口破败的臧园，而在京口城郊长江里的金山^①上筑馆授徒，开始了他边教授门生、边整理考察所得材料的艰苦生涯。

由于臧荣绪早在他父亲臧庸民死后，便以孝顺母亲和“纯笃好学”而远近闻名。尤其是他母亲病故后，臧荣绪四时不忘祭祀，每日里“扫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辄拜荐焉，甘珍未尝先食”^②的这些举动，颇受京口达官士人的一致赞赏。加上他又周游全国大江南北，以博学多才闻名于南朝。所以，他准备在金山之上开馆招生授徒的消息一传开，马上就有远近许多世家大族和庶族地主把自己的子弟送来就读。一时间，荒草连天、人迹罕至的金山变得热闹非凡，一批批送子求学的船只靠满了金山岛。随着臧荣绪的开馆招生，臧荣绪便一改他日只知读书、不交朋友的习惯。这就引出了京口城另一名隐关康之与臧荣绪结成生死好友的趣闻。

关康之是刘宋时期著名的隐士和学问家，以“为《毛诗》义”、“善《左氏春秋》”和“稀与妻子相见，不通宾客”^③而闻名于世。没想到，关康之与臧荣绪一相识，便越说越近。不仅关康之以年长臧荣绪十几岁而成忘年交，而且关康之还将自己妙龄的小妹许给了博学多才、年轻有为的臧荣绪。从此，臧荣绪有了一位理解和支持自己事业、操持家务、生儿育女的贤惠妻子。又过了几年时间，臧荣绪自感欣慰的是：他不仅教授了上百名得意门生，妻子为他生了一个聪明、漂亮的儿子；而且，他还感到经过几年的爬梳整理、潜心研究，自己已完全掌握了写作东、西晋历史的技巧和中心内容，觉得现在是可以正式着手写作的时候了。于是，他暂时辞退了所有来从学于此的学生，闭门不出，潜心著史。

① 金山在今镇江市西北。本在长江中，清末长江江沙游积，方与南岸相连。

② 《南史·臧同文传》。

③ 《南史·关康之传》

门徒走了，臧荣绪有一个清静的写作环境；贤妻的调度和操持，又使臧荣绪免去了内外事务的纠缠。他的书房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札，以致房间的大窗户都被遮住了，本来就采光不好的书房变得更加幽暗，白天都要点灯才能看得清字。臧荣绪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停地写作，简直达到了不舍昼夜的程度。渐渐地，臧荣绪的名字在京口城内变得默默无闻了。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在一个冬天的早晨，臧荣绪的妻兄关康之突然驾船来到了臧家，其目的—来是看望小妹，二来是看望十几年未谋面的臧荣绪。臧荣绪—听妻兄兼挚友关康之来访，顿时喜出望外，匆忙之中竟手拿一本书稿从书房里跑出来迎接。关康之仔细端详臧荣绪，便发现才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当年英俊潇洒的臧荣绪，刚五十岁出头，竟添了满头的白发，背也有些驼了。关康之心中不免升起了一股怜惜之情。他关切地询问臧荣绪：“荣绪贤弟，你—人关在家里这么孤独寂寞，叫愚兄于心不忍。这等拼命写书，实非长久之计，何不经常出去走一走、活动活动呢？！”臧荣绪笑咪咪地说：“要说这孤独吗，我这里却真热闹；要说这寂寞吗，那我连—刻也—不得空闲哩。仁兄你不知道吧，天刚亮，我就与祖逖—起‘闻鸡起舞’；白天里，我便与谢安—道扬鞭跃马、驰骋疆场；到晚上，我又与琅玕王导—起促膝谈心，讨论定国安邦的大计，我的生活不是充满无限的乐趣吗？！”关康之立即就明白了臧荣绪的意思，知道他正在撰写《晋书》，心中又是惊讶，又充满敬佩，连声说：“快！快把你精心撰写的大作拿出来，让愚兄我先睹为快。”臧荣绪把正在编写的《晋书》搬出来，关康之看了几卷，就禁不住啧啧称赞：“太了不起呀！贤弟能写出如此传世之作，真乃当今的司马迁、班固啊！”臧荣绪谦逊地说：“过奖了，我这等浅薄之人，怎能与班马相提并论？”关康之放下手中的书稿，倏然站起来，激动

地说：“太史公曾说过：‘周文王被殷纣王囚禁而演绎了《易经》；孔夫子周游列国、四处碰壁而改编了《春秋》；屈原身遭陷害、流放，才写出著名的楚辞《离骚》；左丘明双目失聪而矢志写出《国语》；孙臧被庞涓剜掉了膝盖骨，忍辱负重写出了《兵法十三篇》；韩非身陷囹圄而写出《说难》，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们发愤写出的作品。至于太史公本人，惨遭腐刑而后写出了千古不朽的《史记》。贤弟幼孤，继而丧母，也可谓是屡遭磨难，你身处逆境而发奋著述，也一定可以写出流传百世的大作来。更何况贤弟的《晋书》已形成简约爽洁、叙事明白、读起来犹如水清月明的文风，何愁不能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呢？愚兄定然为贤弟广为宣传，贤弟再次广为天下所闻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关康之对臧荣绪的《晋书》的夸奖并非虚伪的恭维，也是该书正式完稿后的许多人读后的共同看法。臧荣绪精辟分析了西晋短期统一后迅速灭亡的原因，剖析了“八王之乱”爆发的起因，叙述了“八王之乱”后中原社会经济大破坏的局面，论述了各豪门世族在东西晋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讲述了琅邪王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历史渊源，并将东西晋历史所有的重大战役的前因后果序列殆尽……总之，臧荣绪把东西晋历史那种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历史画卷展现在每一个读者面前，使每个读者在读完他的《晋书》后，无不为他独到的见解所叹服。同时，臧荣绪的《晋书》文字简洁、朴实给读者以清静、明快之感，从而一反自西晋以来到整个南朝的文人们吟诗作赋大都犯片面追求形式、堆砌词藻、文风轻靡绮丽、内容空泛无味的通病。

关于以上所谈及的有关臧荣绪《晋书》的这些情况，我们从成书于北宋时期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引臧氏《晋书》的条目中可以看出：臧氏《晋书》确实实有其独到之处。如《太平御

览》卷138《皇亲部》引臧氏《晋书》惠羊皇后条及怀王太后条，同唐修房玄龄《晋书·后妃传》中同条相对照，可以看出臧氏《晋书》文字简炼、朴实的特点；又如《太平御览》卷138《皇亲部》还引臧荣绪《晋书》载梁皇后条曰：“梁皇后讳兰璧，安定人也，祖鸿季，仪同三司，父芬，司徒。后初为豫章王妇，怀帝即位，为皇后，永嘉中没胡贼。”遍查唐修房玄龄《晋书·后妃传》，没有梁皇后一条，可见，梁皇后这条史料为房氏《晋书》所漏载；再如《太平御览》卷249《职官》48引臧荣绪《晋书》所载傅咸任司隶校尉前后曾固辞此职及上任后整治社会混乱现象的史实，就有两处为房氏《晋书》所无：臧氏《晋书》称：“傅咸以议郎兼司隶校尉，咸前后固辞，辞言恳切，上不听，切勅使者逼就拜授，咸悲哽伤咽……咸卧病”，“治职时，朝廷宽弛，豪右放恣，郡县容纵寇盗充仞攻篡，囚徒掠夺市道，交私情託，朝野溷清……”，而房氏《晋书·傅玄传附子傅咸传》中，既没有记载皇帝“切勅使者逼就拜授，咸悲哽伤咽”，以致“卧病”不起之文；又没有记载当时社会“郡县容纵寇盗充仞攻篡，囚徒掠夺市道”之事，且文字繁杂，与臧氏《晋书》相比，确不及其文字简洁、朴实和史实全面。无怪乎成书于北宋的《太平御览》，会在唐修房氏《晋书》之外，特引臧荣绪的《晋书》达数十条之多。也无怪乎成书于唐朝景龙四年（710年）的刘知几所著的《史通》会高度评价臧荣绪的《晋书》。他认为：“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连《旧唐书·房玄龄传》也不得不承认：“贞观十八年，玄龄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是“史官多文咏之士，好采碎事，竟为绮艳”之作。

由于臧荣绪的《晋书》写得很出色，又加上京口名隐、学问家关康之的极力推崇，所以，臧氏《晋书》未成书之前，臧荣绪精修《晋书》的消息就在京口城内流转开来。多年来为人们所遗忘了的臧荣绪的名字，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谈论之中。

（三）隐居金山，终身不仕

到臧荣绪花甲之年时，写作了多年的“纪略志传百一十卷”的《晋书》终于大功告成。然而，多年来日以继夜地艰辛劳作，使得臧荣绪疲惫不堪。于是，脸色苍白、身体极度虚弱的臧荣绪在亲朋好友的劝阻下，不得不离开自己心爱的书房，以接受妻子及医生的调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治疗，臧荣绪的身体有所好转。不甘寂寞的心，使他再一次决定重操旧业，开馆招生授徒。但是，臧荣绪仍然不能从他所写完的晋朝历史中解脱出来，每天授徒之余，人们都会看到他独自坐在树下，面前摆上几盘小菜和一壶美酒自酌自饮着，但谁都不知道他还在思考着如何修改、完善臧氏《晋书》的方案。所以，很快他就赢得了自甘饮酒“乱德”之人的称号。

刘宋政权后期，政治统治越来越腐败。刘宋政权建立之初，刘裕为了抵制高门士族的影响，便让刘氏宗王广泛参预朝政，以防止异姓篡权。于是，在刘宋政权的近六十年间，就有了五位宗王出身的尚书令掌管国家大政。他们恃已与皇帝有特殊的血缘关系，专横跋扈，不可一世。他们不仅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理国治民的措施，而且也缺乏清廉施政、为国为民的品德。他们还拥有封国和军队，喜，则在州郡里骄奢淫佚；怒，则与朝廷拔刀相见，硬

是把一个好端端的刘宋政权搞得乱七八糟。目睹刘宋政权的腐败和社会上经常兵戎相见的现象，臧荣绪内心为之深恶痛绝，因此，当刘宋末年，萧道成（齐高帝）任扬州刺史，并征辟臧荣绪作为自己的主簿时，臧荣绪便严辞拒绝了这一邀请。以后，萧道成称帝、建立萧齐政权，急需一批为萧齐政权捧场的御用文人，尚书令褚渊在齐高帝面前，极力推崇臧荣绪的才华和品德，萧道成便不记前嫌，以“秘阁”之要职授他。先前臧荣绪已有“南徐州辟西曹，举秀才，不就；太祖（萧道成）为扬州，征为主簿，不到”^①的经历，为的就是不愿意以自己清白之身去沾染官场的铜臭和血腥气，现在萧道成竟让他到政治风云激烈变化的京城任职，所以，臧荣绪一次又一次婉言谢绝萧道成的使者，使得萧道成只好望而兴叹。

进入萧齐时期，年过花甲的臧荣绪日益喜欢通读和研究《五经》，他经常对他的弟子们宣讲：“昔吕尚奉丹书，武王致斋降位，李、释教诫，并有礼敬之议，因甄明之道。”^②所以，他潜心研究，并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了出来，汇成了《拜五经序论》一书。他还经常以孔夫子是庚子日出生的原故，便拿出《五经》重新拜读一番。为了表示他终身不仕、与世隔绝的坚定信念，他经常身穿黑色的长袄，并且自号“披褐先生”。齐高帝永明六年（488年），臧荣绪无疾而终，享年七十七岁。他的《晋书》虽然今天已散佚失传，但是盛唐房玄龄等人所修的新《晋书》是“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详洽”^③而成的。所以，臧荣绪的《晋书》没有白修，他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与世长存的。

① 刘知几：《史通》。

② 《南史·臧荣绪传》。

③ 刘知几：《史通》。

陶弘景



“山中宰相”陶弘景

· 张兆凯 ·

公元 487 年的某一天，在萧齐政权治下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城里，发生了一件引起全城轰动的事件。在齐王朝朝廷担任诸王侍读、奉朝请的一位饱学名人，因欲申请外任县令的要求被否决之后，一气之下，将所穿官服挂在神虎门上离了职，这天是他离开京城的日子。此人是京城有名的学问家，琴棋书画，也是门门皆精。老

百姓平时只听说他的大名，但无缘一睹其风采。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许多男女，知与不知，识与不识，早早吃了饭，纷纷拥向离京之地征虏亭，等候这位名人的到来。

大概在上午十点左右，几十辆牛车簇拥着这位名人来到了征虏亭。其中既有他的亲朋故旧，也有当朝的王公大臣。这位名人身穿便服，清癯的面容上，嵌着一副黝黑的长须，两耳中各有数十根黑毛垂于肩头。加上他那高大的身材，真有飘忽如仙的感觉。人群欢声雷动，该人亦频频抱拳致意，慢步登上为他准备的帆船。帆船缓缓离去，人们目送着他消失在地平线之中，久久伫立后，才怀着无限惆怅的心情离去。

这位具有无限魅力的名人就是当时闻名遐迩的陶弘景。

（一）少年博学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市）人。他的祖父作过王府的参军，这种官级别低，又无多大实权。父亲担任过县令，县令官位虽不高，但毕竟是一方之长。南朝时，地方官没有几个不贪的。一些在朝廷当官的士族，若需要钱用，就要求到地方上去做几年太守之类的官，吃饱捞足了，又回到朝廷来做官。陶弘景的父亲做过多年的县令，家中自然也积蓄了一定的财产，这对他以后能够潜心学问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陶弘景生性聪慧，个性内向。他不像一般的男孩子那样喜欢打打闹闹，而是经常偎依在父亲身旁，听父亲讲一些名人故事。父亲闲时也教他读书认字。弘景极为好学，四五岁时就经常独自用荻秆（一种草名）作笔，用灰作纸，练习写字。父亲的教导，加

上自己的努力，几年后，知识大进。他不仅能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也读了不少书。十岁那年，他得到了一本东晋道士葛洪写的《神仙传》，爱不释手，昼夜研读，他被这部书迷住了。少年大都充满神奇的幻想，陶弘景更是一心想做神仙。神仙可以腾云驾雾，不食人间烟火，可以长生不老，这些都太令人神往了。他对人吹嘘说：我“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①意思是说他作神仙腾云驾雾的日子不远了。不过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极为不幸的事，他父亲被自己的小老婆杀害了。小老婆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男人，史书不详，我们也无法推断。虽然小老婆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这对陶弘景的打击很大，以致使他得出女人是祸害之源的结论，他发誓一辈子不要妻妾。他活了近八十岁，终身未娶。

到了十余岁，陶弘景已是身材高大，眉目清秀，长耳宽额的帅气小伙。令人惊异的是，他的左右耳孔里各长出十余根黑毛，伸出耳外两寸许。右膝有数十颗黑子呈七星纹状，真给人一股飘忽如仙的感觉。在这几年里，他埋头读书万余卷，书中有一事不懂，亦深以为耻，必欲弄个水落石出。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只知读死书的书呆子。除读书之外，他学会了弹琴、下棋，书法更不必言。当时流行的草书、隶书他无不精研。陶弘景的才学形貌名闻遐迩。当时朝中当权的是即将篡位的宰相萧道成，萧道成虽是武夫出身，但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懂点学问，为日后继承他的事业做准备。于是派人把陶弘景请到京师，让他作诸王侍读。名义上是给他的儿子们读书作伴，实际上是做他儿子们的老师。另外还授予他奉朝请的官位，官虽不大，但对一介平民的陶弘景来说，也是难以企求的。陶弘景在宰相家里做事，很少与外人交往，每天潜心公务与

① 《梁书·陶弘景传》。

学问。萧道成代宋建立齐朝，朝仪故事，多来求问于他。他虽在朝中官位不高，时间不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研习了历朝礼仪，并能融会贯通，因而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二）中年学道

陶弘景在皇帝家做家庭教师十余年，收入甚微。家有老母，无以奉养，要求皇帝允许他去担任县令。县令官品虽比奉朝请低一级，但实惠得多。他的这个要求遭到了否决，理由很简单，朝廷需要他的学问，不缺少他这样的县令。他一气之下，脱下当官穿的衣帽挂在神虎门上，上表辞官。这时的皇帝是萧道成的儿子萧贇（zé，音则），叫齐武帝。齐武帝曾是他的学生，对这位先生的突然辞职，齐武帝很不高兴，但毕竟碍于老师的脸面，同意了她的辞职，还送了一些绢帛给他，并答应每月给他茯苓五斤、白蜜二斤，供其服用。动身那天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这种盛况空前的场面，是宋齐以来不曾有过的。陶弘景辞官后，安家于句容县（今属江苏）之句曲山。他常对人说：“此山下是第八个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围一百五十里，汉时有咸阳三茅得道来掌此山，故谓之茅山。”他在山中立馆，自号“华阳陶隐居”，与人往来书札，都以隐居代名。

安居句曲山后，他重新燃起了学道做神仙的愿望。他先到东阳（今浙江金华）去拜有名的道士孙游岳为师，学符图经法。尔后，他遍游江浙名山，寻访仙药。常年奔走于高山峻岭之间，身体锻炼得轻捷如燕，快速如豹。他对山水有特别的爱好，每到深山涧谷之处，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自制。他常对门徒说：

“官府的朱门大厦，虽然十分华丽，但我不想再进去。然而，我无论是望见高耸的巨石，还是看到无底的深泽，就有一种难以自制的愿望：或要高攀其上，或要投入其中。永明（齐武帝萧赜年号）时（483—493年），为了那点俸禄，我与达官贵要周旋，今日思之，也是大有裨益。因为没有那段经历，我也不会像今天这样能看透朱门的虚实，走上我所选择的山水之游。人们都说我身有仙像，这一切大概都是时命的安排吧”。当时有个大学问家叫沈约，他恰好担任东阳太守。知道陶弘景的高名，累次写信邀请他去郡府一聚，都被他婉言谢绝。

陶弘景自幼性格内向，中年仍不愿与人多交往。他曾建造一栋三层楼的房子，自己住在最上层，弟子们住在中层，宾客住在下层。平时任何成年人都不准上楼，只有一个家僮可进入他的房子。青年时，他善于射箭骑马，晚年则爱听吹笙。尤其爱听松涛声。他的庭院到处种着松树，每闻松涛声，欣然为乐。有时一个人走到有松树的泉石之处，盘桓久驻，望见者以为仙人下世。

（三）“山中宰相”

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陶弘景生于宋朝，在齐朝做过官。齐朝统治在南朝四代中最短，前后只有二十二年。齐末，东昏侯萧宝卷当皇帝，这是个昏淫残暴的家伙。萧宝卷的父亲是萧鸾（齐明帝），他是通过阴谋诡计夺得王位的。他的这位宝贝儿子萧宝卷，从小不务正业。齐明帝不对他进行正面教育，而是告诉他，他死后若有人发动政变，就应先发制人，“做事不可在人后”。所以萧宝卷即位后就拼命杀人。他的叔父和他的从兄从弟，基本上

被他杀尽。宗室内部的残杀严重削弱了中央的力量，最后导致了齐宗室雍州刺史萧衍的举兵向阙，攻杀萧宝卷，夺得齐朝政权，建立了梁朝。萧衍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梁武帝。

这位梁武帝虽然靠武力夺得政权，但他与宋的开国皇帝刘裕、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不同，他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当皇帝时已是三十八岁了，数十年的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他也喜欢结交各方面的人士，像陶弘景这样名震四方的大处士自然也是梁武帝结交的对象。梁武帝为贵公子时曾多次拜访陶弘景。陶弘景对这位谦虚饱学的贵公子也另眼相看，多次陪同他游历名山大川，两人感情融洽，每次见面都是极尽欢娱。齐末流行一首歌叫“水丑木，建台阁”。陶弘景对阴阳五行和图谶深有研究，知道是齐朝将灭，梁朝当兴。当萧衍的军队打到新林浦（今南京市西南）时，陶弘景派弟子抄小路送去书信，表示拥戴他。到萧衍将要建立新朝而无法定名时，陶弘景根据图谶，提议定名为梁。萧衍采纳了陶弘景的意见。梁朝建立后，梁武帝与这位献图谶的处士恩情愈笃，彼此书信不绝。前来拜访和看望陶弘景的达官贵人更是络绎不绝。

梁武帝希望陶弘景能够出山做官，多次派大臣带礼物进山请他，但陶弘景不愿出山。最后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有两只水牛，一牛散放于水草之间；一牛戴金笼头，被人牵绳，以木杖驱赶。梁武帝看了画，笑一笑说，此人不会出山，他欲效曳尾之龟，岂肯出山做官。但国家每有凶吉，征讨大事，梁武帝总是先要派人进山谘询，陶弘景也就所知毫无保留地给予回答。平时两人书信甚密，每月要通数封信。梁武帝事无巨细，都要通告或者与他商量，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对这位山中宰相，梁武帝确实是尊崇备至，每年都要派二官及王公贵要去句曲山参拜陶弘景数次。各种生活

用品、粮食衣物也派人按时送去。陶弘景除了接受生活必需的那部分外，多余的均予退还。

（四）勤于著述

陶弘景学贯儒道，琴棋书画，医药方术、阴阳五行，无所不晓。对山川地理，各地物产亦颇有研究。他生平著述甚多，有《学苑》百卷，还有《真诰》、《真灵位业图》、《孝经集注》、《论语集注》、《图像集要》、《玉匮记》、《七曜新旧术疏》、《占候》、《合丹法式》、《登真隐诀》、《本草经集注》、《陶氏效验方》、《肘后方》、《古今州郡注》、《帝代年历》、《古今刀剑录》等书。这些书写出来后，多秘而不传，流传下来的有《真诰》、《真灵位业图》、《神农本草经集注》等数本。

《真诰》是一部有名的道教经典，也是上清派道教的集成之作。陶弘景以杨义（东晋句容人，著名道学家）的《上清真经》、顾欢（陶弘景同时期人，道学家）的《真迹经》等基本教义为依据，吸收儒学和佛教的内容，兼及药物、按摩、导引诸术，编成此书并为之作注。这部道教经典，在道教神学理论上虽然没有多少新的内容，但它却保存了不少道教史料和有关天文、医药、炼丹等科技史料。

《真灵位业图》的全名为《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是一部排列神仙位置之书。他将道教所奉养的神仙分为七阶，每阶设一中位，又配以左位、右位。这七阶的中位次序是：元始天尊、玉宸道君，金阙帝君，太上老君，九宫尚书，定录真君，酆都大帝。元始天尊本生于太元之先，居于天界最高的玉清仙境，故应为道教

最尊崇的天神。玉宸道君乃是万道之主，列为第二中位。金阙帝君居于昊天金阙之中，即玉皇大帝，列为第三中位。太上老君为道教始祖，即老子，是混元皇帝，列为第四中位。其他各左右位，则配以已成仙的道士以及周武王、孔子等人。这样，经过陶弘景的编造，他所幻想的神仙世界里也是等级森严，尊卑有别了。

陶弘景在医学上的成就就是为《神农本草经》作注。

《神农本草经》是一部药理学专著，为秦汉时人托名“神农”所编撰。这部书对汉以前在药物方面的成就作了一次总结，收有三百六十五味药。其中植物药二百五十二味，动物药六十七味，矿物药四十六味，但分类不太科学。凡增身补养之药，列为上品，常用药则列为下品。由于药物归类不当，查找十分困难。另外，该书经过几百年的辗转传抄和删改，谬误不少。同时在此书编成后的数百年间，人们又积累了不少的药物知识，需要及时补入。于是陶弘景将书中的原有味药再加上后来新发现的药物，共七百三十味，全部编入该书并为之作注，名为《神农本草经集注》。

《神农本草经集注》共分七卷。书中摒弃以前的分类法，采用了以药物的天然属性为标准的新分类法。即将药物分为玉石（矿物）、草木、虫兽、米食、果、菜和有名未用等七大类。在每一味药物的后面，均注明药性和用途。他还将药物的药性细分为寒、微寒、大寒、平、温、微温、大温、大热等八种。因此这部书是继《神农本草经》之后的又一次药物总结，并使药物的分类更加科学化了。

陶弘景在这部书里还记述了一些新的特效药物，如槟榔治疗“寸白”（绦虫），茵陈治黄疸，栝楼治消渴病（糖尿病）等；其次他引用了朝鲜等国传入的五味子、昆布、茺莢等新药物；另外还制定出丸、散、膏、丹、汤、酒等的制作规程，这些都是药理学

上的新成就。

《神农本草经集注》的分类法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唐代的《唐新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分类，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实和完善起来的。

（五）羽化归天

陶弘景精于医学，对于道士推崇的辟谷、导引之术自然也很精通。所谓辟谷，就是通过气功达到不食或少食五谷；导引，意即练气功的一套动作，如肺部的深呼吸，俯仰起坐等等。与大多数道士一样，陶弘景对炼仙丹也很在行。梁朝建立后，他想炼仙丹，苦无药物，梁武帝送给他黄金、朱砂、雄黄等，助其成功。他炼出的仙丹色如霜雪，服了之后，觉得身体轻盈，有飘忽之感。他把炼好的仙丹送给梁武帝服用，梁武帝亦颇感灵验。服仙丹的人需要戒性欲，陶弘景自己一生不曾婚娶，而梁武帝四十岁之后就隔绝房事，恐怕与陶弘景的劝说有关。梁武帝活了八十多岁，老年后身体仍然健壮，他是在侯景攻入健康后，被困在台城，活活饿死的。否则，也许会活得更长些。

陶弘景的仙丹虽灵验，但毕竟不是长生不老药。八十岁时，陶弘景自知寿命将终。终前数月，他不食五谷，唯把从山上采来的各种草药煎熬成汤，每天服饮数碗。一段时间后，肌肉消瘦，但面容红润。数月后，虽心脏停止了跳动，而颜色不改，肢体屈伸如常，死后香气满屋，累日不散。死前曾交待门徒，死后不要沐浴，不要设灵床，只要在地上铺两床席子，穿上活着时的旧衣，上面加冠巾法服，左肘放一个绿铃，右肘放一药铃，佩符洛在左腋

下，然后绕腰穿环结于前胸，头发用钗扣住，再用大袈裟把全身包起来。死后一百天内每夜点灯，日日燃香。门徒弟子遵命行之，尸体不腐，香气盈室，都谓他已“羽化成仙”了。

陶弘景死后，梁武帝非常怀念，下诏赠为太中大夫，谥曰“贞白先生”。

陶弘景精于五行之术，他预知梁朝的灭亡之期，死前曾写下四句诗：“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意思是说，西晋王夷甫（名衍，西晋宰相，清谈名士），曹魏的何平叔（名晏）只知道坐谈玄理，没想到皇帝的昭阳殿却作了单于（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称为单于）的宫殿。写好后把诗密藏于小箱子里。死后，门徒拿出来传阅。陶弘景死后数年，梁朝人士因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加上梁武帝的昏庸，导致侯景乱梁，侯景果然在昭阳殿称帝。当然这四句诗只是传闻而已，即使有之，不是陶弘景对当时政局的深刻分析，也是一种偶然的巧合。陶弘景不是神仙，世间也没有能预知未来的神仙存在。



阮
孝
绪

崇尚自然、追慕高士的阮孝绪

——汪清朱彧——

阮孝绪，字士宗，祖籍陈留尉氏（今属河南），后迁居建康（今江苏南京）。主要生平活动在南朝齐梁时期。他终生清雅高洁，不为当世风云变幻所左右，不为荣华富贵而低眉，不因功名利禄而折腰。崇尚自然，不执于物，不泥于事，与山同呼，与云同游，是南朝有名的隐逸之士。

（一）醉心山水，追慕高士

阮孝绪的父亲阮彦之，在刘宋时官至太尉从事中郎，是当朝的显贵，因此，阮孝绪小时过的是公子少爷的生活。特别是阮氏到他这一代时，他的同族伯父阮胤之无子，对他尤为疼爱。在阮孝绪七岁那年，终于过继给了伯父阮胤之。不久，阮胤之的母亲周氏死了，留下了百余万遗产，由于她特别钟爱阮孝绪，临终时留下遗言：将自己的私房财产全部归阮孝绪。当周氏安葬礼毕，人们把周氏的遗嘱告诉给阮孝绪时，没料到他坚决不要一枚铜钱，希望把所有资财全部给阮胤之的妹妹，也就是琅邪王晏的母亲。众人听了，有的人惊异，说他不同凡人，有的人叹息，说阮胤之收了一个白痴儿子。这也难怪人们会有后种想法，因为阮孝绪很小的时候，其所作所为与一般儿童迥异，他显得特别文静，有时一人独自坐在潺潺的溪水边，掬一捧清凉的泉水，久久凝视；有时伫立在清幽深邃的山林中，抚摩挺拔的树干，侧耳倾听；有时远眺旷野，眼随天际中缕缕飘动的白云转动。对于他的这些行为，只有他的伯母心里一清二楚，她知道阮孝绪纯真的心灵中，无尘垢之染，而钟情于自然的盎然生意。自然界的山山水水，花鸟虫鱼，是他崇敬的偶像，是他寻求快乐人生的源泉。

由于阮孝绪小时与儿童们游戏时，总是挖掘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池塘，构筑奇特的峰峦，所以，久而久之，其他孩子就不愿和他一起玩这种又累又脏的游戏了。而阮孝绪却乐此不疲，一人独自为乐。到九岁那年，他父亲为他请了塾师，教习《五经》。阮孝绪在读书方面，简直有惊人的天赋，几乎是一教就会，一学

就通。十三岁时，他对《五经》均能背诵如流。十五岁那年，他的父亲为了让他早日跻身宦海，在他行加冠之礼（意即成年）后，对他说：“从现在起，你就长大成人了，应该艰苦地磨砺，树立远大的志向，争取早立功名，名垂朝野。”阮孝绪对父亲的谆谆告诫，似乎并不明白，他回答说：“我已通晓《五经》，如果继续用功，虽不乏谋得显位厚禄，但不免要混杂在浑浊繁杂、尔虞我诈的尘世中，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我只愿像赤松子^①那样蹈迹瀛海，像许由^②那样啸傲山谷，徜徉水滨，即便草褥荷衣，抱木而死，也没有什么遗憾。”从此以后，他便独自深居一室，除了向父母问安外，家中其他人很少相见，外人则更是难见其面。亲戚朋友知他如此清心寡欲，都把他看作“居士”（指未做官的士人），不敢随便去打扰他。

建康城有一山称钟山，因坐落在城北，又称北山。钟山峰峦起伏，峰岩嶙峋，松柏苍劲，虬枝婆娑。山花野草，遮隐着弯弯的山道；暮霭晨雾，掩映着幽谷深壑；汨汨涌泉傍岩倚石，如鸣佩环。建康此时已是数朝旧都，衣冠人物荟萃于此，然而，由于时局不稳，干戈横舞，在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之下，不少有识之士，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尘世的血腥污秽之事令他们耳不忍闻，目不堪睹，于是纷纷隐于钟山，把这里看作是逃避现实，寄托情感的乐土。据说，有一天阮孝绪登上钟山后，放眼望去，只见不少隐逸之士在此间逍遥自在，恬然自安，顿时萌发了为他们这些人立传作纪的念头。他回到家里以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从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开始，一直写到萧梁末年，也就是他生活的

① 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神农时为雨师，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不烧。至昆仑山，常入西王母石室，随风雨上下。

② 许由，上古高士，隐于箕山。相传尧让以天下，不受，遁耕于箕山之下。

当世。将洁身自好的高洁之士，全都罗列进去。经过仔细考虑，他把所罗列的人物分成三类：凡是那些守节不移，具有超越世俗的姿态，无拘无束可凌驾白云，度量可与白雪比洁白，只留下事迹而没有留下姓名的隐士，放到上品；那些耸然挺立于世外，皎洁如云霞，视千金如草芥一样而不顾，摆脱天子的位置就像脱掉旧鞋一样轻易而没有丝毫留恋，这些人终生不渝，对名利毫不染指而留下了姓名和事迹，视为中品；还有那些身在朝廷，虽挂冠人世，而心在江湖者，放在下品，全书命名为《高隐传》，共计收录一百三十七人。

（二）孝顺父母，感动神灵

阮孝绪十六岁时，他的父亲阮彦之不幸去世。尽管阮孝绪是个螟蛉子，但他所表现出来的悲哀，与丧亲父毫无区别。为了寄托对父亲的哀思，在守丧期间，他不穿稍有文彩的衣服，只穿粗劣的麻衣，吃的是清淡的蔬菜。邻人见此，在称赞一番之后，用疑惑的口气问道：“你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何必像对待生父一样呢？”阮孝绪回答说：“我怎么不是他的儿子呢？父子的名份是无法改变的。何况讲求孝道是没有条件的呢？”几句话说得问他的人无地自容。

父亲去逝后，他对母亲更加孝顺。一次，母亲突然病了，这时阮孝绪正在钟山交游听讲，他的兄弟想派人将他唤回，他母亲阻止说：“孝绪自有灵性，我的病他会自然感悟，不必去叫他，他就会自动回来的。”果然，那天阮孝绪突感心中惊异，匆匆地赶回家，应验了他母亲的话。

见到病重的母亲以后，阮孝绪心急如焚，他赶紧请来名医调治。医生开了药方之后，他又立即到药市中配药，可是，几乎找遍建康城，就是配不上一味名叫“生人参”的草药。卖药的人告诉他，这种药是钟山的特产，因生长在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上，非常稀少，所以一般是没有卖的。为了尽快医治好母亲的疾病，阮孝绪背上药筐，拿了把小锄，独自上了钟山。他在山中转了几天，就是不见有药师所描述的生人参。他翻过一道道逶迤的山梁，跨过一道道深幽的山谷，穿过一丛丛锋利的荆棘，汗水湿透了衣襟，脚磨出了血泡，但他坚持不懈。一天，当他正在一悬崖边仔细寻找时，忽然深谷中传来了呦呦鹿鸣，他略一定神，只见不远处一只美丽的小鹿，眼睛正温柔地朝他瞅眼，像是在召唤自己一般。阮孝绪好奇地朝小鹿走去，小鹿缓缓地向前，跳一步停一步，毛茸茸的四蹄在草丛中交错显现，还不时地回头张望，像是招呼阮孝绪，但总是保持着一段距离。阮孝绪似乎感到冥冥之中有神灵在向他昭示，他正为母亲走着一条求生之路。走了一阵，恍惚之间，小鹿不见了，阮孝绪正感诧异时，只见前面的悬崖边，一株株生人参在山风中摇曳。阮孝绪小心翼翼地把生人参连根挖下，装进背筐，然后一路小跑，迅速赶回家中。奄奄一息的母亲服药以后，立即病愈。后来，当他采药的经历被传出以后，人们都说是他的孝心感动了神灵，因而给他指点和帮助。

（三）洁身自好，傲视富贵

阮孝绪的表兄王晏，是东晋以降琅邪王氏之后，世为大家，家世显耀，贵不可言。他仗着家族的权势和巨额的钱财，作威作福。

曾经多次前往阮孝绪家探访。刚开始时，在父母的要求下，阮孝绪还勉强从书房中出来与他相见，后来，他发现王晏鬼迷心窍，汲汲于名利，且喜欢玩弄些小聪明，所以料想他“多行不义必自毙”，可能会招来横祸，便常常逃匿，不肯与他相见。越是这样，王晏越要见他。每次阮孝绪听到王晏来时的车马声，他就爬过院墙，逃出去躲藏起来，弄得王晏经常扑空，自讨没趣。久而久之，也就不再纠缠阮孝绪了。

有一次，阮孝绪吃饭时，桌子上有一盘佐餐的酱菜，味道非常鲜美可口。他吃了一口以后，忙问家人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家人告诉他说是王晏派人送的。阮孝绪像是吃到了苍蝇，立即吐出口中的食物，将盘中的酱菜倒掉，又弄来水将嘴漱了一遍又一遍，盘子刷了一次又一次。并且告诉家人，以后不要接受王晏送来的任何东西。

不久以后，王晏因为作恶多端，恶贯满盈，被皇帝处以死罪。在当时，由于一人犯罪株连九族，所以，当王晏被处死的消息传出以后，阮孝绪一家怕受到连累，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只有阮孝绪一人，若无其事，对大家说：“虽然与王晏是亲戚，但我们没有与他同流合污，更没有与他一同作恶，怎么会受到株连呢？”果然，朝廷在追查王晏事件时，得知阮孝绪平时不仅没有与王晏交往，而且还多次拒王晏于门外，所以，对阮孝绪没有追究，连家人也没有受到一点株连。事后，一家大小在惊慌过后，都佩服阮孝绪有长远的眼光和超出常人的见识，认为当初要是见小利而忘大义，必然要为王晏所累。

南朝时，统治者相互倾轧，政治混乱，今天这人上台，明天那人下野；今天这人逼宫，明天那人“禅让”，政权更迭频繁。刘宋后期，萧衍乘宗室内讧之机起兵进围建康，但很久攻不下城池，

城中由于被围旷日持久，物资匮乏，老百姓易子而食，一片哀鸿。阮孝绪家也困在城中，十分窘迫，连烧火的柴草都没有了，他的妻子只好把邻人坟墓上的柴草拾来做饭。阮孝绪闻知此事，不肯吃用那柴草做熟的饭，而宁肯让家里人拆下房屋的木头当柴烧。他将家里的床搬到树林里，周围再围上一些树枝，并不怕风吹雨打，寒露霜侵，仍怡然自乐，并给这起了一个美妙的名字，叫“精舍”。

洁身自好的阮孝绪，很受人们尊敬，在社会上也获得了很好的名声，有些附庸风雅的官僚，为沽名钓誉，便矫揉做作地想去拜访他，沾取一点“清高”的光。但在真正的高雅之士面前，他们只能望背兴叹。有个御史中丞曾来到阮孝绪的门前，但不知怎的感到一股十分巨大的威慑力量，徘徊好久，终不敢进屋，最后只好说：“阮居士的屋虽近在眼前，但他本人却总是像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啊。”说完悻悻而回。

后来，朝廷中有人推荐阮孝绪，皇帝想征召他出任官职，但却遭到阮孝绪的谢绝。朝廷的使者劝道：“过去当逢乱世之时，有才能的人才隐居不做官，现今天下太平，政治清明，而先生还要隐居尘世之外，怎么可以呢？”阮孝绪回答说：“周朝建立之初，可谓太平世道，但伯齐、叔夷还宁可采摘苔藓蕨菜充饥而不食周粟；汉朝建立之初，还有许多高洁之士，不觉山林寂静。人各有志，不可勉强。何况我还无法与过去那些贤德的人相比呢？我并非有意要羞辱富贵人家，只是生来惧怕高耸的庙堂。如果我能有麋鹿可骖，又何必去乘坐高车大马呢？”使者只好作罢，不可逆意强求。

阮孝绪有个姐姐，嫁给了鄱阳忠烈王，做了妃子。忠烈王与阮孝绪成了郎舅，有道是天下除了郎舅无好亲。忠烈王一次命手下准备好车马，打算携阮孝绪一起游玩。阮孝绪听到这个消息，正

想躲开时，忠烈王的车驾已到，堵住了前门，逼得阮孝绪赶紧转回身，在后墙上挖了个洞，才逃出去。几次三番，终究不愿见他的王侯姐夫，也从不接受忠烈王送来的礼物。直到忠烈王死的时候，相互之间不知各自长的什么模样。有人问阮孝绪，不与忠烈王交往的个中原因，阮孝绪回答说：“我本来就是平凡的人家，不该和王侯有姻亲关系，不料我姐无意间邂逅了王侯人家，这和我的初衷是无关的，我怎么能曲意高攀呢？”

(四) 安贫知命，至死不渝

阮孝绪终生不愿结交王侯富贵人家。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气贯长虹。终生生活清贫，特别是到了晚年，每况愈下，平常蔬食淡菜，本来还有喝杯薄薄水酒的嗜好，但最后也难于维持。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刘歊(yīn, 音寅)的，曾想周济他一点，送些米给他，不料阮孝绪坚决不受。

梁武帝时，因崇信佛教，不好儒道，禁止谶纬之学。阮孝绪正好有这些内容的书籍，他起初觉得毁掉有些可惜，友人劝他将书藏起来，阮孝绪说：“汉时淮南王重视学术研究，召集天下有才能的文人撰写《淮南子》，但却遭了大祸，这还不如没有的好呢？”说完忍痛要将这些书销毁，友人见他恋恋不舍的样子，就向他索要这些书，答应替他保藏起来。阮孝绪连连摆手说：“自己所不愿的东西，怎可嫁祸于别人呢？”终于烧了这批书。

大同二年正月(536年)，阮孝绪忽然意识到自己已到垂暮之年，天年将尽，对人说：“我的寿命与刘著作同年。”刘著作，即阮孝绪的一个朋友刘杳。不久刘杳死了，阮孝绪泰然说：“刘先生

死了，我还能有多少日子呢？”果然这年底也溘然而逝。他的门徒追记他的德行，谥号“文贞处士”。从此，阮孝绪魂归钟山万壑千涧，蓝衣荷冠，在云霞孤映的山上弹琴，在明媚独照的月光下歌吟，与山河同寂，与晨猿作揖，蕙草幕帐，终成他的归宿。

李士谦



徐则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 ——隋朝三隐士

· 史建群 ·

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像一颗流星，转瞬即逝。然而，就在这短短三十余年的统治时期，依然有三位隐士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李士谦、徐则与张文诩。

(一) 乐善好施的李士谦

李士谦，字子约，赵郡平棘（今河北赵县）人。他是一位以道德高尚而闻名于世的隐士。

李士谦是个孝子。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年幼的士谦侍奉母亲十分孝顺。有一天，他的母亲突然恶心呕吐，污秽的东西吐了满地，气味难闻。士谦怀疑母亲是食物中毒。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他跪在地上尝吃母亲吐出的脏物。士谦的伯父，岐州（今陕西凤翔东南义坞堡）刺史李瑞听说了这件事，常常称赞他是“李家的颜回”。东魏广平王元赞也非常钦佩他的孝心，于是任命年仅十二岁的李士谦为自己属下的开府参军。不久，士谦的母亲也死了。按照封建社会的惯例，他辞去官职，为母守丧。由于怀念抚养自己成人的母亲，李士谦茶饭不思，骨瘦如柴。而且，从此以后，由于思念双亲及笃信佛教的双重原因，他就不再饮酒吃肉，口无杀生之言。李氏是当地有名的大族。每逢春秋二季，按照风俗，李氏总要欢聚高会，一醉方休。有一次，李氏宗亲相聚在李士谦家，士谦命人准备了丰盛的酒饌。但在宴会开始之前，他又叫人给每位族人上了一点黄米饭，然后说道：“孔子称黄米为百谷之长，荀子也说饮食以黄米为先。古人定下的规矩，我们岂可违背？”言下之意是责备李氏宗亲过分奢侈浪费，也表明自己不食酒肉乃遵圣人古训。众人听了他的话，肃然起敬，没有一人敢像往日聚会一样喧哗胡闹。一些年轻人相互议论说：“今日见到了道德长者，闻听高义，才知自己的不足。”

李士谦是一个乐于助人并且宽以待人的长者。士谦家是比较

富有的，但他自奉甚俭，救助赈济别人，却毫不吝惜。乡亲们有家贫无力备办丧事的，他总是努力为之奔走，及时送去所需之物。还有两个兄弟分财不均而发生争执，以至于准备到官府打官司。李士谦听说以后，用自己的钱财为分得少的人补足，让他得到和兄弟一样多的财物。两兄弟见士谦出财补足，羞愧异常，便相互推让而不再争吵。自此以后，两兄弟都改过自新，成了闻名乡里的善士。凡是别人的牛跑到自己田中糟踏庄稼，士谦总是把牛牵到荫凉处，饮水喂食，精心照料。发现有人偷盗自家的庄稼，他总是躲避起来，生怕偷盗者看见自己而难堪。他家的仆人曾经捉到过偷庄稼的人。李士谦安慰小偷说：“你是为饥饿所迫，才干这样的事，这是不应该谴责的。”马上命仆人放了小偷。又有一次，乡亲董震喝多了酒，与士谦家的仆人角斗。董震扼住仆人的脖子，用力过大，竟然把人扼死了。董震十分害怕，主动向士谦请罚。士谦说：“你本无心杀人，这是误伤，何必谢罪？但你最好逃到远处去，免得被官府捉拿拘执。”还有一年，年成不太好，许多乡亲都向士谦借贷，累计达数千石之多。乡亲们借债时说是收了庄稼还债。不巧的是，第二年收成还是不好。大家都向士谦求情，要求宽限一年。士谦说：“你们拿去的是我家剩余的粮食，本来就是救济大家的，我岂是用来赚取利息的？”于是，他把借债人全部召集在一起，为他们准备了酒食，并当着大家的面烧掉了借贷字据，告诉借债者说：“债已了了，请不要放在心上。”一年后，粮食大丰收，借债各家争着来还债。李士谦坚辞不受，一颗粮食也不让大家偿还。后来，又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许多人都饿死了，路上到处都是死尸。李士谦把家中存粮拿出来熬成粥，施舍给饥民，救活了上万人。他还让家中的仆人把路边的尸体掩埋起来。到了春天，又拿出粮食和种子救济贫民，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家乡的

农民非常感激他，常常抚着孩子的头说：“没有李参军，就没有这个孩子了！”有一位士人曾对士谦说：“你积了不少阴德啊！”士谦答道：“所谓阴德，就像耳鸣一样，只有自己知道。如今我做的事，你都知道了，哪还能叫阴德？”

李士谦是个好学的人。他在母亲死后，把自己的房子捐作寺院，然后外出游学。他勤学不倦，博览多识。不仅精通儒学，而且还懂得天文历法，又深研道家学派之奥妙及佛教经典之精义。他深信佛教生死轮回的理论，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人请他评论儒、佛、道三教优劣高下，他回答说：“佛教如日，道教似月，儒家为五星。”由于他才学过人，善行卓著，北齐吏部尚书辛术任命他为员外郎，赵郡王高叡也举荐他，可他一概称病不就。和士开准备上奏朝廷，建议授以官职，士谦坚辞得免。隋朝取代北齐以后，他依然立志不仕。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李士谦去世，终年六十六岁。家乡士女百姓闻讯，哭泣道：“苍天无眼，怎么不让我死而让李参军死了呢？”下葬之时，前来为士谦送行者，达万余人。李景伯等人把士谦的事刻于碑上，立于墓前。李士谦之妻乃范阳（今河北涿县）门阀世族卢氏之女，她坚决谢绝乡亲们赠送的财物，并且说：“参军平生好施。如今人虽已死，怎能改变他的志向呢？”不但如此，她还拿出五百石粮食赈济穷人，以此抚慰丈夫在天之灵。

（二）辟谷养性的徐则

徐则，乃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在文献记载中，他是一个类似仙人一般的隐士。

徐则年少之时即沉默寡言，恬淡寡欲。他师从周弘正求学，于道家学派尤为精通。他擅长辨析名实、有无等哲学概念的关系，有自己独到见解，名闻远近。但徐则对“名”看得很轻很轻。他想：“名，不过是表示实的符号。难道我能作这样外在的符号吗？”想到这里，遂隐居山林。有一天，他手持木杖，进入缙云山（今浙江缙云县东北仙都山）定居。几百名仰慕他学问的年轻人，追随入山，苦苦恳求他讲学教授。徐则婉言谢绝，把他们打发下山了。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学习，他不娶妻成家，生活上也自奉甚俭。

陈朝后期，徐则应杨坚之邀来到北方，落脚在至真观。过了一个月，他辞别杨坚，进入天台山（今浙江天台县城北）。从此之后，辟谷养性，食物只有松子和清水。即使三九隆冬，他也不穿棉絮，只有一件单衣已足以御寒。据说，他在缙云山修道之时，太极真人曾下凡对他说：“你在八十岁的时候，当为王者师傅，然后得道成仙。”事有凑巧。后来晋王杨广镇守扬州的时候，亲自写信邀请他去扬州。徐则对弟弟说：“我今年八十一岁，晋王来信召我，太极真人的预言真灵验啊！”立即装束上路，到达扬州治所江都之后，杨广请他教授法术，徐则推辞说时日不对，要等几天才行。半夜时分，徐则命侍者取来香火，按照朝见皇帝的礼仪准备停当。徐则穿好衣服，静卧待死。果然，到五更时分，徐则气绝身亡。但他的尸体柔软如生，停放几十天，颜色不变。杨广见徐则已死，命人护送灵柩回天台山安葬。可是，就在徐则尸体还未运到的时候，从江都到天台山的路上，时常可以见到徐则匆匆赶路。回到天台山，他把自己的书籍分送给诸弟子。然后，又命弟子打扫一间房子，并且交代说：“如果有客来，把他们请到北屋。”说完，骑在一块石头上，不知到何处去了。时年八十二岁。

上述离奇古怪的神话，当然是古代迷信思想的反映。但由此

可知，徐则是一位道教忠实信徒。他之所以隐居不仕，显然是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结果。

（三）道德长者张文诩

与徐则同时的隐士，还有一位叫张文诩，则是儒教的信徒。张文诩，河东人，其父张琚，在隋文帝时任洹水县（今河南安阳一带）令。张琚清正廉明，家有数千卷藏书。他教育子侄很有成效。张文诩兄弟都以通晓儒家经典而闻名于世，文诩尤精于《周礼》、《礼记》、《仪礼》、《诗经》、《周易》、《尚书》及《春秋》三传亦皆通习。他特别重视郑玄注，以为兼具通与博两大长处。其他诸家注，张文诩也很熟悉。隋文帝召集天下名儒硕学之士，如房晖远、张仲让、孔笼等人都授以博士之职。但张文诩游学太学，房晖远等人莫不钦佩拜服。他们的弟子有疑难问题，也都跑去向张文诩请教。文诩一一为他们答疑解惑，旁征博引，辩说无穷。治书侍御史皇甫诞为当世俊彦之士，常执弟子礼请教学问。每次拜见张文诩，到张宅附近，他总是牵马步行，以示敬仰。右仆射苏威素闻其名，于是召见张文诩。二人一番长谈，苏威顿觉相见恨晚。他极力劝张文诩入朝做官，文诩固辞不受。文帝末年，天下大乱征兆已明，太学毁废。文诩毅然还家，耕种田地。地方官屡次举荐，他都不从命。

按照儒家道德规范衡量，张文诩是一位道德长者。他不仅侍奉母亲十分孝顺，而且对人极其宽厚。有一次，张文诩夜间行路，突然发现有人正在偷割自己的麦子，他害怕那人发现自己而羞愧，急忙隐藏到庄稼地里。没想到庄稼的响声还是惊醒了心虚的小偷。

那人见张文诩避而不见自己，非常感动，急忙向张文诩道歉。张文诩一面安慰他，一面发誓决不将此事告诉别人，并且坚持让那人把割下的麦子拿走，以解燃眉之急。数年后，还是那位盗麦人将此事公之于众，乡亲们才知道这件事。张文诩的邻居总觉得他多占了自家的宅基地，心中愤愤不平。当邻居家翻修围墙时，张文诩主动扒掉自己的旧墙，向后挪动了很远，以满足邻居的欲望。张文诩还有一段时间腰部有病。一位医生自称能治此病，但在治病时却误伤了文诩的腰，血流不止。张文诩腰痛得起不了床。那位医生叩头请罪。张文诩立即放他走了，以免坏了医生的名声。

地方官因为张文诩家贫，依例准备救济他，他从不接受。每当闲来无事，他常感叹时间流逝，老之将至，而名誉不立。当时的人都把他比作孔子的弟子闵子骞和原宪。年仅四十岁，张文诩就因贫病交加而离开了人世。乡亲们十分怀念他，集资为他修碑，以寄托哀思。

王
绩



隐于酒乡的“斗酒学士”王绩

· 王 珍 ·

王绩，字无功，自号东皋子。汉族。隋开皇五年（585年）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东南）人。他出身官宦世家，世代在朝做官，自高祖王虬从南朝北归以来，历经北魏、北周，以至隋朝，到他这一辈，已经“六世冠冕”^①。哥哥王通，号文中子，是

^① 《东皋子·序》。

隋末大儒，著作颇丰，但大多散佚，仅存《文中子》十卷。他知书达理，遵守礼法，循规蹈矩。王绩的性格、作风则与哥哥王通迥然不同，他不喜拜揖，不拘礼节，纵诞放任，嗜酒成性，不与乡人交往，我行我素，独步当时。

（一）适逢动乱，挂冠归隐

王绩自幼聪敏好学，博闻强记，对阴阳历数之术，无不洞晓；喜谈《周易》、《老子》、《庄子》等书，将它放于床头，随时翻阅；他还精通音律，雅好鼓琴，为知音者所赏识。他长到十五岁时，已经是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相貌堂堂的魁伟少年了。他情高气盛，不甘居于人下，遂于开皇十九年，也就是他十五岁的那年，便独自一人遨游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并亲自登门拜访隋朝重臣上柱国、越国公杨素。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他旁若无人，口似悬河，谈笑风生，把国家大事分析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在座的大臣无不听得入神，都赞叹他的才华，“一座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①。

隋炀帝大业（605—618年）中，王绩以自己的才华举孝廉高第，而朝廷只授给他一个秘书省正字的小官。他未入仕途前，曾雄心勃勃，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现在事与愿违，自己虽中高第，但只让做些校正书籍之类的烦琐小事，整天手不离卷，咬文嚼字，校其谬误，枯燥无味，这与他旷达放任的性格，格格不入，因而十分反感，认为朝廷不能正确使用人才，使他感到非常

^① 《唐才子传·王绩》。

失望。他厌恶这种繁杂呆板的生活方式，遂托疾辞去这一职务。不久，他又被发放外任，改授扬州六合（今属江苏）县丞。他到任之后，终日饮酒，不理政务，同僚苦苦相劝，他置若罔闻，仍我行我素，嗜酒如命，致使公务积压，百事俱废。在他任县丞期间，又多次受到别人弹劾，因而心中十分愤懑，遂产生了弃官归隐的念头。

隋炀帝即位后，又自恃国力强盛，就滥用民力，大兴土木，修建东都洛阳，开挖运河，征伐高丽（今朝鲜），繁重的徭役和兵役，把全国百姓逼入绝境，再加上当时刑法苛酷，剥削沉重，百姓在忍无可忍、走投无路之下，纷纷聚众起义，和官府相对抗。大业七年，王薄以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县南）为根据地，自称知世郎，首举反隋义旗；接着翟让在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南）举行起义，建立起瓦岗军；窦建德在河北也率众起义；大业九年，杜伏威、辅公祐也参加了起义的行列。他们攻州伐县，杀富济贫，使隋军疲于奔命，忙于应付。反隋的烈火，很快燃遍大河上下，长江南北。隋朝的统治，处于分崩离析，岌岌可危之中。

王绩观察形势，审时度势，见当时天下大乱，自己的宏伟抱负也难以实现，他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①一诗中曾回忆说：

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

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

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

弃繻频北上，怀刺几西游。

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

① 《全唐诗》卷 37。以下所引王绩的诗均同此，不再注明出处。

他本来抱着远大的志向，想学好“明经”、“占星”、“望气”、剑术等本领，一旦名登高第，“待诏”之时，才能报效国家，实现其“觅封侯”的愿望。但时乖命蹇，事与愿违，仅做了个正字、县丞之类的小官，还时时受人挟制、弹劾。现在天下大乱，自己还能有什么追求呢？况且隋朝的法律又森严苛刻，他忍受不了这种受人挟制、弹劾的痛苦，就感叹地说：“做官好比头顶上高悬着罗网一样，时刻都得小心谨慎，遵守礼法，不能有半点越轨，没有丝毫自由可言，如稍有不慎，就会招来不测之祸，还不如辞官而去，寻找个安身处所，饮酒作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生活好呢。”于是他把朝廷发给他的俸禄银两钱财等物，用布帛将它尽数包好，堆放在县衙门前，托以风疾，挂冠乘夜而去。途中又雇了一条小舟，乘风破浪，轻舟沿运河北上，途经河南、河北，四处漂泊遨游，最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龙门，归隐乡里。

（二）“斗酒学士”，颂扬酒德

隋季板荡之后，李渊建立唐朝。武德（618—626年）初年，唐高祖李渊为了笼络人才，王绩被以前官待诏门下省。由于自己的坎坷遭遇，王绩对新建立的唐王朝并无好感，他在《赠李征君大寿》一诗中就有“去去相随去，披裘骄盛唐”之句，借刻画李征君的形象，来反映自己蔑视唐王朝的政治态度。因此，他任待诏期间，仍故态复萌，整日饮酒，无所事事。按唐制规定：“官给酒日三升”^①。王绩的弟弟王静，当时任职武皇千牛，担负着护卫皇

^① 《新唐书·王绩传》。

官的任务，有一次他见到哥哥王绩，便问他：“当个待诏你乐意吗？”王绩立即回答说：“做待诏之官，俸禄少得可怜，况且又寂寞无聊，实在没什么意思。但是，每天发给美酒三升，这个差事还是值得留恋的。”王通的门生陈叔达，这时任侍中，又进封为江国公，当他听到王绩的这番话后，便对门下省官员说：“三升良酝，未足以绊王先生。”^①并指示从今日起，特判日给美酒一斗。王绩对此表示很满意。从此以后，官员们都戏称他“斗酒学士”。

王绩自得了“斗酒学士”的雅号之后，便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常对人说：“遗憾的是不能与刘伶相伴，关起门来痛饮一场。”刘伶是西晋人，以豪饮著称，整日烂醉如泥。有一次，他刚醒过来，又向妻子要酒。其妻见他如此嗜酒，劝他保重身体，不能再喝了。没想到刘伶这次非常爽快，并且说空口无凭，要妻子摆上酒菜，对天盟誓，才能戒掉。其妻闻言大喜，忙备好一桌酒菜，刘伶双膝跪倒，对天起誓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②祝毕，又举怀痛饮，转眼又烂醉如泥。他一向蔑视礼法，以纵酒放诞闻名于世。他还著有《酒德颂》，从理论上阐述酒的功德。王绩则仿效刘伶的《酒德颂》，著《醉乡记》一篇，和刘伶相唱和。他说“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的地方，有个醉乡，那里有一番使人值得留恋忘返的景象：“其土旷然”，“其气和平”，“其俗大同”，“其人任清”，“其寝于于，其行徐徐”；那里的人民“无邑居聚落”，“无爱憎喜怒”，“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器械之用”，他们“吸风饮露，不食五谷”，这个醉乡的人民不受任何约束，与“礼繁乐杂”的中国绝然不同，

① 《唐才子传·王绩》。

② 《晋书·刘伶传》。

它在黄帝时期曾经与中国有过交往，但后来由于“中国丧乱”^①，遂与醉乡断绝了关系。其实，《醉乡记》是王绩虚构出来的乌托邦，他假托游历醉乡，以表达他的人生追求和政治理想。

王绩还以他本人的思想和生活为蓝图，勾画出一个五斗先生的人物形象。他在《五斗先生传》中写道：“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相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在他的笔下，五斗先生是一个“绝思虑、寡言语”，“忽焉而去，倏然而来”，行迹无常，“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万物不能萦心”^②的超凡脱俗的世外高人。他所塑造的五斗先生的形象，不正是自己思想生活的真实写照吗。

贞观元年（627年），王绩以脚疾辞去待诏职务，回到故乡，隐居故里。在家乡隐居数年，又为生活所迫，再赴长安应选。当时，太乐府中有个叫焦革的小吏，出身于酿酒世家，他以善酿名酒冠绝京都。王绩听说后，再三请求去当太乐府丞，吏部以为非士职不得入选，他申辩说：“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浊天下所安，不闻庄周避漆园，老聃耻柱下？”^③经过软磨硬缠，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他担任太乐府丞后，焦革每天都送一坛香味扑鼻的好酒给他喝，王绩一尝，果然窖香纯正，绵甜醇厚，余味悠长，焦革的酿酒技术确实名不虚传。可惜好景不长，过了数月，焦革病死，王绩痛心疾首。好在焦革的妻子袁氏也会酿造好酒，经常送酒给王绩，王绩得以继续品尝焦家美酒。但是，过了一年多，袁氏也相继去世，焦家佳酿绝迹，王绩感叹地说：“这是老天不让我饱饮美酒呀！”遂辞官不做，再次挂冠归隐。

①②③ 《东皋子集》。

(三) 隐居河汾，以酒为乐

王绩家居龙门，在河汾之间，这里有其先人留下的故田十余顷，紧靠黄河与汾水交汇处，是一片肥沃的土地，田间有房屋十余间，有奴仆数人可供役使，田地的收成足够生活所需，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

这次王绩的终身归隐，是下定了决心的。他早年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曾把哥哥隋末大儒王通比作孔丘，视为楷模，颇有建功立业的愿望；而另一方面，他对黑暗的封建社会又深表不满，同时又接受了老、庄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又明显地表现出反对封建礼教的倾向，他在《赠程处士》一诗中说：

百年长扰扰，万事悉悠悠。

日光随意落，河水任情流。

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

不如高枕枕，时取醉消愁。

在纷扰不安的年代里，他表现了对现实的不满，追求人生自由，在苦闷中除了以酒浇愁之外，还发出“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的呼声，这种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他的主要倾向。由于个人的坎坷遭际，几次出仕，都官职卑微，因而他认为自己“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①遂下定决心，绝意仕途，皈依自然，辞官还乡，躬耕东皋。从此，他彻底

^① 《东皋子集·自撰墓志》。

抛弃了“糠粃礼义，锱铢功名”（《答冯子华处士书》）的念头，走上了终身归隐的道路。

王绩的归隐，不外是对政治生涯的厌恶，风波无常的畏惧，和隐逸避祸思想的指使。他在《古意》第三首诗中说：

宝龟尺二寸，由来宅深水。
浮游五湖内，宛转三江里。
何不深复深，轻然至溱洧。
溱洧源流狭，春秋不濡轨。
渔人遽往还，网罟相萦纆。
一朝失运会（时运），刳肠血流死。
丰骨输庙堂，鲜腴藉笾簋（盛食器皿）。
弃置谁怨尤，自我招此否（恶运）。
余灵寄明卜，复来钦所履。

他借用宝龟不慎，落入渔人罗网，惨遭杀身之祸，以暗示作者避祸隐归的思想。他在《古意》第五首诗中又说：

桂树何苍苍，秋来花更芳。
自言岁寒性，不知露与霜。
幽人（隐士）重其德，徙植临前堂。
连拳八九树，偃蹇二三行。
枝枝自相纠，叶叶还相当。
去来双鸿鹄，栖息两鸳鸯。
荣荫诚不厚，斤斧亦勿伤。
赤心许君时，此意那可忘。

王绩在这首诗中，借歌颂桂树不畏严寒，花自芬芳的性格，比喻

自己超脱世俗的高尚品德。又借桂树被隐士移植于庭院之中，才免遭刀斧之伤，借以表示自己“知足”才能“全生”的隐逸思想。

王绩归隐后，头戴葛巾，身着农民服装，亲驾牛车，与奴仆一起躬耕种田，养鸡喂猪，种草药，牧凫雁，或“挟策而驱羊，或投竿而钓鲤”（《游北山赋》）；春秋季节，则学习酿酒技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对这种“不知今有汉，唯言昔避秦”（《田家》诗第三首）的隐居生活表示十分赞赏。曾在《秋夜喜遇王处士》一诗中说：

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

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

从此，他的诗歌走上了抒写田园生活，充满着清新的生活气息，一扫唐初诗风不振，受六朝浮靡淫艳诗风的影响，创作了一些内容质朴，形式比较优美的诗篇。他在《野望》一诗中写道：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不相识，长歌怀采薇。

这首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抒情质朴自然，富有田园生活气息，把一幅农村日色将晚的深秋季节，牧人驱赶着牛群、猎人携带着禽兽而归的真实动人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对唐代五言律诗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王绩除了躬耕之外，就是阅读老、庄的著作，饮酒赋诗，以此为乐。他在《田家》诗第三首中说：

平生唯酒乐，乃性不能无。

朝朝访乡里，夜夜遣人酤。
家贫留客久，不暇道精粗。
抽簾持益炬，拔箕更燃炉。
恒闻饮不足，何见有残壶。

王绩虽然在该诗中自称饮酒是他的天性所决定的，其真正原因，他不过是以饮酒作为摆脱现实烦恼的手段而已。为了饮酒，他把竹簾、草席都拿去温酒，也顾不得酒菜的荤素粗细，一直喝到壶干为止，以此自娱罢了。他在《过酒家》诗第二首中写道：

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
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

他整日“昏饮”，不是陶冶性情，而是表现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苦闷，那种“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感受，正是王绩愤世疾俗的最好自白。他是借酒来逃避现实，寻求内心的平静，所以王绩常常把自己比作嵇康、阮籍、刘伶、陶渊明。在《醉后》一诗中写道：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
百年何足度，乘舆且长歌。

这是王绩对自己的真实写照。他为了寻求内心的平衡，有酒必饮，饮则必醉，醒了继续再饮。他在《过酒家》第五首诗中写道：

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
倚垆便得睡，横瓮足堪眠。

他豪饮之后，把空酒瓮一横，当作枕头，“倚垆”便睡，睡醒之后，一时兴奋，便在酒家墙壁上题诗颂酒。他在《题酒店壁》一诗中

又写道：

昨夜缸始尽，今朝瓮即开。

梦中占梦罢，还向酒家来。

一些好事者，往往把他的诗从酒店中抄走，广为传颂。王绩纵酒狂饮，给自己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他在另一首《戏题卜铺壁》诗中说：

旦逐刘伶去，宵随毕卓^①眠。

不应长卖卜，须得杖头钱。^②

他为了筹集买酒的钱，弄得家徒四壁，不得不去卖卜。亲戚乡邻对他这样狂饮不能理解，对他产生误会和讥笑，把他视为累赘。王绩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无心子传》，以明其志。他假托无心子是越国的一位官员，后被越国国王罢黜，于是无心子漫游于茫荡之野，路遇一机士，机士对他说：“噫！子贤者而以罪废邪？”^③无心子说：“过去蜚廉氏有两匹好马，一匹朱鬣白毛，龙唇凤臆，驰骤如舞，结果整日被主人骑坐驱使，不能释鞍，最后因劳累过度患热症而死；而另一匹马重头昂尾，驼颈貉膝，蹄齿善蹶、为主人所不喜，被主人所抛弃，终年在野外自由自在地吃草玩耍。”王绩借用这个虚构的故事，来表白他不与统治者为伍，去追求自己个性的自由。

王绩隐归后，一直对焦革酿酒一事萦怀在心，遂将他的酿酒方法加以整理，撰写成《酒经》一卷，使其能流传百世。他又把从杜康、仪狄以来，善于酿酒的名人及其所酿美酒的名称编成

① 毕卓，东晋人，官吏部侍郎，酷爱饮酒。

② 杖头钱，是借用晋阮修常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自畅饮的典故。

③ 《新唐书·王绩传》。

《酒谱》一卷，使人们对酒的发展历史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当时太史令李淳风看了以后，称赞他是“酒家之南、董。”^①南史氏和董狐，都是春秋时期著名史官，可见李淳风对王绩的赞誉并不过分。他还在其隐居的东南方向，选择一片高亢空旷的地方，为杜康立庙，以焦革相配，岁时加以祭祀。并为此写了一篇《祭杜康新庙文》的文章，文中指出：自从杜康发明酒之后，人们才“可以全身，杜明塞智，蒙垢受尘，阮籍遂性，刘伶保真，以此避世。”今天新庙已经落成，“大礼斯备，群贤就养”，可以“当开祀飨”了。

他在隐居期间，拒绝一般社会交往，什么乡俗庆吊、婚丧嫁娶，他都一概加以拒绝。他所交往的仅限于和他志趣相投的人。在他隐居的南面，也有一位结庐而隐的处士，名叫仲长子光。此人没有妻子，没有奴仆，自食其力。他虽患有瘖疾，不能与人交谈，但他超凡脱尘，没有任何俗气。王绩喜其贞洁，经常拜访他，二人结为挚友，在河渚间相近结庐而居。他们常在一起散发箕踞，或抚琴放歌，或对酌畅饮，甚为惬意。后来这位处士死后，王绩为他写了一篇祭文，以纪念这位“其生若浮”，“其死若休”^②，心怀坦荡的处士。

王绩是位情操高洁的隐士，他蔑视权贵，清高自负。贞观中，京兆（今陕西西安市）杜之松、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崔喜相继为绛州刺史。他们都知道王绩的大名，崔喜曾派人叫王绩到官衙相见，他竟拒绝说：“崔府君想坐在官衙召见一个隐士吗？”后来杜之松又让王绩到绛州去讲礼，王绩又拒绝说：“吾不能揖让邦君门，谈糟粕，弃醇醪邪？”^③他把礼比作糟粕，把酒当成醇醪，实

① 《东皋子集序》。

② 《东皋子集·祭处士仲长子光文》。

③ 《新唐书·王绩传》。

在不屑一往。这两位刺史知道王绩清高自负，不敢轻看于他，每逢岁时节气，都派人主动送去美酒、鹿脯之类的礼物，王绩才和他们交往。

王绩到了晚年，更纵酒无节，放荡形体，人生态度格外消极颓废，他聊以自慰的是“酒瓮多于阮步兵（阮籍），黍田广于彭泽（陶潜）。”^①对此，乡人经常劝诫他饮酒要有节制，不要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来，他则笑着说：“你们不懂饮酒的乐趣，我这样做是合乎道理，顺乎自然的事呀！”

贞观十八年，王绩卒于家，终年六十岁。临终前，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遂自撰其墓志铭，命家人薄葬。他在自撰《墓志》中说：“有唐逸人太原王绩，若顽若愚，似矫似激，院止三径，堂惟四壁，不知节制焉。”^②从这里可以看到他放荡不羁的性格，因嗜酒不知节制而造成穷困潦倒的形象。

王绩早年有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想报效国家，建功立业；同时他又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傲视权贵。当他被人挟持而遭陷害时，他采取摒弃仕途，走上了隐居不仕的道路。在隐居过程中，他的思想渐渐消沉，以饮酒赋诗为乐，最后竟达到穷困潦倒的地步。但他的抒写田园生活的诗歌，却充满着清新的生活气息，为唐代五言律诗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① 《全唐文》卷131《游北山赋序》。

② 《东皋子集》。

孙思邈



终身不仕、救死扶伤的孙思邈

· 王 珍 ·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汉族。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他自幼多病，身体瘦弱，父亲经常请医生给诊治，花了许多家产，才把病治好。他虽然体弱多病，但聪慧过人，“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①，被人们称之为“圣童”。由于

^① 《旧唐书·方伎·孙思邈》。

自己体弱多病，又看到穷苦百姓生了病，因无钱医治，终于悲惨地死去，感到十分痛心，于是便从少年时代起，就阅读古代医学典籍，到二十岁时，已通晓诸子百家学说，博览了古代医学著作《素问》、《灵枢》、《甲乙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脉经》等书。他立志要用毕生精力，从事医学研究和救死扶伤工作，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终身隐居，救死扶伤

由于孙思邈刻苦好学，勤奋努力，再加上他天赋聪敏，认真学习前人经验和治病方法，使他开扩了眼界，扩大了知识面，因此他在青年时期就具有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和较高的医术水平，在医学上颇有盛名。当隋文帝知道他的才能后，便于仁寿（601—604年）年间，派遣官吏，拿着诏书，到华原县征召孙思邈为国子博士，被孙思邈托病加以拒绝。他一方面厌恶当时社会上争附豪门、趋炎附势的恶习和争名逐利的官场生活，不愿到朝中去做官；而又对“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阙而不论”^①，把学医治病看成是下贱职业的世俗偏见不满，便冲破世俗束缚，毅然走上了行医治病的道路，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他隐居在华原县东磐玉山（该山东有瑞应台，南有起云台，西有升仙台、北有显化台、中有齐天台，所以又称五台山），山中苍松翠柏，到处是奇花异草，又幽雅清静，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孙思邈朝夕入山采药，行医治病，济困扶

① 《千金要方·序》。

危，救死扶伤，为乡亲父老解除疾病的痛苦。

孙思邈在行医中，偶然遇到一位年轻的农妇，生了一个断气的孩子，由于肺气阻塞，已憋得浑身发紫。其夫在门外焦急、忙乱得抓耳挠腮，无法可施。恰在这时，孙思邈行医到此。其夫将情况说明后，孙思邈也顾不得那么多，遂撩开门帘，跨入产房，抱住新生婴儿俯听，已经停止呼吸，便对在旁的接生婆说，快把婴儿嘴里的污血擦掉，并让她准备了一盆温水，自己从药囊内取出一根大葱，用葱白在婴儿身上轻轻抽打，婴儿突然“哇”地一声哭出声来。新生命的哭声，使在场的人们都高兴得眉开眼笑。孙思邈抱起新生婴儿放在温水盆内，轻轻给他揉搓，让血液加快循环，恢复呼吸功能。不久，婴儿便安然地贴到母亲怀里，贪婪的吸吮起乳汁来。他告诉大家，新生婴儿嘴里的污血阻碍了呼吸的流通，婴儿肌肤很嫩，用别的东西抽打，会损伤肌肤，只能用葱白抽打，这是为了让婴儿啼哭，使肺部扩张活动。如果再有这类现象发生，医生不在场，你们自己就可以救护了。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

有一次，孙思邈身背药囊，外出行医。途中他看见几个农夫抬着一口棺材，后面跟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呼喊着她女儿的名字。他急忙赶上前去，发现棺材缝中，流下滴滴鲜血，他急令农夫停步。当抬棺材的农夫和老妈妈停住沉重的脚步后，孙思邈问老妈妈：“棺材里是你什么人？得了什么病？死多长时间了？”老妈妈悲痛欲裂地说：“她是我的独生女儿，因为难产，折腾了两天两夜，才死不久。”孙思邈心中一亮，满怀信心地说：“你女儿没有真死，请看棺材里流出来的鲜红血水，血色尚未变紫，还有一线生机，快打开棺材，让我看看。”老妈妈救女心切，也顾不得那么多了，遂让人打开棺材。孙思邈俯下身来，聚精会神地按了按

死者的脉搏，发现死者的脉搏还在极其微弱地跳动着，死者身体微温，胎儿尚在腹中弹动。他凭着自己渊博的医学知识和妇产科经验，断定产妇是由于难产而昏厥，尚有救活的希望。他取出银针，刺入产妇的有效穴位，经过半个时辰，产妇竟然慢慢地睁开了疲惫的双眼。针灸将产妇救活后，婴儿也随之哇哇出世。老妈妈见一根银针救活了两条人命，才转悲为喜，从孙思邈手中接过刚出生的外孙，笑得合不拢嘴，不知怎样感激这位救死扶伤的恩人才好。抬棺材的农夫见此情景，都惊奇地称赞孙思邈是“神医”。

孙思邈很注意地方常见病和多发病的研究和防治。由于山区人民很穷，饮食中长期缺乏碘，很多人得了“瘰癧病”（即粗脖子病，也就是甲状腺肿大）。他长期生活在山区，虽然还不知道病因，但经过长期观察和研究，认为这种病是因为长期饮用了一种不洁净的水引起的。治疗这种病需服用海藻、海带等海生植物和羊、鹿等动物甲状腺（即羊靛（yè，音夜）、鹿靛）等，因为这些动植物中含有丰富的碘质，结果疗效很显著。尤其是羊靛、鹿靛在山区比较容易找到，是一种因地制宜治疗粗脖子病的好方法。

孙思邈在家乡行医过程中，发现贫苦人家却常常得夜盲症，在黑暗环境中，失去正常人辨别周围事物的能力。他认为穷苦百姓长年吃糠咽菜，无钱买肉，所以才得了夜盲症。于是他让夜盲症人吃些羊肝、牛肝之类的肉食，也取得了良好的疗效。现代医学证明，夜盲症是主要缺乏维生素A所引起的，动物的肝脏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孙思邈在一千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科学道理。

到了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孙思邈已经四十八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知识更加渊博，医术更加成熟，名声远扬四方。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很敬慕孙思邈，遂派特使到华原县，召他

到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来。孙思邈盛情难却，就身穿葛衣布袍，动身前往长安。当唐太宗在宫廷召见他时，见他神采奕奕，风度翩翩，脸色丰满，黑中透红，长须飘洒在胸，不由得喜上心来。于是便对左右官员说：“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美门、广成^①，岂虚言哉！”^②一贯惜才的唐太宗，想授给他以官爵，被孙思邈婉言加以谢绝。唐太宗见他品德高尚，淡于名利，也就不再强求，遂让他在长安住一段时间，为史官提供一些史料后再返回故乡，孙思邈就乐意地答应了。当时唐太宗已任命魏征等人，下诏编修北齐、梁、陈、北周、隋、五代史，魏征恐搜集资料有遗漏之处，就多次拜访孙思邈。由于孙思邈博学多才，当他讲起这五朝历史时，口似悬河，滔滔不绝，犹如亲身目睹一样，说得井井有条，清楚明白，为编修这几朝历史提供了大量资料。

孙思邈除公务之外，还在业余时间在京师的百姓治病。一天，一位右眼红肿发青、充满瘀血的病人，慕名而来，请孙思邈为他医治。孙思邈见他的眼睛红肿得像熟透了的桃子一样，认为必先排除瘀血，然后才能敷药。用什么排除瘀血呢？用针刺又怕碰伤眼球，太危险了，他想了一下，到后院河沟里捉了两条蚂蟥，让病人躺下，把蚂蟥放到病人患处，静静地观察着，见蚂蟥的身子越来越粗，病人眼内的瘀血越吸越少，渐渐平复后，就把蚂蟥拿掉，将患处洗净，再给病人敷上止瘀消炎的膏药，病人立即感到病情减轻了许多，并称赞他医法神妙，药到病除，但不知用的是什么方法，孙思邈告诉他这叫“蛭吸法”。

有一次，一个衣冠楚楚的病人来找孙思邈，诉说自己常年腿

① 美门、广成：即美门高，广成子。皆是道教所尊奉的神仙。

② 《旧唐书·方伎·孙思邈》。

脚浮肿，软弱无力。孙思邈为他切了脉，又看了看病人的脸色，然后在病人浮肿部位按了按，一按一个坑，许久才恢复过来，这是一种典型的脚气病。于是他给病人开了杏仁、吴茱萸、蜀椒、防风、独活等消肿的药方，疗效颇好。其他患脚气病的人听说后，也纷纷慕名而来，不几天，就诊断了十几个这样的病人。孙思邈想为什么自己的家乡五台山附近就没有发现这种病例，而这种病偏偏发生在长安呢？他见病人多是穿着讲究，衣冠楚楚的富家子弟，患的一定是富贵病。他掌握了这种发病规律后，认为富贵人家吃的是细米白面，鸡鸭鱼肉，食物中缺少某种营养才引起的，于是凡是请他看病的这类病人，孙思邈除给他们吃消肿药，还用谷皮煮粥给他们喝，这样就取得了更好的疗效。现代医学证明，脚气病是由于人体内缺乏维生素B₁引起的，而孙思邈所开的这些药物和谷皮中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₁，所以才能取得如此疗效。欧洲人直到十九世纪才探索到脚气病的原因，比孙思邈晚了一千三百多年。

为了进一步掌握地方病的发病规律，他告辞唐太宗，从长安出发，到产米区四川进行调查研究。一路之上，诊治不少病人。他到达四川内江县时，发现当地也流行脚气病，便用此法加以施治，解除了当地人民的疾苦。经过数月，才从四川返回家乡。

孙思邈返回家乡不久，一个尿道堵塞的病人，双手捧着腹部，痛苦不堪地来找孙思邈医治。孙思邈立即解开病人的衣服，见小腹胀得像皮球一样，十分危险！在当时还没有导尿工具的情况下，尿道口又那么小，如何将尿排出呢？孙思邈苦思冥想，来回徘徊，他终于想出用细小的葱叶将尿排出的办法。他将葱叶洗净，把尖端掐掉，试探着插进病人的尿道，一次，二次，……葱叶都折了，又耐心细致地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将葱叶插进尿道，他顺

着葱管，往里吹气，充了气的葱管把尿道撑开后，尿立即冲破障碍，顺着葱管流了下来，病人的小腹像放了气的皮球一样，渐渐瘪了下来。用人工导尿，这在我国还尚属首次。

孙思邈不仅医术高明，还擅长针灸。他不仅用针灸救活了产妇，还发明了“阿是穴”。有一次，一个大腿疼痛的病人来找他医治，孙思邈给他开了几副药方，都没有治好，就决定给他针灸。可是一连扎了几个止痛的穴位，病人的病情仍不见减轻。他想人身上有三百六十五个穴位，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未被发现的穴位呢？于是他借助于这个病人，决心寻找一下。他一边在病人身上用大拇指轻轻地按掐，一边问病人：“是不是这里痛？”他接了许多地方，病人都加以否定。当他继续往下按时，忽然病人“啊”地一声叫了起来，孙思邈就在病人“啊”的地方扎了一针，腿痛果然止住了。这个穴位，医书上没有记载，孙思邈就把这个穴位称为“阿是穴”。这个穴位没有固定的位置，哪里痛就在哪里扎针。

（二）总结经验，著书立说

孙思邈在长期行医过程中，不仅以病人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不图名利，不分贵贱，都悉心加以医治，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深受人民的爱戴。而且他还虚心学习前人和民间医学研究成果，不断加以总结提高，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他不但精于内科，而且擅长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以及卫生保健、食疗等，同时还具有高明的针灸技术和渊博的药物知识。他决心把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写成专著，公诸于世，让人们更有效地和疾病作斗争。

他边行医边著述，在撰写过程中，他感到过去一些医书过于浩博庞杂，分类也不妥当，于是就博采众长，删繁就简，又吸收了大量民间验方，终于在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撰写出《千金要方》一书。这时，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白发老人了。

《千金要方》共分三十卷，二百三十二门，载有医方五千三百多个，内容极其丰富，它包括了脏腑、针灸、切脉、食治、妇人、婴童、脚气、中风、伤寒、痛疽、消渴、水肿、七窍、养性、备急等各个方面。是继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之后，对我国传统医药学的又一次重大总结。《伤寒论》的体例是一病一方。而《千金要方》中则发展为一病多方，或几个“经方”合成一个“复方”，或一个“经方”分成若干个单方，使医生在选择药物时，更灵活变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便于辨证施治。

我国古代比较重视妇、儿科疾病。战国时期的扁鹊、三国时期的华佗，对妇、儿科疾病的治疗都有独到之处；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也记述了不少治疗妇女病的药方。但在隋唐以前，关于妇女、婴儿方面的知识尚少，记载也简单、散乱，缺乏独立系统。孙思邈对妇女、儿童疾病给予极大重视，他在《千金要方》中，把妇女、儿童疾病单独列出，独立设科，这在我国还是第一人，为后来妇幼医学奠定了基础。他在该书中将“妇人方”放在首位，列为三卷；其次是“少小婴童方”，占了一卷。对妇女各种特殊的疾病和孕期卫生、临床处理、产后禁忌等论述，很多符合科学道理。他认为妇女怀孕后，住所应清洁安静，注意调养性情，节制嗜欲，避免惊吓。临产要脱去旧衣，镇静不乱，避免忧郁惧怕，否则容易引起精神紧张，造成难产。产后要用心调养。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科学的。他在“妇人方”中，记载了数百个药方，二十多条针灸法，使妇产科有了独立的内容。他在“少小婴童方”中，

把儿科疾病分为序例、初生、惊痫、客忤、伤寒、咳嗽、杂病等九门，也载有三百多个用方。对婴儿的出生、喂养方法、小儿护理、发育程序等记载，都具有科学道理。

在《千金要方》中，孙思邈还记述了消渴病（糖尿病）的症状、治疗和禁忌。他认为消渴病人的尿是甜的，除采用药物疗法外，应特别注意饮食疗法。消渴病人容易生痈疽，伤口不易愈合，容易化脓感染，因此对消渴病人禁用针灸，避免误伤，以防不测。这些记载十分符合现代科学原理。

孙思邈还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和卫生保健事业，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居安思危，平时应贮备一些常用药品，以备急需。平时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随地吐痰，经常更换衣服，饭后漱口；冬天不蒙头睡觉，夏天睡觉不露小腹；饮食要有节制，不暴食暴饮，不吃死病畜肉和生菜、生米、腐败食物。饭后要散步，每日要调气，按摩、导引，参加体育活动和适当的劳动，但不要过度疲劳。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这些预防疾病的方法和保健常识，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显庆四年（659年），唐高宗又一次召见孙思邈。这时他已经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别看他须发尽白，但精神饱满，步伐稳健，身体十分健康，根本不像近八十岁的老人。交谈之间，见孙思邈学识渊博，深通医理，品德高尚，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唐高宗就让他做谏议大夫，对朝政得失提出批评建议。孙思邈视名利为过眼烟云，遂以年迈为由，再次婉言谢绝了唐高宗给予的高官厚禄。唐高宗见他再三推辞，就挽留他暂住长安，给他一个安静的住处，让他继续著书立说，为京师百姓治病。这次留居长安，一住就是十余年。到了上元元年（674年），孙思邈已经是九十三岁

高龄的老人了，但他仍然“视听不衰，神采甚茂”^①。他很想念家乡亲人和朝夕相处的百姓，遂向唐高宗提出“辞疾请归”的要求。唐高宗为了挽留他，特赐给他良马一匹，又把去世的鄱阳公主的宅第让他居住。孙思邈见唐高宗对他如此关怀备至，执意挽留，便不忍心离去，就又在长安居住了下来。

当时京师的一些知名人士，如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都拜孙思邈为师，以弟子之礼而事之。卢照邻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唐初文学四杰之一。有一次，卢照邻问孙思邈做一个好医生的道理，孙思邈对他说：“天有四时五行，刮风下雨是天时变化的常数，人有四肢五脏，工作休息，新陈代谢，也有一定规律，生理失调，就会发生疾病。一个好医生就得懂得这些道理。高明的医生为人治病，就要对症下药，把病治好。”他反对有人偶尔治好一病，就以为自己天下无双；读了三年书，就说天下没有治不了的病这种傲慢态度，认为这是医生的致命弱点。他的这些见解，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卢照邻于乾封二年（667年）任益州新都（今属四川）尉时，传染上了麻风病，当时叫“疠疾”。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浑身发痒，并没有在意。高宗咸亨四年（673年），他卧病长安光德坊时，治了一年多也不见效，就于上元元年（674年）让孙思邈给他医治。孙思邈为他切了脉，检查了痛痒部位后，发现他身上已经出现许多红斑，有的已经结节，心情十分沉重，就让他搬到自己的宅院居住，慢慢给他医治。孙思邈为他开了各种药方，亲自给他煎药，限于当时医疗水平，都不见效，后来手脚开始麻木，难以行走。卢照邻见自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便颓丧地对孙思邈说：“老师，我

① 《旧唐书·方伎·孙思邈》。

的病恐怕像您这样的名医也难以治好，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孙思邈用天时、寒暑、风雨的变化，来比喻人们的气色、呼吸吐纳、疾病的产生，认为“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①，来安慰卢照邻，让他不要自寻短见。卢照邻见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为他的疾病日夜操劳，心中越发不安，他知道麻风病自古以来就是不治之症，与其全身溃烂、痛苦不堪地苟延生命于人世，还不如及早了却残生，结束痛苦好呢。遂悄然离开长安和孙思邈，返回具茨山（今河南禹州市境内）下自己的田园中。他写下三首凄凉悲切的《释疾文》后，便投颍水自尽，终年只有四十岁。

不久，当孙思邈读着卢照邻的《释疾文》“岁去忧来兮东流水，地久天长兮人共死，明镜羞窥兮向十年，骏马停驱兮几千里。麟兮凤兮，自古吞恨无已”^②时，不禁热泪横流。作为一个医生，应该救死扶伤，孙思邈对自己未能治好这样一位有作为的文学家的病而深感内疚。他决心继续钻研医学，精益求精，济世救人。于是他辞归故里，返回五台山去了。

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当孙思邈百岁高龄时，又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医学巨著《千金翼方》。它和第一部《千金要方》有相辅相成、比翼双飞的意思。《千金翼方》也是三十卷，卷首为“药录”，共收录药物八百余种，详细论述了药物味道、性能和主治病症，对药物的采集季节和处理方法也作了科学的研究。他认为采药季节不对，处理方法不当，使药物徒具其名，失去效用，就如同朽木一样。书中将药物按玉石（矿物药）、草、木、人兽、虫鱼、

① 《旧唐书·方伎·孙思邈》。

② 《全唐文》卷167《释疾文》第二首《悲夫》。

果、菜、米、谷等分类，其中有许多是唐以前未收录的新药和外来药物。书中对各类疾病的诊治在《千金要方》的基础上均有所增补，选录了《千金要方》所未载入的方剂二千余种。它和《千金要方》一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孙思邈博学多才，他还著有《老子注》、《庄子注》、《福禄论》、《摄生真录》、《枕中素书》、《会三教论》等书。他在完成《千金翼方》的第二年，便去世了，终年一百零一岁。他的子孙们根据其遗嘱，用薄薄的棺木将他装殓，也不殉葬任何器皿，安葬于松柏常青的五台山上。人们怀着无限的敬意，为孙思邈修建庙宇，立碑纪念。后来人们还把他所著的医书，刻在石碑上，供人们抄录治病，因此人们称他为“药王”，把五台山称为“药王山”。

孙思邈死后，他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医学著作，不仅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国外医学也有很大的贡献。公元十世纪，日本丹波康赖氏所撰的《医心方》，就是主要参考了孙思邈的著述而写成的。公元十五世纪，朝鲜金礼蒙等所编纂的大型医学丛书《医方类聚》，也从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吸收了不少内容。

孟浩然



终身隐逸的田园山水诗人孟浩然

——·王 珍·——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汉族。生于武后永昌元年（689年）。他的祖先出自孟子之后，世代为书香门第。他自幼就遵循孔孟之道，习礼诵诗，沿袭圣贤遗训。他在《书怀贻京邑同好》一诗中叙述自己的家世说：“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

（子承父教）绍（继承）未躬。”^①他虽自称是儒家大师孟轲的后代，但家世已不可考，只知道他从小受的是儒家教育，历来很重视儒家风范，到他这一代仍然如此。“先人留素业，老圃作邻家。”（《田家元日》）他的祖先留下一份产业，家中使用着奴仆，可见他出身于小庄园地主家庭。过的是“厨人具鸡黍”的小康生活。

（一）隐居南园，自强不息

孟浩然家居襄阳郭外七八里的涧南园。这里东临岷山和汉水，北靠涧水，家在涧南，所以称涧南园。他在《涧南即事贻皎上人》一诗中叙述说：

敝庐在郭外，素产惟田园。
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
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
书取幽栖事，将寻静者言。

这里山明水秀，林野空旷，风光秀丽，又远隔喧闹的城市，是隐居的好地方。幽静的环境，使他可以在这里安心读书，研讨学问；闲暇之时，可以垂钓北涧，从北涧乘舟可到各处游赏。他在《北涧泛舟》一诗中说：

北涧流恒满，浮舟触处通。
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

① 见《全唐诗》卷159。以下所引孟浩然的诗均同此，不再注明出处。

泛舟北涧，观赏两岸风景，也自有一番乐趣。因此他从少年时代起，便隐居在家，习礼诵诗，舞弄文墨，研究学问，写作诗赋，为应试入仕作准备。他在《南阳北阻雪》一诗中说：“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又在《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一诗中说：“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①；他自己“昼夜常自强，词赋颇亦工”（《书怀贻京邑同好》）。孟浩然这样兢兢业业，自强不息，奋发读书，锤炼章句，修饰诗赋，使之工丽洒脱，是为了应试的需要。他不是一个甘于寂寞，无用世之心的人。

孟浩然早年曾立有济世大志，有宏伟抱负，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在《洗然弟竹亭》一诗中写道：

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

俱怀鸿鹄志，共有鹓鸪心（互相关心）。

逸气假毫翰（指诗文），清风在竹林。

达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

诗中说他与弟弟孟洗然等人很友爱，都有鸿鹄大志，互相关心，经常雅集竹亭，共同赋诗、饮酒、弹琴，研讨学问，以备济世之用。

在隐居读书的同时，他还到各地漫游，借以开扩眼界，增长见识，陶冶情操，领略大自然的风光和美的感受，从而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从开元四年（716年）起，到开元十六年止，他先后到过洞庭湖、鄱阳湖；游览过湘、赣、长江、庐山、扬州等地的风景名胜，还结识了大诗人李白，李白还特地为他写了一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为他送行。孟浩然在旅游中写了很多

^① 《孟浩然集序》。

赞美祖国山川秀丽的诗篇，《望洞庭湖上张丞相》、《夜渡湘水》、《下瀨石》、《彭蠡湖中望庐山》、《九日于龙沙寄刘大育虚》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在《下瀨石》一诗中写道：

瀨石三百里，沿洄千嶂间。

沸声常浩浩，洄势亦潺潺。

跳沫鱼龙沸，垂藤猿狖（猿类）攀。

榜人（船工）苦奔峭，而我忘险艰。

放溜情弥惬，登舻目自闲。

暝帆何处宿，遥指落星湾。^①

孟浩然沿瀨江顺流东下，从赣县至吉安一段，即著名的瀨石十八滩。这里水流湍急，礁石密布，航道狭窄曲折，航行十分困难。他不仅把这次险象环生的航行描写得惊心动魄，而且也抒发了他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性格。这对他参加考试也是有帮助的。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他年过三十而立尚未发迹之时，又常为功名而萦怀在心。他在《田园作》一诗中写道：

敝庐隔尘喧，惟先养恬素。

卜邻近三径，植果盈千树。

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

书剑时将晚，丘园日已暮。

晨兴自多怀，昼坐常寡悟。

冲天羨鸿鹄，争食羞鸡鹜。

望断金马门（宫门），劳歌采樵路。

乡曲无知己，朝端无亲故。

① 落星湾，在今江西星子县东鄱阳湖一带。

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

作者年过三十，尚隐居在祖先所留下的田园里。这里虽然房屋破旧，远隔尘喧，但是自己所赖以生活的地方。自己虽抱有鸿鹄冲天大志，又有像汉代文学家扬雄那样的才华，但因不愿与俗人争利，乡里又没有知己，朝中也无亲友做官，无人推荐自己，所以至今仍未飞黄腾达。他为此迷惘不解，很少有想得开的时候。

孟浩然青壮年时期，虽到各地漫游，但大部分时间仍呆在襄阳，和襄阳地方官吏之间，也自然免不了有送往迎来之事，开元八年，他曾和贾昇主簿一起登过岷山，饮过菊花酒，还亲自送他到荆州府去。这些应酬之事，在当时也是少不了的。

在襄阳城东南三十里，有座鹿门山。山中苍松翠柏，曲径通幽，是隐居的好地方。东汉末年的高士庞士元曾拒绝征辟，携妻子隐居于此，过着琴书自娱的生活，留下许多遗迹。孟浩然在隐居鹿门山前，曾寻访过这里的名胜古迹，对庞士元这位高风亮节的先贤产生无限向往。他在《登鹿门山怀古》一诗中说：“昔闻庞德公（庞士元），采药遂不返。……隐迹今尚在，高风邈已远。白云何时去，丹桂空偃蹇。”诗中明显地表达了他要隐居的志趣，后来索性就隐居于此，他的《夜归鹿门歌》就作于此时。他隐居鹿门山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创造声誉，得到有关士人的吸引，为入仕创造条件，希望能在那苍松翠柏中冲天而起，以施展自己的鸿鹄大志。

开元十六年七月，吐蕃大举攻入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政府招募军队，陈七应征入伍西征。为此，孟浩然写了一首《送陈七赴西军》的诗，诗中写道：

吾观非常者，碌碌在目前。

君负鸿鹄志，蹉跎书剑年。
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
余亦赴京国，何当献凯还。

诗中歌颂了陈七为国从军的壮举。在孟浩然看来，一些非常之人，在没有遇到机会时，常常表现得碌碌无为，虚度年华。一旦国家有事，就能争先从军，施展鸿鹄大志。他把陈七从军与自己赴京应举互相比附，文武虽为两途，但为国效力却是一致的。他怀着这种心情，决定赴京应举，并相信定能凯旋而归。

（二）赴京应举，名落孙山

唐代科举考试，分明经、进士两科。这两科除都需试策（即针对经义和政事等问题陈述自己的对策）外，明经科要加试帖经，即用纸把经文覆盖上，中开一行，以显露字句，考生要补上上下文。进士科要加试诗赋。当时进士难考，仕途也优于明经，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①之说。

孟浩然在隐居期间，经过长期刻苦学习，勤奋写作，不仅治学通达，而且词赋工丽，在当时诗坛上，也颇有好评。他知道考进士必须应试诗赋，诗赋越工丽，考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他为考取进士曾狠下过一番功夫。他很自信，并雄心勃勃，希望自己的诗赋能像扬雄的《甘泉赋》那样，也能得到玄宗的赏识，以展自己的鸿鹄之志。

^① 《唐蓆言》。

开元十六年底，他离开襄阳，踏上了“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的道路。在赴京途中，遇上了罕见的大雪，旅途受阻，滞留客舍，踌躇不前，于是写下了《赴京途中遇雪》诗。诗中写道：

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

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

落雁迷沙渚，饥鸟集野田。

客愁空伫立，不见有人烟。

该诗描述了在千里迢迢通往长安的大道上，暮天苍茫，阴霾连月，大雪积满山川，使飞雁迷途，饥鸟无处觅食，远近不见人烟。看到这种景象，孟浩然伫立愁楚，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长安。后来天晴雪住之后，他经过艰苦跋涉，直到第二年早春时节，“雪尽青山树，冰开黑水滨”（《长安早春》）时，才到达长安。

孟浩然到达长安之后，已临近春试。他根据自己的写作水平和声望，认为考取一名进士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对这次应试抱有极大希望，并充满自信。可是放榜时，却名落孙山。这次应试落第，出乎孟浩然的意料之外，入仕的希望也成了泡影。但他并不甘心，仍留在长安，作赋诵诗，打算献赋上书，作最后努力，以求汲引。他在《题长安主人壁》一诗中写道：

久废南山田，谬陪东阁贤（指张九龄、王维）。

欲随平子（张衡）去，犹未献《甘泉》。

枕籍琴书满，褰帷远岫连。

我来如昨日，庭树忽鸣蝉。

促织惊寒女，秋风感长年。

授衣当九月，无褐竟谁怜！

意思是说自己长久抛开田园不管，而在这里陪着张九龄、王维等诸公闲玩，本想急早离开长安，但还未献过诗赋，所以迟迟未能成行，一直拖到秋天，蟋蟀鸣叫，天气渐冷，贫家妇女为冬衣发愁的季节。在这期间，他曾到秘书省（一说太学）赋诗，那是在深秋九月的一天晚上，天刚放晴，明月初升，孟浩然和京师显宦名流张九龄、王维、裴朏、裴揔、卢僎、郑愔之、独孤策等人，齐集秘书省，赋诗作会。当孟浩然联句说：“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时，“举座嗟其清绝，咸搁笔不复为继”，他们遂和孟浩然结为“忘形之交”（即不拘身份、形迹的知心朋友）^①。后来他献过几次诗赋，但都石沉大海，毫无消息。

应试落第，献赋也毫无结果，这是孟浩然一生中所遭受的最大打击。对此，他十分愤懑、怨恨，一扫前期隐居时那种乐观心情。他感到痛苦、失望，在索寂无聊之中，他向尚书左丞袁仁敬、礼部侍郎贺知章吐露了内心的苦闷，写下了《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一诗：

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

明扬（选拔）逢圣代，羁旅属秋霖。

岂直昏垫苦，亦为权势沉。

二毛催白发，百镒罄黄金。

泪忆岷山堕，愁怀襄水深。

谢公积愤懑^②，庄舄空谣吟。^③

①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② 谢公，指南朝诗人谢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既不见知，常怀愤懑之心。

③ 庄舄，战国时越人，仕于楚，病中思故乡而吟越声。作者用此典故，表示思乡心情。

跃马非吾事，押鸥真我心。

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万山）岑。

诗中说他闭门读书三十载，恰逢当今圣世应选，落第后寄居长安，加上秋雨连绵，使人更加惆怅，两鬓已添白发，催人衰老，金钱也已用完，思归之情便油然而生，而对滥用权势之人却倍加痛恨。既然自己已经落第，骑马做官已是非分之想，还是过着亲近鸭鸥的隐逸生活算了。到了年底，他终于成行。临行前他作了一首《岁暮归南山》的诗，诗中说：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卧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几次献赋上书，都石沉大海，他决定不再上书，回归敝庐。自己没有才能，又遭到明主的抛弃，就像一个多病的人一样，连故友也都疏而远之了。时光荏苒，转眼一年将尽，自己躺在床上，孤独寂寞，忧愁难以入睡，一切都空空荡荡，好像做了一场恶梦一样。为了增加孟浩然的故事情节，这首诗被后来好事者加以伪托，说什么王维曾私邀孟浩然入内署，二人正在谈论诗歌，忽然玄宗也来到这里，孟浩然一时惊慌，急忙藏到王维床下。王维如实地向玄宗讲了这个情况。玄宗很高兴地说：“朕曾听说过其人而未见面，为何惧怕而藏起来呢？”这时孟浩然才从床下钻出来拜见玄宗。“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

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①《唐才子传》亦因袭此说。这首诗明明是孟浩然在百无聊赖之中，临别长安时所作，不应有此情节。这一记载，似不可信。

孟浩然离别长安时，唯一感到喜悦的是结识了王维这位好友，遂给他写了一首诗，在《留别王维》一诗中说：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意思是说落第后仍留在京城，到处求人汲引，但总是失望而归。现在我要返乡归隐，惋惜的是要与你离别了。当权者谁也不肯相助，世上像你这样的知己实在太少了。我只好返家，还是过那种寂寞无聊的隐居生活好了。

孟浩然离开长安，驱车东行，到了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告别诸友；途经潼关，与王昌龄话别；后经洛阳、许昌，到达南阳。在许昌到南阳的途中，曾一度阻雪，他写下了《南阳北阻雪》一诗，以抒发他不安地等待着雪过之后重登归途的心情。又从南阳途经唐河，到达湖北枣阳县的蔡阳铺。蔡阳距襄阳只有五十里路，他急于还家，孝敬老母，遂写下了《夕次蔡阳馆》一诗，第二天便到达襄阳。他在长安整整呆了一年。

① 《新唐书·文艺列传·孟浩然》。

（三）漫游吴越，化解怨恨

孟浩然于开元十七年冬回到家乡之后，他对这次应试落第仍耿耿于怀，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羞愧难言，无颜面对父老乡亲。小住数月，怨怼、愤懑之心，仍无法平静，遂于开元十八年离家出走，经洛阳赴吴越漫游，以寻求山水之乐，散发自己胸中郁闷之气。他在《自洛之越》一诗中说：

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

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

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

这首诗正反映了他遑遑三十年，结果一事无成，怀才不遇，落第后的郁闷心情。他要寻访吴越山水，泛舟湖海，以摆脱世俗功名的萦绕和烦恼，只图山水、杯中之乐罢了。

唐代自洛阳至吴越的道路，多循汴水（即通济渠）、邗沟、经扬州，然后渡过长江，再沿江南河到达杭州，即可赴越中各地。孟浩然走的正是这条水路。

他从洛阳出发，沿汴河东行，途经谯县（今安徽亳州市）时，写了一首《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的诗，诗中再次抒发了他要学东汉梁鸿与妻子孟光改姓易名，隐居吴地，为人佣工的隐逸思想。后乘船转入淮水，他在《问舟子》一诗中写道：“向夕问舟子，前程复几多？湾头正好泊，淮里足风波。”说的就是入淮时的情景。不久，抵达长江北岸的扬州。在这里小住，写下了

《宿扬子津寄润州长山刘隐士》一诗，他很向往这位隐居于茅山（今江苏句容县南）的处士。随后，他渡江南下，从他《初下浙江舟中口号》一诗中，得知孟浩然在这年八月到达杭州。他在《与颜钱塘登梓亭望潮作》一诗中，刻画了这位孤寂遁世诗人观看了钱塘江汹涌澎湃的潮水后无限激动的心情，好像汹涌的江潮冲走了他那长久压抑、郁闷的心情，胸怀为之开朗，天地也顿觉宽大多了。遂从杭州溯浙江西上，游览了富春江两岸风光，然后转赴天台山（今浙江东部），夜宿桐柏观。此观是唐睿宗为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所建。他游览了天台山名胜古迹，访问了司马承祯的师弟太乙子（当时司马承祯已不在这里），对他在天台山餐霞饮露，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生活表示十分向往。在这里他写下了《寻天台山作》、《宿天台桐柏观》、《寄天台道士》等诗作。在《宿天台桐柏观》一诗中他发出了“愿言解纓络（纓络本为珠玉串成的饰物，这里引申为解除世俗的缠绕和束缚），从此去烦恼”的呼声。看来他漫游吴越的目的，是要驱散胸中郁闷之气，使心情恢复平静。

孟浩然“登陆寻天台”之后，便“顺流下吴会”（《越中逢天台太乙子》），即沿剡溪先到剡县，再自剡县沿上虞江（即今曹娥江）、赴越州（今浙江绍兴），他到达越州时，已是开元十八年年底。在这里，他游览了耶溪、云门寺、大禹寺、镜湖等名胜。在越州住了八九个月，于开元十九年秋，离开越州从海路赴永嘉（今浙江温州市），这时他的同乡好友乐城（今浙江乐清县）尉张子容也来到永嘉，二人在上浦馆在永嘉城东七十里）相会，因为已到年底，二人稍事盘桓，便同回乐城，在张子容府宅度岁。第二年正月，孟浩然又从乐城动身，途经永嘉，返回越州。孟浩然回到越州后，张子容又因事去长安，二人又在越州相会，孟浩然再次为他送行。他在越州写下大量诗歌作品。在《久滞越中赠谢

南池会稽贺少府》一诗中说：“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句，可以看出他从开元十八年到达越州，在这里已经度过两个夏天，即整整两年半的时间。他热爱这里的山水，产生了留连忘返，甚至要隐居在这里的思想。

孟浩然于开元二十一年二月送走张子容后，也从越州出发，溯长江西上，经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浔阳（今江西九江市），又绕道入湘，凭吊屈原后，沿汨罗江进入洞庭湖，又从岳阳入长江，溯汉水而归，于五月到达襄阳，回归阔别已久的涧南园。他在《归至郢中》一诗中说：

远游经海峤，返棹归山阿。

日夕见乔木，乡园在伐柯。

愁随江路尽，喜入郢门多。

左右看桑土，依然即匪他。

这次漫游吴越，经过不少湖海高山，今日才摇船回归隐居，昔日自己落第后的怨怼、郁闷心情，也随着这次漫游一扫而尽。回来观看家乡山水桑田，仍是依然如故。通过这次漫游，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心情确实恢复了平静。

（四）晚年归隐，志气消沉

孟浩然作为封建时代的世俗士子，曾抱有鸿鹄大志，对入仕做官曾经憧憬过、追求过；当他在仕途上遇到挫折时，也曾经苦闷过、怨恨过；在绝望的情况下，才走向江海，走向山林。当他于开元二十一年夏从吴越漫游归来后，已渐入老境，入仕已完全

绝望，遂写了一首《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一诗，诗中说他“尝读《高士（即隐士）传》，最嘉陶征君（即陶渊明）。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诗中抒发了他要效法陶渊明那种愤世疾俗，辞官归隐，至死不仕的精神，做一位终身归隐的世俗士子。

孟浩然回到襄阳后，除入蜀作短暂漫游外，大都隐居在家。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唐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任命韩朝宗为襄州（今湖北襄阳市）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第二年元月，玄宗下诏：“其才有霸王之略，学究天人之际，及堪将帅牧守者，令五品以上清官及刺史各举一人。”^①韩朝宗深知孟浩然的才能，就虚榻以待，召他共同进京，把孟浩然推荐给朝廷。“郡守（指韩朝宗）虚陈榻，林间召楚材（指孟浩然）。”（《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说的就是此事。恰巧这时孟浩然的好友张子容休假还乡省亲，他与张子容不是宴饮，就是登高，或者互相赠答，二人相聚甚欢。有一次，他约几位朋友，在一起痛饮，有个朋友对他说：“你不是和韩刺史有约在先，今天要赴京师吗？”孟浩然说：“现在宴饮正欢，管他赴京不赴京！”韩朝宗见孟浩然竟然违约，拒绝赴京，心中十分生气，推荐他做官的事，也就此作罢。孟浩然对此事并不后悔。可见他晚年对进仕并不感兴趣。从他与张子容的诗作中亦可看出，孟浩然终日无所事事，以酒为乐，“染翰聊题壁，倾壶一解颜。歌逢彭泽令（即陶渊明），归赏故园间。”（《秋登张明府海亭》）“醉来方欲卧，不觉晓鸡鸣。”（《寒夜张明府宅宴》）“何以发秋兴？阴虫鸣夜阶。”（《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这些都反映了他晚年隐居期间意志消沉，再也没有前期那种乐观、开朗、奋发向上的情绪了。

① 《旧唐书·玄宗纪上》。

在他平静如水的隐逸生活中，唯一能够激起一点涟漪的，是他好友张九龄于开元二十二年被任命为中书令，开元二十四年又被提升为尚书右丞相。孟浩然感到“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当途诉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离异，翻飞何日同？”（《书怀贻京邑同好》）孟浩然对张九龄被提升为宰相十分欣喜，他不愿再过那清贫的隐居生活，又想弹冠出仕了。但这时的玄宗随着开元盛世的出现，年龄的增长，他那种前期励精图治的精神逐渐消失了，产生了安逸享乐思想，在用人问题上，也由前期的任人唯贤，转变为任人唯亲，就在开元二十四年年底，他罢免了直言敢谏的宰相张九龄，任用“口蜜腹剑”、善于阿谀逢迎的李林甫为宰相，从此朝政开始腐败下去。张九龄的罢相，也使孟浩然的出仕再次成了泡影。

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张九龄到达荆州（今湖北江陵）后不久，便辟置孟浩然为幕僚。他曾随同张九龄到各地巡视，祭祀山川，游玩从猎，并与之相唱和，但他对此并不感兴趣，做了不到一年的幕僚，便即返家。

开元二十八年秋，孟浩然的好友王昌龄被贬往岭南，途经襄阳，二人相见，饮宴甚欢。当孟浩然“疾疹发背，且愈，相得欢甚，浪情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①时年五十二岁，葬于凤林山南。《送王昌龄之岭南》一诗，为其最后绝笔之作。

① 《孟浩然集序》。

（五）诗风淡雅，启迪后人

孟浩然是一位清高型的隐士。他早年有宏伟的抱负，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当他的理想得不到实现时，便退而隐居下来，以吟诗自娱。他一生写了大量诗篇，除了他那些抒发怀才不遇、愤世疾俗的诗歌外，还写了大量反映田园山水、隐逸题材的诗歌。这同他的仕途受挫，转而以诗篇咏志有密切的关系。又由于孟浩然长期隐居，而且漫游各地风景名胜，又深受陶渊明思想的影响，隐于诗歌，用以言志，用以遣怀，故能摆脱旧的巢臼，所以他的政治上受挫，恰恰造就了这位诗人。以致他的诗歌作品，能开创出盛唐田园山水派诗风的先河，为百花齐放的唐代诗坛增加了一朵艳丽的奇葩。因此，后人称他为田园山水诗人。

在孟浩然的这些诗篇中，被人们广为传诵的有《过故人庄》、《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夜归鹿门歌》以及生活小诗《春晓》等诗作。他在《过故人庄》一诗中写道：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首诗描写了田家优美的环境和宾主之间的纯真感情，使人读后感到十分亲切。他的田园诗还有《田家元日》、《采樵作》、《南山下与老圃期种瓜》等，这些诗都具有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他的

山水诗则讴歌了祖国大自然多姿多态的景色，以平易、质朴、自然的诗风，创造出清幽淡雅的环境，给人以美的享受，陶冶着人们的情趣。他在《秋登万山寄张五》一诗中写道：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
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
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
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
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
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

这首诗用清新淡雅的比喻手法，抒发了清秋薄暮时的景色和相思之情。他善于捕捉生动的景象，作者在万山远望天边，树矮如荠；近看江畔，舟形如月，一片幽静景象。虽然人们在渡口等待归村，仍鸦雀无声，丝毫没有破坏这幽静的气氛。孟浩然在描写自然景物时，很少敷设色彩、浓妆艳抹，这是他诗歌的艺术特色之一，雄浑、壮逸是他描写自然景色另一特点，他在《彭蠡湖中望庐山》一诗中写道：

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
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
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
踰黥(yǎn, dǎn, 音掩胆，黑色)凝黛色，峥嵘当晓空。
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

作者在这首诗中描写了大自然的广阔景色，气势磅礴，格调雄浑。在孟浩然的笔下，辽阔的太空，悬挂着一轮晕月，夜色朦胧，它预示着天将起风。在渺漫的鄱阳湖中，遥望那巍峨的庐山，似有

压倒滔滔大江的雄伟气势。香炉峰上的瀑布，在日光折射下，像挂在空中的彩虹那样壮丽。他的生活小诗《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也写得颇有情趣，生动活泼。

孟浩然的诗，虽然流露出一些消极情绪，而主要还是歌颂祖国山川之美和田园风光，给人以美的享受和追求，从而产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因而他的诗被人们广泛传诵。他的诗歌对李白、杜甫、王维都起过积极的影响，时人将他与王维并称为“王、孟”。

孟浩然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在他的坟上树碑封土。在他隐居过的鹿门山上建有三高祠，以纪念在此隐居的庞德公、孟浩然和皮日休。他的好友王维不仅写有《哭孟浩然诗》：“故人今不见，日夕江汉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还亲自为孟浩然绘《襄阳吟诗图》：“襄阳之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载，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籍、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韵语阳秋》）。还专门为孟浩然作像，置于郢州（今湖北武汉市）刺史亭内，这座亭子因此叫“浩然亭”。咸通四年（863年），皮日休为郢州刺史郑诚作《郢州孟亭记》一文，极力赞扬孟浩然，郑诚也因此又将此亭改为“孟亭”。在孟浩然曾经游历过的许多地方，也都留有他的遗迹，以表示人们对这位田园山水诗人的怀念和尊敬。

寒
山
子



山林隐逸诗人寒山子

· 王 珍 ·

唐代诗人张继写有一首著名的《枫桥夜泊》（亦称《夜泊松江》）一诗，诗中说：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诗中所说的寒山寺，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天

监（502—508年）年间，原名叫“妙利普明塔院”；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又加以重建，改名为“国清寺”。后来唐代隐逸诗人寒山子曾在这里居住过，并留下许多佳话，因而更名为“寒山寺”。现在寺内尚有寒山子、拾得和尚的画像石刻。

寒山子，又名寒山，他长期隐居于台州唐兴县（今浙江天台县）西七十里的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因此又叫寒岩，他自己则自号“寒山子”。他为什么要隐居山林呢？

（一）愤世疾俗，隐居避世

寒山子为了超凡脱俗，隐逸避世，他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世。他在《我住在乡村》一诗中说：

我住在乡村，无爷亦无娘；
无名无姓第，人唤作张王。
并无人教我，贫贱也寻常；
自怜心的实，坚固等金刚。

因此，他的真实姓名、生卒年月，以及籍贯、身世等，在当时就鲜为人知。人们常把他视为诗僧或道教信徒，其实他是一位山林隐逸诗人。

寒山子的生活时代及其身世，根据他的诗文及现有材料，可知他大约生活在唐玄宗（712—756年）至唐代宗（762—779年）时期。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他出生在一个大家族之中，他的亲人分散在各方，“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他的家境原来比较富裕，寒山子少年时期，曾骑马放鹰，游猎于平原山岗之中，生

活过得很惬意。在这个大家族中，女子们也身穿绫罗，发插金钗，闲暇无事，捕捉蝴蝶、掷虾蟆为乐。

寒山子家中本有妻室，他隐居后与家人隔绝，有时也难免思念她。他在《昨夜梦还家》一诗中说：

昨夜梦还家，见妇机中织。

驻梭如有思，攀梭似无力。

呼之回面视，况复不相识。

应是别年多，鬓毛非旧色。

寒山子在青壮年时期，可能曾做过短时间的一般官吏。他在《元非隐逸士》一诗中说：

元非隐逸士，自号山林人。

仕鲁蒙帟帛，且爱裹疏巾。

道有巢许操^①，耻为尧舜臣。

称猴罩帽子，学人避风尘。

寒山子家中相当富裕，又有妻室，还做过官吏，他之所以要学巢父、许由，像猕猴戴帽子一样，隐居山林，是由于他怀才不遇、愤世疾俗所引起的。他在《一为书剑客》一诗中说：

一为书剑客，二遇圣明君。

东守文不赏，西征武不勋。

学文兼学武，学武兼学文。

今日既老矣，余生不足云。

① 巢，即巢父；许，即许由。传说中的隐士。相传尧到了老年，想让位于许由，许由不受，逃于箕山（今河南太康北），后又去颍水边洗耳，以示清高。巢父听说许由隐于颍水，也随其后隐于颍水上游，洗耳不闻其声。

从该诗中可以看出，他学习书剑的目的是为了报国。虽然在唐玄宗圣明时代，可是他的诗文并没有受到朝廷赏识，他的剑术也没有在战场上立功，因而产生怀才不遇的思想。他在《天生百尺树》一诗中，对这种思想表现得特别明显，诗中说：

天生百尺树，剪作长条木。

可惜栋梁材，抛之在幽谷。

多年心尚劲，日久皮渐秃。

识者取将来，犹堪柱马屋。

他把自己比做栋梁之材，但被朝廷抛之幽谷。可是他并不甘心沉沦，后来被“识者取将来”，指他曾做过一般官吏而言，“犹堪柱马屋”，仍然可以大材小用。但当他看到一些人像狼奔豕突那样，千方百计去追求名利、经营富贵时，寒山子不愿与他们为伍。他在《多少般数人》一诗中说：

多少般数人，百计求名利。

心贪觅荣华，经营图富贵。

心未片时歇，奔突如烟气。

家眷实团圆，一呼百诺至。

不过七十年，冰消瓦解置。

死了万事休，谁人承后嗣。

水浸泥弹丸，方知无意智。

他把那些争名夺利者比做一群饿狗，当主人投给它一块骨头时，互相睚眦而争。他在《我见百十狗》一诗中说：

我见百十狗，个个毛鬣鬣。

卧者渠（它）自卧，行者渠自行。

投之一块骨，相与睚眦争。

良由为骨少，狗多分不平。

他还看到一些比较聪明的人士，为了一官半职，苦读诗书，一旦金榜题名，做官之后，便忘乎所以，贪财好色起来。寒山子“立身既质直，出语无谄谀”，他性情鲠直，不会阿谀奉迎，又不愿与那些狗苟蝇营之辈为伍，更恨那些贪官污吏，他宁愿像伯夷、叔齐那样，“饿著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县西南），生廉死亦乐”，保持自己一生清廉。这就是他的自我表白。他那刚直不阿的性格为世俗所不容，为了保全身家性命，所以他要隐居山林，“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再加上家庭变故，他辈责难，妻子疏远，便促使他挟愤出走，走上隐居不仕的道路。这表现了他不为富贵所淫和不为威武所屈的傲骨；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品德；他不随波逐流，有如出污泥而不染的青莲。他用自己的气节，谱写了一位抗议型隐士的特点。

（二）性格怪诞，人谓疯癫

寒山子隐居于寒岩后，生活方式奇特，言行打扮与世迥异，性格怪诞，被时人称为“贫人疯狂之士”^①。他自己孤单一人居住在深山岩穴之中，怡然自乐。他在《寒山有一宅》一诗中说：

寒山有一宅，室中无栏隔。

① 《寒山子集序》，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六门左右通，堂中见天碧。
房房虚索索，东壁打西壁。
其中一物无，免被人来借。
寒到烧软火，饥来煮菜吃。
不学田舍翁，广置牛庄宅。

.....

他在《余家有一窟》一诗中也说：

余家有一窟，窟中无一物。
清洁空堂堂，光华明日日。
疏食养微躯，布裘遮幻质。
任你千言现，我有天真佛。

他在岩穴里生活得很快活，《奥自居寒山》一诗说：“细草作卧褥，青天为被盖；快活枕石头，天地任改变”。还说：“寂寂好安居，空空离讥诮；我自遁寒岩，快活是歌笑。”他以白云为伴，松风为邻，以鸟助歌，生活十分惬意。他在《有一餐霞子》一诗中说：

有一餐霞子，其居诗俗游。
论时实萧爽，在夏亦如秋。
幽间常沥沥，高松风飏飏。
其中半日坐，忘却百年愁。

他在隐居期间，过着类似原始人的生活。他在《携篮采山菇》一诗中说：

携篮采山菇，挈笼摘果归。
蔬斋数茅坐，啜啄食紫芝。

清沼濯瓢体，杂和煮稠稀。

当阳拥裘坐，闲读古人诗。

他的物质生活虽然简陋清寒，但由于他和尘世隔绝，摆脱了世俗纷争，在“微风吹幽松”的幽静环境中，常常“喃喃读黄老”，领略其中真谛，所以在精神上得到解脱，心情还是舒畅的。他精神上所以能得到解脱，是与他喜谈黄老，清静无为分不开；也与他崇尚佛理，戒除声色有密切关系。他深居寒山，聆听泉水叮咚作响，手抚七弦琴，弹奏着《高山流水》的琴曲，也自有一番乐趣。他有一首《三言诗》说：

寒山深，称我心。

纯白石，勿黄金。

泉声响，抚伯琴^①。

有子期^②，辨此音。

寒山子的服饰也与众不同，他脚登木屐，头戴用桦树皮作的帽子，身穿破衣烂衫，手持藜杖，走起路来，步履蹒跚，使人看了滑稽可笑。他在《余家本住在天台》一诗中，曾有“桦巾木屐沿流步，布裘藜杖绕山回”之句。他有一件短袄，冬夏穿在身上，夜里当作被子，磨得褪了颜色，也不知道是红的还是紫的。他在《我今有一襦》一诗中说：

我今有一襦，非罗复非绮。

① 伯琴，是说春秋时期善弹七弦琴的伯牙。他弹琴技艺高超，相传《水仙操》、《高山流水》等琴曲是他的作品。

② 子期，即钟子期，是伯牙的好友，只有他能听懂理解伯牙的琴意。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再弹琴。

借问作何色，不红亦不紫。
夏天将作衫，冬天将作被。
冬夏递相用，长年只这是。

他的奇装异服，经常招来一些围观者。有一次，他云游到某个城市，街上的行人都围着他观看，有的说长道短，评头品足，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全然不加理会，仍然走他的路、办他的事。

寒山子为了断绝尘缘，拒绝和俗人交往。与他有往来的人，一是国清寺里管食堂的拾得和尚，二是禅院里的丰干禅师。他在《惯居幽隐处》一诗中说：

惯居幽隐处，乍向国清（寺）中。
时访丰干老，仍来看拾（得）公。
独回上寒岩，无人话合同。
寻究无源水，源穷水不穷。

他经常到国清寺去。有时就住在寺库。他与拾得关系更为密切，拾得管理寺内伙食，经常收贮食堂里的残余饭菜，放在竹筒里，寒山子一去，就把它背回寒岩。他就是靠着这些残羹剩饭来维持生活的。

寒山子经常在国清寺长廊里慢慢地行走，“叫唤快活，独言独笑”，像疯子一样。有的僧人故意捉弄打趣他，这时他才“驻立抚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①他有时与村野牧童一起唱歌，嬉笑玩耍，或顺从于牧童、或让牧童听他摆布，以任懽自乐。不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是“疯狂子”。他在《时人见寒山》一诗中写道：

^① 《寒山子集序》，《四部丛刊》初编。

时人见寒山，各谓是疯癫。
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缠。
我语他不会，他语我不言。
为报往来者，可来向寒山。

他与那些认为他是疯癫的人，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他认为那些人才是真正的疯子，是痴人说梦，不值得加以理睬，更不用去批驳他们。他在《忆得二十年》一诗中说：

忆得二十年，徐步国清归。
国清寺中人，尽道寒山痴。
痴人何用疑，疑不解寻思。
我尚自不识，是伊争相知。
低头不用问，问得复何为。
有人来骂我，分明了了知。
虽然不应对，却是得便宜。

由于寒山子长期隐居在寒岩，固守穷困，致使他形容枯槁，面色憔悴，因而得到拾得的同情。

（三）诗富哲理，爱憎分明

寒山子虽然形容枯槁，面色憔悴，貌不惊人，性格怪诞，行为奇特，但他“一言一气，俱备情理”，“出言成章，谛实至理”。有的含义玄深，思想境界博大精深，绝非一般世俗之人可比。在他的诗歌言谈中，除一些禅偈外，还夹杂有老庄黄道思想。但这

不是他思想最本质的东西，他没有佛家的轮回报应、因果之说；也没有道家长生不死、炼丹升化之道。他甚至对此持反对态度。他在《常闻汉武帝》一诗中说：

常闻汉武帝，爰及秦始皇。

俱好神仙术，延年竟不长。

金台既摧折，沙丘遂死亡。

茂陵与骊岳，今日草茫茫。

他不相信长生之术，在他的诗中曾多次反映出人生短暂，“不过七十年”，最多不过“百年”，便“冰消瓦解”，玉碎身亡。他在《谁家长不死》一诗中说：

谁家长不死，死事归来均。

始忆八尺汉，俄成一聚尘。

寒山子虽然是一位与社会现实不合而遁迹山林的隐逸诗人，但他对社会、对人生有着积极探求，并有明确主张和鲜明爱憎。他感叹时空无穷，人生短促，厌倦世俗纷争，勾心斗角，向往清静廉洁，希望人们能保持自己的天真本性。他在《天高高不穷》一诗中说：

天高高不穷，地厚厚无极。

动物在其中，凭兹造化力。

这首诗虽词义浅显，但寓意深邃，有着深刻的哲理。他的《四时无止息》一诗，哲理性更强，充满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诗中说：

四时无止息，年去又年来。

万物有代谢，九天无朽摧。

东明又西暗，花落复花开。
唯有黄泉路，冥冥去不回。
夫物有所用，用之各有宜。
用之若失所，一缺复一亏。
圆凿而方枘，悲哉空尔为。
骅骝将捕鼠，不及跛脚猫。

诗中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都遵循一定的规律，春夏秋冬，年去年来，万物新陈代谢，花开花落，黑夜与白昼交替，周而复始，只有宇宙不会摧朽。这些观点在当时是极其可贵的。

寒山子对世态时俗、人间冷暖、人品高下、丑恶善美等，都有亲切感受，鲜明褒贬。在政治上，他主张民本思想。他在《国以人为本》诗中写道：

国以人为本，犹如树因地。
地厚树扶疏，地薄树憔悴。
不得露其根，枝枯子先坠。
决陂以取鱼，是取一期利。

作者鲜明地提出：国家要以人民为根本。人民就像土地一样，国家就像土地上生长的树木。土地肥厚，树木就生长茂盛；土地瘠薄，树木就枯死。用此作为比喻，说明民富国强，民穷国丧这一道理。作者还警告统治者，不要为了一期之利，就决泽而渔，向百姓采取掠夺政策。不然的话，将自食恶果。这种民本思想，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寒山子对贪婪掠夺、享乐腐化、慳吝虚伪、为富不仁等社会丑恶现象，非常厌恶，并面对现实，给以无情的揭露。他在《常

闻国大臣》一诗中，揭露其享乐腐化说：

常闻国大臣，朱紫簪婴禄。
富贵百千般，贪荣不知辱。
奴马满宅舍，金银盈帑屋。
痴福暂时扶，埋头作地狱。

诗中对“国大臣”享乐腐化的丑恶嘴脸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批判，这些都是暂时的、为自己准备的“地狱”。他对那些“富儿”的贪婪吝啬也同样给予揭露。他在《富儿多鞅掌》一诗中，给以嘲讽说：

富儿多鞅掌，触事难祇承。
仓米已黑赤，不贷人斗升。
转怀钩距意，买绢先拣绫。
若至临终日，吊客有苍蝇。

这种贪婪吝啬之徒，往往极为虚伪，但如果执迷不悟的话，死后只有苍蝇去做吊客。他还把那些巧取豪夺者的丑恶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在《贤士不贪婪》一诗中揭露说：

贤士不贪婪，痴人好炉冶。
麦地占他家，竹园皆我者。
努膊觅钱财，切齿驱奴马。
须看郭门外，垒垒松柏下。

他在《新谷尚未熟》一诗中，把一个放高利贷者逼债要帐、见死不救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诗中说：

新谷尚未熟，旧谷今已无。

就贷一斗许，门外立踟蹰。
夫出叫问妇，妇出遣问夫。
慳惜不救乏，财多为累愚。

此外，寒山子还在《不行真正道》一诗中，把一个“口惭神佛少，心怀嫉妒多；背后噬鱼肉，人前念佛陀”的伪君子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他还有不少揭露唐代土地兼并、侵夺财产、聚敛成性的诗作，如《推寻世间事》、《我见凡愚人》、《贪人好聚财》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各个方面的现实生活，揭示了广泛的社会矛盾、阶级对立状况。他是唐代众多诗人中的佼佼者，是一位同情人民疾苦、揭露社会黑暗的隐逸诗人。他的诗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和现实主义精神。

（四）倡导白话，注重教育

寒山子的诗虽然涵义深邃，但文字通俗易懂，甚至达到口语化。他反对文人学士讲究格律声病，雕凿文字。因此他的诗从思想内容到语言的运用上，都和当时的文人墨客的诗歌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因而遭到时人的非议和责难。当时有个王秀才，对他的白话诗吹毛求疵，百般挑剔，说他不懂格律，不知平仄压韵，进行讽刺挖苦。他在《有个王秀才》一诗中说：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

云不识蜂腰^①，仍不会鹤膝^②。

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

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

寒山子对此则不以为然，他有自己的明确主张。他在《有人笑我诗》中说：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③，岂用毛公解^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官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他的这些主张，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是罕见的、难得的，是中唐时期屈指可数的几个白话诗人之一。

寒山子写白话诗的目的就是注重它的社会效应和教育作用。如果自己的作品是阳春白雪，其和者必然寡少，别人看不懂，就起不到应有的社会效应和教育作用；反之，自己的作品如果写得通俗易懂，接近下里巴人，其和者必然众多，社会效应和教育作用也就会更大。他为了发挥诗的社会效应和教育作用，他采取了与众不同的书写方法，把自己的诗书写在岩石、墙壁、厅堂、竹

① 蜂腰，旧体诗作法中的八病之一。指五言诗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言两头粗中间细，有似蜂腰。

② 鹤膝，亦八病之一。指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言两头细，中间粗，有似鹤膝。

③ 郑氏笺，是指东汉经学家郑玄所笺注的《毛诗》、《三礼》、《周易》、《论语》等。

④ 毛公解，是指毛亨曾作《毛诗故训传》，也称《诗经毛传》，是古文诗学的开创者。

木之上，让更多的人阅读、传诵。因为他的诗接近口语化，十分通俗，只要具备有启蒙知识的人都可以看懂。寒山子对读他诗的人都有明确要求。他在《凡读我诗者》说：

凡读我诗者，心中须护静。

怪贪继日廉，谄曲登时正。

驱遣除恶业，归依受真性。

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

他要人们读了他的诗后，能够从怪贪、谄曲中醒悟过来，从无谓的纷争中解脱出来，变成真正廉洁正直的人，这就是他写诗的目的。他在《五言五百篇》一诗中，也有同样的善良心肠：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

三字二十一，都来六百首。

一例书岩石，自夸云好手；

若能会我诗，真是如来母。

因此，他的诗有劝恶从善，警励时俗，力戒懒惰，互相友爱的作用。他试图用自己美好的心灵和菩萨心肠去感化那些尘世上的芸芸众生。

寒山子的诗，共有六百首，以五言为最多，七言诗也写得很好，还有三言诗二十一首。他的诗既然多书写在石壁、竹木、村野厅堂之上，又是怎样搜集整理流传下来的呢？

据说，有个叫闾丘胤的官吏，他早年曾受命到丹丘（今河北曲阳县西北）去做官，临行前突发头痛病，多方延医诊治，均不见效。恰好这时从国清寺来了一位叫丰干的禅师，特来拜访，并帮他治好了头痛病，闾丘胤非常感激。言谈之间，闾丘胤问起国

清寺一带有何贤人堪为师表？丰干禅师向他介绍了寒山子和拾得和尚的情况。后来闾丘胤到台州做刺史，刚上任三天，就想起丰干禅师的话，于是亲往国清寺拜访，并下令唐兴县寻访寒山子和拾得和尚的消息。当县令报告说县西七十里的寒岩，住有一位贫士，经常到国清寺止宿，寺中有一和尚名叫拾得。他到国清寺后，便访问众僧，经僧人道翘介绍，才知丰干禅师早已不在人世。道翘又带他去见寒山子、拾得二人，恰巧他二人正在国清寺厨房里灶前向火大笑。闾丘胤向前礼拜，二人见他到来，却连声喝斥，并自相把手，哈哈大笑，叫道：“丰干饶舌！饶舌！弥陀不识，礼我何为？”^①这时众僧也围拢到这边，二人趁机摆了摆手，快步走出寺院。闾丘胤派人去追，二人早已走回寒岩。闾丘胤让人找好房子，叫寺里好好安置他二人的生活。他返回台州后，又令人制了两套净衣，又备了二副香药，派人送去供养他们。可是，寒山子和拾得再也没来国清寺，使者就把这些东西送到寒岩。寒山子见有人来送东西，高声喊道：“贼！贼！”忙退入岩穴，使者无法追及。从此，他二人的行迹便无人知晓。后来，闾丘胤派道翘和尚追述寒山子往日行状，并领闾丘胤去看寒山子留在竹木、石壁、村野厅壁上的许多诗歌作品，并把它收集起来，编纂成集，共有三百多首，闾丘胤为他的诗集还写了一篇序言。这样，寒山子的诗歌才得以流传下来。

在他的诗中，还有一部分是描写自然景物和隐逸生活方面的作品，他把隐逸情趣和自然景物溶为一体，真实地抒发出他对大自然优美的感受。在他的诗中还有一部分是格调低沉、消极厌世之作，这类作品虽缺乏积极意义，但在艺术上也不乏为佳作。这

^① 《寒山子集序》，《四部丛刊》初编。

反映了寒山子思想上的矛盾，他在无力和恶势力抗争之时，便采取隐逸山林的消极态度，我们对此也不必苛求于古人。

皮
日
休



同情人民、抨击时政、亦官亦隐 的文坛巨匠皮日休

· 王 珍 ·

皮日休，字逸少，后改为袭美，自号“闲气布衣”、“醉吟先生”、“鹿门子”、“醉民”、“醉士”等。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大约于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庶族地主阶级家庭里。他的远祖曾做过襄阳太守，所以后来世代代就成了

襄阳人。在唐代二百多年中，他家无人做官，“或农竟陵（今湖北天门县），或隐鹿门（今湖北襄樊市东南），皆不拘冠冕，以至皮子。”^①他家不是高门世族，家中土地也不多，皮日休从少年时代起，就过着节衣缩食的贫困生活。他在《贫居秋日》一诗中写道：

亭午头未冠，端坐独愁予。

家贫烟爨稀，灶底阴虫语。

门小愧车马，廩空惭雀鼠。

尽室未寒衣，机声羨邻女。

该诗描写了他家的穷困境况，虽有艺术夸张成分，但也可窥见其生活确实比较拮据。他在《皮子文藪》卷六《食箴序》一文中也谈到“皮子少且贱，至于食，自甘粢粝而已。”

皮日休长相丑陋，其貌不扬，常受到人们讥讽。他性情傲慢，放荡不羁，好嗜酒，癖诗，“以文章自负，尤善箴铭”^②。

（一）隐居读书，抨击时政

皮日休从少年时代起，一直到咸通四年（863年），都在鹿门山隐居读书。他虽出身寒门地主，但家中并不富裕，他把节衣缩食节省下来的钱买了大量书籍，又凭着“对灯任髻燕，凭案从肘研”的苦学精神，如饥似渴地博览了儒家经典，不仅给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也从中接受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在

① 《皮子文藪》卷10，《皮子世录》。1981年上海古籍版。以下凡引此书均不另注。

② 《唐才子传·皮日休》。

《读书》一诗中写道：

家资是何物，积帙列梁枅。

高斋晓开卷，独共圣人语。

英贤虽异世，自古心相许。

案头见蠹鱼，犹胜凡俦侣。

作者说他的家资就是高达屋梁的书卷，整日埋头于书斋之中，阅读圣贤之书，以致书中生了白色的蛀虫，和书籍为伴胜过平庸的伴侣，以表达对古代圣贤追慕之情。在儒家思想熏陶下，他极力推崇尧、舜、禹、汤、周公、孔子、孟子、贾谊、王通等人物，认为儒家学说是万古不移的治世之道，而唐代儒学大师韩愈是当代儒学的继承人，他要像韩愈那样，决心重振儒家道统，以维护唐王朝的统治。

皮日休在鹿门山读书之时，正是唐宣宗、唐懿宗当政时期。唐宣宗于大中元年（847年）即位后，把武宗时期所毁佛寺重新加以修复，把武宗所裁减的冗员冗官统统加以增设，凡不被武宗所重用之人均予以提拔，这无疑要加重人民的负担和剥削。大中十三年宣宗死后，懿宗继位，他在位期间，政治更加腐败，大肆挥霍浪费，游乐无度，连年战争，抽兵运饷，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他即位后不久，便爆发了浙东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后期又爆发了庞勋领导的徐泗地区农民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皮日休作为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比较接近下层人民，颇有正义感。他痛恨当时政治的腐败，同情人民的疾苦，因而他接受了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仁政”思想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他曾上书朝廷，要求立《孟

子》为科选，和明经一样列入选拔人才的考试科目。他大声疾呼统治者要施仁政，并对当时的腐朽社会进行大胆的、深刻的揭露。他在《读司马法》一文中指出“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在《鹿门隐书》中说：“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因此，他认为对那些不惜牺牲民命来夺取天下政权的野心家，以杀人来取笑的凶残统治者，人民可以起来“扼其吭（用力掐住他的咽喉），摔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灭族），不为甚矣。”（《原谤》）他以愤怒的心情，抨击了晚唐的黑暗统治。这种反对暴君暴政的思想，主要来自孟子。孟子认为君主对人民残暴，人民有机会可以起来加以报复，就像武王杀纣，同杀一民夫一样，而不是弑君。这种思想，在当时情况下，是十分激进的。

在民本思想指使下，皮日休反对官吏为己谋私利，他在《鹿门隐书》一文中说：“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意思是说古代的官吏，把天下大事看作是自己应该操劳的事情，所以忧心天下大事；现在的官吏则相反，认为天下的人应该为自己操劳，为自己忧虑。他在该文中又说：“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古之决狱，得民情也，哀；今之决狱，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赏必至。”深刻地揭露了晚唐社会官吏贪污，不管人民死活，只求贪功邀赏，对人民进行掠夺的强盗本质。他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鞭笞。他在《贪官怨》一诗中，进一步揭露晚唐官场的腐败说：

国家省闕（官禁）吏，赏之皆与位。

素来不知书，岂能精吏理。

大者或宰邑，小者皆尉史。

愚者若混沌，毒者如雄虺（毒蛇）。

伤哉尧舜民，肉袒受鞭箠。
吾闻古圣王，天下无遗士。
朝廷及下邑，治者皆仁义。
国家选贤良，定制兼拘忌。
所以用此徒，令之充禄位。
何不广取人？何不广历试？
下位既贤哉，上位何如矣？
胥徒赏以财，俊造悉为吏。
天下若不平，吾当甘弃市！

作者痛斥贪官像毒蛇一样的狠毒罪行后，并呼吁要改革吏治，广揽人才，如果按照他的办法来做，天下如不太平，皮日休甘愿弃尸街头。

皮日休虽然对统治阶级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自己的改革措施，但这些都无法改变现状。朝政的日益腐败，使他痛心疾首。他为此曾苦闷过、忧虑过，渐渐地染上了嗜酒的习惯。他终年饮酒，不醉则游，不游则息，坐船游湖，载酒一坛，山居醉酒，孤枕群书。因此，他给自己起个雅号叫“醉士”、“醉民”。他在《酒箴赋序》中有这样的一段自白：“皮子性嗜酒，虽行止穷泰，非酒不能适。居襄阳之鹿门山，以山税之余，继日而酿，终年荒醉，自戏曰‘醉士’。居襄阳之洞湖，以舶觚（sù，音肃）载醇酎一甌（dān，音耽。大的瓦器），往来湖上，遇兴将酌，因自谐曰‘醉民’。”在该文中，他发出“天地至广，不能容醉士醉民”的呼声。他认为酒不仅可以“充口腹，乐悲欢”，上可导致国家灭亡，下可导致杀身之祸。并规劝统治阶级不要沉湎于酒色之中，而导致亡国之祸。他宁可自己独醉，而“不醉于人”，其用心颇为良苦。他的隐居，

是同当时统治阶级站在对立的立场上，进行抗争，实属抗议型隐士。

（二）同情人民，积极应试

皮日休在痛恨时政腐败的同时，比较同情人民的疾苦。他在《橡媪叹》一诗中说：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岗。
伛偻（驼背）黄发媪，拾之践晨霜。
移时始盈掬（一捧），尽日方满筐。
几曝几复蒸，用作三冬粮。
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
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
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廪。
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
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
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
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
吾闻田成子^①，诈仁犹自王。
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

作者从老妇拾橡子充饥写起，运用对比手法，揭示出劳动人民终

① 田成子，即田常，春秋末年为齐相。他用大斗借出，小斗收回的办法，来收买人心，获得齐人拥护，终于夺取了齐国政权。

年劳动，除将粮食交于官府之外，结果自己却一无所有，这都是贪官狡吏敲诈勒索、以饱私囊的结果。他嗟叹这位拾橡子的老妇，流下同情的眼泪。而他的《卒妻怨》一诗。则从更深、更广的角度，描述了戍卒战死边疆，家人饥饿而死的惨状，揭露了战争和饥荒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诗中说：

河湟^①戍卒去，一半多不回。

家有半菽食，身为一囊灰。

官吏按其籍^②，伍中斥其妻。

处处鲁人髻，家家杞妇哀^③。

少者任所归，老者无所携。

况当札瘥年（荒年），米粒如琼瑰。

累累作饿殍，见之心若摧。

其夫死锋刃，其室委（弃）尘埃。

其命即用矣，其赏安在哉？

岂无黔敖（施舍）恩，救此穷饿骸。

谁知白屋士（作者），念此翻欷歔。

诗中叙述戍守河湟的士卒，有一半战死沙场，他们的妻室吃糠咽菜，官吏们不管其死活，仍按照他们的户籍征收赋税，年青者任其改嫁，年老者无人照顾，如遇上荒年饥岁，粮食贵如美玉，家人饥饿而死，弃尸道路。作者见此惨状，不禁悲伤叹息起来。

① 河湟，指黄河、湟水流域地区，今青海东部一带。

② 籍，指户籍；伍，古代户籍以五户为伍。

③ 鲁人髻（zhuā，音抓），鲁襄公四年鲁军侵邾时被战败，国人迎丧时头发皆用麻盘成丧髻，称为髻。杞妇哀，齐庄公四年齐大夫杞梁袭莒时战死，其妻迎丧于郊，枕尸痛哭。杞妇哀和鲁人髻都是描写在战争中死去士卒的妻子的哀伤。

朝政腐败，官吏贪污，虎狼当道，苛剥百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皮日休对此不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且早有改革吏治的想法，这必然要导致他积极入仕，救民于水火之中。他在《鹿门隐书》中说：“伯夷……不仕非君，谁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他借伯夷不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关心天下大事，来表达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

要入仕，必须通过应试，这是唐代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唯一道路。为此，皮日休于咸通四年，带着自己的文章诗赋，从襄阳出发，出游各地，以自己的诗文去进谒各地名流权贵，求得他们的推荐，以便考取进士。他从襄阳沿汉水东下，于四月到达郢州（今湖北武汉市），拜见刺史郑诚，并为他作《郢州孟亭记》一文。郑诚曾把纪念孟浩然而建的亭命名为“浩然亭”，皮日休将它改为孟亭，文中赞扬了孟浩然，并对他表示崇敬之情。然后又从郢州出发，“南浮至沅、湘”（《悼贾并序》），对西汉政论家贾谊进行悼念，文中颂扬他有王佐之才，又哀叹他不得志而被贬。这年秋天，皮日休又乘船沿江东下，到达白门（即今江苏南京市），并作有《白门表》一文。第二年春天，皮日休来到寿州（今安徽寿县）的盛唐县（今安徽六安），这里是春秋时期的六国，咎繇的后代封于此，故有咎繇庙，皮日休拜访咎繇庙后，作碑以示纪念。（《皮子文藪》卷四《咎繇碑》）然后渡江至彭泽（今江西湖口县东），馆于友人李中白的栖宾亭。咸通六年，再次渡过长江，来到霍山（今属安徽），作有《霍山赋》一篇。后取道南阳，经蓝田关（今陕西蓝田县），于十月进入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他这次出游历时二年半，行程二万里，拜访了十余位封疆大吏和名流，开拓了眼界，准备参加明年的科举考试。

咸通七年春，皮日休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态度，参加了

这次进士科考试，结果却名落孙山。但他并不灰心，还要再考。他在《三羞诗》其一中说：“献文不上第，归之淮之汭（河水弯曲处，这里指寿州）。蹇蹄可再奔，退羽可后歇。”意思是说他这次考试虽然失败，但跛足养好后还可以再奔跑，衰退的羽毛丰满后还可以再飞，以比喻自己将来再试时定会成功。于是便从长安出发，取道洛阳，途经许昌，退归寿州。在寿州刺史的资助下，于州东买了一座别墅，在那里编辑自己的诗文集《文藪》，准备把它作为“行卷”，送给有关人士，以利来年的再次应试。

当他回归寿州途中，行至长安都城门外，看到一些官员，因冒犯当权者而被发配到南越，个个面带厌恶功名利禄的表情，使他再次看到官场上互相倾轧的丑恶现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当他途经许昌，旅居于传舍，正准备休息，忽听人声嘈杂，号啕之声，惊动城郭，皮日休出来寻问道民，才知道这些号啕大哭的人，都是许昌兵的家属。朝廷征召二千多许昌兵去岭南作战，大都战死在那里，所以其家属才如此伤心。皮日休感到很惭愧，遂作了一首诗，他在《三羞诗》其二写道：

南荒不择吏，致我交趾^①覆。
绵连三四年，流为中夏辱。
懦者斗即退，武者兵则黜。
军庸（军功）满天下，战将多金玉。
刮得齐民痛，分为猛士禄。
雄健许昌师，忠武冠其族。
去为万骑风，住作一川肉。
昨朝残卒回，千门万户哭。

① 交趾，泛指五岭以南的地方。相传那里人卧时头向外足向内相交，故名交趾。

哀声动闾里，怨气成山谷。
谁能听昼鼙（军鼓），不忍看金镞。
吾有制胜术，不奈贱碌碌。
贮之胸臆间，惭见许师属。
自嗟胡为者？得蹶前修躅。
家不出军租，身不识部曲。
亦衣许师衣，亦食许师粟。
方知古人道，荫我已为足。
念此向谁羞，悠悠颍川绿。

诗中揭露了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而将帅靠战争升官发财，士卒战死沙场，人民却承受了全部苦难。作者虽有制胜之术，但由于地位低贱，无法发挥作用，内心感到十分羞愧。皮日休回到寿州后，正逢淮右地区发生蝗旱灾害，他目睹了“父舍其子，夫捐其妻，行哭立丐，朝去夕死”（《三羞诗》其三序）的惨状，自己虽衣食无忧，但不能与灾民独享，因而十分同情他们的遭遇，遂作诗一首，以表示对灾民的慰问。他在《三羞诗》其三中写道：

天子丙戌年，淮右民多饥。
就中颍之汭，转徙何累累。
夫妇相顾亡，弃却抱中儿。
兄弟各自散，出门如大痴。
一金易芦菔（萝卜），一缣换凫茈（荸荠）。
荒村墓鸟树，空屋野花篱。
儿童啮草根，依桑空羸羸（瘦弱）。
斑白死路傍，枕土皆离离（罗列）。
方知圣人教，于民良在斯。

疴能去人爱，荒能夺人慈。
如何司牧者（官吏），有术皆在兹。
粤吾为何人，数亩清溪湄（岸边）。
一写落第文，一家欢复嬉。
朝食有麦饘（稠粥），晨起有布衣。
一身既饱暖，一家无怨咨。
家虽有畎亩（田地），手不秉耒耜（农具）。
岁虽有札瘥，庖不废晨炊。
何道以至是，我有明公知。
食之以俟食，衣之以俟衣。
归时恤金帛，使我奉庭闱（父母）。
抚己愧颍民，奚（何）不进德为。
因此感知己，尽日空涕洟（眼泪鼻涕）。

咸通七年（即丙戌年）皮日休回到寿州，见淮右饥民妻离子散，颠沛流离，家破人亡，枕尸道路的惨象，他质问官吏就这样治理人民吗？又联系自己在这荒年饥岁中，尚能“庖不废晨炊”，感到十分惭愧，整日为饥民哀伤流涕。

这次出游和应试，使皮日休广泛接触了现实，深入到社会的下层，耳闻目睹了百姓所受的种种苦难和朝政的腐败，更证实了他早年所说的“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的看法。他下定决心，要像初唐时期的名相房玄龄、杜如晦那样，为国家建功立业。他在《房杜二相国玄龄、如晦》一诗中说：

吾爱房与杜，贫贱共联步。
脱身抛乱世，策杖归真主。
纵横幄中算，左右天下务。

肮脏（刚直）无敌才，磊落不世遇。

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辅。

黄阁（听事处）三十年，清风一万古。

巨业照国史，大勋镇王府。

遂使后世民，至今受陶铸（造就）。

粤吾少有志，敢蹶前贤路。

苟得同其时，愿为执鞭竖（童仆）。

作者不仅歌颂了房玄龄、杜如晦的丰功伟迹，由此而产生的爱慕之情，而且还表明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敢蹶前贤路”，将国家治理好。他在《李太尉晟》一诗中也同样表达了他“吾虽翰墨子，气概敢不群”的安邦定国大志。于是便在寿州别墅编定自己的诗文集《文藪》，他本着“句句考事实，篇篇穷玄虚”（《奉酬崔璐进士见寄次韵》）的精神，力求达到“上剥远非，下补近失”（《文藪序》）的目的。《文藪》共分十卷，文章占九卷，诗一卷。体裁多样，内容丰富。这些诗文充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富有强烈的战斗性。《文藪》编定后，皮日休分别将它送给有关人士，作为“行卷”，准备再次应试。

咸通八年，皮日休再次赴京，参加春试。这次主考官是礼部侍郎郑愚，皮日休以“榜末及第”^①。皮日休平时思想激进，抨击时政，揭露黑暗，得罪不少官员，为什么这次却能榜末挂名呢？原来唐宣宗大中以后，礼部取士放榜时，每年都录取姓氏稀僻的人两三个，作为统治阶级用来伪装公道，以平众愤的装饰品。因为皮姓稀少，所以他被列为榜末。这种现象，当时称之为“色目

① 《北梦琐言》卷2。

人”或“榜花”^①。这次考中的进士有郑洪业、牛徽、韦昭度、韦承贻、崔昭符等共三十人。主考官郑愚见皮日休其貌不扬，对他加以戏弄，皮日休当即进行反击，受到举子们的推崇。当新科进士宴集曲江池时，新科进士崔昭符再次嘲笑皮日休貌丑，弄得他十分难堪。

（三）仕途坎坷，胁迫从军

皮日休于咸通八年及第后，唐政府并没有立即授予他任何官职。他无奈于第二年离京东游，宿太华（今陕西华山），登嵩高（今河南嵩山），经洛阳，然后乘舟沿汴河抵达扬州，渡过长江天堑，到达姑苏（今江苏苏州市）。咸通十年，谏议大夫崔璞出任苏州刺史，皮日休便在崔璞幕下做郡从事。在这里他结识了吴中名士陆龟蒙。陆龟蒙是苏州吴县人，陆姓在三国时期便是吴中大族，他又是唐武后宰相陆元方的七世孙，有田数百亩，出身世族地主，陆龟蒙举进士不第，便隐居在家，以著述自娱，过着安逸的生活，自称“江湖散人”。“甫里先生”、“天随子”。二人结为诗友后，过往甚密。由于皮日休登第后，政治上并不得意，使他失去了早年的政治热情，又受陆龟蒙一些消极思想的影响，他整天无所事事，除了为崔璞刺史作一些祈祷止雨的祝文外，公务之余，便和陆龟蒙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写下了大量的唱和诗。这些诗歌，除了《馆娃宫怀古》、《金钱花》等少数借古讽今、借物喻人，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外，其余大都具有脱离现实的倾向，几乎看不到时代

① 《南部新书·丙集》。

的影子了，已经失去他早年那种锋芒毕露，抨击政治黑暗，揭露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和陆龟蒙的三百多首唱和诗中，内容空泛，几乎完全丧失了早期诗歌的特点，如咏渔、咏樵、咏酒、咏茶诸诗，成了形式主义的作品。至于双声、叠韵、药名、联句之类，更不过是一种庸俗的文字游戏而已。后来皮日休把它编入《松陵集》中。直到咸通十三年，懿宗才授予他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之官，皮日休这才离开苏州，到长安赴任。

皮日休任太常博士时，唐代政权已经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农民大起义前夕了。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病死，僖宗即位，第二年改元乾符。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聚众数千人，在长垣（今属河南）起义，五月攻克濮州（今山东鄄城西北），六月再克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这时黄巢也率众数千响应起义。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皮日休又回到吴郡，出任毗陵（今江苏武进）副使。乾符五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渡过淮河、长江，攻克宣州（今安徽宣城），进入浙西，这时皮日休也被胁迫参加了农民起义军。黄巢爱其才，令他作谶文，以鼓舞义军士气。皮日休当即编谶词说：“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即黄字）。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即巢字）。”^①这四句谶语的意思是说黄巢应当称帝，并无讥讽黄巢发丑之意。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五日，黄巢起义军攻克唐朝首都长安，十三日黄巢即位为皇帝，国号大齐，年号金统，任命了一批官员，皮日休也被任命为翰林学士。金统三年（882年），黄巢政权曾派皮日休巡视安抚同州的铜官县（今陕西铜川市）。皮日休于三月十五日到达铜官县后，见该县既

① 《南部新书·丁部》和《唐才子传》。这四句谶语是歌颂黄巢，并非如二书所说是讥讽之词。

无令长，县衙后园也十分荒芜，遂写下语重心长的《题铜官县壁》一文^①，以表示安抚之意。金统四年，由于唐政府军对长安的包围和不断进攻，使义军发生粮荒，被迫撤出长安，皮日休大约这时被唐王朝所杀^②，年约四十余岁。因为唐王朝对参加起义并接受伪职的皮日休是不会放过的。

皮日休这位唐代文坛巨匠，虽然没有李白、杜甫那样出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是我国封建文学家唯一参加农民起义的诗人，他的政论小品文，被鲁迅誉之为“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他的诗不仅揭露了晚唐黑暗的现实，而且在唐诗向宋诗转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① 见《全唐文》卷799。

② 关于皮日休的下落，正史没有记载。后人笔记杂著中有不少传闻，可归纳三种：一为黄巢所害，见《北梦琐言》、《南部新书》、《唐诗纪事》等；二为朝廷所害，见《老学庵笔记》转引《该闻录》；三为逃奔吴越，投靠钱镠。我们采用第二种说法。

戚同文



博学重义的处士——戚同文

· 高 凯 ·

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军阀混战时期，统治者之间经常性的争权夺利、兵戎相见的事件层出不穷，造成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极大破坏；同时，也使一些恬淡好古、不趋荣利的有识之士为之深恶痛绝。他们纷纷仿效前人而退隐山林，成为名重一方的隐士。生活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晋至北宋前期的戚同文就是他们之中的重要一员。

（一）风雨飘摇逢乱世，孤苦零丁度童年

过去每年四五月的时候，正是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楚丘（今山东曹县）春花烂漫、莺飞草长、万物葱郁的时节。但是而今的这里，空气里却除了充满浓烈的血腥味之外，满眼能看到的只是尚在冒着青烟的废墟和遍地浑身腐臭、爬满绿头苍蝇的尸体，仿佛这片天地里不存在任何生物似的。这时，远远的沟渠里传来一阵微弱的婴儿啼哭声。又过了半个时辰，楚丘的大道上才蹒跚着走来一个白发苍苍、浑身湿透的老年妇人，怀里抱着一个皱巴巴的小脸、身上还带着母体血污的婴儿。只见老太太走到一片已烧成灰烬的院落前，心里想着相继惨死的女婿、女儿，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她一边骂一边哭道：“这是什么世道啊？！好端端的一个家烧成了灰，几天前还活着的人都死了个光。天啊！这世道还让人活吗？！”“可怜我那怀孕的女儿，前番丈夫被害，家遭抢劫，自己要生孩子了，竟只能躲到野地里，又惊又怕，又冻又饿，结果生下孩子人就死了！这叫我这孤老婆子带着这孩子可如何活下去啊！……”人们看到这里禁不住要问：这刚刚诞生、便失却父母的孤儿是何许人也？他便是本文的主人公、以后名垂一方、博学重义的处士——威同文。

威同文的外婆是一位知书识礼之人。虽然她无法承受短时间内接连失去女儿、女婿的沉重打击。但是，为了保住威家的血脉，她还是勇敢地肩负起抚养威同文的任务。为了使威同文长大以后能够不忘父母惨死的原因，不忘军阀混战带给威家的灭顶之灾。她特意给小孩子起了一个“同文”的名字，以祝愿他长大之后能够

生活在一个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环境里。

在外婆的抚养下，戚同文从小就很懂事。五六岁的时候，便知道帮外婆做些轻微的家务活。晚饭后，他从不跑出去跟同龄的孩子一起玩耍，而是坐在屋里，为劳累了一天的外婆捶肩、捶腿，陪着外婆说话，求外婆给他讲故事、说典故。所以，每天晚饭后，外婆除了给戚同文讲故事外，还经常教他读书、写字。寒往暑来，眨眼的工夫，戚同文已经十来岁了。这时的戚同文不仅能够背诵许多优美的诗赋，而且还练得一手好字。这在当地同龄的少儿中是很少见的。故在邻里们的眼里，戚同文是一个既聪明好学，又孝顺外婆的好孩子，以后定然是一个成大业、办大事的人。

本地隐居着一位虞城地面上最有名的老先生，他姓杨名愨，几十年来，他“不求闻达”^①地勤奋读书、专心授徒，颇受乡里的拥戴。所以在当地能够拜到杨愨为师的，都要好好庆贺一番，仿佛自家孩子的身价也跟着提高了不少似的。

一天，外婆让戚同文去离家几里路的油铺打油。途中正好路过杨愨的学馆。平日里戚同文常听大人们提到杨愨的大名，便很想一睹他学生云集的盛况。今天能有此机会，并且从老远的地方便能听到学馆里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心里更是羡慕不已。于是，他打定主意，准备在灌完油回家、再一次路过学馆时偷偷地瞧一会儿。当戚同文手持灌满的油壶来到学馆门前时，正恰遇见杨愨给学生们讲解《礼记》。杨愨深入浅出的讲解、形象丰富的比喻、平易近人的话语及抑扬顿挫的语调，无不深深地吸引了戚同文的注意力。戚同文听得太认真了。他甚至在听到杨愨说：“今天上午的课到此为止，大家可以休息片刻、准备吃饭”的话以后，仍然

① 《宋史·隐逸上·戚同文传》。下引此书不另注。

愣在学馆门口，静静地回味着杨愬所讲的内容。他根本不知道杨愬已走出门来，并站在他身后仔细观察了自己。所以，当杨愬轻轻地拍拍他肩头时，他才发现身后有人。戚同文很尴尬地转过身，忙给杨愬躬身施礼。杨愬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戚同文躬身答道：“我叫戚同文，今年已十周岁。”杨愬又问：“你能否复述一下今天你所听的《礼记》的内容？”戚同文说：“我十分愚钝，不知能否记得周全，请老师为我更正。”于是，他便把杨愬所讲的《礼记》背了出来，并且还把杨愬讲解的重点之处指了出来。杨愬还想问戚同文几个问题，正好戚同文的邻居来了，他把戚同文叫到一边说：“同文，你怎么还不回家，你外婆正心急如焚地等着你呢！”戚同文只得向杨愬告辞说：“小子我甚为无礼，多有打扰，请先生原谅了！我这就回家去禀告外婆，他日免不了来讨扰先生。”然后，戚同文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学馆。

匆匆一面，戚同文在杨愬的脑海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几十年来，他阅人无数，但从未见过像戚同文这样穿着朴实、气质高雅、聪明好学、懂事恭顺的小孩子。经过多方的打听，杨愬终于了解了戚同文悲惨的命运和他不平凡的成长历程。杨愬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收下他为弟子，并把他培养成不可多得的人才。几天后，杨愬不辞辛苦地亲自登门拜访了戚同文的外婆，并向她表达了自愿接收戚同文为弟子而不收任何学费的愿望。戚同文的外婆久闻杨愬性善好施、才识卓绝的大名，便欣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从此，戚同文正式成为杨愬的关门弟子，并陪伴他渡过了他余下的岁月。

为了报答杨愬的知遇之情和外婆的养育之恩，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和学习条件，戚同文便以十倍、百倍的努力，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清晨，学馆里起得最早的总是戚同文；夜深，学

馆里油灯熄得最晚的也是戚同文。对于每天杨愬所讲授的课程，他除了要求自己背得滚瓜烂熟外，还努力要求能完整地理解内容。课余时间，别人玩得热火朝天，而他却充耳不闻地在学馆里苦读。他学习《礼记》，“日讽一卷”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成为了倍受杨愬器重和同学们佩服不已的对象。

此时，戚同文所处的时代正是“儿皇帝”石敬瑭所建立的后晋政权统治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五代十国统治最黑暗的时期。石敬瑭为了换取各地藩镇的支持，以保持皇位，便对藩镇采取了姑息政策，一味听任他们贪纵暴敛，鱼肉百姓。如靠兵变起家的晋昌节度使赵在礼，“历十余镇，善治生殖货，积财巨万，两京及所莅藩镇，皆邸店罗列”。^①就是这个姓赵的狗官，后来移镇戚同文的家乡宋州，他的横征暴敛，使得当地百姓痛苦不已。以后石敬瑭调他移镇永兴（今甘肃安西县东），宋州的百姓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欢心鼓舞，欣然相告：“此人若去，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快哉！”^②既奢贪又残酷的赵在礼闻听，恼羞成怒，立即上表向石敬瑭请求留任一年，并且下令境内按户增收一千钱，号“拔钉钱”。但是，宋州地处中原，历年的战乱使得这里的经济倍遭破坏，加之这一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黎民百姓哪里还有能力拿出这号为“拔钉”的一千钱！为了收缴这一千钱，赵在礼还严令大小官吏“公行督责，有不如约，则加之鞭扑”。^③所以，许多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为了躲避差役，有的百姓背井离乡，有的老弱被逼得忧思成疾，有的甚至被如狼似虎的差役活活逼死。就在这一年，戚同文的外婆也因此忧劳成疾，一病不起。她原想让刚成年的戚同

①② 《旧五代史·安重荣传》。

③ 《五代史补》。

文能够过上安定的生活，但是，她毕竟是风烛残年的人，而且二十年前女儿、女婿双双丧命的痛苦，一直苦苦地折磨着她的心。要不是女儿临死前恳求她抚养戚家唯一的骨肉的话，她早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这一次突如其来的风寒和强迫缴纳“拔钉钱”的打击，使她再也不能振作起来了。现在，她只能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棚，等着戚同文从学馆回来，了却祖孙俩人最后一次相见的意愿了。

戚同文在学馆上课，一听邻人说外婆病危的话，立刻便呆在那儿，眼泪刷刷直流，随着身体一阵寒战，他一头扑在地上。邻人及同学们连忙扶住他，大声呼唤着：“同文！同文！你怎么啦？你要挺住！一定要挺住啊！”过了好一会，戚同文才渐渐明白过来，他匆匆爬起来给杨懋告假，便不顾一切、撒腿如飞地向家跑去。当戚同文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外婆身边时，老人已是气息奄奄了。但外婆一看到同文回来，眼睛一亮，顿时有了一些精神。祖孙二人泪眼对着泪眼，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只听戚同文说：“外婆，您好好的，您不会死！您要振作！”外婆摇了摇头。戚同文又说：“不！不！外婆，您不会死的！您是不是想我想病的啊？我不去上学了！我来照顾您，您一定会好起来的！”外婆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她提着一口气、艰难地对戚同文说：“孩子，外婆自己知道还能活多久了，但不论今后外婆是否活下去，你都要给我好好地活着！也不准再说不去上学的话！你现在先答应外婆！”戚同文重重地点点头。外婆又提了一口气说：“孩子，你还不清楚你的身世吧？我现在给你说一说。”于是，外婆就把二十年前戚同文的父母双双死去的事告诉了他，然后又说二十年来她抚养戚同文的艰辛、小同文带给她的喜悦和最近得病的原因，并要戚同文不要辜负她的养育之情，一定要做一个光宗耀祖的好孩子……她说说着说着，突然，一

口气咽不下去，挣扎了一下，闭上双眼，撒手尘寰了。

戚同文高喊一声：“外婆！您怎么啦！怎么不说话了？外婆，你说啊？”他使劲摇着，声嘶力竭地叫着。外婆没有说话，而且身体也渐渐变得冰冷、僵硬，戚同文知道外婆再也不能给他说话了，于是，他号啕大哭起来。那哭声是那样的悲切，像尖刀一样扎着乡亲们的心，乡亲们也忍不住偷偷流泪；那哭声是这样的惨绝，像是世界已变成了沸腾着的油锅，而油锅里正煎榨着戚同文无依无靠的孤儿的心……乡亲们自动组织起来，东家出钱、西家拿布，有的忙钉棺材、有的忙布灵堂，很快地便把戚同文的外婆装敛入棺了。当戚同文从昏迷中惊醒，看不到床上的外婆，只看见乡亲们把装敛好的棺木放进草草布置的灵堂里时，他便不顾一切地又扑到外婆的棺木上痛哭起来。他怎么能不痛哭流涕呢？他和外婆的感情太深了！

戚同文“昼夜哀号，不食数日”的举动，使周围四邻无不为之感动。他们纷纷来到同文的家，慰问并劝说同文节哀。同文的老师杨愬也赶来劝说。杨愬语重心长地说：“同文，为师知道你的身世，也知道你外婆抚养你的艰辛，但外婆抚育你是为了让你以后光宗耀祖、干一番事业，你怎么可以小小年纪便动了死的念头呢？这岂不是想让你外婆白费功夫吗？这样你外婆岂不是要死不瞑目了！所以，我希望你能节哀，能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回学馆学习，以报答你外婆的养育之情！”在乡亲们和恩师的力劝下，戚同文终于打消了死的念头，回到了杨愬的学馆，继续着他的学业。

（二）两耳惭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儿皇帝石敬瑭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病死，他的侄子石重贵被拥立。但是，后晋政治混乱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变得更加严重，这其中除了石重贵极为昏庸无能而又鄙俗下流的因素外，还在于朝中重臣骄横贪婪而谋勇俱无。例如天福九年，后晋打破辽军的进攻后，石重贵“谓天下无虞，骄侈益甚，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置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作织锦楼以织帝衣，用织工数百，期年乃成”。^①全然不顾“频年灾沴，稼穡不登，万姓饥荒道殣相望”^②的局面；将士浴血苦战，击退了强敌，石重贵赏赐甚薄，而他宠爱优伶，赏赐却无度。连当时的卖国之臣桑维翰都进谏说：“……陛下亲御胡寇，战士重伤者赏不过数端。今优人一谈一笑称旨，往往赐束帛、万钱、锦袍、银带。彼战士见之，能不缺望……士卒解体，陛下谁与卫社稷乎？”^③但是，石重贵对这样的忠告仍置之不理，依然故我。常言“上梁不正下梁歪”，后晋政权的几个军国重臣就是例子。他们或卖国求荣，或唯利是图，或刚愎庸愚，或怯懦畏惧。如唯利是图、觊觎皇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杜重威，他“久镇恒州，性贪残，自恃贵戚，多不法。每以备边为名，敛吏民钱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货或名姝、骏马，皆虏取之，或诬以罪杀之，籍没其家。又畏懦过甚，每契丹数十骑入境，咸已闭门登

①③ 《资治通鉴》卷285。

② 《旧五代史·晋少帝纪》。

肆；或数骑驱所掠华人千百过城下，咸但瞋目延颈望之，无意邀取。由是，虏无所忌惮，属城多为所屠，咸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间，暴骨如莽，村落殆尽。”^① 皇帝和大臣尚且如此腐朽透顶，那么，中下层官吏和军士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后晋的军队出征，纪律荡然，扰民极甚，这一点后晋的官方文书都承认：“征师五万，运粮千里，行扈所过，卷团一空，将吏醉饱，百草尽除，遂使河北生民无措足之所”；^② 不仅军队出发要赏“押路钱”，回师还要赏“御甲钱”，“微有功名目，皆次第给缗帛”，且“动计三十万数。”^③ 至于后晋军队所到之处的大肆劫掠，更是无可胜言。由此可见，后晋必亡之势已然不远。面对后晋这种形势，许多志士仁人无不为之忧虑。

目睹后晋政权危机四伏的势态，同样忧虑而又束手无策的杨愬只有经常告诫包括戚同文在内的弟子们，要减少户外活动，以免身陷贼手。有一次，杨愬私下里对戚同文说：“孩子，现在天下大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希望你能利用这个时机好好读书，多锻炼自己的本事，将来金榜题名、为官作吏后，多做些有利于黎民百姓、有利于社会的好事。”然而，戚同文并不是这样想的。他以外婆告诉他的后唐末年父母惨死的往事与现在后晋末年的时事相对照，得出了天下大乱的原因就在于世上的官太多，尤其是贪官太多，而他们贪婪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必定是“骑着骡子思骏马，当了宰相思王侯”，这样一来，天下永无宁日，百姓亦永远逃脱不了死路一条的命运。他暗暗地下定决心：将来自己一生不为官，不与官府同流合污地欺压百姓，也永远不让官场的丑恶玷污

① 《资治通鉴》卷 284。

②③ 《册府元龟》卷 180《帝王·滥赏》。

自己净洁的灵魂。不仅如此，他渴望全国能够早日统一，以便百姓能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为了强烈表达他的这一心愿；他便把外婆给他所起“同文”的名，当作自己的字，从此，他就以姓戚名同文；字同文作为正式的称呼了。

为了更好地向别人昭示他“绝意禄仕”和刻苦读书的决心，便终日以书为伴，不理旁事，并且常常告诫自己：古人尚知利用“三余”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来学习，我怎么不利用这天下大乱、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的时机来拼命读书呢？戚同文这样拼命读书，不为许多人所理解。一次，有人半认真半调侃地问他：“同文，整日里你只知一个人读书，没有人能有机会和你说上话，而你自己也不和别人说话，你难道不知寂寞吗？”戚同文便说：“我怎么会寂寞呢？清晨，树林有晶莹闪烁的露珠和飘忽不定的白雾伴着我晨读；夜晚，更深入静之时更有噼啪作响的油灯伴着我欣赏古人美妙的文章，这难道也叫寂寞吗？”那人一听，便无趣地走开了。总之，戚同文就是这样克勤克俭地读书的，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读完了儒家的经典之作——《五经》。这在戚同文的授业之师杨愬看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杨愬认为《五经》里保存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它从汉武帝以后便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必读的教科书，也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宣传宗法封建思想的理论根据；但是，《五经》成书的年代久远，且文字艰涩难懂，而戚同文能以不大的年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读懂《五经》，这还不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啊！杨愬十分欣喜，暗自庆幸终于有了一个才华横溢、忠实可靠的衣钵传人。

戚同文是一个孤苦零丁的孤儿，要在当时找个媳妇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安定戚同文的心理，杨愬便主动为早已到了结婚年龄的戚同文挑选了一位既聪明、端庄又贤惠的女弟子，并亲自为他

们操办了婚事。这件事对戚同文的震动很大。他除了内心无比感激杨愬之外，还深深地理解杨愬此举的一番苦心，即希望自己能够安心学习，将来能够很好地继承老师未尽的工作，做一番千古流芳的大业。从此，戚同文便以更加刻苦努力的学习来报答恩师杨愬慈父一般的恩情。这一点正如《宋史·隐逸上·戚同文传》所描述的那样：“……愬即妻以女弟，自是（戚同文）弥益励读书，累年不解带”。这证明他已经达到了为学习而废寝忘食的程度。

后晋开远三年（946年）“（三月）河南、河北大饥，殍殣甚众，沂（今山东临沂）、密（今河南密县东南）、兗（今山东兖州）、郛（今山东东平县西北）寇盗群起，所在屯聚，剽劫县邑，吏不能禁。”又“（七月）自夏初至是，河南、河北诸州郡饿死者数万人，群盗蜂起，剽略县镇。……”^①后晋各地政权摇摇欲坠。契丹的首领耶律德光一见有机可乘，便再一次大举南犯，他在卖国贼张彦泽、杜重威等人的引导下，迅速地灭掉了后晋政权。之后，更“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②，使得中原人民倍遭其害。“及契丹入汴，纵胡骑打草谷，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不通政事，华人之狡谄者依托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掳敛货财，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为盗，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攻陷州县，杀掠吏民……”^③。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百姓们或背井离乡、远奔他方，或自动组成乡兵与之相抗，而手无缚鸡之力、只知“力学勤志，不求闻达”的杨愬只得带着戚同文夫妇投靠将军赵直以求保全生命。

① 《旧五代史·晋少帝纪》。

②③ 《资治通鉴》卷286。

赵直将军久仰杨愬在当地的盛名，故对来投奔自己的杨愬十分看重。他除了立即给杨愬及戚同文夫妇安排了一处宽敞、舒适的住房之外，还诚恳地聘请杨愬做为自己的幕僚；同时，赵直对戚同文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之风、博闻强记的那份聪明十分赏识，便多次向杨愬谈及他愿在国家多难之秋和用人之际，邀请戚同文做自己僚属的意思。杨愬便借此劝说戚同文说：“同文啊！你现在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是应当做一番事业的时候了。赵直将军有意抬举你，你可不要失却这个好机会啊！”戚同文内心想：“我早已下定了‘绝意禄仕’的决心，现在怎么可以动摇呢？加上恩师已是垂垂老矣的年纪，身边怎么可以无人照顾？”但为了避免在言语上冲撞杨愬，戚同文便委婉地说：“长者不仕，同文亦不仕。”

不久，战事愈来愈紧，形势也愈来愈严峻。将军赵直日夜为守城御寇而奔忙不已，作为赵直幕僚的杨愬也不甘寂寞，整日守在赵直身边为他出谋划策，因此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同时毕竟年老体弱，这一番折腾使他不胜其负而染病不起。随着病情的加重，杨愬越来越觉得这次自己是余日无多，遂叫来了戚同文，对他说：“同文哪，我隐居已经几十年了。这几十年里，我既没有娶媳妇，更不曾生儿育女。我冥冥之中觉得老天爷一定会叫一个人来做我的儿子，使我死后能将后事托付给他。后来，你、我终于见了面，而且你成了我最得意的弟子。有一次晚上做梦，见一个神人指着你对我说：‘这就是我派来做你儿子的人！’说完，那神人便走了……同文，或许我这个梦是假的，但是，我确实希望你能够成为我的儿子，能够完成我未尽的事业。至于我那万卷藏书便留给你做个纪念，希望你能好自为之。同文，你能做到吗？”杨愬说完这段话，便用企盼的眼光看着面前的戚同文。戚同文一听恩师此话，顿时热泪盈眶，他连忙跪倒在地，紧紧地握住杨愬的手，深情地

说：“恩师啊，我从上学的那天起，您就把我当成您自己的儿子，用慈父一般的心来宽慰我、培养我，您就是我的再造的父亲哪！……我怎么能不继承您未竟的事业呢？恩师，您现在仅仅是身染小疾，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罢了，您怎么可以想得那么多呢？所以，我恳请您老人家在思想上能够放松一下，配合医生的治疗，以便早日康复！”杨愬满意地点了点头。师徒之间这次语重心长的谈话之后没几天，杨愬便离开人世，安详地睡去了。

恩师杨愬的故去，对戚同文的打击很大。他认为：恩师虽然没有像父母那样生育他，也没有像外婆那样养育他，但是恩师给了他上学和掌握知识、了解世界的机会，教会了他勇敢地面对困难而努力克服困难的方法，也教会了他如何做一个光明磊落、不趋名利、乐于助人的谦谦君子……而老天爷直到最后也不给自己报答恩师知遇之恩的机会，真是太不公平了！……他想：既然老天爷不给我机会在恩师生前报恩，那就让我在他老人家死后来报答吧！从此，戚同文在杨愬的墓前结一草庐，每日身穿用极粗的生麻布做成的不缘边，使断处外露，以示无饰的“斩衰”^①，跪在墓前焚香烧纸。寒往暑来，戚同文结束了三年的守灵，回到赵直将军的家里。

戚同文为恩师杨愬尽儿孙之礼、守孝三年的事迹，轰动了乡里。人们一致称颂戚同文是一个感恩戴德、孝义两全的谦谦君子。由此，将军赵直更加器重和厚待戚同文。为了尊重戚同文本人不愿为官的意愿，赵直特地为他拨了一块树木成荫、风景秀丽的地方，修建了几座房屋作为戚氏学馆。从此，戚同文便开始度过他

^① 衰通缞，旧丧服名。“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种。凡儿子及未嫁女为父母、妻为夫，都服之。见《仪礼·丧服》及《清会典·礼部》。

授四方徒、交八方友的隐居生活。

(三) 不趋荣利不蓄钱，只求仁义存人间

戚同文的学馆选在一个黄道吉日正式开学了。只因早先戚同文博学重义的美名远播，所以，这天前来拜戚同文为师的学生络绎不绝，甚至有的“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那热热闹闹的场景，足足让乡里邻居议论了半个多月。

与别人教书授徒不一样的，是戚同文所收弟子的学费很低，而且对于家中贫困者，他甚至免收学费；对于那些出身富裕的官宦子弟，他既不多收，也不少收一分钱，且决不对他们采取其他照顾的措施。所以，这种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弟子的方法，赢得了弟子们一致尊敬。在教学方法上，戚同文与别人不同的是从不采取体罚学生的办法，而注重正确引导与批评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如针对出身官宦家庭的高象先的方法就是一例。高象先自恃从小聪明过人和父亲高凝祐是刑部员外郎，便不认真学习。戚同文没有体罚他，而是耐心地批评、引导他说：“象先，你聪明过人是好事，但常言道‘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教训你总知道吧？！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走这条老路！你现在年纪很轻，记忆力也强，正是学习的好时机。汉代刘向说过一句话，就是‘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这句话说得很好，比喻也非常恰当，这既是前人学习的经验，又是前人总结的教训，我希望你谨记这句话，多多体会其中的含义！”从此，高象先不仅在生活上一反官宦子弟的轻浮之风，而且在学习上一改华而不实的态度。后来，他终于能够金榜题名，在北宋淳化年间（990—

994)“以司封员外郎致仕。”^①同时，戚同文还注意因材施教，如弟子郭成范也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但是他不愿把精力放在死读四书五经上，而喜欢看民间流传的《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喜欢背诵古人留下来的优美诗赋。对于他，戚同文不是一味地强调让他背四书五经，而是利用他想象力丰富和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优点，引导他多学习和分析古人的诗赋，并经常给他出题目，让他不断地练习写作。之后，郭成范成了戚同文所有弟子中最有文采的人，而且他最终也是“以司封员外郎致仕”，做到“仓部员外郎，掌安定公书记”的京官。总之，在戚同文的精心培养、教育下，他的弟子前后“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成为北宋一朝名动京城的中央官吏。

五代十国时期是封建军阀称王称帝的混战时期。但是这些称王称帝的军阀，其出身比起唐代的藩镇还要“等而下之”。如朱温、王建的出身是流氓，李存勖的出身为沙陀贵族，而石敬瑭、刘知远之流更是出身卑下、连姓氏都没有的沙陀军人，等等，不一而足。他们之所以能在五代时期称王称帝，靠的不是德政，而是武力、屠杀和血腥的政策，那么就可以想见他们的知识水平、道德修养是如何地低下，他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社会上正确教化的作用，也根本来不及搞什么社会教化，便迅速地为其他政权所替代。所以，五代十国时期是社会风气极其混乱、道德风尚极其败坏的时期。社会上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孝敬父母的人少而又少，而横行霸道、抢劫成性、背信弃义的坏事却层出不穷。面对这些情况，戚同文和乡里士人无不为之忧虑。戚同文不仅逢人便宣传政教风化的作用，而且还以实际行动来以身说法，做了许多为乡里

^① 《宋史·隐逸上·戚同文传附高象先条》。

纷纷称道的善事。如乡里有人死了亲属而无钱办理丧事，戚同文便千方百计地“拯济”他；宗族乡里有贫困潦倒、食不果腹的人，戚同文便从自家挑来粮食周济他；天寒地冻之时，戚同文看到路上有裸身露体的要饭人，除了给这人吃饱饭外，还经常解下自己的棉衣皮袄给这人披上。乡里有不按儒家伦理规范做事、不尊重老人、或不孝顺父母的，戚同文都要把他叫来，耐心地给他讲尊重老人的必要性、讲父母生育孩子的千辛万苦等等。乡里百姓及士人见到戚同文如此的举动，都十分不解，他们纷纷劝戚同文说：“同文老师，您的家财也非常微薄，每年收受学生的学费也低廉无比，可您还做了如此之多的善事，您难道不替您的晚年想一想？不替您的两个儿子留下点财产呢？您何不用送给别人的财产为自家造几栋像样的房子呢？”戚同文则严肃地回答说：“个人的事小，社会教化的事大，且‘人生以行义为贵，焉用此为’！”由此，戚同文以他自己“纯质尚信义”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乡里士人及远近百姓的敬佩和爱戴。与此同时，在戚同文的努力感召下，当地的社会风气也大为好转。

戚同文的“纯质尚信义”，不仅为当地士人所钦佩，而且也倍受外地士人的推崇。所以，戚同文得以遍交中原地区的“一时名士”。比如蔡州（今河南汝阳）上蔡县的宗翼便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宗翼的父亲是虞城县的主簿，故他全家都迁到了虞城。主簿是当时办理具体事务、典领文书的小官，俸禄很少，故宗翼的家很贫穷，经常是“家无斗米。”^①为了供养自己的母亲，宗翼有时要自己“负米养母”，所以，他的“笃孝恭谨”，^②在当地也很有名。此外，宗翼还以“好学强记，经籍一见即能默写。欧阳、虞、柳

①② 《宋史·隐逸上·戚同文传附宗翼条》。

书皆得其楷法。能属文”^①而闻名。正因为如此，戚同文认为宗翼不仅仅有与自己一样“隐而不仕”的决心，而且二人相处时，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和切磋的对象。

戚同文另外还有两位好友，一位是虞城人张昉，另一位是滕知白。此二人在学问上也各有千秋，张昉颇具史才，滕知白尤善作诗。这样，戚同文、张昉、滕知白、宗翼常常四人结伴同行，或游山玩水，或饮酒作诗，或谈天说地，或以古喻今，有时为了切磋学问，他们还常常彻夜长谈，而且每一次都互有裨益地尽欢而散。四个人在一起谈话时，张昉和滕知白还多次劝说戚同文说：“同文仁兄，想当年你不愿为官是因为国家丧乱、世风败坏的原故。现在国家统一、民众富足了，你怎么还是不愿为官呢？”戚同文总是笑眯眯地回答：“两位贤弟，愚兄不及二位年轻有为，一把胡子的年纪了，还做官干什么？更何况常言道‘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我就是看中了这‘无官一身轻’啊！两位贤弟将来做了官，整日里忙忙碌碌的，定会嫉妒我现在无官一身轻！”过了几年，张昉滕知白分别做了杂御史和刑部员外郎、河北转运使后，真的在不少次写给戚同文的信中流露出嫉妒戚同文无官一身轻的意思。

戚同文有两个儿子，一为戚维，一为戚纶。兄弟二人在父亲的精心培养、教育下，都是聪明过人、博学多才的人物。与父亲戚同文所不同的是兄弟二人都先后步入仕途，且各有建树：戚维先为随州（今湖北随县）书记，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累官都官员外郎、职方郎中”；^②弟弟戚纶则远远超过哥哥，他“笃于古学，善谈名理，喜言民政……与交游故旧，以信义著

① 《宋史·隐逸上·戚同文传附宗翼条》。

② 《宋诗纪事·戚维条注》。

称。士子谒见者，必询其所业，访其志尚，随才诱诲之。”^①他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的进士；真宗即位后，他为著作佐郎、秘阁校理、太常丞；景德三年（1006年）为盐铁判官、右正言等；大中祥符元年掌吏部选事、户部郎中；大中祥符三年为枢密直学士、知杭州，加左司郎中，后改知扬州、徐州；大中祥符八年授左谏议大夫、知青州；天禧四年（1020年）任太常少卿，一生为官数十个职，可谓位极人臣。但是，当年戚纶如果没有父亲的严格要求、精心培养的话，是不可能在仕途上有如此之大的建树的。

戚同文的晚年是在随州度过的。大儿子戚维就任随州书记之后，不愿让父亲独自一个生活在虞城，便把“生平未至京城”^②的父亲接到随州。随州在今湖北北部、邻近河南的丘陵地区。随州地方虽然偏僻，但是青山款款、绿水盈盈的风景，无疑为戚同文愉快的晚年生活提供了条件。在这里，戚同文把他以前与张昉、滕知白、宗翼之间相互酬唱的诗歌汇集起来，编成了名叫《孟诸集》，共有二十卷之多。这本诗集正巧被当时礼部侍郎、枢密直学士杨徽之偶然地看到后，非常欣赏。他以编辑《文苑英华》的慧眼和思贤若渴的心情，特地赶到穷乡僻壤的随州，以求与戚同文见上一面。杨徽之与戚同文一会面，便一见如故，两人仿佛都有说不完的话题。最后，杨徽之回到京城，逢人就讲他遇见戚同文的经历。由于他的极力推崇，戚同文终于成了名动一朝、博学重义的名人，并被人们尊为“坚素先生”，而成为名列《宋史·隐逸上》中的第一人。

戚同文死后，尸骨运回虞城，并埋在他的学馆附近。宋真宗

①② 《宋史·戚纶传》。

大中祥符二年，有一个叫曹城的府民，在戚同文的旧居旁又盖起了一百多间学舍，建起了拥有“书数千卷，延生徒讲习甚盛”的大学馆。为此，宋真宗特别下诏赐名为宋州府书院，并命戚纶的儿子戚舜宾以奉礼郎的身份主持这个书院，而曹城也被任命为府助教，参与书院的管理。

总之，戚同文的“隐而不仕”，即有社会的原因，也与他个人的坎坷经历有关。但是，不管怎样说，戚同文的“人有丧者力拯济之，宗族闾里贫乏者周给之”、“不积财、不营居室”而“以道义自富”的高尚品质，是值得人们永远称道和学习的。

陈
抃



创象数之学、为两朝并重的陈抃

——·高卫星·——

有这样一位隐士，他举仕落第后，在失意苦闷之中，抱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念无可奈何地隐居山林。其间，他苦练避谷之术，深研《易经》哲理，开象数之学之始，启宋明理学之源。虽隐居山林，却凡心未泯，关心世事，劝谏帝王，因此，两朝并重，恩宠有加。他人为善，广交逸友，人情练达，预知人意。

他就是著名隐士陈抟。

（一）举仕落第，寄情山水

陈抟，字图南，自号扶摇子，北宋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人，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的同乡。四五岁时，有一天，他和小伙伴们到家乡附近的涡河边沙滩上追逐嬉戏。这时，有一位身着青衣的女子来到他们中间，面带微笑问道：“哪位是陈抟呀？”陈抟虽不认识她，仍然毫无胆怯地回答说：“我就是。你是谁呀？”青衣女子没有回答，只是轻声地对他说：“你跟我来，我给我吃一样好东西。”陈抟将信将疑，但他看了看青衣女子那双温柔而又慈祥的双眼，他就爽快地答应了。青衣女子把他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对他说：“你是老子李耳的同乡，千百年来，再没有出过像老子这样杰出的人才了，你将是老子的继承者。”陈抟听着她的话不住地眨巴眼睛，似懂非懂，最后问道：“你让我吃什么好东西？”青衣女子被陈抟幼稚的问话逗笑了，她并不答话，只是慢慢地解开怀。陈抟已有三四年不吃母乳了，看到这，他有一种难以抑制的食欲，不等青衣女子说话，就上前抱住大吃一通。吃罢，青衣女子对他说：“从今以后，你会聪颖过人，但你也对世俗的功名利禄不会有太高的奢望，你好自为之吧！”说罢飘然而去。陈抟望着青衣女子的背影，思考着她的话，若有所悟。

自此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陈抟也越来越聪明。青年时期，他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对读过的书，他过目不忘，一见能诵，令远近乡亲感到吃惊，都传说他是老子再现。他的诗写得特别好，遐尔闻名，经常有人向他求诗。那时，读书人

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学而优则仕”，即通过考试做官。他生长在世俗间，也不能没有凡人的追求。所以，他在后唐明宗长兴年间（930—933年），参加了科举考试，以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结果却是名落孙山，告败而归。科场的失意对他的打击很大，回到家乡，他觉得无颜见乡亲父老，整日闭门家中。他百思不得其解，以自己的才学，他自信能够金榜题名。他暗自思忖，也许这是天意！忽然，他想起儿时青衣女子对他说的话，豁然开朗，于是就产生了退出仕途，寄情山水之间的想法。

当时，有两位著名的隐士孙君仿和獐皮处士经常巡游到真源，他们和陈抟的交情很深，对陈抟也非常了解。当他们得知陈抟有隐居之念时，就对陈抟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如今社会动荡不安，王朝更迭频繁，仕途坎坷不平，前景吉凶难测。与其进而踏上祸福难料之途，不如退而求清静无为。所以，求仕不成不见得是件坏事。”陈抟听了他们的劝告，就决定隐居山野，过一种与世无争、淡泊清静的生活。他问二人：“什么地方可以隐居呢？”二位隐士回答道：“武当山深处的九室岩，山青水秀，远离尘世，是个隐居的好地方，你可以到那里试试。”说罢，二位高士就告别了陈抟，云游他方去了。

武当山在今湖北、陕西两省边境。第二天，陈抟打点行装，带上必备的生活用品，悄然离开故乡，朝武当山方向而去。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武当山的九华岩。他一到此，就深深地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九华岩，是武当山的三十六岩之一。这里山势峭峻，如刀砍斧劈一般，到处是参天的古树，遮天蔽日，水源也很丰富，从山上流到山谷中的瀑布极为壮观，虽是用唐朝诗人李白描写庐山瀑布的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来形容它也并不过分。水缓之处，小鱼自由自在地悠游嬉戏，

五彩斑斓的石头在水底清澈可见。这美丽的景色，幽静的环境，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留连忘返。陈抟就决定在此处住下。他自己动手在离水源不远的地方，搭起一座草屋，从此就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涯。

（二）辟谷练气，修心养性

进武当山隐居以后，他刻苦钻研《周易》，手不释卷。他不仅理解了其晦涩的语言，而且也深刻领会了其中的内涵。在此基础上，他写成了《指玄篇》八十一章。

他是象数之学的创始人。他曾把研究《易》的心得写成《先天图》一书，传给弟子种放，种放又传给穆修，穆修又传给李之才，李之才又传给邵雍，邵雍就成为宋代象数之学的集大成者。陈抟还在《河图洛书》的基础上，写成《河洛真数》一书，以《易》之卦爻，配合人生年月日时八字，预测人事吉凶。种放又把此书传给许坚，许坚又将其传于范谔昌，范谔昌又将其传给刘牧。他还把自己研究《易》的心得与道家的象数之学结合起来，写成《太极图》一书，传给穆修，穆修又将其传给周敦颐，周敦颐又将其传给程颢、程颐，成为宋明理学的起源。

陈抟还深入地研究过道家的导引还丹等养生术。所谓导引之术，是道家的一种养生术，是指人俯仰呼吸，屈伸手足，使血气流通，以促进身体的健康。他还掌握了炼丹术中的还丹之术。据说，利用还丹之术炼出的仙丹，人服后百日可以升天。由于他专心修炼，因此身体健康，在深山野林中行走如飞，据估计他活了百余岁。由于他隐居深山，生活没有保障，食物供应不足，所以

他进入武当山以后，又练就了道家的辟谷之术，即不食五谷就能生存的养生术。为此，他曾精心修炼了二十年。据史书记载，他整日闭门高卧，“但日饮酒数杯”，“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①有时甚至能“一睡三年。”^②后来，他迁移到陕西境内的华山云台观和少华石室中隐居。即使是在这些时候，他也从没有放弃修炼之事。后来，此事传到了后周世宗的耳朵里，世宗半信半疑，于是就命人将陈抟请到宫中，又将他单独锁到一个单间房中，不给他饮食，以检验传说的真假。一个多月以后，周世宗命人将房门打开，只见陈抟仍然熟睡如故，旁若无人，令周世宗大为惊奇。

后蜀孟昶时期，陈抟还专门到邛州（今四川邛崃县），向当地著名道士何昌一学习锁鼻之术。在邛州天庆观，南宋时还保存着一块石碑，上面雕刻着陈抟在此时作的诗，诗中写道：“我谓浮荣真是幻，醉来舍轡谒高公。因聆元论冥冥理，转觉鹿寰一命空。”时人文与可作跋说：“高公者，此观都仪何昌一也。”^③他的诗也是其不求荣华富贵，视浮荣如梦幻的思想反映。

（三）世事洞明，两朝并重

陈抟有经天纬地之才，虽然隐居山野，寄情山水，修心养性，但也经常游历名山大川，拜访高人名士，关心世事的变化。他自武当山迁隐华山以后，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代王朝，对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深表同情，因此每每听说改朝换代时，都

① 《宋史·隐逸上·陈抟》。

② 魏泰：《东轩笔记》。

③ 陆游：《老学庵笔记》。

不免双眉紧蹙，心事重重，有时能一连几天都如此。一天，正当他骑驴游历华阴（今属陕西）时，听到城里人们相互传道：“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做了皇上了。”陈抟听后惊喜万分，不慎从驴背上摔了下来。他的反常举动，引起路人的注意。当人们问他为何惊喜时，他笑着回答说：“自此以后，天下就安定了，这还不值得高兴吗？”

由于他修炼的成就和对世事的深切体察，使他成为朝野瞩目的著名隐士。后周时，周世宗爱好道家的黄白之术（即炼丹化成金银的法术），他听说陈抟是著名的道士，道行高超，不同一般，在显德三年（956年），下诏华州（治今陕西华县）命地方官将陈抟请到宫中。陈抟到宫中后，周世宗与交谈后，发现其道行修养已达到很高的境界，于是，就向陈抟求教道家的黄白之术。陈抟听后，从容地对周世宗说：“陛下身为天子，为民之父母，应当常常把天下治理太平挂念在心上，怎么能不顾百姓死活，天下安危，而把精力都花费在黄白之术上呢？抟乃一芥草民，不会什么神仙黄白之事！”周世宗闻听此言，心中虽然不悦，倒也暗暗佩服陈抟的胆识、勇气，并没有责备他，反而要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负责向皇帝进谏。陈抟深知周祚难以长久，因此固辞不受。无奈，周世宗只好赐号他为白云先生，放他回山中隐居，并诏命本州的长官，定时派人去慰问。显德五年，成州（今甘肃成县）刺史朱宪就职前向周世宗辞别，周世宗还念念不忘陈抟，特地让朱宪为陈抟捎去帛五十匹，茶叶三十斤。

宋太祖赵匡胤取周自代以后，曾亲自到深山中访聘陈抟，却没有找到陈抟。后来，他就命人经常到深山中寻找陈抟。终于有一次遇到了陈抟，陈抟被请到宫中，太祖礼之甚重，他向陈抟请教宋祚之长短始终。陈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一汴二杭三闽四

广”。^①宋太祖不解其意，请陈抟再作解释，陈抟摇头回答说：“此乃天机，臣也不知其意。”其实，宋朝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句预言，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陈抟只是不好明说罢了。

宋太祖在建立大宋朝以后，鉴于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称雄，朝代更迭频繁，在即位以后，尽收各镇之兵，把精锐之师全部集中到中央，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对地方的节度使只给其名誉上的地位和较高物质待遇，不让他们掌握军权，因此，宋朝建立的近百年里，地方上非常稳定。据说，这也是陈抟为宋太祖出的主意。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陈抟听说天下安定，出山朝见宋太宗，宋太宗待之甚厚，亲赐诗道：“曾向前朝出白云，后来消息杳无闻。如今若肯随征诏，总把三峰乞与君。”当时，陈抟身着华阳（今陕西商县）地区特有的粗布短衣，脚穿草鞋，却不卑不亢，与太宗以宾礼相见。当时，宋太宗出兵征讨河东地区，陈抟知道此事后，认真分析了宋辽双方的军事实力，就进谏说：“此次出兵不会有什么结果，请陛下罢兵。”宋太宗不信，正好此时军队已经出发，他就令陈抟寝于后宫之中，等待消息。不久，军队无功而返，宋太宗误以为陈抟有未卜先知的能耐，很是惊讶。陈抟在宫中睡了百余日才起来。宋太宗对他是恩礼特异，就让他长期住于宫中，什么事决策前都要与他商量，两人还经常作诗唱和，君臣相处甚欢。时间一长，宋太宗就有了让陈抟出山做官的念头，陈抟却坚辞不就。他在辞别宋太宗时，作诗言志道：“草泽吾皇诏，图南抟姓陈。三峰千载客，四海一闲人。世态从来薄，诗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处不称臣？”宋太宗知道难挽留住他，就在便

① 《宋人轶事汇编·陈抟》。

殿为他设宴饯行，命宰相以下的许多高级官员作陪，并作诗为其送行。

太平兴国九年，陈抟再次来到京师朝见宋太宗。宋太宗对他非常尊重，曾私下对宰相宋琪说：“陈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是个超凡脱俗的人。他在华山隐居了四十余年，朕估计他的年纪接近百岁。他自称是经历了五代的离乱，只是因为今天天下太平，所以才来朝觐。他的话很有道理，与他谈话很受启发。”宋太宗还亲自派人将陈抟送到中书门下（宰相办公的地方）与宋琪相见。宋琪请陈抟坐下后，开门见山地问道：“听说先生深得养生之术的要旨，可以把这些传教他人吗？”陈抟也直率地回答说：“我本是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也不知道神仙黄白之事和吐纳养生之术，也没有什么方术可以传给后人的。退一步讲，如果我会养生之术，即使修炼到白日冲天的境界，那对这个世界又会有多大好处呢？当今皇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而且博古达今，知识渊博，对治乱之道有深切体察，真可谓是有道仁圣的明君英主。目前正是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大兴教化，使天下大治之时，您作为宰相怎么如此关心勤行修炼之事呢？”宋琪不但没有怪他这番议论，相反还非常欣赏他的胆识。事后，宋琪将此事讲给宋太宗听，宋太宗也觉得深受教益，于是下诏赐号希夷先生，还赐紫衣一套，并命有司重新修葺陈抟隐居的云台观。

（四）交结逸友，逆知人事

陈抟身居庙观，隐逸山野，却喜欢结朋交友。华阴隐士李琪，据他自己说是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的中郎官，已有数

百岁，平时人们很少能见到他。还有关西逸人吕洞宾精通剑术，已有百余岁了，仍然是鹤发童颜，步行如飞，一会儿就能走数百里，人们都认为他是神仙。他们与陈抟的交情都很深，经常在陈抟的隐居地小聚，谈天论地，挥洒自如。分别以后，李琪还经常用红笔在青纸上写诗，让书童送给陈抟，陈抟也随即作诗与之酬唱。此外，像当时著名的道士贾休复、隐士种放都与之有深交。

陈抟还善于相人，能逆知人事。宋太宗时，对立谁为太子一直犹豫不决，于是召见陈抟，让他去见寿王赵恒。陈抟刚到寿王门前，就掉头返回，宋太宗问他何故，陈抟回答道：“寿王门前的属吏都有将相之气，我何必再见寿王呢？”就这样，宋太宗就决定立寿王赵恒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宋真宗。真宗即位以后，陈抟已经去世。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亲幸华阴，专门到云台观，观看了陈抟的画像，并亲谒其祠，还免除了云台观的田租。据说，这都是真宗为了报答陈抟在建储之事上对自己的帮助。

陈抟有一个大瓢挂在墙上，他的好友道士贾休复很想要它，但又不好明说。一天，贾休复又来到陈抟的隐居处，抟已知其意，对贾休复说：“你来没有其他事，就是想要我的瓢罢了。”他马上叫身边的书童把瓢取下来送给贾休复，贾休复大惊，心想陈抟能知道自己心中所想之事，真是太神了。

王克让曾在江南地区做过高官。宋朝初年，进入值舍人院任职。他没有儿子，但他们家尊奉佛教，经常施舍。他死时，他唯一的女儿才十余岁，身穿重孝跪在父亲的遗像前。陈抟正好去吊孝，出来后，他对人说：“我虽然没有看见王克让女儿的面孔，但只从她那双手来看，她日后一定大富大贵。若是男儿将来可以进入翰林院做官，是女儿也可以做一个国夫人。”人们都不相信他的话。数年以后，晋国公陈恕为参知政事，一天奏事结束后，与宋

太宗闲聊，宋太宗问他：“卿的妻子是谁，有几个儿子？”陈恕回答道：“臣的妻子已经去世了，现在有两个儿子。”宋太宗听后说：“王克让是江南的名门望族，身后只有一个女儿，听说此女知书达理，温柔娴淑，可以与卿匹配。”陈恕以年事已高为由，不愿接受，宋太宗劝谕再三，陈恕也不敢不听，于是就纳王氏之女为妻室。不几天，王氏就被封为郡夫人，果然像陈抟预料的那样。

宋初著名隐士种放，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听说华山陈抟的名声后前去拜访他。陈抟提前一天就让侍者把庭院打扫干净，说：“明天会有嘉宾到此。”第二天，种放打扮成樵夫的模样来到陈抟门前。陈抟一眼就认出了他，说：“你怎么能是樵夫呢？二十年以后，你会成为显官，名扬天下。”种放笑着答道：“我是向您求教来了，既已隐居，就不再追求功名利禄了。”陈抟给他解释说：“人的贵贱，都是命中注定的，贵者不能为贱，贱者也不能为贵。你的面相当为贵人，虽然隐身山林，恐怕也由不得你自己，将来你自己会知道的。”并告诫他说：“你将来会遇到名君英主，你虽不想做官，但皇上会让你做高官的，而且名闻天下。名，古往今来人们都把它当作好东西，你要很好地利用它，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天地间，一个人的名声始终都很好的可不多见。你的名声将会很大，因此我提醒你一定要注意。”种放后来果然身居要职，到了晚年，他奢侈无度，到处购置田产，他的门人亲属也都依势欺人，种放却不加管束。他晚年的所作所为受到时人的非议。果然不出陈抟所料。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有一天，忽然他对弟子贾德升说：“你到张超山谷中为我凿一孔石室，我将要在那里休息。”七月，石室凿成，他亲笔写下了上太宗的遗表，大致是说：“山野之人陈抟大限已到，很难再留恋圣朝，已于七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峰下

张超谷中。”他封好之后，放于石室中，果然，七月二十二日去世。人们在把他安葬到石室中时，发现了他早已写好的上太宗的遗表，打开一看，才知道他已预知自己的死期。对此，人们都感到非常惊奇。

有关陈抟的事迹，带有不少迷信的成份，但这是由佛道而来的隐士的共同特征，不足为怪。关于这些神话性的记述，正反映出人们对这些隐士的崇敬之情！

林
逋



梅妻鹤子话林逋

· 文 醉 仙 ·

“明媒正娶择佳偶，育子贻孙娱晚年”，这是人们共同向往的生活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子孙才得以繁衍，社会才得以延续。然而，北宋文人林逋却作出了与众迥异的选择。他一生不仕，终身不娶，把毕生的精力倾注在诗文上，把无限的情意移植在梅、鹤上，因而，获得了“梅妻鹤子”的一段佳话。人各有志，不能强求

一律。自然我们不能以世俗的一般眼光来审视这位古人的抉择。但也不妨作点浅浅的探索。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向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让我们从林逋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生活的经历来打开他心灵的窗扉，窥视他心底的奥妙吧！

（一）愿为飞雪衣天下，怎奈权门撞不开

知人必须论世，论世方可知人。对历史人物作研究，自然不能离开特定环境中的精神探索。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子，是出仕还是隐退，多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人遭遇和所受思想影响的不同来决定，意即在社会环境的包围、个人遭遇及思想爱好诸因素中取舍抉择。

那么，林逋一生不仕、终身不娶的抉择是怎样形成的呢？一般来说，宋人入仕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一是推荐征用，即凭本身的知名度和社会贤达的举荐。

根据《宋史·林逋传》的记载：“林逋，字君复，杭州钱江人，少孤，力学，不为章句。”“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这大约是他十年寒窗苦读时的真实写照。“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这是对他后来生活一段含糊的、掩饰性的记述。

林逋失去父母以后，大概是伴随兄、嫂长大的，对他的性格难免没有一点影响，但不能成为他“恬淡好古，弗超荣利”的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关于费尔巴哈提纲》。

要因素。年轻时读书能不为章句所羁，证明他在浩瀚的书海中遨游一段时间以后，已形成了自己一套理解、消化、运用书本知识的特殊方法与本领，具备了冲向社会，一展鸿图的基础。那么，他为什么没有走科举考试的道路呢？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实现统一的一个朝代，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都十分尖锐。经过五代十国短暂分裂而统一起来的宋王朝，是赵匡胤以“黄袍加身”的兵变手段而攫取到权力的。因此，许多旧政体遗留下来的腐朽因素仍占附在它的躯体上。新掌权的赵氏王朝，仍推行着“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并提出“富室田连阡陌，是为国守财”^①的论调，放纵和支持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一时间，原有的兼并势力与新兴的兼并势力相互勾结，千方百计向人民榨取。连理学老夫子朱熹也发出了“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②的感叹。没有丰厚的家资，没有广泛的社会背景，要参加考场角逐是很难以取胜的。宋代的科举考试弊端很多，某些贪官污吏为了迎合权贵势力，他们可以采取各种手法使本来冠冕堂皇的防范措施，变成一纸空文。因而，营私舞弊之事，屡见不鲜。如刘几道是刘师道的弟弟，考官是陈尧咨。陈尧咨为了巴结刘师道，便让刘几道在考卷上作了暗记，从而顺利地通过了参加进士科殿试。另外，皇帝不能公平地录取考生，常凭自己的喜、怒、好、恶来决定取舍，破坏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③的考试原则。皇帝的宠幸梁师成居然也参加了科举考试，还考了个进士，就是一个不公平竞争的典型例子。那时还有一些封神拜佛的人，也来应考，显然是把考试当成儿戏。真可谓“杂流阉宦，俱占选举，

① 王明清：《挥尘录·后录余话》卷1。

② 《朱子语类》卷10。

③ 《宋会要辑稿·选举》。

而祖宗之法荡然矣!”^① 科举制度到了如此地步，还具有多少选拔人才的实际意义呢？性格高傲的林逋，早有愤世疾俗的思想，自然不屑于去进行这种不光彩的角逐。

另一条入仕的道路是靠举荐与补荫。朝廷还列举了十条举荐的条款。按照“经述精通可备耕读科”；“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文章典丽可备著作科”；“行为纯固可为师表科”；“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公正聪明可备将帅科”^② 等条件，林逋都是可以被举荐入仕为官的。何况当时的林逋在人品和诗品方面已经享有盛名，获得了人们的公认呢？梅圣俞在《和靖先生诗集序》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君在咸平景德间已有达闻，会朝廷封禅未及诏聘，故终老不得施用于时。……”^③ 朝廷封禅泰山，大约是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的事。这时林逋正值壮年，且正在江淮一带游学，离京都开封很近，他是多么希望寻找到登高的梯子，但是他失望了。才能和智慧，往往成为中国士人阶层痛苦的深渊。林逋的情况就是如此。为了寻找麻醉的良方，他只有选择隐居这条道路了。

林逋归隐之后，心情并不怎么平静，怀着愤世疾俗的心情，写了一篇《省心录》。^④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他处世哲学的自白，也是他真实旅程的写照，更可以说它是儒学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整套理论的注脚，还可以说是一篇《醒世危言》的精萃。他认为“古之人修身以避名，今之人饰己以要誉。所以古人临大节而不夺，今之人见小利而易守”。这里所指的今之人，自然是指与他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人，也就是指那些巧取豪夺通过不正当手

① 《宋史·选举志四》。

② 《宋史·选举志五》。

③ 《林和靖诗集序》。

④ 《说郭》卷7。

段而攫取了高位和财富的统治者，是这些人败坏了社会的风尚，搅乱了是非的界线。即使在今天，他那些精辟的言论，仍具有很深的现实意义。

林逋审视事物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观。他曾形象地比喻：“千斤之石，置于立坂之上，一刀可以落九仞；万斛之舟，溯于急流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①、“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则蹶；行险途者，畏而慎，故徐步而不跌”。^②只有经过这样的实践之后，才会知道：“安乐有致死之道，忧患为养生之本”，因此，他在纷纷攘攘的世态中，总是采取冷静的态度，乐于“乘独后之马”，而不顾“人笑我痴”^③的胸怀，过着自己“乐莫大焉”的日子。

林逋在江淮游历期间，除饱览山河之秀外，作过一些社会考察，也见识了不少朋友，大名鼎鼎的范仲淹与他就有很深的交往，范氏并以“山中宰相下严扃，静接游人笑傲行”的诗句来赞喻他。一个叫智园和尚，是林逋的朋友，说他是“荀孟才华鹤氅衣……”“荀孟才华”是说他有荀子、孟子的才能和积极入世的思想，“鹤氅衣”是说他有像道士一样出世的外表。这和尚一针见血地指出林逋的隐逸是韬光晦迹之举，希望有一天朝廷会启用他。的确，这时的林逋有点像热水瓶，里面装着滚烫的开水，而外壳却显得十分冰凉。有一次，朝廷命杭州守臣王济去访问他，并了解他的真实情况。他喜出望外，立即呈献出自己一卷诗文，希望获得王济的赏识与推举。王济读罢，觉得很不错，还喟然兴叹道：“草泽之士，不友王侯，文须格古，功名之事，俟时致用，则当修辞立诚。今逋两失矣。”^④回到京城，以文学才华突出保荐他。然而，朝

①②③ 《说郭·省心录》。

④ 《西湖游览志余》。

廷并没有真正采纳王济的意见而启用林逋，只是赐“粟帛而已”。并交待“岁多劳问”。^①那么，皇上为什么不征用他而又赐粟帛呢？这都是为了粉饰太平，表明有明君在上，野无遗贤的花样文章而已。加上林逋本身虽博学多知，但所谈论的都是孔孟之道的大道理。对这种固执讲死理的人，皇上并不怎么喜欢。也许还因为林逋曾自诩“世间事皆能之”的话传了出去，引起了同辈们猜忌和排挤的缘故，因而，他始终没有挤上政治舞台。至于对他这种人的处理办法，就是假意揄扬，捧为高人雅士，把他养了起来。倒霉的林逋也只好顺水推舟过着“闲门自掩苍苔色”^②“坐看渔舟两两归”^③的生活了。日子一长，瓶子里的水也凉了，与世无争的心理也抬起了头，便决计归隐孤山。他在撞破“济世”藩篱以后，乐与寺院、僧侣打交道。当他道过安徽芜湖时，曾留下一首《过芜湖留咏》：

诗中长爱杜池州，说著芜湖是胜游。
山掩县城当北起，渡冲官道向西流。
风消橈碇网初下，雨罢鱼薪市未收。
更好两三僧院舍，松衣石发斗清幽。

芜湖本来就是一座风光秀丽、经济繁荣的江滨城市，是历代诗人墨客留连歌咏之地。林逋慕名来此，以朴素明净的语言，高度地概括了芜湖优越的地理形势，勾画出了江南鱼乡繁忙、兴旺的特色，为这片圣土，平添了许多韵味。然而，他并不想在这繁华的地方作过多的逗留，而是急于去寻找他专访的目标——“更好两

① 《宋史·林逋传》。

② 《湖上隐居》。

③ 《孤山从上人林台写望》。

三僧院舍，松衣石发斗清幽”的寺院和僧侣们。这大概是他决定归隐后所谓秉性恬静、高洁，与世无争思想形成的部分写照，也是老庄思想在他身上的一种反映。但林逋的归隐，始终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身隐”未必就是“心隐”。鲁迅说过，真正的隐君子是没有的。如果有，就该汨没无闻。从林逋《赠任懒夫》的诗来看：

未肯求科第，深巷且隐居。

胜游携野客，高卧读兵书。

点药医闲马，分泉灌晚蔬。

汉庭无得意，谁拟荐相如。

就可以推知一个既不求科第的人，为什么又要读兵书、医闲马，还希望得到人推荐呢？这难道不是隐居后矛盾心情的自白吗？

西施是古越国的绝色美女，西湖是天下闻名的胜地。苏轼曾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佳句来赞美西湖。孤山是西湖中的一个孤屿，在里湖与外湖之间，孤立突兀于湖中，因种有很多梅树，又称梅屿。它不仅是西湖胜景之一，而且也是人物荟萃的地方。林逋深爱西湖，也曾倾情地赞美西湖道：

混元神巧本无形，匠出西湖作画屏。

春水净于僧眼碧，晚山浓似佛头青。

桡桡粉堵摇鱼影，兰杜烟丛阁鹭翎。

往往鸣榔与横笛，斜风细雨不堪听。

他选择西湖之孤山作为终生隐居之地，也可谓高人雅致，别具情怀。从此，他一进孤山，二十年足不涉城市。

那么，在这漫长的二十年中，他是怎样安排生活、消遣时日

的呢？

林逋和所有的文人一样，“善行草”、“喜为诗”，其语“孤峭澄淡”，^①很受时人的欣赏。其余的时间是登山观景，泛舟钓鱼，或放鹤种梅。有人劝他把诗稿汇集起来传给后人，他却坦然相告道：“吾终志山林尚不欲取名于时，况后世乎！”^②不错，他早年发奋读书，不孜孜兀兀在书本上钻牛角尖，也不屑于学骚人墨客作寻章摘句的老雕虫，而是希望有大展鸿图的机会，既然夙愿难成，留下这些诗文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由于他并不珍惜自己的精心之作，散佚的作品自然很多。今天保存下来的三百多篇诗稿，远不是他全部诗作的菁华，实在是一件憾事。

一个孤傲自负的人，一旦隐居，要东山再起，就不容易了。于是，有时对自己的隐居生活就自鸣得意起来。他在《小隐自题》中写道：

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余。

鹤闲临水久，蜂懒得花疏。

酒病妨开卷，春荫入荷锄。

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

可见他在诗文之外，也参加一些种菜、栽树、养花、拔草等辅助性劳动，以改善和美化自己的居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性地得出，林逋并不是生来就厌恶为官作仕要当隐士的。他是受种种原因限制而不得已归隐的，即使在无法改变自己命运以后，积极入世的思想并没有泯灭，而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希望他们积极进取，功成名就。他

①② 《宋史·林逋传》。

就曾亲自培养了一名侄儿走上了成才的道路。从许多诗句看，如：

前春得意处，酣饮上林花。

——《送茂才彭泽年赴举》

明年重访旧，身带桂枝香。

——《寄吴肃秀才》

何期桂枝客，来访竹林居。

——《喜马先辈及第后见访》

一战词场定策勋，麻衣西笑仕纷纷。……

明年新榜看看见，第甲嘉名且认君。

——《送吴秀才赴举》

都可以证明他绝非超然物外的隐士。

至于林逋为什么终身不娶呢？是生理上的缺陷？是性格的孤僻而产生的排异性？是女性们鄙弃他，不愿与他过清贫寒苦的孤寂生活？还是他始终没有发现意中人？抑或是婚恋问题上横遭破坏呢？在这个问题上，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回答，就是在他的诗文中，也难寻觅出踪迹来。不过从《省心录》中，很可以看出他有一套以儒家学说为准则的“治家”理论和观点。他曾说：“欲齐家，则先正身。身正则可理，号令则可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又说：“溺爱者受制于妻子，患失者屈己于富贵。”还说：“女相妒于室”、“家不和，无以见孝子，国不和，无以见忠臣。……”这些理论的提出，可以证明他对于家庭这个组成社会的细胞是经过了一番严格考察和思索的。也许他是害怕一些无谓的羁绊和纷扰会影响终身不仕而采取终身不娶的吧！陶渊明不是在隐居之后，由于家境骤贫累及妻、儿受苦而发出了：“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咏贫士》）

的悲叹吗？林逋也很赏识陶渊明，说他“无公德以及人，而名节与功臣义士等”，^①可见历代隐士的心声是相通的。事实上，林逋也是具有七情六欲的人，他的《长相思》一词与陶渊明的《闲情赋》同样表达了男女悱恻、凄婉的情怀。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未结成，江头潮已平。

词中的这对恋人在爱情生活上遭到了阻挠和破坏，虽情投意合，却又不得不忍痛分割，其难舍难分、悲痛难忍之情跃然纸上。生离死别是人们感情上最难突破的难关。而最珍惜“离别情”的是恋人们的感受。这位独身的隐士，为什么能把这首《长相思》词写得如此感人真切呢？如果不是自身的写照，一定是他看惯了破裂婚姻中恋人们喝下的苦酒太多太多的缘故吧！

（二）枌骥原怀千里志，寄情梅鹤远尘嚣

林逋虽然在仕途中没有蹉出一条路来，却在诗坛上仰起了高昂的头。

林逋既然是“终志于山林”，不想再在仕途中挤挤攘攘，自然就要朝其他方向发展，于是，林逋描山画水、吟花唱蝶、叹风咏雪的诗文便多了起来。他择居梅屿（即孤山），更多的便是种梅、赏梅、咏梅了。中国人喜爱梅花是有传统的，咏梅之作也十分繁浩。但对梅花的描写往往是因人而异。嘲花弄月的人，从梅花的

^① 《说郛·省心录》。

身上看到的是俏丽多姿；清高自负的人，从梅花身上看到的是孤霜傲雪；愤世疾俗的人，从梅花身上看到的是高昂雅洁；奋斗进取的人；从梅花身上看到的是热情、乐观、进取。可见作者的身世、感受不同，会影响其立意的差别，于是品咏梅花的角度就发生了差异。林逋远离官场，洁身自好，自然有他自己咏梅的着眼点。他的咏梅名篇《山园小梅》就具有独领风骚至今不衰的魅力。其诗曰：

众芳摇落独鲜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在众花摇落的寒冬里，只有独傲霜雪的梅花迎风开放，而且是开得那么“鲜妍”，真是生气勃勃，引人倾心瞩目。这孤傲高昂的气质不正与山园主人的气质很相符吗？这竖横交错缀满繁花的枝条，已是美不胜收，却又倒映在清澈的水中，构成风摇枝动水婆娑，花影随风荡红波的情景，简直是妙极了。至于在皎洁的月光下，从梅林中闻到的那沁心透脾的清香，又何啻是一杯甘醇的美酒？这里不仅突出了梅花的个性，简直是画出了一幅绝妙的月下溪边梅花图。他想，要是白色的“霜禽”飞来，首先定是要偷看几眼梅花的娇艳而不是先去觅食；假如在严冬里仍有蝴蝶出现，一定会为这竞争烂漫的梅花而消魂落魄。他太爱梅花了。他把自己融进到梅花的诗情画境中去了。他低吟浅唱，留连忘返，与梅花心心相印，结为情侣，在这凄冷的寒冬里，与梅花相伴相依，共度岁月。只有这种深入细致观察的人，才能抓住梅花最富有特征的地方来抒发特有的情怀。他是以梅花凌寒独放、压倒群芳、独占

风情、预报春讯的特征而加以咏赞的，他避开了一般人对梅花外貌的描写法。诗以言志，诗如其人，他通过咏梅来抒发自己的情怀，表达出“趣向博远”、“弗趋荣利”的情操，并借此奚落那些趋炎附势、附庸风雅的权贵们，指出他们是无法领略这种恬静的山林之美、之静、之雅的情趣的。正是这首立意新颖、志趣高远的诗篇，引起了后人许多的评议与和唱。

苏轼读后说：

“先生可是绝纶人，神清骨冷无尘俗。”

王十朋说：

“暗香和月入佳句，压尽千古无诗才。”

欧阳修在题《张矩臣水墨梅》诗中说：

自读西湖处士诗，年年临水看幽姿。

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

认为林逋的咏梅诗比唐齐己的“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的《早梅》诗写得更好。

“未须草草赋梅花，多少骚人词客。总被西湖处士，不肯分留风月。……”

这是辛弃疾在一首《念奴娇》词中对人们的奉劝，自然也是对林逋《咏梅》诗的高度评价和由衷的佩服。从此，“疏影”“暗香”便成了咏梅诗、词中常用到的词汇，可见林逋的咏梅之作对后世人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

毛泽东的《咏梅》诗中有：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冬云》中有：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的诗句，都是托物咏怀之作，其意境的高雅与林逋有着共同之处。

林逋本是一个自命不凡、热衷功业的人，在受到不公平对待之后，没有堕入绝望的深渊而遁入空门，而是以钢铁般的意志钳住自己的感情，在诗坛上昂起了高昂的头，其自身的涵养和情操，可谓深矣！

有人说林逋以梅为妻，赠予“梅妻”的雅号，这除了他朝夕置身梅林，勤疏剪、勤浇灌，用以寄托情怀，消耗时日之外，他还勤于观察梅花，一旦蕾开花绽，更是留连而忘返，把酒赋诗，情意盎然，这也是他屡有咏梅佳作问世的缘故。如另一首《咏梅》诗中写道：

吟怀长恨负芳时，为见梅花辄入诗。

雪后林园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

人怜红艳多应俗，天与清香似有私。

堪笑胡雏亦风味，解将声调角中吹。

这首诗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黄庭坚说：“欧阳修只赞赏‘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据我看，‘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两句比前面的两句写得更好。苏轼和黄庭坚都是大名鼎鼎的文坛高手，他俩的择句虽然各不相同，但对林逋的评价都是极高极高的。林逋能把眼中的梅、胸中的梅凝于笔端，和盘托出，使咏物、抒怀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如：《山林冬暮》中有：

“雪竹低寒翠，风梅落晚香。……”

《湖上初春偶作》中有：

“梅花开尽腊亦尽，晴和便如寒食天。……”

《酬画师西湖春望》中有：

“笛声风暖野梅香，湖上凭栏日渐长。……”

《送史殿省典封川》中有：

“……水连芳草江南地，烟隔寒梅岭上春。”

诸如此类写梅花的诗句，简直是指不胜屈。难怪人们说他是把感情移植到梅花身上而以梅为妻了。

林逋不但善于咏梅，也善于写景，把诗写得“澄淡峭特”，其超妙入神者很多。如《孤山后写望》：

水墨屏风状总非，作诗除是谢玄晖。

溪边袅袅穿黄落，樵斧丁丁斫翠薇。

返照未沉僧独往，长烟如淡鸟横飞。

南峰有客锄园罢，闲倚篱门却忘归。

读着这首西湖山水夕照图，可以使游览过西湖的人仍重投入到她的怀抱中去。即使没有去过的人，也会因此而浮想联翩。

林逋不仅有爱梅之癖，而且有爱鹤之情。他在一首《鸣皋》诗中写道：

皋禽名只有前闻，孤引圆吭夜正分。

一唳便惊寥泺破，亦无闲意到青云。

从这首诗里充分表现出他做官不成，也不想再做官的高傲情怀和气概，其骨铮铮，其气昂昂，哪里还有什么攀龙附凤，趋慕权贵的想法呢？他活得多么坦然自在。进入到九十年代的今天，当人们从“都市热”中慢慢苏醒过来的时候，开始向往起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曾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林逋，也许会勾起人们许多羡慕，对他那寒梅园里自贻情的情趣，更将心向往之！

（三）贫居闹市无人问，名越西湖知己多

林逋隐居孤山，二十年足不涉城市，他没有相濡以沫的妻子，没有绕膝讨欢的子孙，难道不太孤寂吗？其实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随着时日的推移，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他的人品、诗品飞出山居，飞下孤山，越过西湖传到了人们的耳里，慕名的来访者也越来越多了。其中有文人学子，有达官贵人，也有樵子渔夫。有的来清谈，有的来求诗，有的来索字，也有的来打“秋丰”。

李及是一个资质清介，治政简严的清官，曾做过杭州地区的地方官。他十分讨厌那时杭州的奢侈轻靡的社会风气，从来不出席各种宴游活动。有一天，他冒着大雪去郊游，同僚和下属们以为李及要破戒了，说不定今天还能享受一顿美餐。谁知李及骑马独行，直上孤山去拜访林逋去了。这一天，他俩谈得何等投机，直到天黑，李及才回到官邸。林逋对李及的清廉，也是十分赏识的。李及在杭州做官数年，什么东西都没有购置过。离开杭州时，只

买了一套《白乐天集》。^①

薛映也是和林逋同时代的人。“好学有文，该览强记，善笔札，章奏尺牍，下笔立成”，^②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平时处理公务，极为严明，同僚下属要想作虚弄假蒙骗他，是绝对达不到目的的。他平时五更即起，据案决事，十分认真，决不马虎了事。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威信是很高的。他听到林逋的清名以后，常忙里偷闲去拜访，彼此交谈十分投机。薛映认为与林逋交谈，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为人处世、治理公务的有益东西。

王济更是了解林逋。他赏识林逋的才华、品德，并曾竭力向皇上举荐过。虽然没有达到主观上的愿望，但还是使宋真宗知道孤山上有这么一位才学兼备的高士，才“诏长史岁时劳问”并“赠粟帛”^③的。从这里可以证实林逋从政之举虽然失败了，但谋隐揖退之道却是成功的。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人要长期隐居，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很难办到的。林逋虽然也有过“春荫入荷锄”之举，但这是一种辅助性劳动，怎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呢？他既然是一个“弗趋荣利”却又“家贫衣食不足”的人，如果没有政府的“岁时劳问”并“赠粟帛”的来源，恐怕很难活下去。至于权贵、显宦们来访，自然也是有些馈赠的。根据吴处厚《青箱杂记》记载：天圣（1023—1032年）中丞相王随以给事中知杭州，日与林逋唱和，出俸钱新之。……”^④大概是这些人帮了林逋的忙，才使得他的隐居生活得以坚持到底。

据说有个叫许洞的人，品质恶劣，“狂狷不逊”、“辄用公钱”，

① 《宋史·李及传》。

② 《宋史·薛映传》。

③ 《宋史·林逋传》。

④ 《宋人轶事汇编》。

是个乱拿乱喝的人，有时来打搅林逋。大概是私欲没有得到满足，便胡诌打油诗一首讥笑林逋道：

寺里啜斋饥老鼠，林间咳嗽病猕猴。

豪民送物鹤伸颈，好客临门龟缩头。^①

许洞以鼠、猴、鹤、龟来谩骂林逋，自然是因为他对这种“好客”予以了痛击的缘故。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林逋处境是十分艰难了。

林逋平时爱泛舟湖上，作竟日游。他爱让自己的思绪在湖上漂浮，让船儿剪开水中的天幕，让双桨在水面划出哗然作响的声音来作伴唱。他鉴赏着高天飘忽的白云，环视四周的山色，掠过水面的飞鸟，沐浴着柔和的阳光，构思着新的诗篇，也思索世间的一切。清人吴之振辑《宋诗抄·和靖先生诗钞序》中提到“所居多植梅蓄鹤”，当泛游湖上时，如果有客人来了，家僮便开笼放鹤。经过长期驯养成性的“家鹤”，便在湖面上飞翔盘桓，把客至寻访的消息传递给主人。林逋只要看到鹤在自己头顶上和船边盘旋，便立即掉舟返航，接待客人，由此便引出了“鹤子”的佳话。在《典形》一书中，记载许多后人赠给他的“爱梅仙”、“处士妻”、“孤山人”、“和靖鹤”、“鹤林老子”、“孤山处士”等一系列称号。

宋人楼槃《霜天晓角·梅》中有：

“谁是我知音，孤山人姓林。

一自西湖别，辜负我，到如今。”

① 《宋人轶事汇编》。

宋人张炎《清平乐·赠处梅》中有：

“清水隔断尘埃，无人踏破苍苔。
一似逋仙归后，吟诗不下山来。”

元人张翥《多丽·西湖泛舟夕归》中有：

“自湖上爱梅仙远，鹤梦几时醒。”

明人袁道宏《代广陵姬用前韵》中有：

“梅花终作处士妻，海棠暂拭人目。”

又：《香光林即事》中有：

“子鹤难为父，妻梅不用媒”。

清人黄景仁《夜偕蒋大荡桨清波》中有：

“何处可招和靖鹤，此间应有谪仙魂。”

清人蒲松龄《家居》中写道：

“久以梅鹤当妻子，直将家舍作邮亭。”

不管他们同林逋是同一时代的人，还是不同时代的人，通过这些数不清的佳言美语，表明他们对林逋都有所认识，才有所赞赏，所以，林逋的生活内涵并不是孤单的。

林逋隐居孤山之上，也不完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的蛀书虫。如果不是对纷纭的世事了如指掌，哪能在《省心录》中写出那么多精言辟论呢？他和时人李洙并没有多少交往。林逋客游临江时，李洙才考上进士，知道他的人很少。这时

林逋就预言：“此公辅才也。”后来李洙官至翰林学士。仁宗时作过永兴的知县，由于执政严明，致使境内肃然。以后又升为户部侍郎，知谏院事。此人“周知世务，处烦猝若闲暇，吏不敢欺。在枢部专务滥赏，抑侥幸，人以为称职。”^①林逋的预言传到李洙耳里，心里很是激动，觉得林处士高人一着，对自己有相知之恩。等到林逋死后，李洙与林逋的门人披麻戴孝，临丧七日，把林逋安葬好。并把林逋的遗诗：

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秋色亦萧疏。

茂林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

刻在石板上作为陪葬品，以报知遇之恩。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林逋高洁、清雅的品德。从李洙为林逋举丧一事来看，也可以认识到中国的文人们有着许许多多、清贫、高雅、达观、友爱的品德，并不是人人都是唯我独尊的人。因此，《林逋传》才会记载这两位相识而未曾谋面的知己者佳话。然而，李洙的好意却为林逋死后带来了灭顶之灾。林逋生前，家境寒苦，是靠亲友、政府救济过日子的人，‘哪来珠宝金银。一些贪财好事者，从传闻中听说林逋死后口里含有珍珠，于是，便使出了刨坟剖尸的卑鄙勾当。根据《遂昌杂录》、《辍耕录》的记载：“……发和靖先生墓，尸骨皆空，独有一砚。”又说：“惟得一玉簪。”砚也罢，玉簪也罢，一个看透了尘世的人，决不会在死后有什么厚葬之求的，他连“封禅书”也不希望有，还奢求什么珠宝呢？这只不过是庸人们的自扰而已。因而又有人作诗说：“生前不系黄金带，身后空余白玉簪。”这话既是对林逋生活旅程的概括，也是对那些掘墓挖坟者愚

① 《宋史·林逋传》。

昧、卑劣行为的批判。

林逋终身未娶，是没有子孙的。生前他只抚养过一个侄儿，并使之成了才。过了很多年以后，有个叫林可山、名洪、号龙发的人，自称是林逋的七世孙。于是，又有一个叫姜石帚的人作诗嘲笑林可山道：

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儿孙？

若非鹤种与梅种，定是瓜皮搭柳皮。

——《梅涧诗话》

林逋死后，各种人物的扮演尽管不同，但都证实他是一位具有影响的人物。虽然他没有高贵的爵位，显赫的权威，也没有震聋发聩的政绩，或叱咤风云的战功；更没有田连阡陌家富万斛的家财，但他以清贫乐道、傲世居高的气节，澄浹峭特的文彩、不朽的诗文赢得了以金钱换取不来的许多赞喻。宋仁宗听到他的死讯后，也不胜嗟叹，便赐谥“和靖先生”。以后，梅尧臣为他编辑了《和靖先生诗集》并作序以记其事。

至元年间（1264—1294年），儒学提举余谦“叩葺处士之墓，复植梅数百本于山，构梅亭于其下”，又有“郡人陈子安以处士无家，妻梅而鹤子，不可偏举，乃持一鹤，放之孤山，构鹤亭以配之。”^①

《宋史·林逋传》中说他又善行书，那么，他的字究竟写得怎么样呢？

苏轼这样说：“书似留台（李建中）差少肉。”李建中和林逋是同一时代的人，彼此有过交往，而且都写得一手好字。

① 清·吴之振：《宋诗抄·和靖先生诗抄序》。

王世贞这样说：“结体尤峭劲。”

他俩都是从“瘦”、“硬”、“秀”的角度来审视、评价林逋字体的。至今在故宫博物馆里珍藏有林逋手写的自书诗一卷。此卷为行书，写了他自己的五首诗，大多是赠送友人和描写孤山景色的。卷末有“皇上登宝位岁夏五月”句，这大概是宋仁宗天圣元年时的事，这时林逋已经五十七岁了。其中有一首写着：

“制诰事舍人以松扇二柄并诗为遗上次来韵”，诗为：

编松为箴寄山中，兼得紫薇诗一通。

入手凉生殊自慰，可烦长听隐居风。

这几首亭亭玉立、颇似墨竹、劲节秀挺、颇饶天趣的行体诗，就成了故宫字画中的珍品，遗给后人极佳的临摹风范。

到了宋仁宗天圣六年，年已六十二岁，身体孱弱、久患气管炎的林逋故去了。但生命的句号，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一切都消失了。他以高洁的人品、绝伦的诗品、精湛的书品展现其无限的生命力。当人们翻阅、吟诵他的诗、词的时候，或是游览西湖登临孤山的时候，抑或是游览故宫鉴赏书品的时候，都会想起这位数十年不改初衷的隐士。

朋友，当你在寒梅盛开的时候，不妨在梅林中多多徜徉，也品尝一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韵味；或驾一叶扁舟在湖面上作一番轻荡，体会一下泛舟钓鱼、放鹤高吭的情趣。也许你会惊奇地发现，它比之卡拉“OK”歌舞厅里嘈杂、狂舞的情趣要高雅得多。这才是真正的“潇洒走一回”啊！

邵
雍



治《易》学、好预言、隐居不仕的 理学大师——邵雍

· 韩国河 朱 彥 ·

北宋中叶以后，理学大师辈出。其中有位终生研治《易》学，好预言、隐居不仕，而又颇关心时事，臧否人物，与名噪一时的司马光、韩维、吕公著、富弼等过从甚密，又与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程颢、程颐齐名的大师。他，就是建立象数思想

体系的邵雍。

（一）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

邵雍，字尧夫，祖上是河北范阳（今河北定兴县）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对于邵雍的降生，有一段饶有趣味的传说。据邵雍之子邵伯温讲：邵雍的祖母对邵雍的母亲李夫人十分苛刻，李夫人忍无可忍，想上吊一死了之，正当她神情恍惚，用绳索套上脖子之际，冥冥之中梦见神人让她用玉筋喝了一杯汤，并告诉她：“不要自杀，你会生一个好儿子。”绝望中的李夫人，顺从了神的旨意，怀着对神灵的一片虔诚之心，忍受了婆婆的种种虐待，坚强地活了下来。果真不久她怀了身孕，婆婆对她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可是，没过几个月，又因病卧床不起，望着日益消瘦的妻子，邵雍的父亲请来了医生，开方医治。当天晚上，李夫人吃药以后，又做一梦，模模糊糊看见卧室门两侧有二株木瓜，左边的已开花结果，右边那株却已枯死。梦醒后，李夫人将梦中所见告诉丈夫，丈夫立即将药泼出门外。分娩那天，同时产下两胎，一胎是一死女婴，另一胎即是邵雍。邵雍刚生下来时，发遮面，牙齿已出，且能够呼叫母亲。七岁时，他在院中玩耍，趴在地上看蚂蚁筑窝，突然大声喊叫：“快来看呀！这里面有一个太阳，还有飘浮的云雾。”母亲闻声赶来，却一无所见。为了不带来麻烦，她赶紧叮嘱儿子再不要胡言乱语。

年少的邵雍，特别爱听父亲邵古讲解那些前贤先哲嗜学不辍、博览群书的故事，像苏秦锥刺股、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每每使他激动得不能自制，常说自己一定要像他们那样，长大以后建功

立业、匡辅朝政。因此对各种书籍，无所不读，学习时就更加刻苦努力。寒冬腊月，书房中没炉火；盛夏酷暑，亦手不执扇。就是在这样一种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用了几年的时间，把他所见之书全部读完，并且读得烂熟。终于有一天，他对父亲感叹地说：“前人还把他们的前人当成朋友，而我连远近四方均未涉足过，真遗憾！”父母知道儿子学有所成，想外出游学了。于是为他准备了行李和盘缠。邵雍即告别父母，渡过黄河，来到了历史悠久的中原大地，然后又怀着仰慕司马迁的心情，到关中凭吊了司马迁的亡灵。接着南下江汉，取道淮、泗，效法司马迁参观各地的名胜古迹，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最后到达齐鲁、宋郑故地，博采各家学说，领略时贤教诲。

在游历、求学过程中，邵雍既有一帆风顺之时，也有事不遂心之处；既有心情舒畅之感，也有狼狈不堪之窘。总之，他饱尝了苦与乐、经受了各种磨难。据说，当他经过山西境内时，为了赶路，不得不夜行山路，由于天黑路险，坐骑失蹄，他从马背上滚到山涧之中，同行之人听到他滚下去的声音，心惊肉跳，大叫不好，赶快下马攀缘寻找，竟奇迹般地发现他除了帽子被树枝、荆棘挂破以外，并未受伤。邵雍在经过江汉一带时，有一次好几天没有投宿之处，并且也找不到充饥的食物，只得风餐露宿。这些磨难对他以后的人生观很有影响。

几年的游学生涯，使邵雍的学识倍增，他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情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见到父母后，颇为自负地指着自己的肚子说：“道就在这里。”从此闭门不出。

（二）三年不设榻，昼夜危坐思

邵雍游学归来，闭门不出，开始潜心研究有关三代遗留下来的典籍。期间，家中发生变故，其父邵古率全家迁居衡漳（今河北南部）。关于迁居原因，有关邵氏文献上均无记载。在衡漳定居后，邵雍的生活并未改变，仍是闭门研究学问。

为了能与新居之地的饱学之士建立联系，从他们那里学到知识，邵雍闭门一段之后，不时亦外出拜访名师，答疑问难。其中一次半月未归，母亲由于想念儿子，精神恍惚不定。由于她笃信佛教，每日都要诵念佛经，思念之中，竟将佛经倒念。邵雍归来，闻得真情，就不再轻易长出。之后不久，李夫人病逝，邵雍十分悲哀，守丧期间，竭尽孝道，以至容貌俱毁。昔日有母亲操持，家中饮食他从不过问，母亲死后，他不得不亲自下厨，开始为一家的生计忙碌。

不知又是何故，邵雍之父邵古又率全家从衡漳迁居共城（今河南辉县市）。到达共城之后，邵古把全家安置于苏门山下，邵雍一人独自筑室于百源之上，以便研修学问。正好，此时代理共城县令的李挺之，是殿中丞李成之子，学识渊博，号称东方大儒，听说邵雍好学不倦，就在揽政之余，亲自去邵雍住处拜访，两人一见，谈吐十分投机。李挺之问邵雍：“您也悟出了物理性命之学了吗？”邵雍听言，急施重礼，答道：“希望听您指教。”当即拜李为师，向他学习《河图》、《洛书》和伏羲的八卦六十四爻图像。

李挺之在物理性命之学方面深得师传，颇有造诣。据说此学始创于宋初华山道士陈抟，陈抟把先天图传授给隐士种放，种放

又传给穆修，穆修再传李挺之。

李挺之把先天图传给邵雍后，临别时又把《大学》一书教授给邵雍。邵雍虽早就读过，但经李挺之的讲解后，又颇有收获，从中悟出学无止境的哲理。于是更加刻苦、努力，竟至三年不架床开铺，日夜端坐静思。他把《周易》一书抄写了一遍以后，一页一页张贴在住室四壁，每天朗诵几十遍。

后来，他听说汾州（今山西吉县）一位姓任的先生对《易》学颇有造诣，便不顾路途遥远，亲自去拜访、请教。当李挺之调任河阳（今河南孟县）司户曹时，为了能够聆听老师的教诲，在征得李挺之的同意后，邵雍也随从到了河阳，寓居州学。此时，他穷困潦倒，连夜间读书照明的青油也买不起。好在州学供给学生一日三餐之食，于是邵雍就不时地把食物拿去换一些青油照明。有一位军官从京师出使代北路过河阳，目睹此景，对邵雍说：“哪一个苦学像您啊！”说完，把一百张纸，十支笔送给了邵雍。

邵雍对《周易》之学的探赜索隐所得，往往是那些不大为前代和当时《易》学家所注意的问题中获得的。他之所以屡有体会，除了他把全部的心思倾注到《易》学中以外，还在于他把老庄的学说与之联系起来考察。正是他对《易》学的专注精神和融汇贯通的治学方法，使他创立了一套自己的《易》学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集中地体现在他后来所著的《皇极经世书》之中。

（三）学识人品感动人， 为之构筑“安乐窝”

北宋时期，虽定都开封，但西京洛阳却为权贵、文人之渊薮，

学术之盛与开封相比，实过之而无不及。邵雍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路过洛阳时，投宿在洛水之北的汤氏旅店，领略了这里的锦绣山水和优雅的风光，目睹了这里的人文之盛和敦厚朴实的民风民俗以后，几乎是留连忘返，乐不思归。他回想起几次举家搬迁的情形，顿生再度迁居之意。皇祐元年（1049年），他劝说父亲把家从卫州共城迁到洛阳。其父邵古虽对古都洛阳十分向往，跃欲搬迁，无奈由于家境贫寒，无搬迁费用，邵古没有答应，后经与邵雍同门受业的怀州武陟（今属河南）知县侯绍曾的帮助，邵古总算同意迁居。初搬洛阳，寄住在天宫寺三学院。虽然学院年深失修，附近杂草丛生，但邵雍却自得自乐，亲自采柴刈草煮饭事奉家人。久而久之，他的学识及为人深深地感动了周围众人，谏议官刘元瑜、吕献可、王益柔，少卿张师锡及其子职方君张景伯，状元张师德及任谏议官的儿子张景宪、学士王起、侍讲李育、郎中姚奭等与他有了密切的交往，其中有些人还自称是他的学生。政治上失意，寓居洛阳的一些有钱有势的官僚对邵雍的情况耳闻之后，敬慕之情油然而生，不仅常去拜访，与之交游，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替他在履道坊西、天庆观东买了一处房子。一个姓赵的谏议官还主动把汝州叶县（今属河南）的田地借给他耕种，直到后来王不疑、周乡等人在洛阳附近延秋村替邵雍买下一块田地后，邵雍才把叶县田地归还给赵谏议。

嘉祐七年（1062年），王宣徽出任西京留守，见邵雍居室简陋，便出资出力，派人在天宫寺西、天津桥南的五代节度使安审琦的住宅原址，用郭崇韬废宅的余材修筑了房屋三十间，请邵雍一家搬居。不久，退居洛阳的宰相富弼，让他的宾客孟约买了对面富人的一座花园，送给邵雍，邵雍再三谦让，最后勉强答谢接受。

熙宁（1068—1077年）初年，颁行买官田之法。由于邵雍所

居也是官地，被官府标价拍卖达三个月，但人们出于对他的敬慕不忍心购买。司马光、富弼等人见此情景，纷纷说：“若邵先生的住宅让别人居住，是我们的耻辱。”于是司马光等一些人集钱替邵雍买下了这块宅地。事后，邵雍先赋诗感谢王宣徽说：

嘉祐壬寅岁，亲懽始戾功。

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宫。

槛仰端门峻，轩迎两观雄。

窗虚响澗洞，台迥粲伊嵩。

好景尤难得，昌辰岂易逢？

无才济天下，有分乐年丰。

水竹腹心里，莺花渊藪中。

老莱欢不已，靖节叹何穷。

啸傲陪真侣，经营荷府公。

丹诚徒自写，匪报厚恩隆。

然后又作诗感谢司马光等人，诗文说：

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

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

嘉祐卜居终是僦，熙宁受券遂能专。

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

洛辅清风朝满袖，嵩岑皓月夜盈轩。

接罗倒戴芰荷畔，谈尘轻摇杨柳边。

陌彻铜驼花淡漫，堤连金谷草芊绵。

青春未老尚可书，红日已高犹自眠。

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

敢于世上明开眼，会向人间别看天。

尽送光阴归酒盏，都移造化入诗篇。

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尧夫笔似椽。

由于房子是司马光领头替邵雍买下的，园是富弼出面买下的，庄是以王郎中的名义买下的，所以买房的契约、买园的契约、买庄的契约，一直到邵雍死后，其子邵伯温居住时，仍分别写着三人的名字。邵雍很长一段时间在自家园中种花、养鱼、栽菜，用以供自己衣食所需，唯恐诸公再为他买宅置地。他对自己的这种生活十分满意，将其居室命名为“安乐窝”，自称为“安乐先生”。他每天早上起床后焚烧一炷香，然后静坐冥思，用餐时小酌几杯，然后乘酒兴诵诗抒发自己的理想及志向。春秋时节常出城踏青、郊游。每次皆乘一小车，前有一仆人牵拉，出去漫无目的，拉到哪里算哪里。因此，那些读书人听到他的车声传来，早在路边迎候，小孩及老人、仆人都竞相高兴地说：“我们家的先生来了。”不再称呼他的姓名。更有好事之人，为了请他小住几日，专门仿盖邵雍家的房子，以便等待他的光临，并把这些房子称为“行窝”。

（四）高官厚禄如浮云，自有林泉安素志

嘉祐三年（1058年）冬，王安石奉命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上书皇上改革法度，并且建议，变法的先决条件是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宋仁宗虽未采纳变法主张，却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访求遗逸。此时富弼再度任命为相，入相伊始，即对门下士田契说：“你替我问一下邵雍，若愿意出来，将任他要职；若不愿意，就让皇上封他为先生处士，以遂他隐居不仕的志向。”邵雍得此转

告，挥笔写下二首小诗。一首说：

相招多谢不相逸，将为胸中有所施。
若进岂能禁史意，既闲安用更名为？
愿同巢、许称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时。
满眼清贤在朝列，病夫无以系安危。

另一首说：

欲遂终焉老闲计，未知天意果如何？
几重轩冕酬身贵，得此云山到眼多。
好景未尝无兴咏，壮心都已入消磨。
鸕鸿自有江湖乐，安用区区设网罗。

富弼读后，虽明其意，但一定要让邵雍来京城，特地在明堂举行大礼，让皇帝下诏举荐遗逸人才。富弼认为，河南府一定会举荐邵雍应诏。当时文彦博罢相后任河南尹，得朝廷旨意后，用两府重礼召见邵雍，均被其委婉回绝，不得已，为搪塞朝廷旨意举荐了客居洛阳向邵雍求教的人才福建人黄景。

经全国上下推荐，共二十八人入选、应诏，富弼见人群中没有邵雍，大失所望，询问应答时，见河南府人选是一个操有浓重闽南口音的人，顿生不快，只让他们各自作了一首有关时政的诗，然后全部任命为知县。事后，富弼上奏说天下遗漏的人才还很多，请求再次下诏举荐，皇帝应允。

担任洛阳留守的王拱辰接诏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邵雍，他一方面报告邵雍近况，另一方面亲自去其住处延请。邵雍知其来意后，只是一直摇头，弄得王拱辰尴尬而返。与此同时，颍川郡举荐一人叫常秩，富弼决定不经选报，先让他们两人担任将作监

代理主簿。富弼一心一意想召邵雍入京做官，又恐有徇私的口实，就说是朝廷之意。负责制诏的王安石不认识邵雍，驳回富弼签署的公文，说道：“假使姓邵的是寻常百姓，担任代理职衔也不行；如果真是贤能之士，不应该只让他担任代理之职，应该召他面试而任命正式官职。”皇上批阅后，未采纳王安石之意，让另一名负责制造的祖无择起草诏令，只是将原来的“不经选拔”四字删去，还是让二人代理将作监主簿。

诏令到洛阳留守王拱辰手中，预感结果不妙，然君命难违，只有再见邵雍。见面后只是一味地恭维，请他出任。邵雍打断话语，用戏谑的口吻说：“就是尧舜再世，把您的留守一职让与我，恐怕也不行呀！”王拱辰惊呆一阵，用疑惑的口气问：“听说先生曾锐意功名，热衷仕宦，是否确有其事？”邵雍答道：“不错，有过。不过那是年幼无知时的想法，成年以后，目睹官僚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勾心斗角，结党营私，贪污腐化，鱼肉乡里种种情形之后，早就没有那个意向了。您也不用再多费口舌、白白浪费时间了。”说完之后，独自返回书房去了。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即位不久，决心振兴朝纲，下诏全国各地再举人才。御史中丞吕海、三司副使吴充、龙图阁学士祖无择等纷纷上书举荐邵雍。这次任命邵雍为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对于这次任命，邵雍百般推辞，因始终未得朝廷同意，他只好默许，但一直却不离开洛阳赴任，朝廷几次派人催逼，邵雍只好佯装有病卧床不起。为表明自己的心志，曾给同乡写诗二首，一再说：

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

断送落花安用雨，装添旧物岂须春？

幸逢尧舜真为主，且效巢由作外臣。

六十病夫宜揣分，监司何用苦开陈？

另一首说：

却恐乡人未甚知，相知深后又何疑？

贫时与禄是可受，老后得官难更为。

自有林泉安素志，况无才业动丹墀。

苟扬若守吾儒分，免被韩文议小疵。

（五）留心天下事，不忘学问道

邵雍虽然多次谢绝朝廷延召，但并不像有些隐士那样逍遥尘外，不过问时事，而他却时刻留意朝政，有机会就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熙宁年间，王安石的变法遭到一些顽固守旧的官僚抨击。邵雍的门生故友中担任州、县官职者，纷纷去信给邵雍询问其见，邵雍一一回信，说道：“值此之时，贤能之士应该竭尽全力为国效忠，新法虽然苛严，只要能够宽容一分，那么老百姓就能得到一分恩赐，弹劾引退有什么益处呢？”

富弼因母亲去逝而去官守丧，丧期满后请求从家乡汝州回洛阳养病。他在洛阳的住处与邵雍之居相距很近，因此，二人过往甚密。一次，富弼笑着对邵雍说：“从此以后我可以时时招引你了。”邵雍知道富弼意在举召为官，便笑而答说：“我冬夏两季不出门，春秋时节偶尔到亲朋好友家走走，您想招未必来，不招未必不来。”为此，富弼告诫儿子：“邵公来，无论何时，我都要见。”两人相

会，有时探讨学问，有时议论时政，有时吟诗作赋，抒发自己的感想。一日，两人饮酒畅谈，深夜之际，微有醉意，富弼即兴作诗：

先生自卫客西畿，乐道安闲绝世机。
再命初筵终不起，独甘穷巷寂无依。
贯穿百代尝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
珍重相知忽相访，醉和风雨夜深归。

邵雍当即回赠一首：

道堂闲话尽多时，尘外盃觞不浪飞。
初上小车人已静，醉和风雨夜深归。

过了不久，邵雍又一次来到富弼家，见面之后，邵雍发现富弼脸色忧愁，心中不快，便问道：“您恐怕有不顺心的事吧？”富弼说：“您猜猜看。”邵雍联想到富弼官场失意后，不时指责朝政的事，加上当时王安石变法已陷入进退维谷之境，便带有推测的口气说：“莫非是因为王安石罢相，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吕惠卿会比王安石更残暴吗？”富弼点了点头。邵雍笑着说：“您不必忧愁，王、吕本来就是因为权势、利益联合在一起的，二人在权利相等后，一定会变成仇敌，顾不上危害别人。”不久，吕惠卿果然背叛了王安石。

邵雍居洛除了与富弼经常在一起外，还与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等十分友好。如果说邵雍与富弼在一起谈论的多是政治方面的话题，那么他与司马光等人在一起，则更多的是有关学问方面的事。当时司马光正在洛阳全力编纂《资治通鉴》，张载在研究他的本体论学说，二程在试图从《易》学中阐明其“天理”论

和“格物致知”学说，而邵雍则正在建立他的象数学。因此他们在一起，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二程兄弟对邵雍在《易》学方面的学问十分推崇，曾说：“尧夫（邵雍）道虽偏驳，然卷舒极熟，又能谨细行。”^①司马光初论曹操时，认为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于汉室也”。请问邵雍时，邵答曰：“以为非是。”^②

（六）潜心象数学，怡然乐余年

邵雍隐居洛阳后，对《易》学刻苦钻研，建立起神秘的象数学体系。这个体系集中反映于他的代表作《皇极经世书》中。对于“皇极经世”四字的涵义，邵雍之子邵伯温认为是：“至大之谓皇，至中之谓极，至正之谓经，至变之谓世”。^③《皇极经世书》的主要内容，邵伯温说“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为之《观物》焉。”^④邵雍在这部书中力求制造一个囊括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完整体系，还企图找到贯穿于整个体系的最高法则，并声言只要人们掌握了这个体系及其法则，就可以上知宇宙，下应人事而不疲。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可以预测一切。

《皇极经世书》十二卷的内容，按邵伯温所说，卷一至卷二是阐述元、会、运世的时间体系，也就是《易》经中的天干、地支

① 《二程遗书》卷7。

② 《邵氏闻见后录》卷9。

③ 邵伯温：《皇极经世系述》，见王植《皇极经世全书解》卷6。

④ 徐必达编：《邵子全书》卷1。

的发挥。卷三至卷四是以时间体系会经运、列世数与岁甲子、记载尧至五代历代年表，描述天下离合治乱的事实，用天时去验证。卷五至卷六是以运经世，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尧至五代文献中所载兴亡治乱得失邪正之事，拿人事来验证天时。卷七至卷十则是以阴、阳、刚、柔之数，联系律、吕、声、音之数，以及动物、植物、飞禽走兽等。也就是《周易》中所说的万事万物。卷十一至卷十二，解释写本书的目的。从全书的内容来看，邵雍认为宇宙的一切都有“数”，一切万物都是按照他所推衍的象数所构成并发生变化。为了论证这个主旨，邵雍作了《伏羲始画八卦图》、《伏羲八卦方位图》、《经世衍易八卦图》、《经世天地四象图》、《经世天地始终之数图》、《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和《经世四象体用之数图》等许多图象，并进行了繁缛的推论。

邵雍为了表明他自己的学说准确，不时地运用他的学说去经验一些事物的发生、发展情况。据说治平年间（1064—1067年）邵雍与几位客人在天津桥上散步，忽然听到杜鹃的叫声，邵雍的情绪骤然低落，客人赶忙询问其故，他回答说：“洛阳过去没有杜鹃，现在开始飞来了，是有缘故的。”客人连忙问：“为什么？”邵雍倒了几个指头，答说：“不出三五年，皇上不仅一定要用南方人为相，而且还会重用大批的南方人，肯定会变革时政，天下也就从此多事了。”客人们莫名其妙，疑惑地问道：“听见杜鹃的叫声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呢？”邵雍慢慢地说：“天下将要大治，地气自北而南。将要大乱，自南而北。现在南方的地气到了这里，禽鸟飞兽，首先得到地气。《春秋》上说的‘六只鸟退飞’和‘鸛鹄筑巢’。都是地气迫使的结果。从此南方草木都会北移，南方的疾病瘴疠之

类，北方人都免不了了。”他的这番话，到熙宁初年都应验了。^①由于许多事都被他言中，所以当时人们就把他的《易》学神化了，认为他是一个未卜先知的预言家。不少人专门登门向他请教，据说有一算命先生向他请教时，邵雍对他说：“不久以前，京师有一道士，白天到市中饮酒，临走时对身边的人说：‘今天还有一个人要来。’后来他说的那个人果真来了。有人问道士：‘预言用的是什么方法？’道士回答说：‘无心罢了。’那人又问：‘无心可以学习吗？’道士说：‘想要学习，就是有心了’。”算命先生只得快快而去。后来，许多从事相学、预测之学的人，为了吹嘘他们的术数高明，都竞相称自己是邵雍的学生，深谙邵雍的象数理论。

邵雍完成了他那神秘的《皇极经世书》之后，已经耗尽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已是白发苍苍，老态龙钟了。他对自己的生活似乎是心满意足，颇感惬意。经常独自一人徜徉于花园之中，漫步吟诗。他的诗集《伊川击壤集》所收录的“寻乐”诗不仅占了绝大部分，而且大多数是晚年的作品，光题为“安乐窝中吟”的就有十四首七律。其中有“安乐窝中职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安乐窝中万户侯，良辰美景忍虚留”等句。他的职分就是看花，饮酒与赋诗，此外于世无求。由于受老庄的影响，对于这种闲适的生活，也是适可而止，不到极点。曾作诗说：“美酒饮教微醉后，如花看到半时开”，“饮酒莫教成酩酊，赏花慎勿至离披”。

有一天，吕希夷去看他，两人谈笑风生，话题又扯到早年拒不做官的事上，邵雍当即作了一首著名的《打乖吟》诗：

安乐窝里好打乖，打乖年纪合挨排，

重寒盛暑多闲户，轻暖初凉时出街。

① 《邵氏闻见录》卷9。

风月煎催亲笔砚，莺花引惹傍罇罍。

问君何故能如此，只被才能养不才。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充满了诗酒自娱、守身避世之意。吕希夷当即和诗一首，中有“先生不是闭关人，高趣逍遥混世尘。”

邵雍至老思维仍很敏捷，能够从别人的一举一动中洞察其心理变化。有一次，程颐路过邵雍居宅时，站在外边犹豫片刻，然后才进屋，邵雍一见，笑嘻嘻地说：“不是不想进来吧？”程颐心想：邵雍在屋内，怎么会知道自己所想呢？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归结邵雍的“心虚明”。洛阳的学者都很佩服邵雍的学识，竞相吹捧他，甚至有人说他知道天底下发生的一切事。

岁月无情，风烛残年的邵雍虽然对人生充满了乐观，但由于年事已高，还是病倒在他的安乐窝中。病重期间，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都去看望他，早晚守候在床边。临终之时，他们在外间商议丧葬之事，奄奄一息的邵雍竟听得清清楚楚，把儿子邵伯温叫到身边说：“诸位君子想把我安葬在近城之地，还是伴先人而葬吧。”安葬之后，程颢为之作墓志铭，称赞邵雍的学问纯一不杂，就其涉猎之处，皆有所成。

苏云卿



自食其力、不乐仕进的苏云卿

· 高卫星 ·

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年），战火连绵不断，民不聊生，无数的平民百姓在战争中丧失了世代居住的家园，背井离乡。一向清静的读书人，在这场家国难保的战争中很难稳坐在书案旁，也被迫奔波流离。他们面对国破家亡，而南宋统治者仍然奢靡无度、不思统一河山的现状，感到非常失望、压抑和苦闷，但又无力改变

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士人便放弃了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对功名利禄的追逐，转而逃避现实，追求自己内心的平静与安宁，独善其身，向往洒脱自然的生活。苏云卿就是这样的一位隐士。

（一）逃避战乱，结庐独居

苏云卿，北宋末年南宋初年人，生卒年不详，广汉人（今属四川），身高七尺，美须髯，相貌堂堂，平时少言寡语，爱好读书，尤其爱读司马迁的《史记》，对其中的人物了如指掌。每每谈起书中的人物总是兴致勃勃，眉飞色舞，既有对英雄人物的仰慕和尊敬，也有对悲剧人物的同情与怜悯。他自幼和其他读书人一样，也有“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但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连绵战争和奸臣当道、贤良被贬的现实无情地打破了他的梦想，使他从原来的五色梦中醒来。对现实的认识越是清醒，就越是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于是，他彷徨、苦闷，感到压抑。经过长期地思考，他终于选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清静无为，自食其力。

南宋高宗绍兴年间，他带着自己心爱的几本书，只身出游各地，逃避战乱。当他来到风景如画的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东湖岸边时，他一下子就被东湖及其周围的景色所陶醉。只见一望无际淡蓝清澈的湖面，就像是一面巨大无比的镜子，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使人难以分辨出哪里是天，哪里是湖。湖面上几只野鸭在自由自在地游荡嬉戏，四周野草丛生，野花飘香，不时地，还从草丛中发出蛐蛐的鸣叫声，在空寂的空中回荡；远处稀稀落落的几家居民的烟囱里也散飘着袅袅的炊烟。一看到这美丽的景色，苏云卿只觉得如同置身于世外桃源一般，多年来郁结在心中的烦

闷顿觉荡涤已尽，把世俗间的是非善恶、功名利禄全部抛到了九霄云外，心情有前所未有的超脱般的轻松、愉快和平静。几乎在观察东湖及其周围景色的同时，他就决定在此定居下来，实现自己平生的愿望。于是，他放下包袱，自己动手，披荆斩棘，开辟出一块平地，又亲自砍伐了几颗大树，终于盖起一座纯粹土木结构、造型别致的草屋。他又把树枝编成栅栏，围成一座小院。欣赏着属于自己的“家”，苏云卿有一种充实、满足之感。从此，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涯。

苏云卿虽恬淡清静，洁身自好，沉默寡言。他以一位老庄客自居，没有读书人的清高，没有致仕官吏的傲慢，更没有一些隐士的孤芳自赏，他待人诚恳热情，不论是高官显贵，或是平民百姓，左邻右舍，不论是七旬老翁或是十岁玩童，他都不卑不亢，平等相待。他乐善好施，经常帮助左邻右舍，谁家有难，只要求到他的门下，他都在所不辞，所以邻居中不论贫富贵贱、老人玩童都非常尊敬他，并亲切地称他为“苏翁”。久而久之，远近的人们，都只知道东湖畔隐居着一位善良的长者“苏翁”，却忘却了他的名和字，以致后来史书上也只有其名而没有他的字。

苏云卿还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每天早晨，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他已经起床，在东湖畔散步，吮吸大自然清新的空气。白天，他则耕田种地，担水砍柴。晚上，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他又编织草鞋或挑灯夜读，一字字一行行地翻阅着那本跟随了他多年的《史记》，虽然已读过多遍，而且都能够背诵下来，但他还是习惯于这样地读。每读一次，他都会深深地为书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所吸引，以至他百读不厌。正由于他内心的平静淡泊，又重视劳动和有规律的生活方式，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从未生过病；他饭量也很大，他一个人比平常几个人都吃得多。

苏云卿朴素无华，他总是像乡间老农一样，经常身着布衣短褐，脚穿草鞋，而且一年到头都不换。如果不认识他的人遇到他，谁也不会相信，他就是见识过人、学富五车、有过远大抱负的苏云卿。

（二）种菜织履，生存有道

毋庸讳言，隐士们之所以要归隐山林，主要是为追求那种“君子之心，静止如水”，“荣枯不驻心，宠辱两相忘”的精神境界。但是，隐士也是人，是人就要生存。尽管隐士们在初做归隐的决定时，便意味着他们不再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不再追求过分的物质享受，但他们要生存仍然离不开必要的物质条件。像北宋初年的隐士陈抟那样练就一身过硬的避谷之术，一觉可以睡上数月不吃不喝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隐士仍然存在着谋生问题，尽管谋生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隐士谋生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少一部分人如陈抟那样练就避谷之术，尽量少吃或不吃饭来解决谋生的问题。有一部分隐士，如宋初的戚同文，他们家中有田产和祖宗的遗产，谋生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戚同文还在维持自己饮食起居的基础上，拿出节余的部分接济乡里的穷人。还有一些隐士，他们知识渊博，于是就聚众讲学、传业解惑，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如宋代著名隐士种放，在刚开始隐居时，“以讲习为业，从学者众，得束修以养母”。^①另外有一些隐士，他们既不营田也不讲学，多是靠朋友、同

^① 《宋史·种放传》。

道的接济来生活的。如宋代著名学者邵雍，闲居林下，潜心学术，受到世人的瞩目。当时士大夫中的上层人物如司马光、富弼等人都与他有深交。他生活的必需品都是这些朋友的馈赠，因此，他的宅契用的是司马光的户名，园契用的是富弼的户名，庄契用的是王拱辰的户名。这件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

苏云卿则与他们不同，他既不练什么避谷之术，也不聚众讲学，收取束修，更不乐意接受别人的施舍，而是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勤奋劳动来养活自己。他自己动手，在房舍周围的荒地上，铲去上面的枯树荒草，拣出土里的砖块瓦砾，开辟出一块小菜园来。他整地锄草，架枝接干，浇水施肥，居然“四季蔬菜，不使一缺。”^①多年的实践使他成为种菜的行家里手。他能够根据不同的菜，所需要的气候土壤等条件，耕耘种植，锄草施肥，浇水培土，他都掌握得恰到好处，因此，无论盛夏酷暑，土石焦灼之时，或是隆冬严寒草木枯死之时，他的菜园里总是绿色盈盈，郁郁丛丛，充满生机。由于他管理有方，不但蔬菜长势好，而且味道也比别人同类的菜鲜美。因此，每当他的菜在市场上出卖时，虽然价钱比别人同类的菜高出一倍，但仍然卖得非常快，以致供不应求。一些吃惯了他的菜的人就不想再买别人的菜了。经常是他的菜还没有长成，就会有人事先出钱预定下。他从不开口乱要价，只要他说个价钱，买菜的人也绝对不还价。不仅他的菜种得好，他编织的草鞋也以其轻便美观，坚韧耐磨而远近闻名，即使用皮革做的鞋子，也难以与之相媲美。因此，常常是鞋子尚未织好，已被人们争先恐后地预定下来，或是贩运远方以求高利，或是作为礼物馈赠亲朋好友。由于他编织的草鞋质量好，价格公道，因此

① 《宋稗类抄》卷2《隐逸》。

人们亲切地称他编织的草鞋为“苏公履”。

苏云卿还非常勤奋，他经常白天在草园里辛勤劳作，晚上编织草鞋，实在累了，就拿起他那本《史记》读上一两段。正是因为他的勤奋，所以自他隐居东湖畔以后，不仅不缺少生活所必需的柴米油盐，而且还自给有余。他非常乐意助人，左邻右舍凡是生活紧张者，有时经常找他借贷，他总是尽自己力所能及帮助别人，至于别人还与不还，他从不在意。就这样，他成为宋代众多隐士中唯一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自贍其身的人。

（三）清静淡泊，不乐仕进

尽管苏云卿靠种菜织履收入颇丰，但他从来不计较自己的钱财多少，只要能维持住自己简单的生活就满足了。平时，稍有一点清闲，他或是读书，或是闭门高卧，或是整天正襟危坐，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苏云卿虽然自己不求名利，但也正因为此，他成为远近闻名的隐士。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到处传播，他俨然成为一位人们心目中勤劳朴实、心底善良而又虚无缥缈的“神仙”。

一天，宰相张浚的属吏给他谈起苏云卿的事，张浚听后，连忙问道：“你知道这位苏翁姓什么叫什么吗？知道他家住哪里吗？”属吏见宰相如此感兴趣，急忙回答说：“人们只称他苏翁，谁也不知道他具体叫什么名字，家又住在何地。”张浚马上吩咐说：“你快点去给我打听清楚！”属吏见宰相对这件事如此重视，也不敢怠慢，连声应诺：“我马上去寻查。”两天以后，属吏回来了，向张浚汇报说：“相爷，我经过两天的详细调查，很多人都说他叫苏云

卿，至于‘云卿’是其名或是其字，谁都搞不清楚。听说他是四川广汉人，与您是同乡，现在他隐居在豫章东湖畔，靠种菜织履为生。”张浚听后脸上露出了笑容，拊掌叫道：“果然是他！”属吏被张浚这句话搞得莫名其妙，心中暗想：“难道宰相认识苏云卿吗？”不错，原来张浚和苏云卿都是广汉人，年轻时两人曾经在一起经常切磋学问，交情很深，张浚非常佩服苏云卿的人品才学。后来，因为战乱两人才失去了联系，现在又突然听到老朋友的消息，张浚当然很高兴。

南宋立国之初，朝廷中人才匮乏，宋高宗一再要求宰相张浚为他举荐人才，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正巧有了苏云卿的消息，于是，张浚就把苏云卿的情况向高宗作了介绍。宋高宗听后也表示很想见见苏云卿其人。于是，张浚就专门给豫章地区的经略按抚使、转运使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我的同乡苏云卿，其才干不在春秋战国时的管仲、乐毅之下。他隐居山林，寄情山水已有多年。不久前，我听说他隐居贵地东湖之畔，靠种菜织履为生。我已向皇上保荐，请他出山为朝廷效力。可是，苦于我公务繁忙，不能亲自去拜访他。苏云卿其人高风伟节，不是随便招之即来的人物，因此，劳驾你们代表我亲自到他的住处邀请他出山，务必把他请到京城来，切切！”另外，张浚又拿了一些金币让他们交给苏云卿。豫章的经略按抚使和转运使接到张浚的信后，见宰相对苏云卿其人这样重视，也不敢怠慢，马上派人到东湖地区秘密打听苏云卿其人。当地人都说：“我们这里只有一位种菜织履的苏翁，没有叫苏云卿的人。”无奈，两人决定亲自到苏翁的住处看看，看这位苏翁究竟是不是苏云卿。

第二天，经略按抚使和转运使率领随从骑马飞奔东湖地区，在靠近苏云卿隐居的地方，他们下马，变换服饰，打扮成游客的模

样，拿着张浚的亲笔信和金币，直奔苏云卿的住处。当时，苏云卿正在菜园中锄草，根本没有看到他们两人。他们直接来到苏云卿的菜园中，上前向苏云卿问好。看到这两位不速之客，等了很长时间，苏云卿才与他们谈话，问道：“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二人回答说：“我们是从豫章来的游客，想在此处小憩。”苏云卿放下锄头，客气地对他们说：“那就请你们进屋吧！”二人随苏云卿进入其简陋的草屋中，只见屋里的地面上收拾得整洁干净，所用瓦锅竹几也显得古朴自然，桌案上放着一套颜色发黄的《史记》。两人看罢室内的布置，恍然如置身仙境。他们心中暗想：“此人一定是苏云卿！”不一会儿，苏云卿提泉水回来烧水为他们泡茶，二人于是就很谨慎地问道：“先生是什么地方人啊？”苏云卿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四川广汉人。”两人又问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也是四川广汉人，先生可能认识他吧！”苏云卿回答说：“是的，认识。”两人又进一步问道：“您认为张德远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苏云卿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个大好人。他善于了解君子，却不能对小人有清醒地认识，品德有余而才干不足。”他顺便又问两人：“德远今天做了什么官？”两人回答说：“现在朝廷准备重用张公，他也想引荐您做官。”苏云卿事先没有料到这二人就是张浚派来请他出山的，他不在意地说：“恐怕他不会这样做。”于是，二人就笑着告诉了苏云卿真实的情况：“我们两个不是游客，而是本地的经略安抚使和转运使。张德远公是当朝的宰相，是他让我们亲自到此为您送礼并请您出山共济大业的。”说罢，他们把张浚的亲笔信和要送苏云卿的金币放在桌案上。苏云卿看到这些，脸色大变，咽喉处隐隐作声，似乎是埋怨张浚侮辱了自己。苏云卿当即予以谢绝。二人很为难地对苏云卿说：“如果您不出山，我们也不好向张公交差，希望您能体谅我们的难处！”无奈，

苏云卿就假装答应他们说：“那好吧！今天晚上我把东西收拾一下，明天早上就和你们一起走。”第二天一大早，经略按抚使和转运使就派人来接苏云卿时，只见其房门紧闭，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出来。使者推开房门进到屋里，只见桌案上放着昨天带来的书信和金币，原封未动，室内空无一人。原来苏云卿已于当晚远走高飞。至于他去了哪里，以后他又死在什么地方，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当经略按抚使和转运使将此事详细地告诉张浚时，张浚手拊几案，长叹一声说：“苏云卿的才干比我高出十倍，没有早点找到他请他出山，而我却备位宰相，实在叫人感到惭愧！”于是，他就作了一篇箴文记载这件事道：“云卿风节，高于傅林。予期与之，共济当今。山潜水杳，邈不可寻。弗力弗早，予罪曷针。”^①

① 《宋史·苏云卿传》。

元
好
问



著作等身的隐士元好问

——·任崇岳·李秀月·——

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

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

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这首七律是清代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中的一首《题遗山诗》。诗中说元好问亲身经历了元朝的灭亡，因而在他的诗篇中对故国充满了怀念之情。国家灭亡固然是不幸的事，但对诗人来说，却是一件好事。好问因感怆时事，和泪写诗，因而诗篇婉转浏亮，翻澜不穷。

元好问作为一个诗人，早已饮誉千古，但他同时也是一位隐士，似乎尚不为世人所知。在他六十八年的生命历程中，有近三十年的隐居生涯，而他为官的时间，加起来还不足五年，赵翼诗中“无官未害餐周粟”一句，即指他作为金代遗民隐居不仕，从事著述。因此，把好问列入隐士传中，也是合乎情理的。

（一）自幼聪颖，过目成诵

元好问，字裕之，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因曾在遗山（今山西定襄县东北十八里）读过书，自号遗山山人。

元氏出自拓跋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始改姓元氏。唐代大诗人元结就是好问的远祖，曾任礼部侍郎。五代以后，元氏从汝州（今河南临汝）迁居山西平定，高祖元谊在北宋末年徽宗朝任忻州神武军使，曾祖元春南宋初年任忠显校尉，举家由平定迁居忻州（今山西忻县），从此元氏成了忻州人。忻州是个美丽的地方，元好问后来曾写诗描绘家乡景色说：“一沟流水几桥横，岸上人家种柳成。来岁春风一千树，绿烟和雨暗重城。”流水淙淙，小桥横架，岸柳成荫，远望如烟，真使人神往！祖父滋善，曾任金朝铜山县令；父亲德明，口不言世俗鄙事，布衣蔬食，诗酒自娱。因累举不第，便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四十八岁时撒手而去，有

《东岩集》三卷，今已湮没不传。元好问出生于这样一个书香门第，受父祖的熏陶，为他日后成长为诗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好问出生七个月之后，过继给叔父格为子。他天赋聪慧，四岁开始读书，五岁跟随叔父至掖县（今属山东），八岁即能作诗，被称为神童。十一岁时随叔父到冀州（今河北冀县），一位叫彭宣叔的人，见元好问聪慧过人，便教他写文章，从此文思大进。十四岁时叔父调任陵川（今属山西）令，元好问有机会入名士郝天挺门下为受业弟子。天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元好问在他门下如鱼得水，进步很快。一学就是六年，已经到了弱冠之年，他已是满腹经纶了。天挺对他说：“现在人读书急功近利，以得中功名为目的，六经、诸子百家都各取所需，有些人连篇章句读都不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是个庸人而已。”又说：“读书不汲汲于功名，为官不汲汲于利禄，只有贤能的人才办得到。”最后又耳提面命说：“如今当官的人多数因贪污徇私而身败名裂，都是因为穷愁潦倒而做不到洁身自爱。大丈夫如果忍耐不住饥寒，那就一件事也干不成了。你记住我说的这些话，科举功名也就在其中了。”有人对天挺这番话提出质疑说：“以这种态度对待科举，要想考中，岂不是缘木求鱼吗？”天挺哈哈大笑说：“老夫正不想让好问去应科举呢！”从天挺那里，元好问不仅学到了治学方法，也学到了如何为人，使他受益终生。元好问有诗说：“七岁入小学，十五学时文，二十学业成，随计入咸秦。”（《古意二首》）他因参加秋试，二十岁这年曾去西安一游，在那里结识了几个志趣相投、年龄相近的儒生，每次谈及周、汉都邑及蓝田等地风物，元好问便精神焕发，喜形于色。他甚至幻想与二三知己结庐山中，耕稼自给，谈诗论文，游览山川，把“美食大官、高赀华屋”都抛诸脑后。也就在这一年，他的长女元真呱呱坠地。在他六十岁时，写诗回忆

说：“生女四十年，知有为父乐。”舐犊深情，跃然纸上。

金大安二年（1210年），叔父病逝于任上，元好问扶柩还葬。他从孩提时离开父母之邦，在异乡漂泊了十六年，才回到故乡。忻县山水依旧，风景不殊，只是家族中的老人已凋丧殆尽，元氏先世之事，已没人能说清楚了。这时天下不宁，蒙古人崛起于北方大漠，频频向金国进攻，金国统治者内部也为争权夺利而倾轧不已，金至宁元年（1213年）八月，卫绍王为权臣胡沙虎所弑，九月，宣宗即位，改元贞祐。元好问无心功名，赋闲在家，读书赏花，倒也有几分乐趣。就这样，元好问度过了三年平静的书斋生活，这一段时期，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二）携家避难，流亡他乡

但是，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贞祐元年（1213年）八月间，蒙古人的铁骑沿太行山南下，围攻河东（今山西），离太原只有数日之程的忻州，自然也受到了冲击，元好问一家在惊恐颤栗中度日。幸喜蒙古兵很快退走，全家只受一场虚惊。贞祐二年三月，蒙古兵又倏然而至，以狮子搏兔之力进攻忻州，可怜忻州乃一弹丸小城，兵力单薄，经不住剽悍凶猛的蒙古人攻击，很快便陷落了。蒙古人对忻州人敢于抵抗甚为恼火，在三月三日下午令屠城。一时间阴霾满天，血雨腥风，竟有十余万人惨死在屠刀之下，元好问的哥哥好古，也在这场浩劫中罹难。这年五月，金宣宗完颜珣为避蒙古人兵锋，把国都由中都（今北京市）迁往汴京（今河南开封市）。贞祐四年二月，蒙古兵继续牧马南寇。五月间，元好问携妇将雏，与母亲一起逃难。他家本是诗书世家，度

(guǐ, 音鬼。放东西的架子)藏图画、书籍甚多,不少是希世珍品。其中书籍多是北宋元祐(哲宗年号)以前版本,书法墨宝则是唐人笔迹及五代写本,图画也多是唐宋名家真迹。名贵砚台多是他的先人为官时购得。元好问舍不得扔掉这些珍贵文物,便寄放在亲戚家里,砚台埋在房屋下面,他自己带着杂书及先人所写春秋三史、庄子文选等书千余册,图画百轴,随着逃难的人群,攀山越岭,颠沛流离,几经周折,才来到河南福昌三乡镇(今宜阳县三乡镇)。他在《答聪上人书》中说:“自贞祐甲戌(1214年)南渡河,时犬马之齿二十有五。”刚刚安定下来,十月间,蒙古兵又进攻潼关,元好问不得不再次迁往女儿山下的三潭,等乱后又回到三乡。经过这次兵燹,带来的书籍已损失殆尽了。他是诗人,他把自己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都一一书之于毫端。他写承欢膝下,侍奉老母菽水:“菽水尽欢吾岂敢,老亲自爱荠羹甜。”(《三乡时作》)写他对抱负不能实现的感慨:“虞坂盘盘上青石,石上车踪深一尺。当时骐驎知奈何,千古英雄泪横臆。龙蟠于泥易所叹,麟非其时圣为泣。”(《虞坂行》)。哀叹谋生的艰难:“遗山山人伎俩拙,食贫口众留他乡。”(《雪后招邻舍王赞子襄饮》)在此期间,他还写成了一部表示自己对诗歌见解的《论诗三十首》,他如数家珍般对汉、魏迄于宋代的著名诗人和流派,一一作出评鹭(zhì,音陟。排定)。他那力透纸背的精辟议论,不同流俗的独到见解,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

正因为元好问的诗汪洋恣肆,跌宕起伏,当时道德文章为一代宗师的文坛领袖赵秉文,读了他的诗,赞不绝口,“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一封信把他招到了京师,京师人称他为元才子。与赵秉文齐名,合称赵杨的另一诗人杨云翼,也有诗称赞他说:“礼部(指赵秉文,时任礼部尚书)天下士,文盟会欧韩,一见折行辈,

殆如平生欢。”有了赵秉文、杨云翼的推崇，元好问声誉鹊起，成了名闻遐迩的人物。

（三）栖迟登封，油然思隐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转眼到了金兴定二年（1218年），元好问已经二十有九，将届而立之年了。国家的局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恶化下去。宣宗南迁之后，金国多次与南宋发生磨擦，边界纠纷不断；河北、山东、山西等地起义、叛乱不绝如缕，使金朝统治者如芒在背，如梗在喉，惶恐不安。当然，使宣宗视为心腹之患的，还是蒙古人的威胁。这年八月，木华黎太师国王统率的蒙古大军，越过太和岭，迤迤进入河东，代州（今山西代县）、太原、潞州（今山西长治）、汾州（今山西汾阳）相继陷落。元好问本拟结束这种羁旅生活，返回故乡，但蒙军占领了河东，使他有家不能归，只得举家从三乡移往登封（今属河南），并在昆阳（今河南叶县）购置了田产，一住就是九年。他对登封的景色很满意：“地僻人烟断，山溪鸟语哗。清溪鸣石齿，暖日长藤芽。绿映高低树，红迷远近花。林间见鸡犬，直拟是仙家。”（《少室南原》）这里林壑幽邃，鸟语花香，小溪潺湲，绿树婆娑，真是别有洞天！这种清新幽美的环境，是吸引他的最重要原因。他之所以要在昆阳置买庐舍，想的是“一饱本无华屋念，百年今见老农身。”（《后湾别业》）只要能填饱肚皮，有个安身立命，遮风避雨的地方，就没有住华屋的非分之想了。

在登封居住期间，他曾两次登第，但对做官都没有多大兴趣。第一次是在兴定五年（1221年），主考官是赵秉文。以他的才能，

加上赵秉文的赏识，几乎没费力气便金榜题名。然而，他并未去京师，而是归隐田园，与烟波钓徒为伍。第二次是金正大元年（1224年）五月，他应鸿词科考试，赵秉文又是监试官，当然一试即中。他把家属安顿在登封，只身来到京城，任儒林郎、国史院编修官。一旦为功名利禄羁绊，便只能唯唯诺诺，俯仰由人，写些言不由衷、阿谀奉承的文字。他奉命写的《拟贺登宝位表》、《拟立东宫诏》、《拟除枢密使制》等，便是这类无聊的文字。金哀宗本是亡国之君，德行政绩一无可取，元好问还得称赞他“孝悌通于神明，忠厚及于草木。”^①作为金朝的官吏，他期望“大定（世宗年号）、明昌（章宗年号）之治，增光宜及于此时；周宣、夏后之功，专美岂容于他日。”^②但是，在这祸深寇急，危机四伏之际，统治者却醉生梦死、歌舞升平，使他感慨万端。他把这些都写进了诗中：

百草千花雨气新，今朝陌上有游尘；
皇州春色浓于酒，醉杀西园歌舞人！（《西园》）

一边是金戈铁马，黑云压城；一边是轻歌曼舞，荡志迷魂。蒙古人是摧枯拉朽，志在亡金，金人却是得过且过，苟安偷生，对比何等分明！

炫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
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京都元夕》）

彩裾翩翩，灯火摇曳，全无大敌当前的紧张气氛，元好问自己也随波逐流，侧身于欢声笑语的人群中。金人偏安汴京，与南宋偏

^{①②} 《拟贺登宝位表》。

安临安并无二致，南宋人林升写了“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诗句，这首《京都元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元好问在汴京只住了两年，便挂冠而去，又回到了登封，这年他三十六岁。避开了城市的喧嚣，大有冲出牢笼，返璞归真之感。他说：“人生要适情，无荣复何辱。”（《濞亭》）一个人不能矫揉造作，不能作违心的事。官职是身外之物，在位不值得夸耀，弃官也不是耻辱，总之，合之则留，不合则去。他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这在封建社会中，是很难得的。

读书之余，他参加劳动，和农民们时常往来。他不像有些士大夫自鸣清高，他理解农民的苦衷，同情他们的处境，甚至一晴一雨也牵系着他的心：“春旱连延入麦秋，今朝一雨散千忧。龙公有力回枯槁，客子何心叹滞留。”（《叶县雨中》）只因久旱不雨，老天忽降甘霖，一场大雨把他“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心情也一扫而光了。

元好问和农民一样，盼望着清明政治。一个叫薛鼎臣的人，当了几年登封县令，他廉洁清明，是难得的好官。元好问不仅写了《登封令薛侯去思碑》，赞扬他“退悍卒，并冗吏，决留务，释滞狱，不旬日县中廓廓无事，”又写了《薛明府去思口号七首》，称赞他：“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木索人何罪，累累满狱中，只从明府到，牢户二年空。”钦佩之情，可谓溢于言表！他关心农民的疾苦，对那些暴戾恣睢、受赋纳贿的官吏深恶痛绝。在《虎害》一诗中写道：

空谷绝樵声，长路无行尘，
呀呀垂涎口，眈眈阌城圉。
天地岂不仁，社公岂不神，
哀哀大山妇，叫断秋空云。

这分明是借题发挥，把那些贪官污吏比作吃人的老虎了。又在《驱猪行》一诗中描绘豪猪吞噬农作物时的贪婪：

长牙短喙食不休，过处一抹无禾头。

天明垌亩见狼藉，妇子相看泪空流。

旱干水溢年年日，会计收成才十一。

不用说，这是对苛政猛于虎的控诉了。

元好问也羡慕田家无拘无束，悠然陶然的生活：

田家岂不苦，岁功聊可观。

带月荷锄归，裴回（徘徊）丘陇间。

暧暧远人村，纷纷飞鸟还。

养真衡茅下，庶无异患干。

遥谢荷蓑翁，躬耕非所叹。

他并不为满腹经纶隐居不仕而后悔：

素月出东岭，夜境湛虚明。

挥杯劝孤影，杯尽壶自倾。

遥遥望白云，千载有深情。（《杂著》）

月出东岭之上，清辉洒满天宇，只身独自，遥望白云，举杯邀月，逸兴遄飞，大有把酒临风，宠辱皆忘的气概，这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惬意！这首诗与陶渊明诗的风格相近，无怪乎他对陶渊明推崇备至了。

(四) 三任县令，关心民瘼

正大三年秋，三十七岁的元好问被任命为镇平（今属河南）县令。他对做官虽不感兴趣，但圣命难违，只得束装就道。他在《出山》诗中说：

少日漫思为世用，中年直欲伴僧闲，
尘埃长路仍回首，升斗微官亦强颜。

如果说少年时代还满怀豪情壮志，要报效国家的话，而今人到中年，饱经忧患，早已磨平棱角，要与僧侣为伴了。他表示愿意隐居终生：“此生只合田间老，谁遣春官（礼部称春官，这里指礼部尚书赵秉文）识姓名。”（《被檄夜赴邓州幕府》）在《镇平县斋感怀》诗中说：“四十头颅半白生，静中身世两关情，书空咄咄知谁解，击缶呜呜却自惊。”他只有三十七岁，说四十岁，不过是举其成数而已，已是两鬓添霜了。无人理解他的襟抱，也只能击缶为乐，聊以自慰，心情是郁闷的。镇平是小县，政事不多，他有的是时间，《从邓州相公觅酒》、《镇平寄侄孙伯安笔》、《镇平书事》等就写于此时。他在镇平不久，即离职而去。次年任内乡（今属河南）县令。正大五年母亲张氏病故，按照惯例，他丁忧守丧，三年之后才能出仕。守丧期间，他“出居县东南白鹿原，结茅菊水之上，聚书而读之。”（《新斋赋》）并命名所居为新斋。正大八年四月，元好问调任南阳（今属河南）县令，这年他四十二岁。几个月后就调往京师，任尚书省掾，举家迁往汴京。不幸的是，在赴汴京前夕，他的原配妻子又登鬼箴，长女已嫁，次女入道为女

冠，三女淹留卢氏，他只带着儿子叔仪、小女阿秀赴京，未来得及续弦。

元好问三任县令，但时间都不长，充其量不到二年，他却在邓州居住了六年：“未到白头能几日，六年留滞邓州城。”（《出邓州》）他任职期间，关心民瘼，勤于政事：

田父立马前，来赴长官期。

父老且勿往，问汝我所疑。

民事古所难，令才又非宜。

到官已三月，惠利无毫厘。

汝乡之单贫，宁为豪右欺。

聚讼几何人，健斗复是谁。

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

东州长官清，白直下村稀。

我虽禁吏出，将无夜叩扉。

教汝子若孙，努力逃寒饥。

军租星火急，期会切莫违。

期会不可违，鞭朴伤汝肌。

伤肌尚云可，夭阏令人悲。

（《宿菊潭》原注：邓州内乡有菊水）

诗人作为刚刚莅任不久的县令，极为关注百姓疾苦。他认为处理民事并不容易，而自己又缺乏那样的才能，到任已经三月，还无惠政及于百姓，甚觉惭愧。他知道内乡的百姓穷苦，豪绅恃势肆虐，他想打听清楚，哪些人喜好聚讼，哪些人好斗。之所以详细询问这些，是因为他虽身为县令，但不能周知县境内的所有事情，问清楚了，就可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他知道过去大小官吏敲诈

勒索百姓的事屡屡发生，便保证在他任期内约束官吏，决不会发生半夜敲门勒索的事，尽量给百姓一个“努力逃寒饥”的环境。末了，他又谆谆告诫百姓：“军租星火急，期会切莫违。”国家正和南宋、蒙古人打仗，军情急如星火，切勿延宕军租。像元好问这样有正义感的官员，在金末是很少见的。

元好问的心情是沉闷的，“无限春愁与谁语，梅花娇小杏花愁。”（《内乡杂诗》）孤独寂寞，时时袭上他的心头。“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忧薰。催科无政堪书考，出粟何人与佐军？”（《内乡县斋书事》）当公吏四散，夜阑更深之际，他便觉得寸心牢落（寂寞）了。作为一个县令，在这干戈倏扰的特定环境中，他的任务就是催租。明知农民已经穷得家徒四壁，还要催讨追呼租税，于心不忍但又无可奈何。越是节日，他的孤独感就越强烈，甚至连元夕（正月十五）也引不起他的兴趣：“微茫灯火共荒村，黄叶漫山雪拥门。三十九年何限事，只留孤影伴黄昏。”（《长寿山居元夕》）年近不惑，远离家乡，只落得形单影只，独立黄昏，灯火阑珊，黄叶飘零，大雪拥门！当他蛰居山城，满腹惆怅，百无聊赖之际，忽得友人张纬文一信，使他高兴不已：“鹊语喜复喜，山城谁与娱？青灯一杯酒，千里故人书。”（《得纬文兄书》），大有杜甫“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感慨了。

（五）国亡被俘，隐居著述

元好问自调入京师后，就没有过过一天舒心日子。金天兴元年（1232年）三月，蒙军围攻汴京，金哀宗派户部侍郎杨居仁赍金宝乞和，蒙军始解围而去。七月间，飞虎军士申福、蔡元擅杀

蒙古使臣唐庆等三十余人于馆驿，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十二月，金哀宗御驾亲征，经过陈留、杞县，翌年正月由黄陵冈渡过黄河北上，刚到卫州（今河南卫辉市），便被蒙兵追及，一番鏖战，金兵大败输亏，哀宗只得东走归德（今河南商丘市）。蒙兵速不斛部见哀宗出走，便包围了汴京。这时任左司都事的元好问正在城中，当时汴京内外不通，物价飞涨，米珠薪桂，一升米竟卖白银二两。百姓粮尽，饿殍相望于道，簪缨缙绅之家女子行乞于街衢者比比皆是，甚至有煮食其妻者。元好问经历了“郁郁围城度两年，愁肠饥火日相煎”的苦难生活，看到了“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的残酷厮杀场面，目睹了“汴州门外即荆榛”（《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的荒凉残破景象，心中悲怆不已。

金哀宗出走，汴京被围，人心汹汹，一夕数惊。天兴二年正月，令史许安国建议说，古代国家有急难，便召集大臣、百姓商议，如今局势岌（diàn，音店。临近）危，为什么不召集百官、僧道士庶，商议保全社稷，拯救生灵之事？元好问把这话告诉给了主持京城政务的参知政事完颜奴申和掌管防务的枢密副使完颜习捏阿不，二人都表示同意。元好问问阿不：“车驾出京已二十余日，又派人迎接两宫，外边传言国家打算丢弃京城，你打算怎样处理此事？”阿不说：“我与完颜奴申相公，只有一死报国罢了。”元好问摇摇头说：“死并不难，如能安社稷，救生灵，倒也值得。如果白白死去，又有何价值？”阿不说：“今日这里只有我二人，有话请说。”元好问低声说：“闻听城内外人讲，相公打算立荆王、梁王监国，以保全两宫与皇族，可有此事？”阿不说：“我知道你用意所在了。”便下令召集京城官民，讨论如何收拾危局。但是完颜奴申和完颜习捏阿不空有一腔卫国激情，却不谙文韬武略，拿不

出具体方案来，只连说“死守”二字，使官民大失所望。

就在这时，负责京城西部防务的西面元帅崔立发动政变，杀死奴申、阿不二人，矫诏立卫绍王太子从恪为监国，自立为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四月间，他腆颜降敌，把两宫、梁王、荆王及宗室五百余人押往蒙古军中。他自以为拯救生灵社稷有功，强迫元好问等为他立功德碑。那些手无寸铁的莘莘士子欲待不写，又恐身家性命不保，要写，颠倒黑白，将无作有，又与良心不合，因此，都面面相觑，首鼠两端，便共推元好问执笔。元好问知道众人心事，只得应命。“其碑序全裕之笔也。然其文止实叙事，亦无褒称立言。”^①他写好后，让另一士子曹益甫书写。碑文只直叙事实，没有吹捧溢美，虽不无白圭之玷，但他急公好义，勇于为众人排危解难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元初人郝经在一首诗中说：“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虽是为他开脱，但大体是公平的。

汴京陷落了，元好问成了蒙军的阶下囚，他从青城被押往聊城。劫后余生，痛定思痛，他在《癸巳（1233年）五月三日北渡三首》中描绘汴京遭受的浩劫时说：

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旂车似水流。

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

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

^① 《归潜志》卷12。

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一个好端端的城市就这样千疮百孔，变成了一片瓦砾。道路两旁躺满了囚犯，珍贵的大乐编钟狼藉街衢，木制佛像贱于烧柴，白骨纵横，生灵涂炭。诗人用饮蘸泪水写成的诗，控诉了蒙古军的残暴，抒发了热爱故国的一片深情！

即使在被羁管期间，他仍念念不忘金国的命运：“淮右城池几处存，宋州新事不堪论。”淮右城池还有几座未被宋军占领？哀宗在宋州（今河南商丘市）被官努拘系，可曾获得自由？自己的命运如何，尚在未定之天，他还系念着君王，系念着社稷，对金朝的忠贞，真可谓披肝沥胆！

元好问在金朝灭亡后穷愁潦倒，生计困窘，“一冬不制衣，缁纻如纸薄。一日仅两食，强半杂藜藿。”（《学东坡移居八首》）穷得穿不起棉衣，一天只吃两顿饭，而且一半是野菜。但从他的诗作来看，人身似乎是自由的。他形容在聊城的生活：“家亡国破此身留，留滞聊城又过秋。老去天公真溃溃，乱来人事转悠悠。”（《送仲希兼简大方》）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春天，四十六岁的好问由聊城移往冠氏（今山东冠县），看见途中景色，蓦地想起了家乡：“西北并州隔千里，几时还我故乡春？”（《三仙词》）“荒村此日肠堪断，回首梁园是梦中。”（《冠氏赵庄赋杏花四首》）为送好友李辅之，端平二年七月间，他曾去过一趟济南，那里的锦绣山水，使他暂时忘却了烦恼：“看山看水自由身，著处题诗兴发新。明日扁舟藕花里，有心长作济南人。”（《济南杂诗十首》）他也在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游过黄华山（今河南林县西北），那里千岩竞秀，峰峦耸翠，飞瀑直泻，碧玉飞溅，真是“骊珠百斛供一泻，海藏翻倒愁龙公。”使得他胸怀开阔，“芥蒂（烦恼）一

洗平生胸。”（《游黄华山》）在元好问的诗篇中，讴歌祖国大好河山之作占了很大分量，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短暂的欢娱，不过是给他麻木的心灵注上了一针兴奋剂而已，一旦回到现实生活中，便又感叹歔歔，不胜愁苦了。嘉熙元年秋天，好问从冠氏回到忻州，年底又返回冠氏，途经卫州，触景生情，又联想到金哀宗卫州之败，不禁悲从中来，感慨万端。当年繁荣昌盛的金朝，如同长流不息的黄河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劫前宝地三千界，梦里琼枝十二楼。欲就长河问遗事，悠悠东注不还流。”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离合兴亡遽如此，栖迟零落竟安之？”（《卫州感事二首》）何时才能结束这种“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漂泊生活呢？他茫然了。这时的元好问才四十八岁，如日中天，道路还长，但他已经有迟暮之感了：“少日騫飞掣臂鹰，只今痴钝似秋蝇。耽书业力贫犹在，涉世筋骸老不胜。”（《十二月十六日还冠氏，十八日夜雪》）

南宋嘉熙四年，元好问结束了六年的羁旅生活，携带十口之家，由冠氏返回故乡秀容。他对冠氏故旧依依不舍：“分手共伤千里别，低眉常愧六年贫。”（《别冠氏诸人》）当他风尘仆仆，日夜兼程奔往家乡时，全没有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归”的欢乐心情，有的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喟，写出了“瘦马长途懒着鞭，客怀牢落五更天”（《榆社峡口村早发》）的诗句。马瘦途长，心绪牢落，他为金国灭亡而黯然伤怀，也为自己的遗民生涯而心神不宁。

从五十一岁回到家乡，直到六十八岁病逝，元好问未再离开过故乡。他以“今是中原一布衣”（《为邓人作诗》）的身份，过着“灯火青荧夜雨阑，柴荆寂寞掩春寒”（《晨起》）的穷苦生活。在近二十年的漫长日子里，他读书教子，游览山水，与故旧往还，

写出了大量诗篇。这里有他对祖国绮丽山水的歌颂，有对友人的关怀，有对子女的希冀，也有对故国的怀念和对自己身世的感慨。无论是律诗、绝句、乐府、长短句，都苍凉悲壮，饶有新意，为人传颂。他的诗再现了金朝末年的历史，从这个角度上说，元好问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史学家。五十七岁那年七月间，元好问忽然得了足痿病，足的功能萎缩，失去机能。经过多次治疗，虽免了偏瘫之苦，但手指仍觉麻木。几处相传元好问已经逝世，甚至有作挽辞相祭者，使元好问哭笑不得。

人越是到了桑榆晚景，越是思念往事。金国灭亡了，还没有史书问世，他认为“国亡史作，己所当任。”当时金朝实录在顺天（今河北保定市）张万户家，他打算“亲去顺天府一遭，破三数月功，抄节每朝始终及大政事大善恶，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书，大安（卫绍王年号）及正大（哀宗年号）事则略补之。此书成，虽溘死道边无恨矣。”^①设想虽好，但被人阻止，没有成行。他说：“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②便在家建了一座小亭，命名为“野史亭”，兢兢业业，在亭上从事著述。他四处奔走，搜集史料，经过近二十个寒暑春秋，终于编成了《中州集》、《壬辰杂编》二书。《中州集》收录了金代二百四十九人的作品，分为十卷，附《中州乐府》一卷。每位作者都有小传，兼有评论，寓有以诗存史之意。《壬辰杂编》一书已佚，但其中一部分已被《金史》采用。他在叙述写作的甘苦时说：“朝我何所营，暮我何所思，胸中有茹噎，欲得快吐之。湿薪烟满眼，破砚冰生髭，造物留此笔，吾贫复何辞。”（《学东坡移居八首》）一言以蔽之，他是在极端穷苦的情况下从

① 《遗山先生文集·与枢判白兄书》。

② 《金史·元好问传》。

事写作的。尽管如此，只要能完成二书，即使有天大困难，他也甘之如饴。这种毅力，这种精神，实在令人佩服。除了《中州集》外，今天还有《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传世。前十四卷是诗、词、歌、赋，后边二十余卷是碑铭、表志、序文。另有笔记小说《续夷坚志》。这是他为后世留下的又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秦从龙



陈遇

逸于运外而不仕明的五隐士

· 杨天宇 ·

元、明之际有一些人，他们的德行和才能都很好，知名于世，或知名于一方。他们原来都是元政府的官吏，食元朝的俸禄，后来归了明。他们虽然有的人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干为明政权服务，可是他们都坚决不做明朝的官，这样一些人，被称为“逸运外臣”。逸，就是隐逸不仕的意思。运，指天运。古人认为朝代的兴亡，在于天运

所归。元朝亡了，天运转移，已归之于明，而这些人却不愿仕于明，所以称他们为“逸运外臣”。这种逸运外臣，在两个朝代交替之际，每每有之，可以称得上是隐士的一种类型。

（一）才器老成的秦从龙

秦从龙，字元之，洛阳人，生于元元贞二年（1296年），死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元朝末年，秦从龙曾任岭北行省（治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哈尔和林）左丞（行省最高长官丞相的副手），后来又改任江南行台侍御史^①。元末政治腐败，在元政府做官的，不论是蒙古人还是汉人，也不论是大官还是小官，许多人都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为百姓所疾恨。秦从龙却始终为官谨慎清廉，恪尽职守，因此颇为百姓所称道。

元末，各地反元武装斗争风起云涌，江南更是反元斗争普遍开展的地区。元政府所设江南行台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且成为反元势力攻击的目标。于是秦从龙为避兵乱，离职而隐居镇江（今属江苏）。至正十六年三月，朱元璋攻克集庆（今南京市），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当时元将定定扼守镇江。朱元璋命徐达攻镇江。徐达临出发时，朱元璋特意向他交待说：“我听说镇江有个叫秦从龙的人，才器老成，年高德劭，颇有声望，请注意为我寻访此人，不要让军士犯其家门。”徐达遵命而行。不久，镇江被攻克了，元将定定战死。徐达寻访到了秦从龙，向他转达朱元璋想见他的意思。

① 江南行台，即负责纠察东南诸行省官吏善恶和政治得失的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台署设在建康（今南京市）。行台的最高长官是大夫，一人。下设中丞二人，侍御史二人。

接着朱元璋又命自己的从子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带着重金和丝绸到他家去聘请他。秦从龙为朱元璋的诚意所感动，便带着他的妻子一同来到应天。朱元璋大喜，亲自出来迎接。

当时应天尚未修建公府，朱元璋暂住在一个大富户家中，便邀秦从龙和自己一同居住。朱元璋时时向秦从龙咨访时政。秦从龙知无不言，毫无所隐。朱元璋每每通宵达旦，听取秦从龙的高论，毫无倦意。不久，朱元璋又搬到原元政府的江南行台台署，作为公府，而把秦从龙安排在附近的西华门外居住。朱元璋事无大小，都要和秦从龙商量。他常常把问题用漆写在竹简上，密封起来，派人送到秦从龙那里。秦从龙对朱元璋的问题也以漆书相回答，而且每次都令朱元璋十分满意。因为信的内容高度机密，左右的人都不得而知，也就没有能够流传下来。秦从龙过生日，朱元璋和太子都向他馈赠礼物，有时还亲自到秦从龙家饮酒、参加宴会。但朱元璋多次要授给他官职，他却坚辞不受。

至正二十五年冬，秦从龙的儿子秦泽在镇江病死，秦从龙告归。朱元璋亲自送他到郊外，和他握手道别。没过多久，秦从龙也因悲伤过度，一病不起，很快就与世长辞了。朱元璋闻讯大惊，当时朱元璋正督军到镇江，于是亲自到秦从龙家哭灵，抚慰和厚赐他的家属，并命官吏负责秦从龙遗体的安葬事宜。

（二）真君子陈遇

陈遇，字中行，生于元皇庆元年（1312年），卒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他的祖上原是曹（今山东曹县）人，高祖父陈义甫任南宋翰林院学士（负责为皇帝撰拟文告）时，迁居到建康，子

孙们便以建康为家了。陈遇的父亲陈辛之，曾任元政府的淮南盐课提举（掌淮南盐课之事的最高长官）。陈遇自幼聪明过人，天赋极高，加上他读书勤奋，因此青少年时期就博通群经，博览群书，尤其精通象数之学以及军事、刑律和天文历法之学，还擅长于绘画，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元朝末年，陈遇曾任温州路（治今浙江温州市）教授（掌路学的官），亲眼目睹元末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看到元政权的气数已尽，不愿与当时的官场人物同流合污，便弃官回家，过起了隐居生活。他在自己的室门上挂了一块匾，上书“静诚”二字，因此人们称他为“静诚先生”。

陈遇隐居期间，每天都早早起床，先焚香叩拜上天，祈求上天早早降生圣人，来拯救这苦难的社会。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攻克集庆，并征聘了秦从龙之后，秦从龙向朱元璋推荐陈遇，说他学问好，德行又好，才能和见识出众，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于是朱元璋亲笔给陈遇写了一封聘书，书中写道：“自胡元（对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的蔑称）入主中原，现在上天已经厌弃他们了，所以豪杰并起，争夺天下，造成百姓流离失所。现在天命已经归之于我，因此我提兵渡江，攻取了台城（指集庆）。历思自古创建大业的英雄，很难独自治理天下，所以要广求贤人，共定太平。先生世代居住江东，兼备文才武略，超群绝伦，出类拔萃，是一位天生的贤哲，是我理想的辅臣。望先生以拯救生民为念，应天运而顺人心，贡献才华韬略，以安定天下人民，助我成就大业，我将为先生列爵封侯，以报答先生的功德。先生能与国运相终始，不是很伟大吗？我恭候先生的光临！”陈遇读了朱元璋的聘书，深受感动，便前来拜见朱元璋。朱元璋同他谈了一番话，大为高兴，便留他在身边参与机密，并且对他越来越亲信。

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称吴王，封百官。朱元璋要授给陈遇

官职，陈遇却推辞不受。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后，曾向陈遇询问保国安民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陈遇向朱元璋提出了三条治国之道：第一，不好杀人；第二，薄赋敛，任贤能；第三，恢复中国的先王们所提倡的礼教。朱元璋对他的意见很赞赏，并鉴于他的参谋辅佐之功，曾先后三次要用他做翰林院学士，他都推辞了。于是朱元璋赐给他肩舆（轿子）一乘，卫士十人，护卫他出入，以示荣宠。

洪武三年，朱元璋命陈遇前往浙江察访政治得失和民间疾苦。于是陈遇披星戴月，日夜兼程，赶往浙江，又不辞辛劳，明察暗访，掌握了许多下层的实情，并经过分析思考，针对这些情况提出了许多建议和办法，回来后一一向朱元璋作了详细的汇报。朱元璋对陈遇这次出访的结果大为满意，赐给他许多金钱和丝绸，接着又要授给他中书左丞（中书省的第二把手，仅次于右丞）的官职，他又力辞不受。

洪武四年春正月，朱元璋决定消灭割据四川的夏政权，并就有关问题诏陈遇到华盖殿商量对策。夏政权是由原徐寿辉的部下明玉珍在至正二十年建立的，至正二十六年，明玉珍病死，由他的儿子明昇嗣位。现在，朱元璋在对蒙古用兵取得胜利，稳定了北方的形势之后，便决定对付盘据四川的夏政权。陈遇对有关灭夏的问题，向朱元璋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并受命起草了《平西诏》。紧接着，朱元璋派两路大军进攻四川，到这年七月，夏政权就被平定了。事后，朱元璋又给予陈遇很多的赏赐，并要授给他礼部侍郎（职位仅次于礼部尚书）兼弘文馆大学士（掌图书及参与政事）的官职，他又推辞不受。

朱元璋看陈遇这样一位有用人才而不愿做官，不能收以为臣，实在感到遗憾，因此又要任命陈遇做太常少卿（掌宗庙祭祀之事，

职位仅次于太常卿)，陈遇仍然不接受。朱元璋强行要他接受，他却坚辞不受。朱元璋无奈，也就不再勉强他了。过了不久，朱元璋又想任命陈遇为礼部尚书，陈遇仍然加以推辞。朱元璋于是深深地感叹道：“先生是真君子啊！”又说：“古人说：‘士有志气节操的，连功名也不值得挂怀。’这大概就是说的先生吧！以后我不再勉强先生做官了，以成就先生的高名。”从此以后，朱元璋也不再拿具体事务来麻烦他，只是经常在闲暇的时候接见他，赐坐，赐食，与他谈论经史和古今成败故事，而每次谈话之后，朱元璋都觉得颇有收益。后来朱元璋又想让他的三个儿子做官。陈遇说：“我的三个儿子年纪都还小，书还没有读好，等他们长大了，学有所成之后，再让他们报效陛下吧。”于是朱元璋也就不再勉强了。

陈遇自辅佐朱元璋以来，廷臣有人犯了过失，当被责罚，陈遇总是竭力为之解脱，使这些廷臣得被宽宥或免罪。陈遇为朱元璋所谋画的事情甚多，但都密而不宣，不为世人所知。而朱元璋对陈遇的宠遇也愈益加隆，即使勋戚大臣，也往往不能和他相比。朱元璋还多次亲临陈遇之宅，去看望他，言必称先生，或称君子。

洪武十七年秋，陈遇病倒了，朱元璋命太医为他诊治，亦终无效，不久便去世了，享年七十二岁。对于陈遇的死，朱元璋震悼不已，赐给他家许多祭物和随葬明器，并赐葬于钟山。陈遇生前，朱元璋先后赐给他的诗文墨迹甚多，陈遇自己也撰写过许多诗文，但因临终前曾遭遇一次火灾，大多被焚毁了，因此所存无几。

（三）隐迹不出而死元节的伯颜子中

伯颜子中，生年不详，死于明洪武十二年。他的祖上原是西

域人，元朝末年，子中到江西来做官，因此就定居江西了。子中自少年时期就十分好学，遍读群经，尤精《春秋》。然而他先后五次被荐举做官，都没有能被元政府录用。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仍然等待着时机。

过了不久，机会到来了。江西行省（治今南昌市）听说了子中的志行和才干，征辟他出来做了东湖书院山长（掌书院的官），后来又改任建昌路（治今江西南城县）教授。子中虽然是个儒生，却非常喜欢军事，对于古今用兵之道，以及天下的军事形势，常慷慨而谈。这时江西一带兴起了反元武装斗争，行省官员听说子中很熟悉军事，便调他来行省中做了都事（从七品官），命他去对付赣州（治今江西赣州市）的反元势力。于是子中带领他的一批学生奔赴赣州，但子中还没有赶到，赣州就已经被陈友谅的军队攻破了。子中于是在赣州城附近募兵，与陈友谅军战于赣州城下，终因事起仓促，加上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所招募的军队也死亡殆尽。子中只身逃脱，抄小路向东来到了福建。

当时福建为陈友定所控制。陈友定正在聚积兵力，要抗击反元势力，固守闽地，报效元王朝。陈友定素知伯颜子中之名，子中到来后，陈友定对他十分器重，便推荐他做了江浙行省员外郎（从六品官）。这时建昌也已被陈友谅攻破。于是子中出奇计，借用陈友定的兵，大败陈友谅军，收复了建昌，然后浮海北上，去大都（今北京市）向元政府献捷，因功而被元政府提升为吏部侍郎（职位仅次于吏部尚书）。

至正二十七年十一月，朱元璋命汤和、廖永忠率水师从明州（今浙江宁波市）由海道攻打陈友定盘据的福州。福州的形势危急。陈友定向元中央政府求援，于是元政府派子中持节前往广东，想调发广东何真的兵前往救援福州。可是朱元璋的军队进兵神速，当

子中赶到广东时，不仅福州已被攻克，而且廖永忠又移兵广东，何真也被迫投降了。子中一看形势不妙，慌忙逃跑，不慎从马上掉下来，摔断了一条腿，结果被廖永忠的军队俘虏。廖永忠想胁迫他投降，可是子中宁死不屈。廖永忠看他是个义士，没有杀他，把他释放了。

从此，伯颜子中改名换姓，头戴一顶黄色的帽子，隐迹漂泊于江湖之间。元朝的一些守义遗民都很哀怜他，常常暗中供他饭食。这时已经是明朝的天下。朱元璋听说了他的名字和才干，多次下令征召他，想用他来明政府做官，但始终没能找到他。后来朱元璋便命人把子中的妻子抓来，关在皇宫后边的掖庭中为奴，以此要胁子中，想逼他出来。子中知道情况后，仍然不出来，说：“我是元朝的臣，为元而死，是我的本分。”于是他买来毒药随时带在身上，准备一旦被明政府发觉，并逼他做官，就饮毒自杀。过了一段时间，风声渐渐平息了，子中才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故里。

洪武十二年，朱元璋对礼部的官员们说：“为国得宝，不如进贤。朕君临天下已经十二年了，还有许多博学老成、德才兼备的人物，愿其光华，甘于穷饿，不肯轻出，朕甚感遗憾。应该悉心访求他们。”接着便下诏，命天下郡县荐举元朝遗民有德才者，并且规定，如果有人敢于举而不应，以大辟论处（即处以死刑）。江西行省布政使（行省中主管民政的最高长官）沈立本密奏朝廷说，伯颜子中已经回到了江西故里。朱元璋很高兴，立即派使者带着重礼前往聘请。使者来到子中家后，子中长声叹息而又哭泣道：“我后悔死得太晚了，竟用诏书来玷污我！”说罢歌诗七章，声音哀婉凄侧，闻者无不落泪。接着又痛哭其父祖师友，然后饮毒自杀了。人们都称他是“死元节者”。

(四) 不忘故主的蔡子英

蔡子英，永宁（今贵州关岭西南永宁镇）人，生卒年月不详。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元末至正初年考取了进士。至正二十二年，掌管元政府军政大权的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在开封设丞相府，征辟蔡子英前来参议军事。后来他又连连升官，做了河南行省的参政（从二品官）。

至正二十八年，元顺帝弃大都，北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明军攻陷大都，元朝灭亡。蔡子英随扩廓帖木儿逃奔到定西（今属甘肃）。洪武三年，朱元璋命大将军徐达统大兵出西安，攻打定西。扩廓大败，军队死伤散亡殆尽。扩廓带着他的妻子向北逃去。蔡子英与扩廓走散，单身骑马逃入关中，隐避到南山（即终南山，在今西安市南）。

朱元璋早就听说过蔡子英这个人，很希望能得到他，便命人画了他的像，到处张贴，并命发现蔡子英，即把他送到京师。过了很长时间，他终于被人发现了，并被捕获，要把他押送应天（今南京市）。可是押送到长江边，准备第二天渡江的时候，他却在这天夜里逃脱了。从此他变换姓名，重又逃到关中隐居起来，平时靠给人打工为生。后来朱元璋命搜求天下元朝的遗臣，各地方官吏都行动起来。蔡子英又被发现了，并被戴上枷锁，押送去京师。押送途中经过洛阳，蔡子英被带来见将军汤和。蔡子英见了汤和却长揖而不拜。汤和大怒，强使他屈膝下跪。蔡子英却坐地而不屈膝。汤和又命人用火烧他的胡须，胡须都快烧光了，蔡子英仍然不屈，而且口中不停地谩骂。汤和对他奈何不得，也就不

再勉强他了。蔡子英的妻子流落在洛阳街头，听说丈夫被押送到了洛阳，便要求见他。蔡子英对她连看也不看一眼，厉声喝叱说：“我根本就没有娶过妻！”

蔡子英被押送到应天，朱元璋亲自为他解下枷锁，命人安排他在外舍休息（因为蔡子英非明朝之臣，以外臣之礼待之，故安排于外舍），对他十分礼遇。朱元璋想请他出来做官，他推辞了。回到舍中，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陛下乘时势，应天运，平定群雄，一统天下，海内外臣民，莫不宾服。臣本陛下鼎中之鱼，却侥幸漏网，得隐息南山。前次被捕，又得逃亡，漂流七年之久，重又烦劳吏卒追踪。而陛下居万乘之尊，却能成全我一介匹夫之节，不仅不加诛杀，反为我疗疾治伤，赐给衣冠酒食，授以官爵，可见陛下之宏量，足可包容天地。臣感恩不已，并非不想竭尽犬马之劳以报效陛下，然我生为元臣，名义所存，不敢改变最初之志。我自思本是一介平民，知识浅陋，过蒙主将（指扩廓）知遇推荐，使我做官受禄，骑马食肉已达十五年之久，常自愧无尺寸之功可报国士（亦指扩廓）知遇之恩。然而到了国家破亡的时候，却又失节，我还有什么脸面可见天下之士！管子说：“礼义廉耻，好比是维系国家的四根大绳索。”现在陛下创建大业，以垂万世之统绪，正当用大经大法，垂示子孙和臣民，又何必造就一个既无礼义而又寡廉鲜耻的俘囚，把他置于新创之朝，而列于贤士大夫的行列之中呢！臣日夜考虑，怪都怪我从前没有死掉，而一直苟延到了今天，实在应分当自裁（自杀）。陛下待臣以恩，遇臣以礼，臣本不该卖死以求立一己之名节，但也不敢偷生苟活以求俸禄。如果陛下能够体察臣的愚衷，成全臣的愚志，把臣禁锢于海南，以

终臣之余生，那么即使到死的那一天，也如同活着一样呢。从前王蠋^①关起门来自缢而死，李芾^②关起门来举家自杀，他们并不是厌恶荣华利禄而乐于死亡，只因道义所在，即使赴汤蹈火也不可躲避。我这渺渺之躯，实在上愧于古人，虽死亦有余恨，请陛下体察、圣裁。

朱元璋读了蔡子英的信，对他更加敬重，暗中命人好好地照顾他，不要让他感到有什么不便或不适，每天早晚都要派人去向他致以问候，并说：“切不可让天下人说我杀害义士。”

一天夜里，蔡子英忽然大哭不止。别人问他为什么哭，他回答说：“不为别的，只因思念旧君。”朱元璋知道蔡子英的志节不可改变，便命官吏护送他出塞外，让他到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的哈尔和林），去追随他的故主。这是洪武九年十二月的事。出塞后的蔡子英，就不知下落了。

（五）以奉养老母为辞的简祖英

简祖英，广东东莞人，生卒年月不详。元朝末年，曾在江西行省中做官。后因天下反元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元统治已岌岌可危，简祖英便辞官回归故里。当时简祖英的同乡何真也弃官在家，

① 王蠋(chù，音触)，战国齐画邑（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人。燕初破齐，乐毅闻蠋贤，令军环画邑三十里无人，备礼请蠋，蠋谢不徒。燕人劫之，义不北面于燕，遂自缢死。

② 李芾，南宋衡州（今湖南衡阳）人，以荫历任知州。德祐初（1275年）知潭州（今长沙市），元军围城，芾亲冒矢石，城陷，全家自杀。

正募集兵众，以抵抗反元武装。简祖英便追随何真，为他出谋画策。

洪武元年，朱元璋命廖永忠为征南将军，帅水军攻打广东。何真自知不是对手，便投降了。廖将军听说了简祖英的名字，便征聘他前往应天。到了应天，朱元璋设宴慰劳他，赏赐给他许多金钱和丝绸，并要授给他官职。简祖英上表辞谢说：

臣九岁就失去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后便食元的俸禄，后来做了何真的参佐。广州曾被盗贼所破，臣一门妻子五人丧命，臣母也被贼兵拘留。幸遇圣朝兵至，使臣母得以生还，臣虽九死，又怎能报此洪恩！陛下要录用臣，使臣为陛下治民，这正是臣为陛下效命的好机会。然而臣之所以心中惭愧而不敢受命，实因长期侍奉元朝，关系已经太深厚了。再说现在臣已经四十九岁，而臣母已经八十一岁了。陛下如果确实想以孝治天下，以仁使远方之人怀德亲附，那就请怜惜我母如夕阳之短期，使臣得朝夕侍奉于老母前，臣母子当拭目以看清平世界，讴歌陛下如日月之圣明。

朱元璋读了简祖英的信，十分同情他的一片诚意，便不再勉强他做官，放他回归故乡去了。此后简祖英的事迹，就不得而知了。

姚
广
孝



隐身佛门的一等功臣姚广孝

——·杨天宇·——

明朝时候有这样一个人，他从小隐身佛门，而又热衷于功名，可是当他立下巨大功勋、成为一等功臣之后，却又拒官禄爵位而不受，仍然退隐于佛门，这个人就是姚广孝。这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很特殊的隐士吧。

（一）不学医出家为僧，负高才心向金坛

姚广孝生于元朝元统三年（1335年），卒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原名天禧，广孝这个名字是后来明成祖赐给他的。他是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父祖世代行医。但他却不愿从父学医，而想建功立业，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有一天，年龄还很幼小的姚广孝对他的父亲姚震卿说：“孩儿不愿学医，只想读书求学，将来做官，光宗耀祖。否则的话，孩儿宁愿出家做和尚，以寻求方外之乐。”这后面的两句话，令他父亲大吃一惊。当初姚广孝说这样的话，也许是想吓吓他父亲，让父亲同意他读书求学，而不要强迫他学医。可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父亲并没有供他去读书，而他竟真的出家当了和尚。这一年是元朝至正八年（1348年），当时姚广孝年仅十四岁。

姚广孝出家在本地的妙智庵，法名为道衍，字斯道。但他并没有因出家而泯灭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之心，他除了念经做法事，便刻意于读书求学问。他听说附近的灵应观里有个道士，名叫席应真，好读书，学问很大，能诗善文，天文地理、阴阳术数都精通，而尤其精通兵书和机谋，姚广孝便暗中前去拜其为师。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他几乎把师傅的本事都学到手了。但他平时却深藏不露，他的僧友们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本事或学问，只有他的好友王衍了解他，对他说：“总有一天，你会遇到机会而发迹。”他自己也很自负，而且多次想返冠巾还俗。有一天他进城去，看见前面过来一位僧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鸣锣开道，前呼后拥，甚是威风。于是他感叹道：“做僧官也能富贵啊！”从此打消了还

俗的念头。

姚广孝曾经游览嵩山寺，遇到了当时著名的相者袁珙。袁珙一见到姚广孝，便大为惊异，说：“你是个何等不同寻常的僧人！我看你眼作三角形，而体形如病虎，性情一定嗜杀，是个刘秉忠之流的人物。”刘秉忠本是山西云中寺（在今山西大同市）的僧人，后来去漠北投奔了忽必烈，受到忽必烈的赏识和重用，成了忽必烈的第一谋臣，辅佐忽必烈创建了元朝。现在袁珙把姚广孝比作刘秉忠，姚广孝心中十分高兴，并和袁珙交了朋友。从此，姚广孝更加自负不凡。

有一次，姚广孝同他的好友僧人宗泐一同游北固山（在今江苏镇江市北）。北固山有南、中、北三峰，其北峰三面临江，形势险峻，故称“北固”。历史上，这里曾经云会过许多扭转乾坤的英雄人物，演出过许多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山上还有著名的铁塔和甘露寺。姚广孝游览着这一切，不由得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于是在甘露寺的墙壁上题了一首七律，诗的后四句写道：“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至金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野田有路至金坛”，暗示自己虽然身隐佛门，野居山寺，却渴望建功立业，踏上通达“金坛”（即朝廷）之路。“萧梁事业”，指南朝时期梁朝皇帝萧衍崇佛佞佛之事。南朝时期的梁朝，在梁武帝萧衍的积极支持和鼓励下，佛教达到鼎盛时期，梁武帝本人为佞佛还曾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奴。这里姚广孝是借“萧梁事业”，来暗示自己将与帝王沟通。题罢诗，姚广孝颇为得意，便摇膝高吟起来。宗泐读了他的诗，又见他这副得意模样，便嘲讽他说：“看你这诗，难道像是佛门子弟说的话吗？”姚广孝只是笑而不答。

明洪武六年（1373年），姚广孝申请获得礼部度牒，并入册于觉林寺。第二年，朝廷诏命天下通儒和有学识的僧人来京，由礼

部主持考试，成绩优秀者可授予官职。姚广孝参加了考试，成绩出众，获得了朝廷的嘉奖，却不愿意出来做官。于是朝廷赐给他一套僧服，他仍回山寺去了。但从此姚广孝便出了名。

（二）遇时机投靠燕王，说形势鼓动起兵

姚广孝参加礼部考试取得优异成绩后，之所以不愿出来做官，并不是因为他淡漠于功名了，而是想等待更能施展他的才干、实现他的抱负的时机。

这个时机终于到来了。

洪武十五年，姚广孝来到京城。当时马皇后病重，诸王都来京城看望母后。姚广孝经他的好友、已经做了左善世（明朝掌管全国僧人的长官）宗泐的引荐，结识了燕王朱棣。姚广孝一见燕王，便觉得他器度非凡，似有包囊乾坤之志，决不会甘居人下，因此便暗下决心，想要跟随并辅佐燕王，干一番大事业。这天，他瞅准了一个没有别人在场的机会，对燕王说：“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现在皇上万事草创，诸多举措暗昧不明，而东宫（指太子）仁弱，愿王自重自爱。我希望大王您能向朝廷请求，允许我留在您的府中，我当奉上一顶白帽子给王戴。”“白”字加在“王”字上，就是“皇”字，这是姚广孝在暗示自己要辅佐燕王将来做皇帝。燕王心领神会，也很想把姚广孝留在自己身边。不久，马皇后死了。朱元璋命僧录司（明中央所设管理全国僧人的最高机构）给诸王每人选一高僧，替他们为马皇后诵经荐福，以慰藉皇后的在天之灵。经过宗泐的推荐和燕王的请求，姚广孝被获准去燕王府。姚广孝大喜，便随燕王一起来到北平。

姚广孝来到北平后，燕王安排他做了庆寿寺的住持（负责主持寺院者的职称，意为久住护持）。姚广孝虽住在庆寿寺，却经常出入燕王府，行踪甚密，而且常常支开其他人，单独同燕王密议，积极帮助燕王出谋画策，把目光盯在朱元璋百年之后。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洪武三年四月被分封为燕王。当时朱棣还年幼，住在京城。洪武十三年，燕王来到封国北平。朱棣生得状貌奇伟，智勇而有大局，又能推诚任人，特别在对北边元朝残余势力的作战中屡建功勋，因此深受朱元璋的器重，朱元璋令他“节制沿边士马”，从而威名大振，成为明初诸王中军事实力最强的一个。但他也因此而滋生了政治野心，特别是皇太子朱标死后，朱元璋立朱标的第二子、年仅十六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朱棣的心中甚是不服，早怀觊觎之心，不过一直未敢表露出来，更不敢有所行动。现在来了个姚广孝，对他一鼓动，他的野心便开始膨胀了。姚广孝帮他制定的方针是：安而勿躁，积极准备，静观时变。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建年号为建文。朱允炆为皇太孙时，就已经感到诸王拥兵自重，对皇权是巨大的威胁，而且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把他这个晚辈放在眼里。继位之后，他更深感诸王叔的威胁，因此就和他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尽管朱允炆感到威胁最大的是燕王朱棣，但他决定先从周、齐、湘、代、岷等几个势力较小的王下手，且认为“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削燕之手足也”^①。接着就把周王朱橚和岷王朱楙废为庶人，把齐王朱榑囚于京师，代王朱桂幽禁于大同，湘王朱柏则自焚而死。与此同时，又以加强北部边防为名，在北

^① 《明史·黄子澄传》。

平周围部署兵力，准备袭燕。并以工部侍郎张曷为北平布政使（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而任谢贵为都指挥使（省的最高军事长官），在北平城内监视朱棣的行动。

建文帝的上述行动，使诸王人人自危，燕王更感到威胁。于是燕王问姚广孝：“您能为我占卜一下，看看命运怎么样吗？”姚广孝问道：“大王是想卜天子之位吗？”燕王连连摆手说：“嘿，可不敢胡说！”姚广孝却显得十分镇静，笑着说：“大王不必忌讳。幸亏王赐我私下相见，没有外人，因此臣敢竭愚诚。现在主上（指建文帝）猜忌和离间宗室之亲，削夺藩王的土地和权力，被他所杀害，囚禁和降为庶人的已经有五王了。大王您深受先帝的信爱，且又圣明英武，得士众之心，正是当前主上所最忌恨的。大王所居之燕，是元朝的故都，北方的雄镇，人民熟习骑马射箭，土地又盛产枣粟，征集各郡县武士和良家子弟，可得甲士三十万，粮食足支十年之饷，而大王的护卫精兵勇士又不下二三万。大王拥有这样一支军队，鼓行而下，定山东，略河南，犹如高屋建瓴之势，谁能阻挡？大王如果犹豫而不敢行动，贻误时机，等到南军（指南方建文帝的军队）先发，再想高枕无忧，还可能吗？到那时，恐怕大王将会成为日暮途穷的一介匹夫了。”燕王说：“然而现在民心还都向着他们，怎么办呢？”姚广孝说：“臣知天命所归，何必顾及民心？”姚广孝为了坚定燕王之心，又说：“臣有个好友，名叫袁珙，是位著名的相者，是不是再让他来看看？”燕王说：“好吧，您把他带来。”

姚广孝去请来了袁珙。燕王为了考验袁珙的判断力，让人扮成燕王，而自己扮成卫士，夹杂在其他九名卫士中间。谁知袁珙到来后，一眼就看出了他，而不理会那位假燕王，跪在他的面前说：“殿下何必如此自轻呢？”其他九名卫士都假装笑他认错

了人。可是袁珙的话说得更加诚挚肯切，这样燕王才出来请他入内。袁珙对燕王审视了一番，然后说：“王龙行虎步，真是一位太平天子啊！年四十，就将登大宝（皇帝宝座）了。”又说：“我在燕市中，看见王的部下许多人都是将相之材，这都是因为叨了大王气运的光。”燕王听了很高兴，增强了信心。为了防止袁珙把话透露出去，燕王又打发他回去了。

一天，燕王无意中说了一句对联的上联，曰：“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立即对出下联，曰：“国乱时危，王不出头谁做主。”^①于是二人相视而笑。从此便加紧进行起兵的准备工作。

（三）留北平运筹帷幄，靖难役论功第一

燕王府本是元朝的故宫，广大而深邃。姚广孝便在宫殿的后苑帮燕王练兵。为了防止被人发觉，姚广孝在后苑建了一座巨大的地下练兵场，日夜在里面练兵和赶造兵器，而在地上的周围筑了很厚的墙，又养了许多的鹅鸭以乱其声。一切似乎进行得很顺利，没想到出了一件意外的事。

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燕王不知怎地得罪了一个名叫倪谅的护卫官，于是倪谅便把燕王准备谋反的事向朝廷告了密。建文帝得到情报，立即密令张昺、谢贵采取行动，同时密令北平都指挥张信逮捕朱棣。没想到张信又向燕王告了密。燕王大惊，立即召姚广孝前来密议。姚广孝鼓动燕王迅速起兵，以免被人所制，

^① 《靖难功臣录》，见《胜朝遗事》卷之二。

并说：“天之所兴，谁能废之？”这天正是个大风雨天，又忽然有一片檐瓦被大风刮落下来，堕地而碎。于是燕王心中不快，认为是不祥之兆，脸上的颜色都变了。姚广孝立即解释说：“这是个好兆头。龙飞在天，从以风雨，正是大吉之兆，说明大王将升腾而上。檐瓦堕地，说明天意要让王换居黄瓦之宫呢。”燕王的心这才安定下来，于是决计起兵。

当时北平城中到处都是谢贵所统帅的军队，而燕王的王府护卫精兵都在前此被建文帝以加强北边防卫为名调到了开平（故元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形势对燕王十分不利。于是姚广孝向燕王献计，先诱杀张昺、谢贵，除掉了领兵统帅，其他士兵就好对付了。燕王依计而行，先设好伏兵，然后请张昺、谢贵二人来府赴宴。张、谢二人果然被骗前来，在酒席间被擒杀。北平周围的将士听说统帅被杀，皆溃散。燕王即命其亲信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等乘夜攻夺北平王城的九门，迅速控制了北平。

燕王为了使自己师出有名，便与姚广孝商量，决定以诛齐泰、黄子澄而“清君侧”为名。起兵前燕王说：“予已上书陈情，请诛奸臣，今少主为奸臣所蔽，恐不见答（即诛奸臣的请求恐怕得不到建文帝的答复），则惟应以尔等清君侧之恶（意思是：因此我应率领你们去清除国君身边的坏人），扶国家之既坏（挽救这已被破坏的国家）。”^①这样燕王便使自己的起兵“名正言顺”了，并把自己的行动称为“靖难”（即平定祸难），而把自己的军队称为“靖难之师”。

燕王控制了北平之后，接着就“拔居庸关，破怀来，执（都

^① 《明太宗实录》卷2。

督)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①,迅速扫平了北平的外围地区。为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燕王决定向东北用兵,攻取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大宁本是宁王朱权的封地,宁王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②,是一支强大的势力,特别是他的军士多蒙古骑兵,骁勇善战,因此燕王起兵后,便想把宁王的势力合并过来,以扩充自己的势力。

燕王出兵大宁前,委托姚广孝辅助世子朱高炽防守北平。这年九月,建文帝却乘燕王出征之机,任命李景隆为大将,帅五十万大军,前来围攻北平。但姚广孝部署的北平防卫十分牢固,李景隆多次攻城,都被击退。于是李景隆屯兵坚城之下,结九营以围困北平城。姚广孝针对这种情况,常常趁夜间从城上用绳缒下壮士,前往袭杀南兵,或派人远伏草莽间,举火鸣炮,扰得南兵夜夜不得安宁。十一月,燕王成功地合并了大宁地区宁王的部分军队,回师救北平,来到北平郊外,进逼李景隆的军营。这时城内的军队也开门杀出,内外夹击,把南军打得大败,李景隆连夜逃跑了。这次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燕军的士气。

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又会合其他诸部队,总计六十万大军,与燕军会战于白沟河(在今河北雄县)。战斗十分激烈。但由于南军“将帅不一,政令不专”^③,又被燕军打得大溃败。李景隆单骑逃往德州。燕军追至德州。李景隆又逃到济南。燕王又率军围攻济南。但攻了三个月,未能攻下。当时姚广孝仍留守北平,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燕军需要休整了,已经不宜久在外恋战,便飞马传书给燕王说:“将士已经很疲劳了,济南防守坚固,短时间

① 《明史·本纪·成祖一》。

② 《明史·宁王传》。

③ 《明史记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很难攻克，再战下去，将挫伤士气，为南军所乘，应迅速回师。”燕王便帅军返回北平。

建文二年十二月，燕王出兵攻东昌（今山东聊城市）。临出发时，燕王问姚广孝：“您看此行胜负如何？”姚广孝说：“每日师行必克，但费两日耳。”^①结果燕军在东昌遇到了南军的顽强抵抗，至使燕军大败，大将张玉也战死了。燕王溃围而逃，才得幸免。这次战役使燕军丧失了好几万人，燕王颇为丧气，打算好好休息一段再说。姚广孝却敦促他说：“现在决不可收兵坐息，否则必将为南兵所乘。应继续出兵进击，定可反败为胜。记得我前次对大王说的话吗？我曾说‘但费两日’，两‘日’就是‘昌’，现在已经过了东昌之役的劫难，从此以后，定将‘师行必克’了。”燕王和燕军将士一听这话，都大受鼓舞，于是重又振奋精神，整顿师旅，准备再战。燕王还总结白沟河和东昌两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对将士们说：“比者（近来）东昌之役，接战即退，遂弃前功。夫惧死者必死，捐生者（不怕死的人）必生。白沟河之战，南军畏死先走（逃跑），故得而杀之，所谓惧死者必死也。尔等奋不顾身，故能出万死，全一生，所谓捐生者必生也。”于是告诫将士，“自今无轻敌，无先懦（nuò，音糯。即怯懦）”^②，要奋不顾身，勇猛杀敌。

建文三年二月，燕王又率军出击，仍留姚广孝与世子驻守北平。这一年的军事行动虽然打得很艰苦，但正如姚广孝所预料的那样，所攻必克，先后在滦沱河、夹河、真定等战役中打败了南军，接着又攻下了顺德、广平、大名等地，“河北郡县多降”^③。

① 清·傅维麟：《明书》卷160。

②③ 《明史记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但通过这二三年的战斗，燕军将帅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虽然打了很多胜仗，却能略地而不能守，“所克城邑，兵去旋（很快）复为朝廷守，仅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①。于是姚广孝向燕王献计说：“应该改变战略，不要把重点放在攻城略地上，应当率军疾速南下，进攻京城。现在南军都野战在外，京师兵力单薄，一定可以攻克。只要攻克了京城，大局就定了。”正巧这时有朝廷被罢黜的官员前来报告说，京师兵力空虚，可以攻取。于是燕王确定了南下攻夺京师的战略。

建文四年正月，燕军进入山东，但绕过了南军守卫坚固的济南，直趋沛县、徐州、宿州，又在灵璧（今属安徽）大败南军，使燕军士气大振，而南军益衰。接着燕军攻抵扬州，六月三日，又从瓜州渡江，攻下镇江，十三日便攻抵南京金川门。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橞开门迎降。燕王进入京城，杀了齐泰、黄子澄等人。但建文帝朱允炆却不知下落，有人说他在宫中自焚身亡了，还有人说他从地道逃出京城，到南方出家当和尚去了。紧接着，燕王朱棣便在应天（今南京市）即皇帝位，这就是明成祖，也称明太宗，建年号为“永乐”。燕王所发动的这场历时三年多的夺取皇权的战争，就是所谓“靖难之变”。

这场“靖难之变”，从预谋，到起兵，一直到攻克南京城，姚广孝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三年多的战斗中，姚广孝虽然始终留守北平，但燕王在外的每一步重要的军事行动，都要事先征求他的意见。史载燕王“在军三年，或旋（还军）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指朱棣）用兵有天下，

^① 《明史·成祖本纪一》。

道衍力为多”^①，因此姚广孝成了“靖难之变”的第一功臣。

（四）不做官仍愿为僧，万念灰退隐佛门

明成祖即位后，命姚广孝做了僧录司左善世，让他掌管全国的佛寺和僧众，并命他为太子少师。姚广孝自出家以来，一直用的是“道衍”这个法名，成祖则恢复他的本姓，并赐名为广孝，从此有了姚广孝这个名字。但成祖却对他以“少师”相称，以示尊宠。

按照成祖的想法，是希望姚广孝还俗，并授予高官，委以政务。可是姚广孝坚辞不肯。成祖说：“朕如果没有少师为我运筹神算，怎么能得大统天下？如此功勋，难道敢忘了吗？现在每次想加官予您，您都加以推辞，究竟为什么呢？”姚广孝回答说：“臣本是江南一浮屠（佛僧），全赖陛下神圣威武，得以成就大业，臣有什么功劳可言呢？况且我已经蒙受了陛下的特殊恩宠，心中不胜感激，如果再受高官厚爵，实在不是做臣子的应有之义。恳请陛下发圣慈之心，还臣原来所受佛僧之牒，放臣继续做僧人，臣也就死而无憾了。”成祖不许，强令人给他穿上官服，戴上官帽，并命他谢恩。姚广孝无奈，只好接受。但他仍然住在佛寺中，有事上朝时才穿一下官服，下朝后即又换上和服。他既不蓄发，也不娶妻。成祖赐给他一所府第，并要为他从功臣家的女子中物色妻子，他都推辞不受。后来成祖赐给他两名官人，侍候他的生活起居，他却始终独居，不接近官人。成祖又不得不把官人召了回

^① 《明史·姚广孝传》。

来。

永乐四年（1406年），苏（今苏州市）、松（今上海市松江县）一带发生水灾。成祖命姚广孝前去巡视灾情，并赈济灾民。姚广孝顺便回到老家长洲，把朝廷赐给他的金钱布帛都拿来分散给自己的宗族和乡人。但令他感到悲凉的是，他辅佐燕王发动“靖难之变”的所作所为，却不能得到他的亲人和好友的理解。

当初姚广孝出家为僧时，他的姐姐曾告诫他说：“你既然决心出家当和尚，那就一定要以慈悲为怀。”当时只有十四岁的他回答说：“请姐姐放心，我一定铭记姐姐的教诲。”后来听说广孝辅助燕王起兵，姐姐叹息说：“和尚慈悲，应当这样吗？”这次他回来，看他的姐姐，姐姐却拒而不见，说：“你这个大贵人，还回这个穷家做什么！”不给他开门。第二天姚广孝又换上和服去见姐姐。姐姐仍不肯出来见他。后来家人强要姐姐出来，姐姐不得已，才同意意见他。姐姐站在中堂上，表情异常严肃。广孝连连下拜。姐姐说：“我哪里受得了这许多拜礼？你这做和尚的，难道是什么好人？”说罢就转身回房，不再出来见他。

当时乡里有个隐士，名叫王宾，人称光庵先生，本是姚广孝过去的好友。姚广孝去看王宾，王宾也不愿见他。于是姚广孝屏去随从人员，穿着布衣短褐，不骑马，不乘轿，独自步行前往拜访王宾。王宾仍然闭门不纳。姚广孝一再请求，王宾却佯装不认识他，问道：“你是谁呀？”广孝说：“我就是从前的道衍啊。”王宾不答。于是广孝大声恳求道：“光庵先生能不弃旧日之情，容我这老僧一见吗？”王宾回答说：“我在收拾柴禾，正忙着，没有空见你。”姚广孝继续请求，在门外站了很长时间。王宾看他一片诚心，便同他约了个见面的时间，姚广孝这才离去。到了那天，姚广孝天不亮就起来，站在门外等候，等到日出时，王宾才到来。姚

广孝大为高兴，赶忙把王宾迎进门来，行过再拜之礼，然后入座。没想到王宾不述旧情，也不谈别的什么话题，却连连说：“和尚错了！和尚错了！”姚广孝面有惭色，为自己解释说：“那时老僧确实错了，但也是天命所致，由不得人啊。”王宾大声叱道：“你既犯了大错，还要归咎于天！况且你只是一个沙弥（出家修行的人），特受高皇（指朱元璋）隆遇而不能报，怎能反过来背叛呢？试问你于心何忍？万世之后，怎能无罪！”说罢，起身拂袖而去。

姚广孝当初也知道，辅佐燕王反叛朝廷是大逆不道的，发起“靖难之变”而杀死了那么多人，更有背佛门子弟慈悲之旨，但青少年时期的他，不甘贫贱、欲建奇功以光宗耀祖之心太迫切了，而且自负超群的才智，也不甘一生寂寞于佛门，因此他毅然选择了辅助燕王谋反之路，并终于成功了。他本以为这样已不负此生，且可光宗耀祖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家乡亲友却以他为耻，甚至连见也不愿见他。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他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垮了，可以说是万念俱灰了。如果说，他青少年时期出家，只是想走一条与众不同的求取功名之路，并非真想隐居佛门，那么现在的他，却是真地下决心隐退了。因此他这次出巡回朝之后，不久便上疏求退。成祖恳留之再三，也无法挽回他的心，只得允许他自便了。

从此姚广孝便隐居于北平庆寿寺，再不过问朝中事务。永乐十六年，姚广孝八十四岁，他病倒了。在他病重期间，成祖曾两次来看望他，对他抚慰备至，为他派来了太医，并赐给他一只金唾盂。姚广孝临终时，成祖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交待，他不肯说。成祖一再逼问他，他说：“出家之人，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事情呢？”成祖强要他说，于是他不得已，向成祖请求说：“泐季潭（即僧博洽）久囚在狱中，请赦免他吧。”泐季潭本是建文帝的主录僧。成

祖攻克京城后，寻找建文帝的下落。有人告密说渤海季潭知道建文帝的下落，于是成祖便把他抓了起来，一囚禁就是十多年，也终于未能搞清建文帝的下落。这次经姚广孝请求，成祖当即下令释放了渤海季潭。姚广孝顿首谢恩。此后没过几天，姚广孝便与世长辞了。

对于姚广孝的死，成祖甚为震悼，并为之罢朝二日。成祖命官吏为他治丧，用僧礼安葬，并追赠他“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国柱、荣国公”^①的称号，赐谥号为“恭靖”。成祖还亲自为他撰写碑文，以表彰他的功绩。

姚广孝是个博学多才的人，诗和文章都写得很好，曾得到宋濂等学者的称赞。成祖即帝位后，他还曾担任监修，重修了《太祖实录》，又同解缙等纂修了《永乐大典》。晚年他还曾撰《逃虚子集》，都是佛家语。又撰有《道余录》一书，据说此书专诋程朱之学，因此颇为当时儒者所非。姚广孝有个朋友，名叫张洪，曾经得到过姚广孝很多帮助。张洪曾说：“少师待我甚厚，我无法报答，因此只要见到《道余录》，我就把他购来烧掉。”张洪的目的在于为姚广孝掩过，怕他因为这部书而遗骂于后人，但他实在是多此一举，且在程朱理学盛行的明代而敢于对之提出批评，正是姚广孝的不同凡响处。

姚广孝死后，被赐葬在北京房山县东北。

^① 《明史·姚广孝传》。

朱載堉



抛却亲王尊贵位，让国退隐做学问 ——郑世子朱载堉

· 范沛滩 ·

（一）显赫的家族

朱载堉，字伯勤，号句曲山人，又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九峰山人。明朝嘉靖十五年（1536年）诞生在河南怀庆府城（今河南沁阳市）的郑王府内。关于他的生

明朝建立伊始，太祖朱元璋鉴于“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①而灭亡的教训及历史的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择名城大都，豫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目的在于“外卫边陲，内资夹辅”^②。分封诸子为藩王，逐渐形成一套完整、严密的制度。这一制度与明王朝相始终。

一 太祖朱元璋——二 惠宗 朱允炆……

三 成祖 朱棣——四 仁宗 朱高炽——

五 宣宗 朱瞻基——六 ……

1 郑靖王 朱瞻埈——2 郑简王 朱祁瑑——

世子 朱见溢——3 郑康王 朱祐枋——

盟津王 朱见潁——朱祐檣——朱厚炜——

①东垣王 朱见潁——4 郑懿王 朱祐檣——5 郑恭王 朱厚烷——

②东垣荣昭王厚烜——

郑端清世子 朱载堉——郑世子 朱翊錫——

郑世子 朱翊欽——⑦东垣王 朱常洁——

③东垣康僖王朱载堉——④东垣恭懿王 翊钺——⑤东垣王 朱常漾——

⑧东垣王 朱由彬——

6 郑王 朱载堉——7 郑王 朱翊钟——

①② 《明会要·帝系四》。

二月十七日生王，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十一日封郑王，宣德四年（1429年）之国陕西凤翔府（今属陕西），正统八年（1443年）诏迁河南怀庆府（今河南沁阳市），留京邸，明年之国。郑靖王朱瞻埈成化二年（1466年）薨，嫡长子朱祁鐭以成化四年嗣，是为简王；简王弘治八年（1495年）薨，而嫡长子世子朱见滋已于成化十五年薨，遂由见滋长子朱祐杓以弘治十年嗣，是为康王；康王正德二年（1507年）薨，无子，遂由简王庶四子、东垣王朱见湏嫡一子朱祐樸以正德四年嗣，是为懿王；懿王于正德十六年薨，嫡四子朱厚烷以嘉靖六年（1527年）嗣，是为恭王。第五代郑王——恭王朱厚烷就是朱载堉的父亲。

于此可知，朱载堉出身皇族，曾祖父朱见湏在成化十年被封为东垣郡王，祖父朱祐樸在正德四年嗣郑封，为亲王。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①。朱载堉的家族是明代最显赫的家族。

（二）不幸的遭遇

从朱载堉呱呱堕地开始的二十五年中，他曾经历了丧母和父亲被废、被禁两次最大不幸。

朱载堉的母亲高氏，出身于本地大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因为疾病，“生公二年”，便辞世而去。处在王子地位的朱载堉，虽然生活条件优越，四周又有保姆、侍女的照料，但失去母爱，却

^① 《明史·诸王一》。下引此书不另注。

给幼年朱载堉的心灵蒙上了阴影。没有真正母亲的孩子，其孤独感是可想而知的。这对日后朱载堉性格的形成和走向学术研究的隐居之路有着一定的关系。

嘉靖二十五年，年满十周岁的朱载堉，按照明代有关藩王的制度，被授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成为第六代郑王的合法继承人。

嘉靖二十九年，朱载堉十五岁的时候，却发生了父亲朱厚烷被废、被监禁的事情。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第二代郑王简王朱祁鐸有十二个儿子，嫡长子朱见滋虽然在成化七年被封为世子，但是见滋的母亲韩妃，并不为简王朱祁鐸所尊重和喜爱。朱见滋出于对母亲的爱和个人世子地位的牢固与否的思虑，心中一直闷闷不乐，结果忧悒成疾，于成化十五年死去。弘治八年，简王卒，世子见滋之子康王朱祐杓嗣。正德二年，康王卒，无子。遵照明代“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以及“兄终弟及”^①等王位继承制度，按郑宗之序，简王第三子盟津王朱见瀛之子朱祐棖应当嗣郑封。然而，在简王朱祁鐸已有十子的时候，嫡长子见滋的母亲不为简王喜爱，而庶三子见瀛的母亲却倍受简王的宠爱。在这种情况下，朱见瀛的母亲利欲熏心，就谋划夺嫡子见滋的地位，取而代之，以便将来登上郑王的宝座。但在明代王位继承制度的严格约束下，见瀛母子的阴谋难以得逞，结果，她将世子的金册偷去。简王知道此事后，非常着急，赶紧向见瀛母索取。见瀛母不仅不给，反而肆无忌惮地做一些不法的事情。简王没有办法阻止见瀛母子的不法行为，就将此事上奏宪宗皇帝。成化十二年，朝廷以罪降盟津

^① 见拙作《略论明代的皇位继承》，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

王朱见瀛为庶人，并发配高墙（明代监禁皇族的地方）。虽然，朱见瀛于弘治元年被释放，回到怀庆府，并且在弘治四年死去，但是，子孙俱为庶人。这样，盟津王一支就没有了嗣郑封的资格。最后，由简王庶四子东垣王朱见湏（弘治十六年卒）之子朱祐樸嗣封，是为第四代郑王——懿王。

朱载堉的父亲第五代郑王——恭王朱厚烷是懿王的嫡四子，于嘉靖六年袭封。明世宗朱厚熜幸承天（今湖北钟祥），厚烷曾迎谒于新乡（今属河南）。世宗见到厚烷十分高兴，给他加禄三百石。可见，世宗对厚烷的印象极好。

花无百日红，人难百日好。帝王的妄自尊大、独断专行和不善识别好坏等致命弱点，使得厚烷遭到极大不幸。

明世宗是在武宗死后由藩王继承皇位的。在世宗继位的最初年代，明朝社会安定，没有兵革之兴。在地主阶级贪婪本质的驱使和世宗因纵欲过度而身体欠佳的情况下，他为了自己威福任情，锦衣玉食的腐朽生活，强烈感到长寿的重要，幻想通过方术得到长生、成为神仙。明世宗即位后不久，就在崔文等人的引诱下，好方术鬼神之事，几乎天天斋醮，连乾清宫、坤宁宫等宫室及五花宫两暖阁都设有斋坛。世宗崇信方士邵元节这个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不仅把他征召入京，并且被封为真人，敕建真人府，赐其孙为太常丞、曾孙太常博士。^① 每年给邵元节俸禄百石，拨调官兵四十人为他服务，赐给庄田三十顷，并免其租。这样，嘉靖皇帝还觉得不够，于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又赐给他礼部尚书的头衔。世宗信用方术，也耗费了大量财物。有一年，宫中用于斋醮的黄蜡即达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各种香料十万斤。有时，一

① 太常官员，寺丞正六品，博士正七品。太常寺掌祭祀礼乐之事。

斋醮蔬食的费用，就花费一万八千钱。对于大臣们的反对，世宗的答复是，下狱拷掠或重杖而死。

朱载堉的父亲朱厚烷，是一个性格刚毅，正直无私，不阿谀奉迎，不愿随波逐流的人。当世宗沉溺于方术神鬼，一些官员迎合旨意，大肆撰写“青词”^①，供献“道士”，呈奉“仙术”和诸王争相遣使进香的时候，郑王朱厚烷不但不遣使进香，而且敢于面对现实，毫无顾忌地挺身而出，于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上书，请嘉靖皇帝修德讲文，并进《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四箴，《演连珠》十章，规劝皇帝不要崇信方术鬼神，不要为进行斋醮活动大搞土木建筑。语言坦率，感情真挚。不料，世宗看后，龙颜大怒，竟下郑府使者于狱，斥责朱厚烷是谤讪皇帝的人。

盟津王朱见瀛之子朱祐樞，在恭王朱厚烷未遭世宗斥责前，曾希望恢复早年被革去的爵位，因为种种原因，朱厚烷没有将此事上奏皇帝，所以祐樞对厚烷非常怨恨，一直伺机报复。此时，祐樞便想利用世宗对厚烷的不满情绪，来达到他陷害厚烷，恢复郡王爵位，甚至代厚烷为郑王的企图。“我已经是一个庶人了。告准了，我可以一步登天，达到梦寐以求的目的；若告不准，我不过仍为一个庶人罢了。而对被告者说来，万一他失败，就一切都完了。”这是朱祐樞当时的想法，也是所有像他一样企图达到高官厚禄、有个人野心的人的心理。

嘉靖二十九年，庶人朱祐樞收集并捏造了四十条罪状，以叛逆罪上告。世宗得到报告后，立即诏驸马、中官等进行调查核实。经过不多时日的工作，驸马对上告的四十条罪状一一作了甄别。结

① 青词：在道士斋醮仪式上，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因用殊笔写在青藤纸上，故称“青词”，也称“绿章”。

果证明，四十条罪状中有关叛逆的事，均为朱祐樑诬陷不实之词，然而违反规定治宫室名号拟乘輿的事却是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对郑王朱厚烷斥责一番也就算了。心胸狭窄的嘉靖皇帝对两年前郑王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他十分恼怒地对朝臣说道：“朱厚烷指责朕的行为，在怀庆郑府内骄傲无礼，这就是大逆不道的表现”。皇帝既然表示严惩，朝臣也只有迎合他的心理，议定：削郑王朱厚烷爵，锢之风阳高墙。

在这突如其来的事变面前，少年王子朱载堉有点惊慌失措了。当载堉的父亲被废，徙凤阳，朝廷派恭顺侯吴继爵为正使，奉皇帝的命令封朱载堉为世子，并摄郑国事的时候，朱载堉起初不知来使的用意，因而感到极为恐惧。他经过认真思考，并与郑府官员商量，曾采用当时通行的对朝廷命官饷（音 jìn，尽。临别时赠送的财物）重币的办法，以求达到保父亲和保家庭平安的目的。

虽然在这次大事变中，皇帝仅罪及厚烷一人，朱载堉幸保封爵，没有受到株连，但是，这一大事变对朱载堉的影响是至深的，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他的人生旅途上都起到转折的作用。

（三）坚决“让国”

惊恐过后，朱载堉开始思索了。开始改变他的固有生活方式了。

他首先想到的是父亲为什么无罪而被锢之高墙；作为一个正直、刚毅、关心国家命运、前途的世子，是应该发扬父亲的优秀品德呢，还是为保封爵，得过且过，置朝政于不顾呢？而父亲的行为，又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怎样的后果，家族内部的权位之争，金

钱之欲，必然造成家族的损伤。盟津、东垣两支互讦的结果，还不是盟津父子的被废与厚烷的削爵、被禁吗？……这一连串的问题，需要圆满的解答，而对一位十五岁的少年世子来说一时又难以解答。这一切疑难，使他久久不能自安。

作为郑世子，朱载堉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忠、孝是传统道德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如今父亲远离亲人并被监禁起来，笃学有至性的儿子，当然不应也不能再如往日那样住在紫禁城内，锦衣玉食，逍遥自在，不思父辈的铁窗之苦了。

嘉靖二十九年，朱厚烷离开怀庆不久后，朱载堉在郑王府宫门外筑起了一个土房子，屋里没有豪华的陈设，只有一张陈旧的桌子和几条板凳，炕上铺着干草和一条席子，过起了“卧薪尝胆”式的生活。每天，他很早就起床，独自一人到外面散步。有时，他停步与来往的行人交谈。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的人，并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建立了友谊，进而了解到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这一切，是任何一个生活在王府小天地中的王子得不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经验的丰富，朱载堉的思想也逐渐成熟了，对社会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了。他使自己真实地活跃在暴发户、破落户、地痞、无赖以及普通知识分子和穷苦人之中，并且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他在一首《交情可叹》中，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变动以及嘉靖、万历时期人与人关系的自私和虚伪。

叹世情，其实可笑，交朋友，尽都是虚情假套。如今人，哪有刘备关张，也没有雷陈管鲍；假怀肺腑相交，酒和肉常吃才好。有钱时，今日与张三哥贺喜温居，明日与李四弟祝寿送号，怕只怕运蹇时乖，忘却了小塘，认不得少交。听着！衣残帽破，正眼不瞧；听着！与他作揖，他便说：“不劳！不

劳!”佯常去了。^①

朱载堉的思想在这一阶段升华了，为他日后摆脱皇室正统思想的束缚打开死结，为他日后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世宗崩于乾清宫。不久，穆宗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隆庆元年（1567年），大赦天下。郑王朱厚烷就是在这次大赦中释放的。

隆庆元年，张瀚奉恩旨释郑王厚烷，恢复王爵，随即回到怀庆郑王府。穆宗深知厚烷非罪见系近二十年，于是给郑王增禄四百石。朱厚烷本来就十分简朴，又经过这次磨难，更使他在各方面小心谨慎，严格要求自己。郑王厚烷布衣蔬食至老。

隆庆二年，朱载堉搬出土屋，重新回到郑王府居住。从当时的情况来说，主要原因：一是父亲朱厚烷已恢复王爵，住进王府便于早晚请安和侍奉；二是父亲对乐律有一定研究，而个人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住进王府便于随时讨论、商榷问题。

朱厚烷、朱载堉父子的潜心研究音乐，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父子俩甚至为一个问题而通宵达旦地各抒己见或互相说服对方。无论在赤日炎炎的夏季，还是在北风呼啸的冬日，他们都在奋力疾书。

万历九年（1581年），朱载堉和父亲均因勤奋过度，积劳成疾。这场疾病不但时间拖得较长，同时也较严重。父子俩连朝祭行礼都不便参加，不得不向朝廷请示，请以世孙翊锡代行。过了一段时间，厚烷虽然久病痊愈，但对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其后果是严重的。万历十九年，郑恭王朱厚烷终因用脑过度，身体虚

① 朱载堉：《醒世词》，清末石印本。

弱，与世长辞了。厚烷的死，在精神上给朱载堉以很大的打击，在事业上给朱载堉以一定的影响。

按照常理，厚烷死后的三年之内，朱载堉应当袭承郑王爵位。但是，他一改以往的习惯，决心将承袭郑王嗣封的事由东垣王一支归还盟津。朱载堉在上疏中写道：“按郑王这一宗的次序，盟津一支为长，东垣一支为次。盟津前王朱见瀛，既已锡谥复爵了，那么，郑王的爵位，也就应该归盟津。”紧接着，朱载堉又第二次、第三次上疏，陈述同一的观点。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礼臣们的同意和万历皇帝的批准。礼臣们的观点也是有道理的，他们说：“载堉虽然深执让节，然而东垣一支嗣郑王爵已经三世了，没有中间再更换的道理。载堉因为身体的原因或其他一些原因，不愿嗣位，可以让载堉的儿子翊锡嗣。”朱载堉对礼臣们的答复当然十分不满，仍旧继续上奏。

万历三十四年，朱载堉经过十五年七次上疏恳辞之后，终于获得了万历皇帝的批准，将郑王爵让给了载堉。朱载堉以盟津王孙朱厚炜之子的身份承袭了第六代郑王的爵位。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位亲王不希罕尊贵的地位，不要丰厚的奉禄，心甘情愿地将这一切送给别人，甚至是自己家庭仇敌的后代，确实是千载难逢、难能可贵的事。万历皇帝对朱载堉的让国高风十分赞扬，当然，朱载堉的让国事件也给皇上脸上增添了光彩。万历三十四年，皇帝在圣旨上写道：“朱载堉真心实意要求辞去王爵，这种让国高风，千古罕见，朕感到非常高兴，应该大力宣扬。为了对载堉旌奖，特给禄建坊，以彰天潢（指宗室、皇族）之美。”万历皇帝敕建的玉音坊上写道：“让国高风”和“万历丙午岁为郑世子载堉建”两行字。

朱载堉把东垣一支承继郑王爵位的权利让给盟津一支，这对

盟津来说是件大好事，但对东垣来说却是财、权两失的事，必然又一次爆发家族内部的争斗。为了说明这次争斗的原因，还得从东垣王一支承继郑王爵说起。

郑康王卒，无子，遂由东垣王朱见湏子朱祐樸承袭第四代郑王，祐樸即郑懿王。这样，懿王诸子除一人将来为郑王外，另有一子则为郡王。其时，懿王嫡四子为王世子，懿王庶二子朱厚炯于正德十二年准袭郡王，是为东垣荣昭王。朱载堉的让国，就标志着载堉的子孙将世世代代承袭东垣王封，朱厚炯的子孙将从此不能再承袭东垣王封，而授镇国将军等。特别是当时的东垣王朱常濬，万历二十五年才以镇国将军改封长子，其父朱翊钫死后即可袭封东垣王。看来，朱载堉让国的直接“受害者”便是常濬及其子孙了。至是朱常濬执意不肯让，并上书抵毁载堉是大奸，请求立即更正。礼部侍郎李廷机对常濬的上书进行了批驳，他说：

“朱载堉的请求是仁的表现，朝廷对此事的处理也是非常妥当的。朱常濬的上疏是不对的，因为，常濬在疏中称见瀛三世因罪废为庶人，是错误的。朱见瀛先前虽然被废禁，但后来已奉诏洗掉罪名，而且追封赐谥，当然是王了，怎么还能说是庶人呢？这是一。其二，朱载堉从万历十九年上疏开始，共上七疏，经过十五年之久。在这十五年中，没有一人上疏表示不赞成，如今，皇上已降圣旨，而常濬突然上疏表示反对，这也是错误的。其三，朱翊钫是常濬的父亲，翊钫已表示同意，而常濬竟说不是出于父亲的意思，这是任意说谎。其四，朱常濬上疏不是在父亲存世之日，而是在父亲去世之后，这也是不对的。其五，郑府诸王、诸宗都认为载堉这样做是正确的，唯独常濬一人认为不对，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六，朱载堉生活简朴，注意个人的修养，而常濬对其进行攻击，这是与朝廷上下对载堉的看法违背的。”

虽然在这次争斗中朱载堉取得胜利，得到皇帝和朝臣的赞赏。但常藩仍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实惠：万历三十七年袭封东垣王位，东垣所有，载堉也全部让给了朱常藩。朱载堉让国让爵的高风，令后人肃然起敬！

（四）退隐著述

朱载堉让国后，就满心欢喜地离开了怀庆城内的郑王府，在山水优美的怀庆府城郊苏门山，选择一片幽静秀丽的去处，建造了一座小巧玲珑特别雅致的院落。墙内外有各种树木环绕，庭院中遍植无数花草，既整洁清静，又显得充满生机。他在这宁静的山野中，专心研究学问。每当感觉疲劳的时候，朱载堉就走出书房，或漫步于花间草丛，或凝视百花怒放……这一切，不但把身体的疲劳一扫而去，同时也激励自己，加紧工作。有时，他也和友人在花间月下散步、畅谈。

不求玉带挂金鱼，甘分向烟波做钓徒。绝尘世，远世俗，
扁舟独驾水云居。^①

被褐出闾闾，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②

是人们对隐士生活的写照。让国后的朱载堉过的是真正的中国古代隐士生活。

① 沈和：《赏花时·潇湘八景》。

② 左思：《咏史》。

中国古代的隐士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也有着共同的一些特性。譬如说，他们看不惯，也不愿意在官场角逐；他们高兴隐居山野，或著书立说，或在山水之游、琴棋书画之娱中消磨时光。他们保持着独立的人格，正直的节操。他们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朱载堉的隐士生活，认真地说来不是开始于让国，而是始于嘉靖二十九年父亲被废之后。那时，他已离开王宫，居住土屋，睡草茎，并专心攻读天文、律算和音乐了。

中国古代的隐士中，虽然有一些人是借隐以待“明主”，等候时机的到来，以求飞黄腾达，成为名利场上的胜利者。但，相当一部分隐士却是对于权利之争最为厌恶。他们要的是人格的理想，最憎恨那些为“五斗米折腰”，奉迎拍马，甚至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不顾一切的人。对那些只图虚名，不务实学的人也看他不起。作为王子，甚至是未来的亲王，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在学术上也不能有所成就，这是朱元璋分封制度对朱氏家族绝大部分成员思想的禁锢，聪明才智的扼杀。宗室中再有才能的人，也只能碌碌无为，虚度年华。朱载堉不愿作一名庸庸碌碌的王子。另外，皇族内部因争权而引起的残杀事件也时有发生，萧墙之祸防不胜防。朱载堉是一位善良的人。他对父亲的“非罪见系”一直心有余悸；他更顾虑自己或子孙再有“天降的祸事”。朱载堉之所以隐居，起初，可能是为了避祸，表示自己的孝道，而表现出的不自觉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的成熟，对社会认识的深刻，要求隐居的思想和行为，便成为自觉自愿的了。当然，这与他在学术上取得的一个又一个丰硕成果也有一定的关系。

嘉靖三十九年，朱载堉在音乐研究中的大型处女作《瑟谱》，写成问世了。在《瑟谱小序》中，他自称“狂生”，署名为“山阳酒狂仙客”。

朱厚烷复爵还国后，父子俩合作撰写了《操缦》、《旋宫》等谱。朱载堉曾在《进律书奏疏》中说：“往年臣父在凤阳的时候，惩戒（惩戒、惩治）之余，以琴书自适，撰写了《操缦谱藁》。返回怀庆后，将书稿让儿臣看，并且指示儿臣说：‘你应该对这本书再加工润色，为我完成这一著作，以便让人们阅读’。同时，还对一些问题的修改，提出具体、详细的意见。我不仅博采古今先儒的旧说和最新的发现，而且也提出个人的看法，著成琴瑟《操缦》、《旋宫》等谱。臣父看后，颇以为然”。这便是《乐律全书》中的《操缦古乐谱》。

从嘉靖三十九年到万历九年，朱载堉除完成上述两书的写作外，还写成了《律历融通》、《律学新说》、《律吕精义》诸书的初稿。

万历二十三年六月以前，朱载堉又写成了《律历融通》四卷附《音义》一卷、《圣寿万年历》二卷、《万年历备考》三卷等共十册。万历二十四年，经过润色、增删，《律吕精义》一书定稿。从万历二十三年到三十四年的十一年间，亦即朱载堉让国前，他是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对自己著作的修改、加工以及雕板、印刷、装订等项工作中。万历三十四年八月，朱载堉特派郑府长史进京，送去刚刚印刷好的《乐律全书》五部。神宗皇帝看后说：“载堉留心乐律，深可嘉尚”^①。并将五部书（一正本，四副本）中的四部副本，一部送礼部，一部送国子监，一部送翰林院，一部送文渊阁保管收藏。

由上可见，朱载堉在父亲禁锢凤阳和让国前的几十年里，一直在从事学术的研究和著作的撰写，他一天也没有承袭郑王的爵

① 据《明神宗实录》。

位。同样，朱载堉也没有参加到嘉万时期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也没有使家族内部的争斗或矛盾发生激化。无论从思想上，抑或行动上，朱载堉都退隐了。

让国后的朱载堉，已经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时的他，才算过上了真正的隐士生活。平时在家著书立说，一旦外出访友，他就坐上四人抬的竹兜，或与友人谈笑于室中，或尽兴于山野，自号句曲山人。他不仅思想上完全退隐了，连行动也俨然一隐士。当时，他曾写了一首《平生愿》，诗中说：

再休提无钱，再休提无权，一笔都勾断。自古人生七十难，苦心劳力熬头汉。子陵垂钓，留侯归山，他二人枉高见。种几亩薄田，栖茅屋半间，就是咱平生愿。^①

这首诗，充分地代表了作者的隐居思想。

当然，这个时期的朱明王朝，也已显现出衰败、灭亡的迹象。作为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的朱载堉，他具有科学家的精细、文学家的敏锐、思想家的深刻。他对于明末政局的不可收拾，也是有所觉察的。《池北偶谈》记有这样一件事：郑府内有一柜，朱载堉亲自动手加安锁的钮，将其封闭起来。每年他总是在柜子上加贴一张封条。他告诉子孙说：“平日谁也不能打开，看里面是什么。一旦遇到急事，才可以打开。”在他孙子寿平王时，正遇上河北的农民大起义，义军直接威胁着怀庆城内的皇族。在这紧急的关头，寿平王赶紧打开柜子，只见内有破布衫五，一阔大，四稍窄小。寿平王身体雄伟，他的四个弟弟身体短小，于是，穿窄衣而逃。朱载堉的隐居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他的上述做法，也反映了他时

① 朱载堉：《醒世词》。

时为子孙考虑出路和让国的一点苦衷。

在朱载堉七十岁到七十五岁这段时期内，他更感到时间的可贵，他写作亦更勤了。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即万历三十八年，还完成了《嘉量算经》三卷和《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辨惑》二书。这表现了一位七十五岁老人对事业的奉献精神 and 刚毅、坚强的品格。

万历三十九年，朱载堉与世长辞，享年七十有六。这年十二月己卯（1612年1月16日），神宗皇帝“赐郑世子载堉，谥端清”^①。

朱载堉一生著作甚丰，主要著作是《乐律全书》。全书共收：《律学新说》四卷，《乐学新学》（不分卷），《算学新说》（不分卷），《律吕精义》内篇十卷与外篇十卷，共二十卷，《操缦古乐谱》（不分卷），《旋宫合乐谱》（不分卷），《乡饮诗乐谱》六卷，《六代小舞谱》（不分卷），《小舞乡乐谱》（不分卷），《二佾缀兆图》（不分卷），《灵星小舞谱》（不分卷），《圣寿万年历》二卷，《万年历备考》三卷，《律历融通》四卷附《音义》一卷，总共十四部四十八卷。在书中他创造了十二平均律的理论，把一个音阶分为十二个相等的半音，使各相邻的两律之间的振动数之比完全相等，从而可以自如转调。这项发明使千余年来困扰中外律学家的十二律不能周而复始的难题，得到彻底解决。人们把十二平均律作为标准音调，使世界音乐文化产生了质的飞跃，近代键盘乐器、竖琴等均依此定律。

朱载堉既是位头脑冷静的科学家，又是洋溢激情的艺术家，还是位愤世疾俗的诗人、出色的乐器制造家。他的《乐律全书》以

^① 《明神宗实录》卷490。

及《嘉星算经》、《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辨惑》、《瑟谱》、《圜方勾股图解》、《醒世词》等著作，涉及音律学、音乐学、历法、数学和珠算、计量学、乐器制造、乐谱和舞谱、物理学、文学和绘画等丰富内容。他的哲学思想充满了注重实践的观念，强调“道”与“器”的统一；而《黄莺儿》、《山坡羊》等词以幽默辛辣的风格，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贫富之间的尖锐对立，语言通俗畅达，脍炙人口，如“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扶都是假”；“劝人没钱休投亲，若去投亲贱了身”等，深得民间的喜爱。

朱载堉的多才多艺和发明十二平均律的杰出贡献，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被称作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

孙奇逢



一代儒宗名隐孙奇逢

· 郑永福 ·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清初迁居河南辉县（今属河南）苏门山下夏峰村，学者称之为夏峰先生。孙奇逢生于明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1585年1月14日），卒于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675年5月15日），终年九十二岁。奇逢一生曾几度濒于绝境又幸免于难，故晚年又自号岁寒老人。他于

明朝万历二十八年中举，明清两朝曾先后十一次征聘授官，但奇逢一概力辞不就，时人尊称“征君”。奇逢晚年在苏门山下隐居二十余年，躬耕自食，授徒讲学，弟子甚多。当时直隶、河南一带的学者，多出自奇逢之门。著名的学者汤斌、魏象枢等，也是他的门人。清初，北方学者奉奇逢为泰山北斗，与黄宗羲、李颀并称“三大儒”，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一代儒宗。

（一）生长儒门，冒死犯难

孙奇逢书香门第出身。他的祖父是明嘉靖时的举人，曾任沭阳（今属江苏）令、河东盐运司运判。奇逢的祖母是明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的再从侄女，曾从杨继盛宦游十余年。杨继盛生性耿直，不畏权奸，因为敢于上书弹劾权臣仇鸾和严嵩而朝野闻名，后来遭受迫害冤死狱中。杨继盛曾写下了著名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①他的事迹与他的诗句广为流传，为人称颂不已。到明朝万历年间，当局才为其平反昭雪。孙奇逢的父亲是一位秀才，与杨继盛之子杨补庭为世谊。奇逢年幼时，祖母时时以先人的言行教诲他，父亲也常常带他到杨补庭家作客。家庭环境的影响，使奇逢自幼萌发了重气节、主正义、反邪恶的思想念头。曾有人突然向年幼的奇逢发问：“如果城池被敌人围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你将怎样对待？”奇逢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与城池共存之。”闻者无不惊奇。

孙奇逢十四岁入学，习阳明之学，又以程朱理学相砥砺。十

① 《清初名儒孙奇逢》，《河北地方志》1988年3期。

七岁考中举人后，越发对古文经学不屑一顾。他认为训诂、考据、词章之学对社会没有什么好处。他与同年进学的鹿善继很要好，两人共同切磋学问，“以圣贤相期许”。^①为了体验理学的内省功夫，俩人常在一个小屋子里静坐，反躬自省。但鹿善继性格与奇逢又不一样，感情激越，刚直不阿，对这种和尚打坐式的学习方法颇不以为然。鹿善继常对奇逢说，目前政局弊窦丛生，我们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应当向杨继盛老先生那样去做。奇逢却认为善继气太盛，不适于作学问。作学问不应当在客观环境及个人遭际上打圈子，还是应当内求自省。俩人曾为此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但感情并没有因此受到伤害。这时期奇逢家中贫困，有时连一日三餐也难以继。奇逢同善继一起从早晨学习到太阳偏西，有时只能吃一碗用豆面做的粥。但这他已经心满意足了，奇逢曾说，在忧患困囿之中，才能更深入地体会所谓心性本原。

万历四十一年，鹿善继考中进士，历任知县、御史、户部主事。孙奇逢却年年科考，年年落第，科场上很不得志。后来他的祖母、父亲接连去世，奇逢恪守儒学教义，结草庐守墓达六年之久。早在万历三十九年的春天，奇逢曾赴京城，一面以教书糊口，一面准备应试，两年后虽然没有考中，思想却起了变化。在京期间，他进一步耳闻目睹了朝廷的腐败，官场上的黑暗，尤对宦官弄权陷害忠良恨之入骨。但他认为这个世道之所以坏透了，是因为人心不仁，即人心大大地坏了的缘故。从此，他无意再走科举道路，决心以恢复封建的纲常名教为己任。

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年），阉党魏忠贤擅专朝政，滥杀政敌。复社领袖左光斗、魏大中等六人被诬陷下狱。已削职还乡

^① 《清史稿》卷480，儒林一，孙奇逢条。

的周顺昌也被阉党假借皇帝的命令逮捕下狱。与之有牵连者被施刑、斩首者多人。孙奇逢最后一次赴京应试时，就结识了在吏部供职的周顺昌，后经好友鹿善继的引荐，认识了时任左金都御史左光斗。左光斗等人入狱后，奇逢妥善地安顿好了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的子弟。之后变卖家产，东奔西走，营救左光斗等人。

当时，高阳（今属河北）人孙承宗任兵部尚书，督师山海关抵御清军入犯，鹿善继在其手下赞画，孙奇逢曾应邀到军中参观。孙承宗有意疏请奇逢赞画，奇逢借故辞归。这时，孙奇逢想到了对魏忠贤一伙深为不满的孙承宗，通过鹿善继请求孙承宗帮忙。奇逢在给孙承宗的信中激动地说：“左、魏诸君子清风大节，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独以善类之宗，直臣之首，横被奇冤，自非有胸无心，谁不扼腕？”^①孙承宗接此书后，决定向皇帝面陈机务，除掉魏忠贤。魏忠贤听此消息后，半夜里围绕御床哭泣，哀求皇帝阻止孙承宗。明熹宗听说孙承宗要动兵清君侧，飞檄三道，严加制止。孙奇逢与好友鹿善继的父亲鹿正及新城（今山东桓台县）张果中冒死犯难，在京畿一带设立募捐箱，公开向“愿输金救左督学者”募捐。于是，向箱中投钱者云集，共收得白银数千两。当奇逢带着这些银两进北京时，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已惨死在东厂特务的廷杖之下。奇逢结集友人同志，将左、魏等人遗骸赎出，举幡击鼓，善加安葬。时阉党之势如火方炽，容城离京师又不过二百里，人们都为奇逢捏一把汗，但奇逢毫不畏惧。他站在风萧萧兮的易水河畔，长歌当哭，祭奠亡灵。人们十分钦佩奇逢等人的高风亮节，称奇逢、鹿正、张果中为“范阳三烈士”。后

^① 《夏峰先生集》卷1，《上孙愷阳相公书》。

有人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奇逢而后，其风再起。

崇祯九年（1636年），清兵入逼北京，南下保定，鹿善继战死在定兴（今属河北）城内。孙奇逢号令士民死守容城，竟使清兵两千余人马七日之久而不能攻下。之后，奇逢率族人数百家迁到了百里外易州的五公山，结茅筑寨于双峰，凭借天险御敌。奇逢闻警则入山战守，无事则居城讲学。其间，明朝的地方官交章论荐，多次征聘，奇逢皆辞而不就，而于扰攘之中，弦诵不辍。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孙奇逢闻讯老泪纵横，对农民起义军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李自成曾派新任县令带着诏书诚聘奇逢，奇逢正叹大明天运不济，哪肯应聘。一个多月后，大清皇帝在北京皇宫就位，无可奈何花落去，奇逢剃发易装，成了大清朝的顺民。顺治初年，巡抚柳寅东、侍郎刘余佑先后以人材荐举朝廷，祭酒薛所蕴也向朝廷陈其学行，以其比之元代的许衡、吴澄，举荐奇逢做官。奇逢心念大明，岂肯就任，一概以有病在身而力辞。

（二）苏门归隐，设帐讲学

清朝开国伊始，为维护和扩大满族贵族的特权，支持其疯狂地掠夺土地。顺治三年（1646年），圈地之风殃及了直隶容城。孙奇逢虽屡承朝廷诏聘的“恩宠”，但其田产也不能免遭圈占的厄运。在武力的驱赶之下，已是古稀之年的孙奇逢不得不拉家带口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一路上，他感慨万端地对孩子们说，二十年前我的好友茅元仪便劝我迁居，我问其故，元仪说这块土地以后不归你所有了。当时我怎么也不相信，可如今却真的应验了！

奇逢出走后，移居新安县。后又几经迁徙，五年之后，来到河南辉县市的夏峰村定居。夏峰村在辉县市苏门山下，紧靠名泉百泉，山清水秀，地僻幽静，曾是著名学者姚枢、许衡讲学的地方。据当地传说，奇逢乘牛车往辉县途中，遇见一位骑着高头大马的官员由南而北，走到他的车前上下打量，然后问道：“车上坐的老先生尊姓大名？”弟子们告诉他是容城的孙征君。骑马人万般惊喜，翻身下马连连施礼，说：“在下久慕先生大名，不想今日在此得遇，实乃三生有幸，但不知先生要到何处去。”奇逢答道：“只因我老家容城的田产被圈占，无处安身，此次想到苏门山下寻觅一个地方住下来。”那人一听喜出望外，连忙说：“在下有薄田数顷在辉县，约离苏门山十余里，愿赠送给先生。”孙奇逢觉得素不相识，怎么好意思要人家的田产呢，于是一再回绝。不料那个官员说道：“先生您要是不肯收下这份田产，就是看不起我，日后有人知道了这件事，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请先生一定要给我这个面子。”奇逢见来人如此真诚，便收了下来。这个传说有几分真实，已无从考究。也有记载说，夏峰的田庐是当时奇逢的友人马光裕赠送的。不管怎么说，孙奇逢最后是在夏峰村住下来了。

孙奇逢到达夏峰村不久，便盖起了草屋，名之曰“兼山堂”，读书其中。不久又办起了书院，授徒讲学。这一下子，苏门山下沉寂多年的讲学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了。二十多年中，河南、河北的不少青少年到奇逢门下学习。一些学者也慕名前来向奇逢求教，与他切磋学问。上至朝廷的公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拜访夏峰先生者可谓不绝如缕。汤斌等人此时已是一方大员，也专程登门求教，在孙奇逢的指导下编著了《北学编》、《洛学编》等著作，总结宋以后理学发展的历史。著名的学者傅山，也曾专程来夏峰村求奇逢为其母撰写墓志铭，并一起讨论学术。康熙三年

(1664年)，顾炎武也曾到河南访问过孙奇逢。

孙奇逢为人谦和，对来访者均能真诚相待。他见长者言仁，见少者言孝。不论是当官的还是种田的，学问大的还是初学的，奇逢都能有针对性地与之交谈开导，其学术影响波及到江浙一带。当时有不少人以能听奇逢讲学或见上一面感到荣幸。据说有一个人怀抱婴儿来见孙奇逢，他说：“等将来这孩子长大成人后，他可以骄傲地对别人说，我在幼儿时就见过孙先生。”这足见当时人对奇逢仰慕之深。

在苏门夏峰村，奇逢甘居土室，粗茶淡饭，一心问学教书，不敢稍稍涉及时事政治。可万没想到，祸从天降。康熙三年，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严防人们讥讽当局，清廷颁旨严禁野史传播。一时间，宵小争功献媚，讦告之风大起。于是，有的讲历史、论时政的人被逮捕流放，甚至被杀害。在孙奇逢撰写的《甲申大难录》一书里，行文中“野史氏曰”的字样。有人将此事呈报朝廷。这一天，孙奇逢正在友人家作客，传讯之命飞来，在坐诸友人无不大惊失色。孙奇逢强作镇静地说道：“天下事只问有愧无愧，不问有祸无祸”。^①他自认为对清廷无任何越轨行为，便动身赴京城对质。多亏了朝廷中他的门人弟子从中斡旋，车行到半路，祸事即告止息。

经过此次祸事后，孙奇逢更加小心谨慎。讲学著书，绝不出性命义理、纲常名教的圈子，远离政事，尤不敢涉及现实社会问题。其实，孙奇逢入清以后，早已藏锋敛锷。他曾谆谆告诫其弟子说：“时时如临深履薄，便时时康庄乐土也。”^②他的意思是说，

① 《夏峰先生集》年谱，康熙三年甲辰条。

② 《夏峰先生集》卷2，复李松友。

如果你时时刻刻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小心谨慎，那么你便时时平安无事可安居乐业了。到如今，奇逢更是严格按照这一准则行事了。到了晚年，奇逢又跟着雄县的李崧学习《易经》，钻进卦爻中谈玄释道，不问世事，但求祸不及身。康熙十四年四月，奇逢卒于夏峰村。河北、河南的学者予以深切地悼念。

（三）探究理学传统，调和程朱陆王

孙奇逢一生以理学家自处，注重心性修养。他的为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常伦常为实际。奇逢自己曾经说过，我七十岁较六十岁而密，八十功夫较七十而密，九十功夫较八十而密。当然，理学家对自己的要求无非是封建的道德践履，不一定有多重要的意义。但他那么大的年岁了，还执著地研究追求，精神可嘉。

孙奇逢一生著述很多，入清后的三十一年间，有《四书近指》、《理学宗传》等近二十种。《理学宗传》所要传的宗，指的是圣人提出的“理”，即周敦颐所说的“天”，或者是程颢所说的“天理”。天理是理学家的最高哲学范畴，十分古老，本没有什么新奇之处。而孙奇逢的著作中，则要给这个“天理”找出一个自周敦颐起直至明朝末年东林党人顾宪成为止的大宗传统。奇逢选了十一个理学家，作为《理学宗传》的大宗，又从汉朝起找到了“诸儒”一百四十六人。这样以大宗为主诸儒为辅，论述这一时期重要理学家的生平、思想及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虽不甚精确科学，但作为理学的学术发展史，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奇逢在《理学宗传》一书中，强调宗传必须本“天”，不能本

“心”，本心乃是禅学。这实际上是在贬斥陆王心学为禅学了。但是，孙奇逢曾学宗陆王，到了晚年也并不完全尊程朱而退陆王。可以说，孙奇逢是清初程朱、陆王两派调和的首倡者之一。他认为，周敦颐之无欲，二程（程颐、程颢）主敬，朱熹之穷理，陆九渊之本心，王阳明之良知，“皆从浩博中体认精微，所谓殊途而回归，百虑而一致，无非说约之旨耳。”^①也就是说，这些大儒的学说都秉承了孔孟的说教，将“道统”寓于“学统”，里面包含了治国安民的大道理。孙奇逢认为后世学者之所以对程朱、陆王的异同争诉不已，是缺乏融通之见，失去了两学派的原初之旨，才产生了诸多分歧。

孙奇逢的《四书近指》、《书经近旨》及《读易大旨》，是三部经学著作。其中所论进一步发挥了他的理学观点。有些观点迂腐不堪，但也有些不乏积极意义。如他说到《孟子·汤放武伐章》时，肯定了汤武革命、诛杀纣王及臣视君若寇仇的思想。这是明末清初反对君主残暴、重视民众思潮的一种反映。当然，孙奇逢这方面的思想较之同时代的黄宗羲、唐甄等人来说差之甚远，无法同日而语。

孙奇逢身居北国，没有机缘接触启蒙思想，入清后又消极避世，虽曾与顾炎武相识，与黄宗羲通过信，对东林党人表示钦敬，但仍囿于“存天理，去人欲”这个圈子中不能自拔。在不少学者取得巨大成就，市民民主思想已经朦胧出现的情况下，还抱残守缺在酣梦中沉睡，这是很可惜的。

^① 《夏峰先生集》卷4，《重刻四书说约序》。

朱之瑜



以中日文化交流为己任的隐者朱之瑜

· 郑 彤 ·

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1682年3月10日），即日本天和二年四月十七日，一位八十三岁的中国老人在日本江户（今东京）去世。三百年后，即1982年，日本学者和友好人士隆重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人们怀着无限景仰的心情，来到茨城瑞龙山这位老人的墓地凭吊，或到水户市水府明德会彰考馆、茨城县历史馆，瞻仰这位老

人的遗著、手迹、遗物，深沉地怀念这位伟大的学者、教育家、中日文化交流卓然特立的先驱者。这位中国老人，便是明末清初的朱之瑜，人称舜水先生。

（一）授官不就，奔走内外为抗清

朱之瑜，字鲁瑀，流寓日本后以家乡水名取号舜水，后以号行世。舜水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后寄籍于江苏松江。

之瑜的家庭原系世宦之家。其先祖“于皇帝族属为兄，雅不欲以天潢为累，物色屡征，坚卧不赴，遂更姓为‘诸’”。^①所以之瑜生下来姓诸，到祔主入庙，题姓为朱，才恢复了朱姓。舜水的曾祖父朱诏，号守愚，明皇诰赠荣禄大夫。祖父朱执孟，号惠翁，诰赠光禄大夫。舜水的父亲朱正，号定寰，别号位垣，明万历时官至总督漕运军门，但未赴任。死后诰赠光禄大夫，上柱国。

之瑜祖上虽倍受皇帝荣宠，但家境并不富裕。据他自己讲，大明未乱之时，合天下之缙绅，独有他家贫寒。他的曾祖清风两袖，所遗者四海空囊。之瑜八岁时，父亲去世，这个世代簪缨的显赫家族骤然衰败，即便是粗茶淡饭也难以为继。之瑜长兄朱之琦发愤研习兵武，终于天启五年（1625年）考中武进士，任南京神武营总兵。但没过多久，因之琦对魏忠贤阉党深表不满而被削职遣还。直到崇祯时，之琦才被特旨昭雪，授漕运总督，但又值明清易帜，未及上任。之瑜仲兄之瑾考取诸生，但又不幸早夭。两位兄长为振兴家业努力奋斗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舜水。

^① 《朱舜水集》上册，第348页。

之瑜自幼勤奋好学，族人乡党多以公辅相期；先世功名钟鼎的业绩，也吸引着他走科举之路。之瑜曾就学于南明时官至尚书的学者朱永佑等研习六经，于毛诗尤多体会。但时世风云变幻，形势已不允许舜水像他先人那样生活下去。弱冠之年，他见世道日坏，国是日非，慨然绝进仕之怀。崇祯末年，朝政极度混乱，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急剧紧张，后金屡屡兴兵，明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在科场上却一仍旧章，人们猎采词章，埋头咕哔(ché bì, 诵读之意)，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于国是民瘼全然不顾，令人扼腕叹息。针对当时腐败的吏治，之瑜指斥道：“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士大夫为名利奔竞，廉耻丧尽，还晓得什么忠君爱国、出治临民？”他说，“官吏、豪佑腴削肥己，攘臂争首，鱼肉百姓，种种罪恶，罄竹难书！”长兄遭贬，更给之瑜仕途之梦泼了一瓢冷水。入仕的险恶，也使之瑜转而对有利于民生的实务发生兴趣，他开始研究稼穡以至建筑、器物制作等百工技艺。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之瑜在他的几位老师的荐举催促之下，勉强赴京应礼部试。时提督苏、松等处的学政亢炜，推荐之瑜为“文武全才第一名”。之瑜老师吴钟峦称舜水为“开国来第一”。这一年，之瑜以恩贡生贡于礼部。其后，不少显贵慕名延揽舜水入仕，均遭拒绝。之瑜后来自己回忆说：年至四十，欲弃举子业，诸父兄不许。每逢大比，游戏了事。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帝死。四月，清兵入关，五月初三，建元顺治。五月初一日，福王于南京建立南明政权，以次年为弘光元年（1645年）。早在崇祯十六年时，江南总兵、明右军都督府署都督金事方国安征辟之瑜为监纪同知，他辞而不就。南明初建，方国安又向福王推荐之瑜，奉诏特征，他仍不就。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再次奉诏特征，

他还是不就。四月，出于无奈，之瑜“即授”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监镇东伯，旋晋监荆国公方国安军。所谓“即授”，是在家中就家拜官，实际上并不就任。两次奉诏特征、多次授官不就，激怒了南明当局。阁部交章论劾，以“偃蹇不奉朝命，无人臣礼”的罪名下令逮捕朱之瑜。^①之瑜闻讯后，来不及向家人告别，星夜逃往舟山。此后，之瑜奔走流落在浙江、福建沿海及日本、越南、泰国先后达十五年，从事抗清活动。

朱之瑜多次辞官不就，是有原因的。他认为，明王朝的覆亡是由于百官贪污腐败造成的。“颠厦非一木所支，大川岂一人攸济！且救焚当豫筹曲突之先，支柱必无补于栋挠之后”。^②所以他不得不忍情辞逊，并非出于想沽名养高。南明政权建立后，之瑜看到昏庸的弘光帝不过是马士英等一班宵小的傀儡，若应召做官，不仅复明大业无望，还可能以奸臣同党受人唾骂，于是他不顾身家性命力辞不就。

亡命舟山后，之瑜为原明朝江北总兵、拥兵守岛的黄斌卿出谋画策，准备抗清战事。顺治二年五月十六日，清军攻陷南京，弘光帝被俘，之瑜搭船出走日本。当时正值日本实行锁国政策，海禁甚严，不容外国人居留。之瑜不得不于次年夏乘船南归，而当时中国沿海各处战事正紧，无法泊身，只得暂至越南驻足，直到顺治四年春才潜回舟山。

舟山守将黄斌卿承制授舜水昌国县知县，之瑜不受。后黄题请监察御史任之瑜管理屯田事务，亦不受。又聘请之瑜为军前策划，仍不就。当时东南几支抗清力量各拥其主，或唐王，或桂王，

① 《朱舜水集》下册，第654页。

② 《朱舜水集》上册，第375页。

或鲁王，且彼此猜忌，甚或同室操戈。之瑜奔走于几支队伍之间，竭力说服其以抗清大局为重。也就在这时，之瑜先后结交了著名的抗清领袖王翊、黄宗羲、冯京第、张名振等人。当时，号称大岚洞主的王翊聚义于四明山（今浙江宁波市西南）寨。之瑜背着黄斌卿与舟山诸将密定恢复之策，准备向日本借兵，以王翊为主将坚持抗清斗争。恰好这时鲁王派侍郎冯京第乞师日本路过舟山，在之瑜一再敦促下，黄斌卿遣其弟孝卿为副使偕之瑜同往日本。日本国王萨摩答应发兵三千、资助洪武钱数十万。冯京第携钱先期归国，黄孝卿与之瑜滞留日本以待援兵出发。不料黄孝卿在日期间饮酒狎妓，为日本人所看不起，援兵之事也便搁浅。舜水愤而独返，舟行海上，路遇清军水师，用武力威逼船上的人剃发就降。之瑜镇定自若，视死如归。同船的刘文高等七人感其义烈，驾舟突围将他送回舟山。

顺治六年九月，张名振、阮进、王朝先等奉鲁王命杀死黄斌卿。十月，鲁王来到舟山，以张肯堂为东阁大学士，朱永佑为吏部侍郎，王翊为河南道御史。此前之瑜一意韬藏，严禁家人子弟宣露其功名，只称生员。此时因鲁王驻骅舟山，之瑜间与相会，理合开具朝单，恐涉欺君之罪，酌量再三，权称贡生。鲁王对之瑜连次授官，或京或外，或高或低，之瑜不改初衷，一概回绝。见鲁王及一班臣僚多目光短浅、无所作为，之瑜曾一度躬耕于四明山寨之中。

顺治八年二月，张名振杀黄斌卿旧部将王朝先，人心更加涣散，黄宗羲等纷纷出走。六月，之瑜见舟山败势难免，也决计出走。张煌言挚意挽留，说：我们在此，连您都留不住，日本人听到了，也会笑话我等无能。之瑜以海滨无田可耕，坐而靡饷，有负本志，终于离去。月余后，舟山及四明山皆陷，王翊捕后被杀

害。

离开舟山后，之瑜于七月来到越南，旋赴日本。念及复明无望，他想在日本避地久居。他曾写信给长崎镇官，其中云：“惟阁下裁择而转达之执政。或使瑜暂留长崎，编管何所，以取进止；或附船往东京、交趾，以听后命。”^① 无奈当时日本锁国正严，仍不许他居留。他只好等待风起而乘船去越南。期间，五十余岁的朱之瑜因心力交瘁，重病不起，其次子大咸曾前往长崎探视。郑成功得知之瑜的下落后，几次约他回国参加北伐，鲁王也去信希望他尽快回国效力，但此信过了两年才收到。此后数年，为了筹资觅饷，之瑜积极奔走于越南、泰国，在海外苦心经营。顺治九年春夏间在越南，患病甚剧，复归日本。次年上半年在越南，七月去日本。顺治十一年曾再由日本至越南。这一年病情加重。终年呕血。顺治十三年，之瑜欲回国参加抗清斗争，不意奸人作梗，船出海口半月之久而不能行，只好再次折往越南。

顺治十四年正月，之瑜得到鲁王特召之玺书，便准备夏间起风后搭船自越南去日本，然后由日本转归厦门。但不想遭越南供役之难，被迫羁留五十余天。当时，越南王为黎维禔，四年前为其臣莫氏所篡。黎氏为振兴王室，讨伐执政的莫氏，下令遍访汉族知识分子充书记等职。黎氏听说朱之瑜客寓越南之会安，便差人往捕，并将之瑜软禁起来。数天后，之瑜被押送到国王驻地外营砂。国王传见时，文武大臣尽集，持刀环立者数千人，传呼迫切，杀气腾腾。之瑜从容不迫，徐徐步入。差官令其跪拜，他拒绝。差官拉着他的衣袖强按着他跪拜，他挥而脱之。越南国王大怒，令长刀手押出行刑。他毫无顾盼，挥手随行。在囚禁地之外，

^① 《朱舜水集》下册，第664页。

越南人天天杀人，枭首剖腹，制造恐怖气氛，妄图威吓他，使其屈服。但他大义凛然，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充分准备，就连越南的差官也不禁对自己的妻子说：“朱之瑜真是条好汉！”

十五天后，越南来见的各个官员，都对之瑜表示深深的敬意，有的称呼之瑜为“太师”。黎王也为之瑜的言行所折服，改变了态度，致书之瑜，令其仕于越南，并以周公、陈平相期许。之瑜复信表示感谢，但言明：如今中华丧乱，欲委质于贵国，皇天后土所不容。之瑜应邀为黎王撰写了答某将军书，又写了《讨莫氏檄》。檄文笔锋犀利，正气浩然，深得黎王的赞许。黎氏罗致心切，对之瑜优礼以加，还传下命令为之瑜建造府第，令差官去接他的家眷，但被之瑜力拒，他言明：“役毕告归，必不留此！”^①之瑜返回会安，但行动仍不自由，兼以旅舍被盗，资斧荡然，处境极为艰难。他曾致书鲁王和郑成功，请他们向黎王明言索取，以便脱身。

顺治十五年夏，朱之瑜来到日本。后应郑成功之召，在日本友人的资助下回到厦门。第二年五月，郑成功、张煌言率十七万大军北伐。之瑜到厦门后并未见郑成功，六月便随郑军马信部北伐，从崇明岛登陆，克复瓜州、镇江。但自七月初起，马信军内将骄卒惰，纪律涣散。其中余新等一二要人，刚愎贪忌，狙于小胜，不用上命，坐失战机。之瑜身临此境，很有看法，但却未向郑成功、张煌言通报。北伐失败后，之瑜深感愧对郑、张二帅，又不愿剃发降清，决心蹈海全节。当年冬天，朱之瑜怀着复杂的心情，再次登上开往长崎的商船。此后，他流寓日本，再也没有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

① 《朱舜水集》下册，第672页。

（二）客居东瀛，汗青长照寸丹诚

顺治十六年（日本万治二年，1659年），六十岁的朱之瑜在日本长崎登岸了。按照当时日本当局的规定，海舶至长崎后，在冬春间碇泊时其船员及搭客可以登岸暂住，随船出港，谓之曰“戢冬戢春。”^①一过此期，则不许登岸。此时的朱之瑜，孤身一人，谋生乏术，进退维谷。他身无寸丝尺帛，为生活计，也只好混迹于商贩之中，与诸商贾往来挣碗饭钱，间或也以教书度日。他心里明白，夏天一到，他又有循例被遣之虞。这时有日本人劝他为文颂扬长崎镇巡，以博得该官好感而获取居留权，但之瑜断然拒绝。他表示：君子一言不智，丧其终身。献媚取宠、仰人鼻息之事，绝不能干！

在十分困难的关头，日本友人、关西著名学者安东省庵赶来了。安东系之瑜结识多年的老朋友，曾屡有书信往来。安东对之瑜的学问与为人十分钦佩，他请了几位朋友联合署名申请给予朱之瑜居留权。经反复交涉。日本当局破例批准他留居日本。此后，他在日本生活了二十三年，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朱之瑜留居长崎后，处境仍很窘迫。日常生活，主要靠向商船家人及华侨中的亲故借贷来维持。往往是借新债还旧债，一步

① 戢冬戢春：戢（shuāng）同戢（shuāng），系指固定船只的木桩。此句意思是：当时日本政府规定，在冬春两季外来船只到达日本时，因航行季节已过（夏秋当航行季节），可以让船员或搭乘该船的乘客登岸暂住，待船只再行时一起离港。若是夏秋两季来船，船员、搭客则不允许登岸暂住，御完船上的货后，马上随航离日本。这是当时日本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人入内的一种办法。戢冬戢春，成了一句俗话，即乘冬春之时可以上岸暂住。

步地往前挪。他曾想变卖老家的不动产，但终未能成。安东省庵拔刀相助，将自己的俸禄分一半给他，他苦辞不成，只好接纳，俩人感情更加深厚。之瑜念及光复明朝终成泡影，便决计觅数亩之地，抱瓮灌园，从此不交王侯，不涉世趣，只与朋友、学人谈论古人古书，考究疑义，酌酒谈心。其间有一和尚劝他皈依佛门，之瑜严辞拒绝。他说，今日中国普天下都剃头，我若削发为僧，岂不与此类似？我决心留此数茎之发，以见先大夫于九泉。

顺治十八年六月，之瑜撰写了《中原阳九述略》一书，交安东省庵收藏。他说：“他日采逸事于外邦，庶备史官野采。”^①该书分为四章。第一章论明朝灭亡的原因，指出，明亡是因为政治腐败，学术虚伪，以及士大夫廉耻堕丧。第三章历数清兵入关后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康熙二年（1663年）春天，长崎发生大火，之瑜的房舍化为焦土。他寄寓于皓台寺庑下，风雨不蔽，盗贼充斥，朝不保夕，又是安东省庵前来相助，才幸免于难。

康熙三年，之瑜在日本的生活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这一年秋天，日本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派儒臣小宅生顺前往长崎，为编纂《大日本史》开设的彰考馆选拔人材。小宅生顺数次造访后，对舜水十分推崇，便邀请朱之瑜到江户讲学，但他婉言拒绝了。第二年上半年，德川光国将他的情况禀明宫廷，以礼相聘，并命长崎镇巡岛田守正专员护送。七月，他来到江户，德川光国以宾师之礼，竭诚尽教。德川光国礼贤下士，念之瑜年高德重，不敢称其字，欲得一庵斋之号称之。恳切再三，之瑜乃以故乡一条河的名字命之。“舜水”之称，始于此。八月，光国奉命就国于水户，便迎之瑜来水户，并命人为舜水造屋。年底，之瑜返江户。此后，

^① 《朱舜水集》下册，第691页。

之瑜长住江户，但也常来往于水户及附近都邑，有时在水户过冬。之瑜在给光国的书信中，讲述中国传统的大同之说，并认为近世中国不能行之，而日本实现大同则相对容易些。他嘱咐光国勃然奋励，踏踏实实地去干，朝大同目标努力。之瑜还常到水户讲学，一些已白发苍苍的学者也扶杖前去听讲。

康熙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朱之瑜七十寿辰。德川光国行养老之礼，在“后乐园”宴请之瑜，亲授几杖，竭诚尽教。后乐园位于江户的小石川，这里是江户时代水户藩主邸第的林苑。之瑜来到江户后，寓居藩邸数年，后乐园是他足迹常到的地方。而且，德川光国重新规划修建此处园林时，之瑜曾参与其事。“后乐园”的名字，也是他根据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建议而取的。当年，他为德川光国作《诸侯王庙图说》，详解中国五庙之礼。

德川光国夙有兴办教育之志，在长崎时之瑜即有所闻。他写给安东省庵的信中曾说：“听说光国有在江户设学校之举，特别高兴。贵国别的都好，只是教育欠缺。然而教育是古今天下国家的第一大事，怎么可以欠缺呢？”之瑜在写给其他日本朋友的书信中，也反复申明此意。康熙九年，德川光国毅然决定兴办学校，请他作《学宫图说》。之瑜作毕，请木工依其图制成模型，比例约为1:30，栋梁枅椽，莫不悉备。殿堂结构日本匠人不熟悉，之瑜亲自细心指点。经过一年努力，模型制毕。其中，文庙、启圣宫、明伦堂、尊经阁、学舍、进贤楼、廊庑、射圃、门楼、墙垣等，都制作得非常精巧，朱之瑜毫无保留地将中国古代的设计、建筑技艺传到了日本。德川光国欲仿造祭器，为使这些祭器合乎中国古典制式，之瑜依图考古，研核其法，精心教授、指点工匠，经年余顺利制成。两年后，学宫在水户建成。光国请之瑜作仿古学宫

的礼法，改定《释奠仪注》，德川光国率儒学生依中国古制奉器施礼。之瑜还应光国之请，指导日本工匠制作明代皇室衣冠。这些，无疑促进了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的交流。

朱之瑜有两子，长子大成，次子大咸。大咸英年早逝，其后，之瑜便与家中断了音讯。后大成死，留有两子毓仁、毓德，寄养在外祖父姚秦家。到江户的第二年，舜水有信寄给大成，书抵姚家，全家悲喜交加。姚秦曾托人赴日联系，但未能与之瑜见上面。康熙十六年，之瑜已七十八岁。他西望故土，百感交集，写下了《与诸孙男书》，抒发了离家数十年后的无限感慨。信中谆谆教诲其子孙：“汝辈既贫窘，能闭户读书为上。农、圃、渔、樵，孝养二亲（之瑜此时尚不知长子大成已死）亦上也。百工技艺，自食其力者次之。万不得已，佣工度日又次之。惟有虏官不可为耳！”^①信中还表示，希望有一个孙子到日本来侍奉他。第二年，接到之瑜家信的长孙毓仁赴日省亲，于十二月到达长崎。碍于当时日本法制，毓仁无法抵江户。德川光国派之瑜的学生今井弘济往长崎会晤毓仁，表示慰问并赠送了不少礼品。康熙十八年四月，今井弘济再次抵长崎与毓仁相见，详细转达了之瑜希望毓仁留下朝夕奉养的意见。毓仁回答说：“我自幼失父，家有母亲、弟弟，家境贫穷。此次来日本是向祖父问安，面陈家中实情，回国后向母亲及外祖父汇报后，再研究侍奉祖父的办法。”六年后，毓仁再次东渡日本，惜朱之瑜已不在人间了。

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朱之瑜病逝于异国他乡。德川光国破例将他安葬在他们德川家的墓地里——今日本茨城县常陆太田市境内的瑞龙山。墓地依中国制式作坟，题曰“明征君朱先生

^① 《朱舜水集》下册，第721页。

之墓”（因朱之瑜曾多次奉诏特征，人尊称其为征君）。德川光国及朱之瑜的众弟子亲临墓地为老师送葬。第二年七月，德川光国与群臣议定，谥之瑜“文恭”先生。祭文中曰：道德博闻曰“文”，执事坚固曰“恭”，故谥“文恭”。又过了一年，德川光国在之瑜所居之驹笼别庄构筑舜水祠堂，以作纪念。后光国手辑《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由光国子刻成。朱之瑜这位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受到日本人民世世代代的怀念与景仰。“异境术空人亦去，汗青长照寸丹诚”，^①这是日本人民对朱之瑜的高度赞誉。

（三）经邦弘化，为学主“实理”、“实学”

朱之瑜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到日本时，日本国内佛教独尊，儒学地位去之远甚。朱之瑜在长崎等地的讲学活动，引起了儒学界的重视，一些人表示欢迎，但也遭到佛学界的猜忌与不满。朱之瑜尖锐地批评了儒学界虚浮空疏的弊病，同时指出，“儒教未明，佛不可攻；儒教既明，佛不必攻”。在日本，他以“明儒教”为己任。但在他看来，那些有助于国家政治，能教化民风土俗的实理实功，才是儒学的真髓。他把中国明末清初许多进步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和思想成果带给了日本学术界，在日本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体系是程朱一派的客观唯心主义，另有一派即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与之抗衡。当时，有

^① 《访朱舜水的遗踪》，《人民日报》1983年11月14日。

不少思想家在总结明王朝衰亡的经验教训时，对这两大思想流派进行了批判和总结。朱之瑜认为，程朱理学脱离实际，虚伪浮夸，故弄玄虚，捕风捉影。理学家表面上辨析毫厘，实际上一件事也作不成，于世无补。他说，程朱大讲性理，要人们穷尽事事物物之理，而后致知，才能治国平天下。然而人生几何，等不到穷事事物物之理，早已夭亡。还不如随时格物致知，踏踏实实地从近处作起，老百姓也可以直接得到一些好处，朝廷治事也可多一分借鉴，不致于空疏无用。朱之瑜对陆王心学也不以为然，指斥其为“伪学”。他认为陆王派讲良知、言心性，是援佛入儒，“高视阔步，优孟之冠，是其病也”。

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朱之瑜提出了实理实学的主张。他说，所谓实理，就是明明白白的“现前道理”，凡是能够取得实际功用与事功的就是实理。在他看来，一种理论的好坏，要看他的实际效果。有实际效果的，就有价值，因而为学当有实功实用。他比喻说，比如布帛菽粟，衣之即不寒，食之即不饥，这就是功，这就是用。如果不是这样，说得天花乱坠、玄妙无比，经千年万年，人们也见不到它的功用。他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人们学习应该在致知和力行上一齐下功夫。将致知和力行结合起来，其目的在于经世致用。有助于国家政治和移风易俗的学问才是真学问。学者能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移风易俗，才是真正有用的学者。

从“实理”出发，朱之瑜提倡“实学”，反对说玄道妙、言高言远的迂腐作风。他猛烈抨击明中叶以来的腐败学风，指出：朝廷以时文取士，士子以八股为敲门砖，奔竞功名利禄，败坏社会风气。时文制艺，好像以灰尘为饭、泥土作汤，什么事都不顶用。那些泥塑木雕式的道学家，吟风弄月的文士，醉心科举的俗士，不

过是一群废物，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朱之瑜心目中的巨儒鸿士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德与才干呢？那就是“经邦弘化，康济时难”，就是要求学术要为政治和社会生活服务。在当时来说，就是能匡时济艰，有所贡献，以维护封建统治和国家的完整，具体来说就是有助于平定农民起义、抵抗满族贵族的入主中原。

朱之瑜提倡实理实学，又特别重视史学。他深受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史学学派风气的影响，认为舍史而求经，是舍本逐末，沿流失源。朱之瑜提出，经简而史明，经浮而史实，经远而史近。主张通过研究历史的变迁总结出国家兴亡得失的规律。

朱之瑜不仅是个书生学者，还是一个博学多能的工艺能手。他的学生今井弘济、安积觉等称他农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用之制，皆审其法度，穷其工巧。朱之瑜在虚心向日本人民学习的同时，把中国的科学技术如工程设计、建筑技术、农艺、衣冠裁制、生物地理知识等介绍给日本人民，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与爱戴。

朱之瑜一生中最后二十几年在日本讲学，对日本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安东省庵、山鹿素行、木下顺庵、德川光国、安积觉等，受其影响较多。朱之瑜在长崎时，日本封建时期最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伊藤仁斋（1627—1705年），曾通过安东省庵请求向朱之瑜问学。时朱之瑜虽对仁斋很推重，但因学术观点不同，表示不愿和仁斋见面。他认为仁斋当时思想中有陆王心学之非，不足为法。但后来当仁斋思想转向唯物论时，朱之瑜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伊藤诚修兄策问甚佳，较之旧年诸作，遂若天渊。倘由此而进之，竟成名笔，岂逊中国人才也。敬服敬服。”^①朱之瑜在日本的门人弟子中，大多接受他的史学思想。安东省庵不仅经学

^① 《朱舜水集》上册，第194页。

著作甚多，也著有《春秋前编》等史学著作。在朱之瑜的影响下，德川光国创立了前期的水户学派，以彰考馆为中心，召集三宅观澜、安积觉等一大批藩士，编纂《大日本史》。到了幕末，水户学派的说教十分流行，对后来日本的明治维新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难能可贵的是，朱之瑜胸怀豁达，他热爱中国，也热爱日本国。他批评一些人“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的妄自尊大观念是“眼界逼窄的三家村语”。他认为日本是一个“山川降神，才贤秀出”的国家。朱之瑜真诚期待日本繁荣富强，早日臻于理想的“大同之治”。他意识到自己在日本的使命“动关中国、日本千年之好”，呼吁日本“与中国世世通好，若汉赵之交”。^① 唯其如此，朱之瑜才更得中日两国人民的爱戴，被誉为鉴真式的中日友好交流的使者。

朱之瑜后半生流落他乡，最后客居日本二十三年，加之清初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他的言行事迹长时间被淹没。但当人们一旦了解他之后，无不表示深深的敬意。当年鲁迅先生从仙台去东京时，曾中途在水户下车专程去凭吊瞻仰朱之瑜遗迹。在日本留学时代的郁达夫，也写出了高亢激越的朱之瑜颂诗。这一切都告诉人们，朱之瑜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历史地位。

^① 《访朱舜水的遗踪》，《人民日报》1983年11月14日。



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思想家傅山

· 郑永福 ·

山西阳曲（今太原市）城西北的崛围山下，有一个小村庄名叫西村。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傅山，便诞生在这个山水环抱的村子里。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十九日（1607年7月12日），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1684年7月23日）。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青主。又有真山、浊翁、石人等别名。

傅山先世系山西大同人，累代业儒。曾祖朝宣做明宁化王府的仪宾、承务郎，遂移家太原。傅山祖父名霖，字应期，嘉靖壬戌（1562年）科进士，官至辽海兵备道。二祖父傅震，嘉靖辛酉（1561年）科举人，当过耀州知州。傅山的父亲傅之谟，字檀孟，号离垢，万历年间的岁贡生，以教书为业。母亲陈氏，系忻州诸生陈勳之女，顺治十七年（1660年）才去世，卒年八十有四，人尊称其“贞髦君”。傅山二十六岁时，妻张氏病卒，誓不复娶，又无媵妾，其独生子傅眉遂由贞髦君抚养。

傅山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之中，幼承家学，受过严格的启蒙教育。据说他年少时便聪颖异常，过目成诵。十五岁时，傅山应童子试，拔补博士弟子员（秀才），二十岁时为廪生。成年后的傅山，学益渊博，诸子百家无不贯通。他长于音韵、训诂及其诸子学的研究，又工诗文、书画、金石，还精于医学，著作等身，名震天下。这样一位鸿儒大师，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其学问人品，深为后人景仰。人们为了纪念他，在山西太原傅山故里修建了牌坊、牌楼，建立了傅公祠，内藏傅山所书的石刻、牌匾及遗像等文物，供人们瞻仰凭吊。

（一）力主正义，不畏权奸

据载，傅山曾祖傅朝宣，英俊博学，被明宁化王府逼迫成婚，成了王府的女婿，目睹了王府中的肮脏生活。王府女不育，朝宣纳殷氏为妾，生傅霖兄弟三人。傅霖一降生，其祖母王氏怕孙子在王府中受虐待，便将其抱回忻州自己抚养。傅朝宣临终立下遗嘱：有子孙再敢与王府结亲者，以不孝论，族人鸣鼓攻之！傅山

年幼时，父亲常将曾祖、祖父的不幸讲给他听，十分感伤，以至于落泪不止。这使傅山从小对权贵产生了反感和厌恶。

崇祯九年（1636年），执政的阉党温体仁，授意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诬陷东林一派的袁继咸，并将袁逮京下狱。袁继咸是傅山的老师，江西宜春人，被捕前任山西按察司提学佾事。袁继咸系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为人鲠直，对当时宦官弄权、官僚误国的政治局面非常不满，并屡有抨击。到山西任职后，主持三立书院，傅山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山西巡按史张孙振是当朝宰相温体仁私党。他串通阳曲县知县李云鸿，罗织了袁继咸十数条所谓的罪状，向朝廷方面告发，其中主要的一条是说袁继咸有贪污行为。当年九月末，袁继咸即将被押解入京的消息传来，傅山挺身而出，与薛宗周等号召全省生员一齐进京，为袁继咸伸冤。同时动员人每天到巡抚衙门请愿，向巡抚吴牲（shēn，音身）申诉。

十月二十日，袁继咸被押解赴京。傅山与薛宗周跟踪着袁继咸的囚车，从太原出发，徒步进京。出发前，傅山叮嘱其兄傅庚留在太原，发动各县来的生员赴京集会。到了北京后，傅山等住在琉璃厂伏魔祠，并联络到京的山西生员百余人联名上疏朝廷。众人推举傅山领衔，并由他起草诉状。当时通政司袁鲸孝与张孙振有交，对傅山等的上疏一再压制，并斥之有冒名欺君之罪，始终也没有接受傅山等人的诉状。傅山伏阙讼冤，惹怒了张孙振，于是张派人到处搜索傅山。傅山敝衣褴褛，转徙自匿。

三次上书不达之后，傅山等便四处张贴或分送传单，呼号请愿。这些传单中，一方面陈述袁继咸的政绩，一方面对张孙振的诬蔑不实之辞一一加以驳斥。当年腊月间，山西巡抚吴牲检举张孙振贪赃白银八万两的公文抵京。次年二月，崇祯皇帝差人将张孙振捉拿在案。为了促使案件早日结清，傅山等百余人包围了辛

相温体仁的坐轿，仗义执言，要求为袁继咸平反昭雪，并将因该案牵连被捕的百余人释放。四月初刑部公审该案时，傅山出堂作证，袁继咸案得以昭雪，以原来品秩改任为武昌道。此案持续达半年之久，震动全国，由此傅山也名闻天下。

清顺治二年（1645年），袁继咸因故被清政府逮捕，关在京城狱中。傅山曾潜入都门，暗中照料。袁继咸感叹道：“乾坤留古道，生死见心知。”^①袁继咸被杀害后，傅山收其老师遗稿而归。

崇祯十年袁继咸案了结，傅山回到了太原。两年后，他移居太原城西北四十里兰村裂石庙前的“虹巢”。所谓虹巢，是傅山向住庙的和尚借的一间不到一丈见方的小屋。数年后，他又回到老家西村。经过一段读书生活，傅山思想有了较大改变。他渐渐悟出八股科举之无用，读书研究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

（二）身着道袍，心系天下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烽火连天，关外清兵步步紧逼，明王朝摇摇欲坠。傅山见明王朝败势无法挽回，便于崇祯十七年拜郭静中为师，出家当了道士。郭静中是当时负有盛名的道士，他给傅山起了一个道号，名曰真山。

傅山出家当道士，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愿当大清朝的顺民。因为清兵攻下南京后，下令薙发，迫令男子一律剃头留辫子。出家当道士，可以保留头发，这也是反抗清廷的一种手段。傅山表示：他虽身披道袍，不忘忠君爱国，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兴亡。傅山出

① 《霜红龛全集》附录二，袁继咸：《铁城寄傅青主》。

家后，身着红色道袍，自号朱衣道人。所谓“朱衣”，有暗指朱明王朝之意。他又号“酒食道人”。我们知道，道士按戒律本不该喝酒吃肉。傅山既当道士，又自号酒食道人，是他虽当了道士，但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尤其是不忘其政治抱负的思想情感的真实流露。

出于封建的忠君爱国思想，开始时傅山对明末农民大起义采取敌视态度。他曾参加过抵御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攻山西的活动。他还称赞抵御农民起义顽守太原而死的张宏业有奇节。但明朝灭亡后，出于反清复明，傅山对农民起义军的态度则有了明显的转变，希望农民军能站稳脚跟，与清政府抗衡。

顺治初年，傅山流浪在山谷之间。当他听到友人叶廷秀（润苍）在山东参加“榆园军”起义抗清时，异常兴奋。傅山在诗中称颂叶廷秀铁脊铜肝，是山东好男儿，表示身着道袍黄冠的他对各路反清义军深深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

顺治十一年，南明总兵宋谦在晋豫边界的武安（今属河北）策动反清起义，事泄被捕。宋谦供出了他在山西联络的傅山等人。供词中说，傅青主，太原人，生员。已出家作道人，身穿红衣，号为朱衣道人。年五十岁。在汾州一带游食访人。据此，清廷将傅山逮捕下狱。在监狱中，傅山遭严刑拷问，但抗词不屈。后来傅山还绝食九日，差一点要了命。他在狱中写诗，自比像铁石一样坚硬顽强，并鼓励同侪坚持斗争到底。不久宋谦死去，查无对证，又经门人多方营救，傅山于顺治十二年七月获释。傅山被审期间，其子傅眉、其弟傅止也曾被扣押审讯。因事前统一了口径，官方一审再审毫无破绽可找，只好放出了事。

傅山出狱后，正值江淮地区掀起一次抗清高潮。郑成功进攻南京，张煌言转战皖南。傅山闻此情更加抗清心切，曾赶赴南京。

但抵达时，明军已失败撤离。感慨之余，傅山赋诗，把郑成功、张煌言等比做凭据海岛抗秦不屈的田横，抒发了自己的哀思。

自江淮返回家乡后，傅山过起了“隐居”、“遗民”的生活。顺治十七年春天以后，他隐居松庄，自号松乔、松乔老人。在自己的家乡居住却称作“乔”，其意是大明已亡，有不承认清政府的寓意。清初的遗民，大都有这种心态。松庄位于太原东山冢旱山脚下，离城约十里远，是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该村北面有个慈云寺，傅山在离寺不远的东崖腰上修了几孔窑洞住了下来。傅山常同慈云寺的和尚往来，表明自己要脱离红尘，以减少清政府的注视。

傅山在松庄一住就是十几年。康熙二年（1663年），名儒顾炎武来松庄访问傅山。顾、傅二人诗词唱和，抒发心中的愤懑与期望。感情激动时，或浑身大汗，或老泪纵横。后来，顾炎武又两度来太原拜谒傅山。康熙二年四月，傅山到河南辉县百泉拜访孙奇逢（夏峰）。傅山此次造访，是求孙奇逢为其母陈氏撰写墓志。晤谈之后，傅山对夏峰先生十分敬重。隐居松庄期间，前来拜访傅山的还有申涵光、屈大均、阎尔梅等人。这些人，皆一代名流，志趣多有共同之处，诗词唱和、切磋学问之中，念念不忘反清复明。

（三）“出乖弄丑”，隐居求志

康熙十七年正月，清政府特开博学鸿词科，笼络当时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康熙的诏书下达后，被荐举的知名学者中，有的借口有病在身不能应试，有的借口有老母在堂需要奉养而无法脱身。

这一下子惹恼了康熙皇帝，到了当年七月，他把所有请辞的奏折一律予以批驳，并命令各地总督或巡抚迅速将这些被召者起送进京。

特开博学鸿词科的诏令下达后，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向朝廷推荐了傅山。傅山听说了这件事后，决意坚辞不就。傅山多次请辞也不管事，阳曲知县奉命踵其门催傅山上道，赴京应试。傅山说自己有病不能走，地方官哪肯罢休，让役夫抬着傅山的卧床强行上路。

经长途跋涉来到京城郊外，傅山一行住在崇文门外的野庙圆觉寺内。他以一路风尘、鞍马劳顿、病情加重为理由，整天躺在床上，表示死不入城。文学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冯溥及一些公卿，久仰傅山文名，先后来到城外探访，傅山依然稳卧床上，不具迎送之礼。这可苦了他的儿子傅眉，马不停蹄地迎来送往，进行应酬。这样拖来拖去，便拖到了三月初一的试期。清廷刑部尚书魏象枢实在无计可施，只好以傅山老病不能应试上奏康熙皇帝了事。

按规定，当时凡考中博学鸿词科者，朝廷分别给予官职，对于年老者特赐予内阁中书衔。康熙帝接到魏象枢奏折后，便降诏允准傅山免试，并特加中书舍人衔，以示恩宠。依照惯例，受到皇帝的恩宠，应该到清宫午门磕头谢恩。吏部尚书冯溥劝傅山入朝叩谢，说：“皇帝对阁下破格恩赏，纵使您重病在身，也得给我个面子，入城一谢。”傅山仍以身体有病为由，坚持不入城。不管冯溥令其宾客怎么劝说，傅山就是不起身。冯溥只得使人强行抬着傅山入朝。一看见午门，傅山百感交集，涔涔泪下。冯溥强拉着傅山叩头谢恩，傅山故意乘势趴在地上。看到这个架式，魏象枢连忙走上前说：“好了，好了，这就算谢恩了吧！”对于傅山如此一系列的表现，不知是康熙帝真的不知道呢，还是故意摆个高

姿态，故意装作不介意，批示道：“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谢恩的次日，傅山便急忙要回山西。大学士以下的一些官员，纷纷到郊外送行。这时傅山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叹息道：“从今以后，我全然没有什么拖累顾及啦！”

离京返晋前夕，傅山曾给好友曹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以一个老病将死之人，谬充博学之荐，而地方官府即时起解，篮輿（竹轿）就道，出乖弄丑。累经部验，今幸放免，复卧板舁（yú，音于。共同抬东西）归。从此以后，活一月不可知，一年不可知。先生闻之，定当大笑复有此蒲轮^①别样。”这信里说的“出乖”，是太原方言，意思是“捅漏子”、“闯祸”的意思。傅山明知在庙堂之上“出乖弄丑”可能导致身杀之祸，但他无所畏惧，抱定了“死亦要精神”的信念。

傅山在京的一番表现，使他的名声更大了。自北京返回山西后，不少人愈加仰慕其名，以能与他见上一面为荣。一些地方上的官员，也纷纷前往拜见他。见面时，凡称呼他为内阁中书的，傅山十分反感，一律低头不应。阳曲县知县奉命要在他家门上悬挂“凤阁蒲轮”的牌匾，傅山予以回绝。后傅山僻居远村，不入城府，更加淡泊自甘，一身布衣服，冬天戴一般人戴的毡帽，自称为民，避免与官府打交道。

五年之后，傅山逝世，终年七十八岁。入殓时根据他生前意愿，穿朱衣、戴黄冠。远近赶来参加葬礼的达数千人。傅山临终前曾留下遗嘱：“后之人诬以刘因辈贤我，我目几时瞑也。”^②这里说的刘因，系河北容城人，元世祖时被征为右赞善大夫。不久，因

① 蒲轮，用蒲裹轮，车轮转动时振动较小，古时常用于封禅或迎接贤士。后泛指迎接贤士的车子。

② 《霜红龛全集》，卷25，《训子侄》。

母病辞归。后再征不起，元世祖称其为“不征之臣”。傅山遗嘱意思是说，如果后世的人把我同刘因相提并论的话，那我是死不瞑目的。因为刘因毕竟向元世祖称过臣，我傅山是从来没有向康熙帝俯首称臣呀！

(四) 萧然物外，自得天机

傅山一生重气节，轻势力，主实行，恶虚文，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超人的成就。大思想家顾炎武曾说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甚至说“吾不如青主”。^①

傅山与其同时代的顾炎武、黄宗羲一样，为学主张经世致用。傅山在哲学上，有否定正统思想的倾向，以“异端”自命，不喜儒学而好老庄。但他又不逃避现实，思以济世，不屑空言，这显然又与某种程度上来说悲观厌世的老庄思想不同。傅山痛斥那班空言性命义理、不讲经邦济世的“宋儒”是一群奴才，他更鄙视那种埋头考据不问实事的书呆子。为了反对程朱理学——即当时的所谓正学，傅山把诸子的研究列于和六经的研究平等的地位，提倡“经子不分”，打破了儒学的正统观念，开创了有清一代诸子学研究的风气。

傅山认为宋明理学家们注经害死人，提醒人们切勿泥读这些人的注解。傅山说，看书洒脱一番，就会长进一番。若只是在宋儒的注脚中讨分晓，那只能说是钻故纸堆，到头来也只能成为一个书蠹虫。傅山还进一步说，单单靠前人一句半句的注脚，就扬

^① 《亭林文集》，卷6，《广师》。

言我是有本之学，那就好像用牙咬着人家的脚后跟，大有死狗挂不上墙的态势，根本成不了学问家。傅山主张治学要审辨精断，善于独立思考。我们的一双空灵眼睛，不仅不许让今天的人欺蒙过去，也不让古人蒙骗过去。他说，古人行事，有全对的，也有全不对的；有先对后错的，也有先错后对的；有似是而非的，也有似非而是的。我们今天就要取其是去其非，“十百是中之一非，十百非中之一是”^①，我们都不能放过。

傅山研究诸子百家成果颇多，其学术思想，对当时及后来的学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傅山的诸子学研究中，多有新义创见。如他在解释《老子》中的《道常无名章》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②这里不仅表达了傅山的反清思想，也说明他和黄宗羲等人一样，已有了一定的带有民主色彩的思想。在治史方面，傅山太囿于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思想，对于汉族人拥戴非汉族王朝的功臣、良相予以严厉的抨击，指斥那些表扬非汉族王朝的史家和史籍，甚至排斥金、辽、元三史于“正史”之外，使他这方面研究的价值大打折扣。

傅山长于金石。他是用金石遗文证释经史方面开其先河的人物。他的诗歌创作，承继了屈原、杜甫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杜甫的诗尤为倾倒。傅山认为，不关心人民痛痒的诗，算不上是好作品。他认为诗是“性命之音”，是真情的流露。傅山不少诗是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因而“动触忌讳”。他写作时，常常情从中来，泪如泉涌。傅山的文论和诗论一样，认为“文章负荷难”^③，就是说文章应负起爱国救民的责任。傅山说，“文章生于气节”，^④

① 郝树侯：《傅山传》。

② 《霜红龕全集》外编，《道常无名章》。

③④ 《傅山传》。

那些阿谀奉承的作品，绝不可能成为好文章。他还认为文章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不能因袭古人的“格套”。不然的话，就只能成为古人的“印板”。

得其祖上六七辈家传，傅山的书法艺术造诣极深。其真草隶篆，各体均精，尤其重正贵拙。有人推崇他为清初第一写家，人们说他一字千金，得者如获至宝。傅山认为要写出好字，要先作个好人，写字不单是艺术技巧，也是思想品质修养问题。他教人习字要求“正入”、“变出”，认为写字不到变化处不见妙。

绘画方面，傅山也成就卓著。他工于山水，也善绘墨竹。现故宫博物院所藏傅山名画，如《文聿双峰》、《瓮泉难老》、《岷国红叶》、《古城夕照》、《土堂怪栢》、《天门积雪》等，都是以太原附近古迹名胜为题材进行创作的。画中抒发了他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以及执意不与清廷合作的孤高。王士禛称傅山“画入逸品”。

傅山还精于医术。太原城中原有“傅先生卖药处”，系傅山侄子傅仁开设的铺子。门前立着一块写有“卫生馆药饵”五个大字的牌子，这五个字便是傅山亲笔手书。开设药店外，傅山还曾经与其子傅眉共挽一车，云游四方卖药，并借此秘密地进行反清联络。其足迹遍及山西，并曾到过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傅山为人看病时，用药一般不依方书，根据病情往往以一两味药取验，慕名求医者常常把他的小屋子挤满。傅山著有《辨证录》、《石室秘录》等医书。《女科》一书系从《辨证录》中摘录出的单行本。该书不依傍古人，引证之方，多吻合《内经》、《难经》的旨意，故为医家所重视。书中所载“生化汤”，对产后诸症，颇有疗效。该方多年来广泛地在民间流传，尤其在山西农村，几乎成了产妇特别是生头一胎的必服药剂。1964年，山西省

中医研究所搜集傅山处方，编印了《傅青主验方秘方》一书。

有关傅山行医方面的传说很多，不仅反映了傅山医道医德的高深，也表达了广大人民对他深切的怀念。据传，一次山西某巡抚母亲突然得了病。巡抚委托阳曲县知县请傅山诊治。傅山说：“看病可以，但我不愿见贵人。”知县转嘱巡抚回避。诊完脉，傅山说：“偌大年纪，怎么得了这种病！”知县再三问什么病，傅山说：“相思病，得自昨天中午。”知县向巡抚禀报，巡抚母亲惊奇地感叹道：“神医神医！昨天中午，我翻腾箱笼，忽然见到你父亲的一双鞋，病就发作起来了。”后服了傅山开的一剂药，便告痊愈。有一妇女，因规劝其丈夫戒赌，被丈夫打了一顿，郁愤之下，得了气鼓病。这个妇女的丈夫求傅山治疗。傅山问明情由，就地抓了几把野草，告诉这个男人：“你拿这草回去，每天在你女人面前，慢火去熬，要和颜悦色。每天吃完饭就熬药，一天要熬它十几次。”不到三天，妇人的病果然完全好了。有人问傅山，野草怎么会治病？傅山说：“本来不是大病，只是那个妇人家憋了一口气，让她丈夫来一番低声下气，妇人家自然心平气和，这样病就退了”。这些传说固然有演义色彩，但傅山医术高明，医道独特，确实名不虚传。傅山曾为其卫生馆作联，曰：“以儒学为医学，物我一体；借书居作山居，动静常贞。”^① 从这副对联中，我们也可看出傅山的医道和志趣。

傅山一生著述甚多，惜大多数已经散佚。现有《两汉书姓名韵》、《金刚经批注》、《霜红龕集》等行世。

^① 《傅山传》。

王夫之



早慕刘琨投戎旅，晚遁山舍著鸿篇 ——著名思想家王夫之

· 张兆凯 ·

明末清初，社会发生着极大的动荡。残酷的现实迫使知识分子进行各种各样的思考。在这种时而冷静、时而激烈的思考中，他们发现过去的一切，无论是道德标准，还是价值标准都需要进行反省。明末清初的险恶政治使他们失去了入仕干政的机会，

传统的道德观又促使他们不能为清统治者效力。因而隐居山舍，著作鸿篇，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提出他们的一系列主张和观点。这些主张和观点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而且直到今天，许多方面仍然放射着光辉。在这一批知识分子中，出身于湖南衡阳的王夫之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一）衰落家世，苦学少年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他晚年长期隐居于湘西蒸左的石船山麓（今湖南衡阳县曲兰乡），所以又称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诞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祖籍是江苏高邮。明成祖永乐初，九世祖王成以军功升衡州卫指挥僉事，因而迁居衡阳。他的祖先系中下级军官，到了高祖王宁时才开始“以文墨教子弟”。^①曾祖王雍的文名在衡阳还不小，曾被州郡推荐到太学读书，毕业后授予武岗州的训导（州里管教育的副职），后又迁为江西南昌的教谕（县里管教育的副职）。这个时候，王家是相当富有的。但到了他祖父王惟敬时，这位不事生产只知挥霍的纨绔子弟，把家中败得徒有四壁。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自幼也只知道读书，不善谋生，以至于家中的几亩薄田仅能供食稠粥。王朝聘有三个儿子，长曰介之，次曰参之，王夫之最小。王夫之出生时，王朝聘已年近五十，但仍汲汲于科举考试，想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他年轻时考取了秀才，希望由举人到进士，一步一步地

① 王船山：《家世节录》。

爬上去。但每次参加省里的乡试，都是“名落孙山”。万历乙卯科（1615年）应考，他曾考中一个副榜（举人的备取），很不甘心。王夫之三岁时，五十岁的王朝聘又去参加天启辛酉科（1621年）考试，但还是不得志，仍只取为副榜。这年是明熹宗登极的大典。新皇帝上台，自然要颁布一些宽仁厚德的诏令，当时诏准乡试的副榜可以入太学读书。王朝聘趁此机会，抱着羞惭和委屈的心情，到北京国子监学习。希望四年毕业后，吏部能授给他一官半职，了此一生心愿。但当时的明朝统治，已经腐朽不堪。皇帝不理政事，朝政被宦官权臣把持，官以贿成。王朝聘候官数年，仅被吏部授了个正八品散秩的官。正八品不仅官阶极低，而且是个空衔，要想得个实缺，就要纳贿。王朝聘一则纳不起贿，二则也不屑于干这种事。悲愤与失望交加，他醒悟了，仕进的道路对于他说来等于缘木求鱼，根本走不通了。他“罢选不就”^①，返回故里。从此以后，戢影家园十七载，连一次都邑也不曾去，杜门谢客，一心在家里教子读书。

王朝聘在科场失意后，对时政不满，决心隐居不仕。但他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在科场找到一条出路，因此要求少年的王夫之刻苦读经，以便将来参加科考，求一世的功名。王夫之四岁就奉父命跟大哥王介之读书，七岁读完了“十三经”。十岁左右，父亲从北京归来，就向他传授经义。父亲的严格要求，加上他本人的聪颖好学，十四岁那年就考中秀才，引起了当时的湖广学政的重视，决定送他到衡州州学去深造。在州学两年，王夫之读书十分用功，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十六岁开始学诗，十九岁时，与本县陶万梧之女结为夫妻。这一年他跟叔父王廷聘读史籍，并研

^① 王船山：《家世节录》。

习诗歌。随着王夫之读书范围的扩大，他的思想境界也日益开阔。他开始留心政事，并与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进行交往，结识了不少知心朋友，因而也加速了他对社会的认识。

（二）走入社会，留心政治

王夫之开始接触社会时，这个社会正面临着天崩地解的大动荡。当时封建制度已经非常腐朽，社会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以皇帝为首的官僚贵族，以种种名目向人民巧取豪夺，逼得人民不是卖妻鬻子，就是走死他乡。统治阶级的奢侈无度，致使国库空虚。神宗派宦官为矿监，以勘矿、开矿为名，肆行搜括。遇到良田美宅，则诬称地下有矿脉，任意毁人房屋，掘人祖坟。神宗还派遣宦官为税监，到各地征税。名为征税，实为掠夺。不但一般中小商人被掠夺破产，连穷苦老百姓家里的一只鸡、一头猪、一斗米、几两盐，都被课以重税。这种残酷敲榨，激起人民无数次的反抗，终于导致了明末大起义的总爆发。此外，崛起于东北地区的满族贵族也正在加紧扩张。皇太极在崇祯二年（1629年）曾率军大举入塞攻明，兵锋直逼北京。崇祯十二年，清兵竟深入到明朝的腹地山东济南一带进行杀掠，严重地威胁着明王朝的安全。

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万历年间，以皇室、宦官为首的官僚大地主集团，已成为统治阶级内最腐朽最反动的势力。他们把持中央政权，无恶不作。一些政治上受到排挤，经济上受到伤害的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和中下级官吏看到当时的政治日趋腐败，必将导致明王朝的覆灭。为了改良政治，缓和阶级矛盾，谋求政治势力，逐渐形成了

一股政治力量——东林党。他们与贵族大官僚集团及其党羽——阉党（以宦官魏忠贤为首）展开了斗争。魏忠贤与明熹宗的乳母客氏勾结，得到了熹宗的宠信。糊涂皇帝居然把朝政交给这位宦官，自己完全不理政事。魏忠贤口含天宪，威福自专，见东林党跟他作对，在他的党羽大学士顾秉谦、魏广徵，大理寺丞徐大化的策划下，决定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他们首先诬杀东林党的领袖杨涟、左光斗等，接着将所有在朝廷的东林党官僚加以贬削，以致“善类为一空”。魏忠贤控制特务组织，肆无忌惮地作恶。民间对他稍有訾议，就会被戮杀，甚至剥皮割舌，被他杀的人不可胜数。一些无耻官僚甘愿充当爪牙，称他为“九千岁”，为他在全国建造生祠。无耻官僚凭借魏忠贤的势力，贪赃枉法，荼毒人民。崇祯帝即位后，思图重振纲纪，严惩了魏忠贤及其党羽。但他信任的仍然是宦官，正直的东林党人士或被贬谪，或遭杀害，朝政仍然控制在善于钻营的奸佞之徒手中。

面对着这种严重动荡的局面，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迫切希望改革时政，挽救国家危机。年青的王夫之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与当时一些对腐败政治不满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以文会友”的名义下结社，议论时政，抒发救国抱负，并进行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崇祯十一年王夫之在岳麓书院读书，与旷鹏升等结“行社”。次年，又与郭凤翥（xiān，音先）、管嗣裘、文之勇等结“匡社”，所谓“匡”就是要匡扶那摇摇欲坠的明王朝。虽然王夫之等人结社拯救时局的实际作用不大，但通过这类活动，有助于他关心现实，改革弊政的忧国忧民思想的增长。

北方时局虽然日益险恶，但王夫之要走科举入仕之路的思想并没有改变。二十四岁那年，他和大哥王介之一块去武昌参加壬午科（1642年）的湖广乡试，结果他以《春秋》一门夺魁的优异

成绩中了第五名举人，王介之也考中了第四十名举人。父亲非常高兴。老人家自己一生不得志，连个举人都没考上，而自己的两个儿子同时高中了，怎不叫他脸上增辉呢？他敦促两个儿子取道南昌到北京等候会试。老人的最大愿望是他们兄弟通过“会试”，考取进士，进入明王朝的统治集团，实现自己的宿愿。兄弟俩到了南昌，度过暮冬后，准备坐船北上。其时谣言纷起，人心恐慌，经过多次打听，才知李自成部已攻克襄阳，进入荆州；张献忠部也从西安出兵，进逼蕲水（今湖北浠水）。北上的道路已被梗阻，北京会试去不成了。王夫之为之奋斗多年的“进士梦”，在农民革命的风暴冲击下破灭了。他感到茫然。悲愤之余挥笔写道：“闲心欲向野鸥参，更听鱼龙血战酣，何事春寒欺晓梦，轻舟犹未渡江南。”^①他把农民革命比作突如其来的料峭之风，把他的美梦都吹散了。北去之路既断，只好与哥哥介之快快返回故乡。这件事无疑助长了王夫之对农民革命的憎恨，也使他把自己的命运同腐败的明王朝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崇祯十六年八月，王夫之的家乡衡州被张献忠所攻克。为了壮大力量，张献忠于所克州县署置官吏，并物色贤才，以资辅佐。张献忠部将艾能克了解到王夫之与其兄王介之有高才异行，为乡里所推重，指名招请。而王夫之兄弟对农民起义非常憎恨，自然不会与起义军合作，他们连夜逃往南岳莲花峰下的双髻峰藏匿。可是其父王朝聘已经衰老，不能行走，农民军为了促使王夫之兄弟出来应招，将其父亲找去作为“挟质”。王夫之知道父亲作了人质，于是采用残毁肢体的苦肉计，自己把身体刺伤，敷以毒药，叫人把他抬到张献忠驻扎的地方，伪装自己病重，不堪任使；又谎称

① 王船山：《姜斋诗·忆得》。

介之已死。在友人的帮助下，张献忠放了王朝聘，王夫之也逃走了。

次年，王夫之在双髻峰下的黑沙潭畔盖了一所名叫“续梦庵”的茅屋居住。这一年夫人陶氏又生了一个儿子（长子早夭）取名攸（bān，音班）。他们的生活主要靠南岳僧性翰的照顾，王夫之后来曾写诗对此感激不尽。以后两年左右的时间他都住在这里，继续从事他的学术研究。

（三）上书被拒，救国无门

王夫之隐居续梦庵的几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崇祯十七年春，李自成的农民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进入了以夺取全国政权的新阶段。李自成在襄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推翻明朝的战略计划，决定先取关中，再攻入山西，直捣北京。此时期明朝统治者为了挽救危机，任命兵部尚书孙庭芳调动陕、晋、豫、川、楚、黔六省军队，作孤注一掷的进攻。李自成率兵迎战，击溃了官军，攻下了西安，建国号为“大顺”。起义军到处宣传“均田免粮”的政策，因而获得广大下层人民的支持。当年二月，李自成率军从陕西渡河往北，破宁武，下大同，所向披靡。三月初，直抵北京城下。十八日傍晚，太监曹化淳打开漳义门，农民军如潮水般涌入京城。崇祯帝曾鸣钟召集百官，居然一个也未到。天未明，崇祯帝登煤山（景山）自缢。

李自成虽然推翻了明王朝，但他没有妥善处理善后问题，对在长城外面虎视眈眈的清统治者的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进驻北京城后，尤其是对拥兵驻扎在山海关的明朝大将吴三桂没有加以

利用或予以消灭，致使吴三桂在徘徊观望中最后降清。李自成的失策，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失败。

王夫之在续梦庵得知崇祯自杀的消息后，难过得痛哭流涕，几天茶饭不思，并作《悲愤诗》一百韵，边吟边哭。他把农民起义军迫使崇祯帝自杀视作滔天罪恶，认为中国社会从此陷入了漫长夜般的黑暗状态。他同所有明朝的地主官僚一样，对打着“为尔等复君父之仇”幌子的清兵存有幻想。但当清统治者日益暴露征服全国的野心，以及清兵南下对汉族人民的肆行杀戮时，很快把他们的幻想击得粉碎了。

崇祯自杀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阉党余孽，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明朝统治集团的残余势力，拥立崇祯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于当年五月在南京建立起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明弘光政权。

南明弘光政权从一开始就糜烂不堪。大敌当前，他们不去思虑如何迎敌，以马士英、阮大铖等为首的阉党权臣打击东林党人，排斥主张抗清的史可法等。皇帝朱由崧则只知看杂剧，饮火酒，淫幼女为乐。结果，清军一路南下，史可法在扬州殉难。第二年五月五日，清军攻入南京。建立仅一年的弘光政权覆灭了。

清兵占领南京后，继续南进。由于清统治者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强迫汉人剃发梳辫子，欲迫使汉人从衣冠装束上和精神上承认清政权的绝对统治，因而激起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特别是江阴、嘉定两地人民的反抗最为英勇激烈。两地人民的反抗虽被清军残酷镇压，但牵制了清军主力的南进，给了明朝地主阶级中的抗战派以再建立南明政权的机会。

弘光政权溃灭后，南明出现了两个并峙政权：一是浙中抗清义师首领张国维、熊汝霖、钱肃乐等拥立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就位，称“监国”；一是福建的明朝官僚张肯吾、郑芝龙等拥立唐王

朱聿键做了皇帝，建元“隆武”，史称隆武政权。这两个政权互争“正统”，彼此水火不容。而内部又都矛盾重重，纷争不已。这样就严重削弱了抗清力量，给清统治者以各个击破的机会。清统治者乘机进行分化离间，先后诱降了鲁王政权中拥有重兵的方国安和唐王政权中拥有重兵的郑芝龙。结果到第三年夏秋，两个南明政权相继为清兵所灭。

在消灭南明两个政权的同时，清军另一路向西进攻江西、湖南。到了清顺治三年秋天，清军的兵锋逐渐逼进了王夫之的家乡衡州。这对在南岳续梦庵从事研读著述的王夫之来说冲击太大了。避居南岳，本为逃避农民革命的烽火，但两年来，随着清兵的深入和抗战局面的展开，整个斗争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军从反明转到了反清斗争的前线。王夫之也开始意识到要保住南明的半壁河山，只有坚决反对投降派，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共同抗击清兵。过去，他对农民军是很仇视的，而当农民军将领李过、高必正、郝摇旗等在湘鄂前线抗击清兵，并主动提出与驻扎在湘鄂一带的南明唐王政权的抗战派将领何腾蛟（湖广总督，当时驻长沙）、堵胤锡（湖北巡抚，当时驻常德）共同抗清的正义主张时，王夫之是非常钦佩，并坚决赞成的。但遗憾的是何、堵二人对农民军将领表面敷衍，实际心存猜忌，不予妥善安置。另外，何、堵二人又都自负气节，不能和衷共济，因而形成南北不协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两湖地区驻扎了近百万军队，为筹划粮饷，何腾蛟创办义饷，增加租税，每亩田地较原额增加五倍多，又预征两年的钱粮，使得民怨四起，人心动摇。王夫之了解到这种情况，非常焦急。虽然他当时是一个举人，但没有授予官职，不能冒昧向封疆大臣提意见。然而形势的危急，加上炽热的爱国心的驱使，他思之再三，想到当年参加省里乡试时的分考官章旷正任堵胤锡的

粮饷总督。他以门生的身份去参见章旷，向他谈了自己的担心，提出筹措军粮，防止掠夺，调和南北，以防溃败的建议，并请求他能把自己的意见反映给何、堵二人。王夫之说话时，心情很沉重，一边说，一边流出了眼泪。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爱国情感的真切表现。章旷听了王夫之一席话，只略微点了下头。而且他认为何、堵之间，并无大的矛盾，要王夫之不必过虑。王夫之怀着满腔热情而来，章旷却是不冷不热，只好怏怏而归。

回到故乡不久，就传来了唐王政权覆灭的消息。他感到十分痛苦。然而更不幸的是，与他结婚不到十年的妻子陶氏，因其父陶万梧死，居丧哀毁，婴疾不起，离他而去，年仅二十五岁（时王夫之二十八岁）。妻子的死，使他本来就破碎的心灵蒙受了更大的打击。在这种雪上加霜的打击下，王夫之的精神几乎被摧垮了。

（四）投身戎旅，追随永历

唐王政权覆灭后，明朝遗臣中在湖广、两广的地方实力派丁魁楚（两广总督），瞿式耜（广西巡抚）、何腾蛟、堵胤锡等，又拥立明宗室桂王朱由榔于清顺治三年十一月称帝于广东肇庆，建元永历，组成最后一个南明政权。这个政权既由抗战派所组成，又得到人民抗清武装的支持。

桂王政权刚宣布建立，清兵就分兵两路大举南进。一路由降清明将李成栋指挥，从福建进入广东，随即攻占了广州，次年陷肇庆，丁魁楚降清。桂王奔往梧州，后到桂林，再逃武岗（今属湖南），辗转于湖广各地。另一路则由降清明将孔有德指挥，进攻湖南，连下湘阴、长沙等地。何腾蛟退守衡州，堵胤锡也被迫转

到川鄂边界。

王夫之听说桂王到了武岗，非常兴奋，就和好友夏汝弼奔赴武岗“从王”。他们翻山越岭，走到湘乡县西南的车架山时，正值大雨连绵，道路泥泞，难以行走，不得已停留下来。王夫之的心情十分焦急，眼看着自己为国效命的机会因霪雨而阻隔，他仰天大吼：“劲血如泉欲进出，红潮涌上光陆离。”^①心潮起伏，思绪如麻。想到民族灾难深重，而南明军队对清兵却不能抵御。他遥望郊原，“荒郊无烟三百里，封狐（大狐）瘞（jì，音计）狗（疯狗）渐相扑。”^②从无情的霪雨，他又想到在辗转逃难的永历帝。他在百无聊赖之际写下了《七歌》，怀念在“峒烟蛮雨”中受困的永历帝，怀念在家里过着艰苦和惊恐生活的年老父母，怀念避居东安四望山的大哥和二哥，怀念自己的亡妻和幼子。无限的忧伤撞击着他的心灵，他牢记父亲的话：“虽死不辱犹生存。”

王夫之在车架山被困的日子里，湖南的局势则日益危急。湖南全境大都被清军攻陷，家乡衡州也沦入敌手。军情紧急，清军巡逻四出，为避免被清朝的巡逻抓走，他与夏汝弼赶到湘乡县南的高峻幽僻的白石峰躲藏。到了当年八月中旬，清军攻破宝庆（今湖南邵阳市），进逼武岗，永历帝逃奔靖州（今湖南靖县）。这段时间里，王夫之的家里也发生了不幸，二哥王参之害病，因战乱未能及时治疗而死。父亲为使王夫之兄弟在外安心避居，写信嘱咐他说：“汝若自爱，切不须归，勿以我为念”。谁料写信的第二天就病倒了。王夫之获悉家中变故，日夜奔波，回到了家里，大哥王介之也在这一天返家。父亲见他们冒险归来，很不高兴。沦落后的衡州，到处都是清军的爪牙，为避祸，父亲带他们兄弟到

①② 王船山：《姜斋诗·忆得》。

清兵势力尚未到达的南岳峰顶隐避。不久王朝聘病死于南岳的潜圣峰，享年七十八岁。临终前，叮嘱王夫之兄弟，他死后就地葬在莲花峰麓。他认为自己所在的城市已被清兵占领，安葬回乡，会玷污他洁净的遗体，同时也会连累王夫之兄弟。这些话充分表现了王朝聘仇恨清统治者的意志，对王夫之终生不仕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此同时，抗清的形势则有了好转。当桂王被清军追得辗转奔逃之际，李自成部将郝摇旗率所部精兵护卫桂王至柳州，并对进攻桂林的清军发动猛攻，暂时挫败了清军的攻势。随后，李过等又率领农民军组成的“忠贞营”，并联合何腾蛟、瞿式耜的部队，在湖广地区连续大败清兵，先后取得了“岳州大捷”，“全州大捷”，迫使清军退保湘南，居于守势。在广东、四川等地农民军也乘胜攻打清兵。已经降清的明将李成栋、金声桓等，由于不满自己的待遇，在人民抗清胜利形势的影响下，相继在广东、江西率兵反正，并派人把永历帝从柳州接到肇庆。

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蓄志抗清已久的王夫之认为时机已经来到，就与创办匡社的好友管嗣裘、夏汝弼以及南岳僧性翰等人策划武装起义。管、夏与王夫之是同年考取的举人，交谊甚厚。夏性格豪爽，居莲花峰，号“莲冠道人”。性翰虽出家为僧，但见明廷倾覆，常怀悲愤之情。这三个人都有坚强的抗清意志，衡州是个军事要地，清统治者早就派重兵驻守，一旦有警，可以立即发兵。四人虽有心抗清，但都是书生出身，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加上他们去联系的多是主张抗清的一部分士大夫，而对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认真去发动，因而人数不多，力量显得很单薄。起义队伍还没有进行武装暴动，就被充当清统治者鹰犬的湘潭人尹长民所袭击，战败兵溃，管嗣裘一家老少都被杀害。敌人到处搜索，株

连而死者数十人。夏汝弼因母病及居丧未到军中，未被清军发现，他得以把起义者的家属和性翰和尚收藏在自己的家里，加上乡里群众的掩护，才减少了牺牲。这件事的结局是王夫之当初没有想到的，失败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惨，使他终身都感到遗憾。他后来回忆道：“与仇者战，败亦非辱，而志事不遂，亦何荣焉？”^①战败军溃，数十人被杀，能不令人遗憾吗？

衡山举兵的失败，使王夫之认识到，孤军奋战是行不通的。他认为只有“从王”共襄国事，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因而决定立即度岭，奔赴肇庆“从王”。从衡山到肇庆，道路险阻，王夫之带着侄儿王敕（王参之儿子），日夜兼程，翻山越岭，经由郴、桂等地到达永历政权所在地。

来肇庆之前，王夫之是怀着满腔热情的，他要挥洒热血，施展抱负。但到了肇庆一看，却使他大失所望。这里的当权者都是一些苟且偷安的守旧官僚，他们置抗清的大业于不顾，却热衷于分党分派，争权夺利，专力排斥抗战派官僚。目睹此状，王夫之认为留在这里无益，不如到主张抗清的桂林留守瞿式耜那儿去，或许可以有为。当督抚堵胤锡保荐他做翰林院庶吉士时，他便婉言谢绝，来到了抗清气氛浓厚的桂林。在桂林他虽然受到瞿的尊重，但瞿也并无多大实权。他力荐王夫之，但始终未能为王夫之从永历那里谋得个可以有为的职位。在桂林期间，王夫之除认识了《物理小识》的作者方以智等几个有气节的朋友，互相谈谈爱国抱负之外，也是无所作为了。

在此期间，抗清的形势发生逆转。肇庆朝廷里吴楚两党攻讦不已，江西的李成栋被害，抗清名将何腾蛟则在湘潭战役中不幸

^① 王船山：《章灵赋·注》。

被俘牺牲，收复不久的湖广诸地又沦于清军之手。进攻广东的清兵攻占了韶州，肇庆告急，桂王西奔梧州。

在桂林期间，王夫之续娶十八岁的郑氏为妻，小家庭还没安置妥贴，大局的变化接踵而来。他考虑到此时决不可以隐居，因此抱着与君王同生死的信念，奔赴梧州，就任行人司行人之职。行人的职责是充当持节传旨，册封宗室，抚谕藩属。王夫之希望借此微职，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以便能竭尽所能，制止党争，挽救时局。

然而，当时吴楚两党之争愈演愈烈。王夫之对吴楚两党的是非曲直非常清楚。吴党的目的是攫取或巩固其特殊权益，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枉法循私。结果使永历政权政治糜烂，严重损害了抗清事业。楚党虽然也对权柄看得重，但他们的主张主要是适应抗清斗争需要的。吴党以军阀陈邦儒作靠山，加上皇太后的支持，永历帝的袒护，致使吴党气焰嚣张。他们逮捕楚党，肆行烤掠，并欲杀之而后快。王夫之平时同情楚党，而今天大敌当前，吴党又这样肆无忌惮地迫害楚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使他极为悲愤。他与担任中书舍人的好友管嗣裘一起去见大学士严起恒，慷慨陈词，说楚党诸君弃妻子，跟着桂王在刀剑之中拼命，而吴党要把他们杀掉，这无异自掘坟墓，今后还有谁来扶持皇帝呢？严起恒听了王夫之的话，颇受感动，允王夫之所请，在朝廷力争，楚党得以不死。但严起恒因为触犯了吴党，王化澄欲置他于死地。王夫之悲愤不已，上书死谏，参劾王化澄等“结奸误国”。^①王化澄恼羞成怒，指使党羽以诗反罪名诬陷王夫之。^②王夫之有口难辩，

① 王船山：《小腆纪年》卷16。

② 当时湖南攸县一个狂人写了一阕“百梅诗”，假冒王夫之的名义作序，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王化澄看到这篇序，认为词语不逊，欲以文字狱来加害王夫之。

竟至“愤激咯血”^①，幸赖农民军将领“忠贞营”统帅高必正极力营救，才免遭毒手。

这次事件后，王夫之感到自己身单力薄，孤立无援，根本不可能消弥党争。同时感到桂王政权已经不可救药，自己想通过“从王”献策来达到挽救时局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清顺治七年秋，极端失望的王夫之与妻子、侄子离开梧州，重返桂林，再次投奔瞿式耜处。

（五）屏迹幽谷，著述以终

王夫之到桂林不久，忽然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与妻、侄速返衡州。由于战事阻滞，途中几为乱兵所杀。有时困于岩塞，几天不能食。与妻子商量，间道而归，但又遇霖雨六十日。比及到家，母亲早已死去。当时他的生活极为困难，为母亲守丧时，严寒之节，只有一件破麻衣，一件破棉袄，厨房里无隔夜之粮。他一面为母亲守丧，一面还怀念着在梧州的永历政权。当他得到桂林失守，瞿式耜英勇牺牲，桂王在清军的进逼下逃往南宁的消息后，他才深切感到形势已不可逆转，只有屏居幽谷一条出路了。顺治九年，王夫之怀着沉郁的心情遁于邵阳的耶姜山侧（又云白云峰），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清统治者恢复在湖南的统治后，在各地布置爪牙耳目，对曾经响应、参加反清和怀有“光复旧物”之志的明臣，加以缉捕杀害。为了避难，遂与妻子郑氏避居于零陵北洞、钓竹源、云台山

^① 王船山：《行述》。

等处。为躲避迫害，他不得已改换姓名，更换装束，自称瑶人。生活无着，幸亏当地隐士王文俨常常送一些粮食来加以接济；自己通过授徒讲学，谋得一点收入，与妻子就过着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生活虽然艰苦，王夫之对清朝镇压汉人的仇恨却丝毫不减。清统治者占领南京后，强令汉人剃头留辫，并且严酷规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王夫之蓄发明志，以示反抗到底的决心。在荒僻山洞里，他一面授徒教学，一面从事学术研究。不久，他得到了与他多年患难与共的侄子王敫在家乡被清兵杀害的噩耗，悲痛万分，也更加深了他对清朝统治者的仇恨。

到了顺治十四年，清朝政权已基本巩固，为收买人心，一方面“大赦天下”，一方面调集兵力进攻永历政权所据的云南、贵州，这样湖南地区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王夫之带着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孩子王敫(yǔ，音语)回到了南岳双髻峰下的旧居“续梦庵”居住。两年后，又徙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在朱黄塘筑茅舍，名之曰“败叶庐”。

回到家乡后，王夫之过着幽栖的生活，但心情并没有平静过，永历政权的命运时刻萦绕于心头。当桂王为吴三桂所执，被害于昆明的消息传来时，他痛哭流涕，又一次写了《悲愤诗》一百韵来抒发自己的悲痛心情。

更为不幸的是，与他共同度过忧患生涯，对他关怀备至的爱妻郑氏不幸患病早逝，年仅二十九岁。郑氏辞世，所遗幼子王敫，成天抱着王夫之的大腿悲呼要母亲。此情此景，见者无不凄恻！但王夫之毕竟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的人，他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著述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为了缓减对亡妻的怀恋，他把全部身心都倾注于学术研究之中，写成了《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等书。

清朝统治者基本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加紧了对文化、思想领域的控制，以残酷的手段对待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政治环境的险恶，使当时许多正直而不愿屈从的知识分子，为避免迫害，或遁入空门出家为僧，或隐姓埋名出为道士。王夫之的好友方以智出家后，更名弘智，在江西青原山做和尚，过着枯寂的空门生活。方以智曾写信给王夫之，劝他也出家。但王夫之认为出家太消极了，把头发剃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合。而且僧人是方外顺民，与王夫之誓与清廷对抗到底的决心不相吻合，因而委婉谢绝了方以智的邀请。

王夫之五十一岁时，又在住地的林塘小曲盖了一所草庵居住，取名叫“观生居”。这一年他整理了从三十岁到五十岁的古近体诗，编成了一部名叫《五十自定稿》的诗集。另外，为了使自己能潜心学问，遂续娶张氏为妻。

“三藩之乱”爆发后，王夫之又在离“观生居”二里许的石船山麓，盖了一座名叫“湘西草堂”的茅屋，作为他的新居，专门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当时，三藩之首的吴三桂，正驻扎在衡州。随着吴三桂军事上的日益失利，为了笼络部下，吴三桂竟然在衡州称起皇帝来，并示意部下物色名手写一篇《劝进表》。王夫之的学问在衡州久负盛名，一些人自然想到了他，吴三桂立即派一个幕僚去请王夫之。王夫之对这个败类的丑恶面目十分厌恶，他当然不会为其所用。他严肃地对来说：“某本亡国遗臣，扶倾无力，抱憾天壤。国破以来，苟且食息偷活人间，不祥极矣！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为？”^①那个幕僚悻悻地走了。王夫之担心吴三桂报复，就逃往深山隐匿起来。

① 潘宗洛：《船山先生传》。

王夫之拒绝为吴三桂写劝进表，是因为他不屑于与这个民族败类打交道。但这件事竟然为清统治者所误解，他们把王夫之看成是他们的“贞士”。吴三桂被平定几年后，时任湖南巡抚的郑端对王夫之拒绝“劝进”事“闻而嘉之”，^①叫衡州知府崔鸣鹭（zhuó，音浊）亲自去拜会他，并赠以粟帛，向他进行诱降。王夫之称疾力辞，坚决不和知府见面。

在石船山麓的“湘西草堂”里，王夫之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七个春秋。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如哲学方面的《张子正蒙注》、《庄子通》、《噩梦》、《俟解》等，史学方面的《读通鉴论》、《宋论》等都是在这里写成的。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也在这一时期的著作里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王夫之是我国十七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在哲学方面，他不仅是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通过他对一系列历史事件的亲身感受，以及他毕生所作的艰苦、批判的理论思维，把我国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推进到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王夫之面对现实的斗争，深深感到当时学术的流弊；提倡用实物生动的学说，来攻破虚无寂静的唯心谬说。

王夫之认为物质世界是独立存在的，宇宙的起源是实有而非虚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道不虚生，则凡道皆实也。”^②他从唯物的认识出发，主张“天不听物之自然，是故絪縕而生花。”^③意思是说，凡天地间所有的实物，都是生化不息的。这是一种进化的哲学观念，这和宋明理学的不变哲学是对立的。王夫之不仅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生化不息，而且都在推陈出新。他说：“今日之风

① 潘宗洛：《船山先生传》。

② 《周易外传》卷4。

③ 《思问录·内篇》。

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①从这一进化观点出发，他认为人类的认识也是随着事物的变化而日新的，社会形态是发展的，后代必然比前代进步，他反对复古，冲破了儒家以唐虞三代为圣世的陈说，认为社会制度必须改革。

宋明理学强调天理，主张绝欲，王夫之则认为应该把天理与人欲统一起来，主张“求天理于人欲之中。”^②当然他也反对纵欲，他对婢妾成群，荒淫无度的人欲世界也是反对的。他认为解决的办法，一是政治上人为的调节，一是道德上自身的节制。

王夫之受其时代和条件的局限，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里，还有着许多唯心论的东西，但他的基本观点却是唯物的，在我国的思想史上有着他的伟大贡献。

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从当前的现实，以及他本人一生颠沛流离的感受出发，提出了人本主义思想。

王夫之的人本主义，主要是一个“仁”字。他说“天道人情，凝于仁”。^③他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应该互相剥削、压迫，同时也极力反对封建政府的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提出要厚民、富民。

他痛恨土地兼并的罪恶，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说：“土地不是帝王所得私有，人民生长在土地上，用自己的劳力，耕自己的土地。土地分明是耕者所有。”

王夫之在政治思想上有他落后的一面。如他一方面反对封建剥削，但又仇视农民起义。不过，对农民起义的态度在他一生中是有所变化的。当他汲汲于功名利禄时，是农民起义打破了他的进士美梦，因而对农民起义极为仇视，认为是洪水猛兽。但当明

① 《思问录·外篇》。

② 《周易注传》卷2。

③ 《礼记章句》卷9。

王朝灭亡，清朝建立之后，特别是他隐居于“湘西草堂”的这十余年时间里，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的厚民、富民的主张正是在这一改变的政治观下形成的。

在历史哲学方面，王夫之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特别反对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了一千八百年之久的“正统”学说。所谓“奉天承运”之类的正统思想，他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他说：“无所承，无所统。正不正，存乎其人而矣。”^①不过王夫之之所以反对正统，与清王朝的建立有关。在他看来，“异族”在中国的统治，难道也可以说是正统吗？他说“宋濂作史，以元为正而乱华夷”。^②这样的正统是不能接受的。但他心底里可能还是承认有正统，只不过是清朝统治者而已。

王夫之认为社会是发展的，他认为现在与过去不同，未来与现在也会不同。他说：“洪荒无揖让之道，尧舜无吊伐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③从这种发展论出发，他反对复古，更反对泥古。他认为三代之制不可行，肉刑、井田制不可复。

不过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也还有许多唯心论的成份。如他过分强调人类意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而这里的人类实际上是少数统治者。所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④“礼非圣人莫制”^⑤等认识即是其体现。另外，他虽然承认社会是发展的，但在他历史哲学的体系里，还或多或少地残留着历史循环论的残余。

王夫之在“湘西草堂”的生活是极为清苦的。他为了抓紧时间进行写作，“隐居山中，未尝入城市”，靠授门徒自给。

①② 《读通鉴论·叙论》一。

③ 《周易外传》卷6。

④ 《思问录》外篇。

⑤ 《读通鉴论》卷12。

这期间，他的大哥介之和介之子敞相继去世。王夫之不顾病弱之身，两次亲赴长乐乡耐园办理丧事。大哥和侄子的去世，对他身心打击很大。从耐园回家后，他的身体日益衰弱，弟子也减少了。王夫之感到他要完成的事业还非常艰巨，时间不多了。他干脆把授徒谋生的任务交给儿子王敫，自己集中精力从事研究。到了晚年，他身体多病，手拿不稳笔，但他坚持著述，脍炙人口的《读通鉴论》、《宋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长期的穷困生活，紧张的著书立说，使他的病情日益恶化。由于久病憔悴，身体枯瘦，对着镜子竟不敢相信自己是镜中的那个人。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日，王夫之在“湘西草堂”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四岁。他的遗体由儿子王敫、王敫安葬在衡阳金兰乡高节里的大罗山麓。他在自撰的墓碑上写着：

有明遺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侧其继配襄阳郑氏之所祔。自为铭曰：抱刘越石（刘琨）之孤愤，而命无从致（达到），希（仰慕）张横渠（张载）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坟墓），因衔恤（含忧）以永世。^①

王夫之把自己比作西晋末年坚持抗击匈奴的刘琨。刘琨虽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他的事迹为天人共仰。王夫之坚持抗清，虽然未能恢复明朝，但他告诫后人：“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② 据他的理解，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异族”能够长久征服汉民族的，因而对未来的民族复兴充满胜利的信心。

王夫之一生勤于著述，据初步考证，其著述共达八十八种之

① 王船山：《姜斋文集补遗·自题墓石》。

② 王船山：《行述》。

多。其中有经学二十四种，史学五种，另外还有许多诗、赋、诗评等文学方面的作品。

对经学的研究中，尤重《易经》，对《易经》作有《稗疏》、《考异》、《外传》、《内传》、《大象解》。王夫之说易不信董仲舒、京房、何休、蔡邕等汉儒之说，而比较重视宋学的意见，但又不拘泥于宋学，可以说是批判地继承。除《易经》外，他对《书经》、《诗经》、《春秋》以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都有《稗疏》。对《春秋》还作有《家说》、《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等，共计五种；对四书作有《考异》、《读四书大全说》、《训义》、《笺解》五种；对文字学作有《说文广义》一种。

王夫之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重依据，不臆断，在这个原则上阐述义理。

史学著作中的《永历世录》、《大行录》是专门记载南明桂王政府抗清事迹的著作；《莲峰志》是关于地方志的著作；《读通鉴论》、《宋论》则是属于历史哲学、历史批判和史学方法的巨著，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主要是《读通鉴论》。后世学子研究历史，《读通鉴论》是必读之书。

在文学方面的作品，创作的辞赋有：做符命、连珠、九昭、南岳赋、孤鸿赋、雪赋、章灵赋等；诗词有：桃花诗、落花诗、遣兴诗、梅花百咏诗等；注释选评的有：《楚辞通释》、《唐诗选评》、《李杜诗评》等。

王夫之的著作到道光初年，才由他的六世孙王承侄开始搜集遗稿。1840年，他的七世孙王世全开始在湘潭雕板印刷。当时刊出十八种，同治初年曾国荃重刻于南京，增至五十八种。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根据各种刊本刻本，并参照所获得的王夫之书稿，排印为《船山遗书》，一共有七十八种、二百八十八卷。但也不过

是其著作中的一部分。根据后来的发现，应为八十八种，计三百九十一卷。

王夫之留下来的鸿篇巨著，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丰富的文化遗产。

呂留良



被剖棺戮尸的隐者吕留良

· 吕美颐 ·

雍正六年（1728年）浙江出了一起轰动朝野的戮尸案，明末清初的学者吕留良，在去世四十五年后，重被定为不赦之罪，剖棺戮尸枭首示众。家族后代连坐者甚多，长子同罹戮尸之惨，次子论斩，诸孙被发往黑龙江隶水师营。吕留良的著作被搜尽焚毁，严禁民间流传。接着，雍正帝自著《大义觉迷录》，其中多处提及吕留良，指

斥他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傲扰彝伦，私为著述”的“千古罪人”。^①吕留良何许人，他死于康熙年间，从未当过雍正朝臣民，为何惹得雍正帝“天廷震怒”？他是否如雍正帝历数的那样恶贯满盈？那个时代的人，凡能明辨是非者，心中自有定论。但因清代人多畏惧文字狱，吕留良的著述又于雍、乾两朝连遭毁禁，因此，以后人们很少论及他。直至今日，人们也很难对他进行详实的评价。

（一）散财结客，纾难抗清

吕留良，初名光轮，字用晦，又字庄生，号晚村。暮年削发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祖籍河南，宋南渡后籍浙江崇德（今桐乡）。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终年五十五岁。是明清鼎革之际的人。

吕留良生于官宦之家，祖上曾为明代淮府仪宾，与皇族公主联姻。他自幼丧父，由三哥吕愿良抚育成人。吕留良自幼颖悟绝人，勤奋好学，八岁即善属文，文章华彩绚丽，世人惊其异禀，赞誉满庭，但他仍旧质朴谦虚，并未沾染纨绔习气。

明末，江南文人结社之风很盛，应社、几社、澄社、复社等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东呼西应。吕留良十二岁时与侄子吕宣中一起加入了孙爽的“征书社”，从此几人结为莫逆之交。当时的明王朝已处于大厦将倾的末世，内外交讧，国势颓坏。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声势日益壮大，关外清军又常常南下虏掠，几

^① 《大义觉迷录》卷1。

个少年忧心如焚。他们弃绝了饮酒吟诗，游山玩水等，转而读书力学，经常聚在一起论列古今，擘画时政，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从学风上看，他们讲求经世致用，从政治上看，他们身负报国之心。可惜时代没有给他们提供一展宏图的机会。崇祯十七年，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清军乘机入关，于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旦夕之间改朝换代。吕留良闻讯悲痛不已。有人见此景劝慰他，何必自苦自艾。他正颜厉色地回答：“如今天崩地坼，神人共愤，君何出此言！”此后，他毅然投入了抗清斗争的行列。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挥戈南下，每攻取一处，无不烧杀掠虏。八月，清政府再次下令剃发梳辫，改换衣冠，明令自布告之日起，限十日内男子一律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杀无赦。清朝统治者的野蛮屠杀和高压政策，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些具有爱国之志的明故官员将领和地方士绅纷纷打起恢复“大明江山”的旗号，奔走呼号，组织抗清队伍，涌现出史可法、钱肃乐、张名振、张煌言、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等一批抗清英雄，他们的事迹无不可歌可泣，感人至深，进一步激扬起抗清的民族情感，江浙一带到处爆发抗清武装起义。吕留良的家乡也不例外，与崇德近在咫尺的嘉兴、海宁都是浙西抗清重镇。吕留良的三哥最先参加抗清斗争，投奔了南明福王。随后吕宣忠、吕留良及其友孙爽、董时雨也都投笔从戎。

当时，吕留良只有十七岁，他毁家散万金召募义勇，与董时雨苦心经营于山泽，又四出联络，跋风涉雨往来于湖山之间。一度组织发展很快，抗清志士如潮赴海般汇集而来。七八月间，嘉兴、海宁人民的抗清斗争惨遭镇压，吕留良的抗清活动也受到严重挫折。但他未停止活动。顺治二年至五年，他到过嘉兴和天目

山南麓等地，并在战斗中左腿中了箭伤。顺治四年，浙西抗清失败的大局已定，吕留良的侄子也在这年兵败被捕，惨遭清军杀害。顺治五年，他潜回故里。

这段抗清失败的经历，不仅给他的身体留下了创伤，而且给他的心灵以沉重打击。几年后，他重过嘉兴，故战场重游仍触目皆痛，不由得怅然泪下。在《乱后过嘉兴》一诗中，他认真总结了浙西人民抗清失败的原因，诗中写道：“雪片降书下，嘉禾独出师。儒生方略短，市子弄兵痴。”^①对明故官员贪生怕死降敌事清的蔑视之情，及对书生士子抗清斗争缺乏谋略的惋惜之情，都跃然于纸上。

吕留良回到家乡后，本打算隐迹于世，但为生活计，不得不而出而提囊行医于市。由于他医道高超，声名鹊起，远近病人都闻名争来就医。

（二）喷血拒荐，削发为僧

清政权初建，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相辅相成的两种手段，一方面无情镇压，一方面笼络利用。顺治二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战事未息之时，就进行了顺天乡试，以后继续按明制开科取士。与清政权不共戴天的吕留良，顺治十年忽然入闱参加科考，中了秀才，这使很多人疑惑不解。究其原因，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他的切身处境有关。随着抗清斗争的失败，清廷已控制了浙西地区，昔日抗清志士，有的隐居不出，有的转而与清政府合作，吕留良陷

^① 《吕晚村诗集》，《万感集》。

入了苦闷与彷徨。更为沉重的打击是家庭的变故，继侄子宣中殉难后，他视之“如严父”的三哥及四哥又相继故去，生死患难的挚友孙爽也遽然而逝。一连串的打击，使他悲痛不能自己，落魄不能自振。吕留良失去至亲挚友深感孤独无依苦闷之极，为了寻求摆脱，他误入科场，二十五岁这年考中了秀才。此后一段时间是在围着科场周旋中度过的。顺治十二年起他开始从事“时文评选”，这是一种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准备的文章选编与点评。此时，吕留良的“天盖楼”选本虽然风行一时，却没有什么积极内容。这种生活与他的抗清初衷完全相悖，因而他时常陷入矛盾与痛苦中不能自拔。这种生活沿续了五六年。

吕留良三十岁左右时，有幸结识了浙东著名学者黄宗羲兄弟与宁波隐士高斗魁。顺治十七年秋，在黄宗炎推荐下吕留良与黄宗羲在杭州孤山第一次相见。黄宗羲于明末即以东林遗孤为父鸣冤的非凡举止而声誉朝野，吕留良早已钦佩之至，黄宗羲也久闻吕留良浙西名士之名，因而两人一见如故。黄宗羲虽年长吕留良二十岁，两人却以朋友相处。黄氏兄弟和高斗魁清初也都从事过抗清斗争，兵败后均抱定不入科场不仕清廷的态度，这一点，给吕留良很大震动。以后几年，他们交往很多，康熙二年（1663年）至五年春，黄宗羲应吕留良盛情邀请执馆于吕氏家园梅花阁，吕留良长子葆中从师于黄宗羲。教学之余，诸友人经常以诗文唱和酬答相激励。这段交往对吕留良很重要，使他的生活再次出现转折，迈出了一生中极重要的一步。吕留良经过深刻的反省，很后悔误入科场，决意归隐南村。他在一首诗中明确表示：“失脚下矶今欲返，船过为报富春渔。”^① 已为生员的吕留良，按惯例每年

① 《吕晚村诗集》，《伧集》。

要参加县学例考，康熙五年县学考试前夕，他拜谒了主考官县教谕，表示了将去的决心，请求务全其志。翌日晨他便不再进考场，学官遂以学法除名。吕留良的举动，是他深思熟虑后而主动迈出的关键一步。吕留良对友人讲，自己将以小村庄作为桃花源，过隐居生活。

从此之后，吕留良彻底放弃了学而优则仕这一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人生道路。他不但不进科场，不仕清廷，而且不同清廷官员往来，并借助评选时文之机大肆宣传“夷夏之防”的反清思想。这成了吕留良后半生的立身原则。在这一点上，他与一向敬重的黄宗羲发生了严重分歧。黄宗羲认为不做清朝官即可，不必拒绝与清廷官员的往来。吕留良对此十分不满，曾做诗《问燕》、《燕答》等讥讽黄宗羲趋炎附势。在贬斥黄宗羲请求某官员荐其子至户部堂官家坐馆任教时，写了一首十分刻薄的诗曰：“顿首复顿首，尻高肩压肘，府问此何人，墨胎孤竹后。”^①大意是说：有个叩头不停的人，屁股抬得比臂肘还高，俯身问他是何人，原来是有名的学者东林遗孤之后！这样尖刻的讽刺黄宗羲异常恼火。吕、黄二人虽然在反对仕清上观点一致，但在方式上却有差别，加之学术见解不合等因，竟使这对朋友从此分道扬镳。后来，黄宗羲虽做过重归于好的努力，但未成功。乃至到了晚年，两个人还相互鸣镝而攻之。

康熙十二年，清政府在政权稳固之后，下了撤藩之令，原明降将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继威之子耿精忠兴起“三藩之乱”。吴三桂曾派人给吕留良传信，吕留良也与之有过书信往来，但经过多年风风雨雨的吕留良政治上已日益成熟和稳健，他不相信这些反

① 《吕晚村诗集》，《梦觉集》。

复无常的政客，始终采取了超然态度，隐居之志弥坚。这一年吕留良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完全停止了已持续十几年的时文评选，四十五岁起开始了潜心著述和讲学的学者生涯。

吕留良一生的最后几年遇到了一件他一生中最为难的事情，以至被迫削发为僧。康熙十七年清政府首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天下人才，规定不论已仕未仕，只要有内外大臣荐举，即直接参加殿试，凡有些声望者一律录取给予翰林官。这一次，朱彝尊、汤斌、毛奇龄等著名学者计五十余人被录取。当时，浙江省的封疆大吏也举荐了吕留良，他以死相拒，才得免。但三年之后，郡守又以“隐逸”之名再次举荐他，吕留良闻讯激愤异常，“喷血满地”，为表示隐而不仕的决心，卧床不起的他，在枕上剃发，更换僧服。并慨然长叹道：“如此这般，或可以放过我了吧！”吕留良更法名曰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字与号都隐喻着他坚定不移的志向。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以故事的形式谈及此事，说：一人行于道路，有卖糖的向他高声吆喝：“破帽子换糖！”行人藏了起来；又吆喝：“破网子换糖，”行人又躲开来；再吆喝：“乱头发换糖，”行人恐慌无措，只得求告：“何太相逼！”他剖白道：“留良之剃顶，亦正怕换糖者相逼耳。”^①一语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

晚年的吕留良广泛地研究诸儒语录、佛老家言，深入考究诸言是非短长。但他最大的贡献是弘扬朱子之学。在学术上，他一生尊朱辟王，崇尚朱熹，晚年更坚定不移。他曾总结道：“自初读书，即笃信朱子，至于今老而病，且将死矣，终不敢有毫发之疑，

^① 《大义觉迷录》卷4。

其所谓冥冥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① 吕留良提倡朱学，并非出于儒林门户之争，主要是为了“经世致用”，即正人心，救风俗，以改变时风为己任。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格物致知”。“格物”，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这里的“物”不仅包括伦理道德与世俗人情，还包括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等更广义的“物”。但是吕留良讲朱学，其教人大要，以格物穷理，辨别是非为先。可以这样说，吕留良虽然不是一个理学家，但是个有见地有作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对康熙中叶以后朱学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吕留良生活的最后十年，专意刻印朱熹遗书，提倡朱熹之学。

对于被逼削发为僧一事，吕留良至死都耿耿于怀，虽然没有入寺院修行，过严格的僧人生活，但他仍为此而郁郁寡欢。康熙二十二年，他五十五岁，自感病体难支将不久于人世，曾作《祈死诗》六篇，词音凄厉，哀婉动人。同年八月十三日，吕留良的病情忽然大变，但他始终神志清醒，最后双手交叉，安详逝去，平静地走完了他隐士的一生。

（三）死后罹难，千古奇冤

吕留良生前身后都有人誉其为“时文选家”，为此他身遭奇难。他先后所选文本约二十余种，有的风行一时，很有影响。但是仔细研究可看出，十余年间他所选时文前后大有差别。如果说康熙五年前他的时文评选没有多大历史价值，其后则不然。当他决心

^① 《吕晚村先生文集》卷1。

脱离科场后，又继续搞了几年。他之所以不顾黄宗羲等人讥俏其所搞时文评选是纸尾之学，操持旧业，实在是另有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利用这一形式以“寄发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痒自出之声。”^①用来抒发郁积胸中的感慨和政见。其子葆中也曾写道当时的情况，说他“其议论无所发泄，一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②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大倡“夷夏之别”，认为“华夷之别”更大于“君臣之伦”。这种充满反清的思想情绪，倡和者大有人在，甚至以此论号召排满反清。

曾静（1679—1731年），湖南永清人，生于吕留良死前四年，两人未发生过任何直接关系。雍正初年，广泛流传着雍正帝篡诏夺嫡，残戮诸弟，谋父逼母，纳文妃等传闻，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很浓，曾静等密谋反清举事，雍正六年，他派弟子入陕，劝陕甘总督岳钟琪反清，被揭发下狱。供词涉及流传于民间的大量宫闱传闻，也提及受到过吕留良评选时文的影响，说有“妄论夷夏之防”、“井田”、“封建”等语。雍正皇帝大动肝火，除了大兴文字狱，还颁布了《大义觉迷录》。其中对吕留良大张伐挾，罗织了一大堆罪名，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吕留良“以夷狄比于禽兽”，又以满洲为夷狄，因而犯有弥天大罪。雍正指斥他“著邪书，立异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并耸人听闻地写道：“所记诗文以及日记等类”，“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震悼”，因而称在“乱臣贼子”、“奸诈凶顽匪类”和“欺世盗名者中”，“未有如吕留良之可恨人也”。^③其实，明眼人一看即知，雍正帝醉翁之意不在酒，颁布《大义觉迷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洗刷自己，以正视听，这从大量的闪烁

① 《吕晚村先生文集》卷1。

② 《吕晚村先生文集》卷末。

③ 《大义觉迷录》卷4。

其词的自我标榜，自我粉饰之中可见端倪。贬死人是为了褒扬活人，雍正帝在这点上煞费苦心的。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大为怀，雍正有意释放了曾静，却把与曾静素昧平生的吕留良斥为“千古罪人”，在他死后四十五年从棺材里拉出来做替罪羊，并累及子孙，真可谓“千古奇冤”。乾隆继位后，吕留良再一次遭受文字狱之祸，其著述又遭清廷尽行毁禁。

吕留良一生著述很多，当时流传的有《吕晚村先生文集》、《吕晚村诗集》、《东庄吟稿》、所注医学著作《医贯》、由他批点的《四书讲义》、辑录的《四书语录》、与友人合辑的《宋诗抄》，以及《吕晚村手书家训》等，吕留良时文选评诸本就更多了。遗憾的是，几经焚毁，至今流传下来的种类已经不多了。

吕留良一生以明遗民自为，至晚年仍不顾清廷禁忌，诗文中，凡述及明史均写年号，入清后之事则以干支代年号；凡提及明都城南京或北京，均用旧京或京师，而称清朝国都北京则曰“燕”；凡称明朝均用先朝或本朝，而对清王朝只称“燕中”。其作法虽不免书生气十足，或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中不免显得狭隘，但在清初诸明遗中这种谨守矩矱，坚持气节的精神也是值得提及一笔的。

李
颺



关中大儒名隐李颺

· 郑永福 ·

中

十七世纪中叶，我国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活跃在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的学术舞台上，与黄宗羲、孙奇逢鼎足而立，并称三大儒，这个人就是李颺(yóng, 音咽)。

李颺，字中孚，陕西盩厔(今周至)人。盩字读同周，意思是山曲；厔字音同至，古意是水曲。李颺曾根据这两个字的意思取

别号二曲土室病夫，学者们尊称李颙为二曲先生。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这样评介李颙：“先生起自孤根，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寒饿清苦之中，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无所凭借，拔地倚天，尤为莫及。”^①李颙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死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终年七十九岁。

（一）绝学起关西，南游震群迷

李颙出生于贫寒之家，没有家学和师承，可以说是自学成材。

李颙的父亲叫李可从，字信吾，“以勇力著里中”，人们都称他为李壮士。崇祯十四年（1641年）腊月底，可从随同邑孙公率领的明朝军队去镇压农民起义。第二年，与张献忠部战于郧西；兵败后被农民起义军杀死在河南襄城。

父亲去世时，李颙年仅十六岁。他后来说，当时他家无一椽一土，无以为生。他与母亲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常常数日不点一次火，一天只吃一顿饭。看到这种情形，亲族劝其母彭氏改嫁，或介绍李颙外出当佣工，以养家糊口。但彭氏执意不肯这样做，她决心让李颙拜师求学，长大成材。由于家中实在贫穷，根本拿不起学费，塾师们都将李颙拒之门外。彭氏安慰开导儿子说：“没有老师不要紧，古人和古书不是都可以做你的老师吗？”此后，李颙发愤自学。在家庭生活窘迫的情况下，自学又谈何容易。母亲彭氏拼命为人纺织缝纫，儿子李颙卖力打柴换粮，勉强维持着最低生活水平。因而李颙长得面黄肌瘦，人们几乎不称其名而直呼其

^① 《姑塘亭集》卷12，《二曲先生空石文》。

“李莱”了。家中无书，李颀便向人家借书看，自经史百家，到天文河图、九流百技、稗官野史，无不反复潜心研读。遇有疑难问题，便虚心向人求教。李颀学业进展迅速，也博得了人们的好感与同情。有人见其家生活如此艰难，便想馈赠一些东西，但李颀坚决不接收。

李颀以昌明圣学为己任，以宋明理学为正宗。但苦难的生活经历和时代风云的影响，又使他不忘经世致用，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明体适用”之学。

不惑之年后，李颀学业有成，便倾心讲学，力图讲明父子君臣之义，提醒世人不要忘记忠君爱国。他认为，这是治理乱世的第一要务，讲学育人是“生人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可一日息焉者也。”^①李颀名气越来越大，在关中颇有影响。康熙七年，他开始到蒲城等地讲学，关中士子蜂从尊他为师。就连“关学”大师冯少虚年届八旬的弟子党湛，也顶风冒雪向李颀求教，相互探讨学问。士农工商各界向李颀求学者，不计其数。李颀也是“有教无类”，谆谆教诲或反复与这些人切磋。其盛况显赫一时。

母亲彭氏去世后，李颀的学生常州知府骆钟麟曾派人邀请他到江南讲学。

李颀应邀来到了人材荟萃的江南，先后在常州、宜兴、无锡等地讲学。在常州明伦堂讲学时，门庭若市，远近名儒大绅纷纷前来聆听李颀高论。每次开讲，听众达千人以上，人们惊呼这是当地百年未有之盛事。到其他几个地方讲学，也是听者云集。常州宿儒郑珏曾写诗赞道：“斯文幸未丧，绝学起关西。邈矣李夫子，

① 《二曲集》卷12，《匡时要务》。

南游震群迷。”^①每到一地讲学完毕，主持者常赠送礼物或钱财以表酬谢，但李颙一概婉言谢绝，不取分文一物。有的朋友好言劝他收下，说：“‘交以道，接以礼’，孔老夫子也是这样做的。”李颙说：“我不是孔夫子，所以不能这样做。况且孔老夫子家法多了，我们没有效法他的地方也很多，为什么单单效法取其财物这一则呢？”讲学期间，各地的上层人物往往要设宴款待李颙，但他不但不去赴宴，也一概不回拜。想当初李颙在老家贫困不堪时，也有人向他馈赠，他一概拒绝。有人对他讲，“交道接礼”，孟老夫子也是不却之的。李颙立即答道：墨守孟子家法，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可以看出，李颙这方面的性格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是年青时气更盛些。

（二）从容怀白刃，决绝却华辀

入清以后，李颙多次固辞清政府的征召。不论是以“隐逸”荐，以“海内真儒”荐，或是以博学鸿词荐，他都不赴，这使他名望日高。顾炎武曾赠诗说，“从容怀白刃，决绝却华辀（zhōu，音舟，车辀）”，^②就是颂扬李颙的以死抗拒征召，固守素操。

如同清初不少遗民一样，李颙怀着一种“亡国”之痛，决计不事清王朝。这种“操守”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评价姑且不论，对李颙本人来讲，他是把这看成是一种民族气节的，因而信守不渝。

李颙同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一样，提倡“行已有耻”，顾名惜

① 《二曲集》卷45，《历年纪略》。

② 《亭林诗集》卷5，《梓潼篇赠李中孚》。

节。他认为，一个人名节不足，必然被他人所看不起，即便其他方面有所长，也无法掩盖这一大污点。加之李颺目睹了清兵入关后给中原人民带来的种种灾难，更坚定了他无意功名，不与清廷合作的信念。他发誓，宁肯孤立无助，也绝不苟同流俗。宁肯自己落得个饥寒交迫，也绝不向任何人乞怜。他甚至这样告诫他的弟子，不要跟我谈及清王朝朝廷中的利与害，也不要同我谈及清王朝各级官吏的贤与否。总之，他不愿意谈及清王朝的任何事情，更不仕清。

康熙十二年四月，陕西总督鄂善敦请李颺到关中学院讲学，他再三推辞后勉强答应了。提学钟朗见他穿的衣服宽大，已不合清朝时宜，便给他送来了小袖窄袍，李颺纳而不穿，仍穿戴如常。钟朗出城迎接他时，见其仍如此打扮，很吃一惊。李颺却说，我不是官吏绅士，又非武弁兵丁，穿着那种窄衣小袖，颇不方便。宽衣宽袖乃是平民百姓的常服，我就是个平民百姓，只能穿这样的衣服。当年的八月，鄂善等以“山林隐逸”为名举荐李颺入朝，李颺誓死力辞，上书达八次之多，皆以有病为由却之。清廷下旨让李颺病愈后立即赴京。康熙十三年四月，朝廷下旨复征，差官大吏频频到李颺家中，表面上是讯问起居，实际上是验视催逼。李颺称自己病入膏肓，已成废疾，长卧不起。

康熙十四年八月，因避兵乱，李颺全家迁往富平（今甘肃庆阳西南）。地方官郭九芝也喜欢宋明理学，且素慕李颺，待之以上宾，并为他建了一处房子，名曰“拟山堂”。李颺很高兴，他身处拟山堂，想谢绝人事往来和一切应酬，过上深山穷谷式的生活。便事不遂愿，陕西督抚因朝廷先前有旨，岁岁催李颺应召。时任兵部主事的房廷祯以“海内真儒”为名再次推荐李颺，他仍以病重为由力辞。朝廷催逼如火，地方官也不管李颺从与不从，差数人

连同李颙的卧床一起抬着赴省。行至雁塔，李颙拔刀自刺。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可吓坏了诸官吏，只得停了下来。

富平李因笃、郾县李柏两人与李颙为好朋友，关中学者称其为“关中三李”。李因笃已被荐应征，他怕李颙固执己见惹出祸端，便劝他赴京应召。李颙回答说：“人生早晚有一死，怕只怕不能死得其所。我若因不应召而死，也算是死得其所了。”李颙还告诫儿子，我如果被逼而死，就以粗衣白棺入敛，不要张扬，更不要轻易受人祭奠。其后，李颙竟绝食五天五夜，粒米未进。总督无可奈何，只得借口李颙病情加重，求朝廷假以时日，让其回乡治病，以此了事。李颙所作所为流传甚广，当时有人称他为“铁汉”。

李颙既拒征召，便在家中修筑了一个丕室，又名土室，日处其中，将门反锁，到后来甚至与家人也不多见，从墙壁上挖个洞以送饮食。李颙身居土室，写了一篇《谢世文》，表明自己谢绝世事的态度。文中写道：“我常听说古人有预先作好圹穴以作为死后藏骨埋葬之所。我如今有志未酬，又怎么有脸面晤对宾客，挈长论短呢？还是让我以病废之躯，免去一切应酬，在土室中安息，直到咽气。这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恩赐了。”

李颙在土室中供奉母亲彭氏遗像，表示：只因自己奇穷，未能侍奉母亲于生前，希望能永栖丕室，晨夕瞻礼供奉，聊事母亲于歿后。决心不为虚名所累，为清政府所弋获。倘若朝廷再逼迫，唯有一死了之。此后，李颙不仅闭门谢客，也誓于此生断不操笔。

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西巡至关中，他久闻李颙大名，便询问其近况，要求地方官传旨征诣行在，欲有所咨询。李颙以年老气衰行动不便为予以回绝。康熙帝对李颙这类学者已多有领略，知道难以强求。为了表示求贤若渴又宽宏大量，亲笔书写了“操志高洁”匾额书金山诗一首赠李颙，以示关怀褒奖。官吏便急忙

强使李颙作表“谢恩”，他坚决不从。地方官们只好让李颙的儿子“代谢”，并将李颙所著《四书反身录》及《二曲集》呈献给康熙帝，事情才算了结。

（三）为学兼采朱陆，提倡明体适用

李颙为学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认为，朱熹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九渊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傲切。

从学术思想上来看，李颙前期的宗旨是“悔过自新”，后期则是“明体适用”。作为一种立身学说，“悔过自新”说讲的主要是道德修持，立身旨趣。它虽然在实质上是明清之际动荡的社会现实的折射，其归宿也在于“倡道救世”，但从形式上看，则是游离于社会现实的。而“明体适用”学说，则一反宋明以来传统理学重体轻用的积弊，立足于动荡的社会现实，对数千年来儒学所主张的“内圣外王”之道进行新的解释，具有鲜明的经世色彩。当然，“明体适用”是从“悔过自新”说演变来的，不过是将“悔过自新”与“康济时艰”相沟通，赋予他的“明体适用”学说以积极的社会意义。

李颙认为，儒家的学问，是明体适用之学。他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他把格物致知的“物”，大大地扩充了。李颙曾开列了一个读书的单子，书目分为明体和适用两大类。明体类是宋明诸理学大师的著作，他认为这些著作是指导实际的“本体”和源头。在适用类中，他开的书目包括了历代的通典、律令及实录、名臣奏议等，乃至《农政全书》、《武备志》、《水利全

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等等，他认为道不虚谈，学贵实效，主张用酌古准今，明体适用的实学取代凭空蹈虚，高谈性命的俗学。

可以看出，“明体适用”的“体”，是指道德心性的修养。所谓“用”，是指治国平天下及其有关的政治律令农田水利等的应用。在“适用”之学中，李颙重视农学。诸如《农政全书》这样的科技著作，成书于明末，在李颙当时来说是新书，而他已经仔细阅读过了，并且主张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已属可贵。而《泰西水法》，讲的是外国的好经验，表明在应用科学技术方面他并不保守，主张向泰西学习，这就更为难得了。

李颙一生隐居不仕，但对现实并非都不闻不问。康熙三十年、三十一年关中干旱，连年不雨，饥荒严重，人民或死或逃，十室九空。面对此情此景，李颙痛心疾首。他书写了《与董郡伯》、《与布抚台》等，条陈救灾办法，长达数千言，足见他对人民疾苦的关注与同情。李颙还希望朝廷整饬吏治，惩治贪官污吏。他将海瑞等廉吏言行编成一本《牧政往绩》，以供当政者借鉴效仿。这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清王朝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恢复和发展，李颙清初时基于所谓亡国之痛决心不论清廷与清朝官吏短长的想法已逐渐淡化了。

李颙反对学问为少数人所独占，他说：“道无往而不在，学无人而不可，苟办肯心，何论俦类？”^① 强调只要下功夫，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他在《观感录》中，辑录了十位出身凡鄙卑贱的学者，简述其履历，写下了赞语。其中有益丁、樵夫、吏胥、窑匠、商贾兼陶匠、农夫、卖油佣、戍卒、网斤匠、钉戮秤匠、布

^① 《二曲集》卷22，《观感录》。

衣及牧羊痴子，没有一位达官显宦。

李颺还力主自由讲学，认为：“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返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①这也是和清王朝钳制人们思想的政策相对立的。

应该看到，明末清初，理学已走向衰颓的历史时期，不论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已走到了尽头。李颺作为一个理学家，还想兼采朱陆“担当世道”，维护封建秩序，这显然已经落伍了。但其制行超异，取予不苟，讲学关中，推为宗师，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地位的。李颺著述散佚、自焚甚多，现有《二曲集》四十六卷传世。

① 《二曲集》卷12，《匡时要务》。

顾祖禹



坚守志节、成就“绝作”的顾祖禹

· 吕美颐 ·

明末清初，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和变革。特定的时代，不仅造就了大批勇于浴血抵抗强暴的民族英雄，也造就了一批坚守志节，隐居不仕，以奋发著述匡正时难的爱国学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就是其中一个。可以说，如果没有顾祖禹坚守志节淡泊仕途，以全身心贯注于著述，就不会有《读史方輿纪要》这部被时人称

为“千古绝作”的问世。

（一）家败“国”亡，父子偕隐

顾祖禹，字端五，号景范，别号宛溪（因家居宛溪对面），学人尊称其宛溪先生。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享年六十二岁。顾氏祖上是吴中大家，由隋唐迄两宋，子孙代有名人。明成化、嘉靖、万历诸朝都有人在朝中为官。且先祖多有著述，一向被称为“吴中文献”，显赫一方。明末以来，家道中衰，至顾祖禹的父亲顾柔谦这代已是一蹶不振。

顾柔谦出生后即时运不济。幼时，一次与兄等出游，被挤坠大泽，幸亏母亲有预感，派仆人寻迹将其救出，才死里逃生。九岁，父亲英年早逝，剩下孤儿寡母，其后，家难蜂起，连连不断。不仅先世遗留的家财资产园林荡然无存，字画古玩流失散尽，就连祖茔的树木也未能保全下来。在以后的频繁战乱中，家中仅有的藏书又毁于兵燹，家庭生活日益贫困。

顾柔谦年青时入赘常熟谭氏，二十岁时生祖禹。幼年时的顾祖禹受教于父，少承家学又聪明上进，不仅博极群书，并且能背诵经史如流水，给这个衰败的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因而，祖禹深受父亲喜爱。

崇祯十七年，顾祖禹十四岁。这一年，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决定了顾氏父子一生的道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以势如破竹之势攻入北京，明亡；但农民军未能巩固住自己的政权，四十二天后退出北京，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取而代之。像所有

明遗民一样，顾柔谦感到“天地崩裂”，哀愤已极，社稷存亡时刻牵动着他的心。他写了很多诗词以寄托自己的爱国情思，读过他诗词的人无不被激发起悲痛之情。紧接着，又一件事沉重打击了他。顾柔谦尊为父、师的马士奇与挚友黄毓祺、黄淳耀都在清军屠杀江阴和嘉定中殉国。他在家中为他们设立牌位，长哭以祭，悲痛欲绝。此后，他经常闭门而坐，默然不语，有时整日不进茶饭。顾祖禹焦急万分，他虽年幼却很理解父亲的心境，只好一边叩头一边宽慰劝解父亲。后来父子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顾柔谦叫来祖禹，郑重其事地问：“你能否终生甘于贫困，甚至忍饥挨饿，而不去追求富贵？”顾祖禹伏首而跪，严肃回答：“能够。”顾柔谦又问：“你能否做到身为他人几上肉，而不图报复？”顾祖禹回答：“可以。”顾柔谦大喜，感到儿子与自己志同道合，于是无限感慨地说道：“那么就让我们父子一起做隐士吧！”这次谈话确立了父子终生的生活信条。顾柔谦此后便更名为“隐”，将居处命名为“伐檀”，以示隐居的决心。

这一年里，为避战乱，顾柔谦曾携祖禹隐居常熟虞山，躬耕于虞山之野，过着愤懑无聊的日子，生活极为贫困。这期间父子经常议论为人之道、立身之本，有时夜深人静，顾柔谦突然叫起祖禹，父子促膝长谈通宵达旦。有一次顾柔谦问祖禹，以后若非得志，如何对待旧有的恩怨。顾祖禹回答：每当忆起幼时，都忘不了坐在祖母膝上，听她讲述家中种种灾变，也忘不了父亲坠入大泽遇险之事。并表示这些事“永不敢忘怀”。顾柔谦则开导他：“你不能想得如此狭隘！比如，我家累代富甲一方，以你祖父之才竟中途而逝，这是天意！与你有何相关？若说你败家，哪里超得过我？”并教诲他：万不可以家中旧事耿耿于怀。与人相交，要做

到宁肯他人以非礼来，而自己不可以非礼报。^①要求他以此做为一生谨守之道。这一年，顾氏父子在经历世道沧桑后，经过深沉思索，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之路，确立了安身立命的原则。顾祖禹一生坚守志节，但又平和处世，与少年时代这段经历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入清之后，顾柔谦父子一直过着隐而不仕的生活。顾柔谦在明亡前曾补弟子员，为“诸生”（秀才），入清后并未沿着秀才、举人、进士的阶梯走学而优则仕之路，他鄙视功名，无心仕途，立志著书立说。一生著有《补韵略》、《六书考定》、《山居赘论》等。顾祖禹则一生不近科第，不参加科举考试，从未一为诸生，连秀才也不是，并且不仕一官半职，不求闻达，落落人外，专心教书著述，直至终生。他的好友魏禧评价他时说：“祖禹沈敏有大略，为人奇贫而廉介，宽厚朴挚，不求名于世。”^②

探究顾氏父子两代隐而不仕的原因，主要是家败“国”亡的沉重打击，但其家庭迅速败落乃是社会动荡不安的结果，因而，归根结底是社会原因所致。顾家累代得遇明朝廷福泽，从情感上说，自然对明朝灭亡痛心疾首，而与清廷格格不入，这也是当时一批明遗老遗少成为隐士的原因。而顾氏父子还有另一层原因，就是对科举制的弊端有深刻的认识。顾柔谦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在很多方面有远见卓识。他“深慨科举之学，不足裨益当世”，盛平时代只能装点门面，国难当头则不足匡时救世，完全不能经世致用。因而他一生不追求功名之虚荣，立志讲求实学，以著书立说服务社会，并以此对亡明表示一片眷恋之情。他在临死前还对顾祖禹

① 《清史稿·遗逸二》。

② 《读史方輿纪要》魏禧叙。

一再叮咛：“士君子遭时不幸，无可表见于世，亦惟有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舒志意。”^① 顾柔谦生前不止一次同顾祖禹谈论过对科举制的见解，对顾祖禹有很大影响。

（二）继承父志，成就绝作

青年时代的顾祖禹，过着清贫的教书生活。由于家境贫困，年方“弱冠”便为乡里塾师，每岁仅得束修六金，一半交与妻子，其余买纸笔灯油用以读书。长时期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穷困生活。但他受父亲影响，坚决“不求功名于时”，刻苦攻读，没钱买书，便向别人借读借抄。在而立之年以前，他以读书为主，其间行迹有过几次变化。顺治五年（1648年）曾移居约渚渡，依当地文士范贺；顺治七年起，与弟宛涓一同远游福建，历时三年；顺治十年，他家迁居无锡胶山安镇。

顾祖禹从二十九岁起，开始继承父志撰写《读史方輿纪要》。这是一部历史地理专著。研究历史地理可说是顾氏家学，其祖上即有人著地志九边之图说。顾柔谦对历史地理也颇有研究，并有独到见解。他怀着亡国之痛研究了《明一统志》，对众多学者推之于善本的这部书，指出了严重不足之处。认为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例，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其危害足以使今之“学者”，对于国家封疆形势、战略要地“惘惘莫知”，这些人一旦任要职秉国政，就会糊里糊涂将国土沦丧。^② 明

① 《读史方輿纪要》总叙一。

② 《读史方輿纪要》魏信叙。

确地表明了他研究地理学的意图。父亲的学问和经世致用的学风对顾祖禹很有影响，他青少年时期一直喜欢这门学问，经过多年研读和积累，他终于开始着手写作了。

这部巨著开始写作到付梓问世历时三十年。其间，顾祖禹著述甚勤，处己极严，每天自定写作进度，若因故有所耽搁，必补之而后安。为了激励自己，他在居处自题一联：“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先啼。”康熙四年顾柔谦病逝，死前他念念不忘成书之志，呼祖禹于病榻前，勉励他不必计较“遭时不遇”的处境，专力于完成他的未竟之志。最后长叹道：“余死，汝其志矣！”顾祖禹伏地呜咽而答：“子虽不敏，绝不敢忘记父亲的教诲。”这年顾祖禹三十五岁，由于贫贱忧戚交加，大病了三年。病愈，他不忘父训，吮笔含毫又继续投入了写作。

顾祖禹后半生依然过着“既无负廓之产，又乏中田之庐，寄食庖下”的贫困生活，继续以教书为业，“问籍资于馆穀”。^①写作所需的大量书籍，主要靠借阅。每当他“游历所至”亲朋好友处，“惟有借书，随时抄纂。”经济的拮据，使他难以有更多的实地考察机会，他常叹息自己“上不能涉江逾河，登五岳探禹穴，穷天下形势；次不能访求故老，参稽博识。”^②但他还是利用一切出门的机会，进行野外考察。凡舟车所经，“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津关，”并且不耻下问，常与外埠商人、远归的戍边兵士“从容谈论，考核异同，”^③开展调查研究。他以自己的勤奋，通过博览群书，仔细考订来弥补不能野外考察的不足，经常独身闭一室之中，心周行大地九万里之内，别真伪，察秋毫，手画口宣，

① 顾祖禹：《历代纪元汇考序》。

② 《读史方輿纪要》总叙一。

③ 《读史方輿纪要》总叙二。

专心致志于写作。这时期，他僻处宛溪，不交州府，坚守志节。

康熙十三年顾祖禹曾有过一次闽浙之行。当时正值三藩之乱，因此有传闻说他到了三藩之一的耿精忠处，以图反清复明。但后世很多学者认为此论不足为信，也不符合顾祖禹入清以来的一贯行为。

返回家乡后，顾祖禹从康熙十九年起受聘到昆山徐学乾家坐馆。徐学乾是当时江南有名的文人，对顾祖禹比较敬重，在他教书之余，“听自纂述”。在这里，顾祖禹有机会饱览徐氏传是楼丰富藏书，对于《读史方輿纪要》的最后完成，很有帮助。康熙二十五年徐乾学奉诏修《大清一统志》，请顾祖禹参加，他固拒，“三聘乃往”，不久随徐乾学前往北京修志馆。在北京他得以同阎若璩、黄仪、胡渭等著名地理学家相识。

他们朝夕相处，奇文共赏，疑义相析，顾祖禹深感受益匪浅。在一生的最后几年，他十分注意对《读史方輿纪要》的修改完善，每有新得，即“改窜增益之”。在编纂《大清一统志》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必须提及，就是徐乾学曾打算举荐顾祖禹为官，被断然拒绝。此书编纂完毕，他又拒绝列名。这些都表明他坚守初衷。

康熙二十九年，已近垂暮之年的顾祖禹返回故里，二年后逝于胶山，葬于盛姬墩，终年六十二岁。他的巨著——《读史方輿纪要》历经三十年，十易其稿，随着他的逝世最后完成。

《读史方輿纪要》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历史地理专著，在清代已蜚声于学术之林，与《南北史会抄》、《绎史》合称“海内三大奇书”、“千古绝作”。著名学者魏禧盛赞该书为“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作”。^① 三百年后的今天这部书仍被列为研究我国历史地理和

① 《读史方輿纪要》魏禧叙。

军事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该书共一百三十卷，首叙历代州域形势，再及明末清初省、府、州、县疆域、沿革、名山、大川、关隘、古迹等。着重考订古今行政区划的变迁和地理形势的战守利害。其写作特点是不同于徐霞客、顾炎武等地理学家着重于进行广泛的野外实地考察，而主要依靠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远追《禹贡》、《职方》，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稗史野乘之说，参考了二十一史和百余种地方志，可谓广稽博采。这固然与顾祖禹因经济原因，不具备进行更多的野外考察机会有关，也与他研究地理的方法论有关。他认为一个人不可能走遍天下每一个角落，所见所闻总有局限，有时还可能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情况。他利用文献考核纠正了不少前人的错误记载。例如：辽代二百余年间都城有一次迁徙，只因未正式宣布过迁都，记载多有忽略，顾祖禹首次订正过来。他还纠正了认为金沙江是龙川江别名、把滇池当洱海的错误记载。

《读史方輿纪要》的最大特点，是讲求輿地学的经世致用。他像当时很多学者一样，深感空言误国，主张务实治学。该书总叙明确指出了著述目的在于“垂之后世，俾览者有所考镜。”^①上可助君臣治国安邦，下可为士农工商经营与行旅提供指南。使读者不分贵贱，都能有所裨益。他很具体地分析道：“天子因内抚万民外抚四夷”，固“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不知；宰相佐天子，于“边防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不可不晓；百司为天子综理万物，不可不知“财赋之所出”；监司守令等地方官，更应了解所属地区疆域形势、山泽桑田水利和风俗民情各种情况；就是百姓四民，也应知水陆行旅形势，以避险趋夷。这样，既可作

① 《读史方輿纪要》总叙。

到“世乱则由此佐折冲，锄强暴；平时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他特别痛惜地总结了明亡的教训：“任国事者”于“惘然无所适从”，将宗庙社稷“束手而畀于他人。”^①

该书特别突出了军事地理的地位，不重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的记叙，而重地理形势对战守攻取难易的分析，不论哪一卷都明确贯穿着军事思想。每省卷首都论及疆域山川形势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每叙述到城镇、山川、关隘、桥、驿也都少不了论及军事上的地位。他十分强调直隶在护卫京师方面的重要性。这些大都被后来的战争史所一一证明。

顾祖禹地学观点的另一特点是能比较辩证地认识人与地理的关系，没有盲目地陷入地理决定论。他认为，从根本上看，地理条件的作用是从属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人和社会。他以函谷关和剑阁为例指出，秦国人最初利用函谷关抗拒六国很成功，而秦末农民起义中却难以拒“群盗”；诸葛亮可以出剑阁而震秦陇，刘禅有剑阁却不能保成都。这都是人的因素所致。在那时，能用这种辩证观点来看待人地关系，实属难能可贵。

顾祖禹一生著述很多，除了《读史方輿纪要》，还有《方輿书目》、《四书正旨》、《经书正旨》、《宛溪诗文遗稿》等。可以肯定，随着岁月的流逝，不仅他的著述将会代代相传，而且他坚守气节以成绝作的精神也将受到子孙后代的仰慕。

① 《读史方輿纪要》总叙一、三。